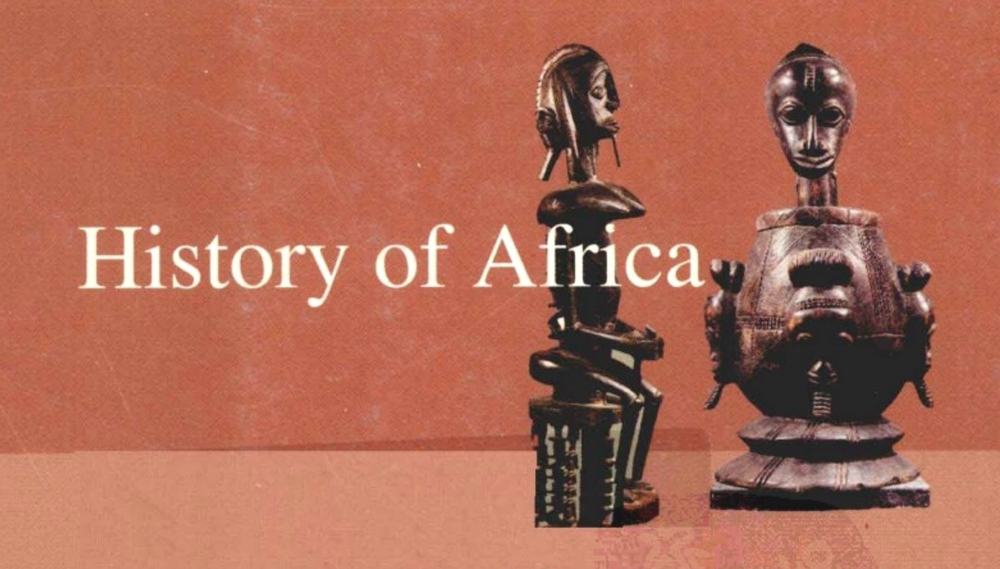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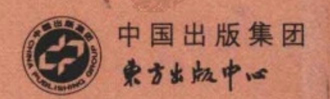


非洲史

凯文·希林顿 著　赵俊 译　刘鸿武 校





History of Africa


ISBN 978-7-5473-0490-7

9 787547 3049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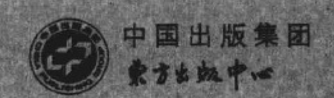
定价：55.00元



非洲史

凯文·希林顿 著　赵俊 译　刘鸿武 校

History of Africa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2010 -2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史/(美)希林顿著;赵俊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2.8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490-7

Ⅰ. ①非… Ⅱ. ①希… ②赵… Ⅲ. ①非洲—历史
Ⅳ. ①K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5853 号

责任编辑：赵　明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40
字　　数：550 千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90-7
定　　价：55.00 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序　　言

非洲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恰好与众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出现同步。在过去的50年里，在非洲、欧洲和北美等大学和档案馆里工作的专职历史学家已经写了数百万字、数百卷的非洲史著作，内容涉及非洲史的方方面面。因此，大部分非洲国家现在得以夸耀其自身的“民族”历史。其中，有一部分著作在当地的中小学和大学里被作为历史学习的基础性教材。同样地，出于中学教学的需要，关于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非等地导论性质的区域史著作也已经面世，大学教学提纲也在构思之中。但是，整个非洲大陆的通史，尤其是那些追溯到最原始时期的通史著作，往往在语言与思想上显得过于晦涩与复杂。因此，非专业的普通读者、高中生或是大学生们，在涉猎时间跨度更大一点的非洲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有点气馁，发现自己难以把握。 xiii

这本《非洲史》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读者难以把握的上述问题，展现出一个用词平白、基础性强且图文并茂的文本。因此，它给尽可能多的读者介绍非洲漫长而又迷人的过去，既容易理解，又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本书尤其关注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发展及其如何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同时，我对非洲大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与发展以编年体的方式进行了评论，并触及很多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主题。

本书从最早期的人类进化写起，循着非洲历史的轨迹，论述了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非洲国家与社会的兴衰沉浮，在论述最近数个世纪不断加强的欧洲干预的时候，我关注的焦点依然放在非洲本土的观察视角、发展与能动性上。最后，我将非洲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置于非洲本身的历史场景中，因此避免了很多论述当代非洲大陆的作品中所具有的那种严重的负面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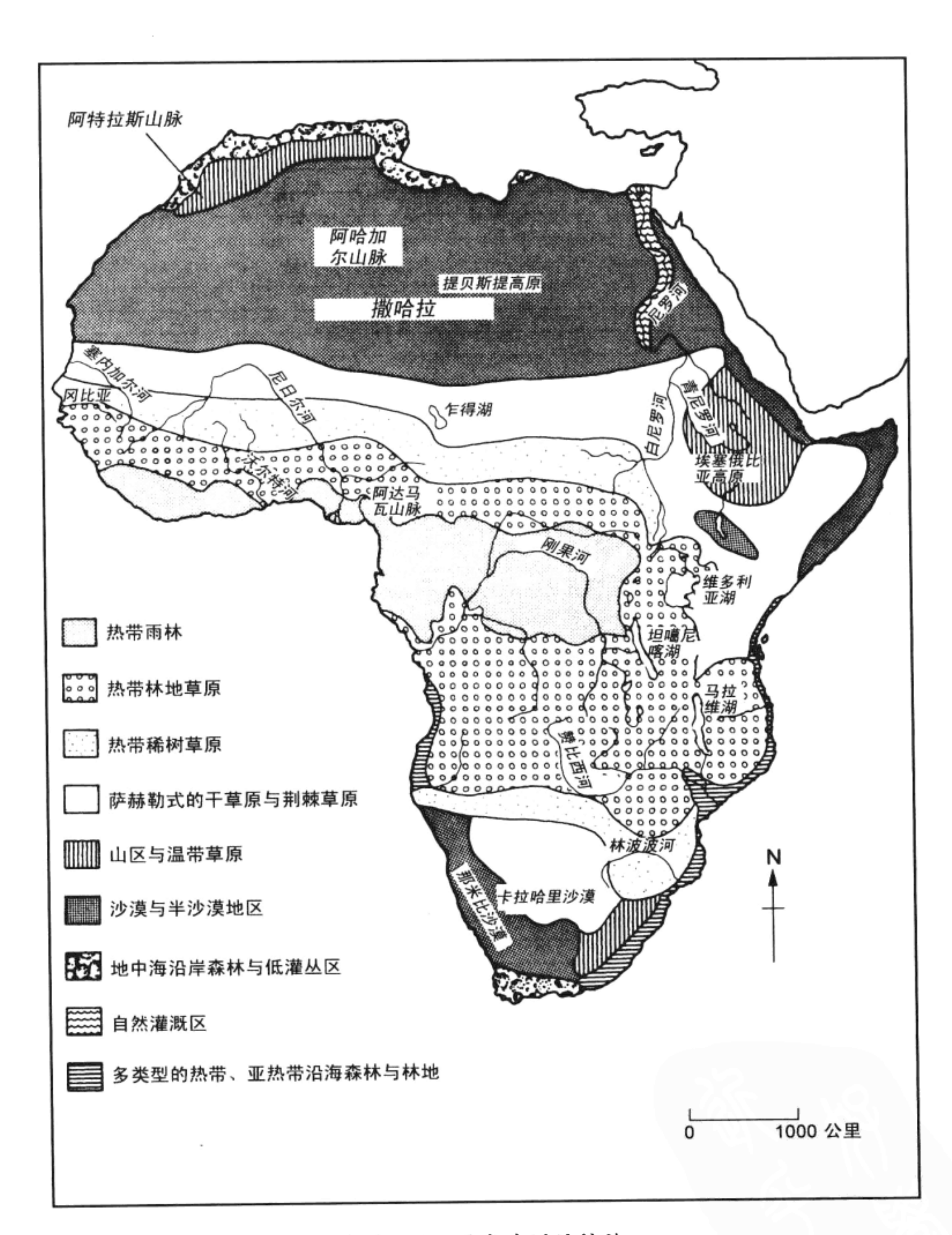
除了依据新的研究成果修订了一些历史解释外，第三版还论述了近现代的非洲历史，并将时间跨度推进到新千年。因此，增加的最后一章对非洲大陆做了宽泛的扫描，讨论了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的民主变迁，审视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历程并讨论了主要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要感谢非洲史研究的同道们，这种感激之情在此刻难以名状。我广泛地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只是希望我的诠释对他们的努力来说是公平的。最后，我要把这本书献给皮帕(Pippa)，没有她不遗余力的鼓励与支持，本书的写作是绝不会完成的。

凯文·希林顿

伦敦





地图 1.1　现代非洲的植被。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非洲的早期史前史

“人类的摇篮”

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于1859年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物种起源》)。达尔文在应用其进化论分析人类起源时,认为人类的诞生地可能是非洲(《人类的由来》,1871年)。达尔文的思想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极大争议。这一争议部分是由于宗教原因而引起的。达尔文挑战了神学观念,即上帝在一周内创造了人类及其他众生。达尔文著作的面世恰逢欧洲强调帝国扩张、宣扬欧洲种族优越论的时代,许多欧洲人难以接受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非洲这一观点。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在非洲南部、东部和北部干燥的热带草原和林地进行的科学研究,为证实达尔文观点的真实性提供了足够的证据:非洲确实是“人类的摇篮”。此外,非洲似乎不但是人类本身的起源地,而且也是早期人类史前史中的远古世界的很多技术革新的起源地。

证据

在人类早期演化过程中,非洲是唯一有迹可循的大陆。人类演化的物质证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代骨骼、化石、石制工具和其他人工制造物的发现和研究。

化石是在岩石的地质构造过程中形成的。陷于岩石内的动植物遗体受到强大压力的挤压,在岩石内留下了印记。岩石在后来的自然进程中被现代研究者打开,一个完美的有机物印记(化石)就显露出来了,这一印记可能千百万年来一直包裹于坚固的岩石内。使用地质科学方法可以得出岩石形成及化石形成的大致年代。自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以来,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放射性碳(Carbon - 14,即碳 14)年代测定法,以估算如骨头、木炭等有机物遗骸的年代。

早期放射性碳测试的结果很不准确,近年来研究出的新技术则可以更为精确地测定更大范围内的有机物遗骸。

2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动植物在其生命周期内会从空气中吸收微量的放射性碳(碳 14)。动植物死亡后,其体内的碳 14 含量会以一种稳定的、可测量的比率逐渐减少。因此,科学家通过测量如骨头或木炭等有机物碎片的碳 14 含量来计算物体的大致年代。计算结果从来不是绝对准确的,但对于研究对象为年代而非精确数据的考古学家来说却大为有用。

最早期的类人动物

从进化方面来说,现代人类属于“人科”(hominids)中的灵长类。人科是对具有更大脑容量,并具有双腿直立行走能力的人及类人动物在生物学上的总称。现代人类是百万年来唯一生存下来的人科动物。但是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很多不同的人科动物种类。化石证据显示,原始人类的最早种类是数百万年前从其他灵长类动物家族——非洲森林猿类(包括大猩猩和黑猩猩)演变而来的。

虽然化石证据有着显著的差异,人们对最早期的原始人类还是知之甚少。原始人类似乎是在距今 1 000 万—500 万年之间的某个时期走出热带丛林,并迁徙到东非更广阔的大草原和林地地区的。在那里,他们开始发展出直立和两腿行走的技能。对于他们究竟是怎样以及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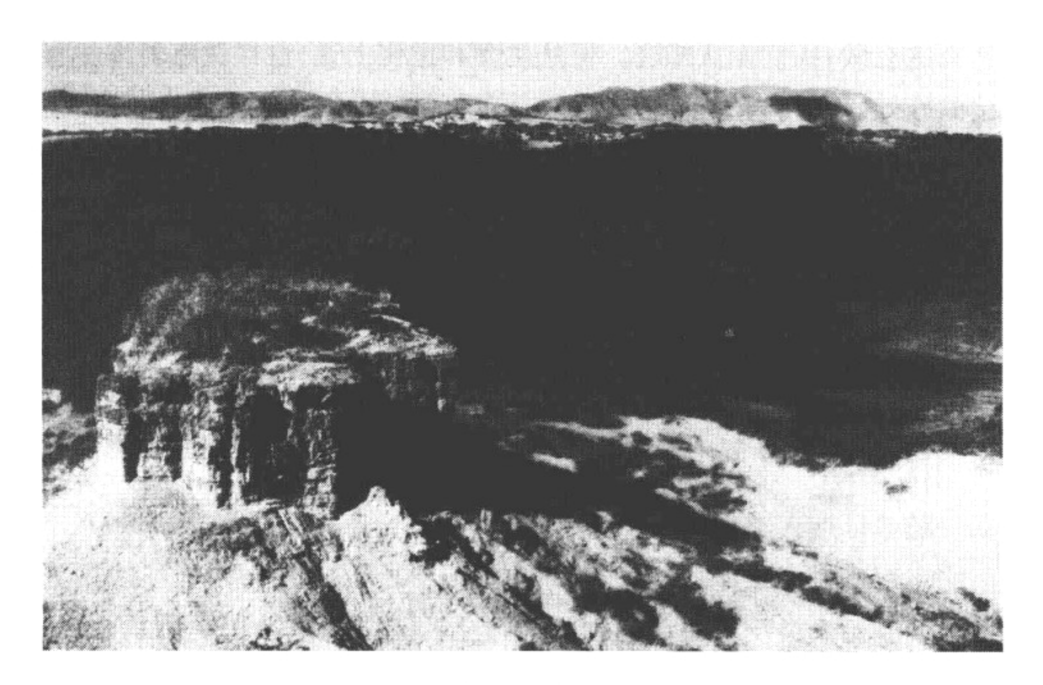
什么这么做，我们无从知晓。但从生存和进化上说，这样做有着许多直接的好处。在开阔的大草原，直立行走可以让他们观察草原，发现以他们为捕食对象的狮、豹等食肉动物。那些直立能力最强的原始人可以生存更久，繁衍更多，并把这一优势传给他们的后代。两腿行走的优势更为重要，它使得双手得以解放，以便捉拿食物和使用工具。再也无需短粗、有力的手指以便在森林里的树枝间攀援，早期原始人进化出细长的手指以从事复杂的工作并最终可以制造出工具。

南方古猿与智人的早期进化

随着早期人类化石在东非、南非以及撒哈拉地区被发现，500 万年前的化石资料不断地得到扩充。持续到 150 万年前的材料，展现了大量早期原始人类及相关动物种类的进化和灭绝的复杂历史。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它们中的大部分是食腐动物，还有一些是食草动物，其他是食肉动物。它们的脑容量还不及现代人脑容量的三分之一。它们是工具的使用者而非制造者。它们不自己加工工具，而是使用可以随手可得的树枝和石头。

随着最早的工具制造者的进化，这种情况在约 250 万年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一重要变化，这些原始人成为能人(Homo habilis)，即最早的人类。诸如猩猩等为数众多的动物虽然使用树枝和其他工具来协助寻找食物，但制造工具的能力、使用这些工具猎取和寻找食物的能力将智人与其他动物、南方古猿区分开来。虽然能人的脑容量不到现代人脑容量的一半，但人们还是认为现代人起源于能人。他们的石制工具，如奥尔德沃型(在肯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被首次发现)石器，只是简单的砍砸器、刮削器。这些石器通过砍凿火山岩石的碎片形成锐边而制成。一些砍凿过的碎片可能用来切割或刮削兽皮，也可能用来削树枝。不过，这种工具的最终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石头的结构。

南方古猿在其发展后期继续和能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与更有能力的智人属类相比，在食物竞争上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到下一个



奥杜瓦伊峡谷。

重大进化阶段,即 150 万年前时,南方古猿已经绝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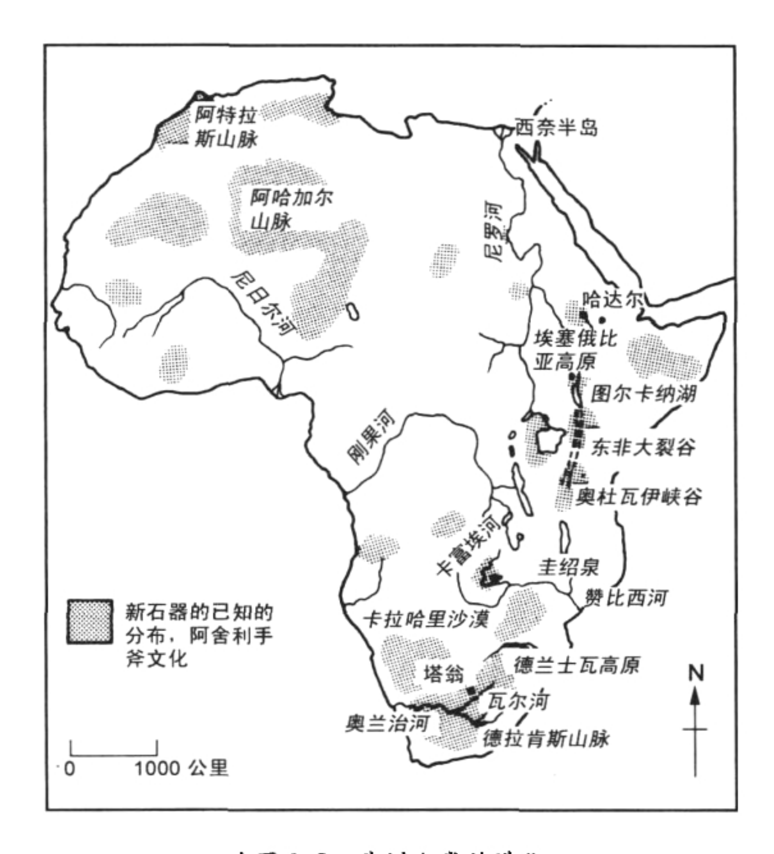
早期石器时代

后一个进化到智人的是匠人(Homo ergaster, 180 万年前),更为有名的直立人(Homo erectus,150 万年前)就是由匠人转变来的。直立人是第一个能按照预定形状来制造特定、精确的石制工具的原始人,这种能力需要智能的重大进步。直立人的脑容量是现代人脑容量的三分之二。

直立人也是第一个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的原始人。直立人的遗迹,即他们在 100 万—50 万年前制造的工具在整个非洲、欧洲南部和亚洲,甚至远至中国都有发现。1927 年首次发现的“北京人”,可能就是后期的直立人。

4

直立人使用的最有名的工具是“手斧”,通常被称为“阿舍利文化”(Archeulian),因手斧最早发现于法国南部的阿舍利而得名。手斧是一种坚硬、锋利和厚重的工具,两边均经过打凿以达到预定形状。手斧可能被用来切割、剁劈或采掘。尽管手斧是以其发现地命名的,但大多



地图 1.2　非洲人类的进化。

数阿舍利文化的工具是在非洲发现的。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制造精良的手斧样本，这些手斧是由熟练工匠花了数小时做成的。一些手斧甚至可能还具有象征性的礼仪功能。在为亡者安葬时，肯定存在一些礼仪或早期宗教形式。而且，我们发现阿舍利文化时期的直立人过着有规律的、季节性的营地生活，并且他们开始合作狩猎，而不是简单地寻觅食物。他们也是最先学会控制和使用火来烤肉、取暖的原始人。无论在非洲、亚洲还是欧洲，阿舍利文化的工具是最具特色的一种工具，尤其是手斧在形状和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点进一步确认直立人最初都是起源于非洲。

中期石器时代

2003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偏远岛屿上发现的化石显示，亚洲

5

直立人的某一个经过进化的后裔可能存活到有史时代。但是,这一证据还有可疑之处。直立人和所有其他早期原始人类很可能在 150 万—20 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期就灭绝了,且为早期智人(Homo sapiens)所取代,后者的脑容量几乎接近现代人的脑容量。虽然这些早期智人的一部分也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南部,但是这种演变在非洲又一次发生了。20 万年前,随着早期智人的出现,技术变革的速度开始加快。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中期石器时代"。

在中期石器时代,石制工具种类更多,也更精细,骨头也开始被用来制作特定的工具。工具制造及其风格的地区性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不同于过去的"粗糙",打凿石头碎片开始应用新技术。因此,浪费减少了,制造者也集中于选择那些最好、最适合的石头,如黑曜石,这是一种像玻璃似的、坚硬的火山石,可以打凿出特别锋利的边缘。有些石头碎片还可以进一步被加工为更好的"刀"和刮削器。一些打凿过的石尖可能被用作矛头,用植物浆和绳索固定在木制杆上。这种情况和其他迹象显示出个体狩猎技术的良好发展。火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营地生活变得更有组织性。遮蔽点是由树枝、草和石头建造而成的,在气候更为寒冷的非洲北部和南部,原始人在洞穴中寻求庇护。

晚期石器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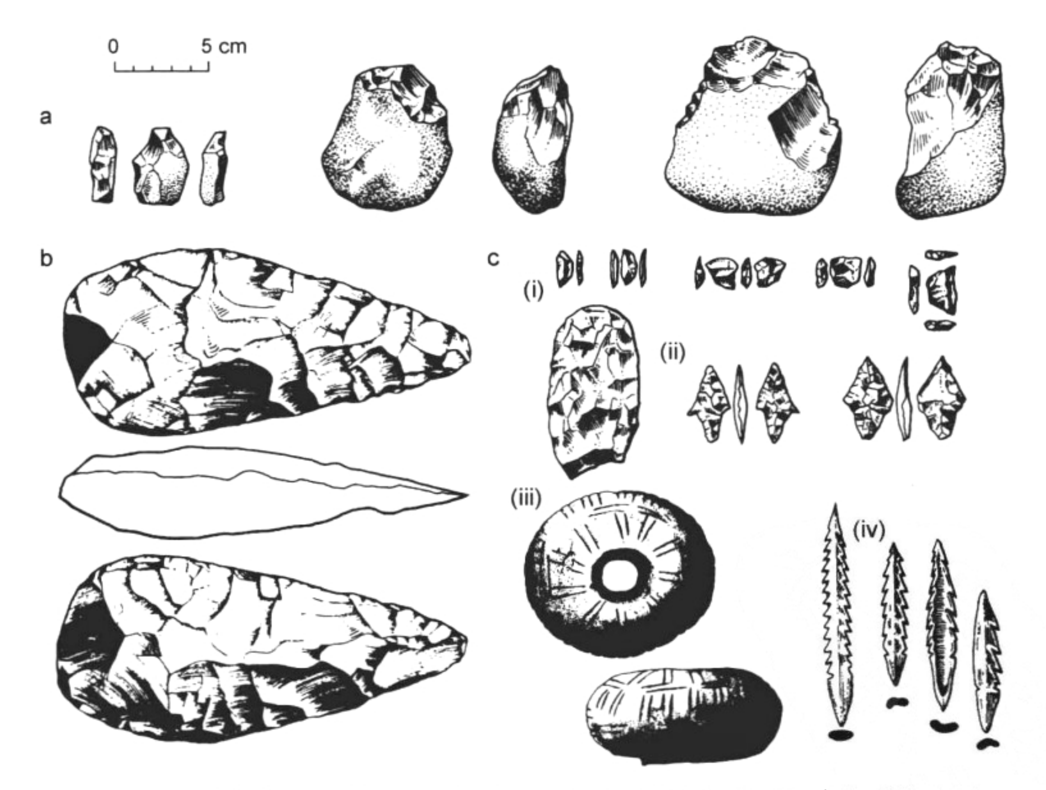
在约 12 万—9 万年前,非洲东部、南部的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最终彻底进化成现代人。这些人有着和现代人同样大小的脑容量,可以像现代人那样思考。事实上,他们和现在的我们一样,唯一缺少的东西是我们的经验教训和积累的知识。因此,他们成为人类思想、哲学、宗教和技术的先驱者。虽然晚期智人的人口数量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依然很低,但到 6 万年前,晚期智人遍及大部分的非洲大陆并开始进入亚洲和欧洲。到 1 万年前,他们扩展到世界的主要区域。我们抛开世界上偏远地区一些物种存在的可能性,通常可以认为在晚期智人遍及世界的其他地区时,所有更早期的智人已经灭绝了。

最早期的晚期智人来自热带非洲,他们皮肤可能是棕色的,在外形

上与当代非洲人在某些方面类似。随着他们遍及整个非洲并移居到世界其他大陆,他们适应了气候和环境的变化。生活在炎热的热带非洲地区的晚期智人形成了最黑的肤色,以避免直接受到炙热太阳的有害光线的伤害。那些迁移到寒冷气候地区的晚期智人形成了淡一点的肤色,以更多地吸收太阳光中较少的有益光线。因此,世界上各个民族间的"种族区别"完全只是对气候和环境外表上的、区域性适应而已。所有人属于一个物种,其起源地就是非洲。

6

晚期智人在石器时代技术上取得了更重大的进展,主要特征是细石器(即细小石器)的出现。石头碎片被加工、再加工成细小精致的石尖和刀片,有时被加工成具体的几何形状,诸如三角形和月牙形。刀片的薄棱再被削尖,变得更为尖锐和锋利。这些"回炉"的刀片几乎全被



非洲石器时代的细石器与人工制品 a. 来自奥杜瓦伊峡谷的奥尔德沃工具;b. 中期石器时代:来自刚果南部卡莫阿具有阿舍利文化特征的手斧;c. 晚期石器时代工具:(i) 细石器;(ii) 斧头与箭头;(iii) 装饰过的钻孔加重挖掘棒;(iv) 骨制鱼叉头。

安装在木制杆上以制成矛,甚至是箭。这一时期狩猎技术的主要进步之一是弓箭的出现,弓箭使得狩猎技术突飞猛进。晚期石器时代,人类也制造各式各样的骨制工具:锥子、针、鱼钩、箭倒钩和鱼叉。非洲很多地区发现了人体装饰用的薄珠和石画石刻等伟大创作,显示了这一时期艺术上的发展。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总是难以区分。在某些地区,简单点的中期石器时代的技术与工具会延续一段时间,与晚期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技术并存。新技术的采用可能受制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同样也受制于技术发展的水平与人的能力。石器时代不同于之前的漫长时期,在技术与生活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

晚期石器时代的狩猎、捕鱼和采集

在种植粮食作物和驯化动物的技术出现以前,人类的生活依赖狩猎和采集在陆地上自然生长的野生动植物。甚至他们的工具和装饰品——由石头、骨头、羽毛或蛋壳制成的——也都是从陆地上采集的自然物品。

我们对晚期石器时代的狩猎者、采集者的很多认识都是来自大量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过去 40 年来的考古发现。在今天博茨瓦纳干燥的里沙漠(Kalahari)地区,为数较少的说科瓦桑语的人仍然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在 20 世纪,考古学家对他们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有助于考古学家解释出土的晚期石器时代文物。晚期石器时代细石器技术的证据在整个非洲草原和干燥林地都有发现。赞比亚中部卡富埃(Kafue)流域的圭绍泉(Gwisho springs)地区的发掘物可能是最丰富的。卡富埃平地的渍水土壤保存了一系列独特的植物、石制骨制材料,以及 30 多具人类骨骼。该遗址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 2000 年。该遗址和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其他不那么有名的遗址,展现了一幅相当清晰的关于狩猎、采集等生活方式的画面,可能是非洲草原地区晚期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典型场景。

但是,晚期石器时代保留下来的最生动的证据可能体现在原始人类洞穴和居所岩壁上的绘画和雕刻中。这些绘画、雕刻的样本遍及从

北方的撒哈拉中部到南方的德拉肯斯(Drakensberg)山脉，这些地方都是非洲的干燥地区。他们的绘画颜料主要为红、黄、橘黄和白色颜料，是用树枝、羽毛和植物染色后的动物脂肪所做成的。绝大多数绘画展示了自然状态中的生物，如动物和人的形象。有些绘画描绘的是狩猎、捕鱼或舞蹈场景。其他绘画更抽象些，可能是受到涉及生命、死亡和精神世界的宗教信仰的灵感的启发。

狩猎

对居住遗址发掘出来的动物骨头、石制品的细致研究，揭示了原始人类狩猎的很多信息。在非洲草原地区，晚期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狩猎的动物种类广泛，既有大型动物也有小型动物。特别打凿的细石器被粘合固定在木柄上，成为多刺的长矛，但最重要的狩猎武器是弓箭。箭杆装有石制、骨制的尖锋，这些尖锋被精心地用植物毒汁处理过。狩

8



刚果东北部伊图里森林中携带着猎网正在回家途中的现代班布蒂俾格米人。

猎小组借此可以捕获在非洲平原上奔跑的大型羚羊、野牛。毒液虽然起效缓慢，但也会使动物，甚至是最大型的动物最终倒地不起。很多小型动物也可以用陷阱、圈套，可能还有网来捕捉。在热带雨林的茂密林地，轻质的弓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在那里，更大、较简单的中期石器时代的工具和武器被继续使用着，人们用圈套、坑洞、矛和斧子可以捕获到更多的猎物。

捕获到的动物不仅仅只是作为肉类食物，动物的骨头也可以用来制造工具或装饰品，动物的皮革也是有用的原材料。动物的皮被锋利的、拇指大小的石制刮削器刮过之后，再经过干化、柔化，最后做成衣服、遮蔽物、皮带、采集袋或携带孩子的吊兜。

9

捕鱼

晚期石器时代，绝大多数原始人会充分利用易于获得的任何食物资源，包括那些适合捕鱼的河流与湖泊。鱼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人们一旦掌握技术，就能够非常容易地、大规模地进行捕捞。在非洲的某些区域，捕鱼和采集贝类生物是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这显著影响了相关区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期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在非洲西部、南部的沿海地区的石头间采集贝类生物了，这种采集所需的技巧很简单。在一年内的特定季节里，人们也可以捕获搁浅的海豹。在晚期石器时代，人们可以进一步地制作出带有骨尖的鱼叉、潮汐陷阱，甚至可以用网来进行捕鱼。

采集

虽然狩猎、捕鱼的考古证据非常容易找到，但采集的证据却不是那么明显。植物往往并不像矛、箭上的动物骨尖或石尖那样，经历几个世纪仍可以很好地保存下来。然而，20 世纪对保存下来的少量狩猎-采集者群落遗址的研究却发现，采集提供了当时人们日常食物的三分之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采集在遥远的古代不是那么重要。

10

采集可能主要是由女人来做的，用的工具是挖掘棒和携运袋。她们采摘各种各样的野生水果、坚果和瓜，并从地里挖掘可食根茎和块茎。她们也采集诸如白蚁、毛虫和蝉之类的生物。从很多方面来说，植物食品的采集比狩猎更为可靠。人们每年都可以收获树上和灌木丛中的果实，有经验的采集者根据不同植物的收获季节不断地更换采集地。

社会组织

从居住地的遗址证据可以发现，晚期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群落通常过着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生活。在干燥地区，这些新型的群体，通常不超过 20 个人。较潮湿的地区有着大量的猎物和植物，人们以 50 个人甚至是 100 个人组成的群体生活在一起。但是无论群体规模多大，人们都可能是以家庭为单元被松散地组织起来的。从狩猎-采集者群体的情况来看，群体间为了婚嫁或其他目的也有着自由的流动。在有洞穴和悬崖的地方，人们就把洞穴和悬崖作为遮蔽所。在更加开阔的地方，他们用树枝、草和石头做成临时的防风屋。在某些地区，季节性帐篷一次会使用数周或数月，圆锥形蔽体可能是用弄弯并捆绑在一起的树枝制成的，并用茅草覆盖。

最近对卡拉哈里的科伊桑狩猎者的研究揭示出，狩猎-采集者群体为了生存而依赖合作劳动和集体努力，这是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男人和女人之间虽然存在劳动分工，但是地位没有高低之分。他们认识到彼此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在一天结束时，采集和捕获到的食物被带回居住地，在群体中平均分配，也没有赋予成功的狩猎者以特殊地位。

气候变化、适应及非洲语言的起源

10

我们在研究石器时代狩猎和采集群落的总体特征时必须慎重，不能把石器时代晚期设想成一个没有历史发展或变迁的永恒阶段。正如近几十年一些非洲人面临的经济和生态危机，并由此造成无法供养越



现代卡拉哈里桑人。

来越多人口的情况一样,非洲人在更早的古远时期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公元前 2 万一前 1.6 万年,非洲气候和植被与近十几年的非洲情况类似。刚果盆地以延展到西非沿海绝大部分地区、远至塞内加尔南部的热带雨林植被为主。刚果盆地以北和以南地区则主要为干燥森林、开阔的热带草原林地、大草原、干草原以及沙漠。在非洲东部、南部的高原上,主要为热带林地和草原。然而,在公元前 1.6 万一前 1.15 万年,非洲面临着一个更为干燥的气候:雨林减少,沙漠区增加。随着旧式狩猎和采集技术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不适宜了,人类面临危机,人口数在这一时期急剧下降。然而,那些学会适应的种群通过文化和语言把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现代非洲土著语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他们。

研究非洲语系的语言学家已经在非洲东北部地区、尼罗河中上游的峡谷至少追查到四个可能起源地中的三个。在苏丹北部险滩、红海和埃塞俄比亚高原间,说亚非语系(Afro-Asiatic)的人专门收集野生草茎。他们烘烤种子,用碾磨石把这些种子和干化的茎碾磨成面粉,再把面粉烘焙成扁饼。说亚非语系的人向南扩展到埃塞俄比亚

11

高原周边,从厄立特里亚到索马里,最后扩展到肯尼亚的东北部。在肯尼亚东北部,他们成为说库希特语(Cushitic)民族的祖先。他们把脱粒和碾磨技术向北带到埃及和西亚。他们向西扩展到北非,同化了更早期的卡普萨(Capsian)的狩猎-采集者,并成为说柏柏尔语(Berber)民族的祖先。

说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人居住在说亚非语系人的南部,即努比亚山脉和尼罗河中游之间的草地,其祖先有其自身的来源。这些人主要用投掷矛的方法专门捕猎那些以丰草为食的大型羚羊。他们的捕猎物可能还包括后来被驯化的撒哈拉野牛。他们沿着撒哈拉以南的草原区,主要向西一直扩展到乍得湖(Lake Chad)和尼日尔河河曲。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的桑海人可能起源于此。这些说尼罗-撒哈拉语系人也向南扩展到大湖地区、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西南地区,成为这些地区希鲁克人(Shilluk)、丁卡人(Dinka)、努尔人(Nuer)和阿乔利人(Acholi)的祖先。

尼罗-撒哈拉语系的西南,尼日尔-刚果语系(Niger-Congo)的祖先专门用弓及上毒的箭在西非的林地草原上狩猎。他们也挖野生薯,用钩、线可能还有篮子来捕鱼。尼罗河中游以西的科尔多凡人(Kordofan)的语言与尼日尔-刚果语系关系密切,一些语言学家因此认为科尔多凡人可能是后来向西迁徙到西非的尼日尔-刚果语系人的最初祖先。然而,其他语言学家则相信科尔多凡语更可能仅是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一个遥远分支而已。被考古学家称为卢彭巴文化(Lupemban tradition)的石器时代刚果森林里的狩猎者,可能是现代班布蒂、巴特瓦(Batwa)狩猎者的祖先。他们的古语言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被尼日尔-刚果语系的支系班图语(Bantu)所吸纳,并已经消失了。

最后,科伊桑语族的起源地似乎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地区。他们主要擅长狩猎、采集,采集用的是细石器,包括弓、毒箭以及用来挖可食块茎的挖掘棒,这种挖掘棒还用钻挖石加重过。科伊桑语族扩展到整个非洲南部和中南部,并同化了早期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的技术特别适合于开发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这些干燥的半沙漠地区。这可

能是这些地区将他们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一直保存到现代的原因。在东非、中非和南非的大部分地区，科伊桑语族从公元纪年一开始就被尼日尔-刚果语系的班图语族所同化（参见本书第四章）。哈扎人和桑达韦人(Sandawe)是他们在坦桑尼亚的后裔。

这一部分所描述的语言和文化的扩展，是一个同化而不是取代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正是技术及与之伴随的文化和语言在扩展，而非大规模的实际人口在扩展。然而，为了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他们的新技术是成功的，并对非洲的晚期史前史产生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第一，他们的语言、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开始主导并同化非洲大陆上所有先前的语言和文化。新旧的结合产生了独特的新的地区文化和语支，而这成为非洲有史时代民族的古老起源。第二，一旦气候条件更为适宜，就会出现农业和畜牧业，因为他们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进行集体狩猎和采集的知识和悟性为此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晚期史前史：热带非洲和古埃及的种植业与畜牧业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大约 1 万年前时，非洲的人类社会就已经将晚期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但是在人口构成上，基本还是以狩猎者和采集者为主。他们的食物和整个生活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到晚期石器时代的末期，由于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出现，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13

作物栽培、驯化与种植业的起源

迈向作物栽培的第一步可能开始于野生谷物的采集，前文对此曾有叙述。人们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转向了那些现在通常被称为“禾谷类作物”的产量丰硕的“草”。这些“草”在西亚和埃及主要是小麦和大麦；在夏天降雨量大的热带非洲草原地区，这些“草”主要是高粱和稷。栽培开始于对野生谷物的精心保护、除草、选种和重新播种。块根植物的栽培也同样如此。人们很快认识到选自最强壮植物的种子是最好的，种植这些种子可以在来年获得最好的收成。在植物的多次世代交替中推行这一原则后，这种植物开始依赖于人类的栽培。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和保护，这种以新的形态出现的植物无法再与杂草竞争或在野生状态下存活。此时，这种植物开始被“驯化”，真正的种植业开始出现

了。从野生作物的栽培到驯化作物的种植,这一过程是渐进的,也很难在考古材料中得到佐证。

驯化动物和畜牧业的过程与此类似。最初,那些最能满足人类需要的野生动物得到了保护,摆脱了食肉动物对他们的威胁,放牧于一个又一个适合喂养的地方。这些动物得到很好的喂养,无需躲避野生食肉动物。历经几代,这些动物的体格渐渐大了起来,也变得比较笨拙,依靠自己已难以存活下来。它们较大的体型满足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放牧者从每个动物身上可以获得较多的肉或奶;另一方面,在人类的保护下,放牧动物(牛、绵羊或山羊)的生命更长,繁殖能力更强。当依赖性开始出现的时候,以新形态出现的动物就无法再在野生状态下生存,它们已经被“驯化”了。

14

农业的影响

随着种植业的出现,人们的定居点变得更大、更持久,他们不再需要为了寻找野生食物而永远处在迁移状态。他们选择把定居点设在土壤肥沃的适当地区,并在周边种植作物。与此同时,人口开始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食物增加的结果,因为食物供应变得更为稳定,更为丰富。人们生活在有更多人口定居的村落,女人可以更经常性地生育孩子。不同于狩猎-采集者村落,这里的孩子不再是负担。在家庭的安全保护下,孩子可以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照料。同时,更大规模的家庭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孩子在较小的年纪就可以在田地上劳作,吓跑鸟雀、给作物除草或照管牲口。因此,更大的家庭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从而又使更多人口的食物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

随着人们可以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定居,他们开始建造更坚固的房屋。这些房屋通常构造简单,由泥浆、木杆和编织后的麦秸以及茅草建造而成。有时,房屋本身或围绕定居点的围墙也会用石头建造。此时人们既是种植者,又是狩猎者和采集者,因而需要更多种类的工具。由于生活在更长久的定居点,需要储存东西的器皿,于是人类制造出用焙烧黏土做成的陶器,用来储存、运送或烧煮食物和水。陶器残片和由

于多年碾碎谷粒而变得平滑的碾石，通常是证明古代早期农业村落存在的考古学证据。人们渐渐制作出更为精密的工具。这一时期特有的工具为磨制石斧。不同于阿舍利时期仅仅把岩心砍凿成所需形状，此时的工具制造者会在更为坚硬的岩石上磨制石器。尖锐的边缘有了一个平滑的斜面，更像现代的金属斧头。这种新式制石技术有时被称为"新石器时代"(Neolithic，来源于希腊语，neos 意思是"新"，lithos 意思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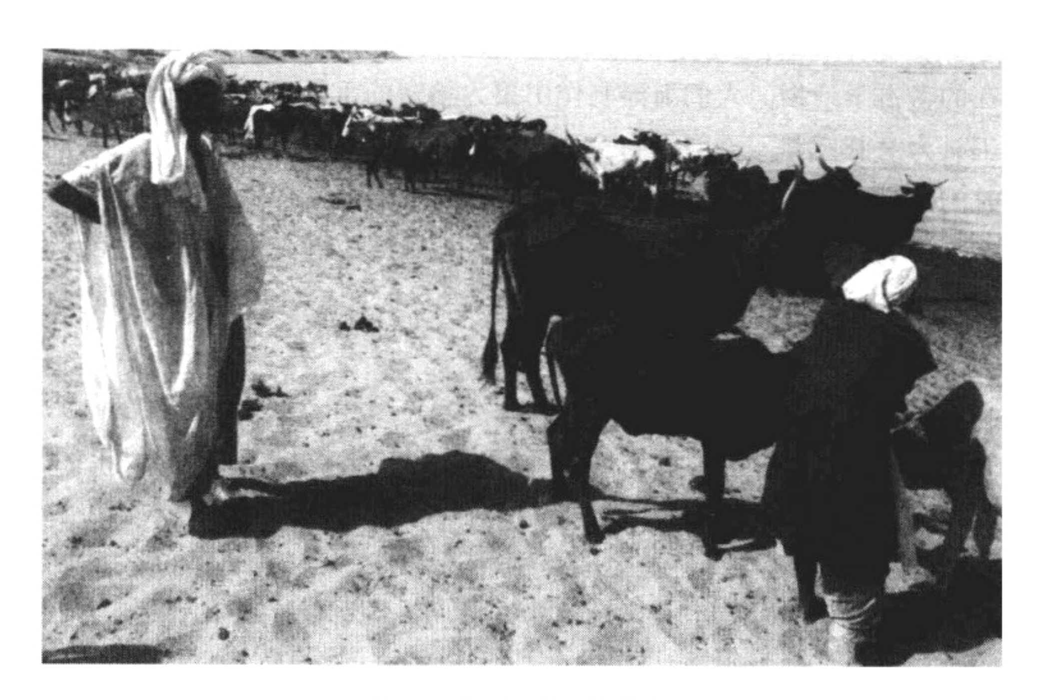
种植业的出现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食物供应需要社会组织、村落内的合作和计划。人们不得不在一起规划未来几个月的生产：种植多少、何时种植、在哪种植何种作物以及何时收获。人们不但要有计划，而且还要储存充足的食物，以保证上一年的收获能一直维持到来年。他们此时已经有了食物富余，也就是说，食物超出了直系家族的吃用需要。储存食物是一种重要的保证，可以应付如干旱或洪灾等自然灾害给作物带来的损失。这也意味着一个村落可以供养很多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的人：专业工匠、牧师、行政人员和掌管、组织社会规划的首领。富余的粮食可以在邻近的定居点间进行交易，以交换本村落并不生产的原材料、奢侈品或其他物件。

最后，在农业和畜牧业社会，狩猎-采集者的某些平等和集体分配已经不存在了。随着富余粮食的出现、非食物生产阶层的存在和个人财产的增加，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在不同的社会中，贫富分化的程度各异。一般来说，那些支配生产的非生产者比较富有，而非生产者所依赖的粮食生产者依然贫穷。

15

畜牧业

豢养牲口(牛、绵羊或山羊)与作物栽培有着类似的优势。这些动物可以提供食物，特别是奶。它们通常很少作为肉来食用，但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食用，例如在干旱和作物歉收时期。在那些主要人口是畜牧者(也就是说，动物的放牧者)而非作物种植者或混合型种植者的地区，人们的定居点往往是非固定的。他们为了寻找不同的季节性



正在尼日尔河岸边饮牛的现代牧民。

牧地而需要迁移。但是由于有作为可靠食物来源的家畜，他们依然是以大型村落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在从一个到另一个季节性牧地的迁徙中，他们可以用动物来背驮他们的财物甚至是造房用的材料，如木杆和席子。

“农业革命”

传统上的“农业革命”正是这样的。一旦人类知道怎样种植粮食，他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彻底变革。很显然，种植业的出现所带来的潜在变革和明显优势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但这不意味着人类一旦学会了种植，所有的村落就会变成固定的农业生活方式。人们在非洲的研究发现，比起人们之前的认识，通向作物耕作的早期转变更为缓慢。固定的种植业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种植业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也使得人们处于由于诸如干旱或洪涝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危险中。无论如何，作物耕作和豢养家禽仅仅只是几种经济选择之一而已。在很多农业村落里，狩猎、采集甚至是捕鱼依然是食物和日常生活的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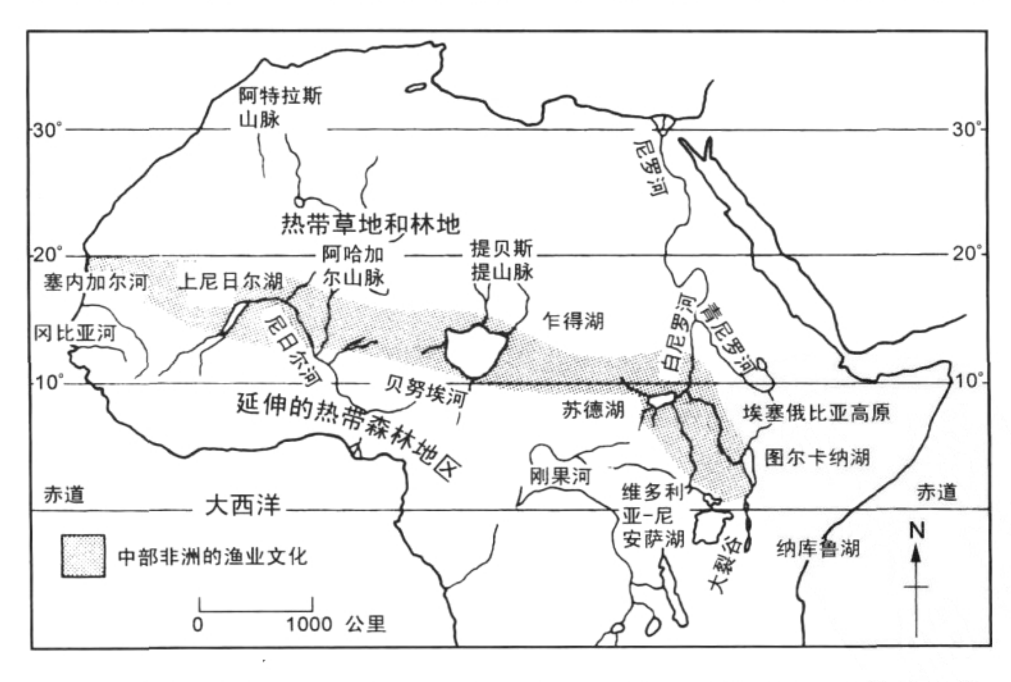
16

要保证。事实上，下文我们将会详细阐述，正因为如此，他们采纳了畜牧，但没有发展耕作。可能在他们看来，耕作将会带来与过去重大的但不必要的断裂。

已经对种植业形成依赖的人们需要接受世界观的重大改变。人们不再完全是在自然的限制下工作，人们更依赖于气候的变化。人们在精神世界中形成了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非洲本土宗教的起源也许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非洲的宗教思想、活动和神殿一向与土地神和"求雨"、耕作、播种及收获的季节性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热带非洲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起源

从约公元前1.1万年开始，非洲气候（前面已经叙述过）特别干燥的阶段终于结束了，降雨量恢复到较高的水平。公元前1.1万年一直到公元前9000年，这一阶段为一个新的"潮湿"阶段，降雨量达到了顶峰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000年。此后，这种较大的降雨量开始逐渐减少，直到公元前3500年，降雨量减少至与今天的普遍降雨量差不多的



地图2.1　公元前7000年的非洲：在持续的大潮湿阶段湖泊和河流的大概范围。

17 程度。在潮湿阶段,雨林扩大了,沙漠减少了,撒哈拉地区是一片可供居住的开阔大草原。发源于撒哈拉中部的阿哈加尔(Ahaggar)和提贝斯提(Tibesti)河流奔流直下,乍得湖是一个巨大的水域,比今天的乍得湖大上很多倍。尼日尔河上游"三角地"和尼罗河上游的"水面植物堆积"地区的沼泽地,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湖泊。正是这一潮湿阶段的开始,我们才能追溯到非洲种植业的起源。

尼罗-撒哈拉人的起源

自公元前 9000 年,撒哈拉东部地区说尼罗-撒哈拉语系的人采纳了他们的北方邻居,即亚非语系人的谷物采集和碾磨技术,并将之应用于尼罗河中游的热带草原,采集与碾磨的粮食还有高粱和珍珠稷。他们为了用这些被碾磨过的谷物煮粥,还发明了陶器。高粱和稷究竟是在哪个确切的时间被驯化的,很难说清楚,但肯定是在公元前 7000 年之前。在公元前 8000—前 6000 年期间,尼罗-撒哈拉人的栽培和陶器制作向北传播到埃及,并穿越撒哈拉地区向西传播。到公元前 5000 年,尼罗-撒哈拉人驯化了葫芦科植物、西瓜和织布用的棉花。尼罗-撒哈拉人可能约在公元前 9000—前 8000 年期间,也驯化了红海山区的野牛,比亚洲的野牛驯化要早 1 000 年。他们在尼罗河边的草地上放牧牛群,这种畜牧技术最终向西传播到了撒哈拉中部地区。

采采蝇在畜牧业扩展早期的重要影响

畜牧业传播被限定在热带非洲某些特定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地区没有一种叫采采蝇(tsetse fly)的吸血昆虫。某些采采蝇的唾液中携带一种寄生虫,这种寄生虫可以导致"昏睡病",这种疾病对人和牛都是致命的。虽然人和牛最终对采采蝇所造成的疾病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免疫,但一个采采蝇聚集的地区通常是无免疫力的畜牧者在寻找新牧场的迁徙中需要规避的地方。采采蝇往往聚集在湿润的、地势低洼的山谷和丛林茂密的地区,这些地区有着大量的采采蝇的野生猎物。因此,撒哈拉南部、非洲高原东部和南部地区中较为干燥的开阔草原地

区通常是形成专业化畜牧业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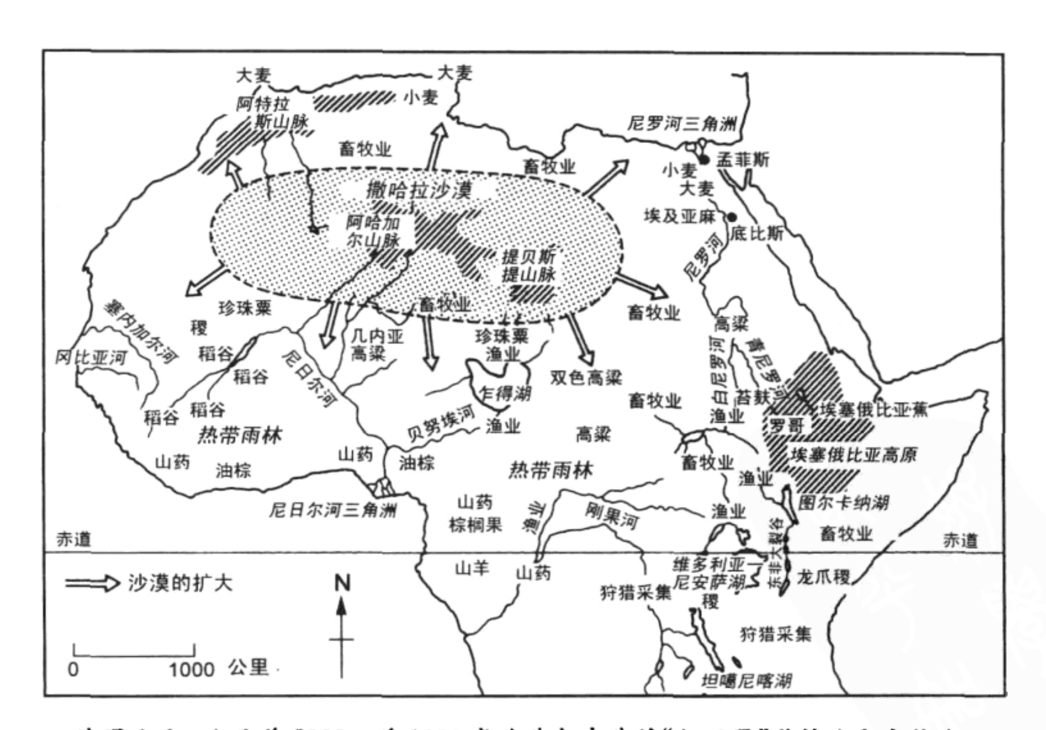
中非的“水域”文化

在潮湿阶段，撒哈拉南部地区的尼罗-撒哈拉人建立了大型的渔业定居点。这些定居点位于中部非洲扩容了的河流和湖泊周围，从尼日尔河、乍得湖至地拉那湖。他们使用骨制鱼叉、渔栅和贝壳制成的钩，并制作陶器。随着潮湿阶段的结束，到公元前 5000 年，“水机”(aquatic opportunities)逐渐减少，这些大的渔业定居点随着人们开始更关注种植和畜牧而遭到遗弃。

撒哈拉的畜牧业者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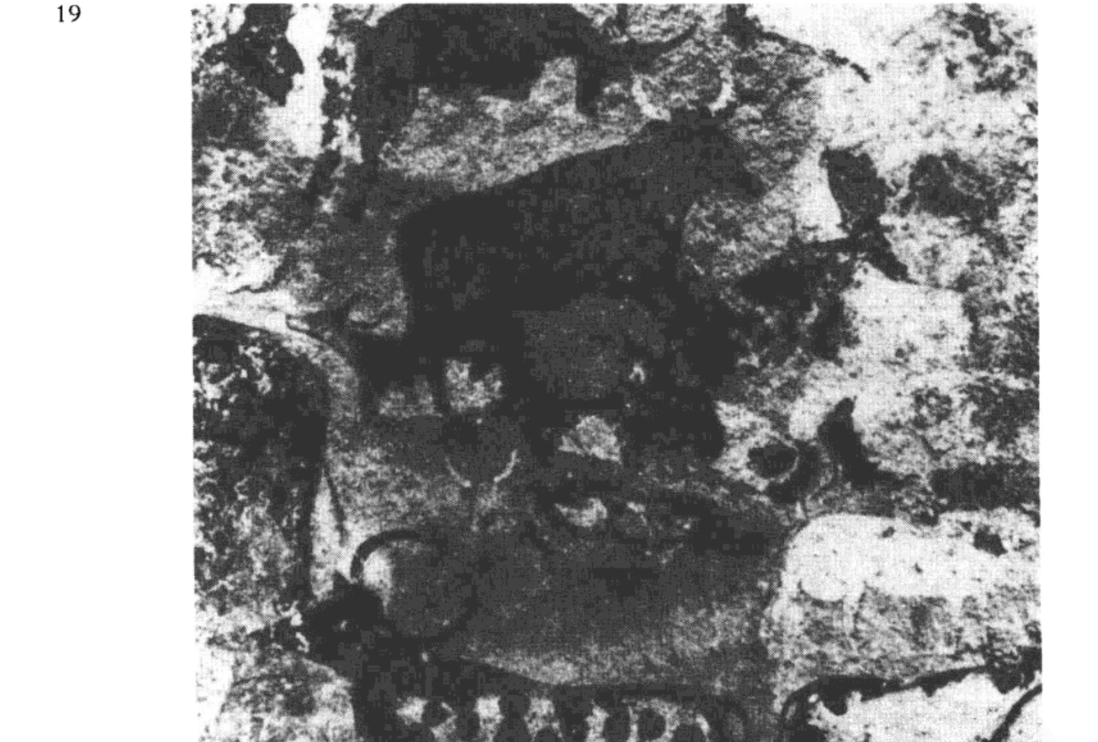
公元前 4000—前 2500 年的这一时期，是撒哈拉地区畜牧业的伟大时代。到公元前 4000 年，撒哈拉中部的阿哈加尔山脉地区以牛为主的畜牧业得以固定下来。虽然这些畜牧者可能还包括那些把西亚的绵



地图 2.2 公元前 5000—前 1000 年北非与中非的“细石器”种植业和畜牧业。

羊带到该地区的亚非语系的人,但主要可能还是尼罗-撒哈拉人。我们从撒哈拉畜牧者留下的著名的系列岩画中,可以了解他们的绝大部分信息。他们的岩画是在今天撒哈拉最干燥的地区发现的。绝大部分岩画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500—前 2500 年。这些岩画几乎描述了家庭生活的各个侧面。绘画者特别展现了人们放牧长角牛和绵羊的场景。岩画中展示的人物形象是多种混合型的地中海人和黑人。这些人穿着织布,带有精美的装饰品,留有发型和体绘。他们用圆底罐来装奶和牛血,用皮袋装水,用牛包(pack-oxen)来运输货物。人们在他们的定居点发现了碾磨石,这意味着他们也收获谷物。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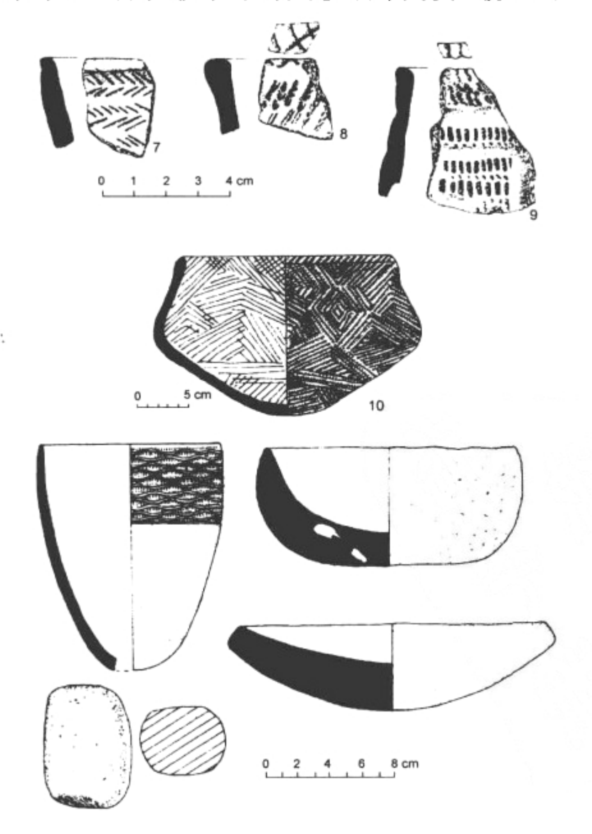


撒哈拉地区石器时代畜牧业者的岩画。

东北非的畜牧业与种植业

与此同时，在非洲东北部说亚非语系的库希特人将驯养的牛从红海山区向南经厄立特里亚带到索马里和肯尼亚北部。到公元前 3500 年，南方的库施人开始在图尔卡纳湖(Lake Turkana)地区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南部牧养牛、绵羊和山羊。在这里，库施人遇到了种植高粱、稷和扁豆的东南部的尼罗-撒哈拉人。库施人采纳了这些种植技术和尼罗-撒哈拉人定居点的圆草屋模式，即这些圆草屋环绕着荆棘栅栏包围着的牛圈。他们制作石碗，石碗表现了其文化的特征。公元前 3500—前 1000 年间，他们的定居点遍及整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北部。同时，当地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上亚非语系的人开发出他们特有的作物。这些作物中较为重要的是苔麸(tef)、罗哥(noog)和埃塞俄比亚蕉。苔麸是一种种子较小的谷物，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仍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罗哥是一种油料作物。埃塞俄比亚蕉是一种粗梗植物，其梗秆含有淀粉纤维。

20



来自石器时代种植者和畜牧者定居地、墓葬中的石器与陶器制品。

南部非洲科伊桑人的畜牧业

科伊桑人可能正是从东非的库施畜牧者那里学会了牧羊和牧牛技术,并在公元前500年把畜牧技术向南传播到博茨瓦纳北部说科伊语的科伊桑人那里。到公元纪年前后,说科伊语的人向南放牧远至好望角。然而,除了在非洲南部干燥草原上的这些畜牧活动,科伊桑人总体上并没有发展出种植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高效和适用范围广的狩猎及采集技术,使他们没有经济或环境压力来实现农业生活方式所要求的那种巨大变革。

21

西非的农业

不同于尼罗-撒哈拉人,西非的尼日尔-刚果人利用公元前9000—前5500年期间的潮湿时期,在该地区扩大了的林地上发展出种植业,特别是薯蓣属植物(yams)。他们发展出石斧制造技术,将石斧打磨成圆滑的形状,很是精细。这些石斧可能被男人用来清理林地以种植薯蓣属植物和其他作物,包括用来榨油和酿酒的油棕、豌豆、花生和可乐坚果。到公元前3000年,他们驯化了珍珠鸡,并种植用来制作拉菲亚布(raffia cloth)的酒椰棕榈。公元前3000—前1000年,他们在尼日尔上游三角洲的内陆湿地上驯化了一种西非稻,并在后来传播到几内亚、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等降雨丰富的森林边缘地区。

妇女是尼日尔-刚果文化中薯蓣属植物的主要种植者。这使得她们有着较高的地位,也可以解释尼日尔-刚果民族间母权制世系制度(matrilineal descent)的出现。在母系制中,虽然部族和村庄的领导职位和权力由男人把持,但是这些男人是经由母族,即从母亲和姐妹中继承职位和权力的。

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东部分支,说班图语的民族此时迁移到尼日利亚的东南部和喀麦隆的雨林地区。他们乘坐独木舟,在河流边建立了定居点,在河里捕鱼,在林中狩猎。他们带来了山羊和珍珠鸡,并在林中的天然空地上安置下来。他们种植薯蓣属植物、油棕、豌豆和葫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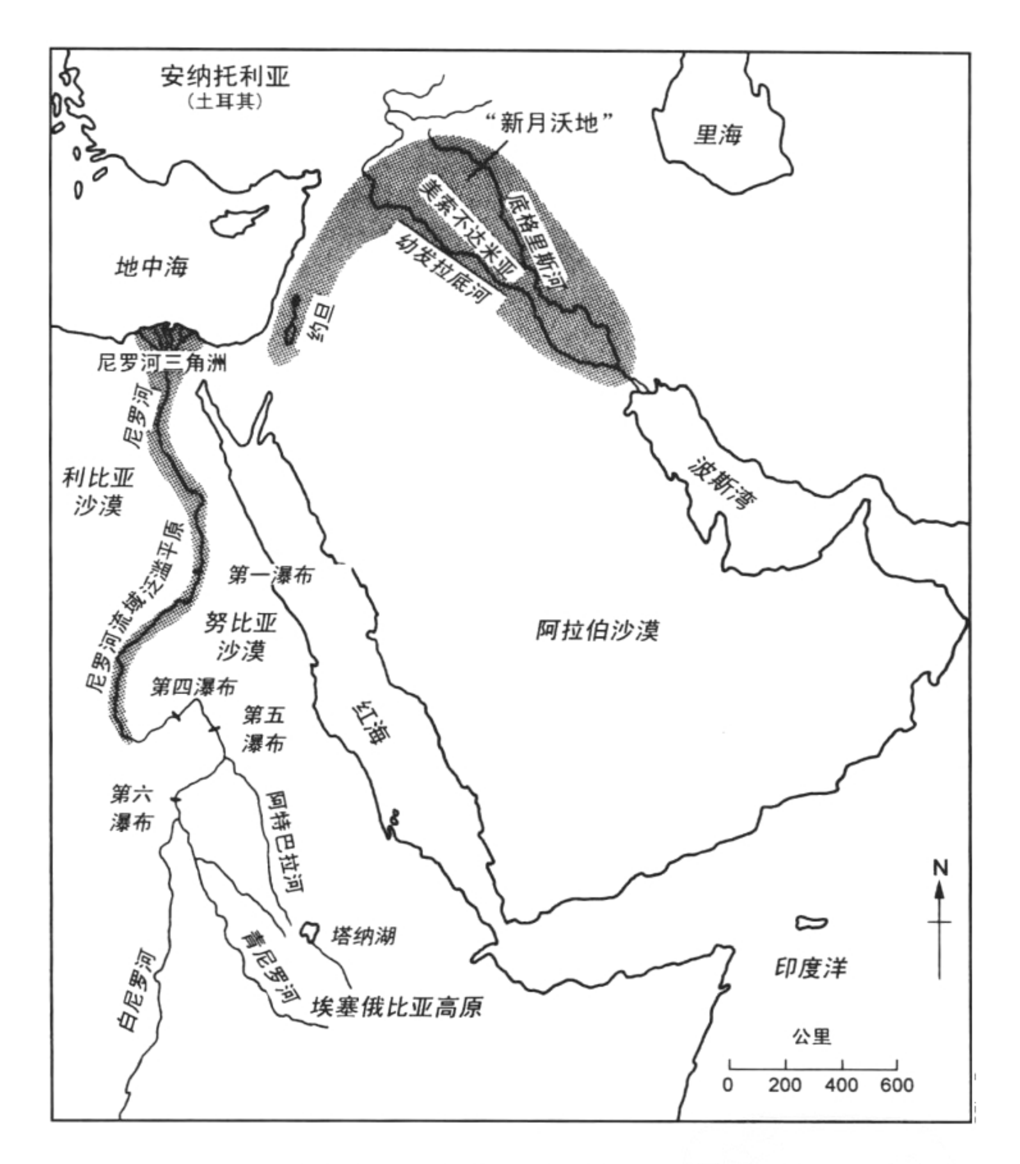
公元前3000—前2500年期间，他们把定居点向南迅速扩展到整个加蓬，并在公元前2000年到达刚果河流域。一些人沿着乌班吉河(the Ubangui River)向东北直上，沿着森林的北边东进。其他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穿越刚果南部的森林，沿着如开塞河(Kasai)及其支流等大河直上，进入安哥拉(Angola)的林地草原和刚果南部(参见本书第四章)。

古埃及

起源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发现，古亚非语系的民族在始于公元前1.1万年的潮湿阶段前，就开始在尼罗河山谷中收集和碾磨野生谷物了。他们把文化向北传播，经埃及进入西亚。在西亚，他们及被他们同化了的人们收集和碾磨这些非热带地区生长的野生小麦和大麦。在公元前8000—前7000年期间，小麦和大麦在西亚的"新月沃地"上得到驯化，并传到整个埃及和北非，成为主要的种植作物。绵羊和山羊的驯化也来自西亚。在此阶段，种植业在埃及一些远离尼罗河的地区，现在为巴利亚(Bahriya)、达赫拉(Dakhla)和哈里杰(Kharga)等绿洲地区成为可能。法尤姆(Fayum)也是一个重要的早期农业定居点。正是随着约公元前5000年潮湿时期的结束，以及东西两边沙漠的蚕食，埃及早期的种植者才折回到有着特有资源的尼罗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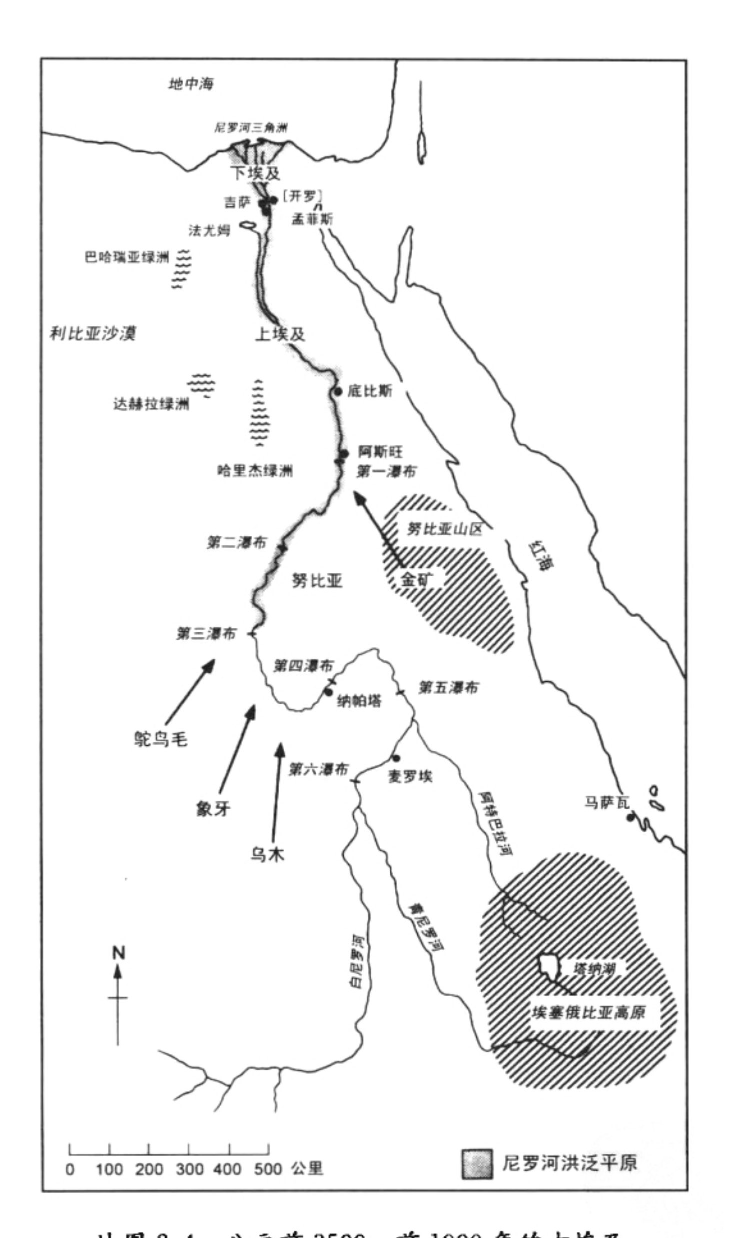
22 尼罗河由两大水系汇集而成：发端于东非大湖的白尼罗河和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Atbara)。白尼罗河使得尼罗河下游常年水流平缓。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则情况不同。埃塞俄比亚夏季的雨水携带着埃塞俄比亚高原上黑色的肥沃土壤顺流直下，使得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成为泥浆翻滚的奔流，直冲到尼罗河流域的低洼山谷。每年8月左右是埃及气候最为炎热和干燥的时候，尼罗河的河水冲破河堤，涌到河岸两边的低洼山谷。约两个月



地图 2.3　西亚与东北非农业的起源。

后，洪水退去，在陆地上留下了一片暗黑色的肥沃土壤层。种子种植在这片潮湿的新鲜土壤里，只要些许简单的灌溉，就可以在土壤干化前收获作物。人们无需担心沃土流失：洪水使沃土每年都可以得到"奇迹般"的再生。在今天，阿斯旺的大坝控制了尼罗河周而复始的泛滥，但是以前，每年第一瀑布下的洪水都可以蔓延开来，宽度达 15 公里或更多。

23



地图 2.4　公元前 3500—前 1000 年的古埃及。

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专职农业种植者的永久性定居点开始在尼罗河流域的山谷中建立起来，他们的农业技术因应于尼罗河每年的洪水。这些村落迅速成长为一系列的地区性国家。到公元前 3500 年，第一瀑布北部的国家合并成两个王国：上埃及和下埃及。大约在公元前 3100 年，上埃及国王纳尔迈（Narmer，也被称为美尼斯

24

[Menes])征服了三角洲的下埃及王国,由此建立了古埃及的第一"王朝"。纳尔迈统一埃及得到普遍的承认,并标志着古埃及 3 000 年文明的开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瞩目的、也确实是最长久的文明之一。

法老、王朝与王国

古埃及的统治者被称为"法老"(pharaohs),他们自称为神在人间的化身。神权思想的确切起源,我们无法知道,但似乎是从"内非洲"(inner Africa)传到非洲南部的。早期农业村落的统治者被认为是宗教首领、"唤雨巫师"(rainmakers)和适时的洪水掌控者。随着他们权力的增长和王国在实力和规模上的扩大,他们行使着比过去更大的职权,并宣称自己是神的后裔。传统上,历史学家把法老统治时期划分为 30 个王朝,涵盖时间是从公元前 3100—前 332 年。

古埃及王国与王朝时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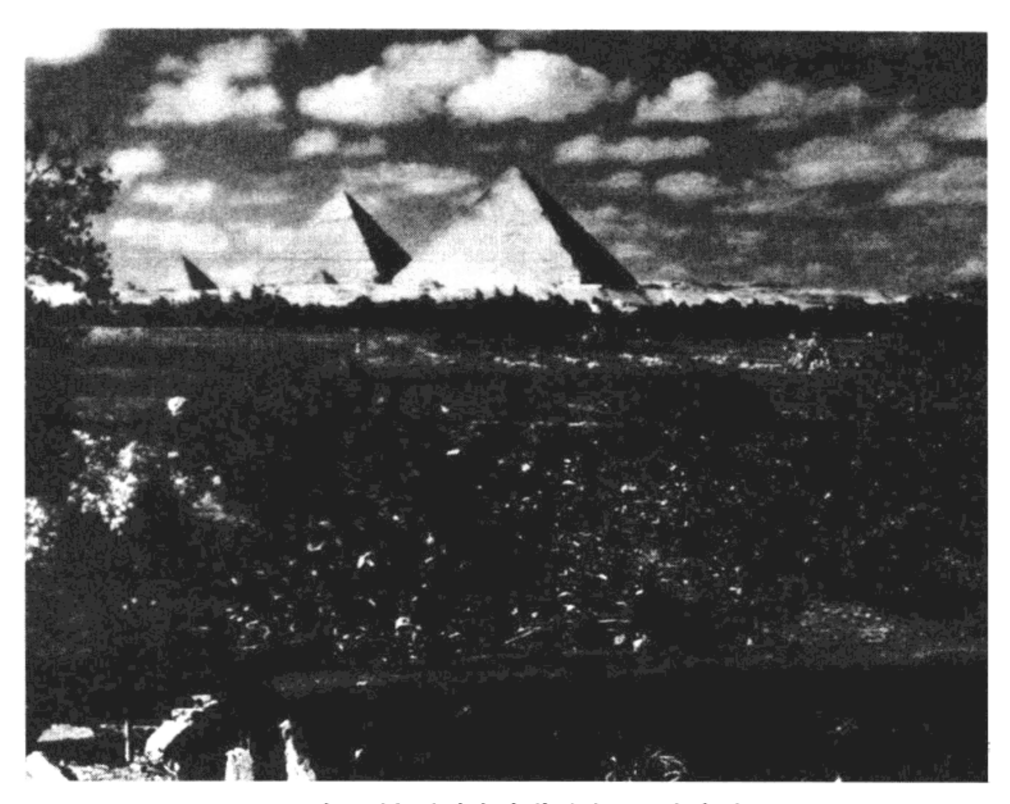
年代(公元前)	王朝		发展与事件	
3100	第一王朝	早王朝时期	中央权威的加强	西奈战争 从黎巴嫩腓尼基人那里进口雪松木材
3000				
2900	第二王朝			
2800				
2700	第三王朝	古王国时期	在塞加拉修建的斯泰普金字塔(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头建筑) 为胡夫国王在吉萨修建的大金字塔 地方亲王日益强势 地方亲王恢复了在当地的权力	国际贸易上升
2600				
2500	第四王朝			
2400	第五王朝			
2300	第六王朝			
2200.	第七、八王朝	第一中间期	中央权威的瓦解	贸易下降
2100	第九、十王朝			
2000	第十一王朝	中王国时期	底比斯的国王们重建中央权威	经红海到东非沿岸地区贸易的扩张
1900	第十二王朝		金字塔修建的恢复 法尤姆地区出现灌溉农业衰退	征服努比亚到第二瀑布地区
1800				

25

（续　表）

年代（公元前）	王　朝		发　展　与　事　件	
1700	第十三、十四王朝	第二中间期	王室权威的瓦解	
1600	第十五、十六、十七王朝		西亚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使用马拉战车）	
1500	第十八王朝	新王国时期	底比斯国王们驱逐希克索斯人 国王埋葬在王陵谷的石墓里 创建大规模常规军	征服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努比亚到第四瀑布地区
1400				
1300	第十九王朝		修建大量石雕和殿庙（拉美西斯二世） 与土耳其赫梯人的战争，摩西率领大量以色列人出埃及	
1200	第二十王朝		与利比亚人的战争	
1100				
1000	第二十一王朝	后王朝时期	巴勒斯坦与努比亚脱离埃及帝国	
900				
800	第二十二王朝		曾在埃及军队中服役的利比亚商人建立了王朝	
	第二十三、二十四王朝		三角洲地方亲王建立了王朝	
700	第二十五王朝		库施或“埃塞俄比亚”王朝，亚述人入侵	
600	第二十六王朝		三角洲亲王驱逐亚述人，尼科时期开凿通向红海的运河	
500	第二十七王朝		波斯王朝	
400	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王朝		短暂的埃及人王朝	
300			希腊人入侵，托勒密王朝建立，罗马人征服埃及	
200				
100				
30—				

注：所有的年代都是估约的近似值。



肥沃的尼罗河流域与吉萨的古王国金字塔。

26 虽然在具体统治时期上没有定论,但王朝世系提供了一个关于古埃及历史极漫长时期的年代表,这是个有用的框架。然而,不是所有的王朝都统治着一个同样强大和统一的王国。古埃及统一的三个重要时期一般被称为“古王国时期”(公元前 2685—前 2200 年)、“中王国时期”(公元前 2040—前 1670 年)和“新王国时期”(公元前 1570—前 1085 年)。虽然法老不断更新换代,王朝和王国也经历荣辱兴衰,但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基础体系,即由神一般的法老统治全国,在古埃及 3 000 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基本保持一致。

农业与埃及社会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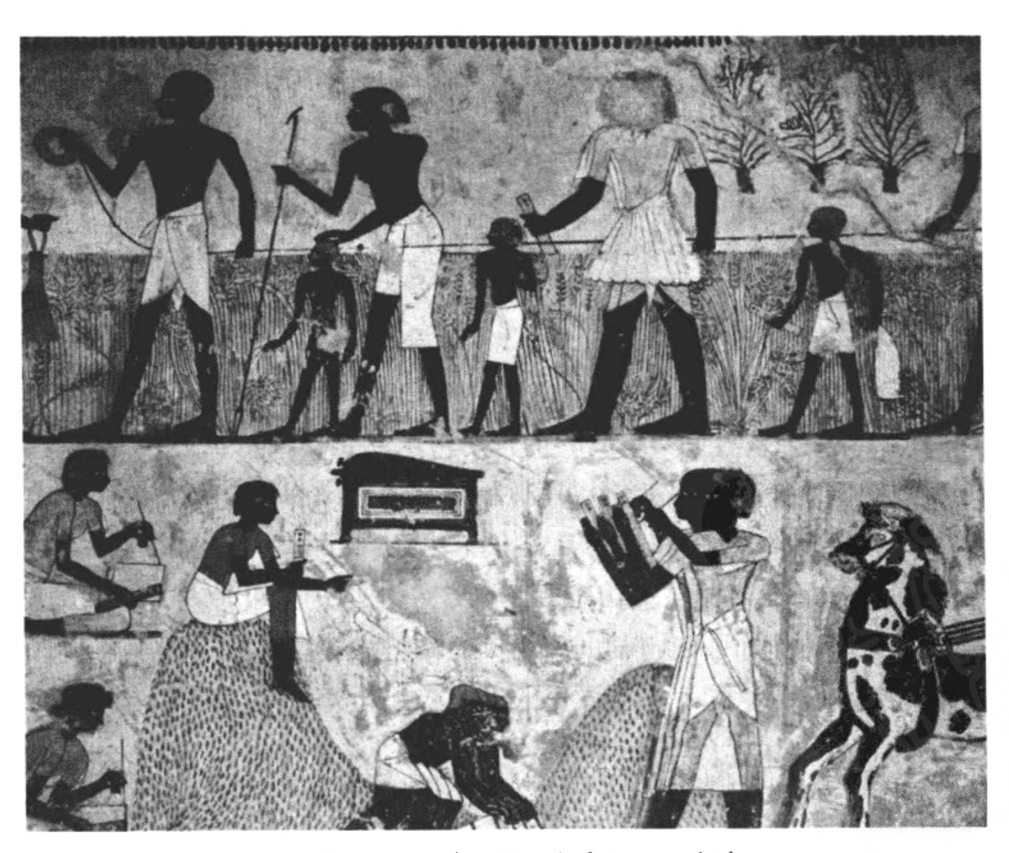
埃及人口主要是由农民构成的。正是他们创造了农业盈余,也正是这一农业盈余构成了古埃及文明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基础。

农民居住在建在洪泛平原沙堆上的小土屋里。他们以食用面包、

洋葱、啤酒和鱼类为生，主要的作物为小麦、大麦和亚麻。他们也种植很多蔬菜和水果，如无花果和葡萄。他们放牧牛羊，养鹅，在尼罗河中捉鲈鱼，在沼泽上捕野鸟，但很少吃肉。绝大部分的肉类被作为赋税交给管理机构，被富有的统治阶层所消费。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所留下的肥沃淤泥，使得农民可以从作物中获得大量的盈余粮食，但是农民本身不允许保有或累积这些余粮。这些余粮被法老的收税官拿走，剩下的粮食只够农民在下一个收获季节来临前填饱自己的肚子。

农民劳动的每个阶段都受到法老的文职奴仆，即书吏和收税官的监视。官员们监视灌溉工程。税额根据尼罗河每年洪水的最高水位来确定。农民因此也被提前告知官方期望他们生产和上交多少余粮。在农闲时期，政府依然安排农民劳作。他们要从事公共项目及大规模的灌溉工作，如沼泽地的排水或挖渠，以及巨大石像、神殿和王家陵墓的修建。

27



测量与记录收成，第十八王朝底比斯殿庙壁画。

管理

农业盈余被储存在巨大的国家仓库中，用来支撑法老一家奢侈与舒适的生活。这些盈余也被用来支付给庞大的行政机构，例如祭司及神殿，还被用来进行对外贸易以换取奢侈品和稀缺原料。政府的日常工作是由受到良好教育的文职官员来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文职官员是书吏和收税官。王国被划分为40个区，每个区都委派由法老任命的总督(governor)来监管。

法老能够对这种高度集权化的统治体系维持强有力的控制。神圣的国王地位赋予法老们的权威以权力与尊重，但法老也受益于很多其他因素。虽然王国从第一瀑布延展1 000公里直到海洋，但是可居住的陆地还是狭窄的。尼罗河里可以航行芦苇船和木船，运输便利，因此政府官员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王国的每个地方。总体上来说，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也没有具有挑战中央权威可能性的地区性设防城市。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受到东、西面沙漠的保护，王国1 500年来没有遭受到外部入侵。因此，直到新埃及王国时期，政府才感到有必要去组建一支常备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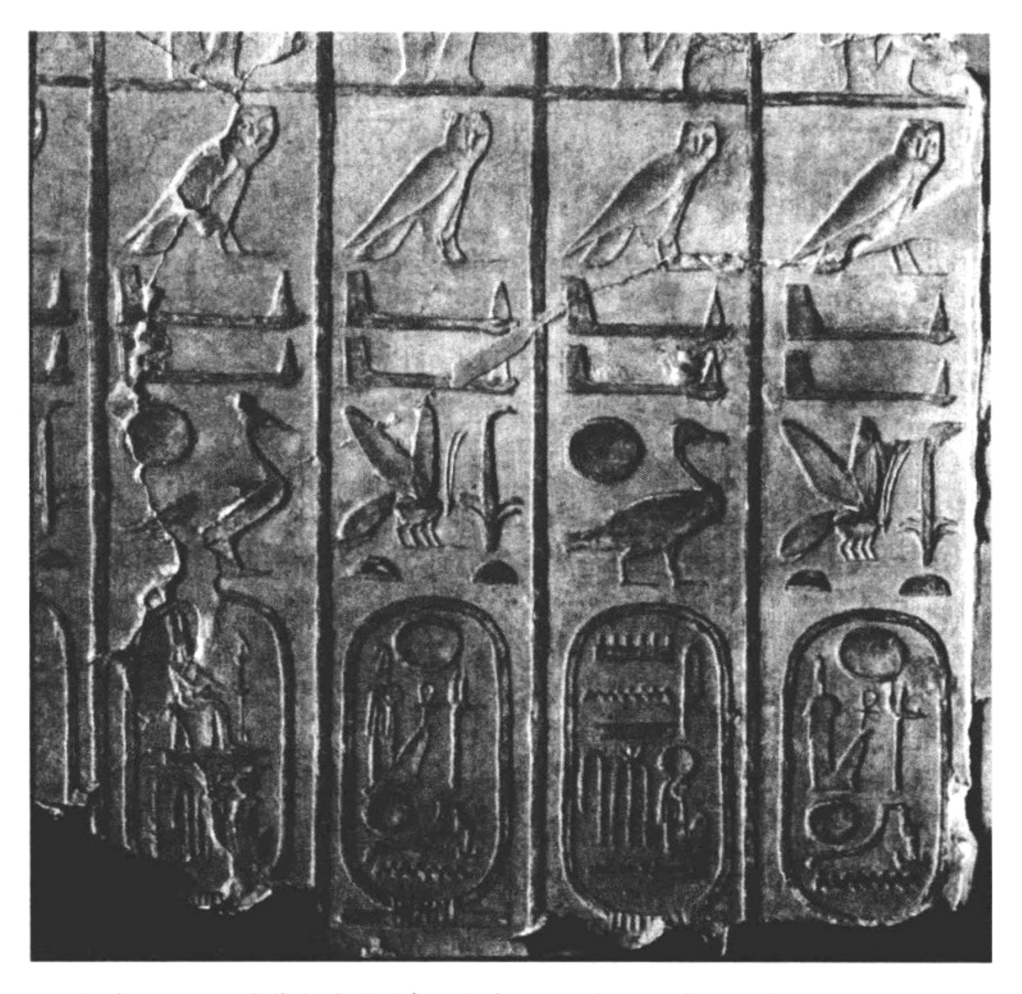
28

贸易

在早期王朝及古王国时期，所有的外贸都是由法老的中央政府来操控的。事实上，对贸易更有力的控制可能是早先促进上、下埃及统一的重要因素。古埃及主要的出口货物是尼罗河山谷的谷物和努比亚山脉的黄金。乌木、象牙和鸵鸟毛是从努比亚内陆和南方进口的。木材作为一种在尼罗河流域的山谷并不能广泛获取的重要原材料，是从巴勒斯坦地区的比布鲁斯(Byblos，今天的黎巴嫩)进口的。香料、熏香和宝石等奢侈品则进口于西亚。

科学与文化成就

埃及人发展出一种书写形式，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名的书写形



拉美西斯二世陵墓上雕刻的象形文字，公元前1270年。拉美西斯二世用了两块装饰框(cartouches)。中左上的符号意思是“上下埃及之王”；中右上的符号意思是拉美西斯二世是“拉(太阳神)之子”。

式之一，被称为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建立在一种图形和声音独特综合的基础上。它可能最初是在记录作物产量和估量税收的需要中产生的。一些最精美的象形文字的标本刻录在神殿、宫殿和陵墓的墙壁和支柱上。很多文字记录的是国王即位和他们的功绩，这些文字成为非洲最早期“历史”的基础。绝大部分行政记录和外交文书是书写在莎草纸上的，莎草纸是芦苇浆纸的早期形式。 29

农业用地扩展和灌溉工程管理的需要导致了数学和天文学的产生。估税员在测量洪泛平原和计算税赋估值中，发展出几何学和算术。

他们研究太阳、月亮和星辰以理解季节和计算洪水期。如此一来，他们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份每年分为 12 个月共 365 天的历法。他们发明了记载尼罗河水位升降的“水位计”(Nilometer)和衡量一天时间的水钟。他们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数学与天文学被建筑师用来修建古埃及那些巨型的石质符号——金字塔。

艺术、建筑与宗教

古埃及的艺术、建筑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古埃及人信仰多神，每个神都有其庙宇或神殿。一些神代表着自然界的重要力量，如拉(Re)是太阳神；阿蒙(Amun)是风神。在中王国时期，这两个神合并为主要的国家神阿蒙拉(Amun-Re)。其他神与那些被认为有着特定力量的动物相联系，如鹰、豺、蛇和鳄鱼。同时，还有大量区域性的神和神殿，它们可以追溯到王朝出现前的古代村落所信奉的神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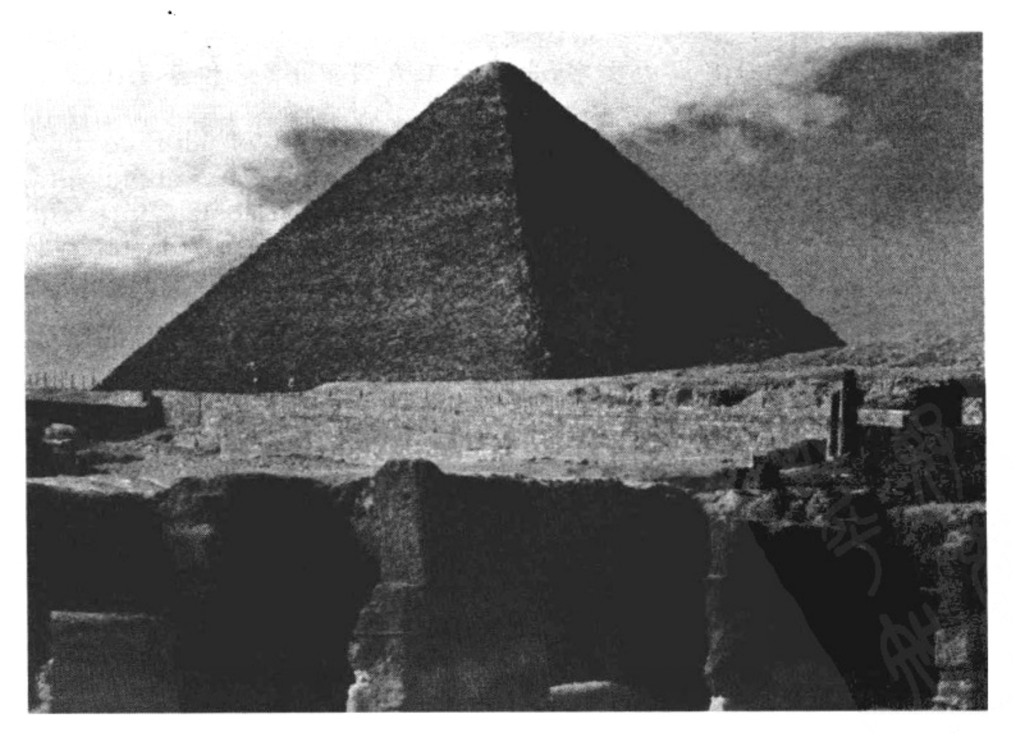
埃及人相信人死后精神生活还将继续，因此对安葬格外用心。有钱人的尸身被涂敷上防腐药物，用亚麻布包裹起来并放置在墓地里。墓地中放满了吃喝用的祭品，这些个人用品是下一轮的生活所需要的。因此，埃及人的墓地是社会分化的清晰写照。贫穷的农民只是埋葬在一个简单的地坑中，随葬品很少。相比之下，法老安葬在大规模的如金字塔这样的石墓中，墓穴中放满了尘世间的物品，体现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

埃及人是伟大的石材建筑者。他们的庙宇、雕像和金字塔建筑通常规模宏大，即使用现代技术来建造，也是令人吃惊的。修建金字塔的辉煌时代是古王国时期的第三、第四王朝。埃及人在 1 500 年间，沿着鸟瞰尼罗河下游山谷的低地平原修建了约 70 座金字塔。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大金字塔，是约公元前 2600 年为第四王朝第一位法老胡夫(Khufu，也被称为基奥普斯[Cheops])修建的。

虽然用来镶衬大金字塔墓穴的质地坚硬的花岗石是从第一瀑布附近的埃及南部运来的，但是金字塔本身是用当地石灰石修建而成的，这

些石灰石是从吉萨(Giza)平原的边缘地带运来的。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金字塔是奴隶劳动修建起来的。这一认识源自公元前 4 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希罗多德在金字塔修建 2 000 年之后才开始撰写历史。金字塔是由奴隶修建而成，这一看法只是一种臆断。可能是希罗多德推断得出的，因为在他所在的社会，纪念性建筑均是由奴隶修建而成的。然而，在吉萨工作的埃及考古学家的最近研究，发掘出的金字塔修建工人的村落，打破了奴隶劳动的神话。1 500 名技术娴熟的石匠切割和打凿修建金字塔的石质建材。这些石匠有着颇高的社会地位，衣食无忧，受到的照顾也很周到，甚至那些骨折的石匠还得到了医治。此外，成千上万的非熟练型劳工，每次要耗时几个月将石块拖至指定位置。为了不至于打乱农业劳动，这项劳动以村为单位轮换着进行。这些劳工可能将从事这项为法老服务的全国性劳役视为一种莫大的荣誉，而这几乎也是从事劳动的年轻男人和照料这些男人的女人获取权力的一种途径。胡夫金字塔的修建耗时 20

30



第四王朝胡夫大金字塔。

年。因此,为了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长治久安,再加上所需的大量资源,或许可以解释胡夫金字塔及胡夫子孙的金字塔修建完成后,为什么没有一个后续法老曾修造出如此规模庞大的金字塔。很多金字塔在法老死前并没有修建完成。希罗多德描述了大金字塔的庞大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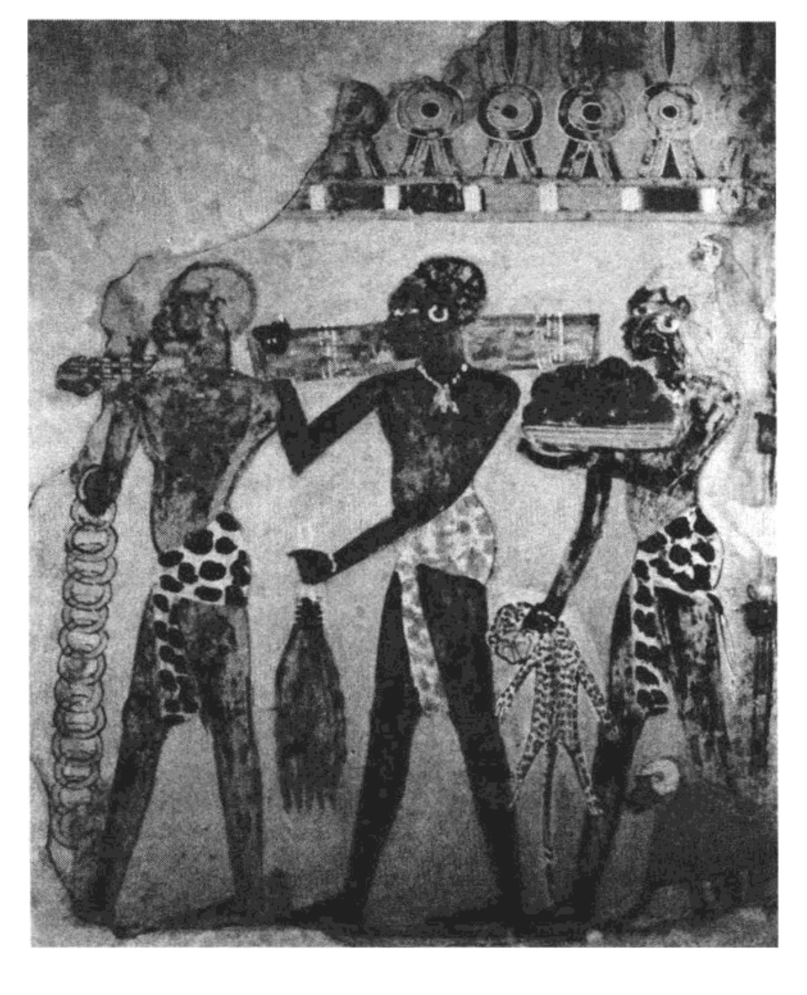
> 它的底座是方形的,每一面有800英尺(约244米)长,它的高与之相等(实际上约150米);金字塔是用磨光的石块极其精确地筑砌而成的;每块石头的长度都超过30英尺(9米)。
>
> 这座金字塔修建得像是带有阶梯、行列、台阶的楼梯。当这个初步工程完成的时候,工人们便用短木制成的杠杆把其他石块撬搬上去;他们把石块从地面抬到第一个级层上去;当石头被这样抬上去之后,在第一级层上再放置另一个杠杆,而这个杠杆又把它从这一级层抬到另一级层上去。金字塔的上部是最先完工的,然后是下面的部分,而最后才是底座和最下面的部分。在金字塔上面,有用埃及字母写成的文字,表明为工人买萝卜、葱和蒜花了多少钱。通译者当时念给我上面所写的文字花费了1 600塔兰特的银子。[①]

31

法老征用了很多全职工匠和画家,使其陵墓具有埃及工艺的精美模式:珍宝、装饰精美的陶器以及精美的黄金饰品。一些陵墓的壁体上还有反映日常生活场景的绘画,如犁地、收割、狩猎、宴会、工匠和书吏工作。从这些绘画中,我们可以生动地考察古埃及的生活。建筑者为了保护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设计出复杂的通道系统,伪造了很多墓穴来欺骗可能的盗墓者。但是,尽管有此保护,绝大多数法老的陵墓在古代还是被窃贼洗劫过。在新埃及王国时期,埃及已不再修建金字塔

---

① 此处的引文翻译参考了希罗多德《历史》的中文版,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6—167页,部分文字有改动。——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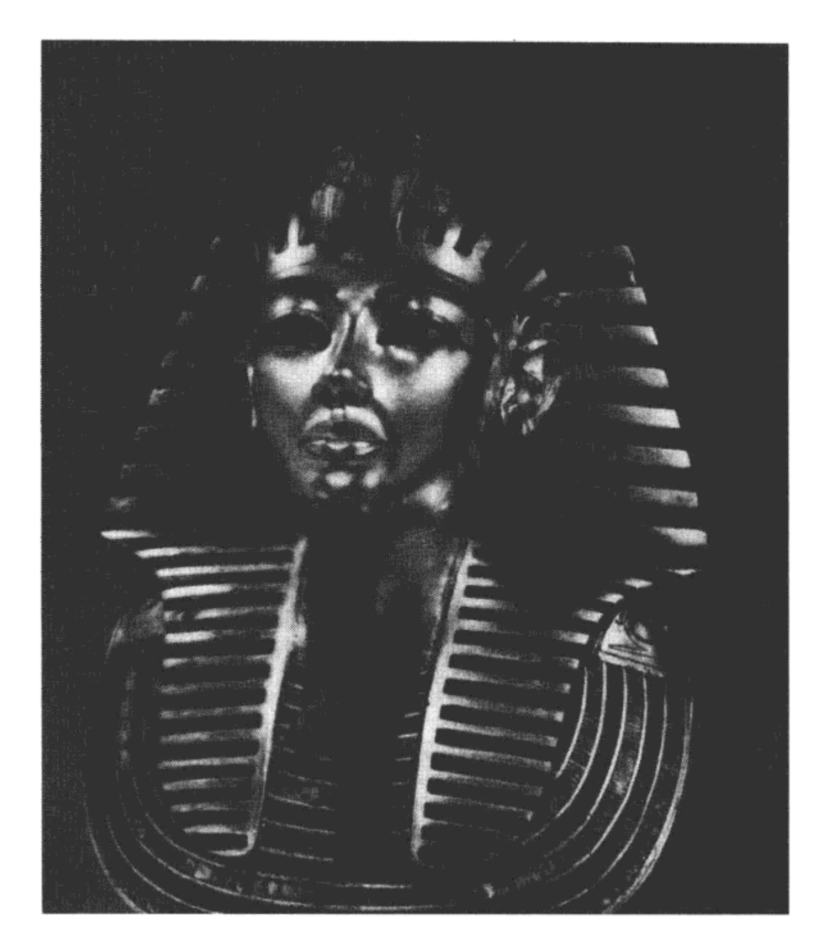
给法老进贡的努比亚人，公元前1420年，壁画。有时，库施的努比亚人被迫承认埃及的权力；有时他们又宣布独立，两者间有着较为平等的贸易往来。

了。与此相应的是，法老被埋葬在新埃及王国时期的首都，底比斯(Thebes，今天的卢克索[Luxor])附近的"王陵谷"(Valley of the Kings)中那些从山中掏空而成的大规模石穴里。这些陵墓中，有个叫图坦卡蒙的第十八王朝小法老的陵墓，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现，里面的棺椁及珍宝在历经32个世纪后依然保存完好。陵墓里的文物现在陈列在开罗博物馆内，它们清晰地反映出古埃及的富有和极其精美的艺术。

32

古埃及的朝代与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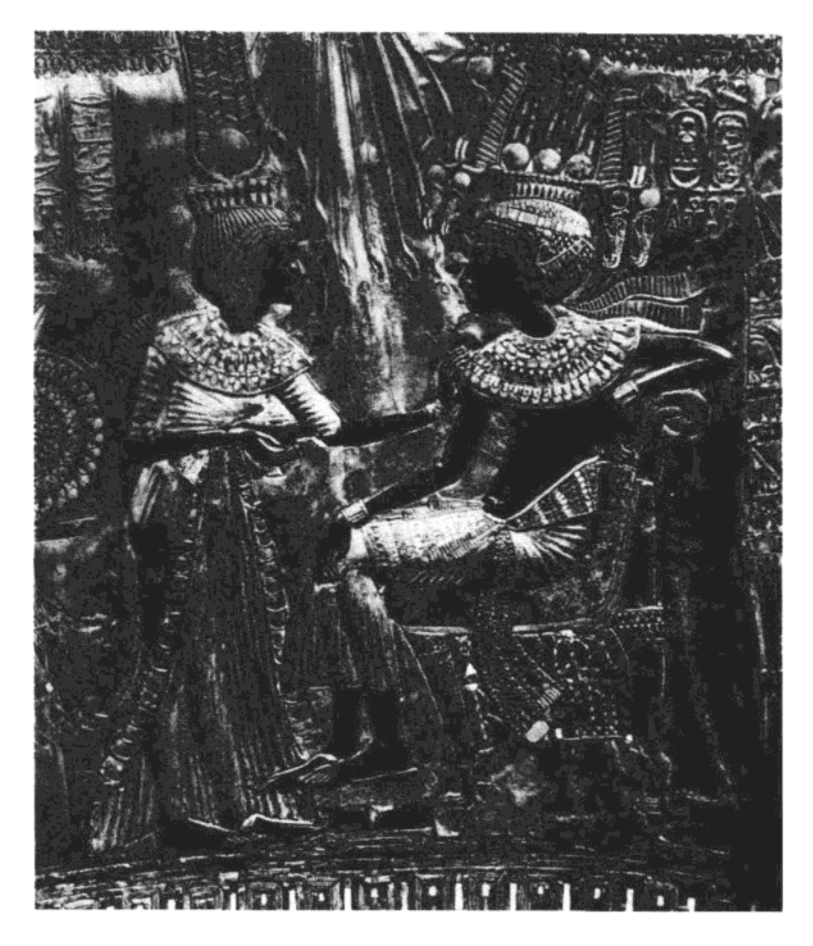
虽然法老生老病死，王朝更替不迭，但古埃及文明最突出的特征



图坦卡蒙的王家面具。

之一就是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它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主要的科学成就和艺术文化几乎都是在古王国时期的早期阶段产生的,法老的权力基础依然为农民的劳动,甚至中央政府权威也很少受到明显的挑战。

33 纳尔迈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统一王国延续了近 1 000 年。然而,约公元前 2200 年,古埃及王国由于中央权威的临时性瓦解而寿终正寝。古王国时期正是撒哈拉地区不断快速干化的时期,这可能促使大量的撒哈拉畜牧者和狩猎者涌入尼罗河流域的山谷地区,遇到在那里安定下来的种植者,并搅乱了他们的生活。此时,法老失去了对贸易的直接控制,藩王控制贸易,并宣称独立。在中王国时期(公元前 2200—前



图坦卡蒙陵墓中的涂色浮雕。

2040 年)，税收不再交付给中央政府，法老的权力也衰微了，金字塔修建的临时性中断也揭示了这一点。但是，直到约公元前 2040 年，来自上埃及的第十一王朝的建立者重新统一了王国。在中王国时期(公元前 2040 —前 1670 年)，法老的地位迅速地恢复了。然而，贸易掌握在那些越过地中海和红海寻找新市场的专职商人手中。中央政府不再控制贸易而是对贸易征税。税收上交了，贸易复兴了，金字塔的修建也重新开始了。灌溉区开始扩展，更多的土地开始成为种植业地区。这可能是为了应对撒哈拉草地的干化，以及对尼罗河资源的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埃及人拓展到努比亚地区，至第二瀑布地区，并在法尤姆盆地开展了一项巨型灌溉项目。 34

古埃及所遭到的第一次外敌入侵发生在公元前 1670 年左右，希克索斯人(Hyksos)从西亚入侵三角洲地区。他们乘着马拉战车，挥舞着青铜武器涌入下埃及。此时，铜是尼罗河山谷地区中唯一被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的金属。然而，希克索斯人对三角洲地区的统治只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便结束了，第十七王朝的底比斯国王们将他们赶出了下埃及并重新统一了王国。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 1570—前 1085 年)，埃及成为主要的世界大国。埃及建立了常备军，帝国通过征服向东北扩展至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向南至努比亚的第四瀑布地区。都城从下埃及的孟菲斯(Memphis)迁至位于上埃及心脏地带的底比斯。象牙、黄金、熏香和硬木贸易也大大扩大，沿红海扩展至东非沿海地区的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彭特之地”。埃及人沿着尼罗河山谷修建了大量象征着新埃及王国法老权力和财富的雕像和殿庙。

然而，埃及紧接着再遭外敌。公元前 1100 年之后，帝国在外部世界的攻击下衰落了。在西部，遭到穿越沙漠地区的外敌进攻；在北部，遭到跨越地中海的外敌进攻。公元前 1050 年，巴勒斯坦和努比亚地区被分割出去。在这两个地区，埃及先后遭到以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和利比亚柏柏尔人(Libyan-Berber)雇佣军为主的军队的进犯。为埃及王朝所赶走的外部王朝也得以建立起来。与公元前 2000 年相比，这是一段相对动荡的时期。不过，也有平静和复兴的时期，如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 664—前 525 年)时期，法老尼科(Necho)开凿了将尼罗河与红海连接起来的运河。尼科曾派遣一支船队沿着“利比亚”(非洲)航行来确定大陆面积，尼科也因此享有盛誉。

由于公元前 332 年希腊的征服，埃及最后一个王朝灭亡了。埃及被并入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欧洲史称之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亚历山大将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将军托勒密。托勒密王朝一直统治着埃及，直到克利奥帕特拉去世，并于公元前 30 年被罗马征服。

第三章　铁器在北非、西非的影响

早期金属加工的传播与影响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论述了农作物种植和畜牧业的出现使石器时代的非洲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变革。由于金属加工知识和技术的出现和传播，这些变革被进一步地加快了。

35

金属为早期人类社会制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提供了一种优良的原材料。比起石头来，金属能以更多的方式被打造、连接、锐化和装饰。最早被开采和使用的金属之一为铜。铜相对“柔软”，有时以纯金属形式出现。因此，对石器时代的工匠们来说，把铜做成锤子、其他想要的工具或装饰品应该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包括铜在内的绝大多数金属，通常是作为矿石，也就是含金属的岩石，被开采出来的。早期的工匠们适时地学会了加热矿石从而提取金属的技术。经过“熔炼”阶段，铜或锡实际上是从矿石中“熔化”出来。人们很快就发现，把铜和锡放在一起熔炼可以制作出一种更坚硬的金属，这是一种合金，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青铜。青铜可以用来制作更多种类的高效工具和武器。

迄今所知最早的铜开采地是西奈，它是连接非洲和西亚的一小块地方，位于埃及的东北角。该地区早期的铜加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000 年。铜和青铜在古埃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作为贸易物品的金属

金属在远古世界除了是一种金属加工行业所需的基础性原材料外,还是一种重要的贸易物品。铜、锡以及其他如铅、黄金这样的金属并不能广泛获取,只在有限的地方才可被发现。那些控制这些金属开采和加工的群落,就控制了一种潜在的财富来源。这些财富可以用来与邻近群落交换奢侈品或原材料。一些金属因需求量较大而价值不菲,它们跨越长途,有时甚至远离其最初来源地达数千公里,从一个地方交换到另一个地方。黄金就是这样的一种金属。

黄金特别稀缺,并且比铜要更软。黄金由于太软、太稀缺,无法被用来制作用具。但是,黄金易于加工,且不会锈蚀,历经多年也不会失去光泽。黄金的这些品质,再加上其稀缺性,使得黄金一直是一种最值钱也最受欢迎的金属。在古埃及时代,人们在努比亚山区开采黄金,并沿着尼罗河运送下来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贸易。埃及人对这一贸易的控制是法老聚集起大量财富的一种重要保证。在埃及本地,法老的工匠们广泛地用黄金来制作象征着高贵身份的精美的陵墓陪葬品和珍宝。

36

西非的铜

在古埃及的新王国时期,青铜的使用沿着北非的地中海沿岸传播开来。该地区也有着西非、撒哈拉南部的阿伊尔(Aïr)山区早期铜加工的痕迹。在今天毛里塔尼亚的阿克茹特(Akjoujt),人们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期间就使用铜,并与当地使用石器的部族进行交换。在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的阿泽里克(Azelik)和阿加德兹(Agades),也出现过早期的铜熔炼痕迹。在这两个地方,有些细石器人群使用过大量诸如矛尖这样的铜制品。在西非,早期铜加工的技术可能只在本区域内演进,但铜加工规模较小,似乎也没有对该地区主要使用石器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铁器时代"的熔炉。图中的熔炉直到20世纪早期，即1918年在多哥北部的班吉里(Bangjeli)还在使用。

铁器铸造的起源

炼铁

比起铜和锡，铁的熔炼技术要更为复杂，也更难于掌握。铁是由矿石经过化学加工而提炼出来的，其提炼涉及一个化学过程，而非仅仅只是从矿石中熔化出来。早期熔炼铁的熔炉有两个基本类型：地面下挖沟，或者是搭建起来一两米高的圆形黏土建筑。击碎后的矿石和硬木炭以合适的比例分层放置在熔炉内，人们再加入助熔剂，如石灰(有时用海贝)来辅助熔炼，接着点燃熔炉，借助风箱泵入空气。有时人们还在熔炉周边插入特制的黏土管(tuyeres)来辅助空气流通。空气既提高了熔炉内的温度，也作为化学过程的一部分起着作用。经过长时间熔炼后，人们打开熔炉，从底部倒出炽热的铁液。粗铁需要反复加热、锤炼，以剔除杂质、锻造出实用的武器和工具。但是，铁容易生锈，远古时代的铁制工具和武器很少被保存下来。非洲早期炼铁的主要考古证据通常为熔炉倒出的废渣。

37

铁的优点

虽然炼铁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复杂过程，但是一旦人们掌握了炼

铁技术,用铁制成的工具和武器要远胜于铜制品或青铜制品。铁是一种更为坚硬的金属,可以锐化成一个更薄的刃边。此外,热带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广泛开采到铁矿石。炼铁的一个弊端就是熔炼铁矿石需要大量的硬木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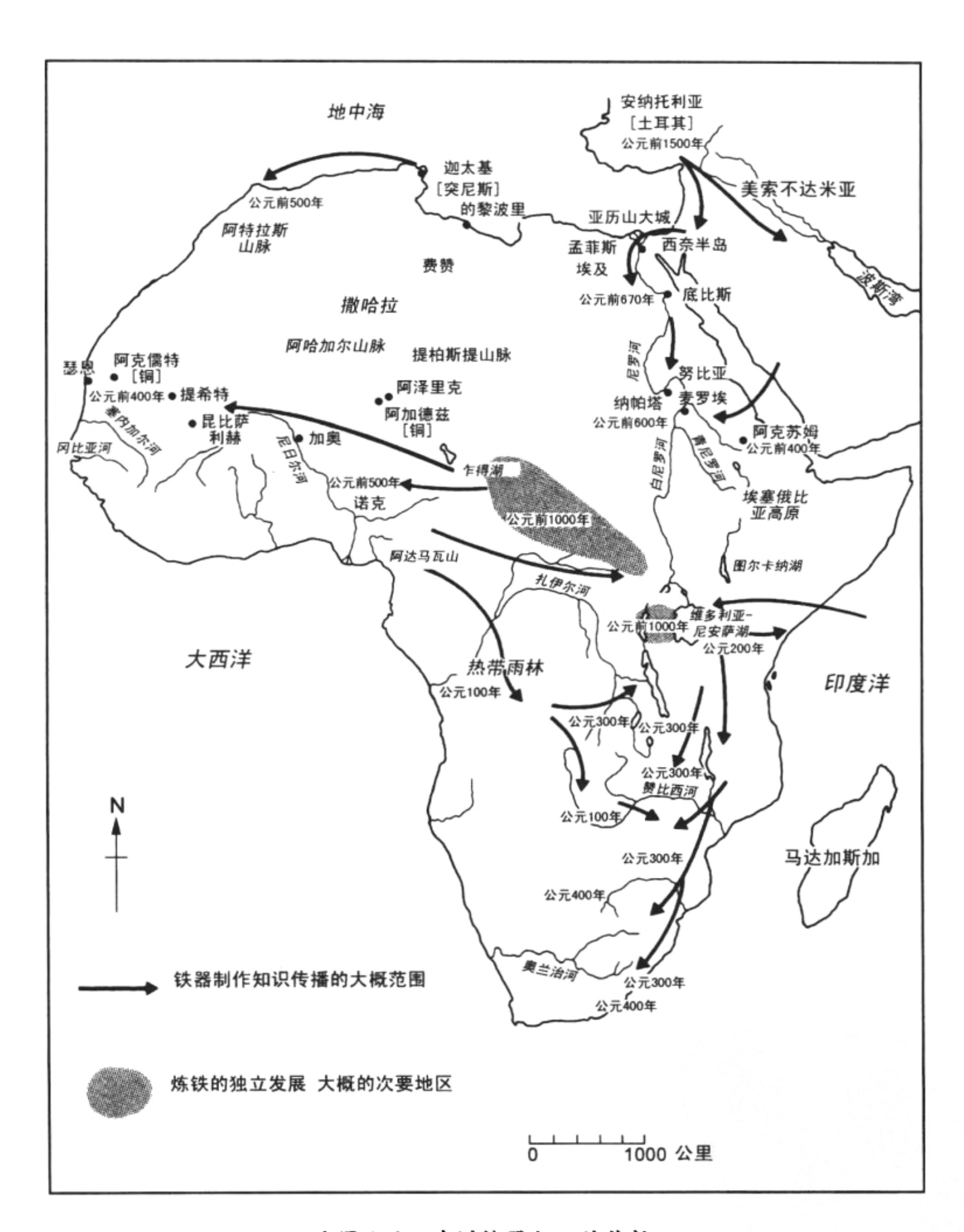
非洲铁器加工的起源

由于炼铁的专业性,炼铁术在古代世界不能在更多的地方独立地“发明”出来。世界上迄今所知最古老的铁器铸造发现于安纳托利亚(今天的土耳其),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500 年。西亚的铁器铸造术直到公元前 670 年才被带入埃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铁器铸造术是从埃及传播到非洲其他地区的。这种来自唯一发明地的“扩散论”,现在被非洲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是不成立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独立地“发明”了不同动植物的驯化。事实上,不同地区独立地“发明”了农业,这些地区远至公元前 5000 年的中国黄河流域和公元前 3000 年的中美洲。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古代非洲人不会炼铜术,且不能独立地将炼铜术应用到炼铁问题的解决。考古证据显示,东非的大湖区和乍得湖之间的地区,在公元前 1000—前 600 年期间存在过早期的炼铁活动,这时西亚技术尚未传播到埃及。铁器铸造知识和技术直到公元纪年前后才经东非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参见本书第四章),利用铜的贸易网络,铁器铸造知识向西传播到撒哈拉南部的西非林地地区。

西非的早期铁器时代

与铜矿石不同,铁矿石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分布相当广泛。铁器铸造的传播所需要的是关于熔炼技术的知识。西非林地草原是铁器铸造得以出现的理想地。不但铁制矛尖和箭头让狩猎的效率更高,而且铁斧和铁锄让早期农民能更有效地清除林地以便种植农作物。同时,林木本身就提供了炼铁所需的大量木炭。到公元前 400 年,铁器铸造在西非的林地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铁制工具加速了农业群落的扩展。

38



地图 3.1　非洲铁器加工的传播。

39

尼日尔河上游的内陆三角洲的复杂水道间之前就已存在的农业部落，形成了村庄和大型部落群。在该地区，人们专门生产稻米，种植棉花和制作干鱼，并用盈余物与邻近村落进行交易。人们在小丘上建造

了较大的城镇，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杰内(Jenne)，至少在公元前 250 年，它还是个兴旺的城镇。

与此同时，尼日尔中游的乔斯高原(Jos Plateau)上的铁器铸造在公元前 500 年前就得以确立。这个集权群落被历史学家称为“诺克文化”，因其文物在塔努加(Taruga)附近的诺克村首次发现而得名。从这些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主要物件是大量精制的赤陶(焙烧黏土)雕像。这些雕像有人头像，也有象和其他动物的雕像。人们认为诺克文化的雕刻与后来著名的伊费(Ife)和贝宁的青铜器之间，有着明显的艺术上的联系。有证据显示，诺克文化对这个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的占领从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 200 年。因此诺克赤陶制作者几乎肯定是之前石器时代种植者的后裔，那些石器时代的种植者将铁器铸造技术传给了他们。人们在遗址上发掘出小型焙烧黏土碗和蒸煮罐，还有一些铁制用具和熔炉残骸。



尼日利亚古诺克文化的雕塑。

40

接下来直到公元 1000 年,铁器的使用渐渐地传播到西非所有地区。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人口逐渐增加,并且在一些如尼日尔河的内陆三角洲这样的地区,村落组织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政治单元或是国家。古加纳帝国(ancient empire of Ghana)的崛起就伴随着这一过程,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六章进行讨论。

东北非的铁器起源

北非和东北非的铁器铸造知识是从西亚传播来的。西亚最早的炼铁活动发生在约公元前 1500 年的安纳托利亚(今天的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竭力将这项技术作为秘密保留下来。这样,赫梯人独一无二的铁制武器使得他们取得了对其周边地区的军事优势。然而,炼铁术还是渐渐地在西亚传播开来了。

公元前 1000 年后的埃及人墓地里开始出现一些铁制品,但数量较少,也可能是进口来的。制约埃及人自己发展出炼铁技术的主要因素是埃及长期缺少制作木炭的木材。因此,直到公元前 670 年亚述人进犯时,青铜一直是埃及人制作工具和武器的主要金属。亚述人的铁制武器使得埃及军队溃不成军,迅速败下阵来。第二十五王朝或"埃塞俄比亚"王朝的努比亚统治者被迫将宫廷撤至第二瀑布南部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地区。在接下来的世纪里,这里成为热带非洲第一个真正进入铁器时代的国家。

铁器时代的麦罗埃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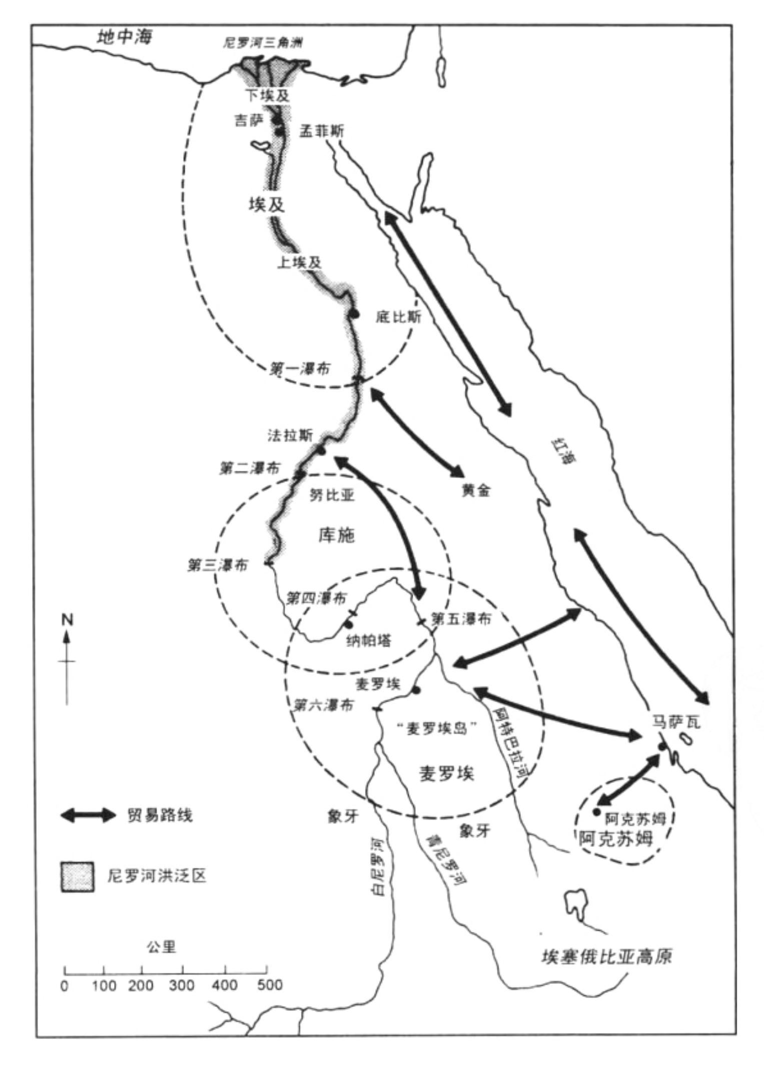
起源:库施的兴起

在古埃及统一前(公元前 3100 年),在尼罗河上游地区相继成立了一系列努比亚王国。在古埃及王国时期,埃及从努比亚进口黄金、象牙、鸵鸟毛和乌木。中王国时期,埃及大约在公元前 1900 年将疆土向南扩展到第二瀑布地区。努比亚人在第三瀑布以南、都城凯尔迈周边重新组织起来。然而,新王国时期开始不久,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埃及人的直接统治延伸到越过第四瀑布的努比亚中心地带,目的可能是

为了进一步地控制该地区的贸易。埃及人沿着肥沃的尼罗河流域的狭窄带建造了市镇和殿庙。在埃及直接统治的 500 年期间,当地的努比亚统治阶层吸收了埃及文化的很多方面,包括宗教、语言和文字。

随着新王国时期古埃及的衰落,埃及人从努比亚撤回来。自公元前 1100 年前后,当地的努比亚统治者得以重新确立他们自己的文化并重新宣布独立。他们在第四瀑布附近的纳帕塔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和政治中心,并将纳帕塔确立为首都。埃及人称这个努比亚新国为库施王国(Kingdom of Kush)。该区域涵盖第三瀑布以南,越过尼罗河洪泛平原区,属于热带夏季降雨地区。因此,库施的农业经济基础是在远

41



地图 3.2 埃及、库施与麦罗埃:公元前 1500—公元 350 年。

离尼罗河的地区种植高粱、稷和养牛。

库施的统治者在文化上仍然是埃及化的，国家也是以埃及为榜样。他们扩大了与埃及的贸易，国王们渐渐地积累了财富与权力。公元前730年，库施国王进犯埃及，并在底比斯获得了对埃及的控制权。库施国王们统治埃及60余年，这段时期在埃及历史中被称为第二十五或"埃塞俄比亚"王朝。然而，这些国王彻底埃及化了，并没有给埃及带来重要的文化变革。他们戴着上、下埃及的双重王冠，崇拜埃及人的神灵，并在埃及殿庙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42

公元前670年，亚述人进犯下埃及，库施王廷又撤回到努比亚并再也没有回到埃及。库施人在第二瀑布的南部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独立王国。

迁往麦罗埃

库施王国起先是以第四瀑布附近的纳帕塔为中心，但很快就将行政中心转移到南方小镇麦罗埃。之所以迁移王国中心，最初的原因是受到埃及的威胁。公元前593年，一支埃及军队最远入侵到第四瀑布地区，并洗劫了纳帕塔镇。

麦罗埃岛位于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之间，具有很多独特的经济优势。首先，麦罗埃周围的陆地，既盛产铁矿石，又盛产制作木炭所需的硬木材。受亚述人侵犯的经历使得库施人决定要将新的麦罗埃王国建立在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基础上。铁不但改进了麦罗埃人的防卫武器，还给他们提供了狩猎用的矛和箭。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狩猎物是麦罗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铁也为麦罗埃人提供了砍伐木材、清理农业用地的斧头，以及翻耕土壤的锄头。

另一个经济优势是麦罗埃地区降雨量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的潜力。在尼罗河下游的埃及洪泛平原上，土地的清理和翻耕不是问题，因此，人们不必非要用到铁制用具。但是，在第二瀑布上方，努比亚地界的尼罗河流段较为狭窄，因此可耕作的洪泛平原面积也就较小。人们意识到，纳帕塔没有充足的农业用地来供应给大量的农业人口。而麦罗埃

岛属于热带夏季降雨地区,人们可以在这里种植热带谷类作物高粱和稷,并在远离河流的地区推广种植业。同时,人们在东部、西部平原上放养牛和其他家畜。因此,麦罗埃人借助铁制工具,成功发展出一种混合型农业经济。

最后,南方小镇麦罗埃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进一步发展贸易。第五瀑布北方与埃及的贸易往来,要向北翻越沙漠再重返今天尼罗河流域的法拉斯(Faras)附近。走这样一个较近的路线,他们需要克服第三、第二瀑布所带来的危险。此外,一旦麦罗埃与埃及的关系变得紧张,事实上它们之间不时就是这样的,麦罗埃更是具有通向红海贸易出口的优势。在希腊和罗马统治埃及的时期,红海作为地中海、印度河远东贸易的动脉,其重要性不断增大。通过出口象牙、豹皮、鸵鸟毛、乌木和黄金等传统产品,热带非洲的麦罗埃王国直接参与了这一不断扩大的贸易网络。希腊和罗马的繁荣时代也正是麦罗埃王国达到财富和权力顶峰的时期,这并非是巧合。

43

麦罗埃文化的发展

最初,麦罗埃统治者的文化、语言、文字和宗教都是高度埃及化的。考虑到与埃及诸多世纪的紧密联系,这就不奇怪了。事实上,麦罗埃早期的统治者在他们结束对埃及的多年统治后,依然称自己为上、下埃及国王。埃及语是管理机构的官方语言,而且人们用埃及的象形文字来书写,在殿庙里供奉埃及神,还在统治者的陵墓上修建了金字塔。

然而,本土影响渐渐地脱颖而出,麦罗埃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被历史学家称为麦罗埃语的本土语言,开始取代埃及语成为宫廷语言。为了与这一本土语言相适应,象形文字得以改进,并适时地发展出一种流畅的字母型书写体。不幸的是,今天的人们不懂麦罗埃语,所以这种独特的麦罗埃文字仍然没有被破译出来。

在宗教上,麦罗埃人保留了埃及神,尤其是阿蒙神,但是也增加了他们的本地神和神殿。麦罗埃人增加的最重要的神是狮神,即阿帕德麦克(Apedemek)。人们在今天依然能在穆塞瓦拉特(Musawwarat)看

麦罗埃的祈愿匾额，显示的是狮神阿帕德麦克与一位国王。

到狮子庙遗址。阿帕德麦克的雕像和雕刻通常将它描绘成狮首蛇身或是狮首人身。但也有一处特别的神殿，那里的祭司喂养了大量象征着永生神的活狮子。麦罗埃神殿的祭司在王国中是有钱有势的人。事实上，自都城迁至南方后的几百年来，麦罗埃的新国王或王后不得不到纳帕塔殿庙去见祭司，祈求神灵对王国的护持。

44

麦罗埃的艺术与建筑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麦罗埃有名的艺术形式是诸如狮子、鸵鸟、长颈鹿和象等热带非洲动物题材的绘画、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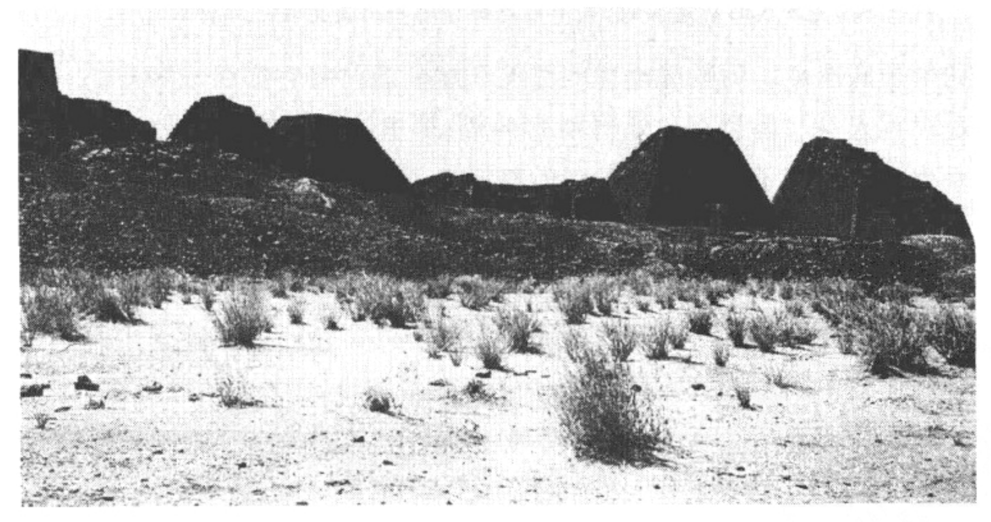


拓印于麦罗埃铜碗边缘，展示的是农村景象。

和雕像。他们制造两类陶器：一类是在转轮上制作而成的，主要是精美的、加过漆的奢侈品；另一类是较重的、手工制作的家用物件，用来日常做饭和储存物品。前一类陶器在形状和设计上是以埃及陶器为基础的，但很显然是当地制造的，并用独特的麦罗埃风格加以装饰。后一类陶器似乎来源于更早期的努比亚文化。他们的金字塔在风格上也具有鲜明的麦罗埃特色。这些金字塔在形状上没有尖端，有规则，规模也较小，迥异于埃及法老的王家陵墓。这些金字塔是古埃及彻底停止修建金字塔数个世纪后，才在麦罗埃首次出现的。

麦罗埃的经济与政治结构

在经济、政治上，麦罗埃王国与埃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麦罗埃的经济不是埃及所实行的那种建立在洪泛平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的经济。我们已经知道，第二瀑布南方的洪泛平原面积太小，无法供养庞大的人口。但麦罗埃人正好生活在夏季降雨区的北界内，可以在远离河沿的更广泛的土地上种植热带谷类作物。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影响了麦罗埃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



麦罗埃金字塔。虽然比古埃及的金字塔小不少，但麦罗埃的金字塔有其自身特征，在埃及停止修建金字塔1 000多年之后，麦罗埃的金字塔依然为王家陵墓的标识。

麦罗埃人口的绝大部分是牧牛者和农业种植者，他们分散在广袤的区域。他们住在土茅屋里，小规模地群居在农村，由家族的酋长和首领来统治。因此，与埃及尼罗河洪泛平原地区的放牧者或种植者相较，他们似乎较少受到直接的政治控制。他们可能是以每年向国王进贡的方式来缴税，而不是那种由埃及官员确定的有着详尽前估税额的税收制度。人们在麦罗埃东、西边的稀树草原上放牧牛群。畜牧者是半游牧者，在夏季和冬季牧场间来回放牧。只要每年进贡牲畜，他们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享有相当程度上的政治自由。

统治者、官员及全职手工业者住在城镇，包括麦罗埃城本身。国王作为全能、绝对的君主进行政治统治，比起古埃及，似乎得到了更多臣民的拥护。君主虽然是在单个王室家庭内选择的，但继承并不是想当然的，需要得到贵族的同意并最终得到祭司们的支持。一个不受欢迎的君主偶尔也会被更换掉。国王的母亲也是统治层中一个重要角色，这可能是为了维持朝代更替的稳定和延续。

麦罗埃国王们的个人财富来自他们对贸易的控制。王国的主要出口物是开采与狩猎到的物品，这两项贸易都受到国王的直接控制。狩猎者，装备着铁制武器，深入到南方的草原和林地搜寻象、鸵鸟和豹。狩猎者构成了常备军的基础。人们在战争中会使用象。受训后的象还从麦罗埃出口到埃及，并被用于埃及军队。

麦罗埃的主要工艺是炼铁和铸造铁制工具。熔炉掏出的废渣堆积成山，至今还矗立在铁路的两边，见证了古麦罗埃王国巨大的产铁量。铁为麦罗埃的农民和狩猎者提供了优良的工具与武器。麦罗埃王国的成功、壮大和财富要部分地归因于铁的出现与使用。

麦罗埃王国的兴衰

在公元纪年到来前的最后一个世纪，麦罗埃国王们把他们的统治扩展到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间的下努比亚。这导致了麦罗埃与埃及的罗马统治者之间的冲突。麦罗埃军队在公元前 23 年攻击了边镇西恩纳(Syene)，并捣毁或夺取了大量雕像和其他珍宝。考古学家 1921 年

在麦罗埃发现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青铜头像可能就是在这次战争中夺取的。麦罗埃的劫掠激起了罗马的反击,罗马军队曾直入纳帕塔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罗马军队撤回埃及时,他们携带着数千名将典卖为奴的俘虏。尽管遭到此次军事入侵,麦罗埃王国在国王奈特卡玛尼(Netekamani,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12—公元 12 年)的领导下,还是恢复到其权力和艺术成就的顶峰。在奈特卡玛尼统治期间,麦罗埃王国的版图南起埃塞俄比亚山麓,北到第一瀑布地区。这一时期的财富主要表现在殿庙和王宫的建造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麦罗埃与埃及的罗马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友好的,麦罗埃受益于罗马跨越红海、进入印度洋的贸易扩展。

麦罗埃王国是在公元 300 年后的某个时期灭亡的。自那时起就没有了王家陵墓,麦罗埃城也在公元 300—350 年间的某个时期被遗弃了。多方面因素导致了麦罗埃王国的衰落。麦罗埃早期的实力是建立在强大的炼铁业、农业基地和外贸财富基础上的。公元 200—300 年,麦罗埃逐渐丧失了这两个优势。由于过度利用,环境退化,农业基地逐渐减少。废渣堆揭示了早期炼铁业的规模,但这么大规模的炼铁业消耗掉大量的木炭。树木砍伐的速度要比新树木生长的速度快得多。这导致了表土的退化和丧失,曾支撑农业人口达 1 000 余年的土地也没有了之前的肥力。

此外,麦罗埃也丧失其有利的贸易地位。麦罗埃的贸易与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紧密联系在一起,麦罗埃是沿尼罗河和红海一带的连接带。随着罗马人财富的减少,对麦罗埃奢侈品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同时,麦罗埃通向印度洋的红海贸易也为位置更好的近邻,阿克苏姆王国(第五章将讨论阿克苏姆的崛起)所取代。约在公元 350 年,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Ezana)的军队侵入麦罗埃岛。但在这之前,麦罗埃城已遭遗弃,该地区已在被阿克苏姆人称为“努巴人”的族群的控制之下。我们无法确知努巴人究竟是何许人,他们可能是来自南方或西南方的入侵的游牧群体,也可能是附属的努比亚人,在麦罗埃统治者权力崩溃后重新掌控了该地区。

铁器时代的北非与早期的跨撒哈拉贸易

北非的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是一个海上民族，起源于今天的黎巴嫩地区。约从公元前 1000 年开始，腓尼基人开始使用铁器，并将他们的财富建立在地中海沿海地区的贸易上。为了寻求诸如黄金、铜、银和铅等贵重金属，腓尼基人进入西地中海，并沿着北非海岸建立了一系列贸易点。到公元前 800 年，腓尼基人把他们的主要定居地变成殖民地，并适时地独立于其母国腓尼基。最著名的殖民地是迦太基殖民地，即今天的突尼斯。

腓尼基人在迦太基与北非使用青铜器的柏柏尔人定居在一起。在突尼斯平原和阿尔及利亚沿海低地上，柏柏尔人是固定农耕民，为腓尼基人的城镇供应粮食。作为交换，腓尼基人为他们引进了铁器加工。腓尼基人，也就是现在的“迦太基人”，加上柏柏尔人成为北非社会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迦太基成为西北非大西洋沿海地区发展贸易的一个据点。迦太基人在公元前 400 年前后到达了最南方的定居地——布朗角(Cape Blanc)南部的毛里求斯沿海地区一个叫瑟尼(Cerne)的地方。

早期的跨撒哈拉贸易

47

到公元前 600 年前，腓尼基人的迦太基殖民地已经成为西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大国。迦太基的财富部分地是建立在跨撒哈拉的热带非洲货物贸易上的。腓尼基人本身并不从事这项贸易。他们依赖于阿特拉斯(Atlas)山脉和撒哈拉北部地区的柏柏尔牧民来作为中间人。柏柏尔人长期以来就是跨撒哈拉的最初联系人，可能要追溯到撒哈拉变成沙漠前(参见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住在沙漠的柏柏尔人的小型定居点紧邻着孤立的天然井地区，即沙漠中的绿洲。村落间沿着贯穿整个撒哈拉地区的绿洲保持着联系。因此，此时的贸易联系并不是直接穿越沙漠，而要把货物从一个绿洲运输到另一个绿洲。运到南方的沙漠物品主要是盐，可以用来交换食物。但渐渐地，来自热带西非地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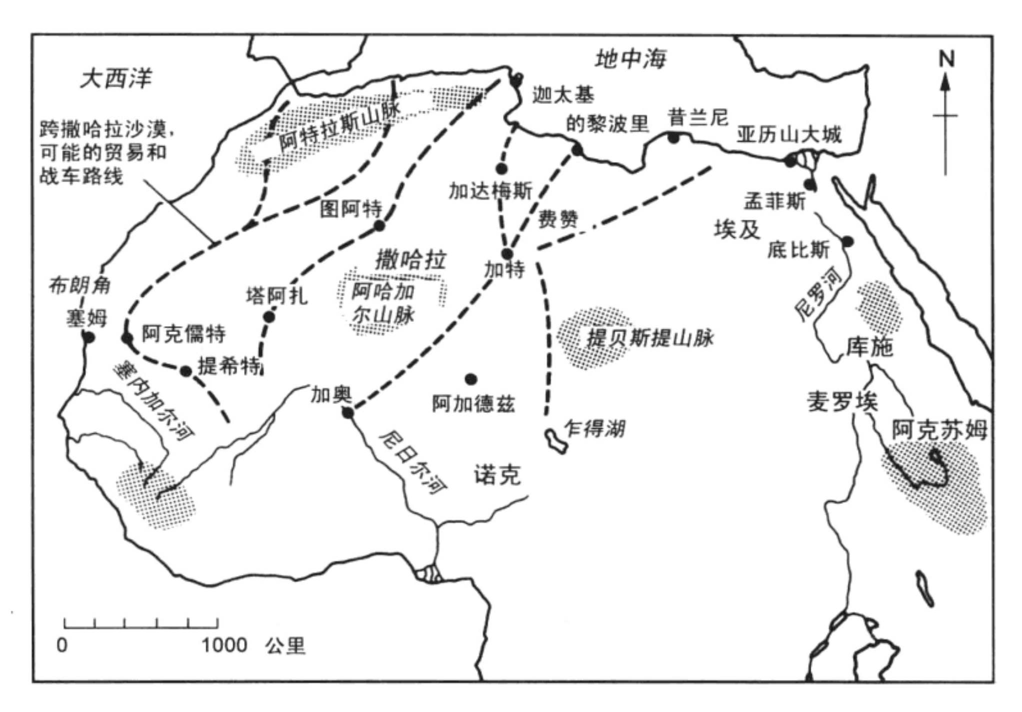
双马赛车：一幅撒哈拉岩画。这样的车辆在地中海北非地区被用作竞赛，而不是像原来所认为的那样，是跨撒哈拉贸易的运输工具。

贵重贸易物品，诸如铜和黄金开始跨越沙漠运输到北方的沿海居民地。

公元前 800—前 500 年期间，迦太基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跨撒哈拉贸易网的进一步发展。贸易网络的规模在撒哈拉地区的多处遗址中的一系列著名岩画中可以得到展现。这些岩画画的是双轮马拉车。人们曾在一段时间内认为这是跨撒哈拉用的轮式车辆，用来将货物从沙漠的一端运到另一端，现在人们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数世纪的历史显示，马拉轮式车辆不可能在沙漠松散的沙地上行驶。其次，人们通过对岩画细节的研究发现，这些岩画描绘的是北非地中海城镇富人体育运动中用的“赛车”(racing chariots)。为了保证速度，这些赛车结构简洁，也没有承载货物的空间。但是，赛车岩画确实显示出北非与撒哈拉绿洲之间的广泛联系。而贸易物品是由驮兽，可能是驴子、骡子和马来运输的。阿拉伯人的骆驼直到公元 1 世纪才在北非得到广泛使用，由此产生的影响在第六章将有所讨论。

48

早期的跨撒哈拉贸易是一项极具风险的事业。除了明显的环境问



地图 3.3　公元 300 年前的早期跨撒哈拉贸易。

题，以及储备水在到达另一个绿洲前就会用完的危险外，商人还可能会遭遇抢劫。居住在费赞(Fezzan)的加拉曼特人(Garamantes)就因抢劫而臭名昭著。他们不但洗劫过往商队，还洗劫绿洲居民和乍得湖以南的居民。俘虏被用来在撒哈拉采盐，或者被运到北非卖做奴隶。跨撒哈拉贸易从最初就带有奴隶特征。但是，主要的贸易通币依然是来自撒哈拉中部的盐。此外，来自北非的布匹、珠子和金属货物被用来交换西非的黄金、象牙以及卖做奴隶的俘虏。

第四章　早期铁器时代的中非、东非和南部非洲

铁器加工传播的证据

49

到公元5世纪前，整个中非、东非和南非中发展较好的区域都已经具有铁器加工和作物种植的知识和技术。人们普遍认为，铁器加工快速传播到这片广袤区域，得益于说班图语系早期语言的小型农业村落的努力。历史学家结合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证据得出了上述结论。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怎么确切。后续研究不断发现关于"早期铁器时代"农业起源、特征、时代、方向和影响的新证据。由此，旧观点得以修订，新观点得以提出，关于说班图语的农民对铁器的传播依然是非洲史前史中的重大争论之一(参见本书"进一步阅读建议"部分)。

语言学上的证据：班图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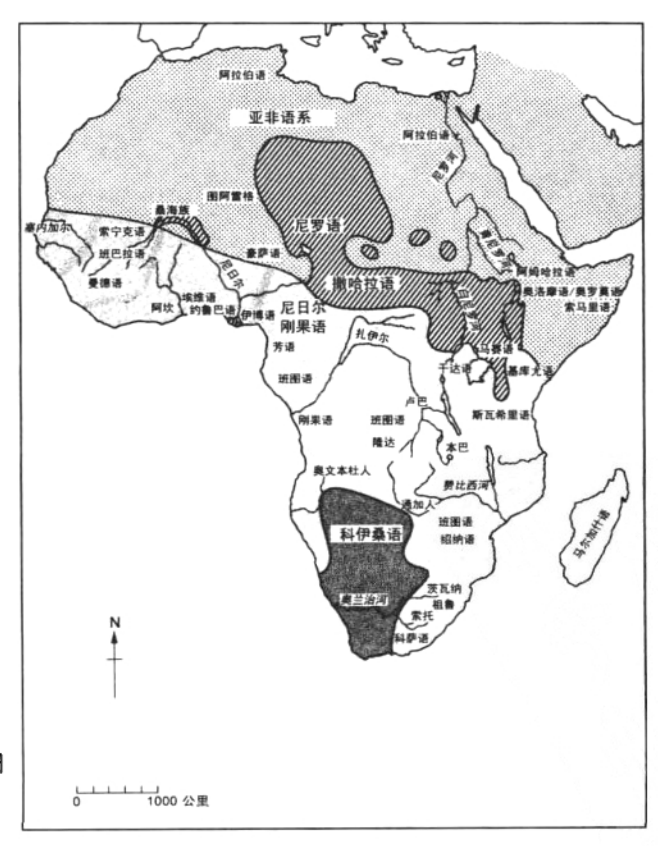
所有有生命力的语言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在当代世界快速且便利的沟通出现之前的远古时代，一组人群离开另一组人群而迁移出去后，他们很可能失去彼此间所有的正式联系。虽然他们开始说的是相同的语言，但他们的语言将独立且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演变。每个

群体将形成自己的方言，出现独有发音，选择或创造新词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新领地里，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开始与其他群体的人联系，并把其他群体的人吸纳到自己的社会，他们的语言将会出现更大的变化。最终，经过数代演变后，一个群体就不再能轻易理解其他群体的语言了。到那时，一种用来交流的新语言就得以出现，它起源于共同的母语，都属于相同的基础语系。

研究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语言的语言学家，将一个语系追溯到它们的语源，通过建立一种语言"系谱"或系谱图，论证出语系分支的演变，进而确定那些离开源语地的人口迁移。随着语言学上的证据越来越多，班图语系的流动现在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说明。

"班图"是现代语言学家给一种特殊的非洲语系所起的名字，这种特殊的非洲语系涵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的、范围较广的

50



地图 4.1　非洲的语言。

51 尼日尔-刚果人群。词根 ntu,或与此非常相近的词根,是这一语系的共同词根。它的意思是“个人”(person)。前缀 ba-在绝大多数语言中也是通用的,是复数表述。因此,ba-ntu 的字面意思是“人”(people)。从地图4.1,我们可以看到在地理上,班图语系在尼日尔-刚果人群中分布最广。但应该强调的是,“班图”不是任何一种语言或人的真正名称。

班图语系约有 450 种已知语言,包括北方的刚果语、吉吉库语(Gigikuyu)和南方的茨瓦纳语与科萨语(Isixhosa)。其最初的祖先或班图母语(语言学家称之为原始班图语[proto-Bantu])被认为是在今天的喀麦隆地区演进的。人们认为班图母语从喀麦隆地区,向东传播到刚果森林北部边缘地区,向南穿过森林传到更远的稀树林地地区。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讨论说班图语的人的迁徙。

考古证据:冶炼者、制陶者与种植者

铁器加工的出现和传播,其主要证据材料来自考古遗址。放射性



20 世纪早期津巴布韦恩德贝勒女孩正在用碾磨石碾碎高粱。在像这样的、十分破旧的碾磨石中,有的就是从早期石器时代农业群落中保存下来的。背景中的女孩正在用植物纤维制作布或席子。

碳和其他测定远古物质年代的科学方法，使得更为精确地测定出铁器时代定居点的年代成为可能。测定年代最为有用的材料是木炭和炼铁所产生的废渣，另一种重要证据是陶器。

农业和畜牧村落需要用陶罐来装奶和水以及烧煮食物，特别是用干化和捣碎后的谷物做糊。考古遗址出现黏土陶器碎片，通常显示出这一遗址是一个固定的农业村落。铁器时代的农民已经成为熟练的焙烧黏土陶器的制作者。他们手艺高超，可以用精心加工的纹路和印制规则的图案来装饰陶器。他们的目的是让陶罐更好看，装饰图案反映的是本地的风俗。有联系的人群使用类似的风格和陶器装饰方法。因此，制作方法、形状、风格和制作模式使得考古学家可以确认互相间以某种方式有着联系的人群。不同风格的陶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测定有着明显联系的考古遗址的年代。

52

农业的考古证据并不总是直接证据。很少真正有种植出的谷物历经时代变迁而得以保存下来，但是人们可以从用旧了的碾磨石、储存坑或贮藏库的遗迹来推测农业状况。在某些遗址中，考古学家已发掘出整个村庄，如赞比亚南部的库玛德祖鲁(Kumadzulo)或博茨瓦纳东部图兹维地区的加斯韦(Kgaswe)。正是通过这些和其他小型发掘，我们可以了解早期铁器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

班图人的“迁徙”

在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出现和 20 世纪 50 年代后大量考古研究展开前，人们往往认为说班图语的人是在相对较近的年代扩散到东非、中非和南非的。我们不能将 500 年前的口述传说作为主要证据。因此，人们曾认为说班图语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分布如此之广泛，一定存在整个新民族大规模的征服性的迁徙。然而，人们现在相信，早期说班图语的人的迁移在一开始是很小规模的，他们渗入新领地，与当地人通婚，或并入当地狩猎者-采集者村落。这一过程历时很长，至少一直延续到公元纪年后的前几百年。因此，在今天，人们通常认为把说班图语的人的扩散称为“迁徙”是一种误解。

赤道非洲早期铁器时代的起源

我们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早期说班图语的农民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就已经扩散到整个刚果森林。在那个时候，他们依然在使用石制工具，因而，为了更加便于种植，他们只得寻找天然的林中空地和森林边缘地。他们的主要种植作物为油棕、坚果和块根作物如薯蓣，这些作物都适宜生长在降雨丰富的森林地区。他们还没有学会种植谷类作物，谷类作物更适合种植在一直延伸到南方的相对干燥、夏季降雨的草原地区。而在苏丹的草原地区，人们已经驯化了诸如稷和高粱这样的谷类作物。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了解到的那样，在同一时期，东非大裂谷和大湖地区（有时指的是湖泊间的地区）也已经确立了某种形式的畜牧业和谷类种植业。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尼日利亚中部在公元前 500 年，东非大湖地区至少在公元前 600 年前均能够进行铁器加工。

早期铁器时代的传播

虽然说班图语的农民最初扩散到整个非洲南部半个大陆的时期被称为“早期铁器时代”，但我们要慎重，不能认为关于铁器技术的知识就是班图文化的一切。事实上，铁器加工技术在迅速传播到该地区前，东非的说班图语的人就已经知悉该技术长达数个世纪之久。这一事实揭示了另一种可能存在的情形，很有意思。最早的说班图语的人是林地居住者，他们主要的生存技巧就是采集水果和坚果、捕鱼和种植块根作物，记住这一点很是重要。他们在刚果森林东部的草原地区接触了说苏丹语和库希特语的民族，这些人的主要生存技能是牧牛、狩猎和种植谷类作物。人们近来认为，说班图语的人的定居点在公元纪年开始的前几百年内就迅速扩散到东非、中非和南非地区，可能是因为他们吸收了草原文化并掌握了多种混合型的农业实践知识，而不仅仅只是因为他们采纳了铁器技术的结果。影响这种迅速扩散的另一因素是他们把东南亚的新作物引入到非洲大陆，尤其重要的是香蕉和亚洲薯蓣，这两

53

种作物大约在公元 2 世纪由占领马达加斯加岛的奥斯楚尼斯亚(Austronesian)水手们带到东非沿海地区的。这些作物可能被运到内陆的东非河谷地区,如鲁菲吉(Rufiji)或赞比西河流域。特别是香蕉,很快就在非洲大陆潮湿地区,如刚果森林地区和乌干达南部的湖边地区成为重要的、高产量的作物。

然而,早期铁器时代说班图语的人的扩散的准确路线和方向,依然只是一种推测。研究陶器装饰和熔炉建造风格的考古学家已经分辨出东西文化间的总体差异,这揭示了早期铁器时代的人们是沿着两条主要的路线或“分支”扩散开来的。东西两支路线的分化地是在赞比西河东部的卢安瓦河流域一带。这也与东、西班图语出现和传播的语言学证据大体吻合。然而,再向南,这种分化的证据就不那么清晰了,人们也很难辨析出东西两支之间的分化。东西两支人群的思想在中非和南非的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了相当大程度的混合和渗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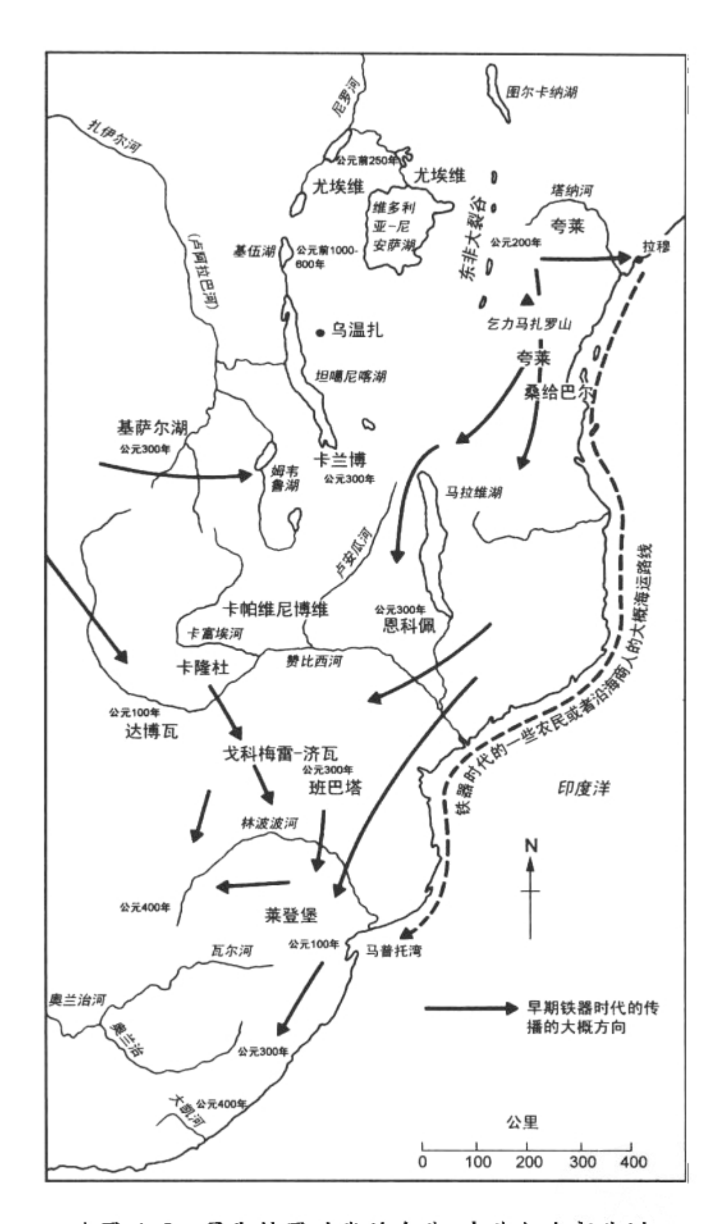
我们无法通过这些早期铁器时代人群的当代后裔确知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所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据陶器文化或风格的发现,可以有助于对他们定居地进行分门别类。

东支

东非铁器时代最早的陶器被分类为尤埃维(Urewe)陶器。东非湖地区域的尤埃维陶器所测定的年代是在公元 2—5 世纪,但它的起源可能要回溯到公元前,也就是该地区铁器加工较早出现的时期。尤埃维陶器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陶罐和陶碗底部有压痕,因此有时也被称为“凹底”陶器。在风格上可能与尤埃维陶器有关联的大裂谷东部的陶器,被分类为夸莱(Kwale)陶器。制作夸莱陶器的早期铁器时代的农民,约于公元 3 世纪开始在肯尼亚南部、坦桑尼亚北部和乞力马扎罗东南山区定居下来。另一个重要的东非铁器时代遗址位于坦桑尼亚西部的乌温扎(Uvinza)。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 5—6 世纪。该遗址的陶器显然是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但没有凹底,可能是本地出现的陶器。该遗址靠近盐泉,似乎是个盐贸易中心。

55

54



地图 4.2 早期铁器时代的东非、中非与南部非洲。

55 东支移民在公元 3—4 世纪定居在卢安瓦河与湖泊间的马拉维。这里的陶器被称为诺寇帕(Nkope)陶器。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Maputo)地区发现一处公元 1 世纪早期的遗址，该遗址中保存着看上去像是夸莱风格的陶器。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不明确，人们有诸多理由质疑这一测定年代的准确性。但是，如果这一年代是准确的，那么公

元1世纪有些农民就可能沿着海岸线航行到马普托湾。支持这一看法的证据依然有待发现,但这种看法似乎很有可能是事实。不幸的是,考古学家还没有探测过莫桑比克内陆的大部分地区。

南非的纳塔尔(Natal)地区最早的铁器时代遗址位于德班(Durban)附近,年代为公元3世纪。铁器时代的农民在公元4—7世纪期间,在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和东开普(eastern Cape)的河谷地区建立了定居点。人们曾认为津巴布韦早期铁器时代的民族属于东支移民,但现在看来,他们可能属于西支移民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属于"中部"分支。

西支

近期的考古发现揭示,公元1或2世纪从事铁器加工的农民生活在刚果西南部的金沙萨(Kinchassa)。但是该地区和安哥拉地区的考古研究依然处在初步阶段。刚果森林正南方稀树林地中的文物最丰富、最能反映铁器时代特征的遗址,位于刚果东南部沙巴省的卢阿拉巴河(Lualaba)上游流域的吉萨内湖(Lake Kisale)附近。该遗址有着早至4世纪的炼铜、炼铁痕迹。铁用来制造工具,铜用来制作项链、首饰或是用来贸易,甚至是用作货币。这个地方似乎到较近的历史时期都是未中断的、繁荣的农业和贸易定居点。我们将在第十章研究晚期铁器时代国家形成的时候,再回过头来讨论该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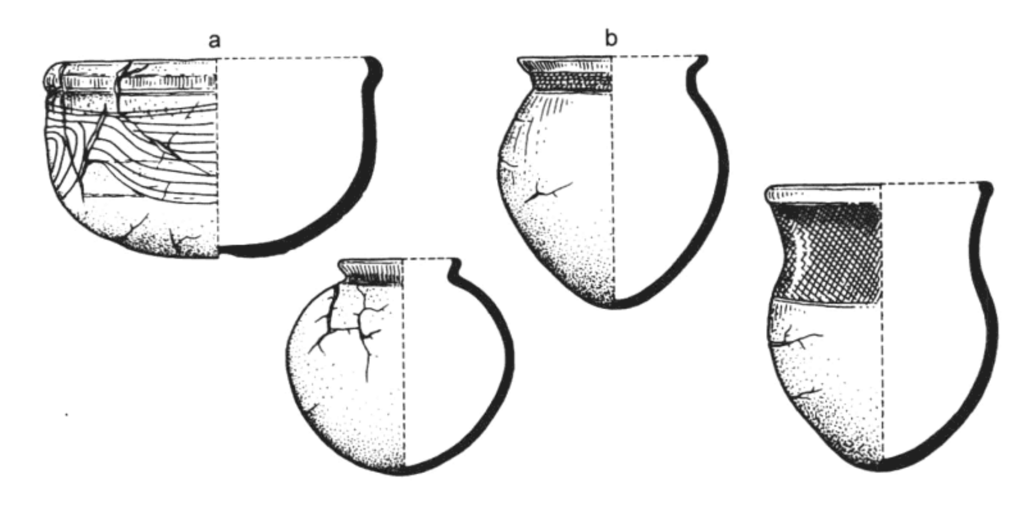
赞比亚东北部的卡兰博瀑布(Kalambo Falls)地区发现一处反映非洲中东部铁器时代村落的重要考古遗址。该遗址的首次发掘是在20世纪50年代,该遗址也是吸引历史学家来研究中非铁器时代状况的原始遗址之一。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卡兰博湖盆地上铁器时代村落自4—14世纪的延续性。

在赞比亚西南部的赞比西河流域,发现了几处公元1—2世纪早期的遗址。但是绝大多数赞比亚南部早期铁器时代的定居点是在公元3—7世纪期间形成的。在赞比亚南部展开的深入的考古研究已经使得这里的陶器分类比其他地区的更为细密。它们被分为三种不同的陶器风格:卢萨卡附近卡帕维尼博维(Kapwirimbwe)的陶器,巴托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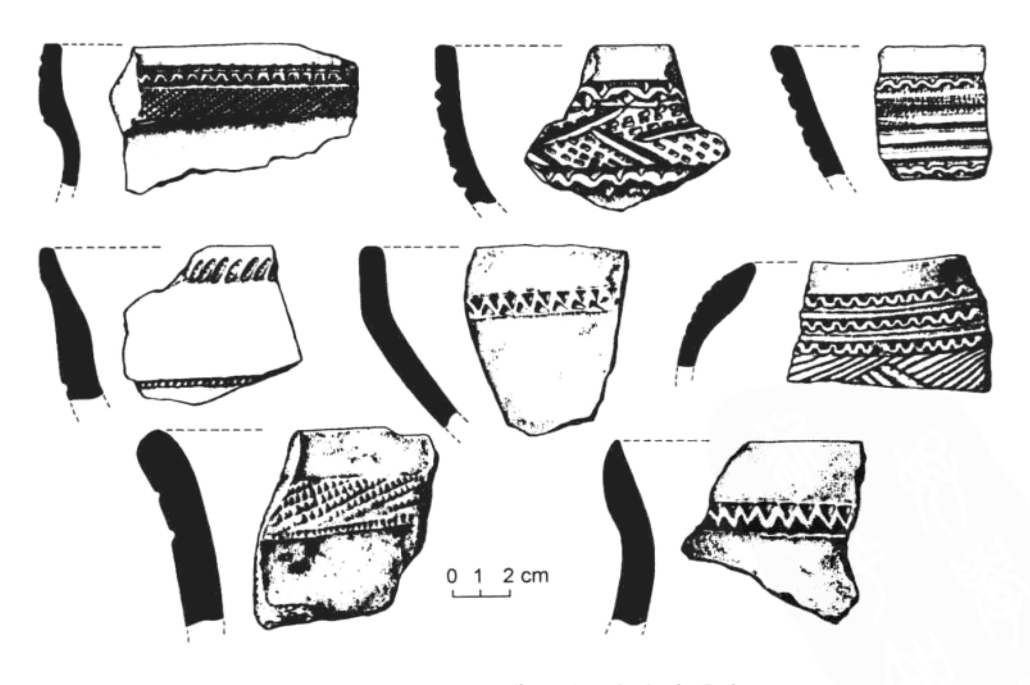
(Batoka)平原上的卡隆都(Kalundu)陶器和赞比西河流域利文斯顿(Livingstone)附近的达博瓦(Dambwa)陶器。

早期铁器时代的津巴布韦居民起初是班巴塔(Bambata)陶器的制造者,他们于公元 2 世纪定居于津巴布韦南部的马布文利(Mabveni)。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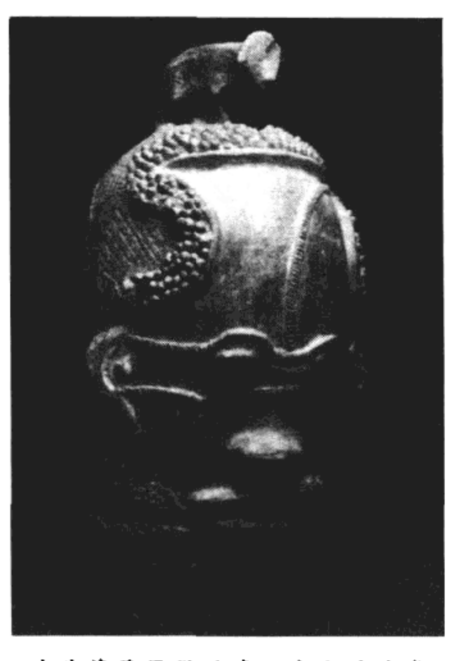
a. 尤埃维出土的深碗 b. 乌干达穆本德山区出土的陶器。



早期铁器时代的铜带工艺：黏土陶器边。

57

然而，人们对班巴塔陶器制造者知之甚少。他们应属于西支移民，并且他们穿过林波波河(Limpopo)到达了德兰士瓦高原的东南部。无论定居在津巴布韦的早期铁器时代的农民是来自东支，还是来自西支或中支，他们的定居时间是在公元3—5世纪。这里的陶器风格一直影响到博茨瓦纳东部，被分类为高克麦若-茨瓦(Gokomere-Ziwa)陶器。著名的大津巴布韦遗址中最早的铁器时代的定居点是公元4世纪的，虽然该区域的石墙属于后来的历史时期。



南非莱登堡附近遗址出土的陶瓷头像，年代为公元500年。

与此同时，西支移民继续南下，经津巴布韦西部、博茨瓦纳东部到达南非的德兰士瓦高原地区。他们可能从高原东部向西扩散，再回到博茨瓦纳。沿着这一路线的遗址保存了大量4—5世纪的海枣。海枣最为丰富的遗址位于德兰士瓦悬崖东部边缘的莱登堡(Lydenburg)附近。在该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引人注目的陶制人头像。莱登堡陶制空心人头像的年代被测定为公元500年，可能是用作典礼或宗教用途的面具。它们显示出相当精细的工艺，揭示了这里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完善的村落，人们有时间、也有意愿去发展技艺，举办典礼。

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的出现与组织

非洲班图语族的铁器时代的发展历程有着不同的阶段。最早的阶段是公元2—5世纪，掌握铁器加工的农民较快地扩散到次大陆东部、中部和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公元5—8世纪是一个巩固时期。人们开发和开采更适宜生活的地区的资源，并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公元

58

8—12 世纪是从早期铁器时代到晚期铁器时代的转折时期。在这一阶段,某些地区只是自己独立发展,而有些地区似乎已经接受了来自外部地区的“现成”的晚期铁器时代文化。这表明在次大陆上有很多中心开始出现和扩展,这一部分我们将在第十章详细讨论。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讨论早期铁器时代中的群落扩散和巩固阶段。

早期铁器时代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主要的作物是高粱和稷,还有各种南瓜、甜瓜和豆类作物。绝大多数村落也饲养家畜,但牛、绵羊或山羊的数量在早期通常较少。有些村落根本不养家畜,而那些饲养家畜的村落只是把它们作为肉类来源,而不是为了取奶,在典礼或宗教活动时也有可能屠宰它们。是否养牛取决于那个地方有无采采蝇(采采蝇的影响,参见前文)。西部的班图人也养猪和鸡。在整个早期阶段,虽然他们是农民,但狩猎和采集对绝大部分民族来说依然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狩猎的重要性取决于该地区的农业潜力。在某些地区,捕鱼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方式。

在班图人扩展的头几个世纪,铁器时代的农民只迁往那些少量的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较少去的地区。班图人因此可以选择那些最适合农业群落的地方。这些地方土地最为肥沃,草地和降雨也适合作物种植。可以自由地选择这些地方,可能是他们在早期阶段在次大陆较快扩散的原因。在这些地方,他们无需清理稠密的森林或采取新技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他们的后代只是简单地迁到新地区,因此,这些群落在一开始通常被限定在肥沃的河谷地区和有降雨的地区,所以一般都是向东南方向迁移,而避开干燥的西南地区。

村庄通常都较小,多的也只有十多户人家。然而,在某些地区,如纳塔尔,群落却很大,村庄规模达八公顷,这是有迹可循的。依托于当地的可用资源,住房建筑风格和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房子通常都是由木柱和黏土搭建而成。他们的小圆房通常以圆形的方式排列开来,形成晚上可以关着牛羊的一个家畜围栏。每个村庄通常也有大量的谷物储藏室。这些储藏室或是用黏土衬里的地坑,或者用石头、木柱搭建起来的储存库。

群落在政治上可能是以村庄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每个村庄都有延展了的家族以及眷属。男女之间有着明确的劳动分工，女人负责管理作物、做饭和照料小孩，男人则负责照管家畜、狩猎，以获取肉食和做衣服用的兽皮。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也与邻近群落的人进行贸易和其他联系，并且全面掌控群落内的生产。男人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从他们独特的安葬地上可以看出来：男人被埋葬在位于村庄中心的家畜圈的地下，而女人和孩子则被埋葬在村庄外缘的房屋附近。

59

影响铁器时代群落的早期扩散与安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可以在其所到之处找到铁矿石和充足的用来点燃熔炉的硬木炭。近来，人们在马拉维用晚期铁器时期的技术做了一次实验。实验发现，一个带有使得通风更快的风箱的黏土熔炉如果要炼出可以做三把锄头的铁，要消耗掉 1 000 公斤的硬木炭。从劳动和木材的角度上说，这样技术条件下的炼铁很显然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然而，到了铁器时代后期，技术与工艺都专业化了，情况也就不同了。绝大多数早期铁器时代的村庄都可以炼出铁来，但是规模可能比较小。有证据显示，人们还继续使用一些石制工具，如取皮用的刮削器，当然还有碾磨石。在炼铁阶段，石器还被用来锤炼新炼出的铁。在更坚固、质量更好的铁器出现前，石斧在如砍树这类重活中仍然使用过一段时间。

绝大多数早期铁器时代的村落都是自给自足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村落间的小规模贸易从早期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贸易最有可能出现在那些有着丰富的特定天然资源的地区，如盛产铜和盐的刚果的桑加(Sanga)和盛产盐的坦桑尼亚的乌温扎。有些位于矿石储量丰富地区的村落专门从事炼铁，如博茨瓦纳东部茨瓦蓬(Tswapong)山区和德兰士瓦东部的帕拉博瓦(Palaborwa)。

随着人们占据越来越多的好地方，迁移新地的速度慢了下来。南部非洲最西部的早期铁器时代定居地，其年代为公元 6 世纪或 7 世纪，正好位于大凯河(River Kei)的西部。这不是一种巧合，因为此地适合种植热带谷类作物，是夏季降雨地区的最西地界。如果再西进，就意味着要放弃人们已经熟悉的农业活动，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作物和技术。

因此,在公元 5—8 世纪的中期,整个次大陆铁器时代的农民不得不开始全面利用其已占据地区的资源。例如,在东南部的纳塔尔地区,早期的定居地限定在沿海低地和山谷底部。渐渐地,人们开始更多地利用德拉肯斯山脚下的夏季牧地,牛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变得更大。同样的,在德兰士瓦西部和博茨瓦纳东部干燥些的高地草原,由于谷类作物收成不固定,人们在早期明显侧重于饲养家畜。然而,在赞比亚和马拉维的密林地区,采采蝇使得牛没那么快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人们以黍和高粱为主要农业食粮,狩猎野生动物依然只是一种重要的补充。

60

与石器时代民族的关系

由于最早期铁器时代的农民迁移规模相对较小,因此,他们没有取代业已存在的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铁器时代的种植业开始在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前,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例如,公元 1000 年前,延续下来的石器时代依然占据着坦桑尼亚的部分地区。在早期,两种社会还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居住在一起,彼此相处也相对和谐。事实上,他们可能还得益于彼此的存在。在较为艰难的时期,种植者为狩猎-采集者提供食物来源,也为狩猎用的矛、箭提供铁尖。作为交换,石器时代的人们可以提供猎物、药草、医疗技术和用来蓄养的动物等。这样,狩猎-采集者和种植者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事实上,南部非洲说班图语的人可能就是从科伊桑语族那里获得了牛,或者至少获得了养牛经验。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该地区的科伊桑人是在说班图语的种植者到来之前就开始养牛、绵羊或山羊了。此外,在南方班图语中,许多与牛和养牛实践相关的单词都源于科伊桑语。

在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种植者有意地将科伊桑狩猎-采集者吸纳进来,而不是把这些狩猎-采集者视为附属的牧人或猎人。从早期铁器时代的墓穴中发掘出来的骨骼,很显然是科伊桑-黑人混种人的骨骼。某些班图语,特别是南部的班图语中具有科伊桑语“滴答”的发音特征,也为这种联系提供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虽然这种发音特征

是后来才出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种植者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总是需要有更多的女人。科伊桑女人可能就是通过支付聘金、以家畜或金属物品为彩礼送到新娘家里，而被吸引到农业社会的。妇女的劳动及其后代增加了粮食生产，因此也增加了群落的安全与财富。因此，从长期来看，铁器时代的农业群落是以牺牲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群落为代价而得以发展的。但是，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两种生活方式共同存在了很长时间。在某些地区，这种合并进程比其他地区更快、更彻底。例如，比起更西南的干燥地区，在今天属赞比亚的农业适宜地区，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群落的消失或被合并的速度要快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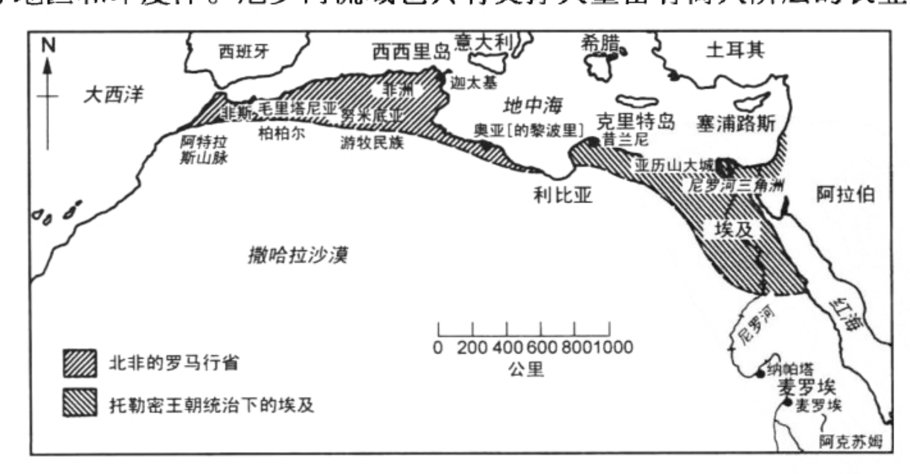
在非洲西南的干燥地区，畜牧和狩猎-采集经济依然优越于农业。科伊桑人和说班图语的人是在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合并的，科伊桑人为说班图语的人所合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卡拉哈里沙漠西部的沙丘高原、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的纳米比亚西部，说科伊桑语人一直到最近的几个世纪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

第五章　11 世纪前的北非和东北非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北非

希腊统治下的埃及

61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论述过，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在公元前 332 年征服了埃及，他的托勒密王朝是一个说希腊语的法老王朝，该王朝统治了埃及 300 年。希腊人将这块新征服地看作是巨大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枢纽点。埃及连接着地中海欧洲北部地区、非洲内陆大部分地区和印度洋。尼罗河流域也具有支撑大量富有商人阶层的农业潜



地图 5.1　希腊罗马时代的北非。

力。新希腊统治者最初的举动之一就是要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地中海沿岸建立一个大的贸易城市，即亚历山大。古埃及贸易体系自此向北扩展到沿地中海的欧洲地区，向南经红海进入印度洋。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一时期红海贸易的扩展如何促进非洲内陆尼罗河上游地区麦罗埃王国的发展。到公元前250年，埃及的希腊统治者已经建立了一支共有约4 000艘船的埃及贸易船队。

正是在这一时期，埃及开始广泛使用阿拉伯人的骆驼。骆驼是一种比驴子更大的驮兽，并在阿拉伯沙漠中显示其出色的功用。骆驼可以承受炎热，并且可以长时间不饮水，它对埃及人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贸易是个有益的补充。 62

希腊人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带到了埃及，希腊语书写更快，形式也更为简单。埃及政府官员很快就抛弃了古埃及文字，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说希腊语的官僚阶层。更具艺术性但书写麻烦的埃及象形文字不再



罗塞塔石碑，刻有象形文字，包括手写的埃及文和古希腊文字。约自公元4世纪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方法已经失传了。1799年发现的罗塞塔石碑上有着一段文字，且附有这一段文字的不同译文，因此它成为今天的学者阅读和翻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材料。

被使用。随着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古埃及的正式语言不再被使用了。普通埃及人的土语演变为后来的科普特语。后来,这种本土的埃及语言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并成为科普特基督徒的教堂语言。

63 托勒密王朝对埃及农民的主要影响是实行了一种更苛刻也更有效率的赋税体系。说希腊语的新收税官深入上埃及,重新测量了农业洪泛平原并重新确定了税额。他们引进了一种"竞争性税收"制度。在这种制度中,那些承诺缴纳最重赋税的农民将得到最多的土地。这种制度肯定会造成那些运气欠佳或效率较低的农民的生活艰难。赋税被用来供养正在扩大的亚历山大城中生意兴隆的商人和统治阶层。

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前的数个世纪里,希腊人崇拜埃及并羡慕埃及的宗教、艺术和社会。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埃及人是最爱干净的、最有宗教意识且最"文明化"的民族。"文明"一词就是源于希腊。一般来说,这里所说的文明,指的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可以从事艺术和文化生活且生活和谐(也正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第二章中使用的文明指的就是古埃及)。在近代社会,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殖民者使用该词以适应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文明"一词已经蒙羞。在欧洲殖民者看来,只有那些具有欧洲文化的人才是"文明"的。所有的其他文化被他们认为是不"文明"的,也就是说是"低级"的。

希腊人的殖民统治将埃及更彻底地融入到地中海世界。但正因为如此,托勒密法老们[①]对埃及人的剥削,加速了持续3 000年之久的埃及文明的衰落。然而,希腊和罗马世界有欠于古埃及人,希腊和罗马世界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中都可以见到许多古埃及的思想和成就的痕迹。希腊反过来带给非洲两个重要的名称: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希腊人用埃塞俄比亚这个名称指称那些主要生活在埃及南部的黑人,利比亚被用来指称那些生活在埃及西部的柏柏尔人。

---

① 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托勒密·索特尔在亚历山大死后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年,托勒密正式称王,即托勒密一世。这一王朝的君主在埃及历史中都被尊称为法老。——译者注

罗马统治下的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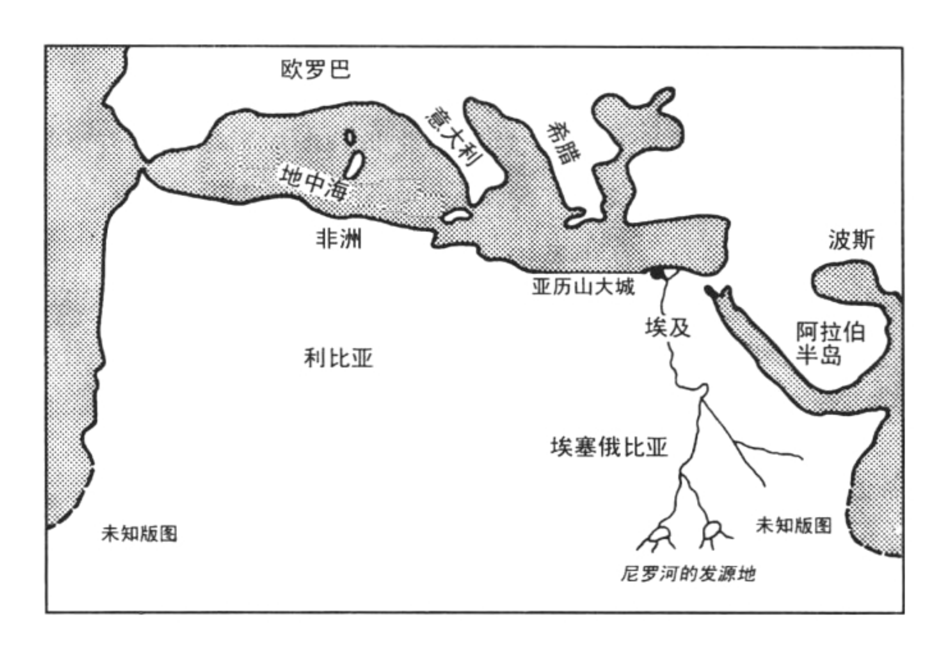
我们在第三章论述过，埃及西部的北非沿海地区是由来自贸易都城迦太基的腓尼基人控制的。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对地中海的控制随即被罗马人所取代。到公元 1 世纪中期前，罗马人开始以意大利中部为基地，将他们的帝国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在公元前 3 世纪中期就和迦太基人产生了冲突。经过一个世纪的漫长战争，罗马人最终在公元前 146 年征服了迦太基，并占领了先前腓尼基人的贸易殖民地。罗马人将他们的新省份称为“非洲”，“非洲”的含义渐渐地延展开来，开始指整个大陆。该词的起源并不清楚。它可能指突尼斯当地的某个地名或民族名的罗马语词。后来，该词为非洲人自己所接受，并由此延续到今天。

诸多独立的柏柏尔王国位于迦太基西部的山区和沿海地区之间。人口包括山区游牧民和固定的沿海农民。他们的统治阶层居住在城镇，且其文化和建筑受到希腊和腓尼基文化非常大的影响。罗马人将

64



罗马时代迦太基局部遗址（位于今天的突尼斯）。



地图 5.2 托勒密王朝所认识的非洲。

65 这些柏柏尔王国称为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在罗马征服努米底亚统治者马西尼撒(Massinissa)之前,马西尼撒的王国已经扩展到阿尔及利亚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起初与强邻柏柏尔人建立联盟。但是,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罗马人开始干涉柏柏尔人的政治,削弱柏柏尔人的权威,最终占领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并将其并入罗马帝国。

罗马人大力地开发北非领地的农业潜力。沿海平原上的小麦生产扩大了,内陆干燥的岩石山区种上了一片片橄榄树。但是,北非农业生产者因为要供养罗马帝国都城而税赋过重。谷类和橄榄油用船只运到罗马,然后再免费地分配给都城享有特权的人。

罗马的北非社会有着不同的阶层,分化明显。作为统治阶层的罗马行政人员和富有的罗马化的迦太基人(他们本身就是腓尼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儿)住在城镇和沿海城市。他们在城镇附近拥有大型庄园,并使用奴隶来劳动:绝大多数奴隶是柏柏尔人买来或是从撒哈拉游牧部落中抓来的。抛开城镇和大型庄园不说,柏柏尔人的人口数量使得柏柏尔人在语言、文化上保持着独立性,并且对罗马人的压迫怨声载道。农民虽然可以获得土地,但税赋太重。不过他们却接受罗马的保

护，以防受到沙漠游牧部落的劫掠。事实上，这些游牧部落有时反而会得到罗马收税官更好的保护，并从柏柏尔人抢掠者那里分得一杯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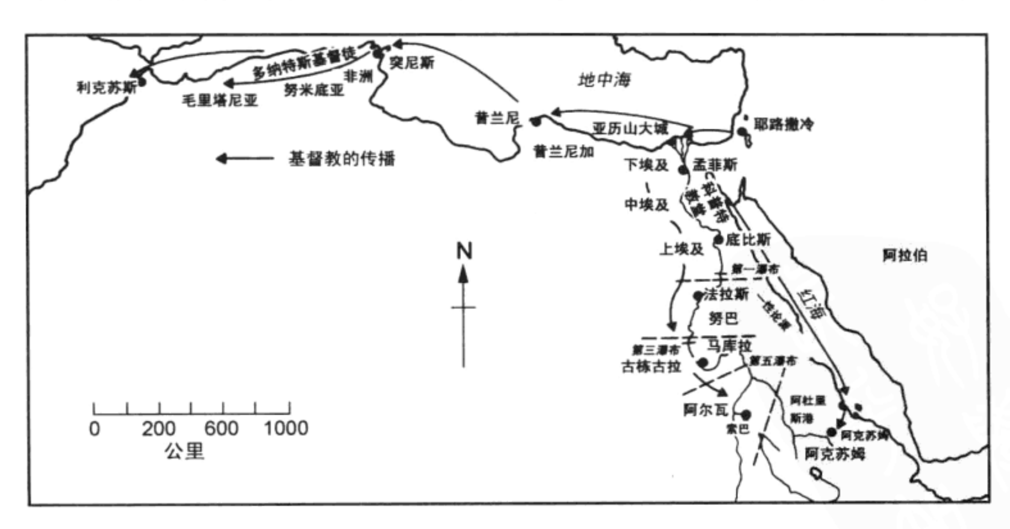
不同于固定的农业群落地区，游牧部落蓄养绵羊、山羊，有时也养牛。他们居住在罗马省份的边缘地带，有时也承认罗马人的权威，有时则承认独立的柏柏尔王公的权威。罗马所控制的南方边界一直受到撒哈拉独立的柏柏尔人的侵袭威胁。事实上，罗马军队曾尝试将骆驼带到北非地界并做日常巡逻。结果却事与愿违，柏柏尔人在沙漠上的机动性和能力使得侵袭变得更为频繁。

公元前 420 年末，北欧汪达尔人越过地中海，并将罗马人赶出了北非。而在这之前，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控制在独立的柏柏尔人的族长之手。

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恢复了对农民的征税，甚至更为苛刻。埃及对罗马来说，只是粮食的来源地而已。事实上，罗马对埃及农民的剥削如此苛刻，以至于很多农民抛弃了土地转变为土匪。

基督教在北非的传播

公元 1 世纪，埃及的商业首都亚历山大在所有的早期基督教中心中，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亚历山大是许多早期基督学者的故乡，正是他



地图 5.3　公元 1—6 世纪基督教在北非的传播。

66 们最先确立了基督教的教义。据说,基督教主教的职位就是在这里由使徒(apostle)和福音作者马可(Mark)设立的。

基督教很快发现了公元1世纪埃及受压迫民众的诉求。基督教为那些在现世中遭受贫穷和压迫的人承诺来世的幸福,并由此给人们带来希望。埃及基督教徒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修道传统。生活孤立的宗教民众组成团体,在团体的观念中存在某种吁求,要求致力于祈祷和冥思等精神问题。回避难以忍受的物质生活是他们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可能造成了这种吁求的出现。

公元1世纪期间,基督教发展缓慢。在公元2—3世纪期间,基督教逐渐向西传播到北非说柏柏尔语的人那里。正如埃及一样,吁求再一次出现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罗马治下北非民众对艰难的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可能是柏柏尔人反对罗马人的"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罗马人肯定认为早期的基督教会是个危险且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是其权威的威胁,它直接给皇帝造成挑战。一些皇帝还以法老的身份声称,他们本身就是神且应受到崇拜,其继承者也同样如此。

在公元4世纪早期之前,罗马人一直无情地迫害基督教会和教会中成千上万的教徒。最后一次的疯狂迫害是公元302年戴克里先(Diocletion)皇帝下令实施的。这种迫害直到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后才终止。此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多纳特斯派

柏柏尔基督徒一直否认罗马的权威并拒绝接受罗马的官方教会。400个北非主教,即多纳特斯派(Donatists),反对罗马基督教会的权威。67 罗马人想驯服多纳特斯派,为此不断地迫害北非基督徒。在罗马教会和多纳特斯派之间的斗争中,涌现出一个来自努米底亚皈依基督教的教徒奥里留·奥古斯丁(Aurellus Augustinus,354—430年)。他是多纳特斯派的强烈反对者,被称为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命中注定地成为了罗马基督教教义的奠基者之一。

在独立的柏柏尔酋长国内，既有多纳特斯派，也有本土宗教信仰和传统，且多纳特斯派在基督教教义和仪式上还有所改变。因此，在公元7、8世纪应对来自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挑战的时候，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团结的有效力量。

埃及的科普特教会

在埃及，大量的当地基督徒同样接受了基督一性论的教义，却并不接受罗马的官方教会。基督一性论者强调基督的神性，否认基督也可能是一个凡人。公元451年，罗马教会宣布基督一性论的教义为“异端”，冥顽不化的基督一性论者被官方基督教会驱除出境。自此之后，埃及就出现了两个教会。大量埃及民众信守基督一性论教义并建立了“科普特”教会。为此，他们用当地的科普特语代替了“麦尔基”(Melkite)教会的希腊语。

努比亚的基督教

在公元500—600年期间，基督一性论的传教士向南推进到努比亚，并带来了他们独特的教义和严格的修道传统。努比亚在此前分为三个王国。努巴(Noba)王国位于第一和第三瀑布之间的沙漠和洪泛平原地区，其都城是法拉斯。马库拉(Makurra)王国位于第三瀑布和第五瀑布地区，其都城为古栋古拉(Old Dongola)。最后是位于第五瀑布上方夏季降雨区的阿尔瓦(Alwa)王国，其都城为位于青尼罗河正南方的今天喀土穆地区的索巴(Soba)。对这些基督教努比亚王国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

后来的阿拉伯作家将尼罗河上游的基督教努比亚描述为一个小农庄分布密集的地区。北部洪泛平原种植着海枣和葡萄，更南边的地区则种植着谷类作物。牧牛遍及整个地区。近来的考古研究发现，信仰基督教的统治阶层相当富有。工匠们制作出精美的陶器，这些陶器在火烤后还画上了装饰性的画。艺术风格可能受到早些时候麦罗埃的影响。此地还留有大量的石木建筑：教堂、修道院和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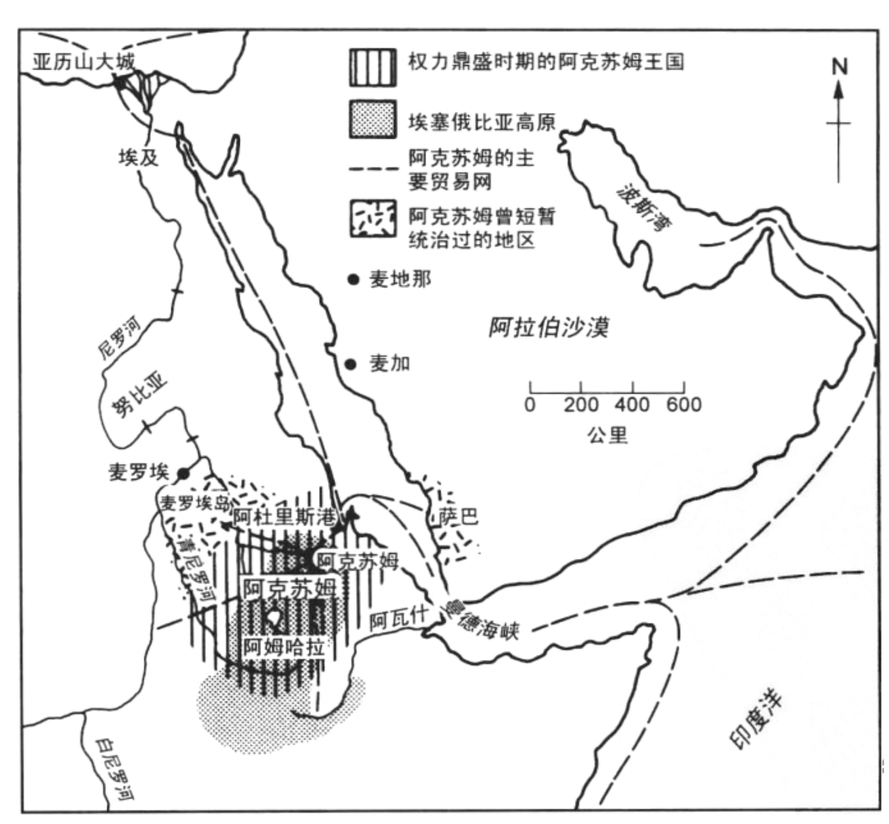
是王宫的一系列大型住所。很显然,尼罗河上游一带曾兴盛过一个独特的努比亚基督教文明,并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侵入埃及后延续了很长时间。

阿克苏姆的起源与兴起

起源

至少是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埃塞俄比亚北部边界的高原、提格雷、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东部就已经确立了混合型农业。虽然绝大多数人可能依然居住分散,但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出现了大量的规模较小的集中定居点。这些涌现出来的酋邦领导人或首领可能受益于与古埃及的贸易联系。古埃及的商人将这个地区称为“彭特之地”。“彭特”商人把黄金、木材、芳香油和兽皮经红海出口到埃及。搭建起来

68



地图 5.4 公元100—700年的阿克苏姆王国。

的石制建筑物寓示着它们是埃塞俄比亚酋邦里的重要墓葬地，并且他们的房屋都是石头结构，带有木架屋顶。随着尼罗河流域王国——先是库施后是公元前 1000 年后麦罗埃——的崛起，“彭特”贸易不再重要，并逐渐衰落下来。

公元前 6 世纪期间的某个时期，来自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萨巴[①]狩猎者和商人越过红海，在东北非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区建立了小型贸易定居点。萨巴人已经在阿拉伯半岛之角的山区发展出梯田制造技术和灌溉技术，虽然他们所处之地是以沙漠为主的半岛，但这些技术使得他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从事农业。他们也学会了充分利用其在红海与印度洋之间具有战略意义的贸易位置。他们跨越红海进入东北非，主要就是为他们与波斯和印度的贸易寻找象牙。随着种植技能的熟练，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提格雷和阿姆哈拉(Amhara)丘陵地带和肥沃流域的农业潜力。至晚在公元前 500 年前，随着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和通婚，他们的狩猎和贸易活动扩展到这块殖民地。他们的萨巴语随之让位于一种在当地约定俗成的吉兹语(Ge'ez)，今天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就是源自吉兹语。他们已经是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民族，并创造了吉兹字母。

69

虽然主要处于内陆，但这些说吉兹语的人在阿杜里斯(Adulis)建立起一个繁荣的海港。他们充分利用希腊在埃及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扩展了的红海贸易。事实上，正是来自萨巴和阿杜里斯的商人将很多希腊出产的货物经曼德海峡，运到印度洋的诸多港口。他们从那里带回了东方丝绸、平纹细布和香料。

到公元 1 世纪，北非说吉兹语的种植者和商人已经基于内陆阿克苏姆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强大国家，在政治方面独立于阿拉伯。希腊的航运手册《红海回航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上说，

---

① 萨巴王国是也门上古时期最著名的王国，约建立于公元前 12 世纪，繁荣于公元前 8—3 世纪。萨巴人主要从事商业和农业，其商业活动东达印度，西至埃塞俄比亚，并且是中国与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译者注

红海边的阿杜里斯港是整个东北非地区最为重要的象牙市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阿克苏姆已经将非洲象牙来源地从内陆的麦罗埃王国转移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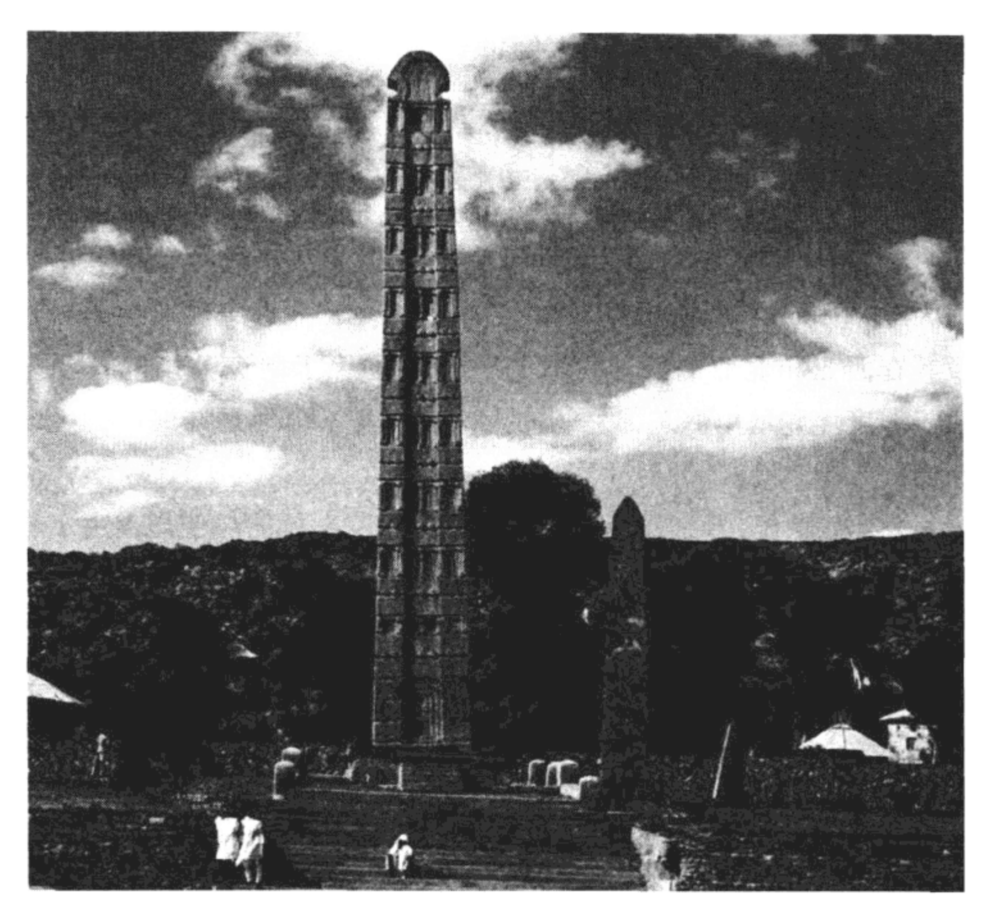
阿克苏姆的兴起

考古研究发现，阿克苏姆到公元 3、4 世纪已相当繁荣了。统治者们进口银器、黄金、橄榄油和酒，主要出口物品是象牙，可能也有卖作奴隶的俘虏。到公元 300 年，他们已经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这有力地促进了阿杜里斯的贸易往来，也使得他们取得了比其近邻的麦罗埃更大的优势，因为麦罗埃从没有出现过货币。阿克苏姆的工匠们也制造玻璃水晶、黄铜制品和铜制品，用来出口到埃及和东方的罗马帝国。出口到希腊和罗马的其他重要物品还有用于墓地的乳香和具有重要药效作用的没药。这两种具有较高价值的物品取自特定树木的树脂，而这些树木主要生长在阿克苏姆和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山区。

萨巴人到来之前，埃塞俄比亚人就已经有了石建和墓碑的观念。然而，早期的萨巴定居者引入了大规模的石建和一种独特的石刻。石建和石刻的结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阿克苏姆纪念碑文化。他们为富有的统治阶层建造寺庙、宫殿和墓地。在诸多石料建筑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巨型纪念碑，其中有些纪念碑矗立到今天。这些石碑提示我们，这些用坚石建成的高大、纤细的纪念碑的放置之所，也就是他们统治者的墓地所在。这些墓地经测定，修建年代约为公元 300 年。这些石碑用一种独特的形式雕刻过，形如一座很是狭窄的多层住所。现已倒塌的最高石碑，由 700 吨石料建造而成，高达 33 米。

公元 4 世纪，来自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学者将基督教带到阿克苏姆。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Ezana，320—350 年在位)在其统治后期接受了基督教。这可能是因为他想巩固与地中海东部希腊语世界的贸易联系并受此影响的结果。这一时期阿克苏姆纪念碑上的吉兹文字中含有希腊文字，反映了这个时候阿克苏姆与希腊的联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肯定，这是阿克苏姆繁荣和扩张的时期。埃扎纳国王约

70



至今依然矗立在阿克苏姆的最高石碑。这些“多层”建筑是由单个石块雕镂而成的，放置于阿克苏姆国王的墓室上方。

在公元 350 年侵入麦罗埃岛。两个世纪后，大约在努比亚正在皈依基督教的时期，来自叙利亚的基督一性论派的修道士也到达了阿克苏姆。在阿克苏姆，这些修道士的修道传统并入了独特的阿克苏姆基督教会。

在阿克苏姆王国内，国王在都城附近的中央地区行使最直接的权力。中央地区之外的地区统治者向国王纳贡。这些地区可能是建立在更早些时候阿克苏姆王国前的酋邦基础上的。在中央王权虚弱的时候，这些地区往往宣称独立，拒绝纳贡。国王财富和权力主要来自他们对外贸的控制。在阿杜里斯，国王的官员们对所有进出口贸易征税。除了外贸，王国的经济基础还有它的灌溉和梯田农业。但是我们很少

知道农业种植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阿克苏姆的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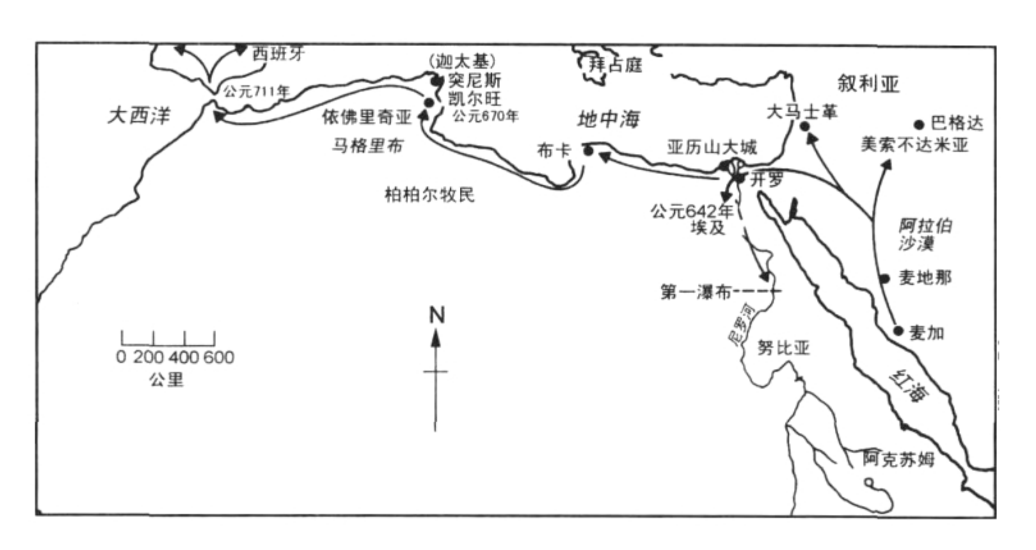
公元 6 世纪,阿克苏姆一度势力强大,版图跨越红海,涵盖萨巴(现代的也门)地区。但是,到 6 世纪末,阿克苏姆人被他们贸易上的强大对手——波斯人赶出了阿拉伯半岛。公元 7 世纪伊斯兰的兴起及其在西亚和北非的快速扩张进一步地弱化了阿克苏姆的贸易地位。印度洋和地中海东部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不再经过红海而是经波斯湾。

71 公元 8 世纪,阿克苏姆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他们丧失了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贸易有关,但与麦罗埃一样,可能也与环境退化有关。长期砍伐树木和过度使用土地,导致了如同今天该地区的那种典型的侵蚀土地的出现。虽然阿克苏姆本身作为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宗教意义的地方一直延续到现代,但在公元 800 年前,这个版图大量削减的王国的政治都城迁往南部,进入埃塞俄比亚内陆中部的高原地区。外贸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国家陷入进一步的孤立,成为一个由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的农业群落。希腊和阿拉伯的影响开始弱化,更具有独特性的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基督教文化开始崭露头角。与努比亚的基督教一样,它在公元 7、8 世纪伊斯兰教横扫北非和西亚的时候存活了下来。

阿拉伯人的进犯:尼罗河流域和马格里布

起源

伊斯兰历法开始于公元 622 年。(伊斯兰历法用 AH 表示,从麦加“逃亡”,即黑蚩拉[Hijra]的那年开始纪年。为了简便起见,本书全部采用公元纪年。)这一年,先知穆罕默德从他的出生地麦加逃亡到阿拉伯沙漠中一个叫麦地那的小绿洲。但是,他不久又回过头来重新征服了麦加,并且在他于公元 632 年去世之前,先知在新的伊斯兰信仰下团



地图 5.5　公元 640—711 年阿拉伯人对北非的征服。

结了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后来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在穆罕默德死后不到 1 个世纪内，伊斯兰教追随者的统治区域，西至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大西洋沿海地区，东至印度河。

72

数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一直是沙漠上的游牧民族。为了控制绿洲和放牧牛、羊和骆驼的分散牧场，不同部族间的骑兵展开了激斗。阿拉伯人跨越沙漠边缘寻找更合适土地的行动由来已久，但规模较小，只是零星的。同时，阿拉伯半岛占据着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红海和波斯湾之间、非洲和亚洲之间关键性的贸易位置。阿拉伯贸易商队逐渐积累了穿越阿拉伯沙漠的经验（这里的"商队"，Caravan，指的是一组跨越长距离贸易路线的驮兽及其牵引者）。事实上，麦加就是一个重要的沙漠贸易连接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商人出身。因此，阿拉伯人总体上很清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拥有富饶而又肥沃的土地。

穆罕默德时代之前，阿拉伯人虽然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有接触，但已经接受了一神论的观念。伊斯兰信仰的强大力量之一就是它的教义简单，容易理解。它没有犹太教的排他性，也没有基督教复杂的理论。伊斯兰教只是要求信仰真主并且接受通过先知穆罕默德揭示出的真主的意愿。先知的话记录在《古兰经》里。伊斯兰教没有其他宗教的神秘与仪式，也不是由一个排外的教主上层来领导，它只是要求定期进

行单独祷告，遵守斋月期间[1]严格的斋戒制度。

伊斯兰教的精神是友善和宽宏。它给阿拉伯人带来了一种新型兄弟关系的意识。之前互相敌对的阿拉伯部族由共同的语言即阿拉伯语联结起来。他们长期以来都希望越过沙漠找到新的土地，但他们缺乏征服的勇气。伊斯兰教给他们带来了团结一致的威力，并以此开始征服外族。

征服埃及

阿拉伯军队在公元640年前就已经征服了“新月沃土”，并开进到尼罗河下游肥沃的三角洲地区。埃及此时由拜占庭统治着。（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公元5世纪达到鼎盛。而此时，西罗马帝国已经陷入汪达尔人和其他西欧进犯者之手。）拜占庭统治的压迫和腐败，以及拜占庭对科普特教会的迫害，使得绝大部分埃及人对阿拉伯人采取不抵抗政策。到公元642年，阿拉伯军队将没有威信的拜占庭当局赶出了埃及。但是，拜占庭在亚历山大依然保留着一支强大的海军，威胁着阿拉伯人。这导致阿拉伯人将他们内陆的统治中心迁移到尼罗河三角洲的顶部。他们在那里的古埃及孟菲斯城遗址附近建造了新的伊斯兰教的都城开罗。在开罗，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尼罗河流域的南部，也可以使得他们与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贸易联系保持畅通。

然而，阿拉伯对努比亚的征服却因遭到新近团结起来的努巴和马库拉王国的强烈反抗而失败。长期以来，努比亚人抵制埃及统治者将其权威向南扩展到努比亚的企图。在此背景下，努比亚由弓箭手组成的强大的军队，成功地将埃及伊斯兰新统治者限定在第一瀑布之北。伊斯兰教埃及和基督教努比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此协议带来了两者间长期的和平共处和互惠贸易。

73

[1] 原文中用的是 before，实际上应该是 during，指的是在拉马丹月，也就是9月，成年穆斯林实行斋戒。——译者注

马格里布

阿拉伯人把埃及西边的整个北非沿海地区称为马格里布，即“西方”的意思。征服马格里布并没有征服埃及那么容易。阿拉伯人遭遇到拜占庭帝国和北非柏柏尔人的强烈抵抗。阿拉伯人最初的目标是想控制迦太基和肥沃的突尼斯平原。这个地区也就是被阿拉伯人称为“依佛里奇亚”(Ifriqiya)的、罗马帝国的“非洲”省份地区。公元533年，拜占庭人从汪达尔人手中重新夺取了迦太基，他们动用强大的海军来保护迦太基、抵抗阿拉伯人的攻击。直到690—699年期间，阿拉伯人建造了大量船只，足以击败拜占庭的船队。随后，阿拉伯人征服并摧毁了迦太基。在迦太基废墟边，取得胜利的阿拉伯人建立了突尼斯城。

与此同时，依佛里奇亚本身也遭到来自西边柏柏尔酋邦和南部沙漠游牧民的攻击。我们已经论述过北非的柏柏尔人长期抵抗罗马帝国的外族统治的历史。此时，阿拉伯人似乎遇到了撒哈拉北部柏柏尔游牧民的进攻。在利用骆驼以及从沙漠北边进行突袭掠夺方面，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没有什么两样。在马格里布中部进行“抵抗”的柏柏尔人曾一度将阿拉伯人赶出了凯尔旺(Qayrawan)要塞，凯尔旺是阿拉伯人在依佛里奇亚的主要基地。但是柏柏尔人未能将抵抗坚持下来。他们的主要弱点是缺乏团结和协调。而另一方面，对阿拉伯人来说，团结是他们最为强大的力量，并以此一次次地打败柏柏尔酋邦。公元711年，伊斯兰军队到达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并随时准备跨海进入西班牙。

阿拉伯人在北非的统治

一开始，阿拉伯人在北非的存在只是军事占领。他们的基本政策就是要附属臣民做出选择：缴纳人头税(即每个成年人需缴纳的一种税)、改宗或死亡。非穆斯林臣民成为税收来源，但并没有出现广泛的改宗倾向。这也使得北非早期的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被免除

了税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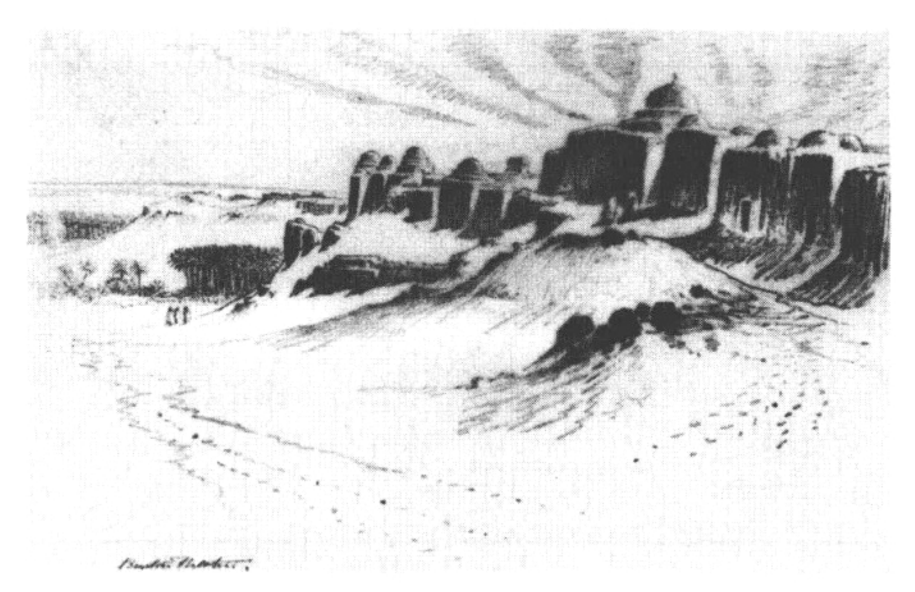
基督教在柏柏尔社会从未扎下根来,已在北非成立的基督教会也没有在最初的阿拉伯征服中得以继续存在。虽然官方的基督教被迅速抛弃了,但是北非的柏柏尔人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轻易接受新的伊斯兰教信仰。事实上,在一个世纪内的绝大部分时期,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主要被限制在沿海城镇。在那里,阿拉伯人组织奴隶在附近的农业庄园里劳作。奴隶主要是在战争中抓获的柏柏尔人俘虏,后来主要来自撒哈拉中部和南部的贸易或掠夺来的人口。马格里布早期的阿拉伯统治者很少试图向南征服高地和沙漠边缘地区。只要纳贡,柏柏尔酋邦就可以保留其自己的组织。

伊斯兰教在北非柏柏尔人之间主要通过军队中的士兵进行传播。从很早以前开始,被俘获的柏柏尔人被重新纳入军队,他们在这里改宗皈依伊斯兰教。这些人成为新宗教的斗士和热心的倡议者。正因如此,他们也受益于伊斯兰教帝国的扩展。事实上,正是一支主要由柏柏尔人组成的伊斯兰教军队在公元 711 年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率先征服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们被称为“摩尔人”(即毛里塔尼亚人)。

74

在埃及,阿拉伯人随即作为管理者、商人或某种程度上的地主而安顿下来。但总体说来,他们还是让大多数的说科普特语的埃及农民留有土地。此时埃及人口估计有 1 500 万。和之前尼罗河流域的外族统治者一样,阿拉伯人把埃及作为他们帝国的一个重要财富来源,主要通过税收来收粮,但阿拉伯人的人头税要比之前希腊人、罗马人的“竞争性赋税”制度所造成的压迫轻一些。此外,阿拉伯人重新启动了灌溉工程以促进农业生产。同时,埃及人口不断增长,而且他们知道,只要成为穆斯林就可以减轻税收负担。

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渐渐地在埃及当地人中传播开来,这要部分地归因于公元 8、9 世纪阿拉伯农民的迁移,也要归因于渐进的教育过程。从一开始,阿拉伯语就迅速地成为官方语言,也是新的宗教语言和书写、教育语言。阿拉伯语、民众读写能力和伊斯兰教事实上是一回事,都是通过学习《古兰经》而习得的。到公元 9 世纪末,古埃及传下来



被誉为杰里德明珠的沙漠城奈夫塔(Nef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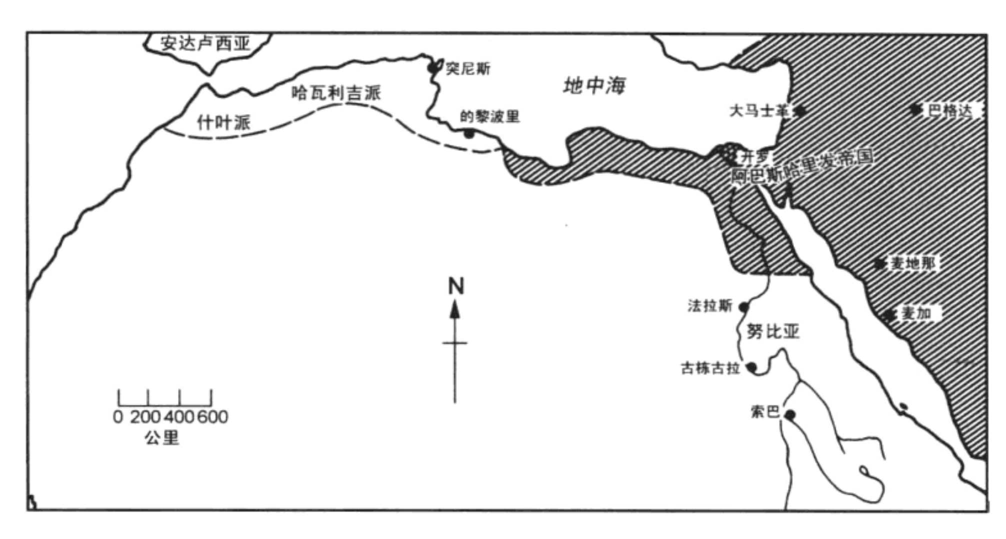
的古科普特语已经只是少数人使用的语言了。科普特语主要集中使用于残存下来的古科普特基督教会,且这些教会一直延续到当代。到 10 世纪初,绝大部分马格里布被征服的土地以及埃及的臣民都是穆斯林。

75

北非伊斯兰国家的发展

7 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教原本的团结并没有在伟大的征服时代中延续下来。在帝国的核心地带,出现了因穆罕默德的继承问题而引发的冲突。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先后掌控了哈里发帝国(Caliphate,即 Kalifa,意思是先知的"继承者")。帝国首都先是由倭马亚王朝于公元 680 年迁到大马士革,后由阿巴斯王朝于公元 750 年迁到巴格达。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主要反对者被称为"什叶派"。他们相信穆罕默德的子孙具有世袭权力来继承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他们抨击哈里发的奢靡和腐败,倡导回归虔诚,并严格地遵守《古兰经》。

与此同时,在马格里布,北非穆斯林宣称他们独立于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虽然阿拉伯人与当地的柏柏尔人有着通婚,但阿拉伯人在整体上有种族和宗教上的优越感,而这正是柏柏尔人所极力抵制的。这可以部分解释马格里布的伊斯兰国家在拒绝巴格达的阿拉伯权威并保



地图 5.6　公元 750—950 年北非的伊斯兰国家。

持与东方的彻底独立上所持有的狂热。山区和沙漠的柏柏尔人的改宗变得缓慢了。当他们改宗为穆斯林时,他们也附和非正统的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Kharijite)的运动。哈瓦利吉派是巴格达哈里发帝国的强烈反对者。他们批评正统伊斯兰教中阿拉伯的排外文化,强调所有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是平等的,无论他们的种族、文化或语言有何不同。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强调的这种平等正是源自穆罕默德时期将原本敌对的阿拉伯部族统一起来的那些原则。哈瓦利吉派的运动使人想起了反对外来权威的多纳特斯派基督徒的运动。就这点而论,哈瓦利吉派的运动为柏柏尔人抵制东方阿拉伯人的统治提供了潜在的动力。在公元 8、9 世纪,众多信奉哈瓦利吉派教义的柏柏尔国家兴亡浮沉,每个国家都宣称与巴格达的哈里发有着不同程度的独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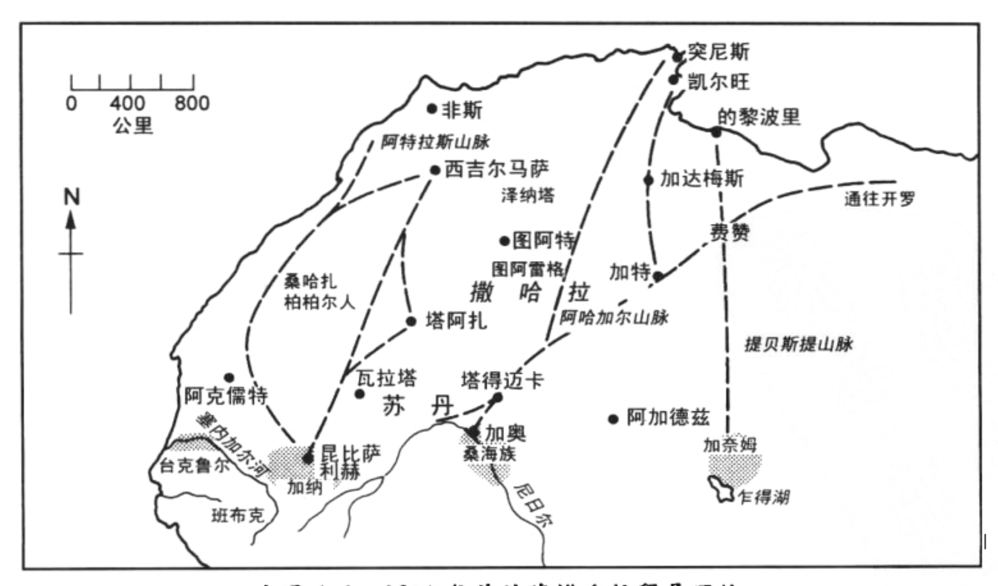
76

10 世纪早期,马格里布中部出现了一个威胁着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法蒂玛(Fatimid)王朝,该王朝就是受来自叙利亚的什叶派移民鼓动而成立的,它宣称是穆罕默德仅存的女儿法蒂玛的后裔。到公元 950 年,法蒂玛王朝征服了突尼斯北部和阿尔及利亚属于马格里布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它的主要目标是阿巴斯王朝。公元 969 年,法蒂玛王朝控制了尼罗河流域,并宣布埃及独立于巴格达的外族统治。

第六章　跨撒哈拉贸易和古加纳王国

跨撒哈拉贸易

我们在第三章看到，跨撒哈拉的长途贸易在引进骆驼之前就已经开展了。起初，沙漠居民用撒哈拉盐来交换生活在沙漠南部或北部的人们生产的粮食。最早的贸易货物可能是捆扎着用牛背来驼运的，这种牛被称为驼牛。第二章里描述的撒哈拉岩画可以提供这一情况的证　77



地图 6.1　1200 年前的跨撒哈拉贸易网络。

据。适应了沙漠环境的牛可以行进数天而无需饮水，从一个有牧地和水源的绿洲行进到另一个绿洲。我们在第三章也可以看到，在迦太基腓尼基人的贸易鼎盛时期，加拉曼特人乘坐着马拉“战车”穿越沙漠。这些战车可能被用作竞赛而非贸易。

78

然而，我们不应认为，跨越沙漠的贸易在引入骆驼之前只是小规模和零星的。除了驴子和马，一些商人继续在使用驼牛。但是，这些牲畜要是不休息不饮水，所行进的距离是非常有限的。跨沙漠的旅行依然是一件危险的事，绝大多数贸易货物在到达最终目的地前都经过了数个人群间的多次易手。少量的沙金和红宝石向北越过沙漠被运送到北非的罗马。但是，罗马人对跨越撒哈拉的常规或直接贸易并没有采取任何激励性举措。罗马从非洲进口的绝大部分象牙、鸵鸟毛和兽皮直到公元 300 年依然出现于沙漠北部地区。跨撒哈拉贸易主要还是区域性的，它的主要动力依然是用沙漠出产的盐来换取粮食。

骆驼与跨撒哈拉贸易

公元 3、4 世纪期间，骆驼在撒哈拉北部绝大多数的柏柏尔游牧民



跨越沙漠的图阿雷格骆驼商队。

族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到公元 5 世纪,骆驼成为沙漠中主要的运输工具。骆驼的引入给跨撒哈拉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比起其他用来运输的牲畜,骆驼有着较多的独特优势。

虽然骆驼比优良的驼牛在运输重量上多不了多少,但是骆驼可以进行长途运输。一头满载的骆驼可以驼运 130 公斤的货物,一天行进 25—30 公里,有时甚至达 100 公里或更远。驼峰存贮的脂肪和骆驼腹部存贮的水可以让骆驼在不饮水的情况下走上 10 天,在距离和时间上是大部分驼牛和马的两倍。骆驼可以耐得住沙漠白天的炎热和夜晚的寒冷。凭借着大八字脚,骆驼可以适应那些主要的沙漠路线之外的柔沙环境。

借助于骆驼,沙漠游牧民可以到达更遥远的绿洲,从而开辟跨越沙漠的全新路线。虽然带有危险,但沙漠旅行的可靠性要好得多了。这使得有经验的沙漠旅行者第一次认真考虑穿越撒哈拉的大宗、常规的远途商队是否可行。

79

沙漠运输主要控制在柏柏尔游牧民之手。从事沙漠运输的柏柏尔人主要是撒哈拉西部的桑哈扎人(Sanhaja)和撒哈拉中部和南部的图阿雷格人(Tuareg)。图阿雷格人与泽纳塔(Zenata)北部的柏柏尔人不同,他们不戴面纱盖住脸下方。面纱的准确起源依然不清楚,但可能是为了防风和沙尘暴。

虽然很多撒哈拉柏柏尔人从事远途贸易,但是在此阶段很少有人全职做此事。他们仍然主要从事放牧。在撒哈拉绿洲,他们收获海枣,放牧羊群、骆驼,偶尔也有牛群。富有的游牧民也养马。马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战争中也特别有用。在一年中最为炎热、干燥的季节,沙漠游牧民将他们的牲畜向北赶往马格里布,向南赶往萨赫勒(Sahel)的更适宜放牧的牧场。这使得他们可以和更多的安居下来的农业人口保持联系,但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萨赫勒是最靠近沙漠南部的稀树草原地区。该词来源于阿拉伯语 sahil,意思是“支柱”。阿拉伯人将撒哈拉沙漠看做是一个海洋,sahil 标志着带有可居草原的沙漠海洋的边界。)

虽然撒哈拉主要是柏柏尔人的领地,但也有小规模的黑人群体居



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绿洲。长期以来正是绿洲的水源才让跨撒哈拉长途贸易的发展成为可能。这里的沙漠定居者收获海枣、开采盐矿以换取粮食、布匹和其他物品。

住在撒哈拉中部的一些绿洲上。他们收获海枣、挖盐以换取粮食,但是他们经常处于边缘地位,因为柏柏尔游牧民控制着绝大多数绿洲。他们可能是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那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渔民和狩猎者的后裔。沙漠中的主要盐矿之一是塔阿扎(Taghaza),位于撒哈拉西部的中央位置。这里的盐层较厚,可以挖出盐板,然后再捆扎起来放到驮兽上。随着后来数世纪的贸易扩展,人们在塔阿扎甚至用盐块建造了房屋和清真寺,并用骆驼皮作为屋顶。

80

在历史上,西非萨赫勒有时指的是苏丹西部及在此地居住的苏丹人。这个名称来自阿拉伯语 al-Sudan,指的是热带非洲的“黑人”。

由于骆驼给沙漠运输带来的革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产品更容易被运送到地中海世界。西非的黄金贸易开始扩展。而与此同时,北非的野生猎物最终也由于过多捕捉而日渐稀少,这导致了对撒哈拉以南草原上的象牙、鸵鸟毛和兽皮需求的增加。随着跨沙漠路线的拓展,撒哈拉北部和南部出现了大量重要的贸易点。在这些贸易点,货物得以

交易,跨沙漠运输的骆驼商队装卸繁忙。虽然商队运输还是控制在沙漠游牧民族,但是货物的真正需求和交易主要是由定居在这些游牧民北部和南部地区的群落中的民族来决定。本章的下一节将讨论撒哈拉南部群落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民族。

古加纳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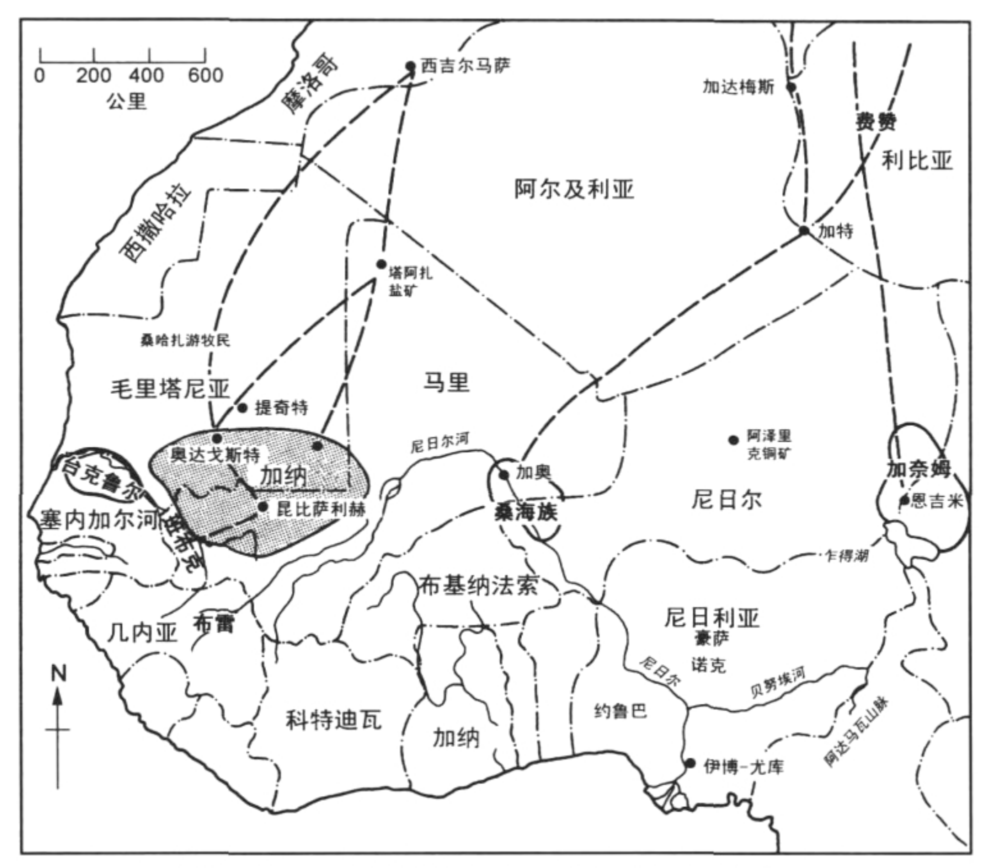
古加纳王国与今天的加纳共和国在名称上并不是一回事。虽然今天加纳的名称是为了纪念古代历史上的加纳王国,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古加纳位于现代加纳共和国西南 700 公里处,是早期西非铁器时代国家中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国家。大约在公元5—11 世纪期间,古加纳包含了今天毛里塔尼亚的南部边界地区和马里。古加纳的人口主要为索宁克人(Soninke),也就是说索宁克语的人。索宁克语是曼德语系的一个分支,而曼德语系与班图语系一样,也是尼日尔-刚果语系下的一个主要语系。为外界所知的国家名——加纳,是加纳国王的称号之一。

古加纳的起源

在第二章讨论“农业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发现农业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大型的、固定的群落中一起生活。后来出现的铁器加工进一步地提高了农业和狩猎的效率。在西非,这一情形发生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和公元纪年的头几个世纪(参见本书第三章)。很多西非社会还是在简单的小型村庄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村落、部族被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更大型的酋邦。这一情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特定的区域原因。在撒哈拉正南边的萨赫勒草原上,大量的酋邦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帝国,即加纳帝国或王国。加纳的起源,首先是掌握铁器加工技术的农民组成大型的固定群落的自然结果。但是,加纳在特定时期,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方式和规模崛起,成为一个相对较大的国家,还有其特殊的原因。

我们在第二章看到,萨赫勒是早期驯化高粱和黍的地区之一。到

81



地图 6.2　11 世纪的古加纳王国(叠加于今天的边界上)。

公元前纪年结束的时期,撒哈拉变得更为干燥,农业技术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便可以获得大量有限的肥沃的土壤和降水。古加纳人的祖先可能是有着在大型固定群落中长期居住经验的新石器时代渔民的后裔。在发展新农业技术上,他们处于领先地位。萨赫勒西部的农民很快就开始使用西非出现的新的铁器技术。在很早的时期,铁剑和铁矛就开始在该地区使用。索克宁人可能是利用更为优越的铁制武器从更为虚弱、更加缺乏组织的近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农地和牧场。由于邻近沙漠南部边缘,索宁克人与撒哈拉游牧民也有着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马匹。与草原近邻民族相比,索宁克人的统治者具有额外的军事优势。

82　然而,索宁克人与撒哈拉游牧民的关系并不完全是和平的。随着撒哈拉的干化,沙漠游牧民被迫进一步地深入萨赫勒地区以获取季节

性牧场。在干旱年份,撒哈拉游牧民的季节性迁徙是通过侵袭固定的农业群落而完成的。随着撒哈拉西部的桑哈扎柏柏尔人深入萨赫勒进行侵袭,索宁克农民可能被迫组织起来以进行防卫。因此,桑哈扎人的侵袭至少是早期加纳国家形成的一个推动力。

但是,比桑哈扎人侵袭更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加纳的贸易地位。在加纳的权力达到顶峰时,依托于不断壮大的跨撒哈拉贸易,它的权力不断增长,其统治者的财富不断增加。因此,贸易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索宁克人处在撒哈拉贸易的理想位置。他们在萨赫勒西部,位于沙漠和班布克(Bambuk)地区的中间位置,沙漠是主要的盐产地,班布克是塞内加尔河上游的黄金产地。索宁克人最初用他们的剩余产品从塔阿扎的产盐者那里换取盐。接着在5世纪,骆驼被引入跨撒哈拉贸易中,带来了跨沙漠运输的兴盛,特别是拓宽了北非获得西非黄金的渠道。随着跨撒哈拉地区对黄金需求的增加,索宁克人可以充当“中间人”,将撒哈拉盐运到南方稀树草原的黄金生产者那里。因此,加纳王国的起源从公元5世纪开始,似乎也不是一种巧合。

黄金贸易的扩展

在公元8、9世纪期间,北非阿拉伯人开始更直接地从事黄金贸易。伊斯兰贸易城镇,如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南部的西吉尔马萨(Sijilmasa)成为扩大跨撒哈拉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北部基地。在这里,阿拉伯商人购买西非的黄金,并且给柏柏尔商队提供更多资金。通过与阿拉伯商人的更深入的联系,撒哈拉北部和西部的柏柏尔游牧民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这让他们与马格里布的阿拉伯商人之间的贸易变得更为便利,并且也会在游牧民本身之间增加兄弟情感和合作意识。旅行变得安全了,也很少会受到侵袭。与此同时,在公元9、10世纪,北非伊斯兰国家对黄金的需求逐渐加大,以便它们铸造货币。随着贸易规模的增加,很多之前的游牧民变成了全职的沙漠旅行者。到10世纪,一支跨撒哈拉商队里的骆驼就达700头。跨撒哈拉的黄金贸易的

扩展与加纳国家的发展是同时并进的。

在沙漠的南边,伊斯兰柏柏尔商人有其自己的城市基地。在完成到达加纳的最后一段旅程前,向南行进的商队可以在这里卸货、休息。向北行进的商队也在南部的撒哈拉基地装货,并购置给养以备跨沙漠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最为重要的伊斯兰柏柏尔城镇是位于撒哈拉西南部的奥达戈斯特(Awdaghust)。随着贸易的扩展,奥达戈斯特的柏柏尔穆斯林与加纳的索宁克人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竞争。在11世纪加纳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加纳在扩强中将奥达戈斯特纳入到它的王国。

83

阿拉伯人对加纳王国的描述

阿拉伯对黄金产地的兴趣不断增加,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同时期的阿拉伯人的作品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加纳的书面记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伊斯兰民族在这一时期还没有文字记录,因此他们没有自己的书面记载。对加纳王国的书面描述,历史学家必须依赖于外国人的记载。在这些外国人中,有一些人从没有访问过西非,只是记载从遥远地方来的商人口中所听到的内容。历史学家对这些阿拉伯人的记录进行研究时,必须考虑到阿拉伯人对非伊斯兰教民族所抱有的偏见。换句话说,和绝大多数历史记载一样,它们也不是绝对可信的。然而,通过最好的作品还是可以洞察处于顶峰时期的加纳王国。

最早在书面上提到加纳的是公元8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厄尔-法扎里(al-Fazari),他简短地提到"加纳之土,黄金之地"。很显然,在遥远的伊斯兰首都巴格达,加纳因其黄金贸易而名声显赫。后来的阿拉伯作家对加纳有着更详细的描述,特别是它的都城昆比萨利赫(Kumbi-Saleh)。最为全面的记载来自11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厄尔-巴克瑞(al-Bakri)。厄尔-巴克瑞以伊斯兰西班牙为基地,从马格里布说阿拉伯语的商人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从这些记载的详细程度上判断,有些商人在西非有着丰富的个人旅行经历。

在厄尔-巴克瑞的描述中,11世纪的加纳首都昆比萨利赫分为两个独立的城镇,彼此还有一段距离。一个是独特的伊斯兰城镇,专门用



昆比萨利赫的考古遗址(位于今天的马里)。

来接待来访的阿拉伯和柏柏尔商人,其中有很多的清真寺。另一个则是国王所在的城镇,约在10公里之外。两个城镇之间都是索宁克人的石木房。

> 国王的行宫由一个宫殿和很多圆锥屋组成,整个行宫由墙状栅栏环绕着。在城镇周围,是圆锥屋和荆棘树园子,住着掌控宗教仪式的巫师。巫师将神像放置在这些园子中,已逝的国王也埋葬于此。这些园子由卫士把守,不让任何人进入或发现园子里面发生了什么。
>
> 除了国王本人和可能的继承人,即国王姐妹的儿子之外,任何人不准穿裁剪过的衣服。其他臣民依其所便穿着棉布、丝绸或锦缎做成的裹布。绝大多数男人剃须,女人理发。国王在其颈脖和手臂上戴有用雌性动物做成的装饰品。国王头上戴着由最好的棉布做成的头巾所包裹的、有着金绣的帽子。国王在一个圆锥屋内听取意见,为民伸张正义。圆锥屋周围停有10匹金色布匹加身的

84

马。在国王的后面，站着 10 个配有镶嵌着黄金的盾牌和佩刀的奴隶。在国王的右边是附属诸侯(vassal kings)的儿子们，他们头上有用黄金做成的褶辫，穿着价值不菲的服饰。国王周围的地上，坐着他的臣子们，而王城的治理者则坐在国王的前面。门口由纯种狗放哨，狗戴着用金银装饰的颈圈。击鼓声召集着王室的臣子们，这种鼓叫达巴(daba)，是用一长块中间被掏空的木头做成的。当人们聚集的时候，和国王信奉同一宗教的人近距离地跪了下来，彼此在头上撒下尘土以示尊重，而穆斯林则是以鼓掌作为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摘自 J. S. 特里明厄姆(J. S. Trimingham)的《西非伊斯兰教史》(*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55 页中所引用的译文

很显然，到过加纳的穆斯林拜访者对国王及其朝臣所拥有的权力和显赫财富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拜访者特别关心黄金的来源，但是索克宁人成功地保守了这一秘密，使得这些拜访者对此一无所知。索克宁人买来黄金以交换南方班布克矿工的盐。然后，黄金再卖给都城昆比萨利赫的穆斯林商人，用来交换马格里布的撒哈拉盐、布匹和其他制成品。加纳的国王们正是通过对这种贸易的征税，获得了绝大部分财富。据厄尔-巴克瑞所叙，国王对每一单进口到王国里的撒哈拉盐征收 1 第纳尔(dinar)，对每一单再出口到南部金矿区的盐征收 2 第纳尔(1 第纳尔就是 1 个阿拉伯金币，在重量上等同于 65 粒大麦)。黄金本身的进出口实际上是不征税的，但是国王为确保他的收入对所有的固体金块都加以征税，使得商人们只得用金沙来进行贸易。这也使得国王及其内臣可以用黄金以上文描述的那种方式展现其富有。国王雇佣具有读写能力的穆斯林作为秘书和大臣，对贸易和税收进行记账。

加纳的臣民很少受到阿拉伯作家的注意，后者主要关心的是黄金贸易。但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加纳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渔民和牧民。国王对王国内远离中心的地区几乎没有直接控制。都城之外的地方机构

掌控在地方异教徒的首领手里，但这是以承认国王权威、给国王进贡粮食和狩猎物为条件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合作，国王将地方首领的儿子和继承人留在宫廷内作为人质。这些人质就是厄尔-巴克瑞所指的"膏立诸侯之子"。作为对进贡的回报，国王要保护王国臣民免受沙漠游牧民的侵袭。虽然没有常规军，但是在需要的情况下，王国中很多地区都会派送男性青年以备军事之需。据厄尔-巴克瑞所叙，11 世纪加纳国王可以召集一支数量达 20 万人的军队。军队有时也被用来侵袭南方的弱势民族。侵袭中抓获的俘虏被卖给穆斯林商人作奴隶。然而，总体上讲，俘虏不是昆比萨利赫的主要贸易商品。跨沙漠到北非穆斯林地区的俘虏贸易主要是来自更东方的乍得湖地区。

加纳王国的衰落

1050 年，加纳王国已经在扩张中占领了伊斯兰柏柏尔城镇奥达戈斯特。这之后的某个时候，加纳的统治者和臣民成为穆斯林。阿拉伯人留下的原始资料通常认为这是阿尔莫拉维德运动（Almoravid movement）的追随者征服伊斯兰柏柏尔人的结果（参见本书第七章，我们将讨论阿尔莫拉维德人）。但是这些原始资料对这一问题的叙述并不清晰。有几个涉及这次征服的材料是过了很长时期才写成的，可能有点热衷于吹嘘伊斯兰柏柏尔人对苏丹"异教徒"的胜利。对这些原始材料的仔细研究发现，这可能是一次和平的改宗。然而，即便如此，撒哈拉柏柏尔人和加纳的索宁克人之间在萨利赫还是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和更具有破坏性的与阿尔莫拉维德人的战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之前的贸易联系。数个世纪以来，加纳的兴盛得益于其在西苏丹黄金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贸易的中断，新改宗伊斯兰教的加纳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统治松散的且主要是非穆斯林人的帝国。

11、12 世纪，南部林地、草原地区的布雷（Bure）金矿区得到开采。同时，更东边的奥达戈斯特出现了新的跨撒哈拉路线。这给了索宁克人和南部的马林凯人（Malinke）的酋邦宣布独立的机会。在 13 世纪早

期，索宁克人酋邦索索(Sosso)占领了之前加纳的大部分地区和他们南部的邻居马林凯人的地区。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论述的那样，马林凯人最终摆脱了索索的残暴统治，赢得独立，并缔造了伟大的苏丹帝国马里。

加纳王国衰落更深层的原因是环境的恶化。萨利赫位于草原和沙漠之间，已是种植谷类作物的边缘地区了。到 13 世纪早期，土地似乎已经退化了，该地区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定居人口。同时，柏柏尔畜牧者正向南推进，导致该地区被过度放牧。因此，在 13 世纪早期，前加纳王国的索宁克农民和商人从昆比萨利赫分散开来。他们一小群一小群地迁移到南部和西部更适宜的林地草原地区。索宁克人的分散进一步地刺激了贸易的发展，西非很多地区的国家建立已经排上了日程表。

86

其他早期西非国家和社会

在西非所有早期铁器时代国家中，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加纳。这主要是因为加纳在跨撒哈拉黄金贸易中卷入得最深，很多受过教育的说阿拉伯语的人访问并记载了加纳。对这些人，我们知道的也不多。但在同一时期，西非其他地方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金属加工和农业技术处在发展中，人们在西非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领土上是以大量大小不一的群落组织在一起的。大一点的国家似乎是在重要贸易路线和连接点附近才得以出现。正如加纳，统治者可以通过对贸易征税和进口奢侈品来增加财富及由此带来的权力。

更西边的塞内加尔流域的台克鲁尔(Takrur)王国，曾作为一个有实力的贸易国家而出现，甚至比加纳还要早一点。其统治者的财富同样是建立在贸易的基础上，主要是来自奥利尔(Awlil)的盐贸易和来自班布克的黄金贸易。台克鲁尔沿着西海岸线直到西吉尔马萨和摩洛哥，连接着北非。台克鲁尔的统治者在 11 世纪早期，在加纳索宁克人之前，将伊斯兰教作为其国家的官方宗教。因此，他们在其近邻穆斯林柏柏尔阿尔莫拉维德人与索宁克人之间的冲突中，站在前者一边。

穿过苏丹西部的另一边，即乍得湖的东北部地区，曾崛起过加奈姆



尼日利亚东部伊博-尤库(Igbo-Ukwo)典礼用的青铜酒器。

(Kanem)帝国。在被称为塞法瓦(Saifawa)的单个王朝的统治下，很多游牧部族约在公元900年被统一起来了，这成为该帝国形成的开始。加奈姆人说卡努里语(Kanuri)，这种语言是尼罗-撒哈拉语系的一个分支。加奈姆的卡努里人在一开始依然是游牧民。直到公元11世纪，他们的统治者才将都城固定在恩吉米(Njimi)(该都城的准确位置至今没有确定)。与加纳、台克鲁尔一样，加奈姆的统治者通过对贸易的控制而获得财富和权力。他们与北部的主要贸易通道经撒哈拉中部到达费赞，再到的黎波里和埃及。他们跨沙漠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为象牙、鸵鸟毛和卖到北非穆斯林手中作为奴隶的俘虏。他们为抓获俘虏而展开的侵袭使得他们经常与其南部邻居产生冲突。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讨论加奈姆后来的历史。

87

在西非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大量从事金属加工与农业的群落。一些是以组织化的国家出现的，另一些则保持小型的、大体上是基于部落或村庄上的群落。这些群落分散在整个西非草原和森林地区。生活在小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村庄里的人通常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也就是说，他们生产粮食是用于家庭消费而无需缴税，也不用来进行贸易。他们没有官僚机构和处置纠纷的少数统治阶层，他们在纯家庭基础上

作出决定。一些人由于有着共同的语言而联系在一起，偶尔也会为了防卫外来进犯而团结在一起。但是当威胁消退后，他们通常又会分散开来。在起始阶段，小型国家组织是作为宗教圣地的保卫者而出现的，军事领导人或富有的商人占居着统治者的位置。例如，约鲁巴(Yoruba)和豪萨(Hausa)国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早期形式的国家，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讨论它们。

甚至在最小型的群落里，金属加工技术也产生了精美的艺术品。在尼日利亚森林南部的伊博-尤库发现了精美的青铜铸件。这些铸件的年代是公元900年，被认为是宗教首领或统治者的陪葬品。尼日利亚人有着漫长的黏土工艺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前的诺克文化。伊博-尤库青铜器的铜肯定是来自诸如今天尼日尔阿泽里克(Azelik)这样的撒哈拉矿地，因为在尼日利亚地区没有这种矿产资源。青铜的铸造方法是伴随着铜的南运过程中而出现的。伊博-尤库的青铜证据说明，甚至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人们也与草原和萨赫勒的长途贸易网络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第七章　伊斯兰教和西非的苏丹国家

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起源

88

前一章已经论述过，到 19 世纪末，大部分西撒哈拉的柏柏尔人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且正是他们将伊斯兰教带入苏丹西部地区。伊斯兰教让柏柏尔游牧民和商人有着一种特定的、共同的“兄弟”意识。此外，伊斯兰教还加强了他们与萨赫勒的苏丹农民进行领地竞争中的力量。领地竞争的最前线是桑哈扎柏柏尔人的拉姆图纳(Lamtuna)分支和加纳的索宁克人。11 世纪早期，加纳索宁克人的控制范围扩展到伊斯兰城镇奥达戈斯特和周边地区的桑哈扎族的拉姆图纳人居住地。某些桑哈扎领导人将这种领地竞争视为宗教战争，但他们没能让其继承者具有圣战(jihad)的那种狂热。

此时，富有的柏柏尔首领们并不总是前往麦加朝圣，去麦加朝圣直到 1036 年才成为一种惯例。1036 年，一位桑哈扎首领在从麦加返回的途中拜访了北非凯尔旺的穆斯林学者。他向学者们倾诉了自己的心事：他的臣民对伊斯兰教没有热情，且臣民在苏丹异教徒的控制下受苦受难。此次对凯尔旺的访问结果就是，该首领将一位名叫阿卜杜拉·伊本·亚辛

(Abdallah ibn Yasin)的北方柏柏尔学者带到了撒哈拉的西南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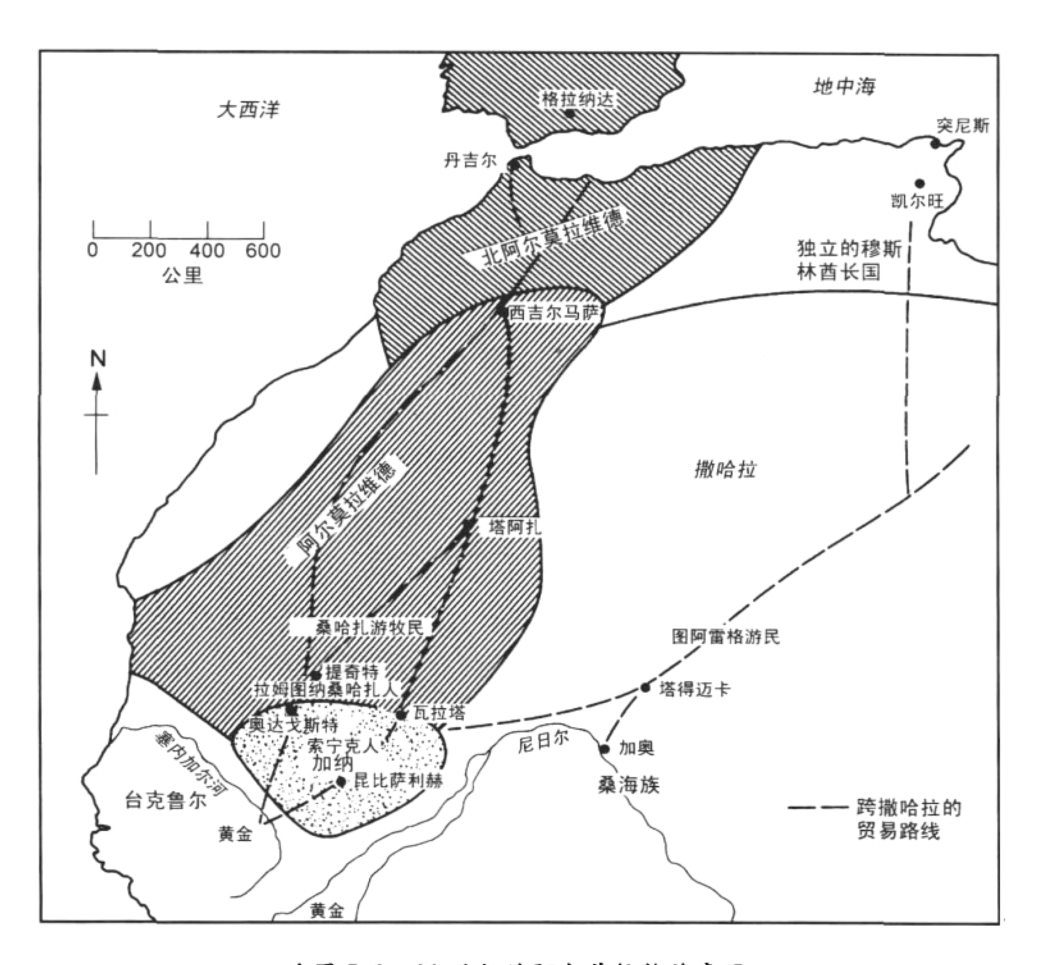
阿卜杜拉震惊地发现，这些名义上为穆斯林的柏柏尔人很少遵守伊斯兰教义。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对《古兰经》知之甚少。此外，他们还保留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宗教思想和习俗。与后来改宗伊斯兰教的苏丹人一样，很多南部的柏柏尔穆斯林将新旧宗教成功地融合起来。在阿卜杜拉看来，这些人没有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主要归咎于桑哈扎人没有统一的意愿，以及他们的领土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索宁克人的掌控之中。但是，阿卜杜拉想让沿海的朱达拉桑哈扎人(Juddala Sanhaja)重新皈依伊斯兰教的努力却失败了。后来，阿卜杜拉隐退到毛里求斯沿岸的一个偏远地。这个退隐地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里巴特”(*ribat*)。在这里，阿卜杜拉建立起一小支勇于献身的、虔诚的伊斯兰教追随者队伍，被称为阿尔莫拉维德人[①]。阿卜杜拉和阿尔莫拉维德人提倡严格遵守伊斯兰教规，并向异教徒发动圣战。

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扩展

阿尔莫拉维德人在拉姆图纳部族中的传教一开始就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这些桑哈扎游牧民与索宁克人处在极其严重的冲突中。在11世纪40年代早期，大量拉姆图纳部族人加入到阿尔莫拉维德运动中来。早期改宗者中，著名的有叶海亚·伊本·欧麦尔(Yahya ibn Umar)和他的兄弟艾布-巴克尔(Abu-Bakr)，两人均是拉姆图纳首领之子。他们和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一道领导了对西撒哈拉桑哈扎人的征服与改宗。阿尔莫拉维德运动让互相敌对的桑哈扎部落以一种新的形式统一了起来，使得他们在北部的西吉尔马萨得以摆脱泽纳塔柏柏尔人的控制，在南部的加纳得以摆脱索宁克人的控制。几年时间内，叶海亚和艾布-巴克尔就打造了一支强有力的民兵部队。部队的速度与激情弥补了纪律缺乏所带来的不足。宗教狂热和战利品的诱惑激发了一次次的征服。

89

① al-Murabitun 或 Almoravids，意思是住在修道院里的人。——译者注



地图 7.1　11 世纪的阿尔莫拉维德帝国。

到 1055 年,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军队已经征服了北部的西吉尔马萨和南部的奥达戈斯特,从而控制了跨撒哈拉的黄金贸易。早期的成功促使桑哈扎游牧民越过沙漠,扩展到摩洛哥山区和平原地区。然而在此期间,两位主要的领导人丧生于战斗中,阿尔莫拉维德人早期的团结有所削弱。叶海亚死于 1057 年,阿卜杜拉死于 1059 年。艾布-巴克尔承担起该运动名义上的领导权,但征服领地太大,从北向南横跨撒哈拉,一个领导人实在难以控制。艾布-巴克尔回到南部展开反对苏丹人的圣战时,他将他的表兄弟优素福·伊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ufin)留下来控制北方。从此,该运动实际上一分为二,优素福率领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军队穿过摩洛哥,进军西班牙南部。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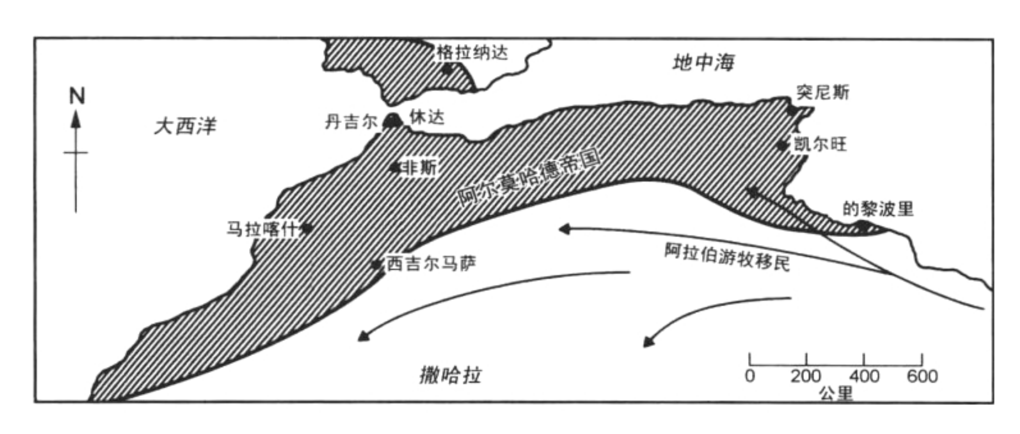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南部阿尔莫拉维德人是在 1076 年征服加纳的。从前几章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代阿拉伯语资料的最新研究对是否存在真实的征服抱有怀疑的态度。可以确定的是，在阿尔莫拉维德人和索宁克人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武装冲突。索宁克人被迫从奥达戈斯特后撤，而且贸易中断了。在 11 世纪后 25 年内的某个时候，加纳的索宁克统治者皈依了伊斯兰教，是征服的结果还是游说的结果依然不清楚。这有可能是为了与已忠诚于伊斯兰教的桑哈扎人重建贸易联系而有意做出的政治策略。可以肯定的是，在 12 世纪早期，加纳既是伊斯兰教国家又是独立国家。

艾布-巴克尔死于 1087 年。之后南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军队的主要力量开始向北转移。很多骁勇善战者都被劝说离开了南部的沙漠，重新加入优素福的军队，以推进对北非的占领。由于这种离弃和半途而废的征服，南部桑哈扎人的团结也开始削弱了。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索宁克人和后来的马林凯人才得以重新开始扩张。

北非的伊斯兰国家（1100—1500 年）

与此同时，在北部帝国摩洛哥和西班牙南部，以前沙漠上的游牧民族很快就沉迷于财富与权力之中。他们“腐化”且缺乏宗教虔诚，这激发了北非柏柏尔人的反抗。12 世纪 40 年代，这种反抗迸发出反对阿尔莫拉维德人的圣战。这一圣战由阿布德·穆明（Abd almu'min）领导，他统一了北非柏柏尔人，推翻了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桑哈扎人，建立了阿尔莫哈德（Almohad）王朝。事实上，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一整个马格里布的圣战依然在继续进行。马格里布的统一直到 12 世纪末才完成。在此期间，北非柏柏尔人变得更加彻底的伊斯兰化，移居来的阿拉伯游牧民则广泛地将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带入到农村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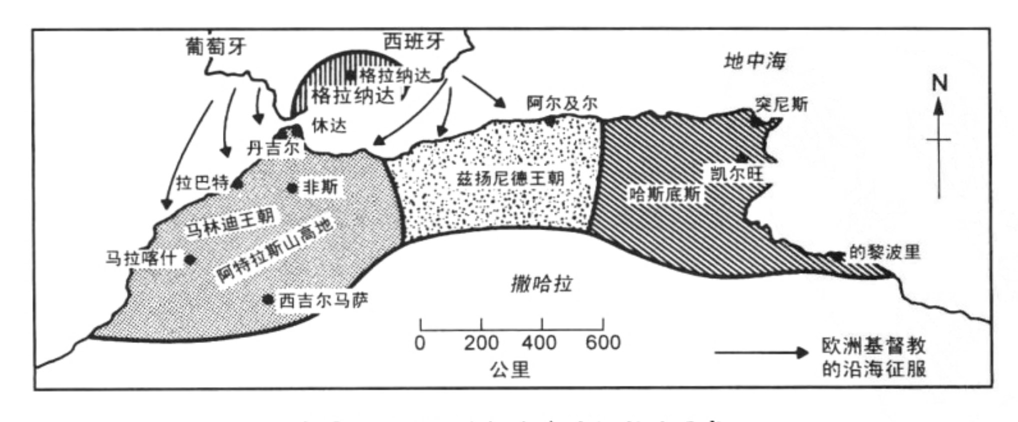
这一进程所带来的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北非、西非伊斯兰世界的识字能力的提升。在阿拉伯人那里，识字能力通常是通过学习《古兰经》而得以提高的。清真寺因此成为教学的中心。通过这种方式，北非和西非的民族可以接触到并得益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成果。这些成果相当丰富，特别是在数学和科学领域。正是这些穆斯林-阿拉伯人，



地图 7.2　12 世纪的阿尔莫哈德帝国。

创造了从 1 到 10 为计数基础的现代数字体系。他们发明了代数,使用小数点和数字 0,这些是古希腊人所没有的数学概念。他们还有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他们研究化学,也是第一个将药物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民族,并将药物发展成一个世俗的科学。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看到,苏丹西部的民族是这一伊斯兰知识传统的继承者。

随着阿尔莫拉维德帝国在 13 世纪分裂为三个敌对的国家,马格里布的政治统一也随之崩溃。同时,穆斯林被基督教王国阿拉贡(Aragon)、卡斯提尔(Castile)和葡萄牙的军队逐出西班牙,赶到北非。1415 年,信仰基督教的葡萄牙人占领了沿海要塞休达(Ceuta),并将他们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拓展到北非。16 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沿着北非海岸建立了许多贸易口岸。



地图 7.3　15 世纪北非的伊斯兰国家。

92

黄金贸易的进一步扩展

北非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和阿尔莫哈德王朝极大地繁荣了跨撒哈拉的黄金贸易。与10、11世纪埃及的法蒂玛王朝一样,11—13世纪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和阿尔莫哈德王朝也铸造了自己的金币。随着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亚洲之间贸易的增长,欧洲在13世纪前也迎来了经济复兴。欧洲的国王和贵族们在铸造货币时,渐渐地从银、铜转向了黄金。这种铸币用的黄金绝大部分是来自撒哈拉南部。据估计,在14世纪欧洲和北非,三分之二的流通黄金来自苏丹西部的贸易。据此可以判断,虽然最初阿尔莫拉维德人与加纳的索宁克人之间的冲突可能中断了贸易联系,但是很明显,这只是暂时的。事实上,阿尔莫拉维德人对撒哈拉柏柏尔人的统一以及伊斯兰教在西非统治者间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并促进了跨撒哈拉的黄金贸易。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论述的那样,随着黄金新产地的开发,加纳也丧失了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这为很多新的西非国家的崛起开辟了道路,特别是马里的崛起。

马里帝国

起源与扩张

主要的黄金新产地是尼日尔河上游稀树大草原的布雷,这使得草原上说索宁克语和马林凯语人更加彻底地融入到了苏丹人巨大的贸易网络。占先机的索索人是南方索宁克人的分支。在坎特(Kante)部族的苏芒古鲁(Sumaguru)的领导下,索索人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新的、脱离于加纳的独立国家。索索王国的建立基础主要是劫掠和征服,他们杀死统治者并夺取了贡品。在13世纪20年代早期,苏芒古鲁的军队劫掠南部的马林凯人,然后再攻击北部加纳的索宁克人,大约在1224年洗劫了他们的都城。

一个在索索人劫掠中幸免于难的马林凯人——来自凯塔(Keita)

部族的孙迪亚塔(Sundjata)开始组织马林凯人的反抗。他将大量马林凯酋邦联合起来并置于其统治下。1235年,他率领马林凯人军队在今天巴马科(Bamako)附近的基里纳打败了索索国的苏芒古鲁。击败苏芒古鲁后,孙迪亚塔开始统治索索在近期征服的所有索宁克人,包括很多隶属于前加纳的索宁克人。

在短短的几年内,孙迪亚塔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即我们所知的马里。其都城建在尼阿尼(Niani),位于尼日尔河上游南部大草原上的黄金产地布雷附近。甚至在孙迪亚塔活着的时候,马里帝国的版图就从西南的森林边缘越过马林凯人和南部索宁克人的稀树草原,一直延伸到前加纳的萨赫勒地区。奥达戈斯特依然控制在桑哈扎人的手里,但此时,更早期的瓦拉塔(Walata)已经成为跨撒哈拉贸易在南部沙漠上的主要"通道"。加纳在其鼎盛时期也没有到达尼日尔河上游的三角洲,孙迪亚塔的继承者却将帝国边界延展到廷巴克图(Timbuktu)和尼日尔河中游河曲。14世纪,马里帝国达到鼎盛,其版图从大西洋沿岸的塞内加尔南部一直延伸到尼日尔河中游河曲东部的桑海(Songhay)都城加奥(Gao)。帝国南至森林地带,包括黄金产地布雷和班布克,往北越过萨赫勒,包括撒哈拉南部"通道"瓦拉塔和塔得迈卡(Tadmek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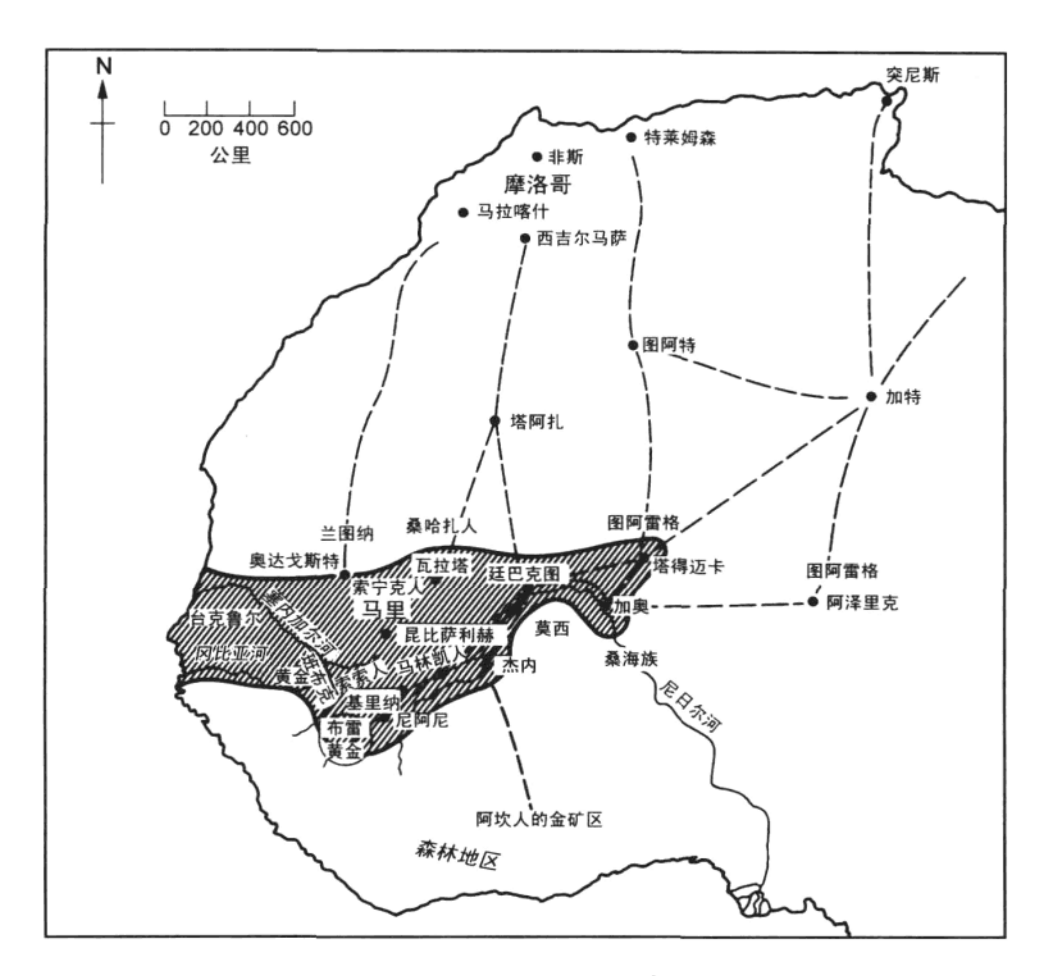
93

宗教与王权

马林凯人的传统宗教与很多西非农业民族是相像的。他们宗教的核心是,只有"土地神"能保佑其庄稼的丰收。他们认为最早到某一特定地区定居的农民祖先与保佑农业丰收的神灵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通过与其祖先的精神交汇,他们才能够与最初的定居者和"土地神"保持沟通。村庄头目或首领,马林凯人称之为曼萨(mansa),就是最早期农民的直系后裔,他与马林凯人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神"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作为祖先的守护人,曼萨既是宗教上的又是世俗上的首领。

在组成反抗索索的马林凯人联盟的时候,孙迪亚塔就劝说其他马

93



地图 7.4　14 世纪的马里帝国。

94　林凯曼萨们将权力让渡给他。由此,他便成为唯一的曼萨,成为所有马林凯人和马里帝国整个事业进程中宗教和世俗的首领。随着曼萨权力的上升,其宗教影响也随之增加。在帝国内,曼萨的核心宗教地位对人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人们极其尊重曼萨。他离群索居,臣民们需跪着觐见。他的周边陈列着象征财富和威仪的物品,以强调其权力和尊贵。无疑,这也有助于其统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顺从。尽管为外人所误解,但他并不是古埃及那样的"神圣之王"。

孙迪亚塔之后的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穆斯林,有些统治者甚至更加虔诚。这些统治者曾多次到麦加进行朝圣,最著名的是 1324—1325 年曼萨·穆萨(Mansa Musa)的那次规模巨大、奢侈的朝圣。城镇里的



杰内的清真寺。

商人、宫廷官员与“土地神”最为疏远，他们比大部分农村平民更加愿意并彻底地接受伊斯兰教。这些农村平民中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依然非常依赖于“土地神”的垂怜。虽然马里的统治者们接受伊斯兰教，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抛弃他们本民族的传统宗教。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他们就会丧失掉农民的支持，毕竟这些农民主要还是遵从本土宗教信仰和惯例。

帝国的行政

95

马里的政治组织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加纳。宫廷雇用很多具有读写能力的穆斯林，作为记录员、大臣以从事绝大部分的行政工作。在帝国的偏僻地区，只要过去的统治者收集贡品并向中央纳贡的话，他们的位置就可以保留住。曼萨保有一支庞大的常规军，营级指挥官也在宫廷中担任地位较高的官员。每个营包括一小部分精锐的骑兵和大量配有弓弩的步兵。军队保护帝国，防范外部攻击，巡逻贸易路线，并保证地方首领向国王纳贡。王室的主要收入来源除了纳贡外，还有征收来的贸易税。与加纳国王一样，马里的曼萨对帝国进出口以及途经帝国的所有货物征收税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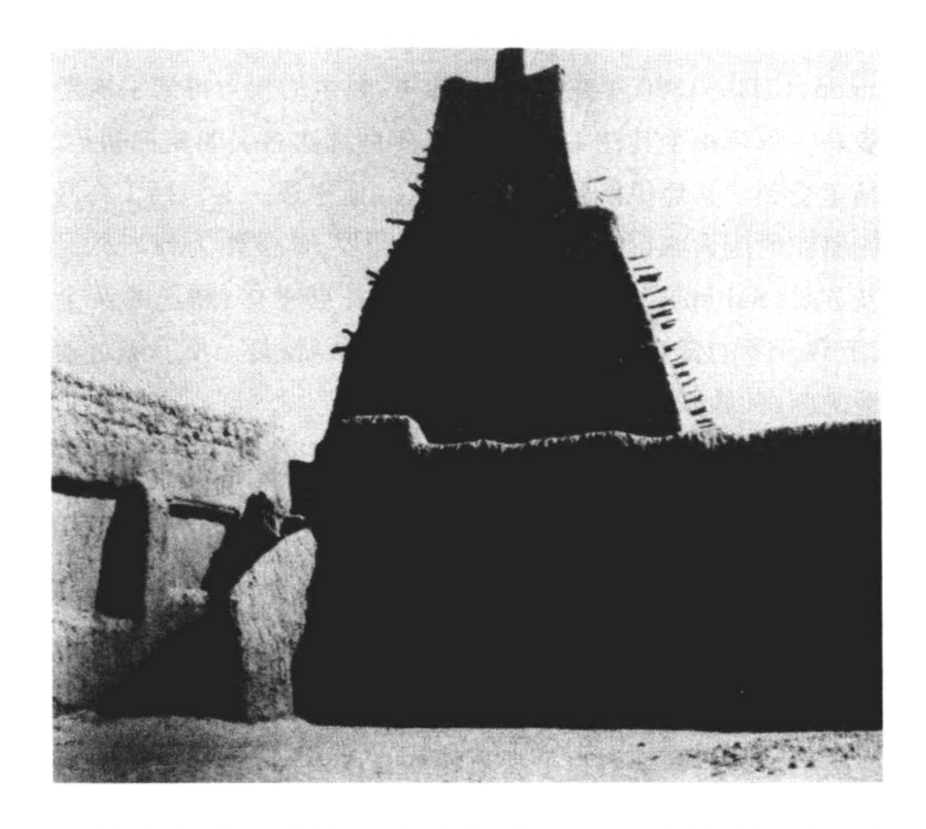
经济

帝国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从这点上说，马里的地理位置要比前加纳好得多。马里的都城尼阿尼处在帝国内土地最为肥沃的南部地区的中心，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加纳不一样，马里帝国横跨南部大草原，那里降水丰富，常年都有粮食盈余。不同地区种植着不同的庄稼。主要的草原作物为高粱和稷，稻谷则种植在冈比亚流域和尼日尔河上游的洪泛平原上。这让更北部、更干燥的萨赫勒草原成为专门放牧骆驼、绵羊和山羊的牧场。粮食从一个地区交易到另一个地区，特别是从草原和尼日尔洪泛平原交易到萨赫勒地区的商业城镇。帝国的绝大部分粮食是由个体农民生产的，他们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小型村庄里。他们将粮食盈余的一部分上交给当地酋长，酋长扣留一部分后，再将余下的上交给政府。同时，曼萨和他的军队指挥官掌管着自己的“国有”农场。在这里，他们组织奴隶为军队和宫廷生产粮食。

在旁观者看来，马里主要的经济活动当然是黄金贸易。正如我们所论述的那样，控制黄金贸易是建立国家的巨大动力。虽然马里的统治者对途经帝国的贸易征税，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控制黄金的开采。居住在黄金产地的民族特别渴望维持独立。他们预备了向曼萨进贡的黄金，也准备对进口的食盐征税。因此，在马里统治者试图直接干涉黄金开采时，矿工们便停止工作；甚至在马里的曼萨试图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时，他们也进行罢工。因此，这一计划也就被放弃了。

马里帝国内部出现了职业商人阶层。在西部，他们被称为万加腊(wangara)，在东部，他们被称为迪尤拉(Dyula)。他们的原籍是马林凯人、巴马纳人(Bamana)或索宁克人，通常也都是遵从教规的穆斯林。他们将帝国的贸易带到西非最边缘的角落，穿过森林交换来可乐果，并将它们和食物、狩猎物和西非的黄金运到萨赫勒地区的商业城镇瓦拉塔、塔得迈卡、廷巴克图和加奥。正是 14 世纪晚期来自马里的迪尤拉商人南越至当代加纳的阿肯(Akan)森林。在那里，他们将整个黄金新产地纳入跨撒哈拉贸易网络中。阿肯黄金产地的开发使得黄金贸易的中心

96



廷巴克图的清真寺。虽然今天的廷巴克图只是一汪污浊的死水，但在14—16世纪期间，它是一个重要的制造业、贸易、宗教和学术中心，并在16世纪达到其财富与声名的顶峰。

向东推进，使廷巴克图和杰内取代了瓦拉塔而成为重要的交易“通道”。

14世纪的某个时期，来自印度洋的子安贝(cowrie shells)被作为一种流通货币引入到苏丹西部的内部贸易中。政府似乎鼓励这样做，并为此做了精心运作。这样做可以增加税收，并有利于粮食与其他货物之间的内部交易。但是，沙金和食盐依然是撒哈拉长途贸易中的主要通货。

14世纪的马里

14世纪，马里帝国达到其权力和声名的顶峰。帝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权力。13世纪末之前，一系列的王朝斗争和短命统治曾一度削弱了君主的权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些偏僻的地区就会宣称独立并拒不纳贡。但是在14世纪，在两个特别能干的统

治者曼萨·穆萨(1312—1337 年在位)和曼萨·苏莱曼(Mansa Sulayman,1341—1360 年在位)的统治下,君主的权力得到了恢复。

曼萨·穆萨由于其在 1324—1325 年间那次著名的麦加朝圣之旅,使得马里受到了其他伊斯兰世界的关注。他率领一支包括 100 匹满载黄金的骆驼的庞大旅行队到达开罗。在开罗,他被作为穆斯林兄弟受到埃及苏丹(Sultan)的尊重。穆萨在埃及花费奢侈,赠送的黄金礼物之多,竟致开罗的黄金贬值,且很多年后才得以恢复。所有见过他的人都对他的富有、慷慨和智识印象深刻。

97 穆萨在从麦加返回的途中,从埃及带回了一个建筑师,让他重新设计了加奥(新并入帝国)的清真寺。在穆萨统治时期,马里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他总是鼓励、推动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学习与传播。在穆萨统治早期,他曾派出苏丹学者到摩洛哥的非斯(Fes)"大学"去学习。在穆萨统治末期,苏丹学者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习中心和《古兰经》研究中心,特别是在廷巴克图建立的中心。

曼萨·穆萨的朝圣引起了其他穆斯林学者的兴趣,其中就有丹吉尔(Tangier)的柏柏尔籍地理学家伊本·巴图塔(Iban Battuta)。在游历完整个亚洲的伊斯兰世界后,伊本·巴图塔在穆萨的兄弟曼萨·苏莱曼统治期间访问了马里。他的旅行记录是我们研究 14 世纪马里的主要资料。伊本·巴图塔是在 1352 年出发的,途经塔阿扎产盐地和萨赫勒地区的贸易城镇瓦拉塔。

> 我于 753 年第一个斋月一开始(即公元 1352 年 2 月)就和一个商队出发了,率领这支商队的是阿布·穆罕穆德·扬达坎·马苏菲(Abu Muhammad Yandakan al-Masufi),愿主垂怜他。商队是由一群西吉尔马萨商人和其他人等组成的。25 天后,我们到达了塔阿扎,这是一个小村庄,什么也没有。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它的房屋和清真寺的建筑材料是岩盐,房顶是由骆驼皮做的。塔阿扎也没有什么树,除了沙子和一个盐矿,什么也没有。人们在地下挖盐。这些盐呈厚板状态,一块挨着另一块,好像是被人为地放置

于地下一样。一头骆驼可以驮两大块盐。除了挖盐的马苏法(Masufa,一个柏柏尔民族)人的奴隶,没有人住在那里。他们的食物是从代尔阿(Dar'a)和西吉尔马萨运来的海枣、骆驼肉和从苏丹(撒哈拉以南黑人的土地)运来的阿尼里(anili)……

我们在那里待了10天,痛苦不堪,因为那里的水含有盐分。这里也是苍蝇聚集最多的地方。

我们离开塔阿扎,进入到荒漠,便看到了水。这是一段10天的路程,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水非常有限。进入荒漠后,我们发现了大量聚集着雨水的水池。有一天,我们在两个岩质山丘间发现一个盛满清水的池子。因此,我们得以重新装满水袋并清洗了衣服……

在那些天里,我们总是走在商队的前面,一旦发现一个适合放牧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放牧。我们一直如此,直到一个名叫伊本·兹瑞(Ibn Ziri)的人在沙漠中失踪之后,我们就既不走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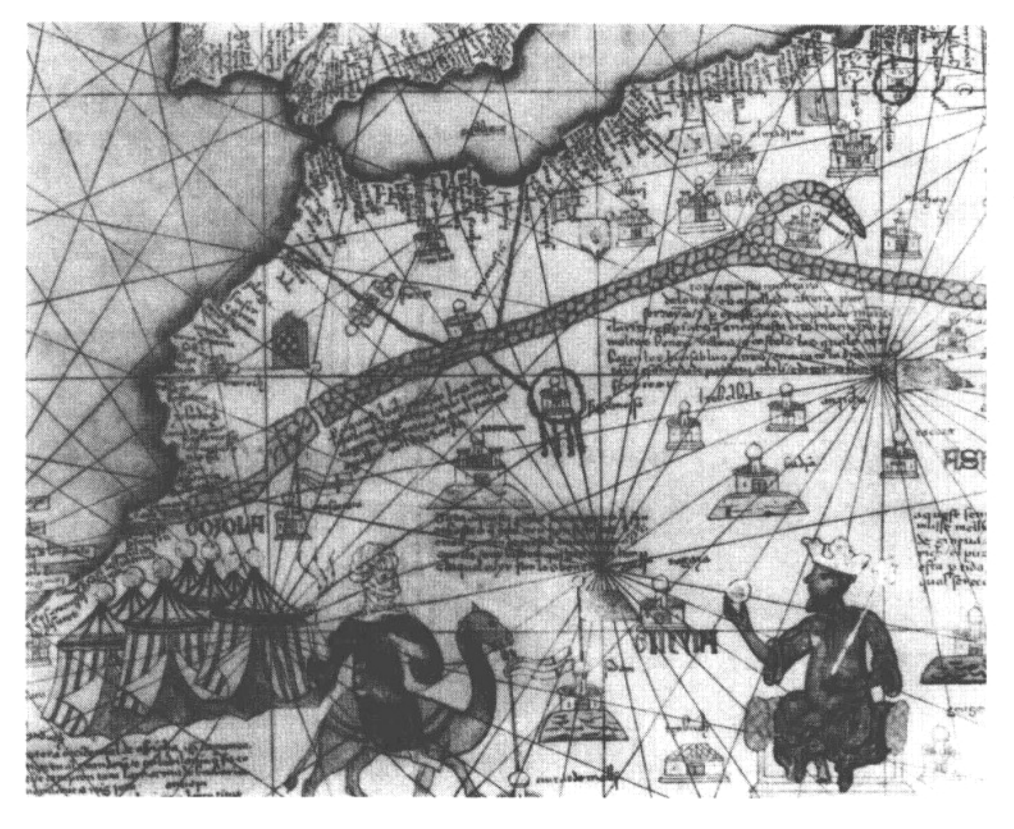
——摘自 N. Levtzion (ed.) and JEPHopkins (trans. and ed.), *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1, p. 782

在经过廷巴克图、加奥、塔凯达(Takedda,即阿泽里克[Azelik])和图阿特(Tuat)之后到踏上返程之前,伊本·巴图塔在马里的都城尼阿尼舒适地度过了八个月。一开始,他对马林凯人只有碎米、蜂蜜和牛奶这样单调的饮食大加抨击,但他很快地就因马林凯人的好客和对正义的热爱而对他们产生好感。关于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他这样写道:

98

黑人具有一些值得赞美的品质。他们很少是不讲公道的,比起其他民族,他们更加憎恶不正义。他们的苏丹(即曼萨)对哪怕只有极小恶行的人都不会开恩。在他们国家,人是完全安全的。外地来的旅行者用不着担心抢劫者和暴民。

——转引自 E. W. Bovill,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68, p. 95



一幅 1375 年绘制于西班牙的地图，上有马里国王。

在 14 世纪，马里声名远播，那个时候的欧洲地理学家在制作地图时开始特别关注它。在一幅 1375 年绘制的地图中，坐在御座上的马里国王被画在西非的中央位置。他左手拿着金块，一个来自沙漠帐篷居所、戴着面具的柏柏尔桑哈扎人骑着骆驼向他走来。

马里的衰落

正如我们所论述的那样，马里帝国的强大和成功依赖于中央统治者的强势。14 世纪末，在经过一系列软弱的统治者、短命统治和王朝斗争后，曼萨的权力已经下降了。边远地区趁机宣布独立。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看到，在这些独立出去的地区中，影响最大的是位于尼日尔河河曲东部的桑海(Songhay)。同时，帝国的财富在南方遭到莫西人(Mossi)、在北方遭到图阿雷格人的掠夺。

99

莫西人

莫西人来自尼日尔河曲南部的草原地区。这一地区从来没有被纳入马里帝国。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管理着诸多莫西小国。他们主要靠装备精良的骑兵在外劫掠来维持统治。骑兵人数虽少,但战斗力颇高。依托这些莫西军队,贵族们从农民那里抽取税赋,并在劫掠豪夺中聚敛起财富。他们在马里帝国虚弱之际趁机而起。在 15 世纪 80 年代早期,他们向北的劫掠远至瓦拉塔。

廷巴克图与图阿雷格人的侵袭

廷巴克图最初是作为图阿雷格柏柏尔人的帐篷定居地而建立起来的。它既是图阿雷格人放牧牲畜的牧场,也是跨撒哈拉贸易的连接点。孙迪亚塔及其继承者在统治期间,就从图阿雷格人手里夺来了廷巴克图并将之并入马里帝国。在廷巴克图,坚固一点的房屋都是土砖结构。正如我们曾论述的那样,廷巴克图是苏丹和柏柏尔穆斯林商人和学者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随着马里中央权威的下降,图阿雷格游牧民在 15 世纪初期开始侵袭城镇,并于 1433 年占领了廷巴克图。图阿雷格人意识到廷巴克图是个潜在的财富来源地,便没有中断城里的日常生活,只是将赋税收入从马里都城转到他们自己手里。事实上,1450 年前后,随着更多柏柏尔商人和学者从瓦拉塔迁移到廷巴克图,廷巴克图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变得更为繁荣。随着廷巴克图并入正在扩张中的桑海帝国,廷巴克图在 16 世纪达到其财富和声望的顶峰。

对马里来说,丧失廷巴克图是其最终衰落并被桑海所取代的一个标志。到 1500 年,庞大的马里帝国的面积大为缩减,只剩下马林凯人的核心地区。绝大多数非马林凯民族都已宣布独立。到 17 世纪,甚至马林凯联盟也转由独立的村庄曼萨统治。即便如此,在马林凯人的核心地区,关于马里帝国总有一天会复兴的思想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桑海的起源与崛起

桑海国的起源

桑海的核心区域是加奥东南部尼日尔河中游一带。该地区的主要人口为杜尔(Do)农民、与莫西人有着亲缘关系的果沃(Gow)猎人和索库(Sorko)渔民。索库人在该地区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早至公元 8 世纪，索库渔民就开始沿河直上，将领土扩展至尼日尔河河曲地带。他们的独木舟掌控着尼日尔河，并将该河作为地区间粮食交易的贸易路线。对有经验的渔民和狩猎河马的猎人来说，将独木舟改为军事用途是很容易的。他们在尼日尔河中游一带修建贸易点，借此控制附近农庄。到公元 9 世纪，尼日尔河中游地区整合成单一的“桑海”国，都城设在库基亚(Kukiya)。在此之前，桑海人一直与住在加奥的穆斯林商人保持着日常联系。

贸易城镇加奥是由柏柏尔人建立的，埃及商人可能也有参与。这些埃及商人是为加纳班布克的黄金贸易所吸引而来到这里的。加奥在跨撒哈拉贸易中连接着撒哈拉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桑海的农民与渔民给加奥的商人提供粮食，换取食盐、布匹和北非的其他产品。通过这些联系，桑海的统治者在 11 世纪初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穆斯林，这要比台克鲁尔和加纳还要早一点。之后不久，加奥就成为桑海的新都城。



尼日尔河上的渔民。此类凿出来的独木舟让加奥的索库渔民控制了通向尼日尔河曲的流段。虽然独木舟被用于军事，但是捕鱼仍然是桑海帝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14 世纪,加奥和桑海西部的其他地区并入马里版图。但是,桑海的大部分地区不在马里军队的收税范围内。

随着马里在 15 世纪的衰落,桑海重申其独立性。索尼(Sonni)王朝建立起由骑兵和独木战船所组成的强悍军队。在索尼·苏莱曼·丹迪(Sonni Sulayman Dandi)统治时期,桑海军队开始沿着尼日尔河河曲向上游地区扩张其领地。正是在苏莱曼·丹迪的继承者索尼·阿里大帝(Sonni Ali the Great)统治期间(1464—1492 年),桑海成为一个帝国,且比马里强盛得多。

索尼·阿里与桑海帝国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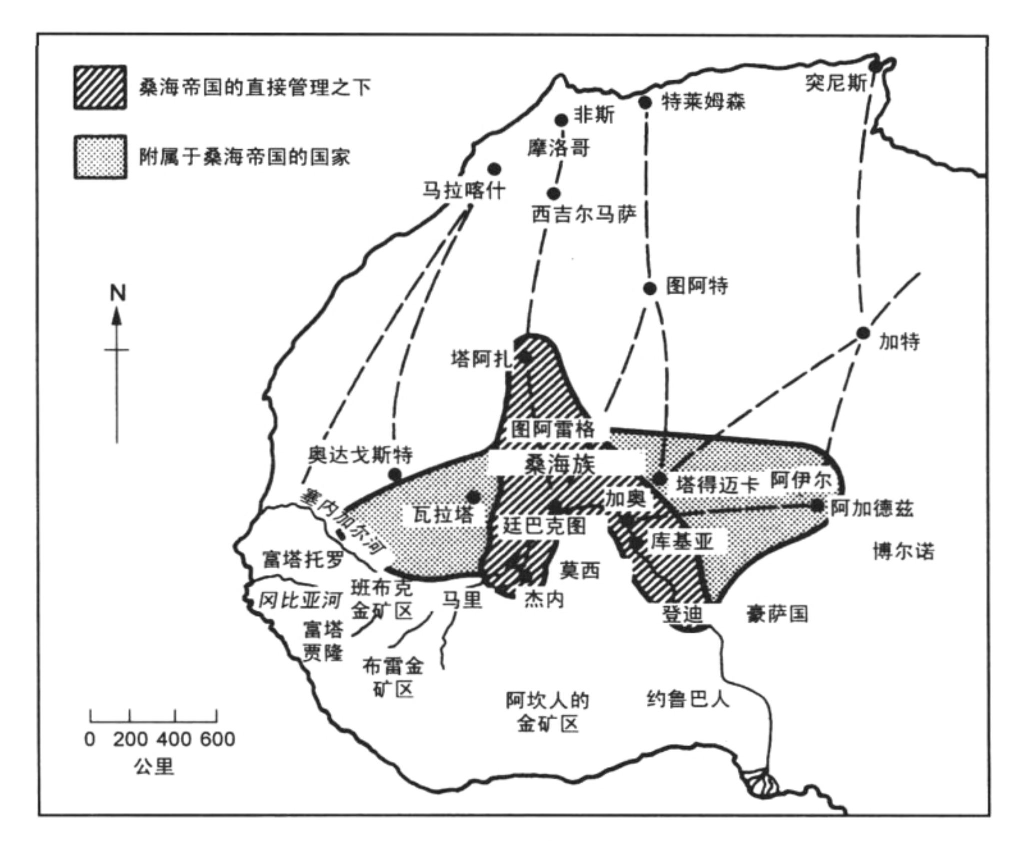
索尼·阿里于 1468 年从图阿雷格人那里夺取了廷巴克图,并开始其对廷巴克图的统治。此后,他在自己的主要统治时期,都忙于将图阿雷格人逐出南部沙漠,并借助军事征服来拓展帝国。他建立了一支有独木战舰支持的强大骑兵。在桑海的口述传说中,他的军队战无不胜。他确实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军事统帅,他将桑海帝国往北深入沙漠地区,往西南推进到杰内。15 世纪 80 年代末期,莫西人被击退到尼日尔河的南部,桑海军队侵入莫西人的领地。对于侵袭者来说,莫西人的领土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但这片动荡的领土事实上从未并入桑海帝国。

101

索尼·阿里对穆斯林廷巴克图的侵袭、对图阿雷格人的残酷追击以及对伊斯兰教总体上缺乏尊重,使他受到阿拉伯历史学家的强烈批评。他们把他描述为一个无情的暴君和镇压者。廷巴克图的学者们在索尼·阿里统治时期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但其作为一个伟大的征战英雄和桑海帝国的奠基者形象却在桑海口头传说中流传。索尼·阿里死于 1492 年,他的继承者很快就被一个叫穆罕穆德·图雷(Muhammad Ture)的将领所罢黜。图雷是个原籍为索宁克人的虔诚的穆斯林。

阿斯基亚王朝治下的桑海

穆罕穆德·图雷(1493—1528 年)是阿斯基亚王朝(Askiya dynasty)的奠基者,他强化了帝国的管理并巩固了对阿里所取得的征



地图 7.5　16 世纪早期的桑海帝国。

服地的统治。他利用伊斯兰教来增强其权威，并维持其幅员辽阔的帝国的统一。他宣布 1498 年对莫西人的一次大侵袭为圣战，从而使得这次侵袭合法化。阿斯基亚·穆罕默德[①]认识到伊斯兰教对跨撒哈拉贸易的重要性。他在继位后不久就前往麦加朝圣，让其他伊斯兰世界的人知道他对信仰的重视。他在开罗成功地说服埃及哈里发承认他为整个苏丹的"哈里发"。从麦加一回来，他就将廷巴克图恢复为伊斯兰教的研习中心。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强迫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大部分民众依然保持其传统的宗教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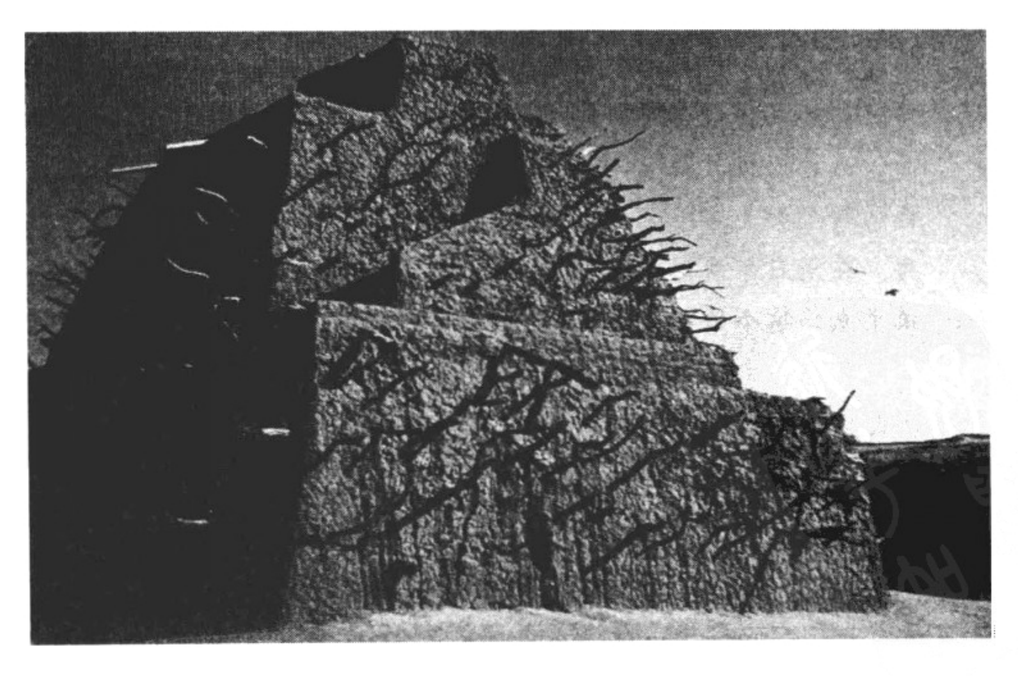
部分得益于阿斯基亚·穆罕穆德对伊斯兰教的提倡，跨撒哈拉贸易在阿斯基亚·穆罕穆德统治时期实现了普遍的繁荣。繁荣的贸易增

① 即穆罕穆德·图雷。——译者注

加了桑海的财富。他将帝国进一步扩展到沙漠区域，使桑海更加直接受益于跨撒哈拉贸易。他的军队驱逐了撒哈拉南部的图阿雷格人，在东面占领了阿伊尔，在北面占领了产盐中心塔哈扎(参见地图7.5)。虽然桑海没有对东南部的豪萨诸国进行过直接的统治，但这些富有的、不同的区域都被纳入桑海帝国庞大的贸易网络中。(豪萨诸国后来的历史参见第十三章。)

102

在行政上，桑海比马里更为中央集权化。帝国征服新的区域后，原来的统治者就会被朝廷任命的官员所取代。这些官员往往是王室成员或得到信任的官吏。他们的官职不是世袭的，这些地方总督是由国王直接任命的。每个总督都征召了地方军，用来保证当地农民正常上交赋税。原来统治者的剔除和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有助于避免地方在王朝纷争或弱势君主统治时期从帝国分离出去。事实上，在年老的阿斯基亚·穆罕穆德于 1528 年被其子废黜后，王朝纷争就不断发生。但是，桑海作为一个大的贸易帝国依然维持了下来，直到 1591 年摩洛哥人的侵入。



位于加奥的桑海国王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陵墓。

与马里一样，桑海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地方的纳贡、尼日尔河洪泛平原与桑海核心地区的王家农场以及对贸易征缴的赋税。长途贸易的主要通币为食盐。子安贝主要用于一般的国内贸易。贸易物品和马里的贸易物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黄金是跨撒哈拉贸易的主要推动力，此外还有来自南部森林地区的可乐果和可以在北非穆斯林地区卖作奴隶的俘虏。俘虏主要来自对尼日尔河河曲南部莫西人领土的侵袭。国内的主要贸易产品为从北非进口来的粮食，此外，除了食盐，还有奢侈品、布匹、子安贝和战马。布匹主要是由当地苏丹人的棉花编织成的。在杰内、廷巴克图和加奥这样的城镇里，来自北非的毛织品和亚麻布会拆解开来，再根据当地的传统重新编织。

1510 年，一个在非斯接受过教育的年轻的摩洛哥人访问了这个国家，并于 1513 年再次访问了桑海。他以莱奥·亚非里加努斯(Leo Africanus)为笔名，生动而详尽地描述了阿斯基亚·穆罕穆德统治下处于鼎盛时期的桑海。关于廷巴克图城，他写道：

103

> 这里有很多手艺人、商人，特别是编织亚麻布和棉布的人所开的商店。柏柏尔商人把布匹从欧洲运到此地。除了仆婢，该地区所有的妇女出门都将面庞遮罩起来，她们出售各种各样的必备食品。当地人极其富有，其富有程度如此之高以致于当今的国王将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这里的两个富商。这里有很多水井，井水甘甜。在尼日尔河泛滥的时候，这里的人们便通过沟渠将水引到城镇里来。这个地区盛产玉米、牛、奶和黄油，但食盐比较匮乏，要从塔阿扎经陆路运到这里，路程有 500 英里(800 公里)。我在那里的时候，曾亲眼见过一匹骆驼驮载的食盐卖了 80 达卡(ducat，那个时候欧洲流通的一种金币)。
>
> 此地居民们彬彬有礼且容光焕发。在全城的街道里，人们载歌载舞地度过大半个夜晚。他们有着大量的男女奴隶，但城镇有着严重的火灾隐患。我到这里的第二夜，大火几乎烧掉了半座城。
>
> 富有的汤姆布托王(Tombuto，廷巴克图总督)家财万贯。官



1858 年一位德国人绘制的廷巴克图。

廷雄伟，装饰华美。他外出时总是骑着一匹骆驼，由一些贵族作引导。在打仗的时候，士兵们都骑着马，他依旧骑着骆驼。三千多骑兵、大量配有毒箭的步兵总在护佑着他。这些士兵经常与那些拒不纳贡的人发生冲突，他们收取这些纳贡再卖给汤姆布托王的商人们。这里很少有养马的，商人和朝臣们养有矮小的马以备外出所需，但良驹是从柏柏尔人（北非）那里弄来的。汤姆布托王只要一听说有商人带着马进城了，就会命令他们将一定数量的马带到他的面前，他从中为自己挑一匹好马，然后很是随意地给点钱打发了事。 104

这里有很多医生、鉴赏家、神职人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得到了国王资助，活得不错。各种手抄本和著作从柏柏尔人那里带到这里，卖的价钱要比其他商品贵得多。汤姆布托币是金子制成的，但没有什么图像和字号。在价值不大的买卖中，他们使用从波斯传到这里来的某种贝壳来结算，400 个贝壳与 1 个达卡或 6 个他们自己的金币等值，每块金币约有 0.67 盎司重。

莱奥·亚菲里加努斯接着描述了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都城——加奥城：

除了国王和朝臣的居所外，这里的房屋非常简陋。商人极其富有；大量的黑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购买柏柏尔人和欧洲的布匹……

这里有特定的奴隶买卖市场，特别是在商旅云集的日子里。一个15岁的年轻奴隶售价为6达卡，这里也卖孩子。该地区的诸侯王有私人宫殿，妻妾成群，并拥有大量的奴隶。为了保卫自己，诸侯王拥有一支数量充足、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军队……

每天运到这里的商品之多、价格之高、奢华之极令人惊叹不已。每匹价格为10达卡的马从欧洲运到这里，出售的价格为40达卡，有时卖到50达卡。这里几乎没有欧洲的粗布，就是有，其价格也卖不到每艾勒[①](ell，仅1米多点)4达卡；如果料子精细点，他们会出价每艾勒15达卡；威尼斯(Venetian)或土耳其(Turkish)红布在这里每艾勒要卖到30达卡。在这里，一把剑要3或4克朗(crown，欧洲的一种银币，价值上小于达卡)，靴刺、马勒和其他类似东西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在这里出售的香料也很多，但食盐在所有商品中是最为昂贵的。

——摘自 Leo Africanus,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Africa*, trans., J. Pory and ed. R. Brown, London, 1896, Vol. Ⅲ, pp. 824—827；转引自 E. W. Bovill,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68, pp. 147—150

富尔贝人(或富拉尼人)

富尔贝人(Fulbe，他们有时也被称为珀尔人[Peuhl]，在西非的东

① 西方旧时量布用的长度单位，1个长度单位在各国所指的长短也不一样。——译者注

部地区，他们被称为富拉尼人[Fulani]，这种叫法更为普遍一点)是一个居住在萨赫勒地区和这一时期的草原地带的特殊人群。他们在体征上与普通的苏丹黑人不同，他们的肤色要浅一些，在外观上与柏柏尔人更像，但又与柏柏尔人不同，他们说一种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的语言。在 11 世纪，富尔贝人居住在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地区。他们是游牧民族，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苏丹农民生活在一起。在 11—16 世纪，富尔贝人逐渐扩展了他们的牧场，越过西非草原，从西部的富塔托罗(Futa Toro)直到东部的博尔诺(Borno)。他们并没有征服或控制农业民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些农业民族中定居下来。一些富尔贝人接受了固定的农业模式并与当地人口融合在一起。其他则依然是畜牧业者，有着独立的富尔贝语和文化。我们将会在第十六章论述，富尔贝人在 19 世纪的西非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05

第八章　16世纪前的东非

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850—1550年)

106　我们在第五章曾论述过，在公元800年前，埃塞俄比亚的都城就从阿克苏姆向南迁移到内陆中央高原的某个地方。随着穆斯林巴格达的崛起以及远离红海的印度洋贸易的分化，埃塞俄比亚的对外贸易衰落了。到公元9世纪早期，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一个孤立的基督教前哨基地，其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地主贵族控制着国家。那个时候，向南的进一步扩张因绍阿平原(Shoan plateau)的阿高(Agew)部落的激烈抵抗而中断。

从公元1000年开始，埃塞俄比亚王国重新交到了好运。这个时候，法蒂玛统治下的独立的埃及的发展，推动了红海贸易的复苏。埃塞俄比亚出口少量的黄金到埃及，可能也有一些象牙。埃塞俄比亚仍然是伊斯兰世界松脂乳香和没药最为重要的来源地。但在埃塞俄比亚的出口商品中，利润最大的似乎是俘虏，特别是妇女，主要卖给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也门的穆斯林做妾和家仆。这些俘虏可能来自塔纳湖(Lake Tana)南部的高原部落间的战争中。此时的主要贸易线路是从古阿克苏姆北部的阿杜里斯港(Adulis)到穆斯林控制的达赫拉克(Dahlak)的沿海岛屿。

扎格维王朝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1150—127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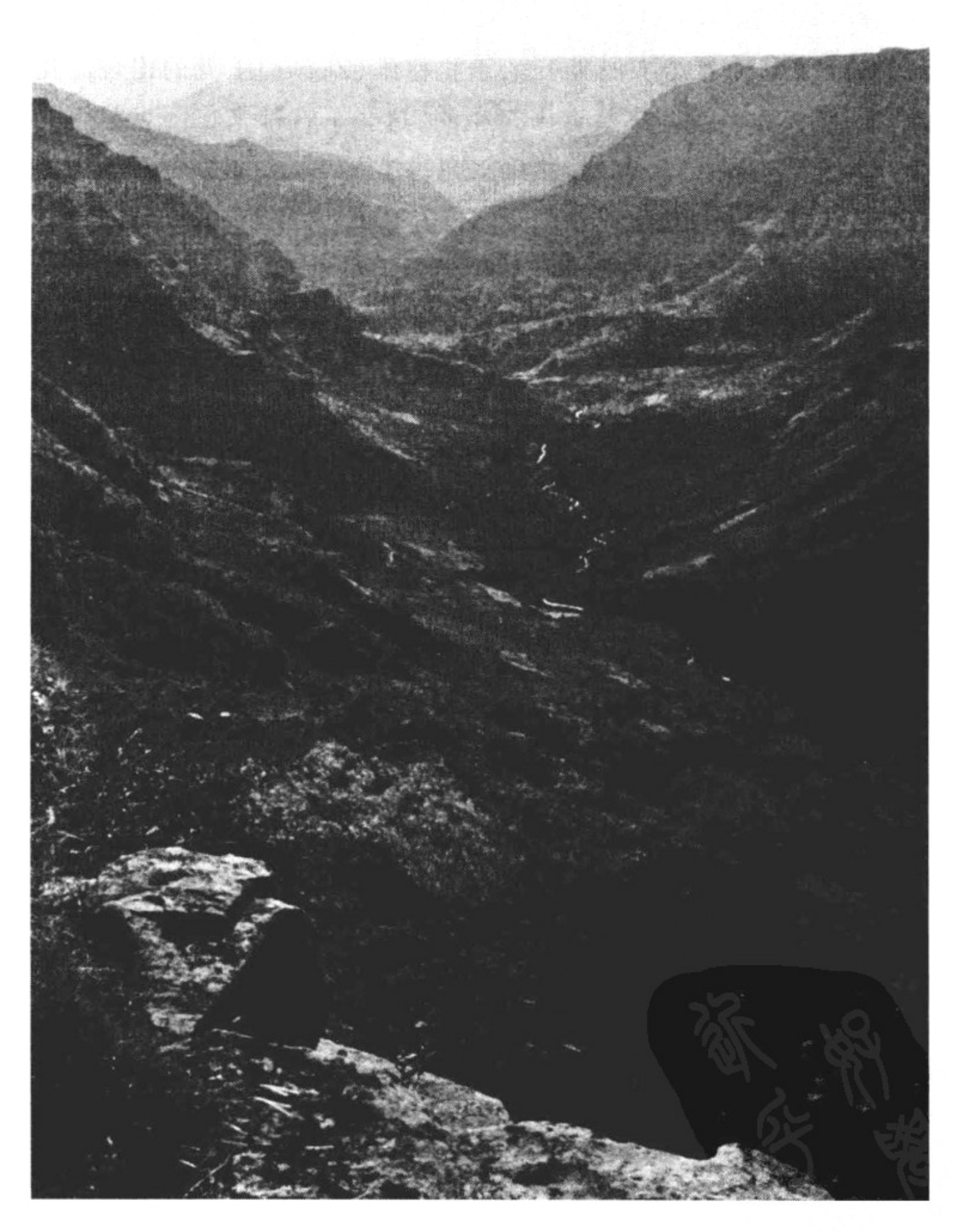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的复兴时期开始于扎格维(Zagwe)王朝的出现。扎格维王朝是在一批阿高军官中诞生的,这些军官都来自阿克苏姆的上层社会。约在 1150 年,扎格维王朝的建立者从古阿克苏姆国王的子孙手中夺取了王位。扎格维王朝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带入一个更具有进攻性的扩张时期,其都城一直设在中央高原的阿德法(Adefa)。扎格维国王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基督徒的定居地及国王的统治从塔纳湖南部推进到戈贾姆(Gojjam),并再向前推进到绍阿高原。

随着国家的扩张,过去的统治者为信仰基督教的军事首领、王室成员或王室成员信任的朋友所取代。这些地区总督拥有巨大的私人财产,并被准许向当地臣民征税。他们负责地区的军事保卫、确保商旅的安全、向中央政府交税并在战争时期支持国王。新的征服地得到了基督教传教士的支持。他们在国王准许的土地上建立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成为重要的学术中心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文化中心。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

107

扎格维统治者重新建立了埃塞俄比亚教会与巴勒斯坦圣地之间的联系。甚至在埃塞俄比亚最为孤立的几个世纪里,埃塞俄比亚的教会还维持着与埃及残余下来的科普特教会之间的联系。埃塞俄比亚被认为是过去亚历山大的大主教管辖区的组成部分。在科普特教派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而衰落的时期,埃塞俄比亚教会还是任命了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作为大主教。尽管有着这种联系,但埃塞俄比亚教会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埃塞俄比亚人将他们自己视为基督教前哨基地——上帝的选民,且被异教徒和穆斯林包围着。在宗教仪式和信仰上,他们与旧约紧密一致。他们相信自己是古以色列人的真正后裔。同时,从 6



位于埃塞俄比亚山区的一处河谷。在这样的、孤立的河谷地区，当地地主贵族或地区总督经常可以独立行事，似乎完全独立于埃塞俄比亚的中央王权的控制。

世纪基督一性论的基督徒那里继承的修道传统也非常牢固地保留了下来。108

讽刺的是，扎格维王朝的这种外向型政策进一步地推动了埃塞俄比亚教会与旧约中的耶路撒冷之间的联系。到13世纪早期，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发展良好，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可以在整个伊斯兰埃及自由旅行。受此鼓励，埃塞俄比亚人开始沿着尼罗河，向东到圣城耶路撒冷定期朝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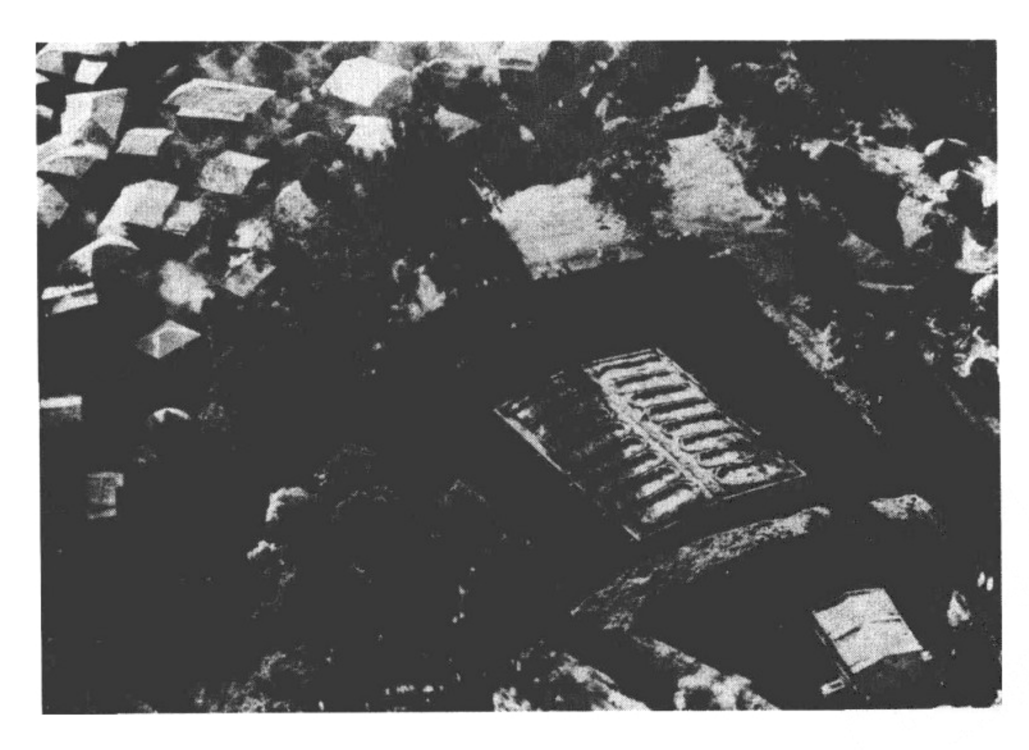


国王拉里贝拉(Lalibela)的画像，出自一副彩色手稿。

109 在拉里贝拉统治时期,即 1200—1250 年期间,都城阿德法的修道士开始修建最为著名的一系列教堂。这些教堂是从坚石中砍凿而成的,极为独特,并且保存到今天。这也是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力量和狂热的实证。在都城地区的山中共挖凿出 11 座这样的教堂。后来,都城以君主的名字改名为拉里贝拉。很多教堂是以耶路撒冷的名胜来命名的,如各各他(Golgotha)、基督墓等。这一情形至少让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认为,拉里贝拉教堂事实上是试图在埃塞俄比亚的山中重建耶路撒冷。阿克苏姆北部地区提格雷的山中和洞穴中发现有大量规模较小、历史更久的教堂。这些教堂充分证明,拉里贝拉教堂继承了古阿克苏姆的艺术与建筑传统。

所罗门王朝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1270—1550 年)

1270 年,被称为所罗门(Solomonid)世系的国王推翻了扎格维的末代国王。所罗门国王宣称他们是古阿克苏姆统治者、圣经中的所罗



埃塞俄比亚拉里贝拉石凿教堂。

门王和示巴(Sheba, Saba)女王的后裔,从而将他们篡夺权力的行为合法化。所罗门统治者来自阿姆哈拉中央高原地区。在那里,前基督教时代的说吉兹语的早期定居者已经和当地说库施语的民族交融在一起,并产生了阿姆哈拉语,也就是当代埃塞俄比亚的主导语言。

110 所罗门王朝的兴起,终结了自古阿克苏姆继承下来的建筑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大部分热带非洲平民特征的建筑风格。石质建筑、矩形教堂和宫殿停止了修建。新的修道院就建在使用寿命不长、并不富丽堂皇的民宅里,即一种由泥砖、柱子和茅草屋顶搭建而成的圆形房屋。

宫廷的变革和宗教建筑显示出宫廷本身的脆弱性。从此时起,国王放弃了都城里具有永久性的石质建筑传统。宫廷、政府官员和军事人员似乎人数太多了,在单一地区很难维持太久。此外,由于是多山地形,都城在获取偏远地区充足的粮食供应上也较为困难。国王及其官员住在一系列临时性的帐营里,从而解决了供应问题。这些帐营从一个地区移动到另一个地区,有时一年要迁移两三次。一位在16世纪到所罗门王朝宫廷拜访过的欧洲人发现,这种临时性都城耗费地区资源和粮食如此之大,以致于都城所在地10年内都不可能再次作为都城选择地了。很显然,王家首府是自然资源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这种对环境利用的程度,哪怕是对当地小规模的利用,会让人马上想到20世纪末期埃塞俄比亚的景象。但是对国王来说,流动的都城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国王与那些独立的地区保持联系,并因此巩固了这些地区的效忠以及确保税赋的缴纳。

13世纪90年代期间,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内战。此后,王位继承斗争问题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一旦新国王继承大统,所有潜在的王权竞争者都会被投入山堡吉森(Gishen)的狱中。这种新方法很是有效,在16世纪穆斯林征服之前的两个半世纪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吉森都是王室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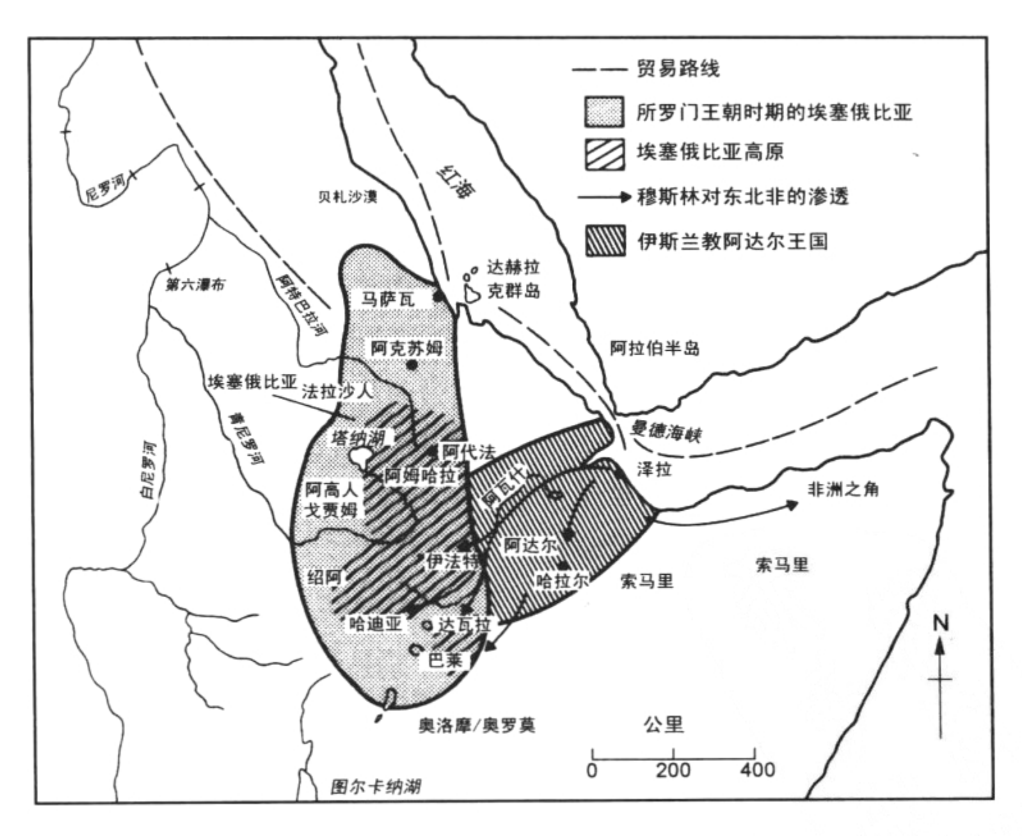
在埃塞俄比亚的进一步扩张中,所罗门王朝觊觎着南方。他们通过军事征服、修建基督教修道院以作为人们改变信仰的中心,并最终在

14、15 世纪期间到达了南部。事实上,在王国南部民众信仰的转变上,他们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的效果。那个时候的所罗门王朝希望开辟到绍阿平原东部的南方贸易联系。这一企图使他们陷入了与阿高山谷苏丹穆斯林王国间的冲突中。延续的冲突主导了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后来 2 个世纪的生活,甚至在 16 世纪 30 年代,冲突导致了埃塞俄比亚的灭亡。

穆斯林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渗入(850—1550 年)

我们已经论述过,在公元 8 世纪,巴格达是亚洲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它的崛起将印度洋贸易从红海转到波斯湾。这让东非索马里沿海地区(有时称之为非洲之角)与穆斯林的印度洋贸易网络有了进一步的

111



地图 8.1 15 世纪所罗门王朝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及其穆斯林对东北非的渗透。

联系。阿拉伯人不再将达赫拉克岛屿和其他红海港口作为他们非洲贸易的来源地。到公元 900 年，索马里沿海地区的北部，也就是今天吉布提的正南方，新出现了一个叫泽拉(Zeila)的地方，它成为了穆斯林另一个重要的贸易点。

内陆的伊斯兰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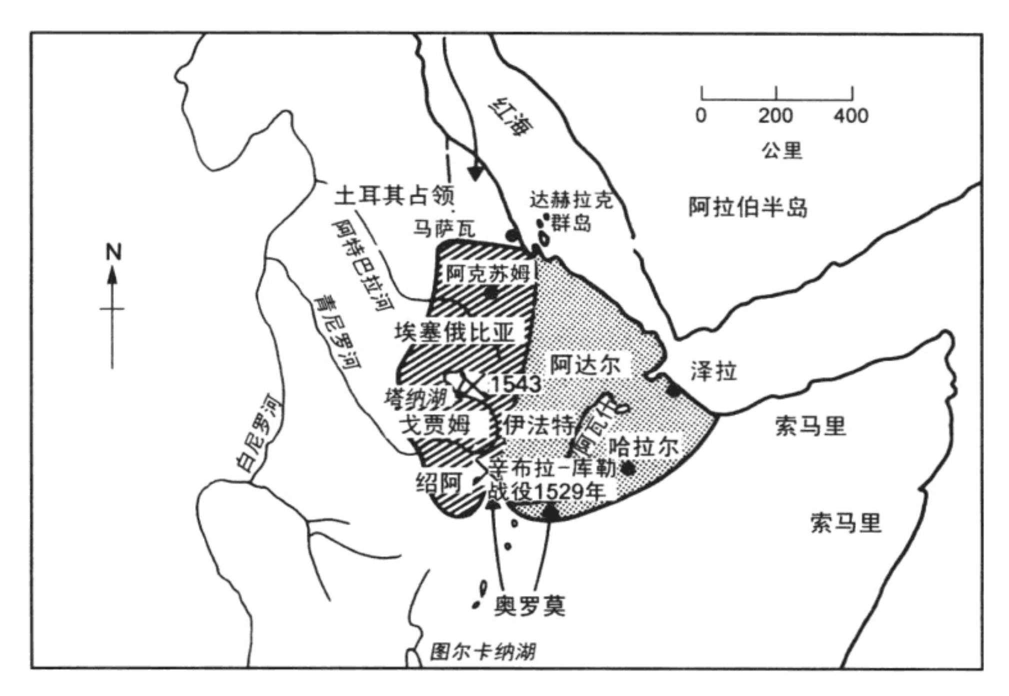
在 10、11 世纪期间，大部分原籍可能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商人，开始渗入通向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阿瓦什(Awash)流域。他们修建了诸多小型贸易点，借此控制内陆的对外贸易。最初，他们很少直接控制附近非穆斯林的、说库施语的群落。但是，他们渐渐地开始主导该地区的经济生活。

穆斯林商人们最开始为争夺内陆的象牙和奴隶贸易而互相倾轧，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合作和团结的好处。在 12 世纪早期，来自麦加的一个商人家族将很多内陆穆斯林定居点合并起来，成立了“绍阿苏丹国”(sultanate of Shoa)。其他类似的伊斯兰国家也相继而起，到 1300 年，绍阿苏丹国的主导地位被“伊法特王国”(kingdom of Ifat)所取代。 112 14 世纪早期，穆斯林商人已经扩散到青尼罗河南部的高地上。他们为了寻找新的奴隶来源，建立了小型的贸易和劫掠国家，如达瓦拉(Dawara)、萨尔卡(Sharka)、巴莱(Bali)和哈德亚(Hadya)。这些国家与基督教埃塞俄比亚之间产生了冲突，此时的埃塞俄比亚正处在扎格维王朝的统治下的鼎盛时期。

埃塞俄比亚在军事冲突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扎格维国王统治着一个相对团结的高原王国，指挥着一支庞大且强悍的常规军。而另一边的伊斯兰苏丹国总体上并不团结，也没有集聚起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相较于参加保卫领土的战斗，他们的军队更适合抢劫俘虏。1320—1340 年期间，伊法特和高原上的其他伊斯兰国家并入了正在扩张中的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王国。

阿达尔王国及其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

伊法特王国的统治者向东撤到哈拉尔(Harar)高原地区，并建立



地图 8.2　16 世纪埃塞俄比亚与阿达尔在高原上的冲突。

了“阿达尔王国”(kingdom of Adal)。这个地区处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与泽拉港口之间,战略位置较好,瓦拉斯瓦(Walaswa)王朝开始重建穆斯林权力。他们团结了内陆的穆斯林,并将东部和东南部的索马里游牧民进行了改宗,转而信仰了伊斯兰教。索马里游牧民是一支更加强大的穆斯林军队的有力来源。就这样,索马里渐渐地被卷进来,进而加剧了伊斯兰教的阿达尔和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

两者之间的绝大多数战斗都是小规模的,只是精心谋划的劫掠而已,双方都从对方那里夺取了大量的牛、俘虏等战利品。15 世纪早期,埃塞俄比亚曾一度占领了哈勒尔高原,但他们很快就丧失了优势。1450 年,阿达尔又将哈勒尔高原夺了回来。无休止的国家战争占据着 15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这无疑阻碍了该地区的和平贸易和经济发展。

113

1526 年,一个名叫艾哈迈德 · 伊本 · 易卜拉欣(Ahmad ibn Ibrahim,也被称为格兰[Gran],即“左撇子”)的穆斯林将领成为阿达尔强有力的统治者。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他认为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对该

地区的穆斯林安全是个持续的威胁。在他看来，结束劫掠-反劫掠混乱模式的唯一方法，就是最终占领并消灭这个基督教王国。为此，艾哈迈德以圣战之名，呼吁穆斯林团结起来并激发他们的斗志。

在过去，伊斯兰苏丹国的军队不是庞大、有经验、有组织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对手。但现在，基督教王国面临的是以圣战为名的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比起其先辈，他有两个明显优势。第一，埃塞俄比亚的团结曾是国家强大力量的源泉，可是这种早期团结已经消退，特别是伊法特、绍阿和哈迪亚等南部地区。基督教在这里从未扎下根来，当地的农业人口受到基督教贵族的残酷剥削。这些基督教贵族并不回应中央政府的需求。早期时候还是任命制的总督职位已经变成了世袭制。地方总督在处理附属于他的巨额财富上，就像这里是他们自己的私人王国一样。多山地形和陡峭的山谷使得地区间的联系非常困难，这也刺激了地方坐大的趋势。然而，面临伊斯兰阿达尔王国的进犯，国王勒布纳·丹加尔(Lebne-Dengel)还是召集起一支庞大的基督教军队。第二，穆斯林军队此时已经配置了当时最新式的火器，这些火器是从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买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那个时候已经将他们的帝国扩张到了埃及。

1529年，艾哈迈德的军队侵入了绍阿高原，在辛布拉-库勒(Shimbra-Kure)战役中击败了数量上占有优势的基督教军队。此次战役，双方伤亡惨重。阿达尔估计伤亡5 000人，而埃塞俄比亚则更多。多年来，埃塞俄比亚南部大部分地区仅仅是在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威慑下才统一在一起。现在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埃塞俄比亚的统一随之分崩离析了。此后六年内，艾哈迈德的军队多次蹂躏了埃塞俄比亚南部，焚烧抢劫教堂，杀死基督教地区总督，并用穆斯林取而代之。勒布纳·丹加尔躲了起来，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在绝望中，他向基督教欧洲求援，以抵御伊斯兰教这个“共同敌人”。

埃塞俄比亚国王多年来一直与葡萄牙人保持着联系。至迟从1520年起，葡萄牙大使就已经留驻在勒布纳·丹加尔的宫廷里。葡萄牙人做出了回应，葡萄牙人的一支规模小但装备精良的军队到达了埃

塞俄比亚的北部。(葡萄牙人此时的动机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讨论。)1543 年,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的联军使穆斯林军队遭受重创,成功地挽救了基督教王国。艾哈迈德本人在战斗中丧生,其帝国也因此倒塌。人们也无需老是念叨葡萄牙人对埃塞俄比亚这一重要胜利的贡献。艾哈迈德最终在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是可以预料的。他的军队扩张得太厉害,他也没有花时间巩固其征服地。很多构成穆斯林军队主体的索马里游牧民已经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返回了家园。

114 在历史学家看来,此时与葡萄牙人联系的重大价值是它促生了一些关于 16 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生动描述与记载。例如,第一位到埃塞俄比亚的葡萄牙使节的随从的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神父,他曾对国王残酷统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国王的威严做出了评论:

> 如果贵族们不那么残酷地对待民众,不拿走他们的一切,这个国家会更富有,农业产量会更大。人们不愿意提供超出他们所需,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必备粮食之外的产品。
>
> 除了宫廷,我们去过的任一地方都没有肉店,没有得到这个国家贵族的准许,没有一个平民可以杀死一头牛(即使牛是平民自己的)。
>
> 人们几乎不说真话,即使他们发了誓,除非他们对着国王宣誓。他们非常害怕被革出教会,如果他们被命令去做一些对他们不利的事以便不被革出教会的话,他们不会说不。
>
> ——摘自 C. E. Beckingham & G. W. B. Huntingford (eds.), *The Prester John of the Indies*, Hakluyt Society, Cambridge, 1961, Vol. 2, p. 515

艾哈迈德死后,埃塞俄比亚在盖拉德乌(Galadewos,1540—1559 年在位)的统治下,10 年内就收复了阿姆哈拉和绍阿高原。但是 20 多年的战争已经削弱了埃塞俄比亚和阿达尔的南方防卫。这让图尔卡纳

湖东北干旱草原上的奥罗莫人(Oromo,也叫盖拉人[Galla])能够进入通向阿瓦什上游流域的南部高原。奥罗莫人的进一步扩张以及他们对该地区后来历史的影响,将在第十一章加以论述。

东非内陆的游牧民族与农民

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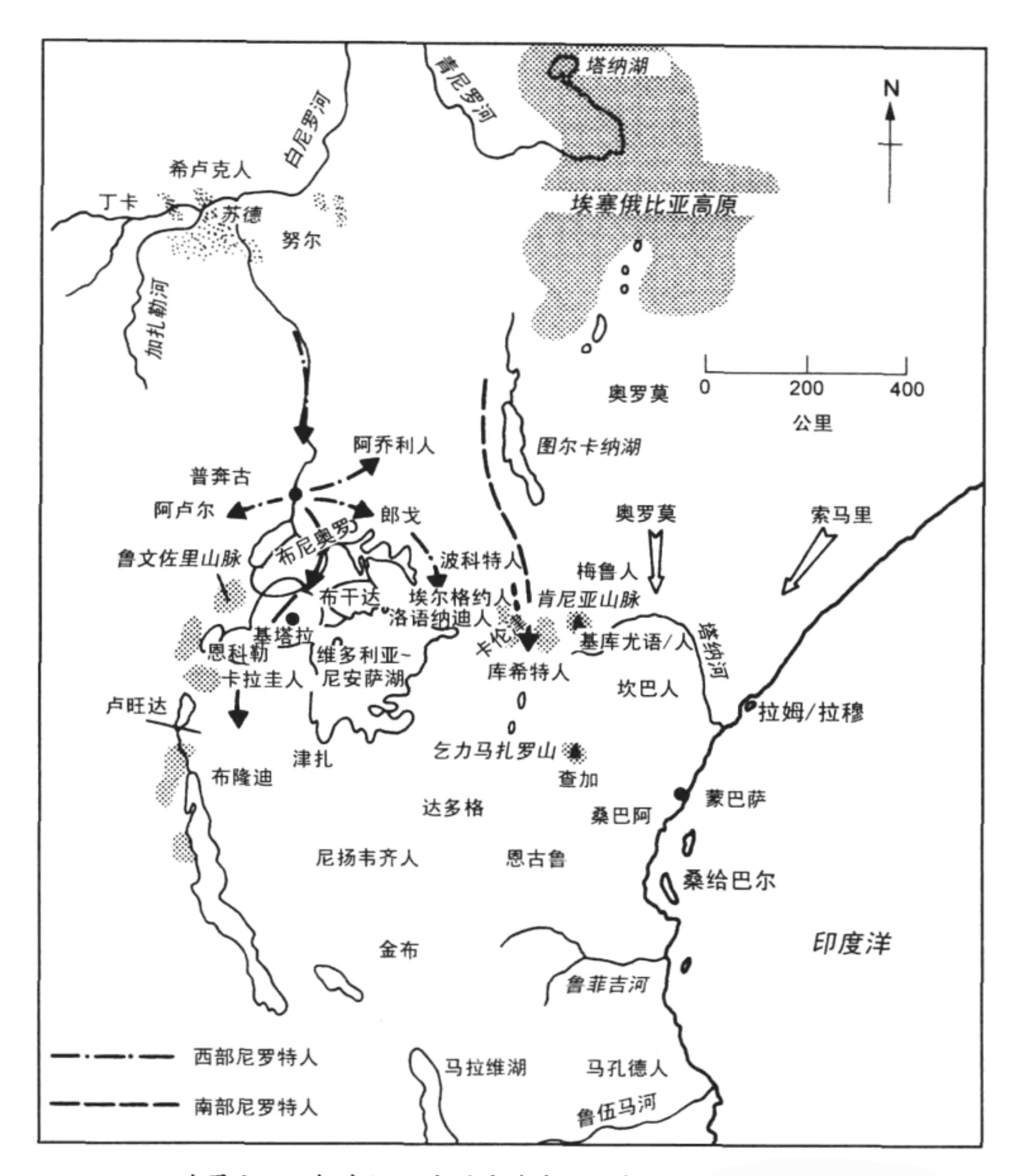
我们已经论述过,埃塞俄比亚和北非、西非局部地区确实保留下来一定数量的可以支持考古学和其他历史观点的证据。不幸的是,此类证据在东非内陆,也就是在当代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坦桑尼亚却不存在。正如我们在下章将要论述的那样,具有读写能力的民族主要活动于沿海地区,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内陆去。内陆的民族没有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直到 19 世纪,我们才发现一些外来者的记载。这些记载成为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东非内陆早期史的主要证据来源。语言研究和考古研究作为历史证据来源的特征和局限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论述过了。

所幸的是,对 15 世纪及其后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依托该地区当代民族的口头传说。然而,这些口头传说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关于早期史的。它们主要集中在统治者的继承方面,而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方面,却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此外,为了证明某一个特定部族或首领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世系有时还可能遭到歪曲,这种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将某一特定民族的传统历史与其邻近的、可能有着竞争关系的民族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知识。对考古学、语言比较研究来说,对口头传说的细致研究会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115

早期铁器时期的东非人

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论述过,有证据表明,在公元纪年前,炼铁技术就有可能在东非独立出现了。但与此同时,铁器加工技术很显然直到



地图 8.3　直到 1500 年的东非内陆晚期铁器时代的民族。

公元纪年早期才开始扩散到整个东非内陆。那个时候，铁器加工技术是由西方和西南方说班图语的农民带过来的。这些早期铁器时代的农民精心选择居所，定居在潮湿的湖边地区和肥沃的河谷，因为这些地方最适合庄稼生长。这一时期，他们很少依赖牛，也很少利用适合放牧牛群和种植谷物的干燥的高原地区。因此，早期铁器加工农民在很大程

116

度上并没有在肯尼亚大裂谷中部和坦桑尼亚北部干燥、开阔的草地留下痕迹。在这里,使用石器的民族至少到1000年一直承袭着他们古老的狩猎和畜牧传统。这些民族被认为是说库施语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第二章中描述的使用石器的畜牧业者的后裔。

我们在第二章也论述了,茂密林区中的采采蝇通常是养牛民族扩散的障碍。但是,砍伐林地、驱散野生动物后,采采蝇也就分散开来了。因此,清理土地以种植庄稼,往往会给未来预备更多适宜放牧的草地。像早期铁器时代说班图语的人一样,混合型农业群落在一个地区存在越久,养牛在经济中就可能会变得越重要。上述就是约1000年前的东非的情况。

晚期铁器时代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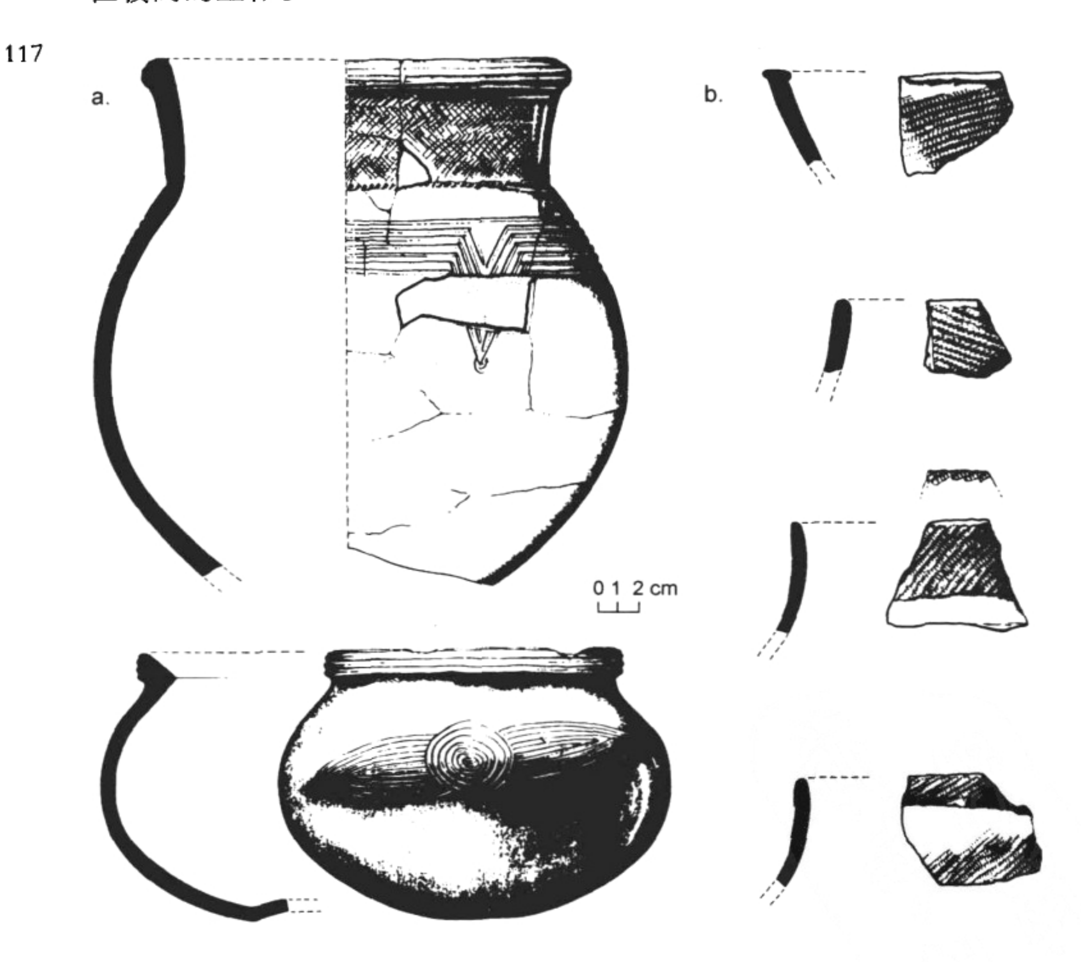
研究东非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将1000年后的时期称为"晚期铁器时代"。这是因为,东非内陆的铁器时代民族在11—16世纪期间发生了很多明显变化。这在考古证据中可以得到揭示。这些证据显示,一方面这些民族开始强调养牛,同时也引入了完全新式的陶器。这些早期证据主要是在乌干达中部和南部的"内湖"地区发现的。约1000年后,养牛和种植谷物的民族开始更为密集地占用了干燥的高地平原。

20世纪50、60年代所提出的最主要观点认为,这些变化是由迁移到该地区的新移民所带来的。然而近十年来的语言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些变化可能由当地社会的新结构而不是由新移民带来的。此外,考古研究显示,几个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大量早期铁器时代的炼铁和拓展定居地的行为,使得维多利亚-尼安萨湖(Victoria Nyanza)东部地区毁林严重。随着森林被砍伐,适宜放牧的草地也变得更开阔了。这为虽小却强的酋邦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这些酋邦将它们的政治权力建立在神灵媒介的权威上,将经济实力建立在对养牛户的控制上。

早期铁器时代精心制作、装饰精细的尤埃维陶器在整个地区被一种粗糙、简约的陶器所取代。这种陶器被称为"刻花"(rouletted)陶器,

它的装饰是在黏土还处在潮湿的时候用打了结的草绳,圈扎在黏土边缘的外面而"刻"成的。人们采用新式陶器意味着当地家庭生活组织的重要变化。更为精细的尤埃维陶器,可能也只是由群落中一小群技术好的手艺人、专业人士制作而成,这些人由于其手艺高超,在群落中被赋予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粗糙的"刻花"陶器的使用表明,非洲这一地区的晚期铁器时代的陶器可能是由那些业余陶工做成的。事实上,制作陶器可能是妇女从事的日常家务,男人们则从事照看牛群之类地位较高的工作。

117



东非铁器时代的陶器。 a. 早期铁器时代的卢旺达:出土于雷默拉(Remera)和绍里(Sholi)的精致手工陶罐;b. 晚期铁器时代的卢旺达:制作更为简单的陶器边缘碎片,带有结绳图案装饰。

随着晚期铁器时代在 11—15 世纪期间的扩散,整个内湖地区出现了大量小酋邦。一些酋邦侧重于畜牧业,另一些则侧重于种植业。这种选择依赖于当地更适合于畜牧业还是种植业。当地种植者和畜牧者之间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种植者也是铁器制造者,他们用铁制工具、武器交换畜牧者的牛和兽皮。大约到 1450 年,大量此类酋邦合并起来,在乌干达西南地区形成了基塔拉(Kitara)王国。两个世代以来,他们都是由来自卡通加河(Katonga)附近的比戈堡(Bigo),即其都城的奇伟齐(Chwezi)王朝所统治。奇伟齐究竟是何许人并不清楚,但他们的统治似乎并没有什么威信,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约在 1500 年,奇伟齐部族的统治者被来自今天乌干达北部地区说卢奥语(Lwo)的乔-比托(Jo-Bito)氏族所推翻。

118

尼罗特语民族的移居

15—17 世纪期间,大量晚期铁器时代的苏丹南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畜牧民族,推进到东非内陆肥沃的草原地区。语言学证据显示,他们的语言属于尼罗-撒哈拉语系,因此,他们一般被称为尼罗特人(Nilotes)。他们为什么恰在此时迁移过来,我们并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干旱,或者是新出现的、改良的养牛技术导致牛的数量激增而要为这些牛群寻找新牧地。最初的迁移数量并不大,可能是小规模的、季节性的迁移,其目的是为了寻找新牧场。

畜牧者,也就是大多数新来者也种植谷物,他们主要迁往干燥的高原地区。他们与早期定居的班图语民族融合起来,有着大量的通婚,并共同创造出新方言。同时,他们具有苏丹南部民族的诸多行为特征,包括割礼仪式、畜牧者的屠牛方式以及广泛将牛奶作为一种食物。

迁移到东非的尼罗特人主要有三支:西部或尼罗特河湖地区、南部或尼罗特高原地区、东部或尼罗特平原地区。

西部尼罗特人

西部尼罗特人主要是说卢奥语的部族。他们来自苏丹南部的苏德



现代苏丹的牧民。

沼泽(Sudd)地区。此地是加扎勒(Bahr el Ghazal)河与白尼罗河汇集而成的一个季节性漫滩。说卢奥语的尼罗特人的迁移,可能一开始只是季节性地出入苏德沼泽地区的牧场。到 1450 年,很多说卢奥语的部族聚集到今天乌干达北部边界附近的普奔古(Pubungo)。至少一个世代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狩猎和劫掠的基地。他们从那里再经过维多利亚-尼安萨湖东北部和内湖地区,分散成多个小部族。其中就有推翻基塔拉奇伟齐王朝的乔-比托氏族。在基塔拉国的残余基础上,比托(Bito)王朝建立了布尼奥罗(Bunyoro)王国。在其他乌干达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布干达(Buganda)的口头传说中,可以寻迹到卢奥语的起源地。布干达历史属于后来一个时期,我们将在第十四章加以讨论。这些西部尼罗特移民可能正是恩科勒(Nkore)的希马人(Hima)专业畜牧群落的先祖,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族人也可以追溯至此(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119

即使这些卢奥语移民通常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但他们与当地说班图语的人还是融合在一起,并采纳了后者的语言。然而,他们在某

些方面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特色传统和语言，如维多利亚-尼安萨湖东北部的洛语(Luo)。

南部尼罗特人

南部尼罗特人(有时称为帕拉尼罗特人[paranilotes])来自苏丹南部偏东一点的地方。他们的起源地可以追溯到图尔卡纳湖西北部的干燥草原地区。他们最初是在约公元200—1000年期间南迁到东非。这比西部和东部尼罗特人要早得多。事实上，这恰好与早期铁器时代说班图语的人来到这个地区的时间是一致的。这些早期的南部尼罗特人迁移到维多利亚-尼安萨湖东部的高原的时候，是使用铁制工具劳动的谷类种植者和牧民，他们同化了该地区早先定居于南部的、使用石器的库施人。在这里，产生了肯尼亚高原上早期的卡伦津人(Kalenjin)。坦桑尼亚中部的达多格人(Dadog)同样也是南部尼罗特人进一步扩张和同化南部库施人所形成的。

肯尼亚高原西部肥沃的河谷和高原牧场，特别适合早期卡伦津人种植谷物和畜牧牛群。因此，西部高原成为公元1000年后进一步扩张的中心。随着定居点的扩张，他们开始和大量晚期铁器时代的其他群落有了联系。在进一步的接触和融合中，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群落，如埃尔格约人(Elgeyo)、波科特人(Pokot)和南迪人(Nandi)，这些人的祖先也可以追溯到南部尼罗特人。

东部尼罗特人

东部尼罗特人(有时也被称为帕拉尼罗特人[Paranilotes])同样来自图尔卡纳湖西北部的草原地区。与早先到来的尼罗特人群相比，东尼罗特人更像一个闯入者，他们保留着自己特有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乌干达东北部的阿泰克尔人(Ateker，其语言为卡拉莫琼语[Karamojong])、肯尼亚中部和坦桑尼亚平原北部的马赛人(Maasai)都起源于东尼罗特人。但是，他们闯入东非内陆属于后一段历史时期了，我们将在第十四章进一步讨论这部分内容。

第九章　16世纪前的东非沿海贸易城镇

120　本书前面的章节已经不时地提及印度洋贸易。大多数印度洋贸易指的是以埃及、红海沿岸和阿克苏姆或埃塞俄比亚为一方，与以波斯湾国家和印度西部为另一方的贸易联系。本章将讨论东非沿海一带斯瓦希里(Swahili)贸易城镇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这些城镇对印度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过去的历史学家有时会倾向于过分强调阿拉伯人对东非沿海早期贸易发展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将东非沿海贸易的出现都归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移民。早期研究将阿拉伯人的贡献集中在斯瓦希里语族的语言与文化上。阿拉伯人被描述成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正是这些阿拉伯人将沿海非洲人带入他们的贸易文化，因此产生了非洲-阿拉伯人的联合，并建立了斯瓦希里贸易城镇。然而，近来的研究已经显示，过去强调阿拉伯人的输入作用是一种误导。这并不是否认伊斯兰阿拉伯移民对斯瓦希里文化和贸易网络进一步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18和19世纪。但是，非洲本土人对早期沿海贸易发展和斯瓦希里文化、社会扩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在以前往往被忽视了。

东非沿海贸易社会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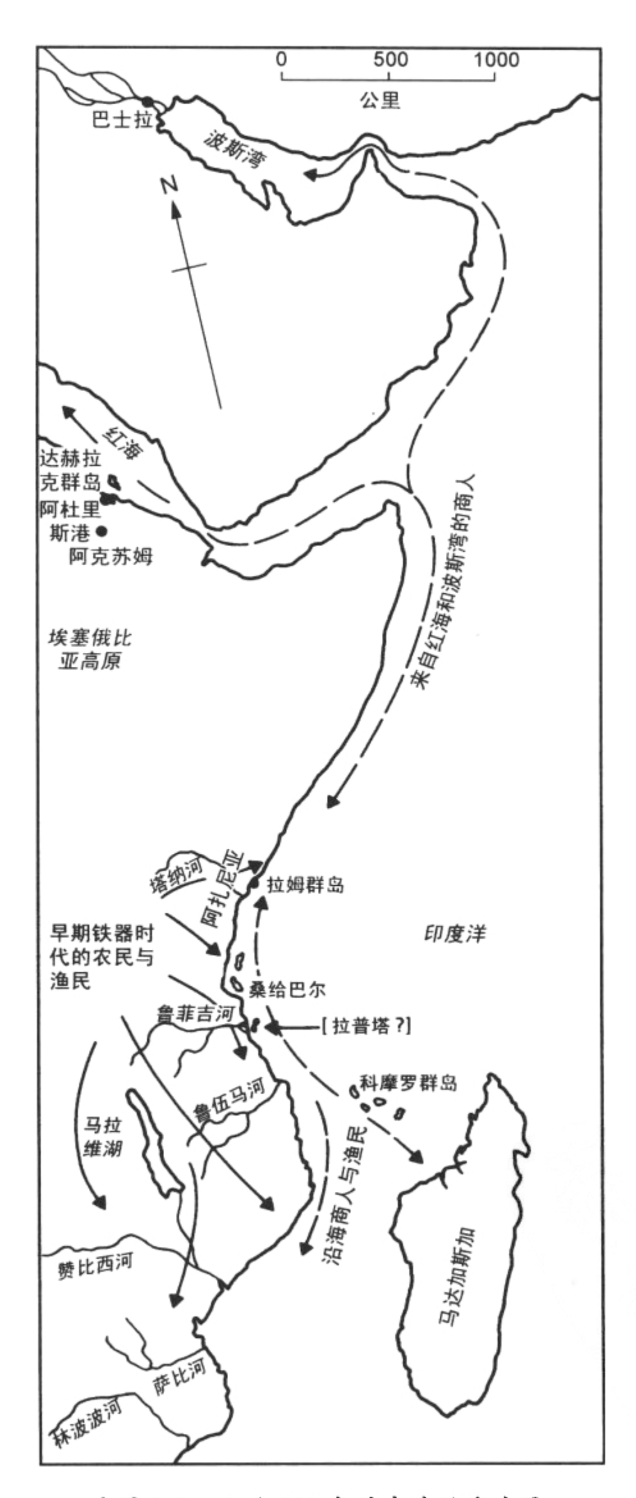
阿扎尼亚：公元 500 年前的东非沿海地区

东非沿海地区在公元纪年早期为希腊和罗马商人所知，他们将该地区称为“阿扎尼亚”(Azania)。最早在书面记载中提到阿扎尼亚的是公元 1 世纪希腊人的手册《红海回航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即“印度洋旅行记”)。这本书大约是公元 100 年在埃及贸易港口亚历山大写成的。它的写作动机是为希腊贸易船队提供一份印度洋已知港口的指南。它提到了阿扎尼亚沿海地区的一系列城镇，外国商人在那里可以获得象牙、犀牛角、玳瑁和少量的椰子油。作为交换，来自阿拉伯半岛和红海地区的商人为阿扎尼亚人提供铁制工具、武器、棉布、少量的小麦和酒。《红海回航记》的作者称阿扎尼亚沿岸最南端的港口为“拉普塔”(Rhapta)。拉普塔的准确位置至今也没有确定下来，但被认为或是在今天坦桑尼亚中部沿海地区，即鲁菲吉河(Rufiji)三角洲的某个地方，或可能在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附近。

122 阿扎尼亚人很明显是富有经验的渔民，他们在近海水域熟练地驾驭着小舟。他们用凿出来的独木舟捕鱼捉蟹，乘着用长长的椰子叶将木条拴在一起做成的渔船在岛屿间航行。每个城镇都由当地的权贵统治。《红海回航记》除了说当地人皮肤黑、个子高大外，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其他记载。目前所知的是，一些阿拉伯商人定居在该地区，与当地人通婚并学习他们的语言。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些早期阿拉伯定居者对阿扎尼亚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只是在业已存在的渔业、贸易村落里定居而已。

这些早期的阿扎尼亚人究竟是何许人，我们并不知晓。考古研究至今也没有发现早期沿海城镇的任何证据。未来的考古研究可能会发现陶器和其他人工制品，这些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他们的情况。他们可能是正处在东非早期铁器时代扩散中的移民的一部分，可能是第四

121



地图 9.1 公元 500 年的东非沿海地区。

章讨论过的说班图语的人。《红海回航记》中记载他们进口铁器物品与此也并不矛盾。他们可能只是发现，与其自己费时费力地炼铁并制作铁器，不如进口制作好的铁器物品来得便利。他们可能采纳了早先定居于此的狩猎和捕鱼群落已经发展出来的捕鱼技巧。“缝合船”(sewn boats)的使用与椰子的存在揭示出，他们与公元纪年早期把马达加斯加变成其殖民地的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水手有着一些联系。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南岛语族的人真的在这个时期定居于此。所能确定的是，至迟在 5 世纪前，说班图语的农民和渔民已经在东非沿海地区定居了下来。

122

僧祇之地：公元 1000 年前的东非沿海地区

公元 7、8 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给印度洋贸易带来了极大的繁荣。伊斯兰教中心于 750 年迁往巴格达后，波斯湾更加稳固地被纳入印度洋贸易网络。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什叶派难民在 8 世纪期间，沿着东非海岸线的北半段定居了下来。他们与非洲人通婚并学习当地的语言。近海岛屿上说阿拉伯语的人越来越多，这让东非沿海和其他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联系变得极为便利。那个时代的阿拉伯作者称东非沿海中部地区为“僧祇之地”[①](the Land of Zen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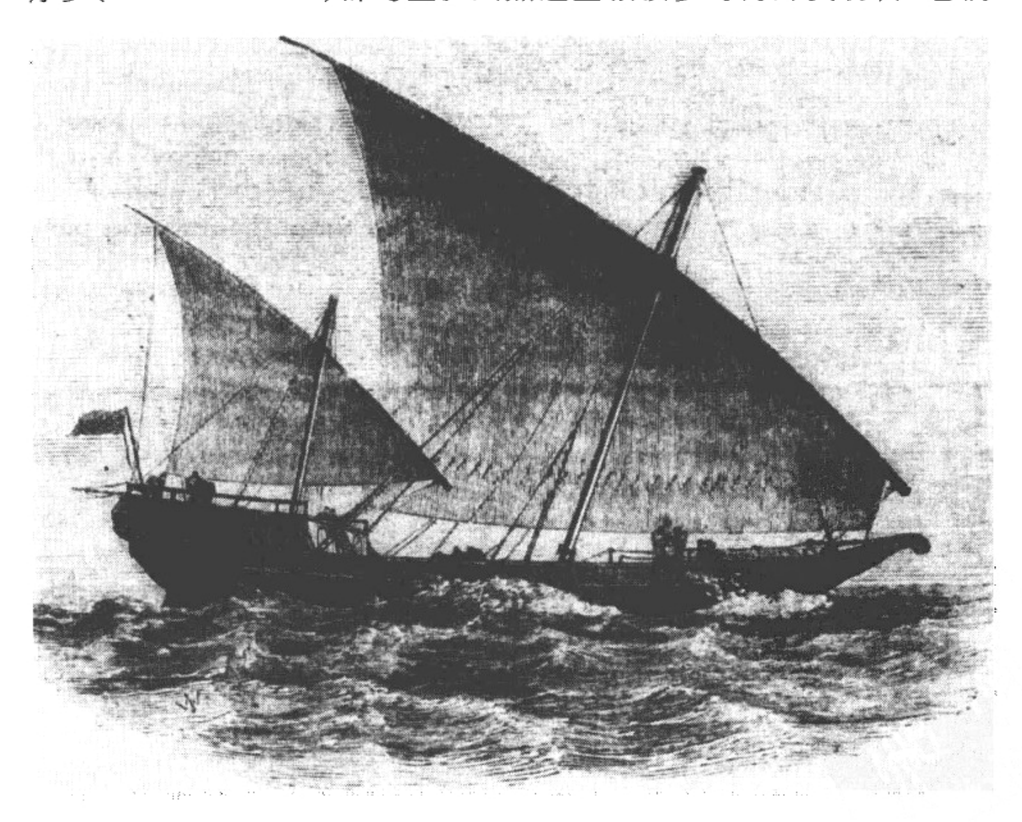
西印度洋上的季风在 11 月到次年 3 月间吹向东非，在 4 月到 10 月间吹向波斯湾。季风在风向上的季节性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已经形成的东非沿海与西亚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跨洋贸易。西印度洋上的绝大多数长途贸易是用被称为“独桅三角帆船”(dhows)的阿拉伯航船运载的，跨洋之旅费时几个月。在不得不乘着西南季风返航回家前，商人们并没有多少时间在东非沿海做买卖。因此，较靠北面的摩加迪沙(Mogadishu)、巴拉瓦(Barawa)和拉姆群岛(Lamu islands)成为他们最

① 僧祇，是对 Zenj 的音译，它还有 Zanj、Zendj 等不同拼法。中国古籍将它译作“僧祇”。“僧祇”的原意是黑，即黑人。僧祇并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而是东非沿海地区居民的统称，甚至包括在东非沿海地区居住的亚洲移民。——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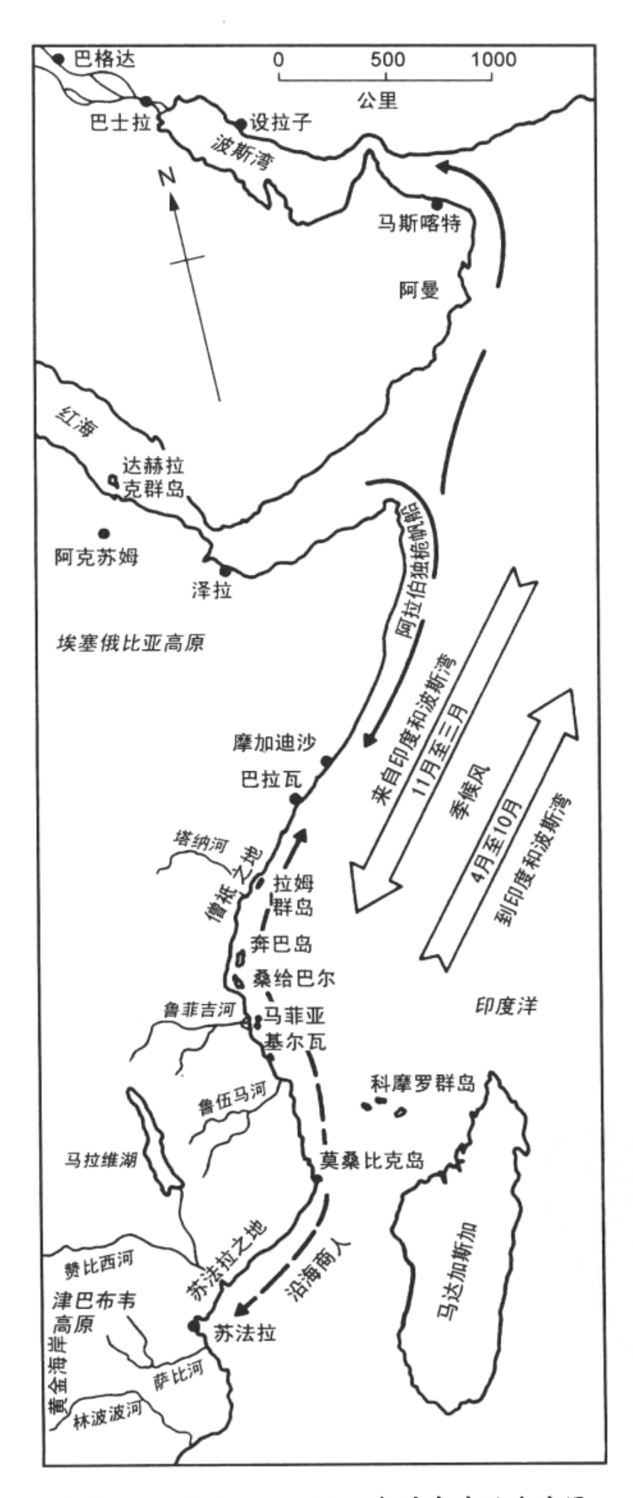
常停靠的港口。当地沿海贸易总体上操纵在东非商人手里，这些商人123将他们的货物运到主要城镇里来。这让跨洋过来的商人可以很快做完买卖，无需浪费宝贵的时间在一个小定居地到另一个定居地之间奔波上了。

随着对非洲象牙，后来是对黄金需求的上升，更多的阿拉伯穆斯林定居在东非岛屿城镇，以利于他们直接参与当地贸易。这些早期的穆斯林定居者，通常通过通婚的形式，与当地非洲统治家族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他们可以确保他们的穆斯林亲戚、海外商人在城镇里得到很好的接待。

到公元 9 世纪，"僧祇之地"沿海一带出现了大量成型的城镇。绝大多数城镇位于近海岛屿。肯尼亚北部沿海的拉姆群岛上有好几座城镇，其他城镇位于更南边的桑给巴尔(Zanzibar)、基尔瓦(Kilwa)与科摩罗(Comoro islands)群岛上。虽然这些城镇参与海外贸易，但它们



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19 世纪的版画。



地图 9.2 公元500—1000年的东非沿海地区。

123 主要还是当地的非洲城镇。它们是养牛的混合农业群落，贸易只是农业经济的补充。牛群圈养在栅栏围起来的中部，居家的房屋一般是按照圆形模式、用泥砖和木柱搭建起来的。考古学家在这些遗址上发现的大部分陶器都是按照一般东非铁器时代的模式在当地制造的。少量从波斯湾、印度西部和中国进口来的陶器证实了贸易联系的存在。从摩加迪沙到莫桑比克这个方圆3 000公里的沿海地带，各地陶器风格明显相同。这揭示出沿海一带的诸多贸易点之间紧密的文化联系和日常航海接触。

这个时期沿海城镇主要出口原材料，进口加工制品、奢侈品、东方陶器、玻璃、印度丝绸和棉织品。海外商人寻求的非洲商品主要为象牙。125 特别是中国，对象牙的需求量较高，中国用象牙为贵族们制作典礼用的座椅。在印度，象牙也被广泛地用来制作镂刻的匕首手柄和剑鞘。与印度象相比，非洲象的象牙更大，质地更细腻，最为适合镂刻。其他



奔巴岛上发现的银币与铜币。这些钱币较小，且是在当地铸造的。在拍照前，这些钱币经过了清理和辨别。这些钱币的年代被认为是在公元 980—11000 年之间。它们的直径从 7 毫米到 12 毫米，大小不等。另外，钱币也较薄，每个钱币的重量不足 0.25 克。

非洲出口产品还包括龙涎香，即产生香味的树脂化石，以及波斯湾地区建造房屋所需的红木。俘虏被作为奴隶输出到巴士拉(Basra)盐矿和波斯湾上部的种植园。巴士拉的奴隶数量众多。公元 868 年，奴隶的数量之多，足以掀起一场起义（"僧祇奴起义"）。在出口货物中也有少量的黄金。黄金由僧祇从"苏法拉之地"带到北部沿海城镇。在一些主要的沿海城镇里，人们也发现了制作棉布、玻璃和贝珠的证据。制作这些产品很明显是用来和内陆民族换取象牙和其他产品。这种类型的贝珠可以追溯到公元 8、9 世纪，在远离中部非洲、南部非洲内陆的多数考古遗址中都有所发现。

研究东非沿海地区的历史学家很是幸运，他们可以参引几位同时代说阿拉伯语的到过该沿海地区的访问者所记录下来的文字。其中，较为重要的访问者有 10 世纪的阿尔-马苏第(al-Masudi)和 14 世纪的伊本·巴图塔。阿尔-马苏第在公元 916 年访问了"僧祇之地"，他是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Oman)乘坐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到达那里的。他写道：

> 僧祇之地制作野豹皮。人们将豹皮作为衣服来穿，或是将豹皮出口到伊斯兰国家。这里的豹皮是最大的，用来做鞍座是最好看的……他们也出口用来制作梳子的玳瑁，象牙也被用来制作梳子……僧祇定居在这个地区，该地区最远延伸到苏法拉，苏法拉是此地的边缘极限了，也是从阿曼和尸罗夫[①]开始在僧祇海面上旅行的目的地……僧祇用牛作为驮兽，因为他们没有马、驴子或骆驼……这里也有很多野象，但没有一头象得到了驯化。僧祇没有用这些野象作战或做其他什么事，只是捕获并杀死它们以取走象牙。来自这里的一对象牙重达 50 磅甚至更重。它们通常被送往阿曼，从阿曼再运到中国和印度。这是主要的贸易路线……

---

① 尸罗夫，即 Siraf 的音译，是中世纪波斯湾的重要港口，位于伊朗布什尔省的南部地区。阿尔-马苏第就是从该港口出发的。——译者注

僧祇有优美的语言，也有人用此种语言布道。有个教徒经常召集民众，告诫他的听众要在生活中取悦真主并服从真主。他解释说，如果不服从就会遭到惩罚，并提醒听众要记住他们的祖先和故去的国王。这里的人没有宗教法规：他们的国王依照惯例和政治便宜来进行统治。

僧祇们食用香蕉，香蕉在他们中很是平常，就像在印度一样。但是，他们的主要食品是稷和一种像块菌一样从地里拔出来的叫卡拉里(Kalari)的植物。他们也吃蜂蜜和肉类。他们有很多长有椰子的岛屿，椰子果被所有僧祇当做水果来吃。离海岸有一两天航行距离的一个岛屿上住有穆斯林，并有一个王室家族。这就是坎巴鲁(Kanbalu)岛(想必是今天的奔巴[Pemba])。

——摘自 G. S. P. Freeman-Grenville 的译本，*The East African Coast*，OUP，Oxford，1962，pp. 1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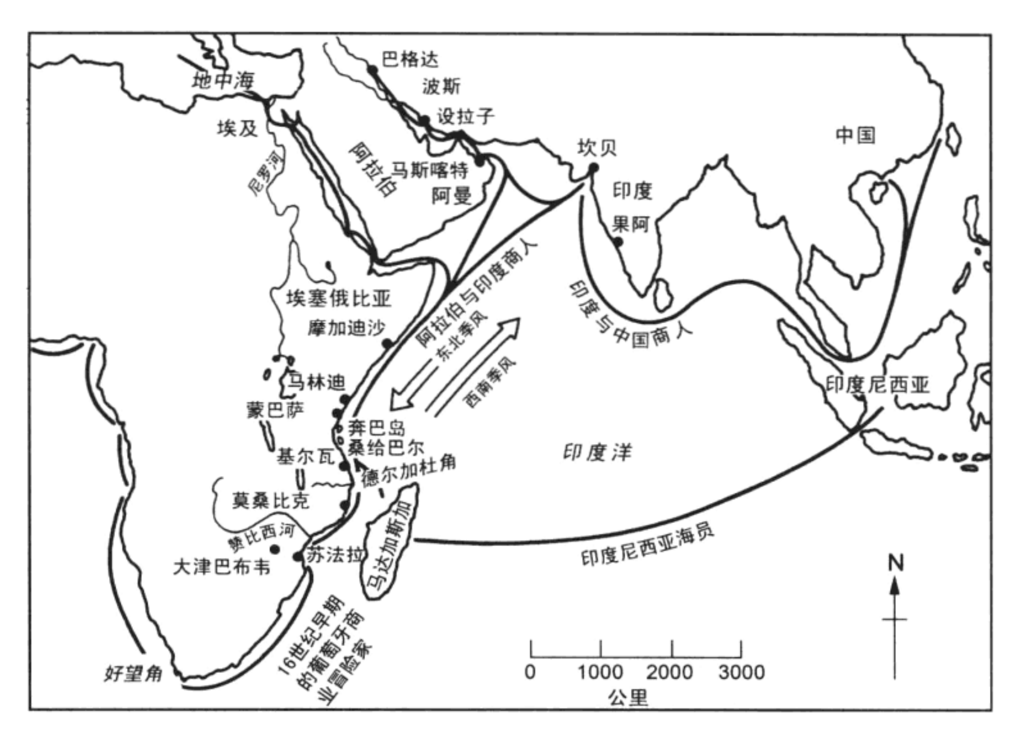
126

斯瓦希里贸易城镇的发展

斯瓦希里人的起源

今天的斯瓦希里语是东非地区使用最为广泛的非洲语言。沿海地区和很多内陆地区的人都说斯瓦希里语。它也被今天的坦桑尼亚作为官方语言。“Swahili”一词来源于阿拉伯单词 sahil，意思是“沿海”。因此，“斯瓦希里”在字面上指的是“沿海居民”。斯瓦希里语实际上是一种班图语，但加入了很多阿拉伯单词。它是从曾居住在塔纳河谷、拉姆群岛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民族的语言中演变而来的。阿拉伯语是由婚嫁到沿海社会的阿拉伯定居者添加到斯瓦希里语中去的。这些阿拉伯定居者书写和与海外商人交流时使用阿拉伯语，但在日常生活中说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适时地发展为一种书写语言，用的是阿拉伯字母。

10—14 世纪期间，“Swahili”一词开始指称一个特殊的沿海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宗教和文化是伊斯兰的，但语言和人口基本上是非洲



地图 9.3　印度洋贸易网络，10—16 世纪。

的。它是一个有着沿海贸易文化和经济的城市。现在，我们转过来讨论这些斯瓦希里城镇的形成。

约公元 970—1050 年，是东非贸易城镇复兴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拜占庭帝国和法蒂玛王朝时期的埃及(Fatimid Egypt)对象牙和黄金需求上升的时期。有证据显示，东非沿海岛屿上有了进一步穆斯林化的定居点。阿尔-马苏第曾说坎巴鲁岛(Kanbalu)有个穆斯林统治者，这意味着这种情况在 10 世纪早期并不常见。一个世纪后，这种情况随着穆斯林影响的增加变得更为普遍。大量非洲统治者转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穆斯林定居者也婚嫁到当地统治家族，一些城镇也修建了清真寺。由珊瑚石块建成的矩形房屋开始在一些北部城镇中出现。这种房屋采用的是红海达赫拉克群岛上的房屋形状，这揭示出此地通过贸易与埃及、地中海地区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至少在统治阶层中，普遍出现了财富增加的迹象。很多富有的商人统治者开始用银、铜铸造硬币。金币、法蒂玛的第纳尔是国际交易的主要通币，但在地方

127

交易中也使用地方货币。

黄金贸易与基尔瓦的崛起

1050—1200 年期间,来自波斯湾和阿曼的穆斯林移民增加了。可能是由于新来者所带来的压力,北部大量的斯瓦希里穆斯林,特别是来自欣格韦亚(Shungwaya)和拉姆群岛的斯瓦希里穆斯林,南迁到桑给巴尔、马菲亚(Mafia)、基尔瓦和奔巴诸多岛屿及科摩罗群岛上定居了下来。在那里,他们在已经形成了的贸易城镇中定居,并建立了后来统治数个世代的新王朝。这些统治家族的领导成员宣称,他们的穆斯林先祖可以追溯到来自波斯湾设拉子(Shiraz)的移民。因此,他们建立的王朝通常被称为设拉子王朝。但是,这里没有发现波斯移民的证据,他们可能是北部一些显赫的斯瓦希里家族,为了提升地位才宣称有这种联系。从这个称之为设拉子王朝"迁徙"过来的时间开始,珊瑚石做成的房子开始修建在奔巴、桑给巴尔、马菲尔和基尔瓦诸岛屿上。

在斯瓦希里的所有新城镇中,基尔瓦注定将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在这一时期之前,黄金贸易一如既往地主要由摩加迪沙的穆斯林商人来组织进行。摩加迪沙是一个修建于 1000 年左右的最北边的一个斯瓦希里城镇。通过沿海一带的穆斯林活动,摩加迪沙商人将沙金从"苏法拉之地"及其以南地区带到北方来。此时的基尔瓦设拉子统治者可以打破摩加迪沙对黄金贸易的控制。基尔瓦是最南边的贸易点,海外商人到达那里要航行三个月。因此,它处在控制南方贸易的理想位置。基尔瓦商人派船南下,在苏法拉建立了一个小型贸易点,就在今天贝拉(Beira)的南边。内陆民族将黄金从林波波流域(Limpopo valley)和津巴布韦高原带到这里来(参见本书第十一章)。至迟到 1200 年,基尔瓦打破了摩加迪沙的控制,确立了对南部非洲黄金海外贸易的控制。在接下来的 200 年里,基尔瓦在所有贸易城镇中,一直是最为重要、可能也是最为富有的一个。

斯瓦希里城邦的政治经济

在摩加迪沙到苏拉法之间,约有 40 座斯瓦希里城镇。很多都是小

型城镇，有着一些石建房子、一座清真寺、一个穆斯林统治家族和大量非穆斯林臣民。大一点的城镇，像摩加迪沙、帕塔（Pate）、蒙巴萨（Mombasa）、桑给巴尔和基尔瓦，几乎都是由珊瑚石修建而成的，展现了其在经济上的富足。 128

大多数城镇在其穆斯林苏丹的统治下独立行事。在不同时期里，一些大型城镇曾将权威强加给弱小的近邻。例如，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基尔瓦苏丹们宣称控制了苏法拉和桑给巴尔之间大部分的沿海地区。但是，他们的控制由于一系列的王朝纷争而受到削弱。到15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城镇，包括苏法拉，都宣布独立。

统治阶层最为富有。他们居住在大型石房和华丽的宫殿里，穿着精细的丝绸、棉布长袍，戴着金银首饰。他们就餐用的是从波斯和中国进口来的精美瓷器。虽然他们有自己的大种植园，种植着稷、棉花、蔬菜和水果，但是他们的主要财富来源是海外贸易。苏丹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高达50%的税，对所有途经城镇的货物则征税更多。尽管税重，



基尔瓦大清真寺遗址。

城镇的商人还是可以在贸易上获得财富。在一些大型城镇，如基尔瓦和摩加迪沙，商人们也组织生产棉布、玻璃和贝珠，用它们在非洲内陆进行交易。

在财富和地位上不如商人的是大量的城镇居民，包括说斯瓦希里语的穆斯林工匠、手艺人、教士、地位较低的宫廷官员和沿海船只的船长。这部分人明显是非洲人，也没有人宣称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后代。他们往往居住在矩形的土木房里，这些土木房在石城的边缘地带聚集成一片片小区。传统的非洲村庄位于紧邻的陆地上，住着非穆斯林农民、渔民，他们给城镇提供日常食物，从内陆来的搜寻象牙的狩猎者和商人通常也住在那里。

129 内陆人与沿海、岛屿城镇中的斯瓦希里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总体上来说，出于双方利益考虑，关系维持得还不错。内陆人为斯瓦希里人提供象牙、兽皮和黄金，这些对斯瓦希里人的贸易和持续富有至关重要。反过来，斯瓦希里人给内陆人提供布匹、贝珠、进口陶器和其他奢侈品。

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并不好。内陆的酋长们会攻击或围攻沿海城镇。摩擦的主要原因是斯瓦希里人自己造成的，他们侵袭到内陆以搜寻牲畜、其他战利品和可以变为奴隶的俘虏。在1331年伊本·巴图塔访问期间，基尔瓦苏丹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内陆"异教徒僧祇"的战争，并将之宣称为圣战。伊本·巴图塔揭示了圣战的真正原因，即苏丹"经常侵袭到僧祇国家，攻击他们并拿走战利品"。一部分战利品由苏丹自己保留，其他则放到一个特殊的金库里，以款待像伊本·巴图塔这样的外国访问者。苏丹由于慷慨地送出大量礼物而获得个外号叫阿布·阿尔-马瓦希布(Abu al-Mawahib，意思是"礼物之父")。

基尔瓦苏丹主要从南部与苏法拉的黄金贸易中获取财富，他们可能曾沿着这一路线攻击过当地内陆民族。其他很多城镇的统治者并不都是如此。基尔瓦后来的苏丹与内陆人关系修好。值得一提的是，当葡萄牙人在1505年攻击基尔瓦时，当地非洲酋长从内陆派来弓箭手协

助防卫岛屿。

斯瓦希里城镇本身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和平的。在贸易上，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竞争，但它们很少彼此袭击，海上抢劫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

东非沿海的葡萄牙人(1498—16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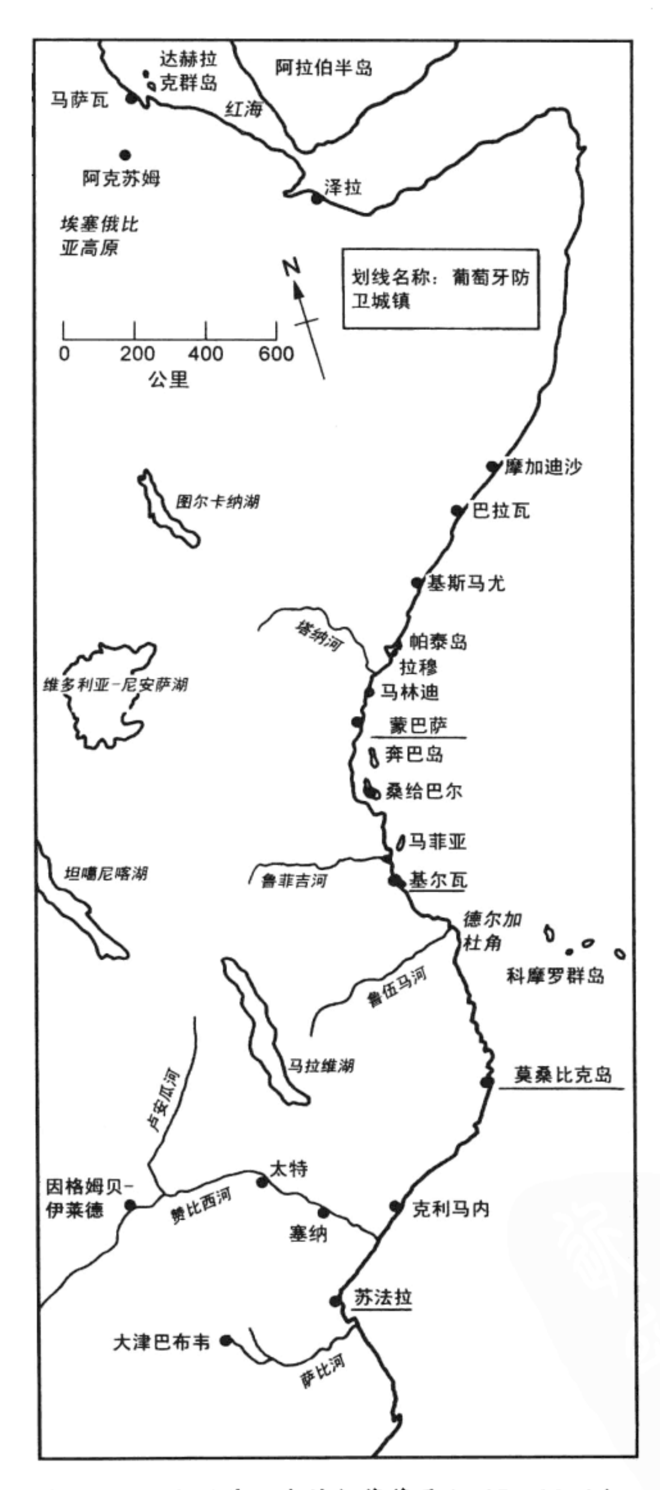
1498 年，葡萄牙人环绕非洲南端，沿着东非沿海向北航行的时候，成为从南边进入印度洋的第一批西欧人。多年来，葡萄牙商船一直沿着非洲西部沿海地区向南航行，以寻找向东进入印度的路线。这些早期欧洲冒险家的动机将在第十二章中进一步讨论。他们希望从南边进入印度洋，绕开控制北非和西亚的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竞争者。葡萄牙人希望这样可以从穆斯林那里夺走印度香料、香水、丝绸和其他奢侈品贸易的控制权，这些贸易可以产生惊人的财富。对东非斯瓦希里的贸易，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当葡萄牙人看到斯瓦希里城镇的富有和贸易的发达程度后，他们决定也要夺取对这里的贸易控制权，如果必要的话，就动用武力。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将全副武装的战船开进较为重要的城镇港口，接着便要求城镇的统治者成为葡萄牙的臣民，并每年向葡萄牙国王大量进贡。如果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攻击城镇，掠夺城镇的所有财物，屠杀任何一个进行反抗的穆斯林。整个进程以反对“摩尔人”的“神圣的基督教战争”为名加以正当化。(“摩尔人”是欧洲基督徒此时专指北非穆斯林的名称。他们也用此词更广义地指所有穆斯林，无论是非洲人还是阿拉伯人。)即使是大型城镇，也不能够抗击来自海上的蓄意攻击，保卫自己。斯瓦希里城镇过去在贸易上是老对手，所以在互相需要的时候，这些城镇没有联合行动以抵御外部威胁。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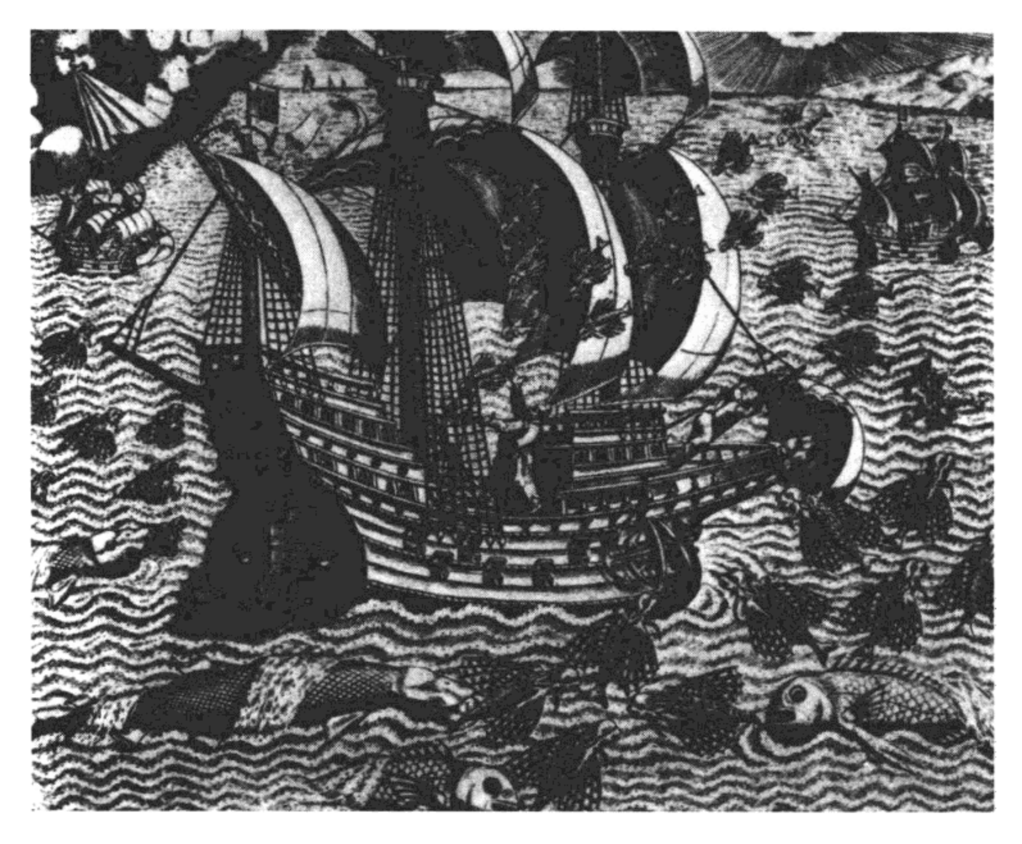
马林迪(Malindi)苏丹希望避免对抗，立即同意给葡萄牙人进贡。但是，大多数沿海城镇都没有那么轻易地放弃独立。事实上，蒙巴萨苏丹还大老远地跑到马林迪，向其宣战。马林迪已经明显成为公敌的同盟者了。

·130



地图 9.4　斯瓦希里城镇与葡萄牙人，15—16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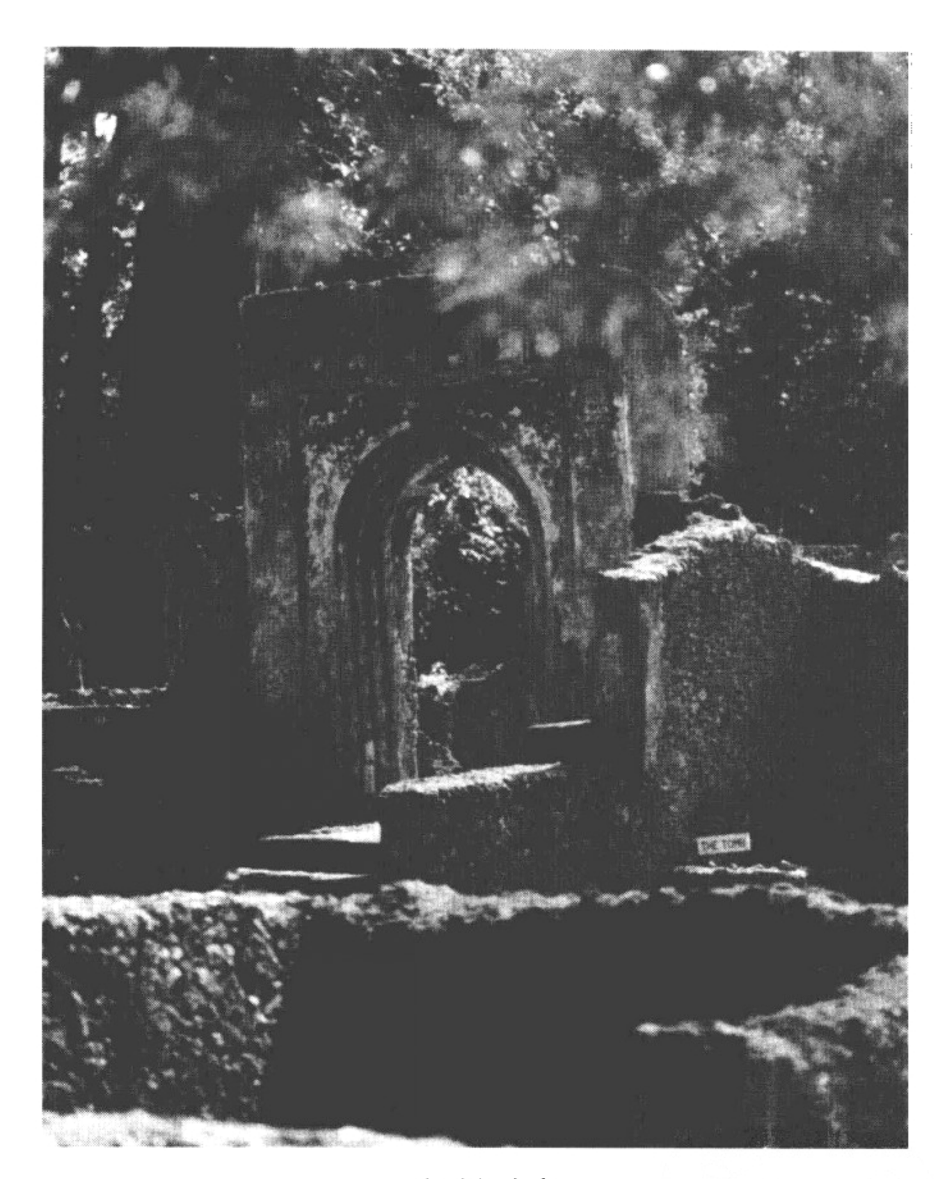
131



16 世纪的葡萄牙船队。

桑给巴尔是第一个遭到葡萄牙人猛烈攻击的斯瓦希里城镇。1503 年，一个叫鲁伊·洛伦索·拉瓦斯科(Ruy Loureco Ravasco)的葡萄牙船长，用船上的大炮攻击城镇居民，直到桑给巴尔同意每年进贡 100 密提卡尔(Miticals)。事实上，这只不过是这个葡萄牙船长自己的一次海盗式袭击而已。但是，这次袭击开了先河。在 1503 年间，拉瓦斯科及其同伙在斯瓦希里沿岸一带来回游荡，劫持商船，索要金币来赎救它们。之后的 1505 年，更有野心的葡萄牙舰队接踵而至。弗朗西斯科·德爱尔梅达(Francisco d'Almeida)率领一支由 11 艘全副武装的战船组成的舰队，抢夺较为重要的城镇的控制权。同一年，基尔瓦、蒙巴萨和巴拉瓦都遭到袭击。随行的葡萄牙人目击这一切，并这样描述了对基尔瓦和蒙巴萨的洗劫：

132



14 世纪的格迪遗址。

从船上放眼望去，精致房屋、海岸阶地、尖塔、棕榈和果树装扮着这个城市（基尔瓦），美极了。我们的人迫不及待要登陆去征服这个野蛮人的傲慢。这个野蛮人花了整个晚上，将弓箭手从内陆调到岛上来……

（肉搏战之后的第二天，苏丹逃跑了，葡萄牙人占领了这个城镇。）

接着，代理主教和一些圣芳济各会神父，携着十字架，唱着赞美诗，列队登上岸来。他们来到官殿，放下十字架，舰队长（德爱尔梅达）开始祈祷。接着，每个人都开始抢劫镇上的所有商品和杂货……

（两个星期后，城镇安定了下来，并修建了一个要塞，任命了一个“傀儡”苏丹后，葡萄牙舰队沿着海岸奔向蒙巴萨。）

133

蒙巴萨的摩尔人在港口的入口处修建了配有很多枪炮的据点，这个港口入口非常狭窄。当我们进入的时候，第一艘战船受到两边摩尔人的炮火打击，我们立即还以颜色。我们的炮火非常密集，以致他们据点的火药着火爆炸。据点开始燃烧，摩尔人随之溃退，整个舰队得以入港并在镇前停锚……

舰队长与其他船长汇合，决定当夜放火烧城，第二天早晨进城。但是，当他们开始烧城的时候，遭到了摩尔人箭林石雨的攻击。城镇有600多座房子，这些房子用棕榈叶作为房顶：这些叶子被采集的时候还是绿色的。石建房屋间有很多牲畜用的门廊与作为马厩的木头房子。这里，几乎没有不附带这些木结构房子的住房。

火被点燃了，并肆虐了整个晚上，许多房屋倒塌了，大量的物品被毁坏。由于这个城镇通过海路与苏法拉和坎贝（位于西印度洋）有着贸易往来，这里还有三只来自坎贝的商船，即使是它们也没有躲开猛烈的攻击。这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葡萄牙人蜂拥登陆。）弓箭手和枪手走在前面，所有人爬着陡坡进入城镇。进城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些房屋由于前一天晚上的大火而遭到遗弃。他们往前推进，发现了一些三层楼房，有人从这些楼房里扔出石头砸向他们。但是，这些扔下来的石头砸到狭窄街道上的墙壁上而掉落下来，因此，石头坠落的力道也就丧失大半了。这里也有很多伸到街道上的露台，人可以藏匿在这些露台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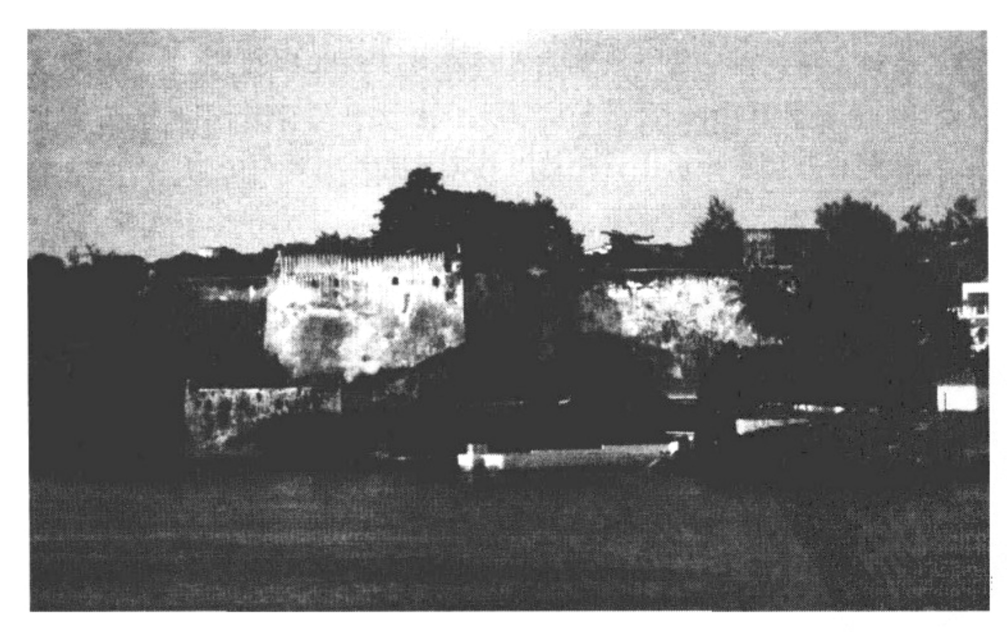
舰队长径直走到皇宫。在那里，伏穆德兹（Vermudez）船长攀上墙壁，高举我们的旗帜，高呼道：葡萄牙，葡萄牙。（攻击蒙巴萨

只死了四个葡萄牙人,但是)……1 513 具摩尔人的尸体为这四个死去的人报了仇……

舰队长命令洗劫城镇,每个人都要将其发现的任何东西带回到舰队长的船上:战利品将在船上瓜分,每个人将得到他找到东西的二十分之一。金银珍宝也用此规则。接着,每个人都开始抢劫城镇,搜寻房屋,用斧头和铁棒强行破门。城镇中有着大量准备运往苏法拉的棉布,因为整个沿海地区都是从这里得到棉布的。因此,舰队长自己获得了苏法拉贸易中的很大份额。战利品中有大量昂贵的丝绸和金饰衣服,也有地毯。其中有块地毯美不胜收,它连同很多其他珍宝被送给了葡萄牙国王。

——摘自 Joao de Barros 和 Hans Mayr 的目击记录,刊印在 G. S. P. 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 OUP, Oxford, 1962, pp. 82,102,108 - 110

134 德爱尔梅达后来成为果阿(Goa)的总督,这是一个在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殖民地。1509 年,他在返航途中不明智地攻击了南部非洲的



蒙巴萨的耶稣堡。

科伊桑人，并死在他们之手。

洗劫那些抵抗他们的斯瓦希里城镇后，葡萄牙人在基尔瓦、苏法拉和莫桑比克这些南部口岸修建了石建要塞。这为他们从非洲沿海地带航行到印度殖民地果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也让他们控制了沿海的黄金贸易，这些黄金是从津巴布韦高原运到苏法拉的。（葡萄牙人与这些地方的关系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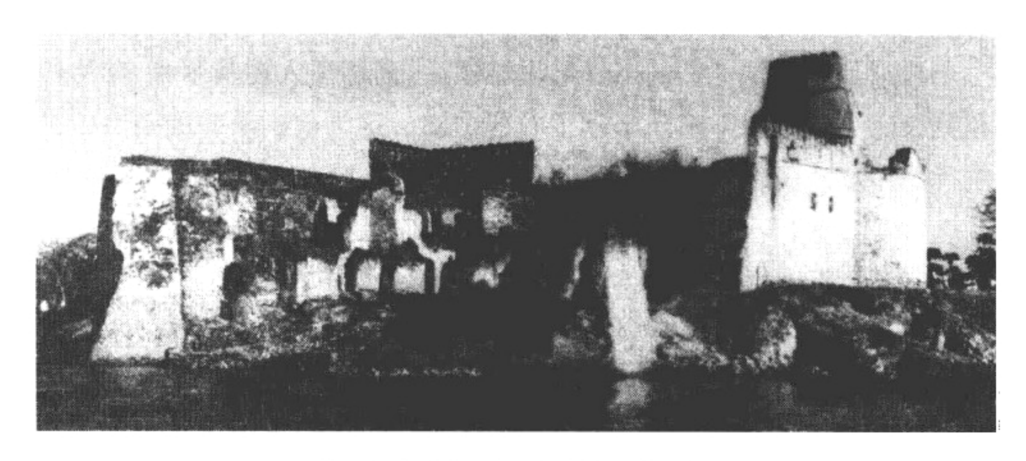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希望他们的南部贸易基地可以将贸易从北方的斯瓦希里城镇转移过来。但是，斯瓦希里人在北部继续进行抵抗。蒙巴萨苏丹拒绝向葡萄牙人进贡，继续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维持直接的贸易联系。这种抵抗造成的结果就是，1528 年和 1589 年，蒙巴萨遭到葡萄牙人两次洗劫。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洗劫蒙巴萨之后，葡萄牙人意识到，要控制西印度洋上的贸易，他们就需要同时控制这些北方城镇。为此，他们在蒙巴萨修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耶稣堡（Fort Jesus）的巨型要塞。修成于 1599 年的耶稣堡在后来的 100 年内是葡萄牙人在东非的势力中心。

厚实的、具有威胁性的墙壁暗示着暴力的存在，借此，葡萄牙人在 16、17 世纪大部分时间维持着东非贸易的主导地位。

马达加斯加

135

马达加斯加是个大岛，位于东非沿海，离莫桑比克约 500 公里。直到公元纪年开始的早期，还没有人在岛上居住。首先定居在岛上的是南岛语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波利西尼亚人的组合）和来自东非大陆的班图语族，两者似乎是在同一时期到达这里的。南岛语族人乘着小木船越过印度洋到达东非沿海。他们没有在东非永久地定居下来，但和说班图语的农民有着联系。后来，他们与说班图语的东非人定居在马达加斯加北部沿海一带，这些东非人可能是作为奴隶劳工过去的。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的该定居地直接考古证据是公元 8 世纪的，但是语言学证据说明，这些活动应发生在公元 100—400 年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其他东非班图语人接踵而至，有些人在岛



在基尔瓦的16世纪葡萄牙人要塞遗址。

屿西部和南部地区建立了独立的定居点。13世纪前,还不时有南岛语族人的小型定居点出现。除了拿手的捕鱼技术外,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南岛语族人先祖还带来稻米和香蕉的种植技术。非洲人的先祖带来了养牛和其他农业技术。然而,印度洋贸易依然是马达加斯加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公元1000年,已有少量祖籍是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定居在北部的贸易港口。

到14世纪,马达加斯加南部地区的流域出现了一些小王国。但是,这些南部王国相对独立于印度洋贸易网络,直到16世纪欧洲人从印度洋南部来到这里。

第十章 17世纪前的中部非洲、南部非洲的晚期铁器时代国家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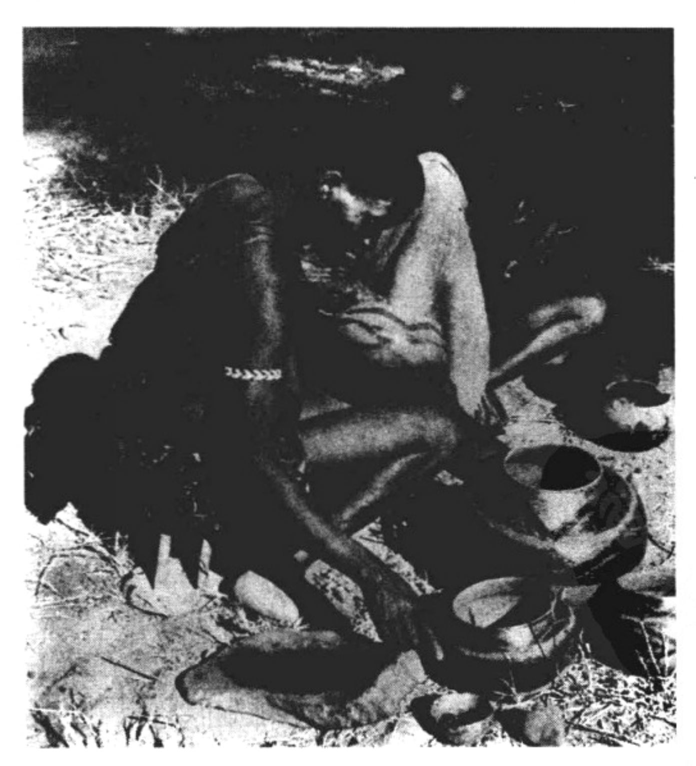
研究中部、南部非洲的历史学家一般用"晚期铁器时代"这一概念来描述约公元1000年后的特定时期。约从那时开始,这两个地区的铁器时代群落在社会和经济实践中都出现了重要变化。 136

研究晚期铁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从铁器时代定居点遗址中发掘出的陶器的风格变化。关于东非内陆诸民族在这一时期的情况,第八章已经讨论过了。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新陶器风格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民族的到来,他们可能已经征服,但肯定取代了之前早期铁器时代的人。然而,对陶器和其他考古器具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则发现,早期与晚期之间的延续性要比人们在过去认识到的大得多。人们也没有发现重大的人口迁移或其他证据。某些地区出现晚期铁器时代的活动,是在本地渐进式地演进出来的。在其他地区,变革相当突然,这意味着此地存在外来思想或少量有影响力的人群。换句话说,一些地区自己发展出新技术和新实践,而其他地区则是从他们那里学过来的。出现变革的时期同样也有所不同。公元1000年只是一个大概的参照时间。在某些地区,出现晚期铁器时代特征的时期要早好几个世纪。在其他地区,变革则晚至12或14世纪才出现。

晚期铁器时代的特征

一般而言,晚期铁器时代是一个伟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时期。人们学会了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农业和捕鱼技术得到了改进,采矿和制造技术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南部非洲,人们随着对干燥草地的更充分利用,越来越重视养牛。某些群落则专门从事采矿、金属加工、粮食生产或狩猎。所有这些地区分工都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贸易。随着人口的增加,更多的土地得到稳定的利用,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者被排挤出去或被同化。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家用陶器出现了新风格。这些新风格的陶器比早期铁器时代有更大的地区差异,也有着更多的形状和大小。很多陶器都是用更好的、硬度更强的黏土做成的,在装饰上更为精美。正是凭借这些大量的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辨别出不同的人群和发展时期。

137



20 世纪早期赞比西流域的陶工和带有晚期铁器时代装饰特征的陶罐。

在某些地区，正是通过对陶器仔细的分析，人们才得以追踪到晚期铁器时代群落和现代非洲本土民族之间的直接联系。

赞比西河北部地区晚期铁器时代国家的出现

中部非洲的宗教与王权

早期铁器时代群落通常以村落为基础，一般是自给自足的。随着晚期铁器时代专业化的出现和人口的增加，人们以更大的政治单元组织起来，地方酋长的权力和重要性得以提升。

我们在第七章曾讨论过，西非的酋长地位或王权一般与宗教权力有着紧密的联系，中部非洲也是如此。刚果森林南部的撒哈拉林地地区酋长和国王权力的兴起，常常源于他们在一些宗教活动中的权威地位。他们可能通过对贸易的控制，也可能因为具有一些优越的金属加工或狩猎知识和技巧而获得权力。但是，无论他们世俗权力的物质来源是什么，他们通常是通过其在传统宗教或其祖先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中的作用，将他们的统治权威加以合法化的。因此，刚果的古代统治者是“土地神”的守护者（西非也有相同的信仰）。当代安哥拉（Angola）姆邦杜人（Mbundu）、当代马拉维（Malwei）早期的切瓦人（Chewa）的最早期统治者，都是“求雨”神殿的监护者。人们将他们作为宗教首领并向他们上交贡品。从更为世俗的作用上说，他们保护民众免受外来攻击，维持贸易路线的安全。在干旱和洪涝时期，他们重新分配储备粮食给困苦的、遭到侵袭的邻居，或组织人们迁移到更加富饶和肥沃的地方。 138

卢巴王国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在晚期铁器时代的出现和酋长地位的早期发展方面，较为重要的一个地区是位于当代刚果东南部基萨尔湖（Lake Kisale）附近的卢阿拉巴（Lualaba）上游流域。自公元 4 世纪以来，基萨尔湖地区就一直为铁器加工农民所占据。此处位置优越，粮食生产有盈余。刚果森林南部



基萨尔人的一座墓穴。

边缘的撒哈拉林地，对谷类作物种植来说是个肥沃的地区。这里雨水充足，为持续的粮食盈余提供了保证。此外，该林地适宜狩猎，江河湖泊也适宜渔业的发展。

基萨尔湖地区的民族最大化地利用了可用资源。数世纪以来，他们发展出使用网、鱼叉和凿空独木舟的技术，并在芦苇覆盖的沼泽中清理出沟渠。他们学会了干制鱼的技术，这些干制鱼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获得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也可以用它们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易。他们从北部地区买来铁矿和食盐，从南部买来铜矿，这些铜矿是从今天赞比亚和刚果“铜矿带”地区开采出来的。他们成为专业的手工艺者，特别是在金属制作上。他们将加热的铜做成丝，用来制作戒指、手镯和项圈，或者加工成十字形的铜块，用来进行贸易或作为财富储存起来。

139

到 1300 年，基萨尔湖地区的民族形成了大量繁荣的农业和贸易酋邦——今天卢巴人(Luba)的祖先。然而，他们主要的农业和渔业用地是极其有限的。可能是由于越来越有限的资源竞争，导致一些村落酋

邦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在1300—1400年期间,卢阿拉巴东部的卢巴人组成了一个在恩孔葛洛(Nkongolo)王朝统治下的中央集权王国。根据卢巴人的口头传说,恩孔葛洛王朝的祖先是来自北部的松吉耶人(Songye)。在15世纪开始的头几年,恩孔葛洛王朝被一个新王朝推翻。根据卢巴神话,建立该王朝的英雄是一个名叫西宾达·卡拉拉(Ilunga Kalala)的伟大猎手。他的父亲从北部昆达人(Kunda)的地方来到卢巴,并娶了恩孔葛洛的妹妹。西宾达·卡拉拉在口头传说中被描述为具有法力的英雄式的猎手。他可能是专业猎人群体的首领,这些猎人由于引入了狩猎新技术而在卢巴人中获得了崇高地位并得到了广泛接受。这些新技术包括弓和铁头箭的使用,该地区之前并没有发现过这两种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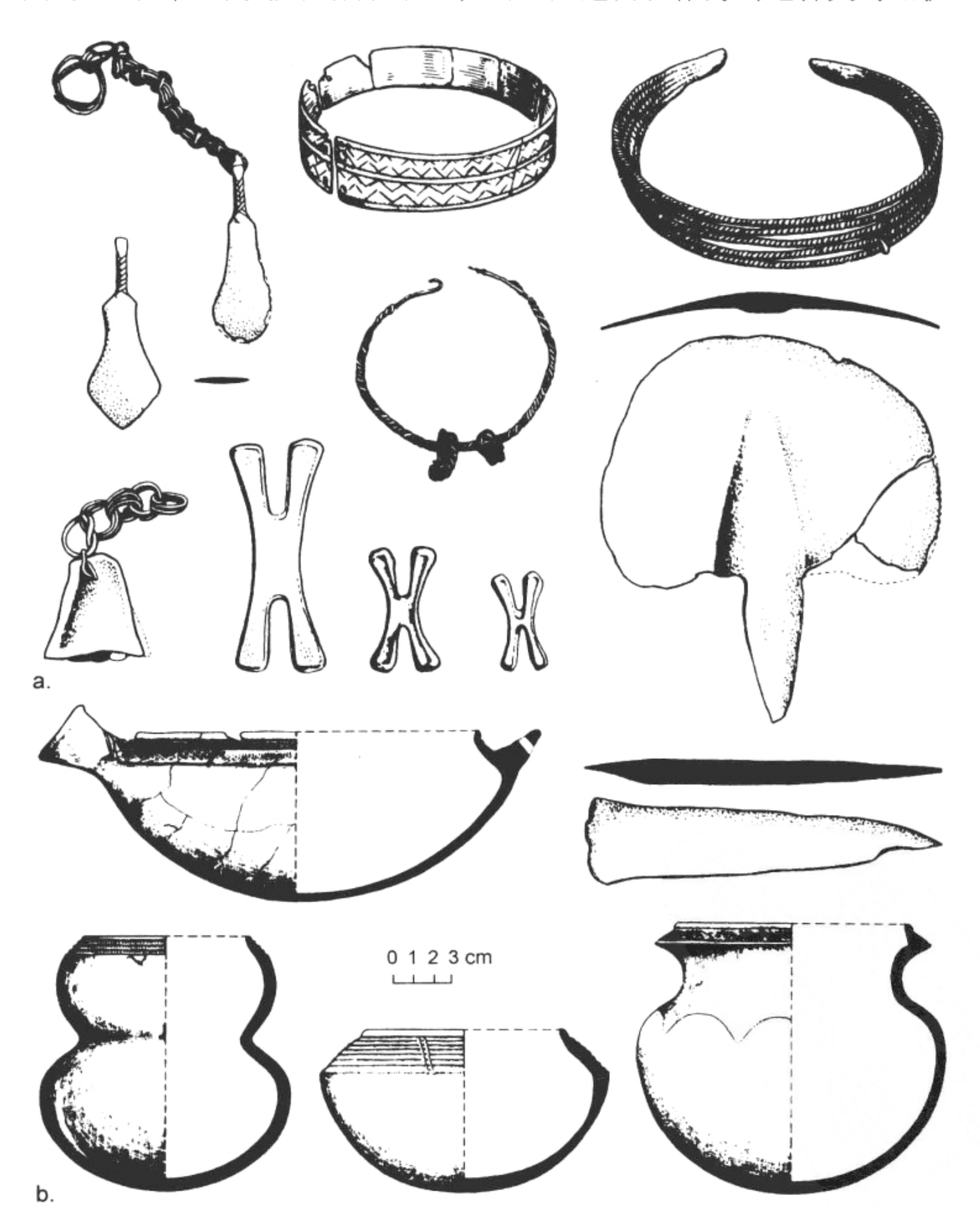
西宾达王朝强化了政府的中央集权,并在基萨尔湖西部将王国的领地扩展了。王国的中央宫廷由王室控制。国王任命地方总督,这些总督常常来自王室家族,他们从地方酋长和首领那里收取贡品。卢巴国王只有一小支常规军,但这支军队得到了国王强有力的神秘主义力量和宗教权威的支持。宫廷内部也存在争夺权力的大家族竞争。15世纪50年代,来自王室家族内部的心存不满的竞争者脱离了出去,在西部,即开赛(Kasai)河上游支流两岸的隆达人(Lunda)中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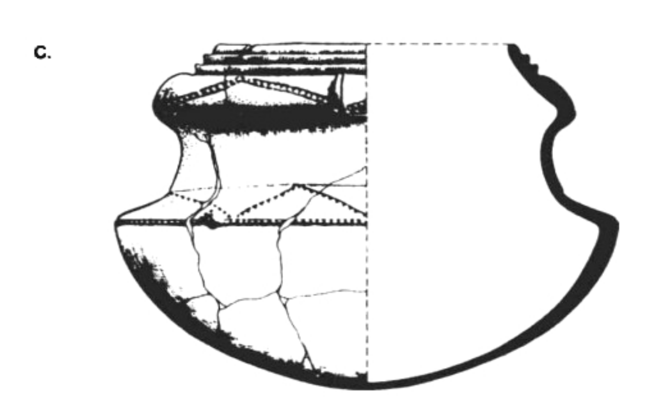
卢巴帝国的起源

虽然此时的隆达人有一个地位较高的酋长,但并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化的酋长制度。迁到这里来的卢巴王室通过与该酋长家族联姻,将他们的地位合法化。在隆达的口头传说中,这种合法化的塑造者是娶了隆达女酋长鲁维姬(Rweej,也作Lueji)的奇班达·西宾达(Chibunda Ilunga)。这场婚姻的后代建立了一个新的隆达王朝,该王朝在16世纪的名称为莫旺特·雅夫(Mwaant Yaav)或姆瓦塔·雅姆弗(Mwata Yamvo,即"毒蛇领主")。为此,他们将松散的、分散的隆达酋邦合并为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化的和扩张型帝国。隆达帝国主要的发展和强盛时期是17、18世纪,但是该国在1600年前就为此奠定了基础。

15 世纪的隆达人口密度远远小于卢巴。他们居住在众多的小型村落里，从事着农业、渔业、狩猎和贸易。迁入此地的少量卢巴王室人员将晚期铁器时代的更高级技术带入了该地区。卢巴人中央集权化的宗教王权思想很适应当地的环境，因此为后来的领土扩张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隆达宗教活动得到了尊重，且隆达酋长作为当地神灵的监护

140





a. 乌彭巴出土的带有基萨尔典型特征的铁器与铜器；b. 和 c. 乌彭巴裂谷（沙巴）出土的基萨尔早期陶器。

者和“土地的所有者”得以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作为回报，他们必须向新建的中央集权化的隆达国王纳贡，同时他们也被赋予宫廷顾问的地位。国王通过任命“基洛尔”(cilool)或“基洛洛”(kilolo)作为王室的“顾问”和每个地方酋邦的收税官，保持着对隆达酋长们的控制，并使他们向国王效忠。

隆达权力的扩张

从统一的隆达王国建国早期开始，王权的王室竞争者就脱离了出去，在南部和西部民族那里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王朝。位于当今赞比亚西部的赞比西河上游卢埃纳(Luena)和卢亚尼(Luyani)之间的君主，被认为与隆达人有渊源。一个较为重要的隆达“分散区”产生了肯古里(kinguri)的王权称号。在口头传说中，最早的肯古里被认为是隆达女酋长鲁维姬的兄弟。他在今天安哥拉中部高原上建立了一个狩猎和掠夺型国家。该国并没有取代和利用已存生活方式的企图，周边村落通过精心准备的准入仪式被整合到这个新国家里。到 1550 年，这个军事型国家的统治者被赋予卡桑杰(Kasanje)的称号，其国人被称为因班加拉人(Imbangala)。

安哥拉中部和南部的民族

与此同时，今天安哥拉说姆邦杜语的民族，也沿着与卢巴和隆达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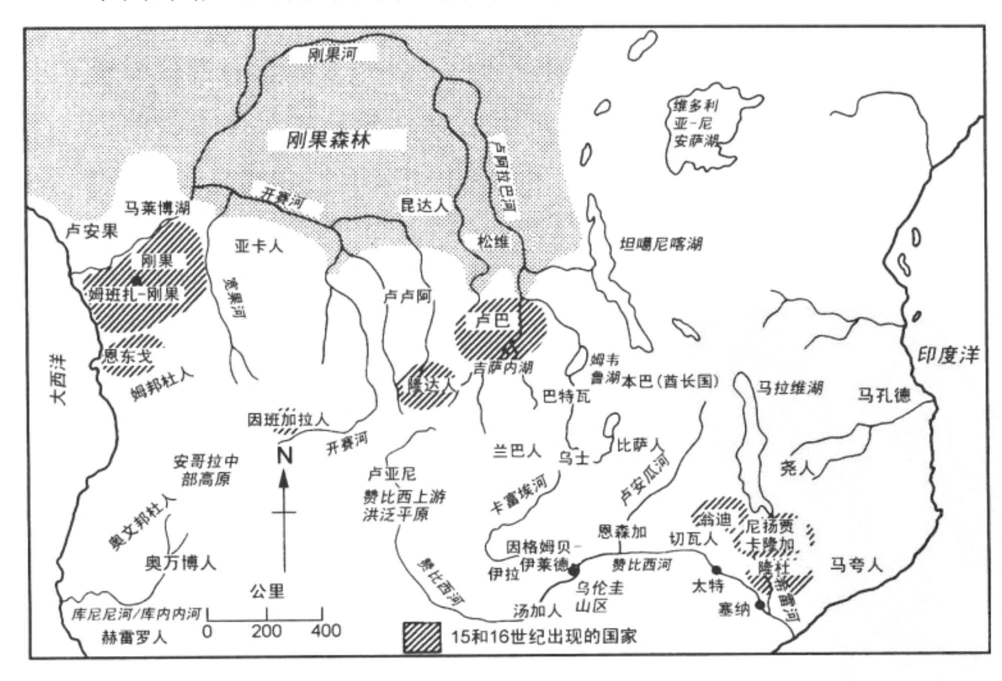
似的宗教模式发展出酋长制和王权制度。说姆邦杜语的主要民族为恩东戈人(Ndongo)、彭德人(Pende)和利波洛人(Libolo)。14 世纪初,他们的求雨神殿监护者担任了酋长,并因为其服务而让他们抽取一部分纳贡。在众多恩东戈村落中,神殿的监护者据说也具有重要的金属加工技术。他们使用恩戈拉(Ngola)的称号。可能正是他们将晚期铁器时代的新技术首先引入到该地区。无论他们权力来源是什么,他们动用这种权力将恩东戈酋邦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到 1500 年,恩戈拉库卢安杰(Ngola Kuluanje)统治着恩东戈。

除了 15 世纪前有奥文邦杜人(Ovimbundu)和奥万博人(Ovambo)在安哥拉中部高原的南面斜坡上从事混合型农业外,我们对更南部的民族知之甚少。再向南,与今天纳米比亚交界,但仍然处在干燥草原地区的赫雷罗人(Herero)主要则是游牧民族。

142

刚果王国

中西部非洲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王国是刚果王国。刚果王国的



地图 10.1 晚期铁器时代的中南非。

起源可以追溯到刚果河下游马莱博湖(Malebo Pool)正北部一群繁荣的小型农庄。这个地方和卢阿拉巴河上游的基萨尔湖地区一样,是一个特别有利于晚期铁器时代技术和生活方式出现的地区:盈余粮食的出现、制作工艺的提高和贸易的发展。森林边缘地带、草原林地土壤肥沃,雨量充沛。这里也是铜矿、铁矿和食盐的来源地,距离上也比较便于贸易。刚果河及其支流促进了渔业的发展。此外,马莱博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中心。它位于刚果河下游急流的上部,有着数千公里的水路运输线,一直延伸到刚果河的上游。

在 14 世纪开始的头几年,巴刚果(Bakongo)村落已经延展到刚果河下游南部肥沃的高地上。由于基本上都是农民,所以他们在神殿的宗教活动集中于"土地神"上。这些神殿的监护者被称为玛尼·卡班加(mani kabunga)。1400 年,刚果河南部的巴刚果村落已经松散地组成了一个单一王国,都城在姆班扎-刚果(Mbanza Kongo)。国王有个称号叫玛尼刚果(Manikongo)。巴刚果的艺术与手工艺高度发达。他们是技艺高超的金属加工者、陶工和编织者。他们用酒椰棕榈纤维做成的精良布匹,畅销至大西洋沿岸地区,并从那里换回食盐和用作当地通货的海贝。刚果国王所执行的赋税体系促进了地区内的贸易发展。在 16 世纪开始的头几年,玛尼刚果统治的区域从西部的大西洋沿岸横跨到东部的宽果河(Kwango river)。

143

由于贸易所带来的对奴隶需求的提高,葡萄牙人于 15 世纪 80 年代来到刚果王国,刚果王国自身的发展也因此中断了。这一中断的后果将在第十四章加以讨论。

晚期铁器时代的民族:赞比亚东部和马拉维

从赞比亚中部到马拉维湖,中东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似乎属于一个单独的晚期铁器时代文化,这从他们的陶器具有卢安瓜(Luangwa)文化就可以看出。这一文化在 1000—1200 年期间似乎传播得非常快。铁器得到更广泛的使用,特别是为了种植而用来清理林地的铁斧。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养牛。搜寻象牙、铜器制作和贸易业变得重要了起来。

虽然卢安瓜文化的起源和起源地依然不清楚，但是这些晚期铁器时代民族与今天的本巴人(Bemba)、比萨人(Bisa)和切瓦人有着明显的文化联系。

在马拉维的中部和南部，酋长是在宗教崇拜中出现的。酋长是“土地神”，特别是负责雨水和土壤肥力神灵的监护者。1400年左右，菲里(Phiri)氏族由于与当地班达(Banda)氏族通婚，在马拉维湖正南方的尼扬贾(Nyanja)诸酋长中获得了优势地位。他们获得了卡隆加(Kalonga)的称号。在口头传说中，菲里氏族的宗教王权最初来源于卢巴人。我们并不确定他们是否是从卢巴之地直接移民过来的。

16世纪，卡隆加王朝的旁支在希雷河(Shire)流域曼甘加人(Manganja)中间建立了隆杜(Lundu)王朝，在希雷河和赞比西河之间的切瓦人中间建立了翁迪(Undi)王朝。火在菲里氏族的宗教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卡隆加、隆杜和翁迪王国的民族统称为“马拉维人”，意思是“火的民族”。该地区是搜寻象牙的密集地，控制着沿希雷河、赞比西河到印度洋沿岸的象牙贸易，象牙贸易可能是早期马拉维王权的一个重要基础。17世纪的卡隆加国王肯定也控制了象牙贸易，我们将在第十四章讨论这部分内容。

因格姆贝-伊莱德

因格姆贝-伊莱德(Ingombe Ilede，即“牛群之所”)，位于卡富埃河(Kafue)和赞比西河汇集处附近，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在1400—1500年期间，先是繁荣之所，后来又遭到遗弃。此处有少量富裕的农民、狩猎者、商人和手工艺人。他们的陶器与当地通加人(Tonga)的陶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一种薄薄的、造型优美、装饰精美的陶器，用石墨抛过光。这种陶器类型可能是卢安瓜文化的一个分支。因格姆贝-伊莱德人更早的起源地和古卢巴之地富裕的基萨尔地区可能有联系。该遗址墓地的证据显示，具有相当大财富的人控制着因格姆贝-伊莱德地区，他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是通过贸易积攒下来的。

在因格姆贝-伊莱德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贸易，部分得益于其在赞

比西河流域中的优越位置,也得益于他们物品的制作技巧。有证据显示,此地存在过棉花编织、象牙雕刻和金属加工业,金属加工的对象主要是铜器,也有铁器和黄金加工。棉布用来贸易和包裹尸体。铜被铸造成十字形的铜块,可能是作为一种贸易通币。铜也被加工成镯子和精丝。黄金被加工成金珠和手镯。铜、黄金的主要来源地是位于津巴布韦高原北部边缘的乌伦圭(Urungwe)地区与赞比西河的南部。

因格姆贝-伊莱德虽然是当地金属、布匹、狩猎产品和粮食贸易的重要中心,但其贸易财富来源与东非沿海有着密切的关系。15 世纪正是斯瓦希里商人进入赞比西河流域寻找更多黄金、象牙和铜的来源地的时期。我们不清楚他们沿着赞比西河向上到达多远的地方,但因格姆贝-伊莱德与东非沿海地区之间,肯定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事实上,与东非沿海地区间的长途贸易可能是因格姆贝-伊莱德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该地区在 15 世纪末遭到遗弃,可能是由于乌伦圭铜矿的枯竭和赞比西河流域的贸易转向正在崛起的穆胡姆塔巴帝国(Munhumutapa)。

赞比西河南部晚期铁器时代群落的出现

我们已经讨论过,晚期铁器时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牛,尤其是在赞比西河南部辽阔的草原地区。牛在早期国家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如采矿、金属制造、狩猎和贸易在财富增长和国家出现上也很重要,下文将进行讨论。

牛的重要性

首先,牛是一种有用的食物来源:牛奶和牛肉。除了富有人家或在特殊的场合外,人们并不经常吃牛肉,但牛肉可以在粮食短缺的时期用以充饥。牛也可以与邻近村落进行交易,用来换取粮食、铁器和其他必需物品。

第二,牛是财富和社会控制能力的重要资源。一般来说,晚期铁器时代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大,男人相对于女人来说地位更高。在养牛的社会里,情况更是如此。如果环境不错的话,低于 20 头牛的牛群

在单一的一个世代里可以自然增殖到数千头。这可以让人们积累起财富并将它遗留给后代。并且,男人决定着牛在社会中的使用。

牛也是聘礼的主要来源。拥有较多牛群的人可以负担起好几位妻子的彩礼。自从妇女成为土地的主要种植者,男人生产盈余粮食的能力就增加了。这些盈余粮食可以用来进行贸易,并供养一大家子及侍从。那些没有牛的人逐渐依赖于富人,他们为富人放牧牛群以换取牛奶或从富人那里借牛来支付聘礼。富有的牛群所有者因此控制了不断扩大的群落。就这样,牛为早期酋长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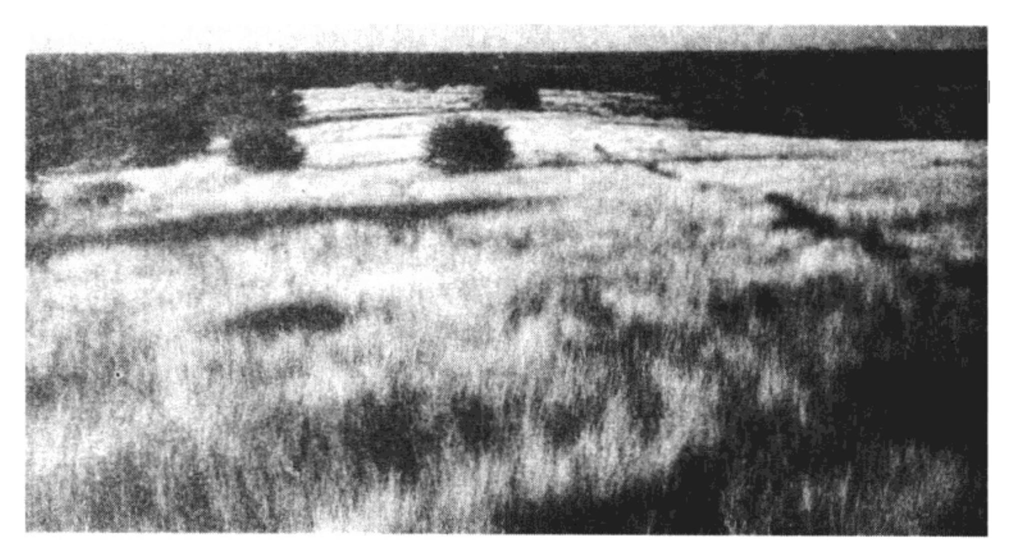
早期出现的另一个专门养牛的较为重要的地区,位于今天博茨瓦纳中部地区的东部,即林波波河和卡拉哈里河之间的地方。

博茨瓦纳东部的早期养牛群落

该地区干燥辽阔的草地得到泉水和季节性溪流的滋润,是养牛业快速发展的理想地。公元 650—1300 年期间,这里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山顶群落系统。考古学家以最大的一个遗址——图兹维姆加拉(Toutswemogala)将它命名为“图兹维文化”。

平顶的大山上修建了诸多圆形土木茅草屋,这些房屋将中间围成闭合的场地,牛群在夜里就关在这里面。人们选择就山而居,最初可能是为了防御野兽。山居也使得牛群所有者得以控制周边的地区。该地区主要控制在三个可能会发展成酋邦的、大型的山顶群落手里。每一个群落都由大量较小的山顶村落包围起来,但牛群所有者和种植者居住在山谷中。山顶居民的财富可以通过他们日常食用牛肉而不是狩猎得来的肉类表现出来。铁器是从南部盛产铁器的茨瓦蓬山(Tswapong)进口而来的,那里的专业炼铁者从事铁器加工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期了。其他的贸易联系要更远一点,如玻璃珠是从印度洋上间接进口来的。

约 1300 年,图维兹遗址遭到遗弃。这是由于一段时期持续的干旱造成的,也可能是该地区遭到长期的过度放牧造成的。然而,此时在这里形成的养牛生活方式可能已经影响到他们在其他地区的适应能力。虽然可能发生过大规模的迁徙,但是人们并没有发现此类迁徙的证据。



挖凿前的妥崔莫哈拉山(博茨瓦纳东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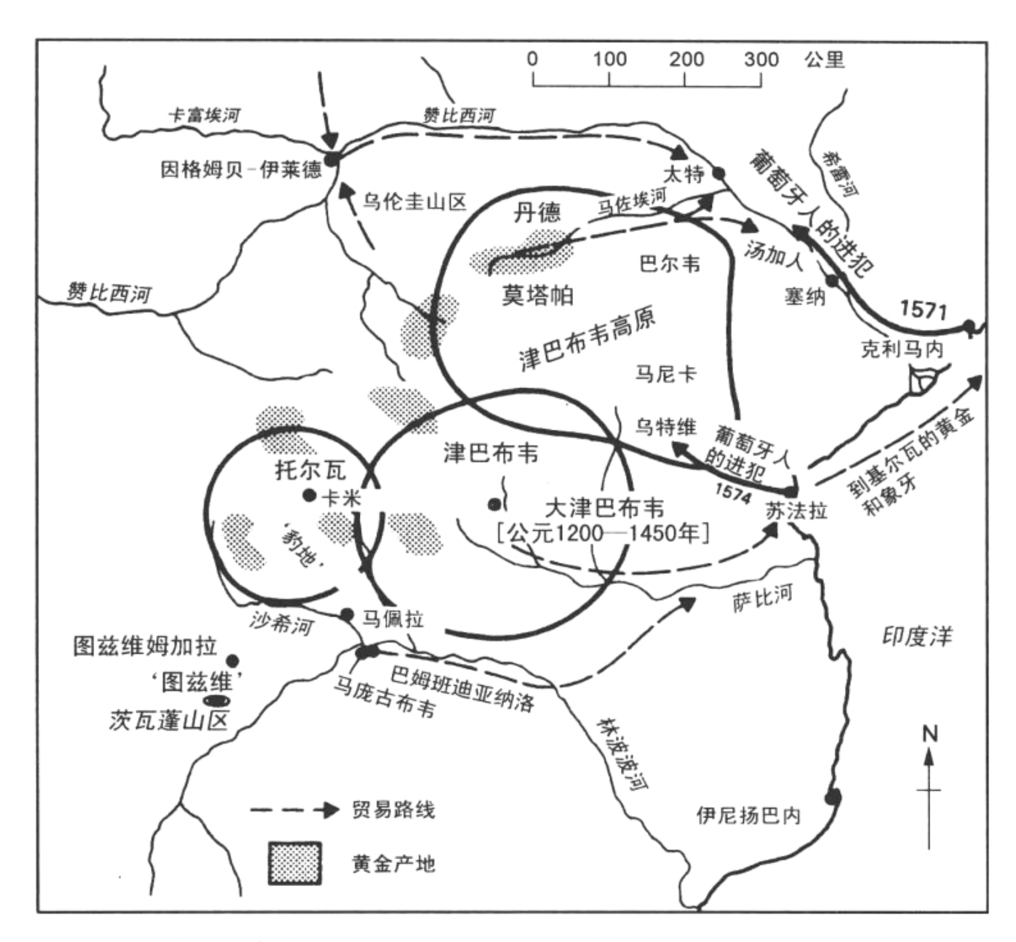
由于牧场破坏造成牛群的大量减少,图维兹人同样也可能转向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或者变得依赖于其他养牛群落。在更东边的湿润草地上出现了好几个这样的群落。

养牛、农业和贸易的发展:豹地、巴姆班迪亚纳洛和马庞古布韦

146

约10世纪前的津巴布韦高原上,在今天布拉瓦约(Bulawayo)地区附近出现了一个晚期铁器时代的养牛文化。这个文化以所发现的第一个遗址——豹地(Leopard's Kopje)来命名。与图兹维人居住地区的降雨量相比,豹地的降雨量要稍微大一点,也比较便于形成一种养牛和种植相混合的经济。尤其他们发展出梯田耕作法(terracing),把高原南部山坡的山腰做成阶地,避免了肥沃土壤的流失。马佩拉(Mapela)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12世纪,整个山腰都被用来居住、防御和种植的干燥石墙构造成阶地。这些群落较为繁荣,生产上有盈余并从事长途贸易。

豹地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黄金开采的出现。西部高原富产金矿。10—18世纪,铁器时代的矿工在这里扎堆劳作。小矿井一旦深达30米或更深,就会出现裂缝或者到达地下水层,也就不能用了。使用水火



地图 10.2 赞比西河南部的晚期铁器时代的国家，公元 900—1600 年。

可以使矿石裂开，然后再用铁楔将它打碎。人们通常让身体纤细的女孩子来挖矿井，并让她们敲碎矿石。在长期废弃的小矿井底部，发现了大量的女孩遗骸。矿石一旦被带到地面就会被碾碎，就着附近流动的溪水，黄金就会暴露出来。人们对这些采矿劳力的结构和管理知道的并不多，但在这里面可能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强迫。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前面章节中所论述的那样，黄金的生产和贸易为那些控制它们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财富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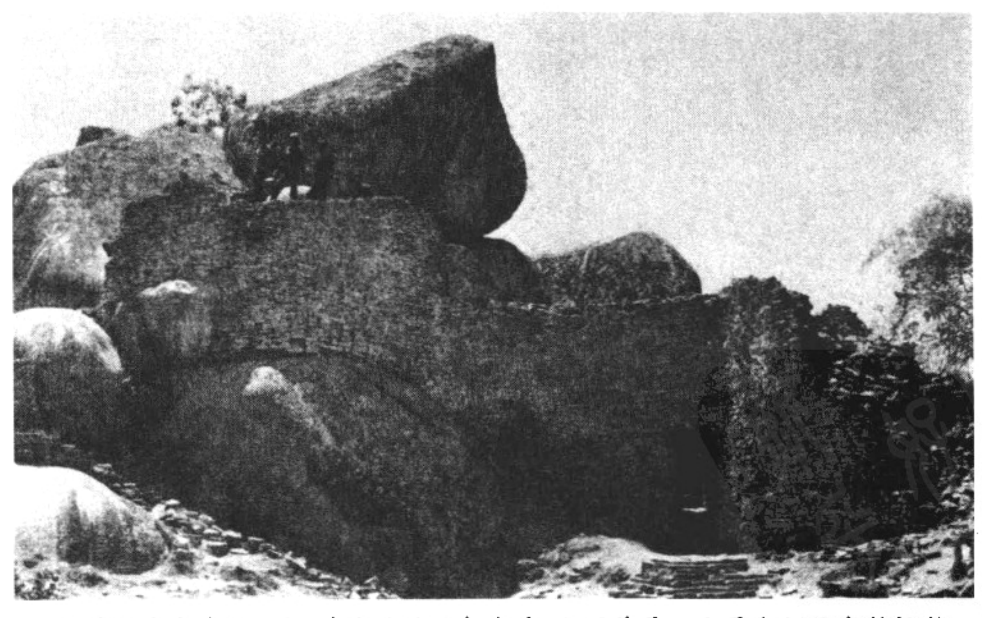
147

随着沙希河-林波波河交汇处南边马庞古布韦(Mapungubwe)的出现，津巴布韦西部的早期豹地文化进入鼎盛时期。这个群落一开始，也就是在 10 世纪，位于巴姆班迪亚纳洛，但到 1100 年，就已经扩展到

了马庞古布韦山附近。该群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养牛群落，其内部的富有统治阶层和贫穷下等人之间有着严重的分化对立。富有阶层居住在山顶上的黏土房屋里，他们的居所位于中央的牛围场(cattle enclosure)周围。搜寻象牙、采矿和贸易对马庞古布韦的统治者来说也非常重要。马庞古布韦成为长途贸易发展的重地。林波波河流域里的象比较多，人们在当地开采铜矿并经高原把黄金运送到北部地区。林波波河流域本身也是通向东非沿海地区的便利路线。向东运送的主要出口产品是象牙和黄金，换来的是玻璃、贝珠和色彩绚丽的印度布匹。统治者也进口少量精细的中国青瓷(绿釉瓷器)。1300年后，马庞古布韦衰落了下来，这让大津巴布韦有所得益。对于养牛、种植和长途贸易的发展来说，大津巴布韦的地理位置更具有优势。

大津巴布韦文化的起源与特征

今天的津巴布韦共和国的名称是以“大津巴布韦”的石头城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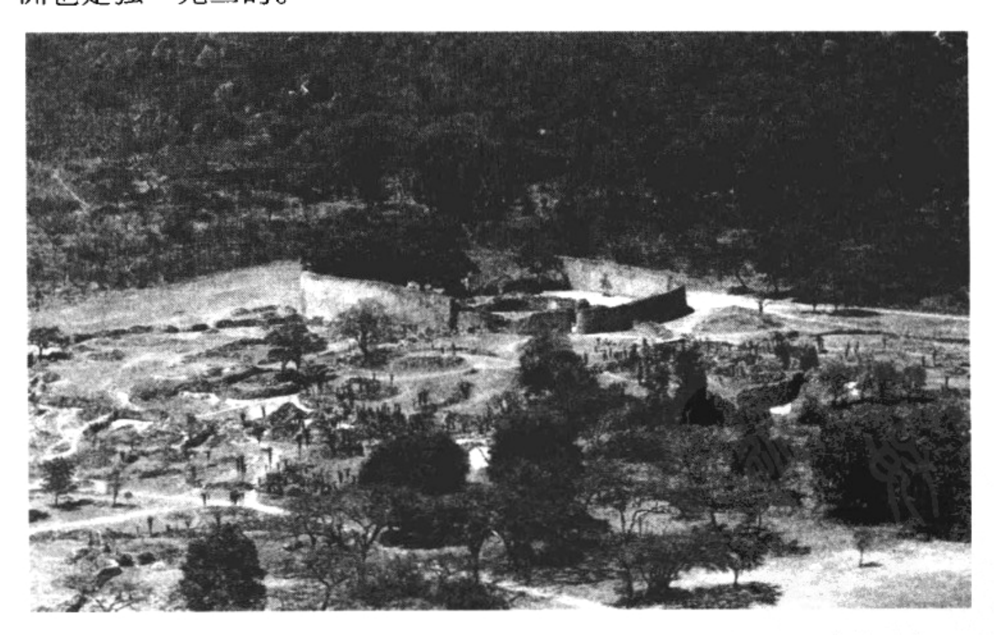


大津巴布韦遗址　A. 在成为政治都城前，山顶曾是一个早期绍纳宗教场所。随着1200年之后政治权力的崛起，山顶周围修建起石头围墙。数世纪的风化将花岗岩山磨成平板石，如同洋葱皮一般。这些平板石成为巨砾间的断层，进而成为一组组石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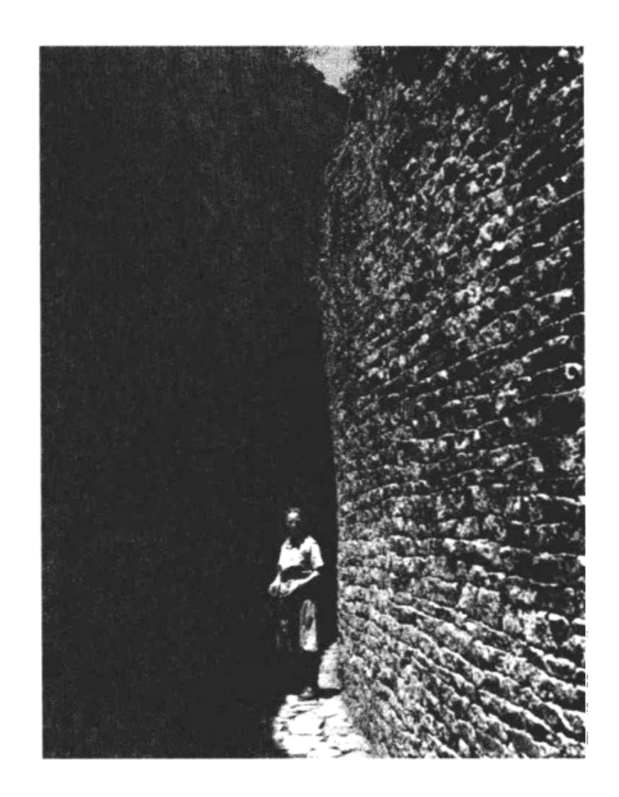
的，大津巴布韦于500多年前遭到遗弃，其遗址至今依然存在。这些石头城最初是在1200—1450年期间，由今天津巴布韦共和国的绍纳人(Shona)在晚期铁器时代的祖先修建的。大津巴布韦是由豹地和马庞古布韦民族所带来的晚期铁器时代文化的进一步扩展。大津巴布韦本身是庞大、繁荣的早期绍纳国的中心或首府。“津巴布韦”这个词(Zimbabwe，复数为mazimbabwe)来自绍纳词dzimba dzamabwe，其意思是“石头建筑”。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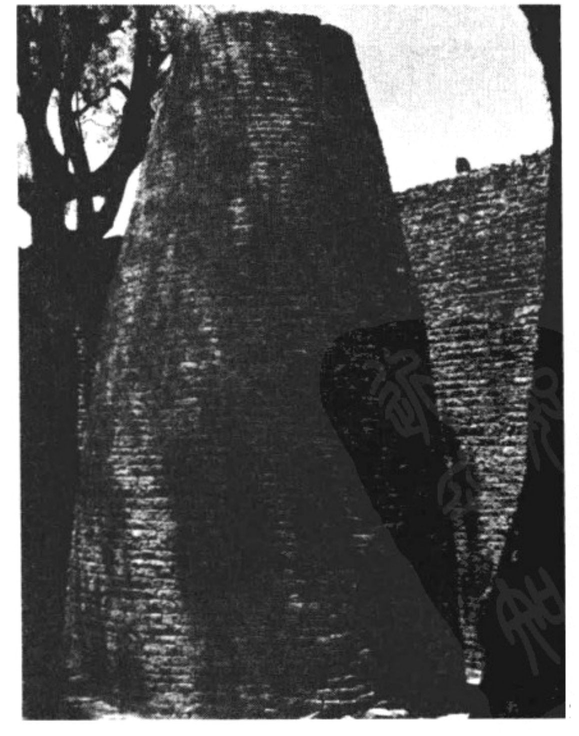
在南部非洲晚期铁器时代的养牛民族中，使用干燥石墙作为牛围栏且环绕在富人居所的周围并不少见。大津巴布韦特殊的地方在于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它一开始是在山顶，后来即14世纪早期开始在河谷地区发展。到15世纪，大津巴布韦的石匠将他们的手艺发展为一种精致的工艺。河谷中10米高的大围栏展现了早期绍纳最精致的石雕艺术。这里出现的筑墙技术——这么高的墙而没有用灰浆，在整个非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大津巴布韦遗址　B. 到14世纪，干燥石墙的技术更为精细，雄伟的王室围墙开始在河谷中修建起来——此处的场景是从山顶上以中等距离所看到的场景。14世纪，整片河谷地区的灌木丛被进一步清理干净，并建有小型石头围墙和圆形的茅草泥屋。



大津巴布韦遗址　C. 王室围城在原先的环形围墙(右)之后又修筑了更大型的围墙(左),留下了一个狭窄的通道,觐见者只有通过这个通道才可以面见国王。



大津巴布韦遗址　D. 在复杂的王室围城中央矗立着一个坚固的圆形建筑,想必是个储存谷物的仓库,可能也有宗教或政治上的象征意含。

148 山顶上的石头建筑最初可能是为了防御,或者是为了震慑远方来的潜在敌人。但是,后期在河谷修建的精致围墙不可能是为了防御。这些围墙环绕在国家统治者黏土居所的周围,既高又结实,但是要爬到墙顶来抵御进攻者也不容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津巴布韦围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调和提升国王的神秘性、权力和声望。

之所以将大津巴布韦作为首府,是因为它在津巴布韦高原东南边缘的有利位置。牛对津巴布韦早期的经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大津巴布韦有着各种高、低地的季节性牧场。猎物也分布广泛,尤其是可以获取象牙的大象。此外,这里还有大量木材可以用作柴火和建筑材料,也有水源充足的肥沃土壤用来耕作。大津巴布韦权力和财富的最重要来源是首府在贸易上的战略地位。大津巴布韦矗立在萨比河(Sabi)的源头,是开发西部平原黄金产地和开展苏法拉与斯瓦希里沿海地区之间150 长途贸易的理想位置。大津巴布韦的兴起与基尔瓦的崛起发生在同一时期并不是巧合。正是大津巴布韦给斯瓦希里的基尔瓦供应黄金和象

大津巴布韦遗址　E. 王室围城最外层围墙顶上带有波浪形状的修饰。在大津巴布韦于1450年遭到废弃后,这种修饰成为卡米河西部都城的典型特征。大津巴布韦山顶一直到19世纪末都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场所。

牙,才让基尔瓦得以成为1300—1450年间最为富有的城镇。

大津巴布韦的崛起

大津巴布韦国最开始可能是养牛和农业民族的一个繁荣中心,牛的所有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在12—13世纪期间,西部高原与沿海间很多的长途贸易都经过大津巴布韦都城转运出去。对这种贸易征收的税赋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上贡给当地绍纳酋长的象牙、黄金和粮食。有了这些财富,大津巴布韦的统治者可以奖励其支持者,养活其侍从,并因此增加其权力。

14世纪,都城修建的精致石头围墙拓展到了河谷地区。国王的主要居住地或"宫殿"就在大围墙内。在这里,国王及其宫廷相当奢侈,到处都镶嵌着黄金、铜饰品和珍宝,吃喝用的碟子是波斯和中国制造的精美的舶来品。同时,类似的小型"石头城"(madzimbabwe)遍及东部高原的广大区域,可能是作为地方管理中心。大津巴布韦本身不仅仅是贸易中心,而且也是手工制造业的中心。都城里常驻的手工艺者将黄金和铜加工成精美的珍宝,并将进口来的铁锻造成各种各样的工具。有证据显示,该地区大部分织布用的棉花都是当地种植的。即使如此,富人们依然从沿海地区进口色彩绚丽的印度棉布。

大津巴布韦的遗弃

大约在1450年,大津巴布韦遭到了遗弃。此时该地区的农耕、放牧和木材资源都已耗尽。口头传说还指出此地出现了食盐短缺。定居地的迁移是晚期铁器时代的一个常见特征,因为农业用地需要恢复肥力。到15世纪,大津巴布韦也到了这一关键阶段。据估计,15世纪早期,住在大津巴布韦"城"及其周边的人口多达1.1万人。到了1450年,该地区再也不能养活他们了。与此同时,该地区长途贸易的主要重镇也向北迁移到赞比西河流域。我们已经叙述过的因格姆贝-伊莱德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突然兴盛了起来。紧接着马佐埃(Mazoe)河源头的莫塔帕王国(Mutapa)也崛起了。

151

托尔瓦国

大津巴布韦最直接的继承者是托尔瓦(Torwa)王国,该王国是这一时期在豹地地区的古如斯瓦(Guruuswa,也作布图阿[Butua])建立起来的。它的都城卡米(Khami)可能是由大津巴布韦的移民修建而成。在这里,大津巴布韦的石墙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人们将山地修建成台阶形状,并用仔细打磨过的石头精心地垒砌成干石墙。该地区不但是西部高原上的黄金产地,而且也是特别适宜放牧大量牛群之所。这为 17、18 世纪昌加米尔(Changamire)的罗兹韦(Rozvi)王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莫塔帕国的发展

根据绍纳人的口头传说,莫塔帕国是由大津巴布韦派出的向北寻找新食盐来源地的尼亚兹姆贝·穆托塔(Nyatsimbe Mutota)建立的。这一派遣行动大约发生在 1420 年。穆托塔在马佐埃河源头附近的丹德(Dande)地区的绍纳北部定居了下来。很显然,这个地方是建立一个大津巴布韦的替代国的理想之所。该地土地肥沃,雨量丰富,也有大量用以居住的林地。此外,马佐埃河还可以通往赞比西和斯瓦希里贸易点塞纳(Sena)与太特(Tete),这两个贸易点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斯瓦希里人最初可能是为了铜和象牙才深入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的,这些铜和象牙是从因格姆贝-伊莱德内陆贸易城镇沿着河流运送下来。

穆托塔和他的儿子及继承者马托佩(Matope)很快就利用绍纳北部有利的贸易位置。他们用人数少但强有力的军队控制了该地区。穆托塔及其继承者们采用姆恩胡姆塔帕(Munhumutapa,也作 Mwene Mutapa)的称号,该称号的意思是"征服者"或"胜利的掠夺者"(Master-pillager),可以将此称号视为他们与其臣民之间关系的某种表征。因格姆贝-伊莱德未能发展壮大就过早地衰落了下来。15 世纪 50 年代,穆托塔从大津巴布韦夺取了因格姆贝-伊莱德,并将其作为内

地高原地区的地方性的绍纳王国。在15世纪80年代马托佩统治末期，被姆恩胡姆塔帕要求上缴贡品的地区向东延展到沿海低地，包括乌特维、巴维(Barwe)和马尼卡(Manyika)等王国。

莫塔帕王国与其前身大津巴布韦有着很多重要的差异。莫塔帕的统治者是作为外来者进入的，并且动用军队来维持对臣民的控制。这也保证了当地村落中的牧民向他们定期缴纳贡品。绍纳北部没有石建文化，姆恩胡姆塔帕的"津巴布韦"是用黏土和木头做成的房子，并围有木栅栏。而且，大津巴布韦统治者从西部进口黄金，而莫塔帕的统治者拥有属于自己的黄金。马佐埃地区具有宝贵的沙金资源，贯穿北部高原的含金岩石的溪流很便于沙金的冲洗。金矿区的农民要提供一定量的定期劳动，为国王开采黄金。大部分黄金被用来与沿海地区进行外贸，以便为统治者换取牲畜、染色布匹和其他奢侈品。 152



20世纪早期津巴布韦的绍纳女孩，她们带着某种进行过装饰的手镯、脚镯，并穿着有念珠的皮裙。这种装扮在晚期铁器时代可能较为常见。

莫塔帕国与葡萄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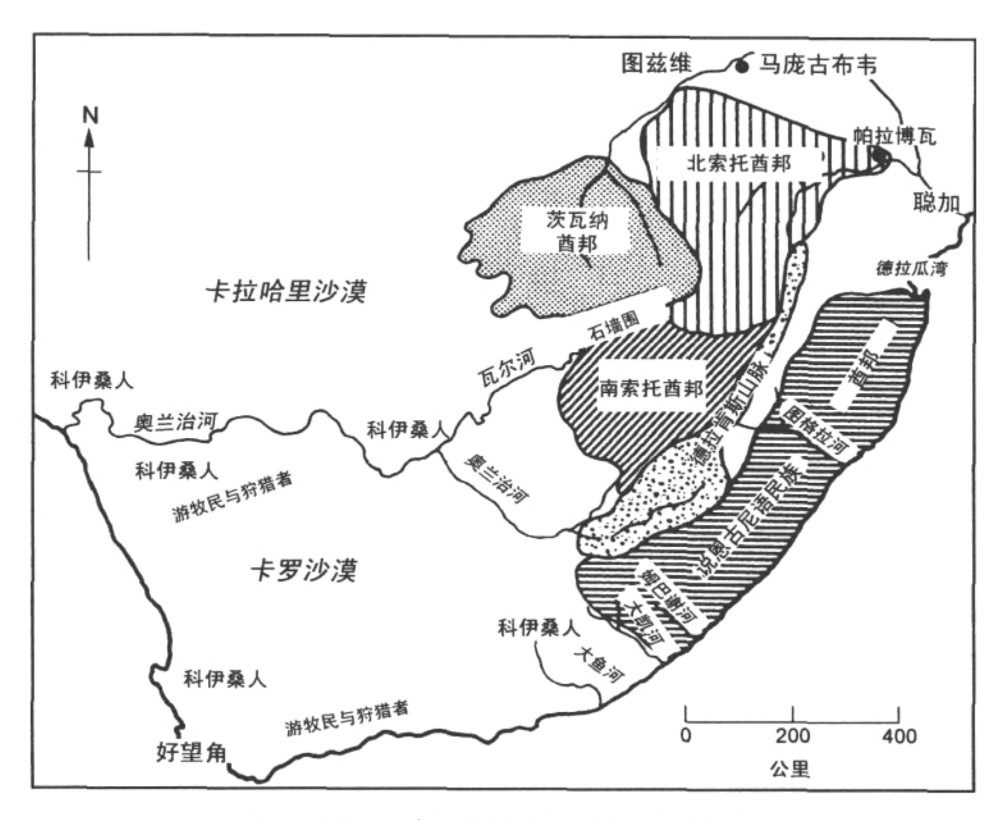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论述过，葡萄牙人来到西印度洋的时候，他们试图通过在苏法拉和莫桑比克建立要塞来控制斯瓦希里的黄金贸易。但在此时，津巴布韦的黄金出口已经从萨比河流域和苏法拉转移到了马佐埃河和赞比西河流域。斯瓦希里正是从这里巧妙地避开了葡萄牙人的控制，将他们的贸易转到了自己的安戈谢(Angoche)海港。葡萄牙人对此作出了反应。他们在16世纪30年代派遣出一小支军队沿着赞比西河直上，夺取了斯瓦希里的贸易点塞纳和太特。正是从这两个地方，葡萄牙人与姆恩胡姆塔帕宫廷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将赞比西河流域的贸易转到了他们自己的要塞城镇莫桑比克。

葡萄牙人最初准备向姆恩胡姆塔帕进贡，以换取其领地的贸易准入。但是，他们只被允许合法地买入少量黄金。受此限制，他们决定直接控制姆恩胡姆塔帕，并由他们自己进行黄金开采。在试图将姆恩胡姆塔帕改宗基督教信仰的努力失败后，葡萄牙人在1571年发动了全面入侵。但是侵略军从来没有离开过赞比西河流域，由于受到干旱、疾病和当地汤加人(Tonga)的有组织反抗，侵略军被击败了。另一次发生在1574年的侵略成功地迫使乌特维统治者同意向苏法拉的葡萄牙人进贡。但是，莫塔帕王国依然处在葡萄牙人的控制之外。直到16世纪末，莫塔帕国依然是东部高原重要的独立国家。

153

林波波河南部地区的养牛民族

随着林地的清理，更多高地草原可以定期使用，林波波河南部地区的养牛业出现了扩展。随着11—14世纪晚期铁器时代的发展，该地区渐渐地出现了多个酋邦。我们已经在图维兹文化中发现，牛通常为酋长制奠定了物质基础。拥有大量牛群的富裕部族在大量依赖者之上建立了世袭统治(或王朝)。酋长在精神上的地位建立在首领与先祖之间的联系之上。酋长主要是氏族的奠基者，即某一时期带有神秘色彩的英雄的备受尊敬的后裔来担任。酋长的地位实际上通常是按照求雨能



地图 10.3　晚期铁器时代林波波河南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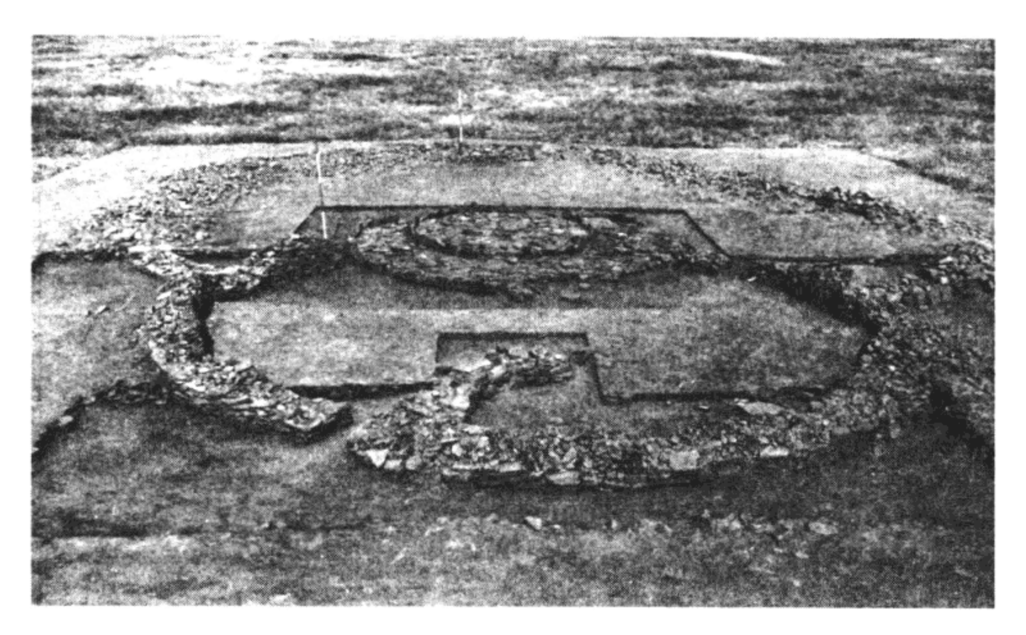
力来确定的。

今天南部非洲高地草原的索托-茨瓦纳人(Sotho-Tswana)古代酋长世袭制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高地草原北部和瓦尔河(Vaal)南部地区发现的大量石建围墙和石建房基,都是他们定居地的痕迹。一些房基和 19 世纪早期欧洲旅行者发现的南部茨瓦纳房屋建筑有着惊人的相似。

154

在瓦尔河西北的干燥高地草原上,早期的博茨瓦纳世系在拥有数千人口的中央城镇基础上形成了相当大的酋邦。这样的人口密度可能与有限的水源相关。当这些酋邦变得太大或遭受到继承纠纷困扰,它们就开始出现分裂和细化。富有的竞争者带领着他们的支持者和依赖者离开,建立新酋邦,并再一次开始新的历史进程。

德拉肯斯山脉的东南部雨量较大,环境更加多样。在任何一个小的区域,都有着大量的山地、适合放牧的河谷、林地和耕地。因此,酋邦



晚期铁器时代常见的索托-茨瓦纳人居所的石基。

要小得多,定居点也更加紧凑。在这里,今天说恩古尼语(Nguni)的民族建立了大量的小酋邦,遍及从大凯河到蓬戈拉河(Pongolo)流域的区域。恩古尼语是班图语系南部一个支系的名称,并没有“恩古尼语言”或“恩古尼人”这么一说。它只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出于便利而使用的一个当代名词,用来指在语言上有着联系的西南高地草原民族。这样,他们就可以与高地草原上的索托-茨瓦纳人区别开来。这些酋邦通常很小,只是在更高一级部族首领统治下的几个大家族宅地的组合体。这里的情况和之前一样。当人口增加,出现统治权的纷争,酋邦就会出现分裂,竞争者就会离开并建立新的定居点。索托-茨瓦纳人的情况也一样。虽然他们是农民、金属加工者、手工艺者和商人,但他们的主要物质财富来源是大量肥壮的牛群。1593 年,由于船只遇险而登陆到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葡萄牙船员清晰地记录了这一点。他从姆巴谢河(Mbashe)到德拉瓜湾(Delagoa),安全地旅行了整个地区,并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民族:

这些人是畜牧民和农民……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是稷,他们用

两块石头或木臼将之碾磨成粉,然后再用燃屑烘烤成蛋糕。他们用同样的谷物加上很多水后,在黏土瓦罐中经过发酵、冷却、变酸而制造出啤酒。他们非常喜欢喝酒。他们的牛肉较多,肥腻、柔嫩、可口且块头很大,牧场也非常肥沃。他们的财富主要是大量无角牛。他们也依靠牛奶和从中提取的黄油来生活。他们一起居住在小型的村落里,所住的房屋是用芦席做成的,但并不能避雨……这些人的衣服主要是小牛皮做成的外衣,涂过油脂小牛皮变得柔软了许多。他们的脚上穿的是用两、三层生皮在圆形模具上加固、用皮带捆扎在脚上的皮鞋,穿着这样的鞋,他们能以非常快的速度奔跑。

155

——摘自 C. R. Boxer(ed.),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1589 - 1622*, CUP, Cambridge, 1959, pp. 121 - 122

在晚期铁器时代酋邦扩展的进程中,说科伊桑语的狩猎-采集者和专业畜牧者逐渐地被同化了。南方恩古尼和索托语发音中带有典型的科伊桑语中的"咔哒"声就是这一进程的明证。但是,晚期铁器时代的农民没有将他们的定居点延展到夏季定期下雨的地区之外。因此,在大陆西南更加干燥的地区,科伊桑群落保留了他们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即使是在这里,他们也不是独立发展的。他们与说班图语的农民有着贸易往来,卖给这些农民绵羊、牛和狩猎产品,交换回铜、铁、大麻和烟草。科伊科伊(Khoikhoil)畜牧牛羊的部族在好望角最东南的冬季降雨草原上尤其繁荣。正是这一肉类资源吸引着欧洲人航行至此并展开征服活动,我们将在第十五章对此进行讨论。

第十一章　18 世纪前的北非与东北非

东北非的“阿拉伯化”

156　10—13 世纪期间，大量的被称为贝都因人（源于阿拉伯语 badawin，即“沙漠居民”）的阿拉伯游牧民，逐渐离开阿拉伯半岛，进入了北非。从阿拉伯的沙漠迁移出来并不是新现象。他们是流动性较大的群落，居住



贝都因人的沙漠帐篷，突尼斯，1935 年。

在骆驼皮帐营里，这些帐营便于拆卸和重建。他们经常处于流动中，骆驼和山羊也随之从一个牧场、水源地迁移到另一个。他们一般是以家族规模的小型部族来进行迁移的，但并没有广泛意义上的团结。有时，他们会侵扰定居的农业群落，但因此所受到的指责远远小于他们事实上所造成的混乱与干扰。虽然他们是穆斯林，但一般都没有读写能力。这可能是阿拉伯学者对他们持有的某种偏见。这些学者指责他们在马格里布对农村地区造成了大量的破坏。然而，他们毕竟传播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言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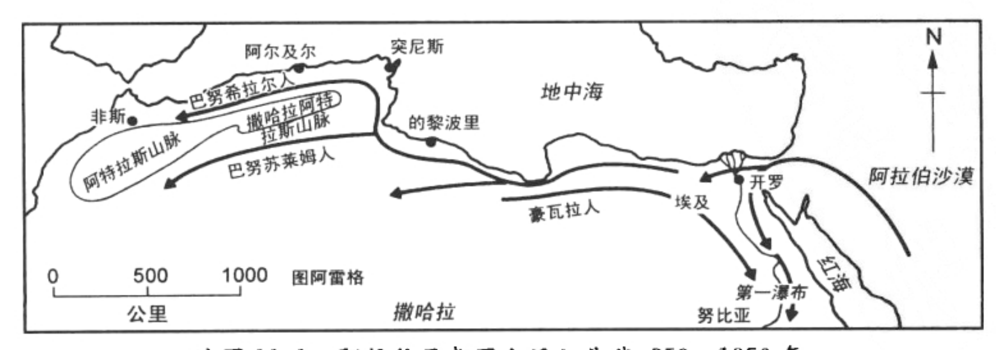
157

在 11 世纪 50 年代的十年间，大约有 25 万阿拉伯游牧民从埃及向西迁入马格里布。那些沿着北方沿海路线过来的牧民就是所谓的巴努希拉尔人(Banu Hilal)，巴努苏莱姆人(Banu Sulaym)则迁往内陆的阿特拉斯(Atlas)南部。后者同化了大量的柏柏尔人，不过柏柏尔人的语言在阿特拉斯山区、桑哈扎和撒哈拉的图阿雷格保存了下来。在 13、14 世纪，"阿拉伯化"的柏柏尔游牧民，即豪瓦拉人(Hawwara)，从马格里布向东迁移到埃及，再沿着尼罗河流域向南推进到第一瀑布地区。而更早些时候的阿拉伯游牧民已经向南进入了努比亚。在这段时期，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当地人大多说阿拉伯语。

从法蒂玛王朝到马穆路克：土耳其人征服前的埃及

法蒂玛王朝下的埃及(969—1171 年)

埃及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最初是相当繁荣的，至少对统治阶层来说是这样的。他们修筑了水坝和沟渠，小麦、大麦、亚麻和棉花的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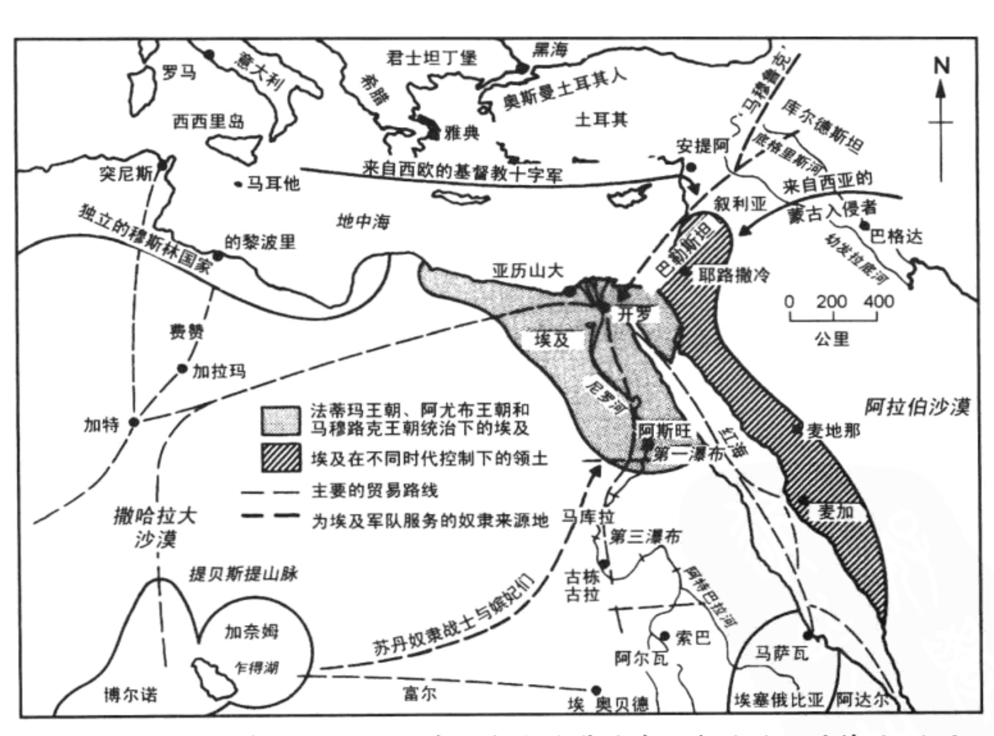
地图 11.1　阿拉伯贝都因人迁入北非，950—1350 年。

也都提高了。三角洲地区变成了繁荣的棉花和亚麻纺织品中心，尽管其中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哈里发的直接控制下。红海一带的商业贸易复兴了，埃及商人依靠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运输贸易而变得富有起来。哈里发铸造了自己的金币。在兴起的东非沿海斯瓦希里城镇里，法蒂玛王朝的第纳尔成为基本的国际通币。

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征收沉重的进出口关税，但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对农民的征税，在这一点上，埃及一贯如此。征税工作转让给法蒂玛王朝的柏柏尔人，这些柏柏尔人很快就作为一个新的地主贵族安居了下来。他们成为广袤的、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实质上的“地主”。这些“包税人”(tax-farmer)按照协商好的税款份额上交给哈里发，并可以进一步为他们自己增加税款。为了谋取自身利益，他们竭尽所能地“压榨”农民。这个制度也为权力滥用和贪污敞开了大门，有点权势的“包税人”也经常不把应交的税赋份额上交给哈里发。

158

最初，法蒂玛王朝用一支规模较小但强悍的柏柏尔军队征服了埃



地图 11.2 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马穆路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公元969—1517 年。

及。随着柏柏尔人安顿下来并成为新的统治阶层,哈里发开始依赖奴隶来扩充军队。军队的主要部分是骑兵,由散漫的柏柏尔人和被称为马穆路克(Mamluk)的土耳其奴隶骑手组成,而大部分步兵则都是从撒哈拉南部输入来的黑皮肤的苏丹奴隶。

由于腐败造成政府农业税的减少,哈里发已无力支撑军队的供给。到12世纪中期,日益不满的军队常常掠夺农村地区。马穆路克人、柏柏尔人和苏丹人之间的冲突阻碍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并严重地削弱了法蒂玛王朝的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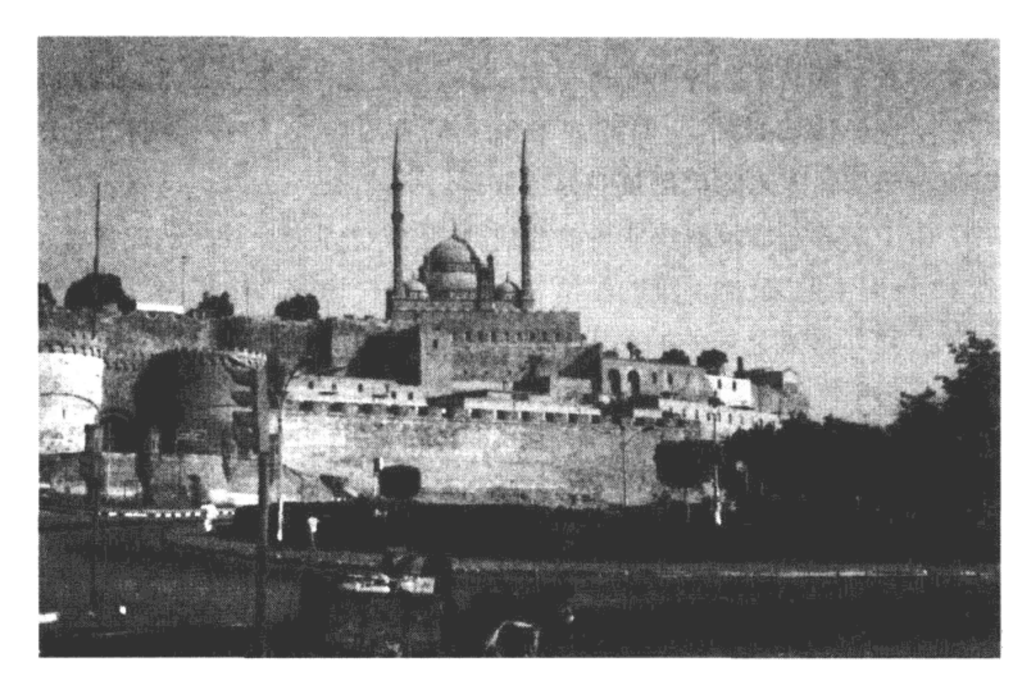
在12世纪60年代,法蒂玛王朝处于可能会被西欧基督教的十字军推翻的危险中,且十字军已经在邻近的西亚建立了安条克(Antioch)和耶路撒冷王国。埃及在基督徒的征服中幸免于难,这主要得益于萨拉丁·伊本·阿尤布(Salah al-Din ibn Ayyub)的行动。萨拉丁是一小支职业军队的首领,这些职业军人最初来自土耳其东部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萨拉丁重组了埃及军队,宣布进行圣战,并将基督徒军队从埃及边境驱逐出去。在此基础上,他于1187年为伊斯兰教收复了耶路撒冷。这是反抗西欧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一次行动。他在欧洲历史上以萨拉丁(Saladin)著称,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伟大的穆斯林反抗者。法蒂玛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于1171年逝世,萨拉丁随即成为埃及的统治者和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的缔造者。

159

阿尤布王朝

萨拉丁重新恢复了埃及政府的稳定与繁荣。他使埃及人又回到了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信仰,并使开罗成为一个重要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学术和文化中心。

萨拉丁最重要的创新或许是军队重组,他将军事招募与赋税体系改革结合起来。他恢复了从土耳其定期输入年轻的马穆路克奴隶的做法。这些配有弓箭和轻便弯刀的奴隶骑兵被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战功显赫的马穆路克可以赢得自由并成为军队的指挥者。与此同时,“包税人”,即伊克塔(*iqta*),由国家接管过来,征收赋税的工作又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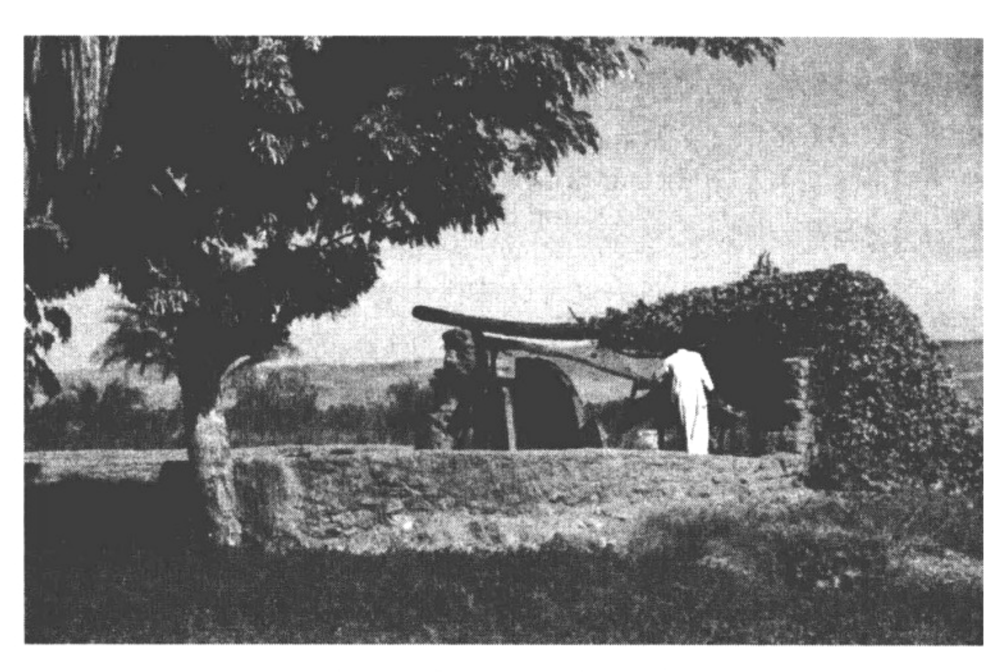
开罗：城堡和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

重新分配给马穆路克军官。作为报答，马穆路克军官用他们从农民那里征收来的赋税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全职士兵。士兵的数量取决于伊克塔的规模。

实际上，马穆路克人成为一个新的占有土地的军事贵族，他们中较有实力的人享有埃米尔(amir)的称号。1250 年，他们向苏丹的权威发起了挑战。一群马穆路克的埃米尔秘密地杀死了阿尤布王朝的最后一位苏丹并夺取了王位。从此，他们建立了两个马穆路克王朝中的第一个王朝，并在接下来的 250 年统治了埃及。

马穆路克王朝下的埃及(1250—1517 年)

马穆路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政权。依靠从土耳其和俄罗斯南部新输入的马穆路克，军队实力不断得到加强。在王朝的头几十年里，埃及帝国扩张到了西亚地区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他们的军队击败了中亚蒙古人和欧洲基督教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让埃及更加有信心宣称它是伊斯兰教的学术中心。马穆路克



埃及农民在尼罗河流域的劳作。

“势力范围”延展到麦加和麦地那，开罗成为去麦加的朝圣者，尤其是从马格里布和西非苏丹来的朝圣者的一个常用中转站。由于在阿斯旺(Aswan)东部山区使用了奴隶劳动，金矿和翡翠开采得到了发展，因而红海贸易在马穆路克的控制下得到了扩展。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任何一个埃及王朝的财富都是以埃及农民的生产能力为基础。埃及农民(fellahin，阿拉伯语“农民”的意思)是尼罗河流域洪泛平原上小块家族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尽管小块家族土地通常是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但一个无力支付赋税的农民经常会被剥夺土地所有权。人们需要提前估算这小块土地的生产能力，并且所有的农作物都要上缴赋税：果树、蜂蜜和蜡，还有大麦、小麦和亚麻。即使是家畜，如鸡、山羊和牛，每年也要上缴赋税。在马穆路克王朝的统治下，因为伊克塔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所以农民被压榨得尤其厉害。事实上，这段期间，农民为了得到足够的口粮，经常不得不从他们的“地主”那里借回他们自己的谷物。马穆路克为了防止农民“弃田”而跑到城市里，给农民施加了额外的限制，即没有“地主”同意，他们不能离开农场。

埃及农民不仅要负担特别沉重的赋税，而且还要为公共工程提供无偿的劳役。农民甚至还要上缴所有的粮食、工具和驼兽。14 世纪期间，公共工程的数量增加了很多。由于新河坝和沟渠的修建，河谷和三角洲地区的灌溉范围有了扩大。这意味着可以种植新土地，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将出现新的农业村落，出现更多为马穆路克王朝服务的伊克塔。

161 马穆路克王朝的包税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里，他们积累的大量财富促进了来自非洲内陆、东海岸和印度洋的奢侈品贸易的发展。据估计，14 世纪早期，埃及大约有 1 万名马穆路克人统治着 400 万—500 万的埃及人。在 15 世纪，与军事服务联系起来的赋税体系崩溃了。马穆路克人将伊克塔变成了世袭制。伊克塔停止提供兵役。随着城里马穆路克人的腐败日益严重，公共工程也停止了。沟渠淤塞，农业生产力也降低了。此外，还有旱灾、蝗灾和瘟疫。随之而来的就是饥荒，人们荒弃了大量的农田。苏丹没有了马穆路克人所提供的兵役，便开始征收更沉重的贸易税以养活军队。这导致埃及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减少，而这一时期正好是葡萄牙人绕着非洲南端挑战穆斯林在西印度洋贸易主导权的时期。

马穆路克军队的威望主要依赖于骑兵们可以熟练地使用弓箭和刀。这就是他们在 1260 年可以阻止蒙古人向巴勒斯坦进军的原因。由于满足于过去的盛名，马穆路克军队未能考虑到火器和大炮的出现对 15 世纪的战争所带来的变革。到 16 世纪，马穆路克军队陷入一片混乱，无情地为历史所淘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近代化军队无可匹敌，他们将马穆路克军队赶出了巴勒斯坦，并于 1517 年征服了埃及。

奥斯曼统治下的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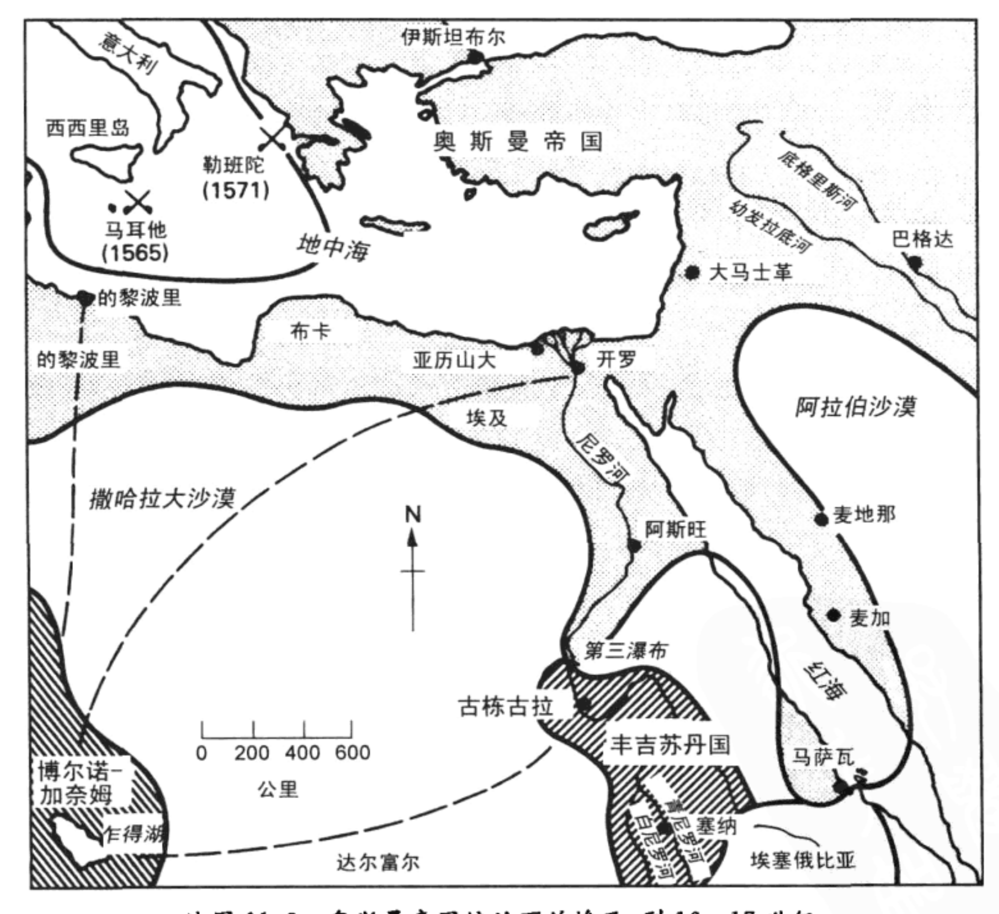
奥斯曼土耳其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他们于 1453 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他们将那个古老城市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并将它作为庞大帝国的都城。到 16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延伸到了大半个东南欧、西亚和北非。

由于奥斯曼帝国 1517 年的入侵 ，埃及丧失了独立性，变成了这个西

亚帝国的一个省份。埃及的统治者从那以后成为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对伊斯坦布尔负责的总督。奥斯曼帝国修复、重新确立了将土地所有权、税收和兵役综合在一起的伊克塔制度。16世纪50年代，埃及的南部边界推进到了努比亚，甚至远至第三瀑布地区。贸易又繁荣了起来。为了对抗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的推进，奥斯曼帝国占领了红海马萨瓦港口(Massawa)。这就阻断了葡萄牙人与红海，尤其是与埃塞俄比亚的贸易通道。但是奥斯曼帝国未能夺回埃及去往印度洋的直接通道。

在17、18世纪，世袭的马穆路克贵族在埃及逐渐又获得了实权。富有的贵族家族的首领被称为贝伊(bey)。总督被称为帕夏(pasha)，最初是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土耳其移居者担任。到18世纪，他们已经建立了帕夏王朝。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几乎独立于伊斯坦

162



地图11.3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到16—17世纪。

布尔行事。当地的腐败贵族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致于埃及缺乏团结和力量来抵御严重的外敌入侵。

不管是马穆路克人还是奥斯曼人都没能抵挡住1798年法国拿破仑军队对埃及的入侵。在1801年，正是借助于英国人对法国舰队的打击，以及英国海军对三角洲港口的封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才得以迫使法国军队撤军。拿破仑一世入侵埃及，标志着英法在埃及利益上争夺的开始，这种争夺支配了埃及19世纪的大部分历史时期。

努比亚和丰吉苏丹国

伊斯兰努比亚的扩展

我们在第五章记述过，由于基督教努比亚王国马库拉的抵抗，阿拉伯人最初对尼罗河流域的征服到了第一瀑布地区就停止了。但伊斯兰教后来却在努比亚河下游逐渐传播开来，这要部分地归因于与穆斯林埃及几个世纪来的和平贸易往来，而努比亚地区伊斯兰化的主要过程发生在14世纪。阿拉伯游牧民，主要是巴努坎茨人(Banu Kanz)和尤哈耶纳人(Juhayna)持续南进给努比亚地区带来了压力。1317年，国王宫殿变成了清真寺。

163 15世纪，阿拉伯游牧民进一步渗透到达尔富尔的南部和西部，以及乍得湖方向的地区。尽管他们不停地传播伊斯兰教，但是由于与当地的努比亚人通婚，他们在个性和文化上都变得非常“非洲化”了。到14世纪末，为了俘获非穆斯林男人和女人，并把他们当作奴隶和小妾贩卖到埃及和西亚，这些努比亚的穆斯林游牧民开始侵掠东撒哈拉的南部地区。

丰吉苏丹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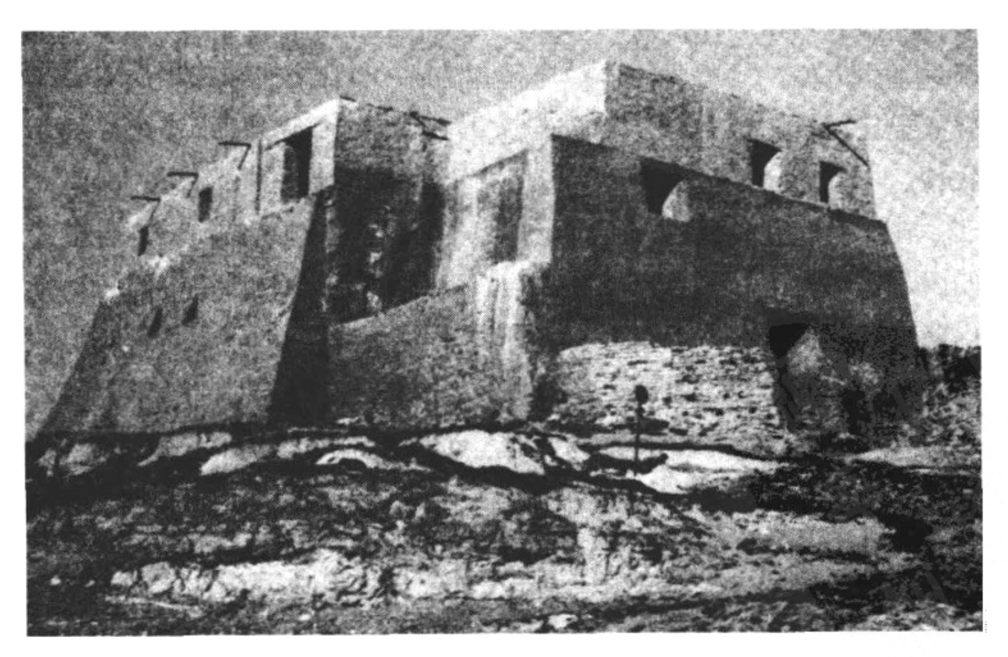
约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埃及的同一时期，一个新的非阿拉伯政权最后取代了衰落的努比亚上游地区的基督教阿尔瓦(Alwa)王国。这个新国家就是丰吉苏丹国(Funj Sultanate)。丰吉人是养牛的骑马

牧民，他们起源于努比亚河上游南部地区的某个地方。我们尚不清楚他们的准确发源地，但他们一定是居住在尼罗河上游平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东部丘陵之间诸多游牧民族中的一个。16 世纪，他们逐渐控制了青尼罗河流域的努比亚地区，一直到今天的喀土穆(Khartoum)与白尼罗河交汇处。到 17 世纪，他们已经成为穆斯林，居住在作为首府的塞纳(Senna)等城镇。丰吉人基本上一直是统治阶层，拥有大量的牛群，并向定居在河畔的农民征收赋税。他们一般让当地的酋长来掌权，但他们也动用属于他们自己的、小规模的、有战斗力的骑兵，向范围广大的定居农民以及游牧民收取赋税。17 世纪初期，他们不定期的劫掠和赋税征收甚至扩展至第三瀑布地区。

奥罗莫人的迁徙和埃塞俄比亚王国

奥罗莫人的迁徙

在 16 世纪初期，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王国和伊斯兰教阿达尔王国一



马库拉(栋古拉)国王的宫殿，之前曾被认为是一座教堂，1317 年成为一座清真寺，但这一说法并不可信。

164 直为控制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斗争。由于南方军事防御被摧毁,人们逃离了战争地区,造成南方高原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奥罗莫人于是趁机从南方进入了这个暂时的真空地带。

奥罗莫人(以前被称为 Galla,即盖拉族人)是说库希特语的养牛牧民,发源于图尔卡那湖东北部的干燥草原地区。他们只在一代人的时间内(1530—1565 年),就占据了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的三分之一,并推进到阿瓦什(Awash)流域和哈拉尔(Harar)高原。但是,奥罗莫人在占领速度与斗争上也遭遇到挑战,他们并不是唯一大规模迁移到这里来的民族。我们要弄清这一活动的性质,就需要对他们的社会结构有所了解。

奥罗莫人并没有综合性的中央权威。像许多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以组织松散、扩展的家族-部落形式居住在一起。在每一个部族内,奥罗莫人社会划分为五个年龄组(age-sets)。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不断地由一个年龄组进入下一个年龄组。第五个,即年纪最大的那个年龄组的人被称为鲁巴(*luba*),它的成员原则上是这一部族的首领。部落里几乎没有贫富的社会分化。每一个成年年龄组中的首领是由全体成员选举出来的。最重要的年龄组是第三个年龄组,即富勒(*folle*),年轻人担任军事护卫并保护部族与牛群。正是他们带领着部落寻找新牧地。

在 16 世纪初的头 20 年内,奥罗莫人的牛群迅速增加。这可能要归因于奥罗莫人新的养牛技术的出现,或者只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南部山麓特别适合放牧牛群。随着奥罗莫人沿奥莫河(Omo)流域向上扩张并进入南部山麓,他们在冬夏牧场之间开始了季节性的放牧迁徙。富勒每一年都会沿着湿润的河谷进一步寻找新牧场。他们徒步行进,装备简单,只携带长矛。富勒一旦将牛群放置于新牧场,部落中的其他人就会迁移过来。部分由于新近的战争,该地区一开始人口稀少,奥罗莫人得以迁入住有耕种者的古老村落间的露天牧场。那些进行抵制的耕种者会受到他们的攻击,并被驱逐出去。

当引导季节性迁徙的部族感到紧随而来的其他奥罗莫人部族所带

来的压力时，他们就会进一步向北移进。这样的迁徙一旦进行，就不会停顿下来。这些部族的人数过于庞大了，而且由于有太多的单一部族，且每一个部族都带着大量的牛群并单独行动，即使埃塞俄比亚人和阿达尔人已经有实力来抵制他们，也不可能将他们“击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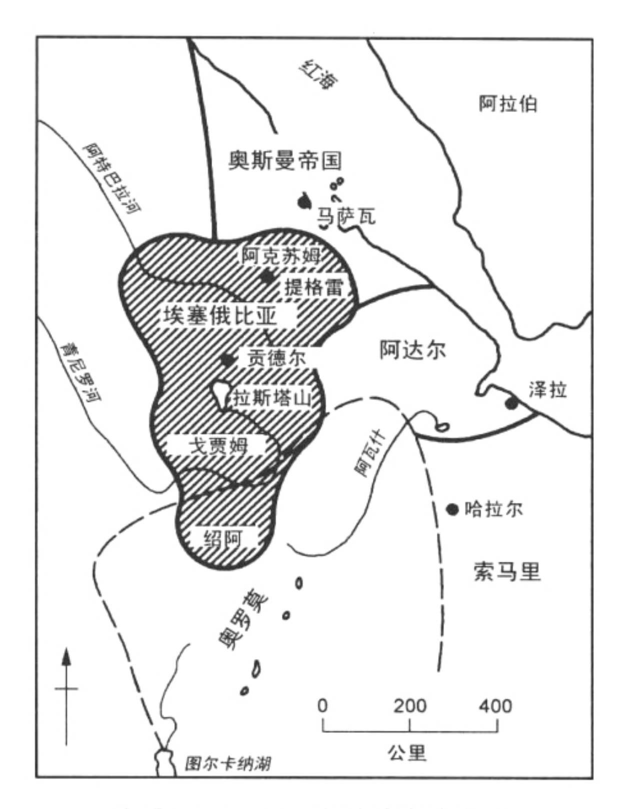
就像他们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寻找新牧地的过程中，奥罗莫人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不会变通”的牧民。那些与伊斯兰教阿达尔王国有着接触的奥罗莫人转而信仰伊斯兰教，而其他奥罗莫人转而信仰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在阿姆哈拉(Amhara)和锡达马(Sidama)中央高原地区，许多奥罗莫人放弃了游牧生活，转向固定的农业生活。到17世纪早期，奥罗莫人成为埃塞俄比亚南半部的优势族群，在哈勒尔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也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

埃塞俄比亚王国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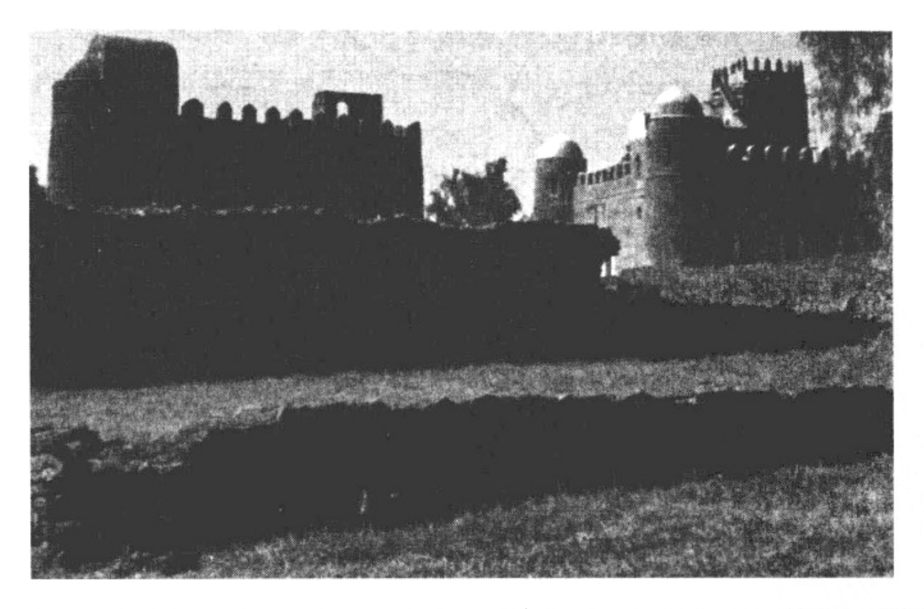
16世纪后期，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国王很少在意奥罗莫人从南方的入侵。萨尔撒·丹加尔(Sarsa Dengel，1562—1597年在位)主要控制着王国的北半部，在马萨瓦开放了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贸易联系。除了能给统治者带来个人利益外，埃塞俄比亚从这一贸易中所获甚少。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贸易活动是将塔纳湖(Lake Tana)西南部抓获的俘虏当作奴隶卖到埃及和西亚。据估计，在萨尔撒·丹加尔统治期间，每年卖给红海海岸的土耳其商人的俘虏多达1万名。西南部流失了这么多人，也缓和了奥罗莫人从南方进一步扩张所带来的压力。

17世纪初期，苏西约斯(Susenyos，1607—1632年在位)正式承认了奥罗莫人在王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统治。作为允许向当地农民征税的回报，奥罗莫人以雇佣军的身份进入苏西约斯的军队服役。这仅仅只是将奥罗莫人已经在做的事情合法化。17世纪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势力主要的关注点仍在北方。在法西拉达斯(Fasiladas，1632—1667年在位)的统治下，提格雷进一步地融入到王国内，贡德尔(Gondar)成为埃塞俄比亚的永久性都城。然而在18世纪，埃塞俄比亚国王丧失了对各省的一切有效权力，基督教贵族实际上已经自行其是了。



地图 11.4 17 世纪的埃塞俄比亚。

166



埃塞俄比亚贡德尔的王室宫殿。该宫殿修建于苏西约斯统治时期(1607—1632年),西班牙耶稣会牧师佩德罗·帕兹(Pedro Paez)提供了建筑建议。

16—18世纪的马格里布国家

马格里布的东部和中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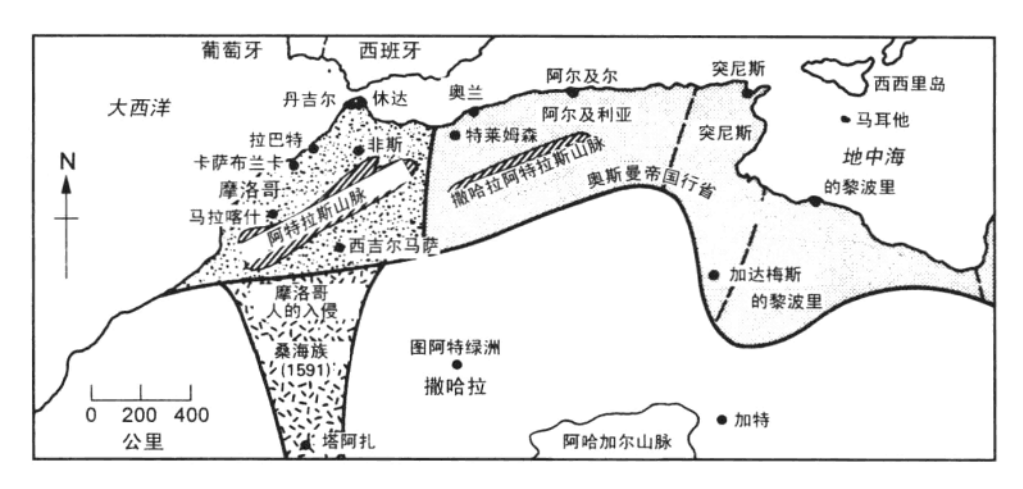
16世纪马格里布历史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基督教西班牙王国和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之间开始争夺西地中海的控制权。尽管奥斯曼帝国重新团结了在西地中海的穆斯林，但15世纪已是欧洲基督教在西方复兴的一个时期。1492年，由于奥斯曼帝国在格拉纳达(Granada)的失利，西班牙人结束了在西班牙南部地区差不多八个世纪的穆斯林统治。同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的基督徒夺取了许多北非沿海港口。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丹吉尔、阿尔及尔(Algiers)、的黎波里和突尼斯。

土耳其海盗(私掠船船员或以掠夺其他船只为生的海盗)作出了回击，并收复了北非港口，他们以这些港口为袭击西地中海上基督徒船只的基地。在后来的斗争中，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在两者之间几经转手。土耳其人遭受了两次大的失败，马耳他(Malta)围攻(1565年)和远离希腊海岸的勒班陀(Lepanto)战役(1571年)。由于这两次失败，奥斯曼帝国失去了掌控地中海航线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驱逐出北非的主要基地，因此也就保证了马格里布仍然控制在穆斯林的手中。

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都成为土耳其人主要的基地。17和18世纪，他们的海盗从这些港口继续袭击基督教的商船。这些港口及其背后的内地都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正式省份。实际上，伊斯坦布尔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些地区内的事务。海盗袭击所获的赃物占了沿海城镇财富的绝大部分，尤其是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尔，这两个城镇与突尼斯不同，它们只有很少的耕地。由土耳其官员带领的内陆军队居住在城镇里，他们为了贡奉和赋税，也会经常袭击牧民和农村地区的耕种者。

的黎波里也从经由费赞(Fezzan)的跨撒哈拉贸易中获利。的黎波里的帕夏与博尔诺(Borno)的苏丹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后者进口马

167



地图 11.5 16、17 世纪的马格里布地区。

匹、枪械和铠甲，用于抓捕非穆斯林男人和女人，并把他们贩卖给奥斯曼帝国的有钱人做奴隶和小妾。尽管土耳其人在的黎波里的存在刺激了横跨沙漠的最短商路的发展，但真正的跨撒哈拉贸易往来仍然掌握在独立的图阿雷格人的手中。

摩洛哥的兴起

在马格里布西部，摩洛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兴起于 16 世纪。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一个叫做萨迪德斯（Sa'dids）的阿拉伯游牧部族（他们宣称是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后代）逐渐地征服并统一了整个摩洛哥。因而，他们不仅阻止了土耳其人将他们的帝国扩展到马格里布西部，而且也将基督教葡萄牙人赶出了他们的大西洋海岸港口。1578 年，当葡萄牙人侵略摩洛哥时，他们在阿尔卡萨凯比尔（al-Ksar Kebir）战役中遭到了重创。在这场战役中，葡萄牙国王和摩洛哥苏丹都阵亡了。艾哈迈德一世曼苏尔（Ahmad al-Mansur，1578—1603 年在位）随后即位，他强有力的统治将摩洛哥带到了权力鼎盛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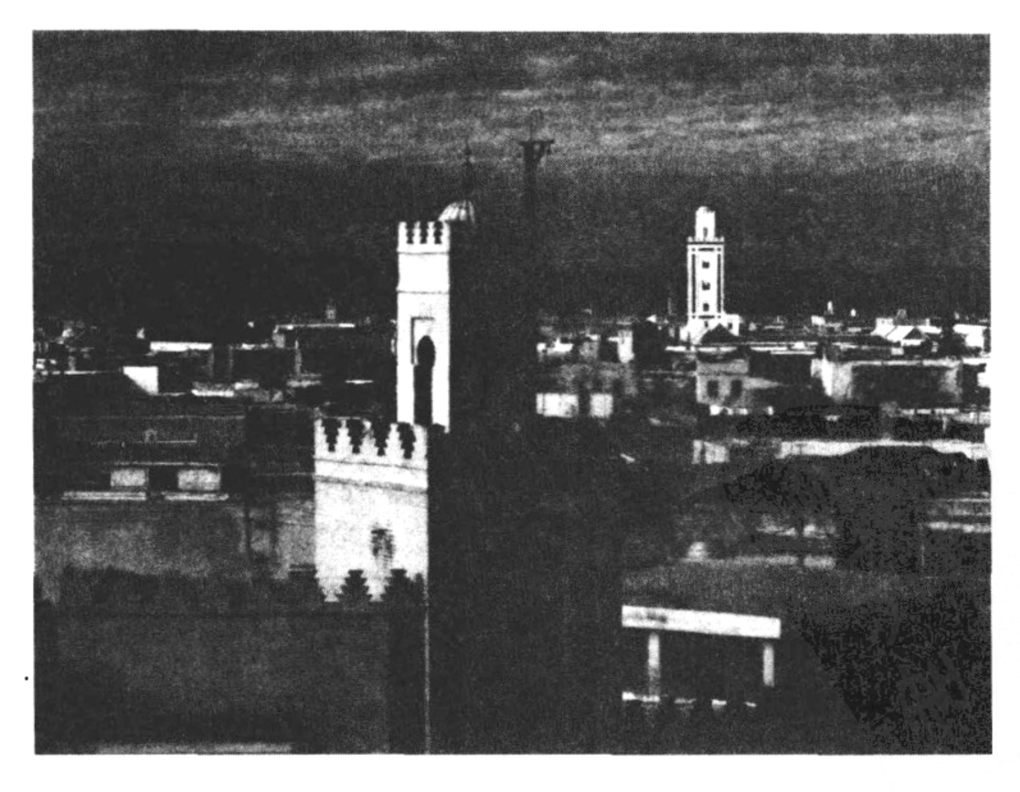
艾哈迈德统治时期的重大事件是 1591 年对桑海的征服。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艾哈迈德已经通过从桑海进口苏丹的俘虏加强军队实力。决定征服桑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他的军队能获得更多的苏丹俘虏，但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控制黄金贸易。（第十三章将进一步讨论

桑海的灭亡。)

征服桑海给艾哈迈德带来了直接的回报,主要体现为从加奥和廷巴克图劫掠来的战利品。但从长远看,摩洛哥帝国的苏丹人对摩洛哥资源来说是一种消耗。黄金的常规贸易被中断,许多黄金向东转运到突尼斯、的黎波里和开罗,或向南转运到西非海岸的欧洲人那里。与此同时,占领桑海使摩洛哥在军事人员和装备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7世纪,摩洛哥继续介入苏丹,但实权日益落到当地的军事总督身上。

168

随着 1603 年艾哈迈德去世,摩洛哥的实力由于王朝争端而被削弱了。一时间,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的苏丹国,非斯(Fes)和马拉喀什(Marrakesh)。在 1669 年缔造了阿拉维德(Alawid)王朝的马维莱·阿尔施德(Mawlay al-Rashid),重新统一了国家。他的兄弟及继任者马维莱·伊斯马伊尔(Mawlay Isma'il,1672—1727 年在位)通过从撒哈拉南部进口更多的苏丹俘虏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尽管在他死后



马格里布地区城市:马拉喀什。

也有王朝争端，但摩洛哥人的统一还是保存了下来。然而，在18世纪的许多时间里，政府直接控制和征税的区域仅仅局限于靠近非斯、马拉喀什的地区以及从丹吉尔到阿加迪尔的沿海城镇。一旦有苏丹军队的威胁行动，其他地方和阿特拉斯山脉的独立游牧部族则被要求上缴贡奉。



第十二章　16—18 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

欧洲与西非海上贸易的起源

169

葡萄牙先行者的目的

当葡萄牙人最初沿着西非海岸踏上探险之旅的时候，到达印度是其长远目标。他们较为关切的是如何绕过穆斯林北非直接到达西非生产黄金的地区。这将为资源匮乏的葡萄牙提供一个重要的国家财富来源，因为众所周知，西非撒哈拉以南地区是西欧制造金币的主要黄金来源地。一旦葡萄牙人获准进入该地区，它所提供的财富可以资助环绕非洲南端和进入印度的进一步探险。最终，葡萄牙人经过南部路线到达了印度，从而绕开穆斯林控制的西亚贸易路线。为此，他们希望能从印度的香料、香水、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的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葡萄牙商船将这些贸易产品运到西欧出售，可以获得较大的利润。

葡萄牙人在西非沿海地区的早期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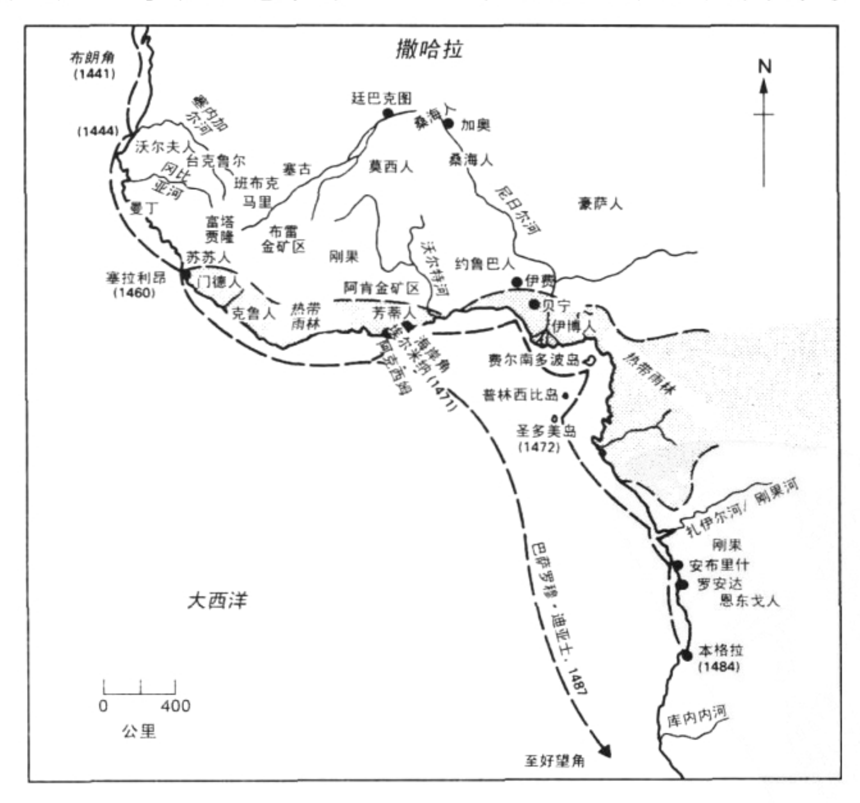
葡萄牙帆船于 15 世纪 70 年代首次到达了西非沿海地区阿肯黄金产地的南部。葡萄牙人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叫埃尔米纳(Elmina，即“我

的"的意思)的要塞,用来保护他们的贸易据点以防其欧洲航运竞争者。一开始,葡萄牙人用铜制品、黄铜和欧洲布来换取黄金。他们给森林民族提供他们之前在桑海和跨撒哈拉贸易中获得的物品。葡萄牙人也卖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奴隶,这些奴隶是从尼日尔三角洲附近的贝宁王国买来的。似乎阿肯森林地区的黄金开采工作也曾使用过奴隶劳动。在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将他们从印度洋贸易中获得的子安贝和精布也加到了他们所能提供的物品范围内来换取西非黄金。不久之后,阿肯黄金产地的一半产量就开始向南转移,远离桑海和跨撒哈拉贸易,转运到沿海一带的欧洲贸易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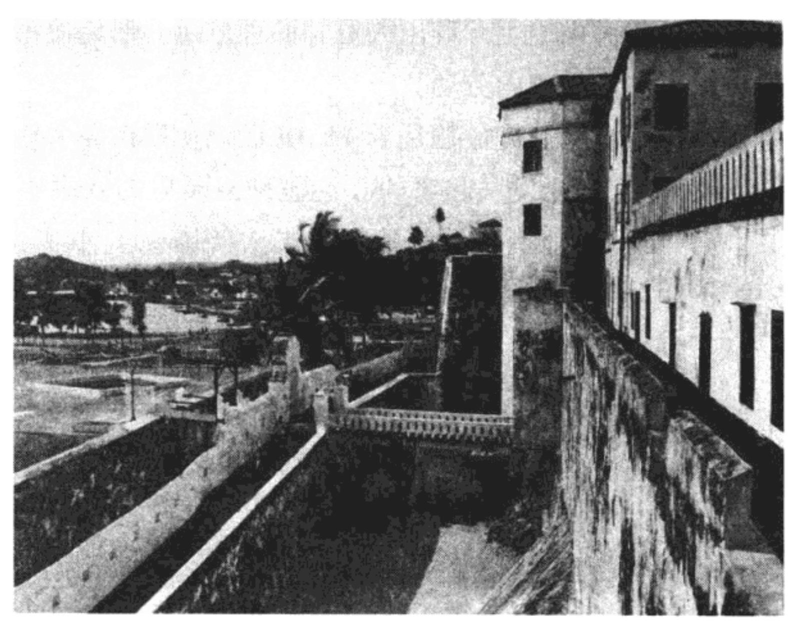
受欧洲人控制的种植园奴隶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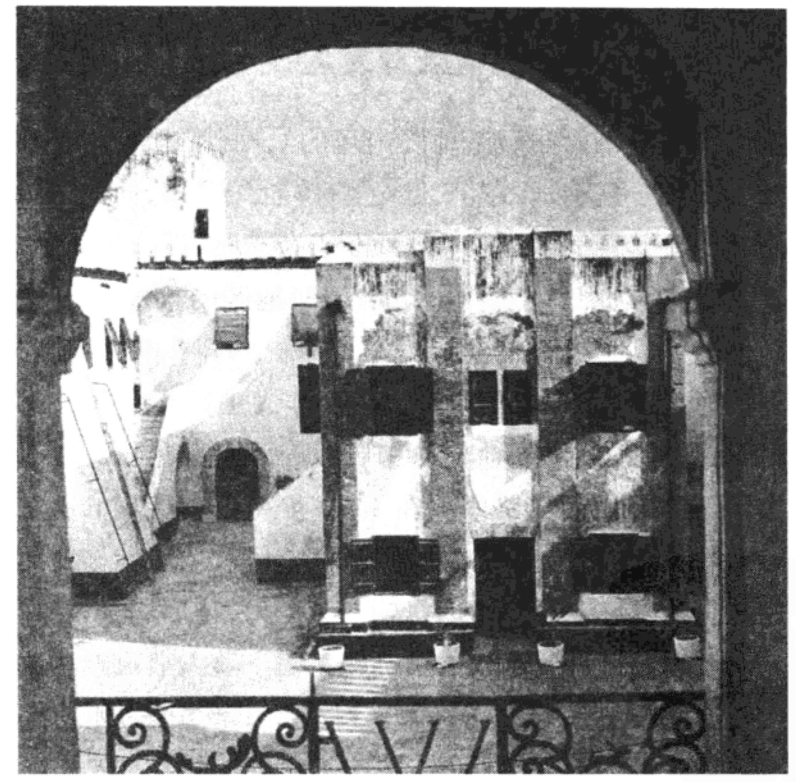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人已经发现了赤道附近的普林西比(Príncipe)和圣多美(São Tomé)岛无人居住。后来,葡萄牙定

170



地图 12.1 西非:15世纪葡萄牙人的探险与贸易。





葡萄牙人于1482年开始修建的加纳埃尔米纳城堡。修建这样的城堡是为阻止欧洲竞争者在特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并在城堡的地牢里安置将要通过跨大西洋航运变卖为奴的俘虏。

169 居者在岛屿肥沃的火山土上开辟出大量甘蔗种植园。他们使用从非洲大陆带来的奴隶在种植园内劳动。

170 种植甘蔗的种植园制度最初是于14、15世纪初期在多个地中海岛屿、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发展起来的。这些种植园里的奴隶不仅仅来自北非,也有来自俄罗斯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Slavs)。事实上,欧洲人的"奴隶"一词(slave)就是源自无偿使用斯拉夫人的劳动。随着葡萄牙人夺取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向南至圣多美岛之间的诸多大西洋岛屿,他们将种植甘蔗的种植园制度扩展到了热带地区。

在16世纪早期,圣多美岛成为欧洲市场最大的单一的甘蔗供应者。最终,圣多美岛种植园制度,即所有权归欧洲监工并由他们来管理,非洲奴隶劳动力来耕作的制度,成为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奴隶制的模型。

172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葡萄牙人在热带西非沿海地区出现的早期,就把从当地酋邦买来的俘虏典卖为奴。最初,即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他们主要来自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地区,并被转运到西班牙南部地区和葡萄牙的农场和种植园。那些来自尼日尔三角洲与刚果河地区的奴隶则被运往圣多美岛。

与此同时,正当葡萄牙冒险家们与西非人进行贸易并找到一条通向印度的东进路线的时候,他们的邻居西班牙人正在开辟通向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跨大西洋路线。在1492年哥伦布(Columbus)的"发现"之旅后,欧洲人对这一热带"新世界"的殖民和剥削就接踵而至。

殖民者很快就感到有必要大量输入劳动力,让他们在大陆的金、银矿和烟草种植园里劳动。当代的美洲印第安土著人很快就屈服于殖民者的严酷对待和不熟悉的欧洲疾病。到公元1世纪末,加勒比海岛屿上与欧洲人有接触的90%甚至更高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死了——他们成为欧洲暴力或疾病的牺牲品。16世纪早期,欧洲的罪犯和被驱逐者也被运送到美洲,但他们的数量很有限。那些送来的人由于热带

病的侵袭存活不了多久。面对这些问题,中、南美洲的欧洲殖民者转向非洲,以便获得奴隶劳动力。

非洲人对热带病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他们在金属加工、采矿和热带农业上也有着经验和技术。葡萄牙人的经历显示出,在西非沿海地区总有某个地方的统治者准备将战俘和罪犯卖给他们,圣多美岛的例子也显示出在种植园里使用非洲奴隶的可能。

第一批直接跨过大西洋被卖作奴隶的非洲俘虏是在 1532 年运来的。此后,虽然在头 100 年里,每年的数量相对较小,但跨大西洋的人口贸易在稳步增长。从 17 世纪 30 年代开始,首先是荷兰人,然后法国人、英国人都卷了进来,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快速扩大。随着对奴隶需求的增加,西非的俘虏贸易规模巨大。自此,人类历史中出现了此后 200 年来大规模的俘虏人口强迫运输贸易。

奴隶贸易的本质

规模问题

近些年来,关于跨大西洋贸易涉及的人口数目在历史学家中有着广泛的争议。记录下来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1532 年后的 300 年里,至少有 1 千万非洲人是活着登陆并作为奴隶被卖到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考虑到还有 200 万人死于跨大西洋的航行中,所以总共至少有 1 200万人作为俘虏离开了非洲。16 世纪里,一年运出的人口数只是维持在数千人,到了 17 世纪,达到平均每年 2 万人,而在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更是达到顶峰,每年高达 5 万—10 万人。19 世纪,运出的奴隶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奴隶贸易直到 19 世纪 70、80 年代才结束。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还有大量的奴隶贸易没有被记录下来,因此真正的贸易规模是这里所提数量的两倍。

173

非洲人的维度

很显然,从非洲运出的人口数量是巨大的,且这些人来自非洲多个

地区。塞内加尔是16世纪早期重要的奴隶来源地区。安哥拉沿海地区较为特殊,因为这里在16—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内都是一个重要的奴隶输出地区。这一情况对安哥拉民族的后续影响,我们将在第十四章做进一步的讨论。随着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自17世纪中期开始兴盛起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丹麦人和其他欧洲人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奴隶运输贸易中来。后来,所谓的"奴隶海岸"(Slave Coast,即今天尼日利亚的西部海岸)成为重要的奴隶来源地。随着18世纪奴隶贸易的迅速扩张,事实上,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南部所有的大西洋沿海地区都卷入了人口贸易。欧洲人的贸易据点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所谓的"黄金海岸"(Gold Coast),即今天加纳的沿海地区。进入19世纪后,虽然很多其他地区都终止了人口贸易,但"奴隶海岸"和安哥拉仍然存在奴隶输出。

从总体上说,欧洲的奴隶贩子在抓捕奴隶上并不积极。欧洲贩子没有军事力量来从事范围广泛的侵袭冒险活动。不管怎样,如果在海岸可以便宜地买到俘虏且没有什么风险的话,又为何要从事昂贵的侵袭冒险活动呢?欧洲军队确实进入过非洲大陆,如安哥拉,他们既没有遭到军事失败,也没有由于疾病而使得战斗力减弱。但是,他们在安哥拉挑起刚果和恩东戈王国间的战争,从而为沿海奴隶贸易提供了大量的俘虏。欧洲人在非洲奴隶贸易上的活动通常受到他们在沿海地区贸易据点的限制。他们为了获得建立这些贸易据点的许可,不得不向当地非洲统治者进贡。总体上说,非洲统治者提供了这些俘虏,从而使专门从事奴隶贸易的非洲商人和非裔欧洲商人可以将这些俘虏卖到沿海地区。

变卖为奴隶的主要人口来源是那些在战争中被抓获的俘虏。在早前,战俘或者被其来源地的人所赎回,或者融入抓获者的社会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常常被迫作为奴隶来劳动,即使其地位低下,但是他们至少还被认为是那个社会的成员。通过婚配融入抓获者的社会,他们可以获得自由,也可以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一旦战俘被卖为欧洲人的奴隶,他们就彻底脱离了非洲社会,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下,会早逝

且回乡无望。

人们过去常常认为,沿海地区绝大部分卖作奴隶的战俘是战争的产物,且这些战争就是为获得奴隶而精心策划发动的。这种情况偶尔确实存在,尤其在18世纪,那时对欧洲人的奴隶要价在不断提高。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战争更多的是当地非洲人发动的,而不是先前所认为的那样。 174

大量细致的地区研究已经揭示,沿海地区的俘虏供应通常是内陆战争所带来的产物。这些战争的主要动机是国家建立和扩张,而不只是将失利者变为奴隶为最终结果的一种混战。19世纪森林地区的贝宁(Benin)国将俘虏卖给葡萄牙人的时候,正是贝宁人展开军事扩张的时期。显然,贝宁人在16世纪是拒绝人口贸易的。随着早期强大的王国开始走向衰落,贝宁才于18世纪重新输出俘虏。在16世纪头50年里,马内人(Mena),说曼德语民族的一个分支,占领了塞拉利昂,将当地人变为俘虏并在沿海地区卖掉他们。在18世纪早期,今天几内亚沿海地区的奴隶贸易达到顶峰,其时的富塔贾隆的富尔贝人穆斯林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并发动对周边地区的圣战,结果导致大量俘虏被卖作奴隶。17、18世纪,在奥约(Oyo)、达荷美(Dahomey)和阿散蒂(Asante)等王国的扩张过程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战争,导致各个地区卖给沿海地区欧洲奴隶贩子的俘虏人数达到了最高值。

基本上,强大的非洲统治者在适当的时候会提供俘虏,一些统治者在此过程中也变得非常富有。但是,除了不想要的罪犯和驱逐者,他们很少出卖自己社会的人口。另一方面,小型社会、弱国、"非国家状态"(stateless)的村落以及大扩张国的邻居无疑会损失惨重。它们中有些会完全消失,其土地会被其他势力更强大的邻居所占据。

从总体上讲,西非内陆的战争并不是仅仅为了制造待售俘虏而发动起来的。但是,沿海地区的欧洲人给俘虏开出的高价无疑会刺激战争的爆发。尤其是在欧洲人将枪炮作为他们主要贸易物品的18世纪,情况更是如此。这让战争变得有利可图,至少从短期来说是这样的。以前的战争有可能是以缴纳贡奉和获取俘虏的形式终结,但现在的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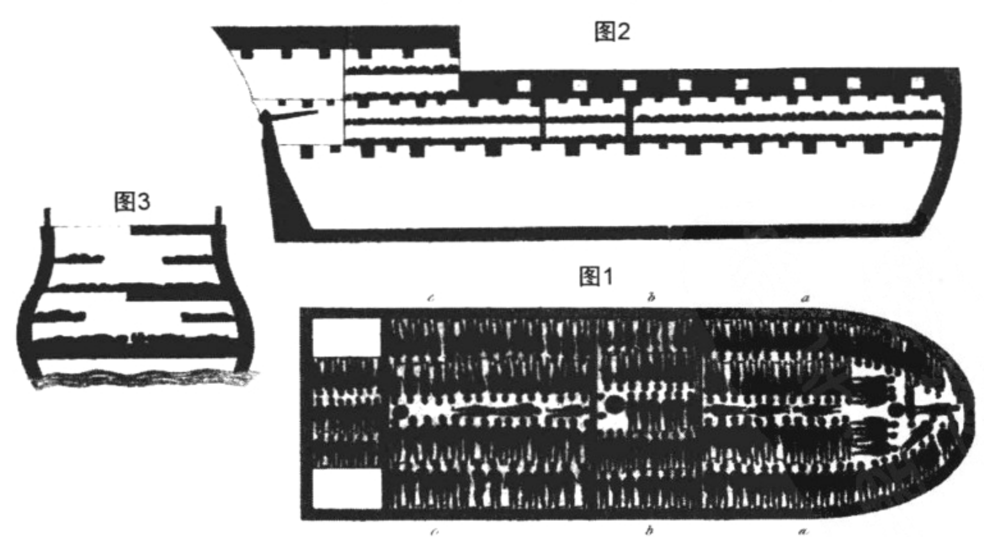
争是“整体性的”——对弱小社会的整体破坏。

奴隶贸易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提升了西非内陆战争的整体激烈程度,从纯粹经济角度上来说,对该地区的生产潜力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先前的战争只是从征服地那里收取贡奉,为胜利者获得为其工作的俘虏。但是,现在战争激烈程度的提升产生了“剩余”俘虏。这些俘虏不再留在抓获他们的非洲社会里,哪怕是作为强迫劳动力,也不再被他们原来的社会赎回。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直接卖出非洲,且出售所换取的物品只相当于这些人在有生之年可能的生产价值的一小部分。此外,这些被卖出的俘虏是年轻人,正是最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绝大部分人年龄是在14—35岁之间,且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西部地区在17、18世纪的某一时期或其他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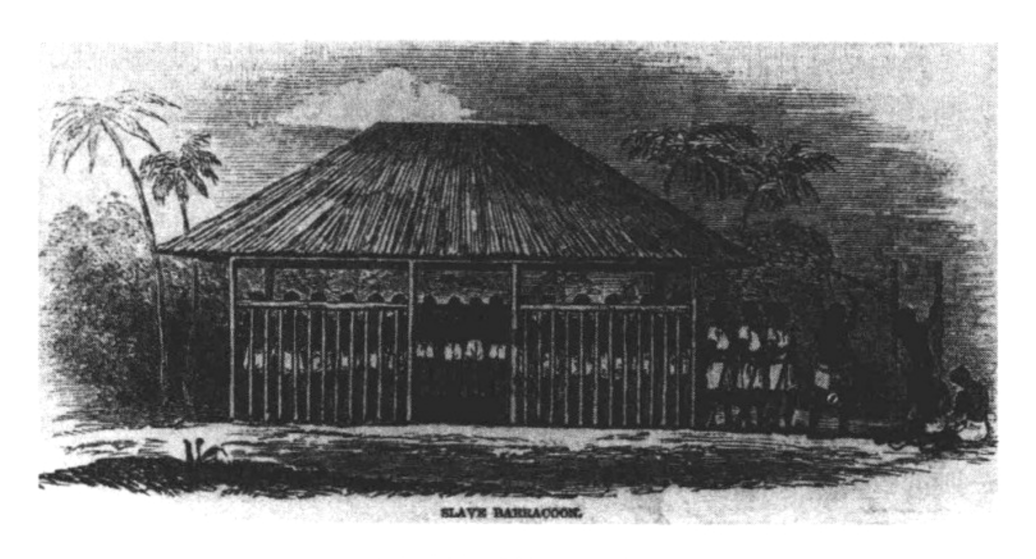
175

跨大西洋贸易

无论对人口减少或非洲大陆发展的影响有多大,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最大的罪恶是人类本身所遭受的苦难,折射出那些如此虐待奴隶的人对人类生命及其对人性的无情蔑视。当一个人在内陆遭到抓捕并被运送到沿海地区卖出的时候,就标志着短暂余生中骇人处境和苦难的



奴隶贸易船的图样,展示了甲板下俘虏极为密集的空间。



被关在木箱里等待运输的俘虏。

开始。俘虏不再被当作人，而是被当作财物来对待，就像家畜一样，被放在一起圈养、体检和买卖。

俘虏们被捆绑在一起运到沿海地区，在那里，他们被关在木箱里等待着下一艘欧洲商船的到来。接着，他们被剥个精光，男女混在一起接受详细的检查，看看他们是否强壮和健康。一旦非洲中间商和欧洲奴隶贩子之间达成协议，奴隶们的极其可怕的旅程就开始了。他们一登上船，就被成行地捆缚在一起，并被要求躺在特制的“甲板”上，这些“甲板”像格子一样排列起来，两层“甲板”间的距离几乎不到半米。人无法坐立起来或是自由活动。他们像这样要连续躺上好几周，忍受着自身排泄物的恶臭，并且所给的食品和水都不足以维持生命。那些死掉的俘虏就被直接从船上扔到水中。平均下来，在三至六周的跨大西洋航行中会有15%—30%的俘虏死于疾病、虐待或衰竭。船主通过装进更多人来弥补这种损失。因此，有足够多的俘虏可以在航行中存活下来并在美洲出售，他们可以为资助航运的商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偶尔，疾病在甲板下的恶劣环境中传播得特别快，以致于整船的俘虏都会死掉。但是，这种不幸很少发生。总体上讲，奴隶贸易对运输商来说利润可观。如果不是高利润的话，这种贸易不会以如此规模持续下去。

176

就是以这种方式，每年有成千上万最精壮的非洲青年男女离开了大陆，所有这些人都被卖给了追求利润的欧洲商人和种植园主。

美洲的种植园及其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

巴西的大部分种植园种植甘蔗和咖啡，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植园种植甘蔗，北美南部地区的种植园则种植棉花。在 17 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和 18 世纪，加勒比海岛屿上的种植园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因而送往该地的奴隶数量最多，这也意味着对奴隶有着更大的需求。甚至在建立时间较久的种植园里，也存在着世代更替的持久需求。

新世界种植园中的生活既是严酷的也是短命的。一些奴隶没有在离开非洲和跨大西洋航行过程中所造成的创伤和消沉中生存下来。三

177



西印度群岛一个甘蔗种植园中正在劳动的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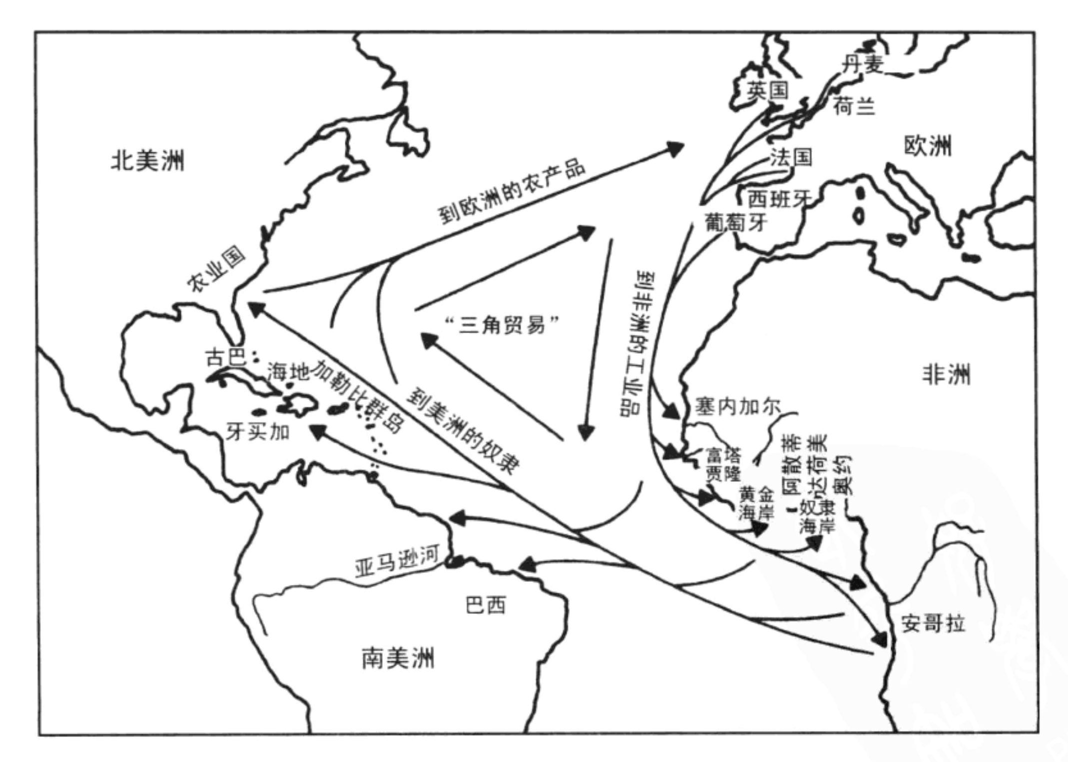
分之一的奴隶会在头三年内死去，很少有奴隶活过十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吃的不够和过度劳动。

我们在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讨论这些送到美洲的非洲人后来的历史。一句话，新世界的财富创造严重依赖于非洲劳动力，从这种财富中获利的是支撑整个贸易体系的欧洲商人。

从奴隶贸易中获得利益：欧洲人的维度

三角贸易

对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商人来说，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只是更大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一艘从欧洲启航的商船在其航运过程中要完成三个阶段，在其返回欧洲港口前，每艘商船都装载着不同的货物。这种三面或“三角”贸易中的每个阶段都会为欧洲商人带来利润。第一个阶段是将欧洲制造的产品运到非洲。



地图 12.2　16—18 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

178 很显然,葡萄牙人最初运到非洲的货物包括像铜和其他金属这样的原材料,用以换取黄金。到17、18世纪,这种早期贸易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一阶段,欧洲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是廉价的制造产品——主要为棉布和金属器皿,特别是枪炮,用以换取奴隶。事实上,在18世纪末,为非洲市场特别制造的廉价劣质枪炮是英国新工业城市伯明翰的重要利润来源。对欧洲制造产品依赖的增加影响了非洲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记述的那样,欧洲枪炮的输入使得非洲战争更加激烈,并使奴隶供应增加。这让17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和18世纪早期非洲输出的奴隶保持着相当稳定的价格。直到18世纪80年代,西非沿海地区的欧洲商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才最终拉动了奴隶价格的提高。只有在那时,欧洲商人才开始质疑这种贸易持续盈利的可能性(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跨过大西洋,奴隶价格可以卖到非洲海岸价格的两至三倍。有时,奴隶买卖是以现金来交易的,获得的现金再用来购买种植园的农作物。有时,尤其是在生产糖料的岛屿上,奴隶是直接用糖料来交易的,这些糖料再出售到欧洲。

虽然存在着风险,如船只在海上可能会遇险,但欧洲商人的利润总体上是巨大的。从这种"三角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很多重要港口城市财富的增加,如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法国的波尔多和南特,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们开始成立银行并最终有助于支撑欧洲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其实,欧洲商人们非常清楚,对其大西洋贸易利润来源来说,至为关键的是维持非洲奴隶剥削制度。

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的起源

欧洲人的种族主义可以在欧洲人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在新世界种植园里使用奴隶,从而产生的对非洲人的剥削中找到根源。种族主义的深层原因可能要比这更为复杂,但是欧洲人将非洲人奴隶化无疑也起着作用。300年来,欧洲人把非洲人几乎只当作奴隶来看,似乎他们

生就如此。欧洲人认为将非洲人带出非洲本土，是把他们从“原始”、“野蛮”的环境中“拯救”出来。这种观点出现不久，欧洲人又认为非洲人天生就低人一等。当欧洲人在 19 世纪末将非洲大陆变为殖民地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些观点来将殖民活动加以合法化，且那些殖民活动是他们打着传播基督教和“文明”旗号进行的。



第十三章　18 世纪以前的西非国家和社会

桑海帝国的瓦解

179

摩洛哥人入侵前夕的桑海人

16 世纪早期，桑海帝国在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图雷的统治下，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在其统治期间，伊斯兰教变得更有社会基础，跨撒哈拉贸易也更加繁荣，还有塔阿扎的撒哈拉盐矿也运到了帝国内。然而，这种实力却在 16 世纪开始逐渐衰弱了下来。阿斯基亚家族的权力也由于一系列短命的统治和王朝争端而遭到削弱，且王朝争端导致 16 世纪 80 年代内战的爆发。与此同时，由于干旱和疾病，总人口开始减少，农业经济基础也遭到了削弱。桑海也放松了对长途贸易网络的控制。在东面，由于豪萨国家，即博尔诺和阿伊尔的图阿雷格苏丹国的发展，它们将跨撒哈拉贸易转移出桑海和西部贸易路线。由于阿肯森林诸酋邦将一部分贸易转移给沿海地区新来的欧洲商人，南面的黄金供应量也有所减少。

然而，回想起来，桑海族的衰弱也确是事实。历史学家似乎总是有点事后诸葛亮。在那时，尽管有 16 世纪 80 年代的自然灾害，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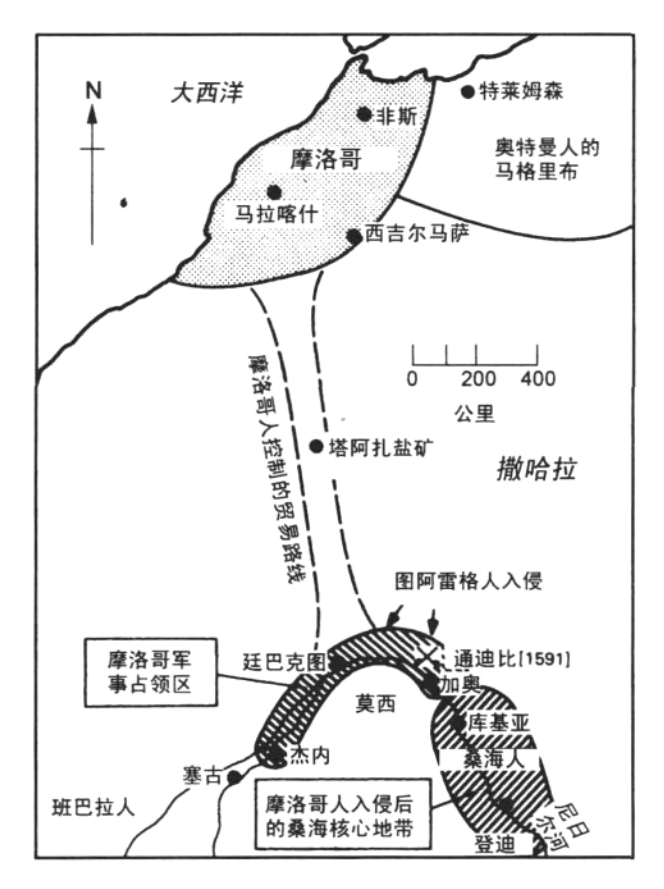
似乎还是稳定的。虽然敌对国家可能转移走了桑海的一部分贸易，但这个过程是渐进式的，也没有到了直接导致帝国瓦解的危险程度。由于没有发生大的征服战争，因而桑海的统治者没有过度地压迫农民到可能会引起农民反抗的程度，而且在这一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也都没有什么外部威胁。阿斯基亚没有理由要进口欧洲生产的原始的、不可靠的枪炮来将他们的军队近代化。南面、东面和西面的邻国都是较小的国家。在北面，直到1591年头几个月，对好战的、马格里布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来说，撒哈拉沙漠仍然是一个不易穿越的屏障。

摩洛哥人的入侵与桑海的瓦解

摩洛哥人入侵桑海主要是为了控制和复苏跨撒哈拉的黄金贸易。为此，摩洛哥苏丹艾哈迈德·曼苏尔派遣精锐部队——一小支作战经验丰富、装备有最先进的膛炮的职业士兵穿越了撒哈拉沙漠。摩洛哥军队有4 000名士兵、600名非战斗人员以及1万头携带武器装备的骆驼。他们大约花了两个月时间才穿过沙漠，但在此过程中已有多至四分之一的人丧生。当他们到达尼日尔河堤岸时，桑海人及其统治者大惊失色。1591年3月12日，在加奥附近的通迪比(Tondibi)战役中，由于摩洛哥人非常熟练地使用火器，使得冲上前来的、庞大的桑海军队陷入了一片混乱。 180

似乎很容易就取得了通迪比战役胜利的摩洛哥人继续去攻占廷巴克图和杰内。但是他们在攻取这一整块区域时遭到了挫败。大批桑海军队在通迪比躲过了摩洛哥人的枪炮，并在桑海的核心地区登迪(Dendi)进行了重组。他们很快明白在枪炮下进行攻击徒劳无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阿斯基亚·努胡(Askiya Nuhu)展开了持久的、积极的游击战，这种抵抗消耗了外来入侵者的资源和斗志。与此同时，出没于加奥、廷巴克图和杰内之外的农村地区的摩洛哥人不断受到富拉尼和图阿雷格游牧民的袭击。

除去早年的掠夺品和强缴来的赋税，入侵几乎没有给摩洛哥苏丹



地图 13.1 摩洛哥与桑海的瓦解。

带来什么长期的财政回报。事实上,桑海的持续抵抗使得摩洛哥人在撒哈拉南部必须要部署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而这将严重消耗摩洛哥人的资源。摩洛哥人在尼日尔河的存在依赖于枪支和其他昂贵装备的持续供给,其中有许多装备不得不用西非的黄金从欧洲购买。可是,摩洛哥并不能从其撒哈拉以南属地获得足够的黄金以支付这笔费用。就像这一章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由于南部和东北部新市场的出现,跨撒哈拉西部贸易路线中的阿肯黄金已经减少了。摩洛哥人入侵后持续的军事活动也没能扭转这一趋势。

181　1603 年,在苏丹艾哈迈德死后,摩洛哥人建立撒哈拉以南帝国的热情逐渐减退。一些摩洛哥人在 17 世纪依然继续出没于尼日尔河流域,但之前的桑海帝国已经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国家,其中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受摩洛哥人的控制。这些外出的摩洛哥人,现在被称为阿尔马人

(Arma)，与当地人通婚，并作为尼日尔河河曲地区的军事总督定居了下来。到 17 世纪中期，他们开始独立行事，且不再向摩洛哥苏丹进贡。1660 年，他们不再虚伪地承认摩洛哥的权威，苏丹的名字也从廷巴克图清真寺的星期五祷告文中删除，取而代之的则是当地阿尔马总督的名字。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图阿雷格的游牧民进一步向南挺进。1737 年，阿尔马人的统治最终结束了，图阿雷格人夺取了廷巴克图，并且控制了尼日尔河河曲中部地区的肥沃牧场。

在桑海帝国分裂出来的众多独立王国中，较为重要的是塞古(Segu)的巴马纳(Bamana)王国。它们是在尼日尔河上游三角洲地区发展起来的，且受到了苏丹穆斯林的强烈影响。下面这段对塞古的观察是由苏格兰旅行家孟果·帕克(Mungo Park)所写，他于 1796 年从冈比亚到达了塞古：

> 我现在所到达的地方，即巴马纳的都城塞古，确切地说，是由四个不同的城镇所组成的：在尼日尔河北岸的两个城镇分别为塞古克罗(Sego Korro)和塞古博(Sego Boo)；在南岸的两个城镇叫塞古索克罗(Sego Soo Korro)和塞古希克罗(Sego See Korro)。这些城镇都被高高的土墙包围着；这里的房子是由黏土建造成的，呈正方形，房顶是平的。有些房子是两层的，且很多房子都用白色涂料粉刷过。除了这些建筑，摩尔人的清真寺也随处可见；街道虽然狭窄，但由于没有车辆，所以其宽度也够用。经过细心的调查，我确信塞古总共约有 3 万名居民。
>
> 巴马纳国王一直住在塞古希克罗；他雇用了许多奴隶送行人过河，一年内(尽管每送一个人只收十个贝壳)，国王的这笔收入也较为可观……我们到达这个渡口时，发现有许多人都在等着过河；这些人默然地惊奇地看着我，我认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摩尔人。这里有三个不同的乘船地点，渡船夫非常卖力、敏捷；由于等待过河的人很多，我无法即刻过去，于是就在河岸边坐了下来，等待着

一个更适合的机会。宽阔的城市、河面上大量的独木舟、拥挤的人群，以及近郊的文明国家，一起构成了文明和辉煌的画面，这是我从未期望能在非洲内陆看到的。

——摘自 Mungo Park，*Travels in the Interior of Africa*，originally published 1799，this Eland Books；London，1983，pp. 149 - 150

182

地图 13.2　16 和 17 世纪的博尔诺-加奈姆。

博尔诺-加奈姆苏丹国

加奈姆的发展

到17世纪,加奈姆王国成为乍得湖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强国。它是由说卡努里语(Kanuri)的游牧部落建立的,这一部落通过劫掠近邻和从事跨撒哈拉贸易而积累了财富。他们大部分的财富都来自其南部俘虏与北非马匹的交易。马的使用使得加奈姆游牧民可以更加有效地劫掠其邻居。

17世纪的后半期,说卡努里语的塞法瓦部落在加奈姆建立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教王朝。早在9世纪,伊斯兰教就在加奈姆有着重要影响。到13世纪,加奈姆卡努里人已经开始与当地的农业人口通婚。国家定期向都城恩吉米(Njimi)附近地区的农民征税,而不是先前的不定期的游牧的侵袭与敲诈。

183

加奈姆在玛伊(Mai,即国王)杜纳马·迪巴拉米(Dunama Dibalami)统治期间,即1210—1248年,达到了其权力的顶峰。他指挥着一支由4万名士兵组成的骑兵部队,曾将加奈姆控制的跨撒哈拉贸易扩展至费赞。杜纳马·迪巴拉米以圣战或反对异教徒之名,将其对乍得湖西南部索人(So)的侵袭加以合法化。侵袭中所获得的俘虏被用于交换更多的北非马匹。较广泛的跨沙漠联系推动了伊斯兰教在卡努里人中的传播,到麦加朝圣成为一种惯例。开罗也为朝圣者和加奈姆来的学者修建了客栈。

博尔诺的兴起

13世纪末,博尔诺乍得湖西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朝贡国。14世纪,加奈姆走向衰落,博尔诺开始独立行动,直接从事跨沙漠贸易,且拒绝向加奈姆朝贡。过度扩张的加奈姆过分依赖于玛伊的个人权威,同时也缺乏支撑如此庞大的国家的自然资源,牧场因过度放牧而枯竭。与此同时,塞富瓦王朝(Saifawa dynasty)正在与一个敌对的布拉拉人

(Bulala)游牧部落为了争夺加奈姆领导权而展开斗争。大约在1400年,塞富瓦王朝通过迁都到条件更好的博尔诺草原地区,从而将国家从分崩离析中挽救了出来。后来,加奈姆正式成为附庸国,有时独立行事,有时承认博尔诺的权威。

通过建都博尔诺,塞富瓦王朝的玛伊得以进入一个更大的贸易网络。在15世纪,他们与西部的豪萨人建立了重要的贸易联系,主要用盐和马来交换阿肯的黄金。

16世纪,玛伊加强了对博尔诺人的控制,对农民的压榨一定相当严重,因为博尔诺由于一系列的内部叛乱而变得动荡不堪。当玛伊进行全国范围的圣战时,这些叛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在那些一旦屈服就不再侵袭他们的农业人口中建立起来了稳固的统治。国家的收入更加牢固地依赖于农民的定期赋税和贸易关税。在博尔诺中心地区,赋税以一个村子或家庭为单位加以核定和征缴。如果定期纳贡,那么边远地区原来的酋长就可以继续保有征收赋税的权力。俘虏的劫掠到这时已经深入乍得湖的南部地区。

16世纪后半叶,玛伊伊德里斯·阿拉沃马(Idris Aloma)通过从北非进口火器枪炮加强了军队力量。在桑海人军队没能实现"近代化"的时期,土耳其雇佣兵和顾问则被引过来以训练博尔诺新军。向玛伊纳贡的国家向西远至卡诺豪萨国(Hausa State of Kano)。同时,博尔诺与的黎波里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时,博尔诺的主导地位也将跨撒哈拉贸易从桑海和西部路线转移了过来。

我们对17、18世纪博尔诺的内部事务知之甚少。直到最近,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是博尔诺的衰落时期,但是没有支持这一观点的确切证据。与16世纪的战争不断相比,这一时期相对和平。博尔诺成为伊斯兰教的学术中心。关于这一时期的书面记载主要集中于宗教的发展。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传播开来,卡努里语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语言。南方的奴隶掠夺仍然是王室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直到18世纪末,东部豪萨诸国还继续向博尔诺纳贡。但是,由于不再经常进口新式火器,博尔诺的军事优势便逐渐丧失了。阿伊尔的图阿雷格苏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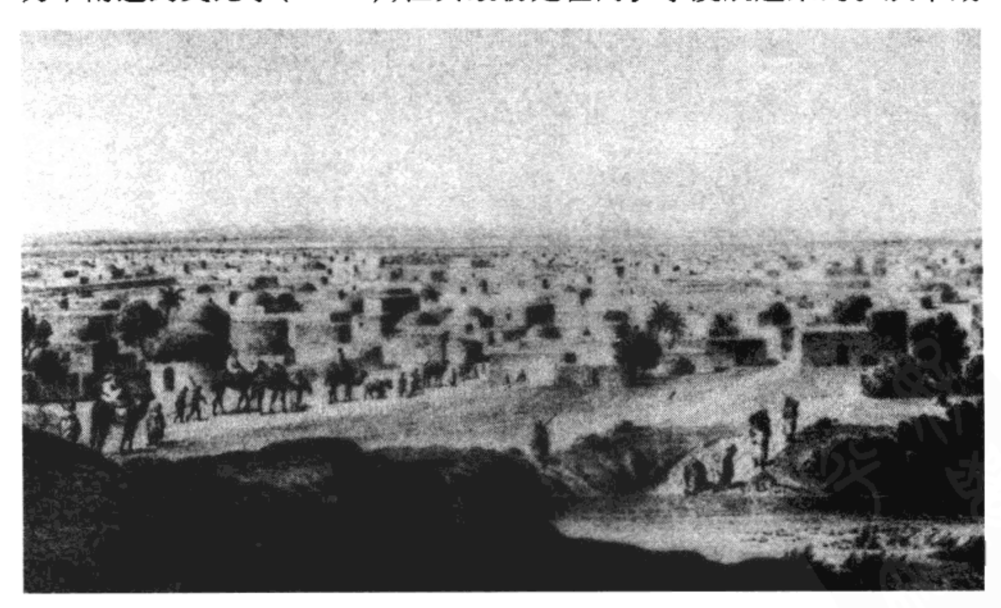
184

宣布独立，到18世纪50年代，就已经自主地经营比尔马(Bilma)盐矿了。博尔诺不再主导苏丹中部的贸易，但是它还没有丧失跨撒哈拉贸易路线。

豪萨城市国家

豪萨城市国家最初出现于公元1000—1200年间。豪萨人是由撒哈拉南部的游牧民和尼日利亚大草原北部不同种族的农民发展而来的。他们的基本政治单位是小型的围村(walled village)。早期的豪萨村庄的木栅栏是为了避开南部的撒哈拉侵袭者以保护居民而建的。栅栏占据着一大块地方，不仅圈住了定居地的住所，也围起了一大片可耕地。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村庄的围栏有助于该地区豪萨人及其牲畜度过长时间的围困。随着人口的增加，众多村庄聚集在当地最大的豪萨城镇周围以求得保护。这些村庄适时地变成了围城(walled cities)，而这些城市就成为各国的都城。

豪萨城市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制造业和商业，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别的产业。尽管豪萨城市国家是在15世纪图阿雷格人的压力下南迁到戈比尔(Gobir)，但其最初是在阿伊尔发展起来的。从早期



19世纪的卡诺(1851年德国艺术家的绘画)。

阶段开始，最北面的戈比尔的实力得益于在马里和桑海帝国的东部边界的跨撒哈拉贸易。建立于 12、13 世纪的卡齐纳(Katsina)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卡诺的财富建立在手工艺人和制造业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棉布的编织上。后来，卡诺的豪萨人进一步发展出染布和制作皮革的技术。卡诺的深蓝色棉布在西非人群中广受欢迎。大量从北非贩卖到欧洲的所谓“摩洛哥”皮革，就是出自卡诺的豪萨手工艺人之手。其他重要的豪萨国家有赞法拉(Zamfara)和凯比(Kebbi)。最南面的豪萨国家，定都于扎里亚(Zaria)的扎若(Zazzau)，是 16 世纪建立起来的。它是其他豪萨国家一个主要的奴隶供应者，这些奴隶是在对贝努埃河(Benue)地区的夸拉拉法人(Kwararafa)的侵袭中获得的。一部分奴隶留在豪萨地区供内部使用，另一部分则出口到博尔诺和北非以交换马匹、马具和枪支。

185

奴隶在豪萨社会中非常重要。城市里的豪萨人从事商业、战争、制造业和细琐的行政事务。外部输入的奴隶，则用于建造和维修城市的围墙，以及为城市生产粮食。在城墙之外，还有许多要向国家上缴赋税的自由耕种者和牧民。不断扩大的贸易联系将豪萨人带进了伊斯兰教



近代卡诺的染布坑。自 13 世纪开始，染色棉布就成为这里的主要贸易商品，这种染色棉布经西非，越过撒哈拉后被运到北非。

世界。14世纪,城市国家的统治阶层成为了穆斯林,不过大部分普通臣民对伊斯兰教信仰仍然无动于衷。

从16到18世纪,豪萨城市国家繁荣兴旺了起来。这些国家间存在很激烈的竞争关系,它们各自的地位也是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但是,没有一个豪萨国成功地征服了其他的豪萨诸国,也没有出现一个单独的豪萨"帝国"。

豪萨诸国在长途贸易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开始是在桑海与博尔诺之间,后来在阿肯金矿、博尔诺与阿伊尔之间的贸易上。但是,不断增加的敌意和城市国家间不断升级的战争,对它们的内部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对农村地区造成了破坏,且统治阶层为了战争向农民征收了过多赋税。为了增加奴隶的供应,豪萨诸国的统治阶层"非法"地将穆斯林平民变成奴隶,经常将他们贩卖到北非以换取火器和马匹。

186

18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在豪萨臣民中的传播,人们对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对豪萨统治者的腐化、压迫和不符合伊斯兰教的"非法"行为日益不满。19世纪早期,他们开始展开席卷该地区的"神圣革命"(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塞内冈比亚的沃洛夫王国

13世纪早期,由于加纳帝国的崩溃,塞内冈比亚地区说沃洛夫语(Wolof)的人建立了乔洛夫(Jolof)帝国,该帝国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1549年,卡乔尔(Kajoor)省的统治者领导了一场成功的反叛,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和多个沃洛夫独立王国的形成:卡奥尔(Kahoor)、乔洛夫、瓦阿洛(Waalo)和巴沃尔(Bawol)。

在17、18世纪,沃洛夫王国参与了与欧洲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每年输出数百个奴隶。许多奴隶仍保留在沃洛夫王国内,并为宫廷生产富余粮食,也从事沿海贸易城镇出口货物的生产。大西洋贸易产生了一个繁荣的粮食市场,以养活在这里的奴隶。这些奴隶被集中在戈雷(Goré)岛和圣路易斯(St Louis),等待着欧洲人(主要是法国商人)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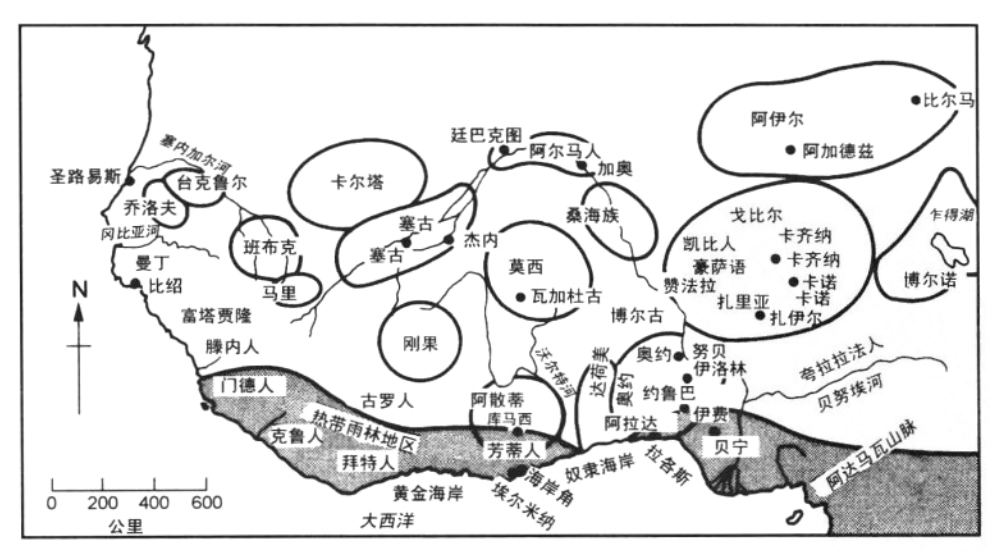
他们出口出去。从事这样的贸易使得沃洛夫人在沿海城镇扎下根来，也使得沃洛夫文化在塞内冈比亚地区成为主导性的城市文化，并使得沃洛夫语成为该地区的主导语言。沃洛夫商人、新出现的市场也让内陆的自耕农和拥有奴隶的地主提高了生产量。19 世纪早期，随着市场需求转向花生，沃洛夫农民和商人也迅速地做出了调整。

森林王国：伊费和贝宁

在今天尼日利亚的西部地区，约鲁巴语(Yoruba)是一个较大的语系。约鲁巴这个词发源于奥约帝国民族的豪萨名字。在今天的用法中，它指的是所有那些与奥约人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在历史上，说约鲁巴语人从尼日尔河下游西部的草原林地一直延伸至海岸边的森林地区。他们基本上是住在小型村落中的农民、狩猎者和商人。

约鲁巴国家的形成，似乎在 11 和 12 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像许多其他的非洲社会一样，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宗教联系在一起。按照约鲁巴宗教里的创世神话，“天神”奥罗伦(Olorun)来到凡尘成为约鲁巴的创始祖先，奥杜杜瓦(Oduduwa)则下界到伊费(Ife)。在伊费，奥杜杜瓦建立了最初的约鲁巴国家，后来他的儿子们散布开来，成为其他约鲁

187



地图 13.3　18 世纪西非国家与社会。

巴王国的首领。伊费的统治者或称为奥尼(*oni*),宣称是创始祖先奥杜杜瓦的后裔,从而奠定了其王权的基础。

早期约鲁巴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他们能生产富余的粮食。这使得他们不仅能养活不从事生产的统治者和官员,而且还能养活许多宫廷手工艺人和艺术家。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宫廷收入除了农民的税赋外,还有额外的贸易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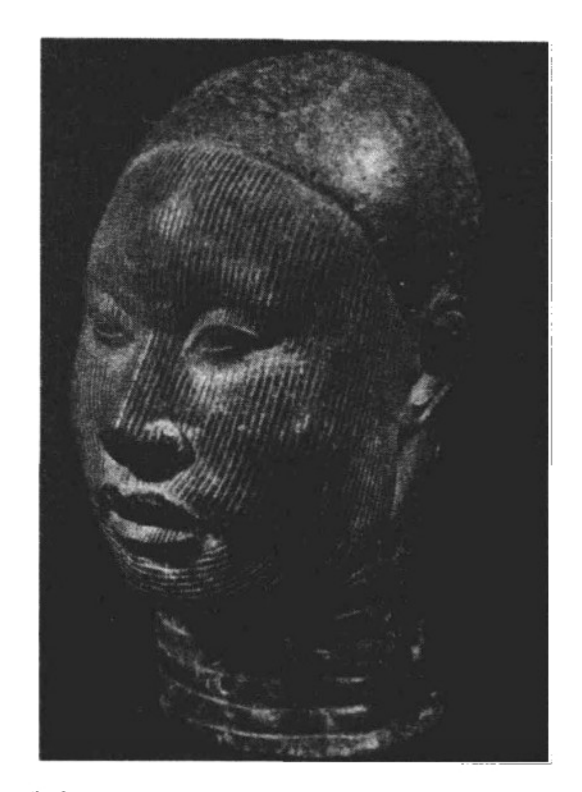
伊费是最早的约鲁巴国家,它能制造出整个西非地区最好的人工艺术制品并不是一种偶然。伊费可能是所有约鲁巴国家中在粮食生产上最占尽地利的国家。它建立在大草原与森林边缘地带。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多元化的环境适合各种根块和谷类作物的种植和家禽的饲养。关于伊费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我们所知甚少,但是它的居民一定有时间和财力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工艺技术,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森林王国才变得人所共知。

伊费的艺术家制作了各式各样的木雕与象牙雕、陶雕以及青铜、黄铜等铜铸件。其中绝大部分已由考古学家复原,测定年代为12—15世纪。陶件和金属铸件明显反映的是奥尼的生活场景,可能是在葬礼仪式使用的。铜的使用意味着与撒哈拉矿井之间存在贸易联系。约鲁巴人可能是用粮食、可乐果和象牙从萨赫勒人那里获取了铜或许还有盐。

当然,我们对在该地区发现如此高度发达的工艺技术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里提及过关于诺克文化和伊博-尤库青铜器的一些情况,西非人有着制作陶器与铜合金工艺的古老传统,金属加工技术未必是从远方传过来的。

188

说埃多语(Edo)的人住在尼日尔三角洲、森林深处的伊费南部与西部地区。虽然他们主要居住在小型的村落酋邦里,但在贝宁也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城市国家。贝宁的王权可追溯到11世纪,与伊费王权的存在约处于同一时期。事实上,贝宁的奥巴(Oba,即统治者)宣称自己是约鲁巴的创始祖先奥杜杜瓦的后裔,并以此塑造了自身的权威。到15世纪,贝宁成为一个庞大围城,长约几千米。一个大约在1600年到过贝宁城的荷兰旅行家将贝宁城里的宽阔街道和精致房屋与荷兰首

伊费青铜器。

都阿姆斯特丹做过对比。

到15世纪中期，贝宁的奥巴埃瓦雷（Ewuare）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并且将贝宁扩张成一个较大的帝国。到1500年，贝宁帝国的范围从东部的尼日尔三角洲一直延伸到西部拉各斯（Lagos）的沿海泻湖地区。埃瓦雷通过挑选和任命地区首领加强其统治，并建立了稳定的奥巴继承制，即长子继承制。

当葡萄牙人于15世纪后期首次与贝宁建立联系时，贝宁还处在扩张时期。因此，奥巴将战俘卖给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就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所论述的那样，再将俘虏出口到阿肯以换取黄金。16世纪早期，贝宁的扩张结束了，奴隶出口也终止了。之后，在16和17世纪，贝宁卖给沿海地区欧洲人的主要出口货物是胡椒粉、象牙、树胶和棉布，欧洲人再将其贩卖给沿海一带的其他西非社会。一直到18世纪，古王

189

国由于王朝争端和内战而灭亡，贝宁才又开始给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提供奴隶。典卖自己的平民为奴以及进口火器破坏了贝宁社会的生产力，并加速了其在 18 世纪的衰退。

像伊费一样，贝宁拥有高度发达的宫廷艺术。人们不断制造青铜、黄铜等铜头像与铜雕像以示对奥巴的尊重和纪念。钉在木质宫墙上的、精心制作的铜画展现了他们过去的光辉事迹。绝大部分艺术制品在 1897 年英国军队洗劫这座城市时遭到掠夺或毁坏。在 16 和 17 世纪里，葡萄牙商人提供了新的铜来源，贝宁的宫廷艺术达到了顶峰。葡萄牙商人也将自己画在一些铜片上。贝宁艺术家也制作了许多卖给欧洲人的象牙雕刻、盐皿和手镯、脚镯。这些物品很可能是葡萄牙商人特别委托制作的，它们也许是非洲艺术家为迎合欧洲旅游市场而制作的最早期产品。

奥约和达荷美，17 和 18 世纪的草原国家

奥约的兴起

尽管伊费是最古老、发展程度最高的约鲁巴国家，但其重要性很快就被北方的奥约王国超过了。14 世纪，奥约由奥杜杜瓦的一个后代创建，与其南部地区的约鲁巴邻邦不同，它坐落在热带森林北部的草原林地上。这个地区非常适合种植谷物，而且处在森林地区的约鲁巴地区和北部豪萨国之间具有贸易优势的地理位置上。另外，这个国家没有采采蝇和森林中其他携带病菌的昆虫，因而也适合养马。借助于常备骑兵部队，奥约的阿拉芬（alafins，即统治者）得以建立起其征服地国家。

由于奥约在森林里不能有效地使用骑兵，它要向南扩张，就被限制在东南方向。从今天尼日利亚西部到今天加纳东部的森林带上有一个断裂处，在那里，开阔的草原一直延伸到沿海地区。进入这个地区，奥约的骑兵能够进行侵袭并扩展帝国的权力。17 世纪末，奥约侵犯了沿海的阿拉达（Allada）王国，迫使它缴纳贡奉，因此也就获得了欧洲的大

西洋贸易通道。

18 世纪,奥约阿拉芬的权力和财富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这种权力的经济基础以及为阿拉芬骑兵提供经济支援的是王室农场里的奴隶劳动。这些奴隶是从战争中俘获的,或是从萨赫勒交换得来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另一来源是奥约的城镇和村庄里以及邻国上缴来的贡奉。奥约对沿海国家和豪萨诸国间的贸易也要征收赋税。另外,持续的扩张战争产生了远比王室农场所需奴隶多得多的俘虏。剩余的俘虏就被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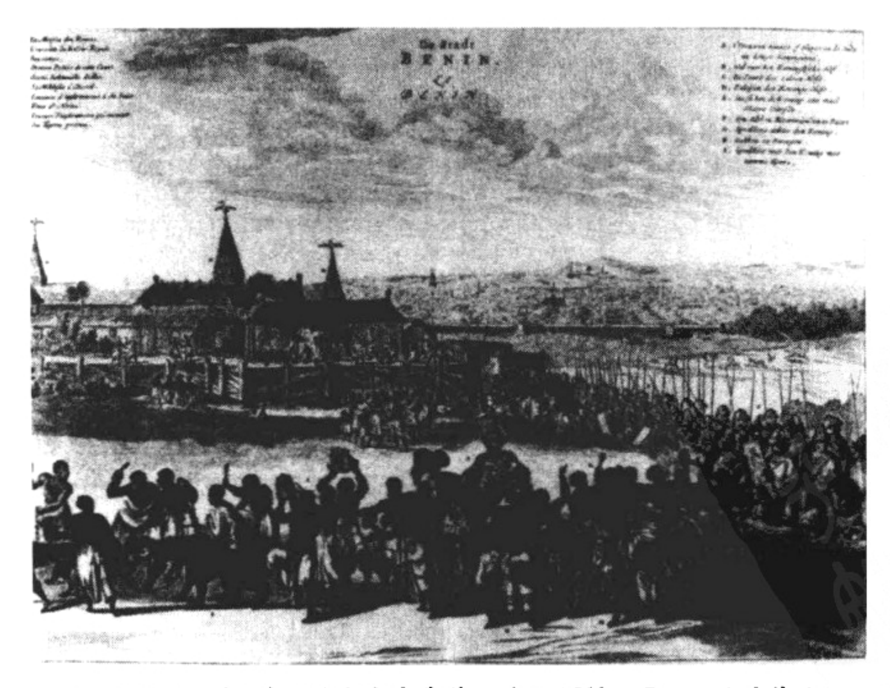
190



之前被钉在奥巴宫殿木墙上,后在 1897 年为英国所抢掠的贝宁青铜画片。



贝宁象牙盐皿。它是由一根象牙雕刻而成，此类物品是为卖给欧洲人而特别制作的。



17 世纪的贝宁，荷兰艺术家奥弗特·达珀(Olfert Dapper)的作品。

191 到海岸，作为大西洋贸易中的奴隶卖给欧洲人。火器、布匹、金属制品和子安贝是从沿海地区进口来的。其中，一部分留在帝国内，但是大部分被交易到北方地区以换取马匹和更多的俘虏。

18 世纪 80 年代，欧洲的奴隶需求大幅度增长，奥约成为从北到南的奴隶贸易的一个主要转运商。但是，奥约的统治者对奴隶贸易的过分依赖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18 世纪 90 年代，欧洲由于英法战争削减了奴隶贸易，奥约阿拉芬丧失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奴隶供应者所获得的财富回报越来越少，农民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18、19 世纪之交，随着王室权力的下降，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叛乱。19 世纪早期，奥约与豪萨诸国一样，面临着穆斯林的叛乱。

达荷美的兴起

位于今天贝宁共和国境内的达荷美(Dahomey)王国是一个被迫向奥约阿拉芬纳贡的近邻国家。(注意，在 1975 年，贝宁共和国是从达荷美改名而来的，但它与古代贝宁森林王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达荷美建立于 17 世纪早期。从沿海阿拉达王国来的少量阿贾人(Aja)向北迁移到丰恩人(Fon)地区定居了下来。丰恩人迄今仍居住在如我们在第六章描述过的、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农庄里。数年之内，阿贾人就开始宣称其对丰恩人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们以阿波美(Agbome)为都城建立了新王国达荷美。1650 年左右，韦吉巴加(Wegbaja)成为国王，正是他将达荷美组建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韦吉巴加宣布自己为国王，也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他可以对这块土地的生产直接征收赋税，而土地只是“出租”给其定居者。由于长子继承权，也就是由国王年龄最长的男性继承人继承王位的制度的建立，王室的权力得到了加强。这杜绝了传统的村落首领在继位问题上的任何纷争，也压缩了他们的潜在权力。与此同时，“王权崇拜”(cult of kingship)也发展了起来。“王权崇拜”由于引入了一年一度的人祭而得到了强化。人祭是为了表达对王室祖先的尊敬，而人祭用的牺牲通常都是战俘。

由于出身于沿海“奴隶”国家阿拉达，达荷美的国王决定充分利用从奴隶贸易中获取的收益。达荷美用其扩张战争中所抓获的俘虏从沿海地区进口火器。18 世纪 20 年代，达荷美征服了阿拉达和维达(Whydah)，因此可以和沿海地区的欧洲人进行更直接的联系。

至少有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达荷美的国王阿加札(Agaja，1717—1740 年在位)对这些沿海地区的征服，事实上是为了压制非洲奴隶的输出。根据这一观点，据说阿加札曾让欧洲人在达荷美建立使用奴隶劳动力的种植园，以此让这些奴隶劳动力留在非洲。但是，那时的欧洲人对这一方案并不感兴趣。对欧洲人来说，跨大西洋贸易体系利润诱人，且在达荷美建立种植园可能会脱离欧洲人的控制。阿加札没有强制推行这项政策，且达荷美对火器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致于阿加札及其继承者们继续向欧洲人出售战俘。

18 世纪，“奴隶海岸”的内陆地区由奥约和达荷美把持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特别是在沿海奴隶贸易控制权上的争夺很快就导致了冲突。在 18 世纪 20 年代后期，奥约四次侵入达荷美。阿加札无法击退奥约骑兵。于是在 1730 年，他同意向奥约阿拉芬纳贡。 192

尽管达荷美在与奥约的关系上处于新的卑屈地位，但在 18 世纪，达荷美王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并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从达荷美输出的绝大部分奴隶都是来自这个国家之外的地区。达荷美国王并不是唯一的奴隶贩子，仅仅是最大的奴隶贩子而已。达荷美的其他奴隶贩子要被课以重税。赋税主要用子安贝来支付，到 18 世纪，子安贝已经成为西非流通最广泛的货币。

达荷美的大部分人口并没有受到奴隶贸易的影响。他们绝大部分是居住在小型村落里的农民。但是，国王收税官的足迹遍及整个国家。他们定期到农村地区去，通过统计人口、家畜、庄稼和财产的数目，对赋税进行评估核定。收税领域几乎无所不在。王室本身就要依赖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种植园的生产来养活。在 19 世纪某个特定时候，达荷美卖给欧洲人的不再是奴隶，他们转而生产棕榈油卖给欧洲人，这或许让阿加札在 18 世纪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阿散蒂王国

阿肯国家的起源和兴起

14 世纪,马里帝国处在顶峰时期,马林凯、巴马纳和索宁克的职业商人分散在草原地区寻找新的贸易机会。在沃尔特河(Volta)上游地区,他们被称为乔拉(Dyula)。多年来,森林地区一直从事黄金和可乐果贸易,但规模较小。现在,由于乔拉的推动,森林边缘地区的阿肯开始定期生产这些产品。

直到这时,阿肯农民才得以进入森林打猎或者从事小规模的、季节性的黄金开采。由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清理陆地,在森林里进行永久性的定居和耕作较为困难。对像阿肯人这样的农民来说,留在森林边缘地带更加有利可图。然而,约自 1400 年开始,阿肯人开始使用奴隶劳动力来清理森林以进行耕作或进行黄金开采。这些奴隶最初是从乔拉买来的,且部分奴隶是用黄金购买来的。

15 世纪,阿肯人的永久性定居点在森林里出现。控制金矿的阿肯人既使用奴隶开采金矿,又使用奴隶为劳力种植粮食。很快,阿肯自耕农就被吸引过来,并定居于森林中的空旷地,成为"地主"的雇农。那些掌控着金矿的人就成为阿肯新酋邦的奠基者。

15 世纪末,像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论述的那样(参见本书第十二章),阿肯人不仅为黄金找到了新的市场,也为金矿找到了劳动力的新来源。在 15 世纪 80 年代,葡萄牙人建立了沿海贸易点,开始购买阿肯人的黄金以从贝宁交换来奴隶、棉布、金属和其他物品。后来,由于葡萄牙人给阿肯人带来了新品种的热带作物,如巴西的玉米和木薯,又进一步地推动了阿肯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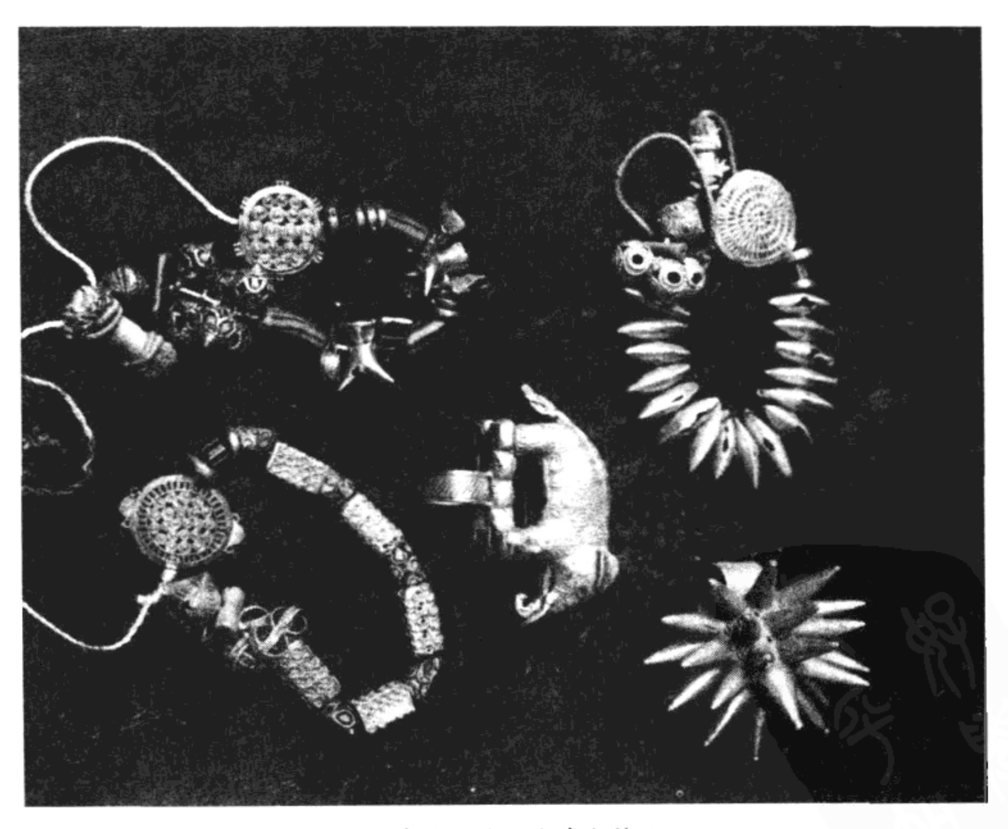
16 世纪出现了许多阿肯国家,比较重要的是内陆的登基拉(Denkyira)和阿夸姆(Akwamu),还有沿海地区的芳蒂(Fante)。当它们为新土地和新的黄金产地或者是为通向沿海地区的贸易线路的控制权而展开争斗时,这些崛起中的阿肯国家之间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后

来,所有这些国家都被阿散蒂(Asante)王国合并了。

阿散蒂的兴起

在17世纪70年代,奥塞·图图(Osei Tutu)建立了阿散蒂王国。奥塞·图图是奥约部族的军事领袖。他开始是在靠近库马西(Kumasi)的一个贸易中心建立起统治权的。他将其他部落首领召集在自己身边,利用库马西作为基地,征服了附近的阿肯酋邦。如此一来,他就以阿散蒂土王(Asantehene)为名,建立了阿散蒂王国。

最初,阿散蒂王国是一个在奥塞·图图军事领导下的松散的酋邦集合或者联盟。酋长们从村落、金矿利润中收集贡奉上缴给奥塞·图图,并且为阿散蒂土王的常备军提供士兵。由于得到了宗教领袖的支持,奥塞·图图在这些酋长中的权威得到了巩固。一位教士曾如魔法



阿散蒂君主的一些黄金饰品。

般地变出个象征阿散蒂王权的金凳子，并把它呈献给了阿散蒂土王。

奥塞·图图的联盟征服了登基拉和其他阿肯国家。到1700年，该联盟已经控制了森林地区的绝大多数黄金产地。奥塞·图图的继任者奥波库·韦尔一世(Opoku Ware I，1717—1750年在位)扩张了阿散蒂的边界，涵盖了今天加纳从沿海森林地区到北部大草原的大部分地区。在18世纪的征服和扩张战争中，阿散蒂统治者在沿海地区将战俘卖作奴隶。但是，王室收入从没有过分依赖这种贸易。

194

18世纪晚期，阿散蒂土王奥塞·夸杜沃(Osei Kwadwo，1764—1777年在位)实行了一种新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世袭的酋邦联盟也随之被废除了。官员的任命和提拔依据的是功绩而不是出身，大部分的地方税收也从当地的世袭酋长那里被收回了。军队也在更加集权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且军官由国王直接任命。

奴隶劳动仍然是绝大多数黄金生产的基础。一些金矿是国王直接所有，并由其代理人经营。其他金矿则为向国家上缴赋税的阿肯酋长所有。与此同时，阿肯自耕农季节性地在河边清洗沙金。农民将黄金



盛装的阿散蒂土王奥波库·韦尔二世。

卖给居所不定的阿肯商人，其中有许多商人都是国王的直接代理商。这些商人从沿海地区购买布匹、金属和欧洲火器，或者从北部购买盐、布匹和其他贸易物品，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出售这些物品以换取黄金。这种扩展了的贸易网络甚至将最遥远的村子也涵盖进来。这种方式让阿散蒂最大化地提高了黄金产量。国王或通过对贸易征收税赋或直接从贸易中得利获得最大收益。

第十四章　18世纪以前的中非和东非

195

刚果森林的农民、渔民和猎人

刚果河盆地是非洲最大的热带雨林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地区都为连续的稠密雨林植被所覆盖。此处除了可通航的河流，还有许



刚果河的渔民。

多高地，那里的森林被大草原的空旷地所阻断。多元的自然环境使得这个地区的人们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尽管他们基本上是农民、渔民或是猎人。有些人从事所有这三种生产劳动，有些人专门从事一种或两种生产劳动。最有名的专业猎人是生活在稠密森林区域的俾格米人(pygmies)。

所有这些行业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共同合作，而这一点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并不总是十分重要。农民在清理森林时需要精心的合作劳动，这种合作通常是从一个天然空地的边缘地区开始，或者是从在易受水灾的地区建造土堆开始的。猎人在挖坑和用陷阱捕杀动物时需要共同协作。修筑水坝、河里布网需要渔民共同协作。森林地区的主要作物是香蕉，草原空旷地的主要作物则是稷或高粱。在17、18世纪，高粱主要被美洲进口来的玉米和木薯所代替。

196

总的来说，刚果森林的人们居住在拥有30—200个成年人的村庄里。村庄如果再小一些的话，将会缺乏劳动力；村庄再大一些的话，就会对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造成太大的压力。村庄内的成年人之间通常有着亲戚关系，姻亲成为村庄间关系的基本纽带。妇女主要是种植者，依附于男人。村庄内部也有俘虏或人质，他们事实上也就是奴隶。另外，一些村庄与从事专门行业的人也有着一种亲属关系，如俾格米人，他们给农业村落提供肉食来源以换取粮食。

河道运输在地区间的贸易中至关重要。专业工匠建造了多种类型的独木舟。马莱博湖(Malebo Pool)位于可通航的数千公里水路的下游，是一个主要的贸易枢纽。

尽管在不同的村庄间存在着多样的联系，但在森林地区的内部却很少有较大的国家。在村落里，最常见的联系是婚姻联盟。其他类型的联系则是由某个战争首领，或由于共同的语言、宗教崇拜构建起来的。王国一般都是出现在森林空旷地上，比如开赛河(Kasai)中游地区的库巴(Kuba)、沿海地区的卢安果(Loango)、马莱博湖北面的蒂奥(Tio)。通常就是这些王国与沿海地区的奴隶贸易有着联系。

奴隶贸易时代的中西部非洲

15 世纪 80 年代,葡萄牙人到达了靠近刚果河河口的中西非海岸。他们很快就与刚果王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为刚果国王希望葡萄牙人提供教师和工匠以对其臣民进行教育和训练,所以他对与外国的交往很感兴趣。他也想要用新式武器和葡萄牙雇佣兵来加强军队。葡萄牙人也很乐意与一个在他们看来是强国的非洲王国建立联盟。葡萄牙人希望刚果能够给他们提供利润可观的黄金、铜币、银器和香料。但是,葡萄牙人很快就失望了。刚果王国只能出口少量的铜,而当地的制造商,比如酒椰纤维布的制造商,也在非洲沿海一带的其他地方贩卖铜。而且,葡萄牙实际寻找到的矿物和香料,在种类上并不丰富。在基本上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西非地区,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一地区的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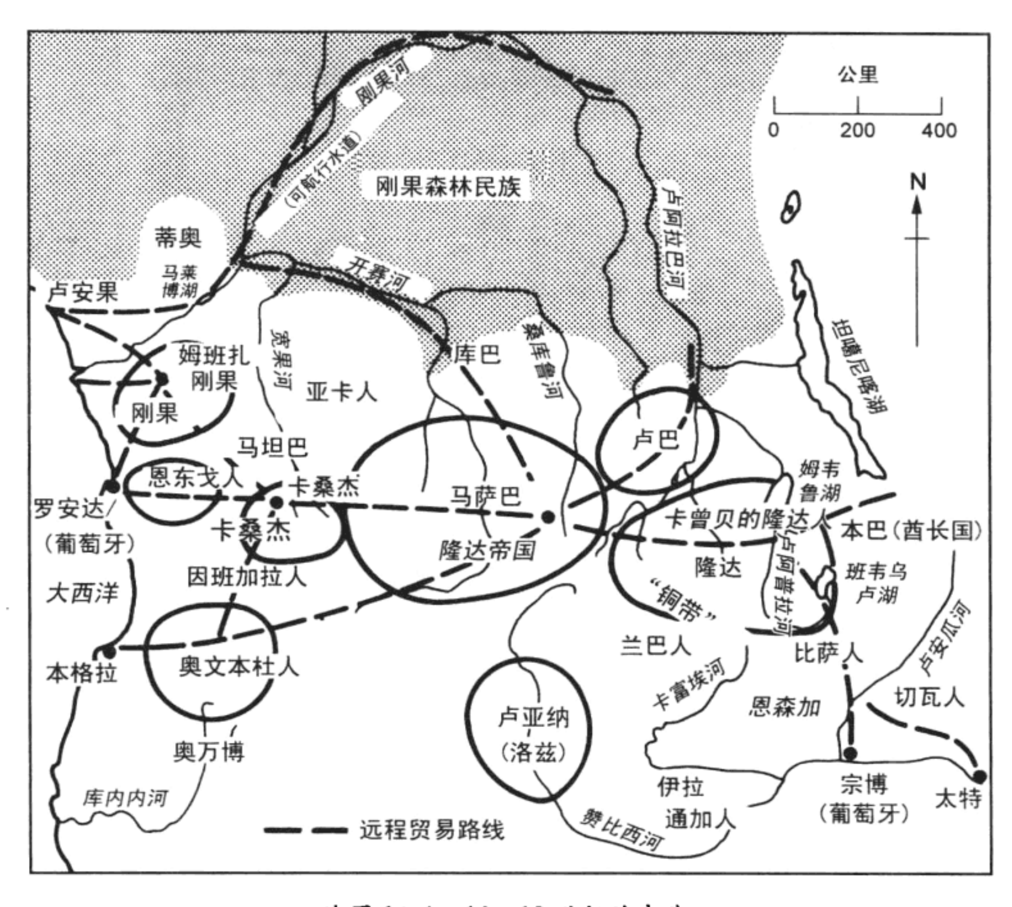
15 世纪 90 年代,葡萄牙殖民者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上建立了甘蔗种植园。他们希望将非洲大陆作为其奴隶劳动力的来源。在贝宁于 1516 年停止奴隶出口之后,刚果河口湾南部的中西非地区成为圣多美种植园奴隶的主要来源地。

刚果王国

葡萄牙人在沿海地区的出现激起了刚果王国内的一场争论,一派赞成与外国发展进一步的联系,而另一派则反对。赞成派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1506 年,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刚果人夺取王位,他就是阿丰索一世(Afonso Ⅰ, 1506—1542 年在位)。

197

阿丰索与他的“兄弟君主”(brother monarch)——葡萄牙国王交换信件,并在罗马与教皇进行了公开的会晤。在刚果国内,阿丰索在效忠王室的地区提倡基督教信仰。阿丰索借此提高了自身的权威,并逐渐削弱了地方宗教首领的权威。一方面,这使他不再像之前那样需要当地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也变得非常依赖葡萄牙人的支持。阿丰索用葡萄牙雇佣军和枪炮直接控制贡奉的征收和长途贸易,并通过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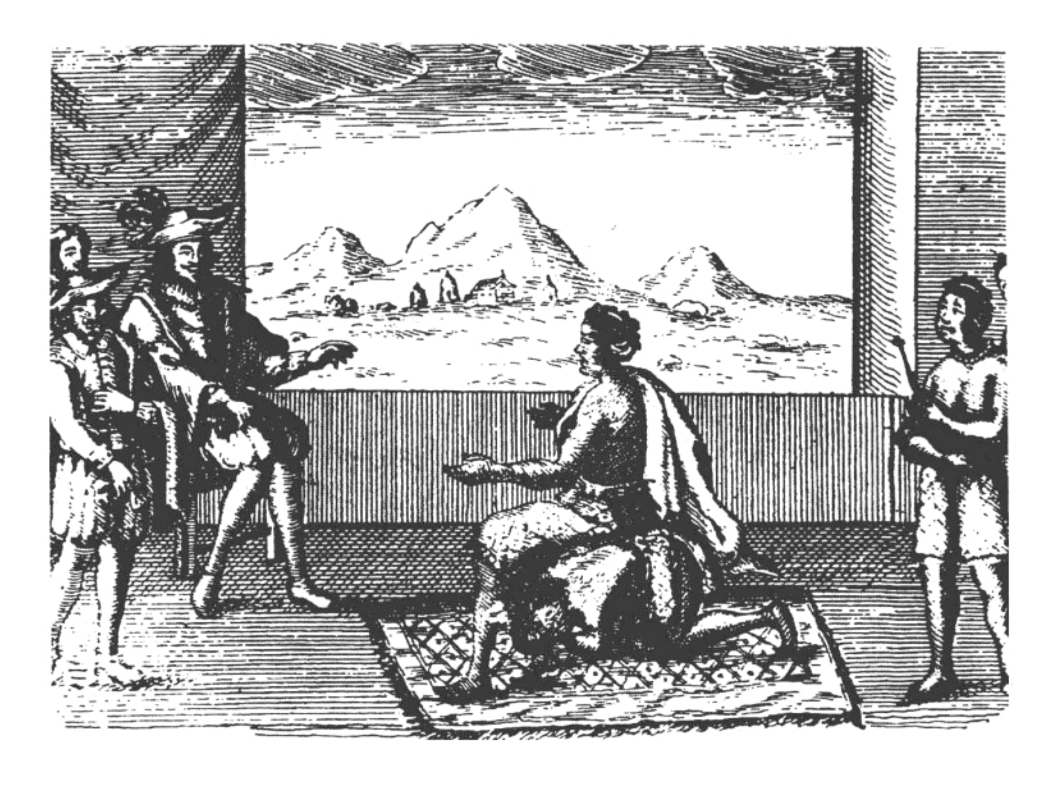


地图 14.1　16—18 世纪的中非。

方式将王国扩张到马莱博湖地区。阿丰索的征服战争产生了大量的俘虏，这些俘虏被当作奴隶贩卖到圣多美。作为交换，阿丰索引入了葡萄牙教士、士兵和金属制品。

在继续将刚果视为一个友好同盟者，还是将其简单地视为奴隶来源地的问题上，葡萄牙政府曾一度犹豫不决。圣多美的殖民者则没有这样的困扰，为了增加俘虏的供给，他们甚至推动当地反抗阿丰索的战争。从 16 世纪 30 年代开始，跨大西洋贸易的发展让刚果国王有了输出更多战俘的动力。

在 1568—1569 年，刚果国王遭到了来自东方的一次侵略。侵略者被称为贾加人(Jaga)，他们很快就占领了王国，使得刚果王国成为一片废墟，并流放了刚果国王。近些年来，关于贾加人究竟是什么人以及他　198



1622年，恩东戈的恩哥拉(1624—1663年在位)兼马萨巴(Matamba)女王(1629—1663年在位)恩岑加(Ndzinga)正在代表王兄与葡萄牙在罗安达的总督进行谈判。葡萄牙人拒绝给她一把椅子，因此，女王就坐在一名随从的背上以示恩东戈的恩哥拉与葡萄牙国王有着同等地位。恩岑加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了反对葡萄牙人的抵抗斗争中。

们为什么在1568年侵略刚果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争议。似乎是长期旱灾促使定居在宽果河流域的农业人口只得四处侵袭和破坏。他们也可能是对刚果人不断加重的纳贡和奴隶搜捕要求进行反抗。

1574年，刚果国王阿尔瓦罗一世(Alvaro Ⅰ)在圣多美雇佣军的帮助下，被葡萄牙人恢复了王位。但在这之后，国王在臣民中的权威下降了，国王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战俘出口以换取葡萄牙人的军事支持。17世纪，荷兰人的竞争刺激了沿海地区战俘需求的进一步提升。专职的非洲奴隶贩子和非裔的欧洲奴隶贩子在马莱博湖地区发现了另一条北方奴隶贸易路线，即刚果内陆和大西洋沿岸之间的贸易路线。这些奴隶贩子被称为庞贝罗(pombeiros)，得名于马莱博港口庞贝

(Pumbo)。后来,庞贝罗被用作一个普通术语,泛指绝大多数中西非职业商人。17 世纪,刚果的中央权威瓦解了,王国分裂成诸多敌对地方势力,为争夺战俘而相互展开斗争。

安哥拉与奴隶贸易

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圣多美成了跨大西洋运输战俘去巴西新种植园的一个主要的中转站。随着对奴隶需求的激增,圣多美的奴隶贩子在罗安达(Luanda)建立了一个奴隶贸易点,以避开葡萄牙王室的控制。在那里,他们从刚果的南方敌对王国,即恩东戈的恩哥拉(Ngola,即国王)那里购买战俘。16 世纪,恩东戈的奴隶贸易增强了恩哥拉的实力。为了能获得更多战俘,恩哥拉便组建了军队,并通过征服扩张了其王国。

199

贾加人对刚果的侵略已经显示出葡萄牙在中西非内陆地位的不稳固。后来葡萄牙人相当容易地击败了贾加人,促使他们对该地区进行直接的控制。有传闻说,宽札河(Kwanza)上游地区周围的山区存在着储量丰富的银矿层,这让葡萄牙人决定尝试着去战胜恩东戈(安哥拉)王国。

葡萄牙人入侵安哥拉遭到了姆邦杜人的强烈抵抗,热带疾病也让葡萄牙人溃不成军。16 世纪 80 年代,这场侵略战争慢慢停滞了,葡萄牙人的残余部队在此定居下来,并成为长期从事奴隶贸易的奴隶贩子。葡萄牙人的入侵引起了安哥拉的内战,因此也就增加了沿海地区的战俘供给。葡萄牙人和非洲裔欧洲商人以罗安达为基地,后来以南边的本格拉(Benguela)为基地,让安哥拉内陆在 17、18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成为大西洋奴隶的一个稳定来源地。在 18 世纪中期,仅罗安达一地每年出口的奴隶就超过 1 万名。如果说非洲这一时期哪个地方以奴隶贸易为主导,那就是安哥拉地区。在第十二章中描述的奴隶贸易所造成的最坏结果都在这一地区有所体现。

葡萄牙人本身并没有更多征服内地的野心,这也没有必要,因为内陆地区无休止的战争已经给葡萄牙人提供了所需的俘虏。葡萄牙人在

沿海港口对奴隶贸易征收赋税反而让沿海商人将奴隶贩卖给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商船。18 世纪大量廉价的法国和英国枪支的出售，更进一步提高了安哥拉内战的激烈程度，并促进了沿海奴隶贸易的繁荣。与安哥拉交换俘虏的其他重要进口产品是印度的棉布和巴西的朗姆酒。进口产品让非洲本土的手工制作和工业发展变得遥遥无期。

在安哥拉内部，因班加拉人(Imbangala)诸多分支广泛活跃于沿海市场的俘虏供应。因班加拉人历经干旱和战争，从中央高原地区中挣脱出来，并于 16 世纪 70、80 年代侵入沿海的低地地区。侵袭过后，很多因班加拉人重新定居下来从事耕作，其他因班加拉人则在罗安达成为帮助葡萄牙人劫掠奴隶的常规雇佣军。此外，因班加拉人还建立了劫掠国家卡桑杰王国(Kasanje)。在 17、18 世纪，卡桑杰成为奴隶的一个主要来源地。安哥拉内部的诸民族则深受奴隶贸易引发的战争之苦，这种状况至少延续到 19 世纪。

19 世纪早期，罗安达的葡萄牙总督派遣两个庞贝罗去调查中非内陆的贸易前景。他们沿着业已成形的贸易路线横越大陆，一直通往隆达帝国的两个都城，即姆瓦塔雅姆沃(Mwata Yamvo)和卡曾贝(Kazembe)。这两个王国在上个世纪已经开始主导内陆的长途贸易。

中非诸帝国与贸易的发展

隆达人的姆瓦塔雅姆沃帝国

在 17 世纪后半期，隆达人的姆瓦塔雅姆沃帝国达到其权力顶峰。此时，它已经在南部和西部地区建立了许多附属国，如安哥拉的因班加拉人的卡桑杰王国。卡桑杰王国成为大西洋沿岸贸易的纽带，并让卡桑杰王国在 18、19 世纪内具有重要的地位。

200

隆达帝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引入了在大西洋沿海地区从葡萄牙人那里直接进口来的美洲新作物，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和木薯，尤

其是木薯,迅速成为该地区,特别是干旱的大草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它甚至在那里取代了非洲本土的稷。木薯产量大,抗旱且便于储存。它让粮食有了更多的盈余,而这种盈余则保证了隆达帝国中心地带的稳定。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则增加了更多的可耕地。

姆瓦塔雅姆沃的权力建立在贡奉的征收和再分配的基础上,而这种情况又促进了长途贸易的发展。马萨巴(Musumba)附近地区是以粮食,主要是木薯来缴纳贡奉;而偏远的帝国酋邦则要上缴各种各样的地方特产,包括盐、铁、铜、金属制品、拉菲草布、篮子、陶器和象牙。

姆瓦塔雅姆沃将贡奉当做恩赐重新分配给支持者,或者与其他民族交换以获取奢侈品和必需品。随着长途贸易的发展,姆瓦塔雅姆沃出口到西方的两个主要物品是象牙和奴隶,用以换取呢绒布匹和枪支。枪支使得姆瓦塔雅姆沃进一步增强了对地区贸易和贡奉的控制。尽管中非隆达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纳入大西洋南部的奴隶贸易体系,但在安哥拉却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17世纪,隆达地区的贡奉征收者在隆达王国的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都建立了酋邦。他们维护当地"领主"的权威,而这些"领主"再征收贡奉上缴给姆瓦塔雅姆沃。其中,最重要的隆达国家是卡曾贝。

隆达人的卡曾贝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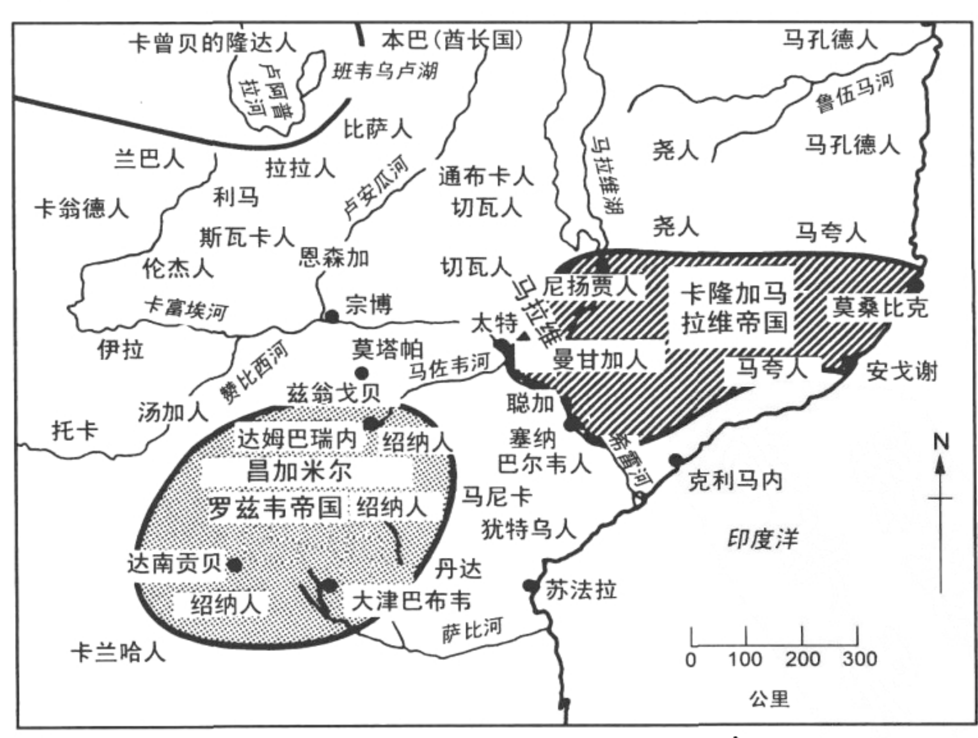
18世纪初,姆瓦塔雅姆沃派遣了一小支隆达人占领了卢阿拉巴河(Lualaba)上游地区的盐田。这支队伍的首领被授予卡曾贝称号,有权向东到今天赞比亚-刚果产铜带地区去扩展隆达的赋税征收范围。卡曾贝的继承者,即卡曾贝二世进一步向东扩大了隆达人的权力。至1740年,卡曾贝二世在卢阿普拉(Luapula)下游河谷地区建立了一个新国家。18世纪的后半期,这个新隆达国家凭借着自身的力量扩张成一个独立的帝国,对姆瓦塔雅姆沃的纳贡已经开始有名无实了。

卡曾贝帝国的财富来源于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帝国对有组织的长途贸易体系的控制。与姆瓦塔雅姆沃一样,卡曾贝保留了"领主",但派贡奉征收官将该地区的盈余粮食收到自己的手中,然后再用

这些产品进行有利可图的长途贸易。在利用贸易体系方面，卡曾贝的地理位置比姆瓦塔雅姆沃更好。王国中部，即卢阿普拉流域肥沃的淤土为木薯和玉米的生产提供了保障。盐是从西北方向的卢阿拉巴河上游地区运送过来的，而铜来自沙巴(Shaba)铜带地区，鱼来自卢阿普拉河和姆韦鲁湖(Lake Mweru)，上贡来的铁器则出自姆韦鲁湖与班韦乌卢湖(Bangweulu)之间的契森加(Chisinga)和乌士(Ushi)铁器制作者之手。

201

1800 年，卡曾贝三世时期的都城位于跨非洲庞大贸易网络的中心。与姆瓦塔雅姆沃不同，卡曾贝既能够利用大西洋贸易体系，又能利用印度洋贸易体系。卡曾贝的主要出口物品有铁、盐、铜、象牙和后来的奴隶。这些商品向西经姆瓦塔雅姆沃、向东南经比萨中间商，再运送到赞比西河流域葡萄牙人那里。卡曾贝的主要进口物品是欧洲的毛织品和枪支，印度的棉花和玻璃珠，以及卡曾贝宫廷用的奢侈品。



地图 14.2　17 和 18 世纪的马拉维人和罗兹韦人。

马拉维人的卡隆加帝国

我们在第十章已经叙述过，今天马拉维南部地区的酋邦在16世纪处于三个主要王朝的统治之下，其中地位最高的酋邦卡隆加，是马拉维湖南端的说辛扬加语(Chinyanja)诸民族的活动中心。辛杨加人南部的希雷河流域的曼甘加人则由隆杜王朝所统治，而更西边的切瓦人则处在翁迪王朝统治下。与隆达一样，这些王朝事实上是酋邦联盟，各自仍然保持着"领主"身份。王朝的王权主要体现在以粮食为主的贡奉上。

马拉维人是重要的铁器制造者和出口者，而赞比西河和希雷河流域则是马拉维人主要的象牙供应地。

16世纪末，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流域试图垄断象牙贸易，这引起了希雷河流域的隆达人的强烈反对。16世纪80、90年代，被称为瓦-津巴(wa-Zimba)的隆达大军洗劫了塞纳和太特，并洗劫了葡萄牙人的贸易城镇，在莫桑比克北部沿海地区制造出恐慌。瓦-津巴的确切起源仍然是个历史争论话题，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是一支由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军，这些流亡者可能新近从赞比西河流域葡萄牙人的奴役中逃跑出来并投奔到隆杜。瓦-津巴的破坏性入侵也可能是由严重的干旱所引起的，干旱也使得安哥拉的因班加拉人迁移了出去。

202

17世纪初，卡隆加的马苏拉(Masula)恢复了对隆杜王国的统治，并与葡萄牙人恢复了象牙贸易。卡隆加的马苏拉的统治时期大约是从1600—1650年，在此时期，马苏拉主要通过军事征服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马拉维帝国。1635年，卡隆加帝国的版图从西部的赞比西河一直延伸到东部的莫桑比克岛。1623年，马苏拉甚至试图侵略莫塔帕以将其权力扩张到赞比西河的南部地区。尽管后来马苏拉被迫撤退，但他带走了大量的黄金战利品。卡隆加的马苏拉统治非常稳固，足以让葡萄牙人不敢挑战马苏拉在赞比西河北部地区象牙贸易上的主导地位。

1650年，帝国的缔造者死后，卡隆加帝国开始逐渐衰落。马苏拉没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中央行政体系，过分地依赖于他的个人领导能

力和常备军的力量。诸酋邦开始宣布独立，马拉维湖东部的尧人(Yao)接管了希雷河与莫桑比克东部沿海港口与基尔瓦之间的象牙贸易线路。18 世纪，缺乏强有力统治的马拉维王国为 19 世纪的奴隶商队和侵袭留下了可乘之机。

津巴布韦高原的罗兹韦昌加米尔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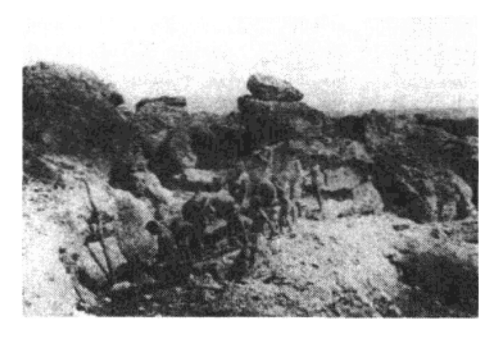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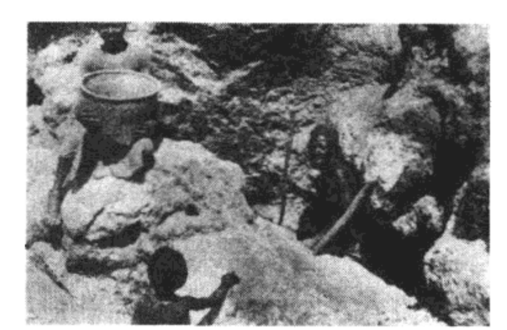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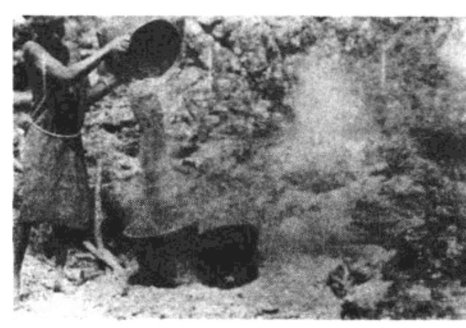
17 世纪，葡萄牙人逐渐控制了莫塔帕帝国。1623 年马拉维人的侵略以及随后一些年里的争端和内战削弱了莫塔帕的统治。赞比西河流域的葡萄牙定居者(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干预内战，以取消莫塔帕对他们在帝国内进行采矿和贸易的限制。在 1630—1670 年，葡萄牙定居者建立了许多贸易集市，并迫使当地人开放新金矿。葡萄牙人的暴行和压迫激起了当地农民的广泛抵制。农民从村落逃出去而不在金矿中工作，以寻找当地强势人物的保护。

17 世纪末，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推动了莫塔帕内私人武装的出现。穷人主要是寻求富人的保护，而那些拥有大量牛群的富人招募了很多穷人组建了私人武装力量。穷困家庭的年轻人为了换取足够的牛来支付未来结婚所需聘礼会当兵多年。如此一来，富有的牛群拥有者就能建立起私人军队来保护牛群和牧场，袭击邻邦的牛群和牧场，并抵抗葡萄牙人。

一个名叫杜姆博(Dombo)的富有的牛群拥有者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并获得了昌加米尔(Changamire)的称号。据传，他最初只是一个莫诺莫塔帕(Munhumutapa)牧民。17 世纪 70 年代，他是高原地区东北部较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可以与莫诺莫塔帕的力量相匹敌。他的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被称为罗兹韦(rozvi，即毁灭者的意思)，后来"罗兹韦"成为其帝国诸王国的荣誉称号。17 世纪 80 年代，昌加米尔领导由牛群和不断壮大的依附者所组成的军队侵犯西南地区。他打败了托尔瓦的统治者古茹斯瓦(Guruuswa，也作布图瓦[Butua])，并接管了其都城达南贡贝(Danangombe)。

203

从 1684—1696 年，昌加米尔杜姆博利用其残忍的、强有力的军队将葡萄牙人从莫塔帕和马尼卡(Manyika)的贸易集市中驱逐出去，其


19 世纪 90 年代，殖民前的中非地区的采矿。

罗兹韦帝国统治着津巴布韦高原地区。莫塔帕成为赞比西河流域东北部低地地区的一个小国。塞纳和太特的葡萄牙人，由于 1696 年昌加米尔杜姆博的死亡而得以保存了下来。在随后连续的争端中，罗兹韦军队从赞比西河流域撤退了。

昌加米尔王朝在整个 18 世纪对高原地区的统治建立在诸多因素之上，不只是罗兹韦军团的纪律和声誉。罗兹韦的存在及其威胁让诸多绍纳酋邦缴纳贡奉。军团也被用来照料和保护昌加米尔数目庞大的牛群。政府的专职官员，即班亚玛伊(banyamai)在小规模的军团支持下定期巡视全国。他们从各地征收贡奉，任命或废黜当地绍纳酋长。缴纳来的贡奉大部分是粮食、牛只、兽皮——农民维持生计之物，或者狩猎物如象牙。

204

黄金开采和贸易是在王室的严格把持下进行的，这有利于阻止葡萄牙人重新从事该地区的黄金贸易。葡萄牙人不再被允许进入帝国范围内，他们被限制在外国人的领地范围内以及赞比西河流域的交易点。18 世纪，葡萄牙人被允许在宗博(Zumbo)建立一个小的贸易点，但只

有其非洲代理人(vashambadzi)被允许进入罗兹韦帝国在昌加米尔的都城进行交易。在这里,沙金换取进口的布匹和念珠,然而,国家的大部分黄金,由当地的金匠精心制作成珠宝首饰以上贡给王室。昌加米尔不容许帝国的经济过分依赖对外贸易。绍纳人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牛群、狩猎和基础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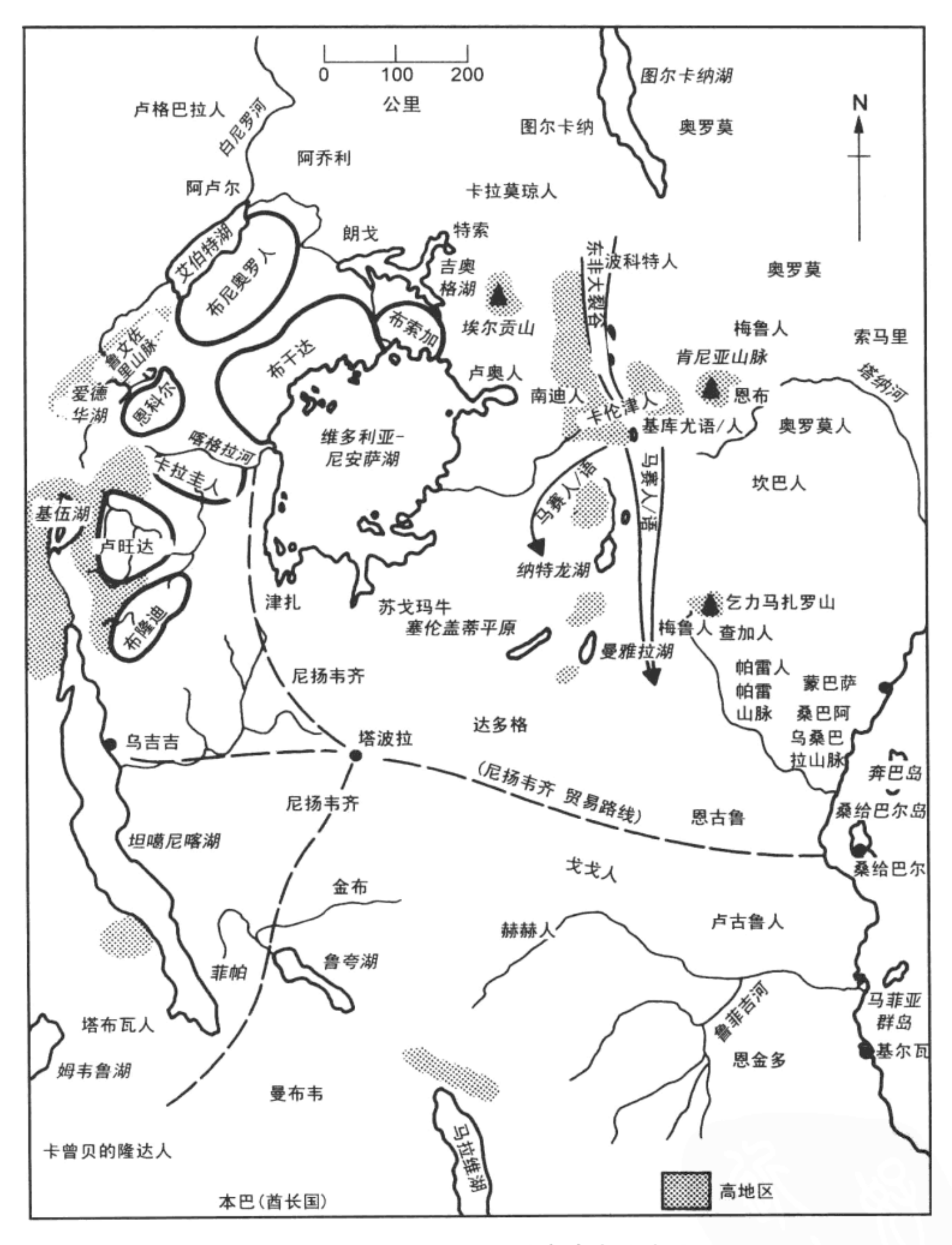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尼安萨湖西部的东非内陆

正如第八章所论述的那样,我们对东非历史的了解确实非常有限。一直到19世纪都没有关于东非内陆历史的书面材料。我们对该地区19世纪以前的历史了解最多的是内湖地区,布尼奥罗(Bunyoro)和布干达(Buganda)王国就兴起于该区域。

到16世纪,从更早期的楚韦兹(Chwezi)国家演变而来的比托(Bito)部落统治下的布尼奥罗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大国。布尼奥罗人实行一种综合了农业、狩猎和放牧的混合型经济。在国王的统治下,布尼奥罗人维持着一种以村落为基础的松散的酋邦联盟,并向国王纳贡。酋邦提供的军团在国王的率领下侵袭邻国,侵袭的主要目的是抓捕牛群并为国王带来额外收入。16、17世纪,布尼奥罗的侵袭向南扩展,经由恩科尔(Nkore)到达卢旺达,向东则进入了布干达。事实上,布干达部落于17世纪组织成一个紧密联系的中央集权群落,正是为了免遭布尼奥罗的袭击。

布干达的兴起

布干达在很多方面都是布尼奥罗的对手。在中央集权统治下,布干达是作为一个小型国家发展起来的。布干达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并以此奠定了实力。布干达的主要农作物是香蕉和车前草(长得像含有淀粉的蔬菜食品,而不像水果)。布干达的核心地区,即维多利亚-尼安萨湖的西北部地区特别适宜香蕉的生长。该地区土地肥沃且雨水充沛。一个香蕉种植园一旦建立起来,只要投入少量的劳动力就可以获得丰收。而且,收获过的和正在腐烂的植物会重新变成土壤的肥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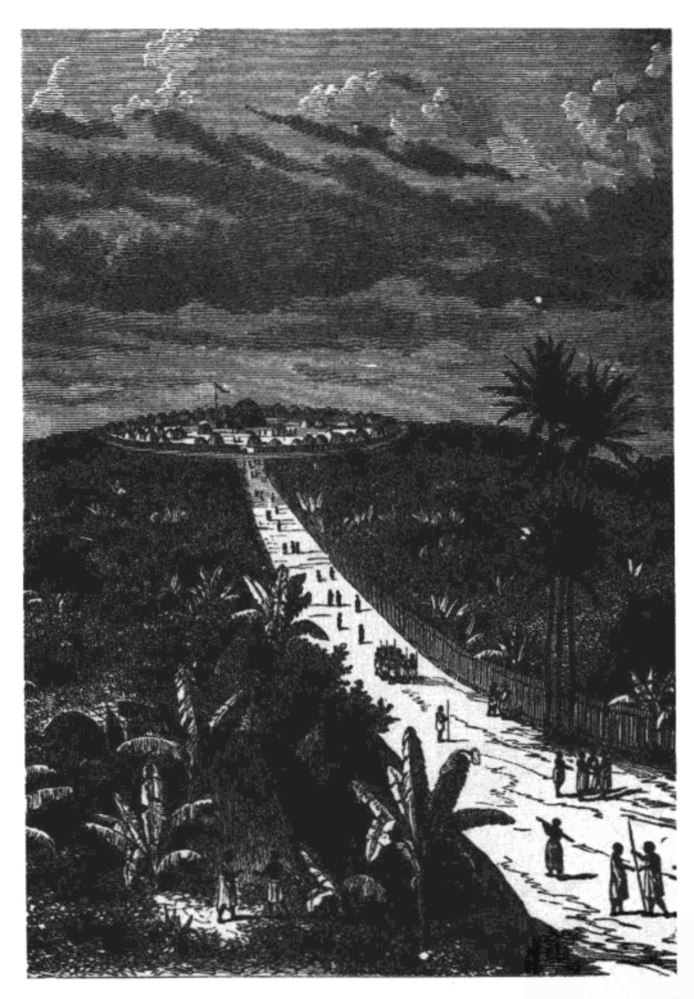
地图 14.3　17、18 世纪的东非内陆地区。

香蕉的生长无需不断转向新的或者休耕的土地，而这一历史时期非洲大部分技术含量较低的热带谷物种植则相反。因此，香蕉种植园在一定程度上为布干达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香蕉种植园让相当密集的人

口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的增长成为可能。这一点,再加上有必要避免该地区不受外界进攻,共同促成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出现。

布干达国王的称号为卡巴卡(kabaka)。18 世纪,正是卡巴卡玛旺加(Mawanga)将布干达带上强盛、中央集权化的王权之路。玛旺加及其继承者以牺牲传统的部落首领为代价来加强国王的权力。

206



H. M. 斯坦利(H. M. Stanley)于 1875 年 4 月 8 日所看到的布干达都城:"它位于一个可以瞭览大片美丽山河的山顶上。宽阔的道路从各个方向通向都城。最宽且最主要的道路是从国王的都城杜巴可以眺望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宽约 400 英尺,长近 10 里,两边都有大人物的住所和花园。"R. Stanley and A. Neame, *The Exploration Diaries of H. M. Stanley*, ed. William Kimber, London, 1961, p. 73。

财富和权力来源于土地生产力与农民的劳动。18世纪的卡巴卡让财富和权力的最终控制权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卡巴卡准许地方酋长占有土地，但酋长身份的获得依赖于对国王的忠诚，而不是通过世袭。这些酋长再将小片土地的控制权授予小酋长。农民缴纳的赋税按照等级被一层层地盘剥。由于香蕉的种植不需要占用农民的全部时间，农民也被要求从事公共事务如修路。布干达修建有复杂的公共道路网络，所有道路最终都通向都城。这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交通变得很方便，既加强了政府控制又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国王谨慎地控制着主要的酋长职位，使这些主要的酋长职位不受地方家族的控制。这样，国王就避免了可能威胁其权力的其他势力的出现。 207

以此为基础，布干达在18世纪发展成了强大、扩张的中央集权王国。到19世纪，如果说布干达在规模上还没有超过布尼奥罗的话，那么它在实力上已经超过布尼奥罗了。

西南高原的畜牧王国

在布尼奥罗和布干达的南部，坐落着人口密集的、富饶的恩科尔、卢旺达和布隆迪高原地区。与布干达相比，少数牧民统治着这里的大部分农业人口。正如第八章中所讨论的那样，16世纪前，牧牛日益变得重要起来并已经导致维多利亚-尼安萨湖西部丘陵地区出现了诸多小王国。其中大部分王国是混合型农业群落，但有些发展成专门的牧牛群落。这样的牧牛群落，在北部叫巴-希马(Ba-Hima)，在南部叫巴-图西(Ba-Tutsi)。希马人在恩科尔的农业种植者中取得了统治权，而图西人也同样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西南部地区居于支配地位。

起先，畜牧者能够使用高原的自然牧场，这些牧场是农民闲置而未耕作的地方。数个世纪以来，牧民们与农耕人口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一开始，牧民们用牛来交换粮食。希马与图西部族本想以平等贸易来从事交换，但随后却取得了贸易上的支配地位。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希马与图西部族将牛借给农民，但农民需要为其放牧牛群。尽管种植的粮食之前是贸易物品，但是现在却被要求作为贡奉上交给拥有

牛群的统治者。后者承担着贵族的“武士”阶层的角色，他们为属民提供保护，以免受到敌对的希马和图西部落的侵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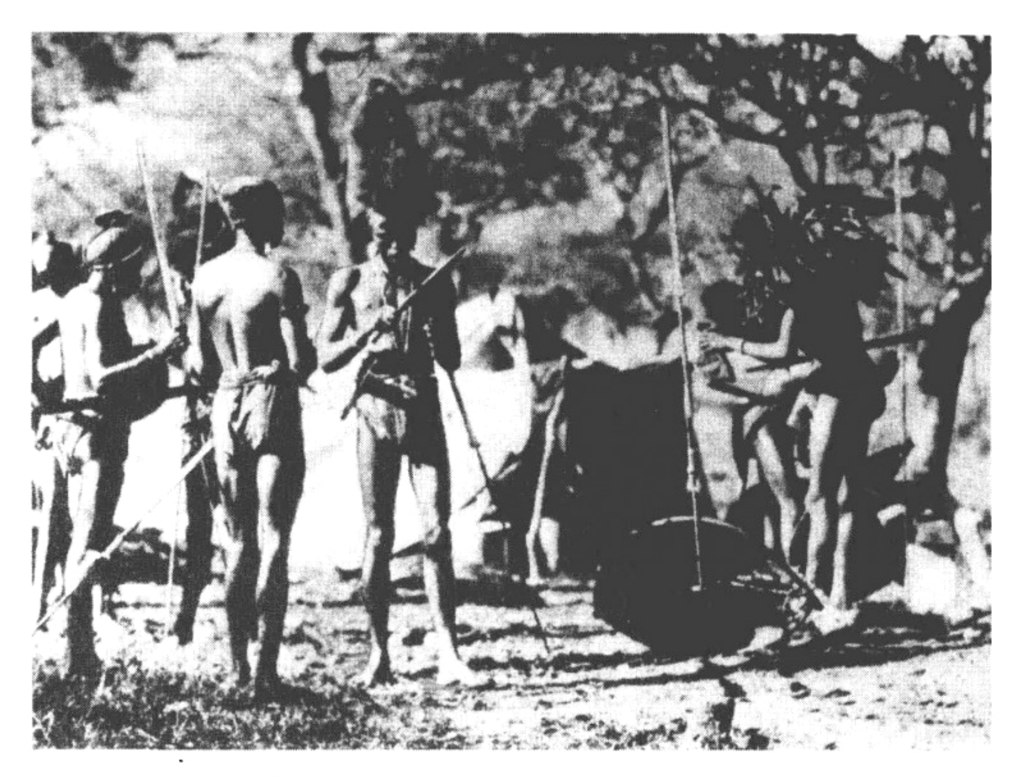
18世纪，南方的图西部落已经合并成两个主要的王国，即卢旺达和布隆迪，其中北边的卢旺达实力要强大一些。在这两个贵族制王国里，图西人用古代起源传说中的复杂仪式和神话来证明他们对地位低下的巴-胡图(Ba-Hutu)农民的统治的合法性。除了前述情况及其在20世纪的变种，这一体制其实并不是以种族为基础。胡图人通过累积的财富、婚姻或者战争中的勇猛进入到图西上层社会也是可能的。然而，在拥有牛群的统治者和从事耕种的属民之间的阶级差异还是形成了一种等级体系，这种建立在族群对立基础上的等级体系在19世纪变得更加尖锐了。

维多利亚-尼安萨湖东部的东非内陆

维多利亚-尼安萨湖的东部在这一时期内的主要发展是马赛人的扩张。他们是16或17世纪期间南进到该地区的说尼罗语人中最后迁移至此的牧民。所谓东部尼罗特人，或平原尼罗特人，或是叫帕拉尼罗特人，只是称呼不同而已，这些专业牧民成为乌干达东北部地区的阿泰克尔人和特索人(Teso)，肯尼亚西北部地区的图尔卡纳人和桑布鲁人(Samburu)，以及肯尼亚中部地区、坦桑尼亚北部地区的马赛人。 208

早期说尼罗语的牧民发现肯尼亚中部地区的牧场大部分是空闲的，所以可以和平地与当地的种植者和狩猎者杂居在一起(参见本书第八章)。但当马赛人穿过东非大裂谷来到坦桑尼亚北部平原时，发现牧场已经被牧牛者，如肯尼亚中部高原地区的卡伦津人(Kalenjin)所占有。因此，马赛人的扩张要靠武力来抢夺牧场。为了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马赛人坚持认为所有的牛群理所当然地属于他们，从其他民族劫掠牛群仅仅是行使他们的权利。

马赛人的社会是以进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年龄组制度组织起来的。在许多方面，这与本书第十一章所描述的奥罗莫人是相类似的。马赛人主要有三个年龄组：孩童、年轻人和老人。十来岁时，男孩子要



穿着传统服饰的准备狩猎狮子的马赛男人。

经过包括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内的成年仪式。然后，这些男孩子以年轻的成年人身份成为全职士兵和牧民。他们的职责是保护牛群和牧场，还有为了获得更多牛群和牧场而去从事侵袭活动。马赛人并不以单一的、团结的团体来行动，也不实行酋长世袭制。他们诸多相关团体由年长者组成的长老会来管理。

尽管马赛人会侵袭其他牧牛民族并将他们驱逐出牧场，但马赛人与相邻的说班图语的农民之间关系比较融洽。他们同基库尤人(Kikuyu)和坎巴人(Kamba)有着铁制武器和粮食贸易，且马赛人和基库尤人之间还有一定某种程度上的通婚。基库尤人占领着肯尼亚中部高原地区东部山麓，借鉴马赛人发展出自己的年龄组制度和成年仪式。　209

在今天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说班图语的农民仍然居住在以部落为基础的小酋邦里，尤其是坦桑尼亚高原上干燥的灌木草原地区的诸民族。就像乞力马扎罗、乌桑巴拉(Usambara)和帕雷

(Pare)山脉中的混合型植被地区一样,一些部族支配着其他部族。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查加人(Chagga)、帕雷人(Pare)和桑巴阿人(Shambaa)已经建立了相当大的国家。其中许多民族,与其北部地区的坎巴人和基库尤人一样,发展出年龄组制度和成年仪式,这种制度与仪式可能都是从更早期的说库施语的邻居那里学过来的。

虽然坦桑尼亚高原一般都是人口稀少,但一部分内陆地区却富产两种重要原料:铁和盐。铁和盐为地区性贸易网络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8 世纪末,西部地区的尼扬韦齐人(Nyamwezi)成为专职的商人和象牙搬运工。在维多利亚-尼安萨湖的南部地区,尼扬韦齐人开辟出长途贸易路线,连接起内湖地区诸王国与东非沿海地区。从内陆而来的象牙贸易,还有后来的奴隶贸易,在 19 世纪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商业活动。



第十五章　18 世纪前的南部非洲

1650 年前的南部非洲

210

我们在第十章曾论述过，到 17 世纪，晚期铁器时代国家和社会在南部非洲已经出现数个世纪了。在西北部地区，奥万博农民和赫雷罗养牛牧民已经占据了今天纳米比亚的北半部。索托-茨瓦纳亲缘类型的祖先主导着卡拉哈里沙漠东部的中央高地草原，他们在 19 世纪扩张到茨瓦纳、北索托和南索托等国。在德拉肯斯山脉的东部，恩古尼语族人在东南部低地草原的河谷和山麓组建了很多小型的、以部族为基础的酋邦。科伊桑语的畜牧者遍及纳米比亚南部和整个开普的西南部地区，他们与狩猎-采集者混居在一起。也可以在南部高地草原的索托-茨瓦纳和德拉肯斯山脉东部的恩古尼人地区发现后者的踪迹。最南端的恩古尼人，尤其是科萨人和科伊桑语族养羊、养牛的畜牧者混居在大鱼河(Fish River)地区，并建立了新科伊/科萨(Khoi/Xhosa)酋邦，如戈纳(Gona)和昆努赫维贝(Gqunukhwebe)。

绝大部分南部非洲社会一直存在着一定量的区域内贸易，但或多或少都是自给自足的。例如，西南部科伊桑人从他们北边的巴茨瓦纳人(Batswana)那里获得铜铁。这些金属中的一部分转运到科萨人那里换取大麻和当地的烟草。科萨人本身不是冶炼者，他们从位于他们

东北部的恩古尼中部地区获得铁。与此同时,北部的恩古尼人和莫桑比克南部的聪加人(Tsonga)将象牙、兽皮卖给德拉瓜湾的葡萄牙人,以换取念珠和其他奢侈品,这些物品被适时地加入更广泛的地区贸易网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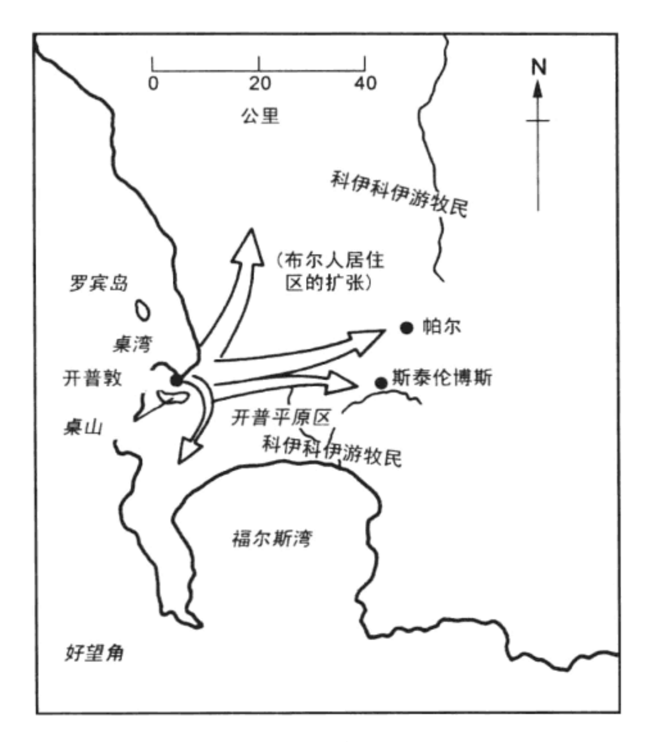
早期开普殖民地:白人定居点和科伊桑人的反抗(1650—1770年)

殖民地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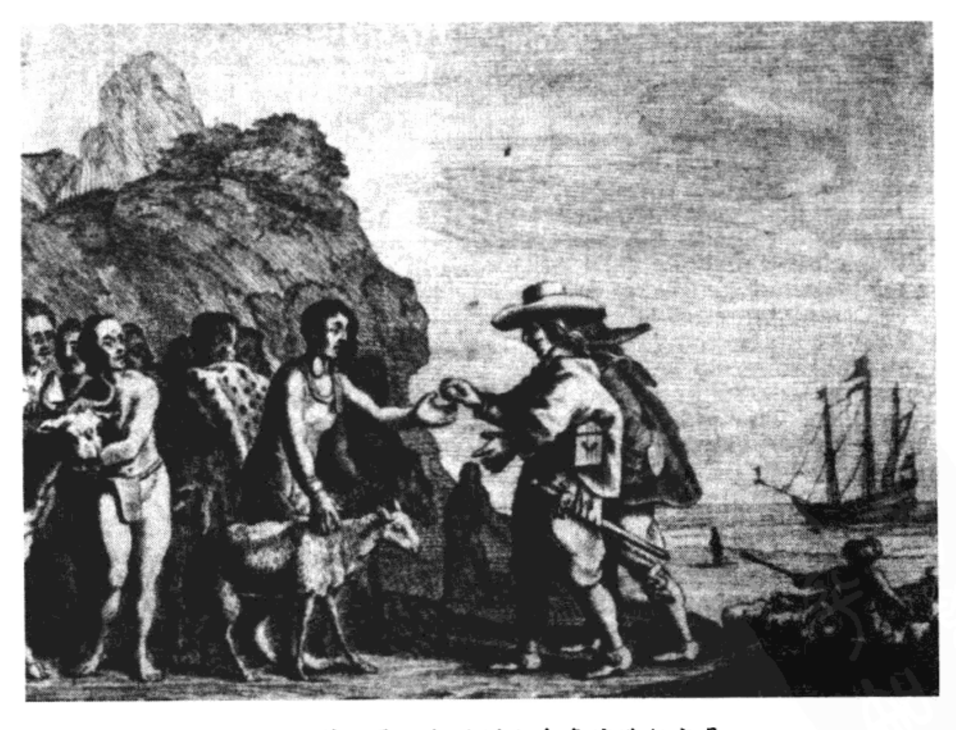
16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荷兰和英国人的帆船开始绕着非洲南端航行到印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欧洲人称之为"the East Indies",即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开普西南部正好处在欧洲与亚洲长途航运线的一半的位置。到17世纪,桌湾(Table Bay)已经发展成为船只补给的常用港口。在这里,船只可以重新装满水,并从当地科伊桑畜牧者那里采买肉食。

211 据估计,到17世纪中期,住在奥利凡次河(Olifants)和布里德河(Breede)的科伊桑畜牧者多达5万人。那些住在离桌湾最近的部族起初对新的贸易机会很是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卖出"富余"的、老的和生病的牲畜,以换取铁、铜、烟草与念珠。与从图兹瓦或科萨人的长途陆地贸易网络中购买的这些物品相比,从过往的船只中购买这些物品要方便和便宜得多。作为开普鲜肉的唯一供应者,科伊桑人能为牲畜要个高价钱。唯一的麻烦就是,欧洲人要的牲畜量常常超出科伊桑人准备的出售量,这就导致了冲突。欧洲船员有时会袭击科伊桑人,抓捕他们的牲畜并扬帆而去,不顾科伊桑人对下一个在海湾停泊的无辜船只进行报复(至少有一位以这种方式袭击了科伊桑人的欧洲船长遭到了报复)。

因此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开普鲜肉的供应既是不可靠的又是昂贵的。荷兰贸易寡头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52年在桌湾南部海岸建立了小型永久性定居点,以便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希望这样会使与科伊



地图 15.1　西南开普,1650—1700 年。



17 世纪科伊桑人与欧洲人在桌湾进行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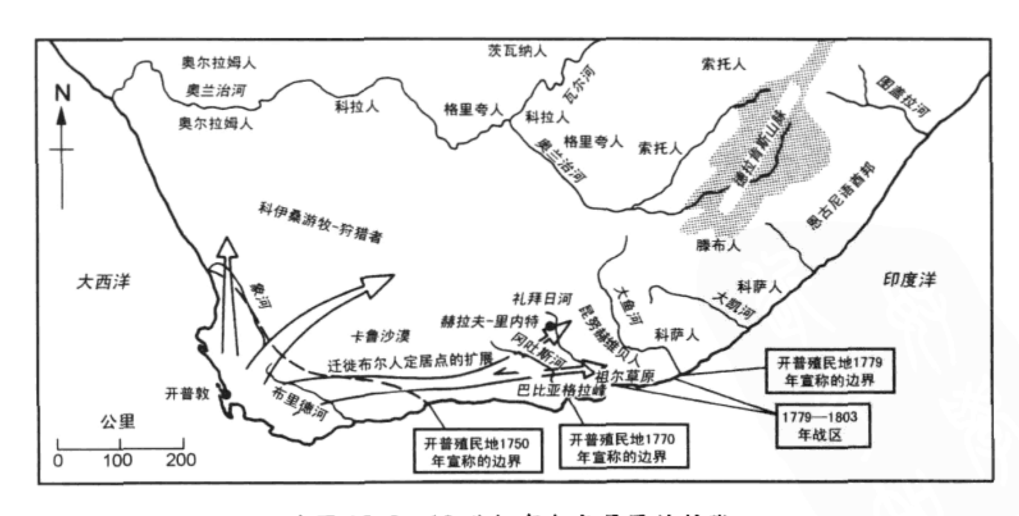
桑人的贸易正常化,因此也就可以使得价格降下来。同时,定居点也为船只提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并为生病的船员提供医治。荷兰人希望这样可以垄断开普的给养贸易,也可以从卖供应品给其他欧洲国家船只的贸易中获利。荷兰人修建了一个由公司卫兵把守的要塞,用来保护这个定居点免遭欧洲商船竞争者的袭击。

212

早期布尔人定居点与科伊桑人的反抗

然而,公司的水果和蔬菜园不足以满足定居点卫兵、公司职员和过往船只上船员的需求。因此在1657年,东印度公司的指挥官范里贝克(van Riebeeck)决定让一些士兵从契约中解放出来,允许他们作为自由民——即"布尔人"(荷兰语中的"农民")建立水果菜园。为了使他们的农场得以运转,公司给他们提供奴隶劳动力,这些奴隶最初是从西非带来的。自由民在桌湾南部的科伊桑牧场上设立定居点,这导致了1659年第一次科伊-荷兰战争的爆发。

开普西南的科伊桑人,最初是乐于与过往船只进行贸易往来的。很快,他们就后悔允许白人永久性定居点设立在开普。首先,公司对牛的需求量超过了科伊桑人准备卖出的自然富余量。公司只供应诸如铜、念珠、烟草和酒等奢侈品,以换取科伊桑人较为便宜的牲畜。铁很



地图 15.2 18世纪布尔定居区的扩张。

快就不再作为贸易产品，以防科伊桑人将铁做成矛，再用它来抗击白人定居点。也正因如此，枪炮从来就没有被出售过。科伊桑人在这种处境下，不愿意将牲畜卖出。白人便开始经常以蹩脚的借口，如一些烟草被偷了等来抢夺科伊桑人的牛。

白人定居点扩展到了科伊桑人传统夏季牧场上，致使科伊桑人在1659年成功地在军事反抗中团结起来。他们很快就明白欧洲原始膛炮(muzzle-loading guns)的局限性，并将自由民赶回他们要塞的保护区。尽管有过数次勇敢的行动，科伊桑人仍然没有能力攻破要塞。在平静了数月，贸易完全中断后，科伊桑人联盟开始出现分裂，其联盟首领不得不寻求妥协。范里贝克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他与科伊桑首领会谈的片段：

213

> 他们说了很长一段时间，说我们每天为了自己的利益，拿走了越来越多历史上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就是在这些土地上放牧牛群的。他们还反问说，如果他们以后到荷兰，是不是也被允许这样做。他们说："如果你们呆在要塞，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们来到内陆，给自己选择了最好的土地，并且从没有问问我们喜欢与否，这样是否会给我们带来不便。"因此，他们竭力坚持他们应该重新被允许自由出入牧场。他们说没有足够的草同时喂养他们和我们的牛。"阻止你们获得更多的牛，难道是我们的不对吗？如果你们获得很多牛，你们就会带着牛群过来并占领我们的牧场，然后说土地不足以给我们双方使用！那么，着眼于最大程度上的公正，谁应该让步，是天然的所有者还是外来的进犯者？"关于这一点，即我们曾告诉他们，不要期望能要回他们在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他们坚持说这是我们有意这么做的。
>
> ——摘自 D. Moodie ed., *The Record*, facsimile reprint, Balkema, Cape Town, 1960, Vol. I, p. 205

因此，通过宣称"征服权"，范里贝克简单地打发了科伊桑反抗者，而自由民继续占据开普半岛。此后，公司后来的指挥官以及自由民都

宣称,所有科伊桑土地,无论是哪里的,都是可以自由拿取的“空地”,是他们的土地。

荷兰人在开普的定居点的重要性是指,它不单单是另一个强有力的游牧团体。在开普建立欧洲出口市场会逐渐消耗掉该地区的本土牲畜,这又会刺激公司商人和侵掠者更进一步地进入内陆。为此,公司利用科伊桑部族间长期存在的矛盾,挑起他们为了牛这样的战利品而彼此争斗。1659—1660 年间科伊桑人短暂的统一再也没有在后来的斗争中重现。1673—1677 年的第二次科伊-荷兰战争主要是一系列的夺牛大战。公司的官员劝服贫穷的科伊桑部族站在他们一边,共同攻击那个实力强大的、抵制公司贸易进展的科克奎人(Cochoqua)。战争最终以科克奎人遭到削弱、公司带回大量的牛羊战利品而结束。

白人定居点的扩展:农民和迁徙布尔人

除了公司贸易和掠夺政策造成的牲畜损失,另一个直接威胁科伊桑人生存的是白人定居点的扩展。首先,公司的供应站已经不能自给自足,但是自由民布尔人的定居点在第二次科伊-荷兰战争后扩展非常快。他们穿过开普平原,定居在今天帕尔(Parrl)和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这些适宜农业种植的地区。在 17 世纪 80、90 年代和 18 世纪早期,白人达到了 1 000 人,公司鼓励他们直接迁徙。此时,殖民地已经生产出足够维持其自身生存的小麦,并能出口剩余品。其他的主要农作物是水果,尤其是造酒用的葡萄。

214

随着迁移定居者看到有如此多的可以“自由”进入的土地(只要支付给公司象征性的佣金),白人不想再作为农场的劳动力来工作。农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从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印度尼西亚输入的奴隶。在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年输入的奴隶是 200—300 人。到 19 世纪末,奴隶数达到 2.5 万人,而白人总数只有 2.1 万人。

白人农业定居点主要被限定在最接近开普的潮湿、肥沃的河谷地区。对科伊桑人的生存造成主要领土威胁的并不是这些定居点。18 世纪早期,游牧的“迁徙布尔人”(trekboer)已经成为白人定居点进入



准备安家的科伊桑人，1801—1803年曾在开普住过的英国画家塞缪尔·丹妮尔(Samuel Danielle)的作品。

内陆的先锋。好地都让最为富有的自由民和公司官员买完了，这让布尔人越来越依靠在干燥内陆地区畜牧和狩猎来谋生。他们被称为"迁徙布尔人"，该词来源于荷兰语"trek"，即"拖拉(货车)"的意思，因为他们经常处在迁移状态中，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牛拉车中。公司允许他们占有2 500公顷或更多的"农场"，一旦这些牧场被消耗完，他们就迁移到新的牧场。他们的家庭人口较多，每个儿子在成年的时候都可分得自己的农场，这被视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迁徙布尔人的定居地扩展得非常快。他们将从科伊桑竞争者那里买来或抢来的牛羊蓄养在农场中。

反抗的方式：科伊桑人独立的丧失

215

面对迁徙布尔人快速扩展所带来的挑战，科伊桑人采取了三种基本回应模式中的一种或更多：直接的军事对抗、撤到内陆或接受在布



骑在牛上的格里夸男人。

尔人社会中的次等地位。一开始,科伊桑人处在非常不利的处境中,一些人相继使用了这三种回应模式。除了布尔人的马匹和高级枪炮武器外,欧洲船只带到开普的天花传染病几乎将开普西南部的科伊桑人消灭殆尽。第一波传染病发生在 1713 年,由于缺乏对这种疾病的天然免疫力,数千科伊桑人,尤其是最靠近开普的科伊桑人都死了。

直接的军事反抗通常采用一种游击战的形式。由于被剥夺了游牧生活赖以存在的空间,没有牧场的科伊桑人又重新回到纯粹的狩猎-采集生活,只是这一时期的他们更像是猎人-侵袭者,捕捉过去剥夺他们土地的布尔人的牲畜。迁徙布尔人组建地区自发军事组织——“突击队”来加以还击。在殖民地的前线地区,骑在马背上的突击队利用自身的速度优势,以及收买对手和设置埋伏来袭击科伊桑“布须曼人”(Bushman,即对南部非洲有色人种的总称),并将他们消灭殆尽。突击队制度的缺陷是,它使布尔人的农场和家庭不能得到保护,因此突击队很难在野地里支撑太长时间。一旦突击队解散了,科伊桑人会重新展开攻击。在开普东北的部分地区,科伊桑人的抵抗在 18 世纪很多时间里阻止了迁徙布尔人定居点的扩展。

一个取代直接军事反抗的可行模式是撤到内陆，远离不断扩展的殖民地边界地区。很多一开始这样做的科伊桑人很快就被白人定居点不断向前迈进的边界追上了。但是，迁徙布尔人主要的前进方向是东面。因此，几个科伊桑人群体——科拉人(Kora)、奥尔拉姆人(Oorlams)和格里夸人(Griqua)——撤到了更北部的地区，得以维持某种程度上的独立。这些人中也混有科伊人、奴隶和发现自身为殖民地社会所排挤的欧洲人。一些领导人是殖民地的逃亡者，如德国人简·布隆姆(Jan Bloem)，他带领着一个科拉人抢劫团伙在奥兰治河(Orange)中游活动；还有贾格尔·阿弗里卡勒尔(Jager Afrikaner)，他逃至奥兰治河并领导着一个奥尔拉姆人狩猎-商人及抢劫团伙。 216

在 18 世纪期间，越来越多的科伊桑人听任其经济、政治独立性的丧失。科伊桑人答应为布尔人劳作，尤其是作为牧人和狩猎者，因而被允许在土地上进出。虽然劳动所获得报酬很少，但是他们通常可以养殖少量属于自己的牲畜。但是，随着科伊桑人独立性的丧失，他们的文化根基，甚至他们的语言也随之丧失了，他们在穿着、语言上都荷兰化了，并掉入他们"主子"的其他文化陷阱中去了。很多科伊桑人在布尔突击队里服务，并反对其他科伊桑人，有时也反对科萨人。

科伊桑奴仆最常见的一个来源是在突击队袭击中死掉父母的、并被抓回来的"孤儿"。这些孤儿被平分到突击队中作为"学徒"，并被强迫作为奴仆来无偿劳动，直到他们成年。成年后，他们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事实上，"学徒制"是迁徙布尔人劳动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有时甚至成为突击队攻击科伊桑人的理由。这种制度在 19 世纪被布尔人的后代带到了高地草原，并让布尔人得以保持最大的活力。

无论科伊桑人是通过何种途径被彻底地容纳到布尔人的社会里，他们依然处在下等阶层，绝不会获得殖民地全部的公民权(市民)。鉴于他们中混有被释放的奴隶、科伊人和欧洲后裔，白种殖民主义者在 19 世纪开始将这一整个说荷兰语的科伊桑人、被释放的奴隶和混种的下等人团体称为"开普有色人"(Cape Coloured)。

18世纪末的开普-科萨战争

背景

18世纪60年代末，迁徙布尔人的定居点东进到科萨人最西部领地。在18世纪，来自殖民地的白人和最南端的恩古尼人之间逐渐地建立起联系，据说甚至在18世纪前，就到达了黑人占据的肥沃、水资源丰富、养牛较多的开普地区，此地位于大鱼河。科萨人也很快得知开普西南较远的地方有白人定居者存在，但是他们对白人的存在没有什么警觉。他们将新的白人殖民主义者视为类似于科伊桑人这样的畜牧者，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吸纳到不断扩展的科萨人社会。白人殖民者和科萨人之间最早的一次直接联系是1702年的一次暴力行为。有45名自由民袭击了冈吐斯河(Gamtoos)的东部地区，他们袭击了一群科萨人并从科萨人那里抓获了数千头牛羊。但是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18世纪，一些迁徙布尔人贵族融合进科萨人社会，按照科萨的一夫多妻制方式娶了科萨人的妻子，为恩古尼人和殖民地之间建立了重要的狩猎和贸易联系。

217 整个地区真正的冲突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第一批迁徙布尔人来到名叫"祖尔草原"(Zuurveld)的牧地时，正是科萨人向西进一步扩张的时期。祖尔草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理想的夏季牧场，虽然在秋冬期间没有那么好。使用祖尔草原的畜牧者需要在祖尔草原夏季牧地与北部河谷或山区冬季肥美草原之间自由迁徙。一开始，虽然迁徙布尔人宣称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农场"，但他们只使用一小部分，科伊-科萨畜牧者也还可以在这块草原上放牧。但是后来，迁徙布尔人的扩张已经无法再向东展开了，因为前面是大鱼河外密集的科萨人定居地。因此，祖尔草原上原来孤立的布尔人农场间没人占据的土地很快就被利用完了。这种情势很快就导致了布尔人和科伊-科萨畜牧者之间的冲突，他们彼此指责对方的偷牛行为及使用对方的土地。

在与科伊桑畜牧者之间产生冲突的早期，科伊桑人总体上缺乏统

一，且绝大多数科伊桑部族规模相对较小，迁徙布尔人可以对此加以利用。迁徙布尔人在1700—1760年间已经有了东进的势头，科伊桑人虽然可以抵制但不能使其停止。相比之下，科萨人口更多，但社会组织更为松散。虽然经常由于内部政治争端而出现分裂，但是当科萨人领土受到不断扩张的迁徙布尔人定居点的威胁时，科萨人还是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团结和决心。因此，他们对殖民主义者展现了强硬的抵制态度，单靠迁徙布尔人的突击队已经无法应对这一局势了。

边境战争和布尔人的反抗（1779—1803年）

作战者或许不知，1779年开始的战争只是九次被称为“边境战争”(Frontier Wars)中的第一场战争。在后来的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殖民主义者和科萨人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第一次战争是因为布尔人越过大鱼河，在抢夺牛的过程中杀死了一位科萨牧民。科萨人的反击很是快速，冲突发展成为整个祖尔草原地区的全面战争。双方损失都较为惨重。迁徙布尔人的突击队洗劫了祖尔草原，科萨军团则夜袭他们孤立的农场。到1781年中期，战争未决出雌雄而告结束。

在18世纪80年代，随着恩德兰贝(Ndlambe)，即哈尔哈贝(Rharhabe)的儿子将其统治扩张到昆努赫维贝，越来越多的科萨人定居在大鱼河西部地区。科伊桑仆人相信布尔人不久就会被赶出该地区，他们开始背离“主人”而加入科萨人队伍。1793年，布尔人突击队为了挽救这一局面而再一次孤注一掷，袭击了祖尔草原上的科萨人并试图将他们赶到大鱼河的东部。但是他们的行动激起了未曾预料到的猛烈回击。在这第二次开普-科萨战争中，布尔人被从礼拜日河(Sundays river)西部的祖尔草原地区上赶了出去。该地区布尔人的高级官员，H·梅尼尔(H. Maynier)，即格腊夫赖内特(Graaff-Reinet)的郡守(landdrost，郡守是在当地选举出来的布尔人官员，负责登记和调查新土地的所有权，收集地租并召集保卫布尔人农场的突击队)认识到不可能再统治该地区了，便向科萨人求和。让当地布尔人懊恼的是，这让科萨人占有了祖尔草原和布尔人的大量牛群。 218

梅尼尔妥协之后，开普东部地区的布尔人指责开普政府没能保护他们的土地。1795 年，当梅尼尔试图向他们收取地租的时候，他们将他驱逐出格腊夫赖内特并宣布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但是，他们因为需要特定的必需品而严重依赖于开普政府。当政府削减他们的武器供应时，这种反抗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当开普东部地区的布尔人于 1799 年进行第二次反抗时，他们被一小支军事力量镇压了下去，这支军队是英国人派出的，英国已经在新近时期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手中夺取了殖民地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科伊桑人乘机反抗布尔人，并与科萨人一道袭击布尔人的农场。在后来的第三次开普-科萨战争中，英国人由于力量过小而没能控制局面，战争一直到 1803 年才结束。此时，绝大多数科伊桑人已经放弃了斗争并重新被布尔人雇佣，但科萨和昆努赫维贝人依然占据了祖尔草原的大部分。

南部非洲内陆的国家和社会(1600—1800 年)

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北部

16 世纪，从事畜牧的赫雷罗人和从事农业的奥万博人已经从安哥拉东南部的奥卡万戈(Okavango)地区和博茨瓦纳的西北部地区迁入到纳米比亚的北部。随着赫雷罗人的牲畜规模的扩大，他们为了寻找新的牧地而迁移出他们小型的、以部族为基础的定居点。他们绕开沿海地区的沙漠，向南进入纳米比亚中部的高地草原。在他们的东部，与其关系密切的姆班德鲁人(Mbanderu)向着今天博茨瓦纳西北部的甘济(Ghanzi)和恩加米兰(Ngamiland)地区扩展。同时，来自纳米比亚南部说科伊语的纳马(Nama)部族同样带着他们肥尾羊群向北进入中部高原的干燥草原。卡拉哈里沙漠和纳米布沙漠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向东或向西迁移。在 18 世纪，由于纳米比亚中部高原上牧场资源的稀缺，纳马人和赫雷罗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冲突导致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占据了该地区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卡拉哈里沙漠本身就很干燥，且沙化严重，零星点缀着荆棘灌木丛，

很少有季节性的草地。缺乏地表水使其不适合放牧牛群，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荒凉的猎区。只有一小群狩猎-采集者居住在那里，偶尔有来自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格里夸人和茨瓦纳人由于长途捕猎和贸易穿越此地。这一时期，在卡拉哈里沙漠北部，诸如姆布库舒人(Mbukushu)、苏比亚人(Subiya)和耶耶人(Yei)由于赞比西河上游洪泛平原洛兹国的扩张，被迫进入水源较好、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博泰蒂河(Boteti)、奥卡万戈河(Okavango)和乔贝河(Chobe)地区。在这里，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河岸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主要依靠狩猎、捕鱼和种植稷。

高地草原上的民族

219

在卡拉哈里东部，南部非洲高地草原的索托-茨瓦纳人已经发展出一种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大的政治单元(或国家)在高地草原的中



地图 15.3 18 世纪的南部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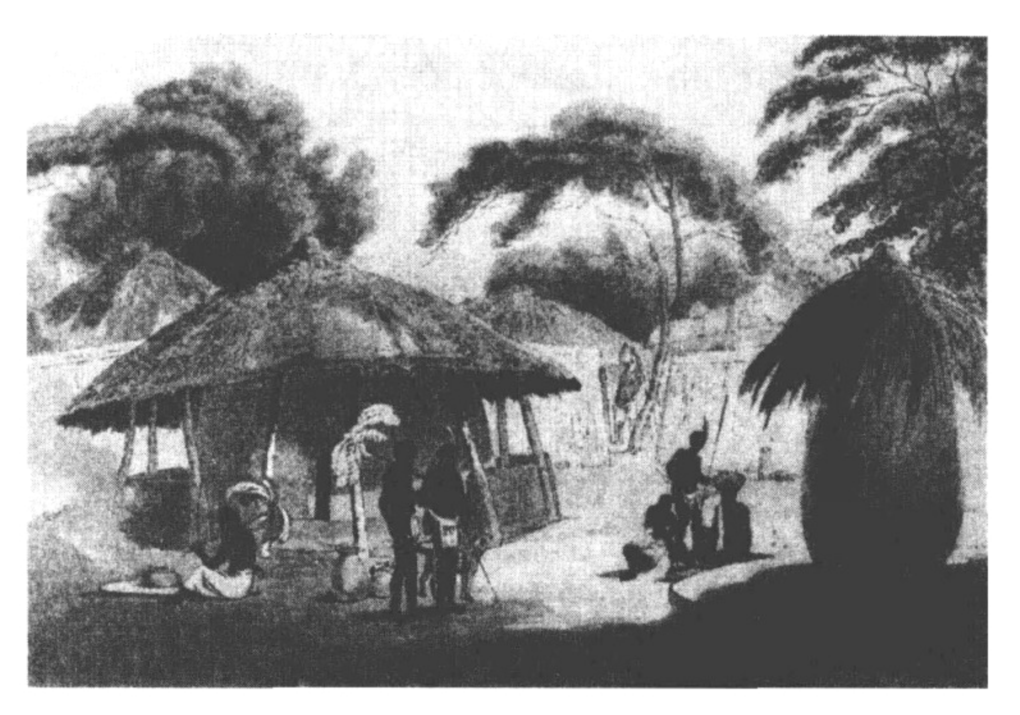
部和西部地区的茨瓦纳人中间已经极为明显地形成了。在大一点的国家里,其首领、国王或大酋长(Kgosi)在18世纪末统治着一个大的都城,人口高达1.5万—2万人。在仅可养活城镇的可耕田地上,种植着稷、高粱、南瓜和扁豆,人们需要定期照看以免受到野生动物的糟蹋。农业用地之外是可供放牧大量牛群的牧场,牧地之外就是狩猎区了。城镇本身自然形成或被行政划分为很多小区。每个区都是一种行政区域,由多个有亲缘关系的家庭及其侍从组成,并由一个首领,即区里地位最高的家庭家长来统治。如果王国(morafe)扩展,小的酋邦就会被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区吸纳到王国内,这个区仍然由自己的首领,即以前的首领来统治。中央都城之外,很多其他小型城镇和村庄也承认国王的普遍权威,并每年都进贡狩猎产品或庄稼。拒不纳贡常常会导致争端,对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关于这一时期的很多口头传说都涉及更大点的索托-茨瓦纳国家内所发生的分裂。这些分裂常常和继承争端相关,一个不满的权力申索人会率领着他的侍从、亲戚和其他支持者建立一个新的酋邦,脱离其竞争者要求纳贡的地域范围。分裂常常是在如干旱这样的自然灾害时期发生的,也可能是由寻找新水源、可耕地、狩猎领地或适宜不断增加牛群牧场的切实需求或愿望所推动的。

220

首领,或是大酋长,既是其臣民的政治领导人,也是宗教领导人。因此,他的一个最重要任务是主持每年的求雨仪式。这种仪式在9月和10月间举行,期望着早春降雨的到来,这也标志着在冬季漫长的干旱之后,农耕与种植季节的到来。酋长的成功与权力通常取决于他的"求雨"能力。一个酋长如果总是没能成功"求雨",就意味着丧失了与祖先通灵的能力。因此,漫长的干旱时期会刺激酋长地位的竞争,更可能造成王国内的分裂。

启动这些仪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制度就是要平衡这种争端倾向。酋长每隔几年,通常是在酋长子女达到适当年龄的时候,就会召集青少年参加仪式,也昭示着这些青少年步入成年。仪式尾期内容包括在习俗、社会行为上和男人圈内的教化,使得参加仪式的人构成了年龄团(age-



19世纪初期索托-茨瓦纳人的居所，英国画家塞缪尔·丹妮尔的作品。

regiment)。这些年龄团是酋长分派公共劳动的重要人力来源。但是，男性团体最为重要的功能是作为一支储备军，这支储备军可以召集起来进行防卫或从近邻那里抢夺牛群。从王国的区、村庄直接抽取相同年龄的男人或女人召集起军团，是维持国家内部团结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在17世纪初期，中部和西部草原高地上主要的茨瓦纳国家有罗隆人(Rolong)、胡鲁策人(Hurutshe)、奎纳人(Kwena)和加特拉人(Kgatla)的国家。到18世纪末，这些早期国家已经发生了扩张、扩展和分化，并统治着瓦尔河和卡拉哈里沙漠之间的大部分领地。 221

北部索托人的主要分支是佩迪人(Pedi)，他们是加特拉人的早期分支。18世纪佩迪人在派出自己分支的时候，其主要的根据地是德兰士瓦东北部的利奥鲁(Leolu)山区。向北到林波波河中游，就是洛贝杜(Lobedu)和文达(Venda)酋邦，他们起源于北部的津巴布韦的绍纳地区。

瓦尔河南部的索托酋邦的南部地区,往往没有形成具有位于他们北部的茨瓦纳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19世纪末期,他们的酋邦规模较小,数量较多,零星地分布在今天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和莱索托(Lesotho)的大部分地区。在瓦尔河的南部支流、向南流向奥兰治河的卡利登河(Caledon)的肥沃流域,酋邦特别集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南部索托酋邦,应是由15世纪从中央高地草原扩展到该地区的福肯人(Fokeng)建立的。瓦尔河北部在后来世纪里的进一步扩张和分化,将特洛夸人(Tlokoa)、科伊纳人(Koena)和塔翁人(Taung)等酋邦纳入到这一南部索托高地草原。

最后,经由位于今天莱索托正北部德拉肯斯山脉的狭隘通道,南部高地草原与东南部低地草原之间,经常出现人口的穿梭迁移。说恩古尼语的孜孜人(Zizi)甚至在福肯人到来前就可能穿过南部高地草原的东部地区。一些来到高地草原上的人,如德兰士瓦东部的恩桑萨人(Ndzundza)依然明显地保留恩古尼文化和语言。其他起源于恩古尼的小群人则较为彻底地融入索托-茨瓦纳社会,如德兰士瓦西部的利特人(Lete),今天莱索托的某些部族就被认为与恩古尼有亲缘关系。同样,一些养牛和有成年仪式的索托人的风俗习惯可能就是经德拉肯斯山脉传到低地草原的恩古尼地区。

东南部低地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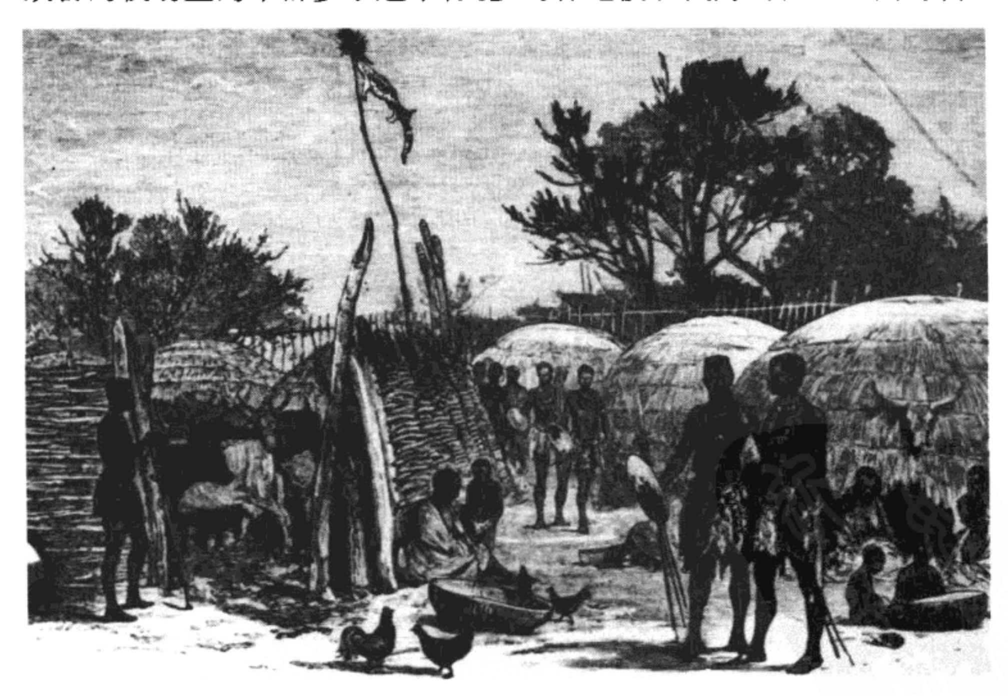
直到18世纪晚期,恩古尼酋邦才在总体上小于中部、西部高地草原的索托-茨瓦纳酋邦。部分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地理位置。德拉肯斯山脉东南部低地草原的降水一般比西北部高地草原要多。该地区很大程度上也属丘陵地带,被大量从山区流向大海的河流所造成的深谷分割开来。因此,此地从干燥一点但肥沃的谷底到水分充足的山区林地,遍布着多种多样的可耕地和牧地。因此,如果他们可以根据季节自由地在山区的不同草地和河谷间迁徙牛群,那么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耕地几乎可以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维持耕种者的生存。虽然人口数量较少和牲畜规模较小,但这不构成问题。有着亲戚关系的宅地被组合

为酋邦，如果出现继承争端，失利的申索人可以迁移出去并可以在仍然很少利用的地区上建立新的酋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将他们所遇到的科伊桑人接纳进来。事实上，恩古尼-科伊人的同化程度相当高，所以恩古尼语中出现了明显的科伊桑人“咔哒”发音。

222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叙述过，最南边的恩古尼人、科萨人在18世纪末期与正在从开普殖民地向东扩张的迁徙布尔人先驱者发生暴力冲突前，是如何向西扩张、吞并科伊桑酋邦的。对中部、北部的恩古尼人来说，18世纪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从长远来看，这一时期的发展对19世纪早期南部非洲内陆的民族，其意义甚至更大。

在18世纪，北部大量的恩古尼酋邦扩张日盛，且吞并了诸多小酋邦。这似乎与该地区资源的激烈争夺相关。葡萄牙人从美洲经德拉瓜湾引入的玉米已在该地区得到广泛的种植。如果雨量较大，玉米要比当地的非洲高粱高产。而18世纪后半段是个雨量较大的时期。粮食多了，人口也就增加了，更多的土地被纳入耕作范围了。草量得到很大改善的牧场上的牛群多了起来，更多的林地被砍伐为新牧场。同时，在



图盖拉河河畔上一个牛栏的内部。

德拉瓜湾与聪加人和葡萄牙人的长途贸易刺激了北部恩古尼国家的发展，争夺象牙出口的控制权强化了沿海森林地带狩猎区的争夺。

与高地草原上的索托-茨瓦纳人一样，恩古尼人也举行成年仪式和划分年龄团，这个习俗可能最初就是从索托-茨瓦纳人那里学过来的。随着酋邦规模的增大，酋邦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更加明显，武装军团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 18 世纪后期，北部的恩古尼酋邦已经合并为三个主要的中央集权王国：索布胡扎(Sobhuza)的恩格瓦尼(Ngwane)、蔡德(Zwide)的恩德万德韦(Ndwandwe)和丁吉斯瓦约(Dingiswayo)的姆特瓦(Mthethwa)酋邦。到 18、19 世纪之交，大量小型的恩古尼人团体已经被合并到不断扩张的姆特瓦联邦，祖鲁酋邦就是其中之一。在 18 世纪即将结束的几年里，降雨为长期干旱所取代，一个多世代的粮食增产时代突然终结了。控制有限的资源对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及其对整个南部非洲所造成的影响，依然是下一章的主题。

223



第十六章　19世纪的西非与奴隶贸易的结束

西苏丹的伊斯兰圣战

富尔贝人(或富拉尼人)的起源

224

19世纪早期,连续的伊斯兰圣战横扫西苏丹地区,西非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主导这次运动的穆斯林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富尔贝人。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论述过,富尔贝人是个特殊的民族,大部分人都是牧民,他们在公元7世纪前已经扩展到西非草原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保有其独立的自我认同,通常也不参与其定居国或酋邦的政治生活。一开始,他们很适应这种情况,但在后来,他们发现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压力来自定居的农业人口和统治者。富尔贝人常常被作为侵入者而遭到怨恨,且他们的牧场和贸易权受到限制。同时,他们承受着越来越重的贡奉与赋税。

他们在定居地人口中的孤立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富尔贝人此时会信仰伊斯兰教。这部分是由于与城镇穆斯林商人间的联系,部分是由于与萨赫勒地区图阿雷格牧民的接触所造成的。伊斯兰教促进

了富尔贝人的团结和斗志的迸发。相较于富尔贝人的统治者的统治，伊斯兰法，即沙里亚法(shari'a)则提供了另一种统治模式。到18世纪早期，很多富尔贝穆斯林部族与图阿雷格人，即西非伊斯兰教的主导者展开了竞争。将“异教徒”改宗是穆斯林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些鼓吹向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富尔贝伊斯兰传教者可能是从早期宗教改革运动，如11世纪的阿尔莫拉维德人那里获得了启示(参见本书第七章)。一次圣战成功通常肯定会激起另一场圣战。

富塔贾隆与富塔托罗的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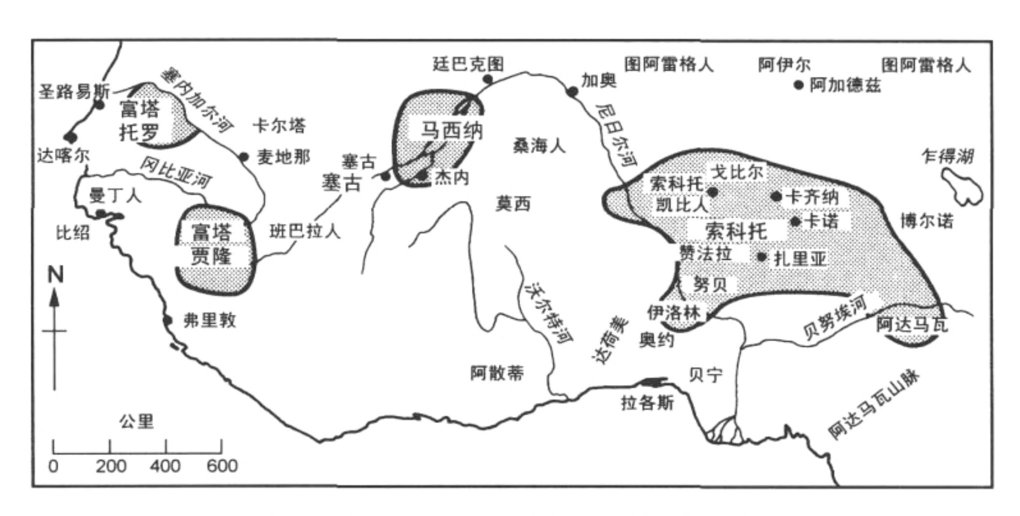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西非圣战开始于富塔贾隆高原，即今天的几内亚(Guinea)。富尔贝牧民从16世纪早期就已经定居在这些高原地区。当地的农业人口是以一系列的小型村庄酋邦形式组织起来的。随着牲畜规模的增大，富尔贝人感到了压力，即农民对他们的限制和征税。但是富尔贝人在伊斯兰教里发现了解救的办法。1725年，富尔贝人展开了对其统治者的反抗，并得到了穆斯林商人的支持。这些穆斯林商人曾对定居的农民“异教徒”发动过圣战。1750年，富尔贝人展开全面征服。此时，他们已经将该地区置于伊斯兰法的统治下，并建立了富尔贝人主导的国家。

225 我们在本书第十二章曾论述过，他们的征服战争产生了过剩的俘虏，这些俘虏被卖给了沿海地区的欧洲商人。

富塔贾隆圣战激发了塞内加尔河下游南部的富塔托罗发动了一场类似的斗争。穆斯林图库洛尔人和富尔贝人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圣战，并建立了一个在沙里亚法统治下的新伊斯兰国家。

乌斯曼·丹·福迪奥和索科托哈里发

18世纪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的圣战给西非其他地区后来的伊斯兰传教者提供了灵感。在19世纪早期，今天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豪萨国家内发动了一系列圣战。从这些圣战中出现了索科托哈里发王国(Sokoto caliphate)，或称为帝国，这是19世纪早期西非最大的单一国



地图 16.1　1840 年前的西苏丹圣战国家。

家。索科托圣战的领导人和精神领袖是乌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他是北部豪萨国戈比尔(Gobir)一位富尔贝伊斯兰传教者的儿子。(在这个西非东部地区,富尔贝的豪萨名字为富拉尼[Fulani]。)

虽然乌斯曼从来没有到麦加朝圣,但是作为穆斯林学者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且肯定知道 18 世纪的西非圣战。他在阿加德兹(Agades)完成教育,并受到图阿雷格革命圣徒吉布里·伊本·奥马尔(Jibril ibn 'Umar)的影响,这位圣徒曾宣扬过圣战的价值与重要意义。青年时期的乌斯曼于 18 世纪 70 年代曾在戈比尔传教。他所关心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将那些仍然坚持本土宗教信仰的富拉尼牧民改宗,另一件则是促使徒有穆斯林之名的豪萨统治者进行宗教和社会改革。他形成了理想伊斯兰国家的笃实信念,并依据沙里亚法的原则来评判豪萨统治者。在此基础上,他希望通过对和平改革的宣传来实现目标。不过,他越来越强烈地抨击政府的腐败和不正义。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富拉尼牧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支持,那些非穆斯林对豪萨的牛税尤感痛恨。

乌斯曼作为圣徒和传教者的威望很快就传遍了豪萨地区的伊斯兰世界。甚至在他的较为热心的支持者那里有传言说他是救世主,是将　226

拯救世界末日且具有预言能力的穆斯林领导者、第二个来到世间的穆罕默德。到 18 世纪 90 年代,在戈比尔和凯比边界附近的德杰尔(Degel)聚集着大量乌斯曼的追随者。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影响遭到戈比尔统治者的嫉恨,戈比尔的统治者试图限制他的活动并阻止他做进一步的改宗活动。

19 世纪早期,当国王云发(Yunfa)试图暗杀乌斯曼的时候,一场危机爆发了。乌斯曼及其追随者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622 年从麦加的逃亡,撤离出戈比尔。云发派出骑兵来阻截他们,但遭到重挫。圣战已经开始了,这一年是 1804 年。

斗争迅速扩展到豪萨地区的穆斯林和富拉尼人地区。斗争不只是一场圣战,而且是一系列反对豪萨贵族政治统治的伊斯兰反抗运动。1808 年,戈比尔都城最终被攻陷。此时,凯比、赞法拉、扎里亚、卡奇纳(Katsina)和卡诺都被伊斯兰圣战士攻陷了。豪萨统治者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受压迫的豪萨农民的支持,也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一致的行动。长达数世纪的国家间的敌对关系已经昭示了它们的最终衰败。

乌斯曼退隐于宗教生活,新伊斯兰帝国由其兄弟阿卜杜拉希(Abudullahi)及其子穆罕默德·贝洛(Muhammad Bello)来统治。新都城建在凯比的索科托,且圣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尤其是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帝国占领了博尔诺的西部,并将阿达马瓦(Adamawa)纳入到帝国版图。到乌斯曼去世的 1817 年,索科托帝国从西部的桑海横跨到东部的贝努埃河的源头。后来的南部扩张将努贝(Nupe)和约鲁巴国伊洛林(Ilorin)也纳入到帝国。据估计,到穆罕默德·贝洛去世的 1837 年,帝国或索科托哈里发王的人口达1 000万,比之前任何一个西非国家的人口数都要多。

索科托哈里发王国

索科托圣战通过一系列地方起义取得了胜利,其独立行动获得了哈里发的支持与赞许。这场运动是由农村的富拉尼人和穆斯林豪萨城

镇人来领导的。很多富拉尼穆斯林的牧民觉悟令人怀疑,且都利用运动对城镇进行了抢掠。这让很多豪萨人开始反对圣战。但是,当征服变为全面性战争的时候,豪萨贵族政治也就被废止了,帝国安定下来,地区的经济生活也得到了恢复。

帝国是由大量独立的伊斯兰酋长国组成,这些酋长国在地方事务上独立行事,但他们从索科托的哈里发那里获得了宗教权威。因为它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所以政治权力也就具有了宗教权威。埃米尔每年拜访索科托一次并进贡,以显示他们对哈里发的效忠。此外,豪萨兰很快就在与之前相同的地区上重建了经济。过去的豪萨贵族被新富拉尼贵族所取代,但富拉尼贵族日益被"豪萨化"(Hausaised),接受了豪萨语言和文化。他们小心谨慎,以防变得像他们前任者那么腐败,备受尊崇的伊斯兰法也给整个豪萨人口带来了更大的正义。

227

伊斯兰教和识字教育在整个人口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普及,伊斯兰教所带来的团结也终结了互有敌意的国家间战争所带来的破坏。贸易兴盛起来,卡诺成为一个重要的市场中心。获利最少的是豪萨农民,他们只是换了一个主子而已。奴隶依然是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在家庭内服务,也在土地上劳作以供养城镇。在帝国内部,非穆斯林依然有着小范围的抵抗,他们成了圣战中的俘虏,随后被变为奴隶。

19世纪的博尔诺

当富拉尼牧民以圣战掀起对博尔诺苏丹的反抗时,他们很快就控制了西部地区,甚至将玛伊从他的首都比尔宁加扎尔加姆(Birnin Gazargamu)驱逐出去。但是,博尔诺不是又一个豪萨兰。博尔诺有着漫长且深厚的伊斯兰传统,宗教革命并不彻底。博尔诺的卡努里人也不准备接受富拉尼人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博尔诺被一个来自加奈姆的著名宗教领导人穆罕默德·卡拉米(Muhammad al-Kanemi)所拯救。(事实上,卡拉米据说出生于曾是博尔诺-加奈姆最北部的省份费赞。)卡拉米组织起抵抗,并向索科托的哈里发抗议说,博尔诺已是一个伊斯兰国

家,因此没有理由发动对它的圣战。同时,他在博尔诺开始宗教和法律改革以安抚其反抗者。

卡拉米统治着博尔诺苏丹国,只是保有玛伊的称号,该称号只不过是个名号而已。1837 年卡拉米死后,其子乌马尔(Umar)继位,称号为谢赫(shehu,即宗教首领)。1846 年,伊易卜拉欣企图从中部苏丹地带的瓦达伊(Wadai)组织对博尔诺的进攻,以重新夺取控制权,但是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他本人被捕获并被处决了。易卜拉欣是塞法瓦王朝的最后一位君王,他的死标志着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非洲王朝的灭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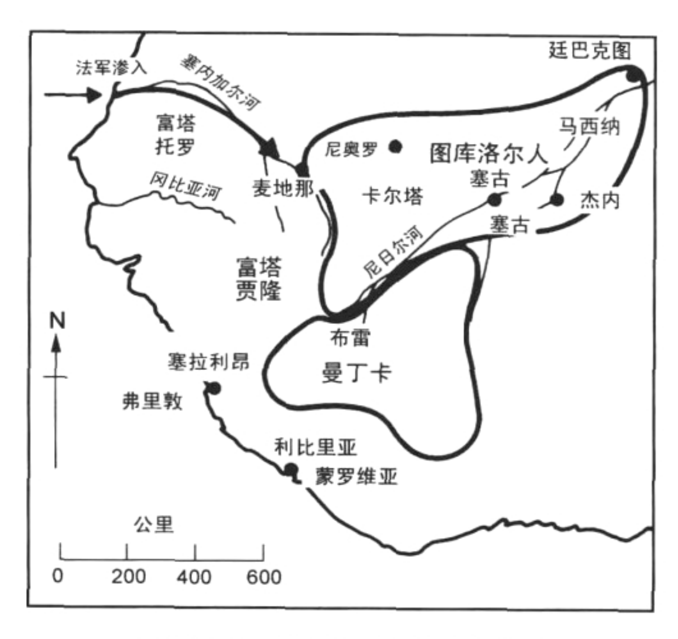
谢赫乌马尔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虽然博尔诺从来就没有恢复到它之前的财富与权力地位。在西部,博尔诺失去了东豪萨兰,东豪萨兰为索科托的埃米尔所夺取。在北部和东部,它失去了通往瓦达伊苏丹国的跨撒哈拉贸易通道,这个通道可以与北非的班加西(Benghazi)建立直接联系。在博尔诺内,富有的统治阶层和受压迫的农民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地加大了。由于失去了贸易收入,博尔诺的谢赫们要求对已经饱受沉重压迫的农民征收更高的赋税。

哈吉吉·乌马尔的图库洛尔帝国

与此同时,在索科托西部,乌斯曼·丹·福迪奥的圣战已经激发了穆斯林斗争的进一步发展。1818 年,在尼日尔河上游地区,富尔贝穆斯林与异教徒展开了一场圣战,并建立了一个富尔贝人主导的伊斯兰教马西纳(Masina)王国。马西纳王国后来成为崛起于更西部地区的图库洛尔帝国的一部分。图库洛尔人的圣战首领是一位名叫哈吉吉·乌马尔(al-Hajj Umar)、来自富塔托罗的伊斯兰传教士。

在更早些时候,富尔贝人的圣战主要是对当地“异教徒”统治者的自发性地方起义。乌马尔的图库洛尔圣战则是另一模式,它更是一种精心谋划的军事征服和伊斯兰国家的筹建。乌马尔受到更东边的圣战运动的很大影响。1826 年,他开始踏上到麦加朝圣的漫长之旅。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经过了卡拉米的博尔诺,并在穆罕穆德·贝洛的王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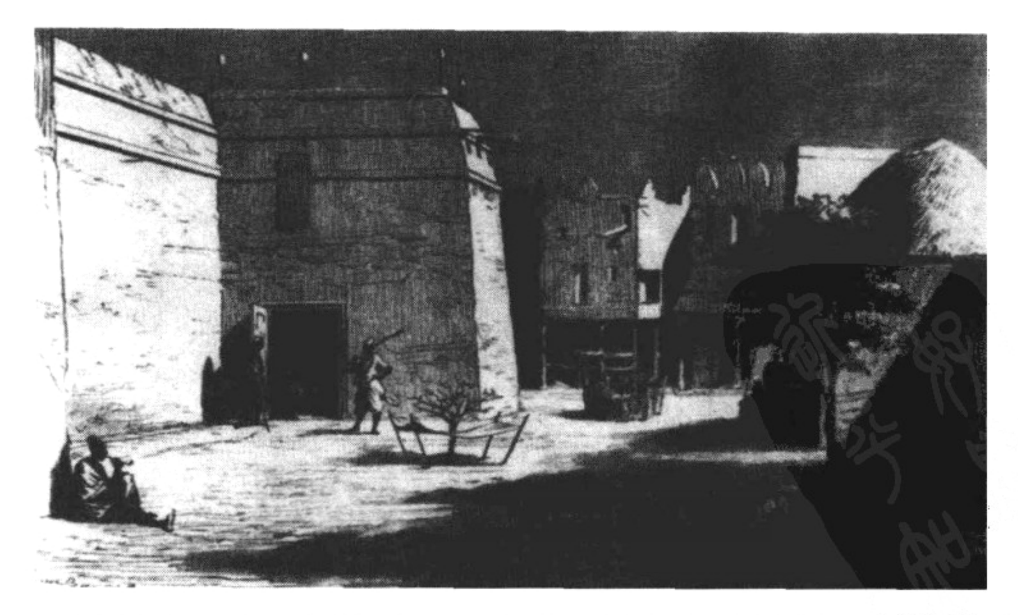
228



地图 16.2 图库洛尔与曼丁卡帝国。

呆过数年，在这期间，他至少娶了哈里发的一个女儿。

在19世纪40年代，乌马尔在富塔贾隆的边界地区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他在那里出售非穆斯林俘虏，以换回火器来提高其军队的战斗



1864年哈吉吉·乌马尔死后，图库洛尔帝国统治者艾哈迈杜(Ahmadu)的塞古宫殿。

力。因为在塞内加尔河边的麦地那,有法国势力存在,乌马尔无法攻占其故土富塔托罗,只好将圣战向东北方向开进。1854 年,他占领了卡尔塔(Kaarta)的巴马纳王国。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他的征服经过尼日尔河上游的塞古和马西纳王国进一步地扩展开来。乌马尔强调征服,这意味着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保存下来的、稳定的管理机构。他强迫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政策也激起了民众的抵抗,尤其是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的巴马纳人。1864 年乌马尔死后,由于出现内部反抗,以及其子与其最亲密的追随者之间缺乏团结,图库洛尔帝国的势力受到严重的削弱。这一形势也被法国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加以利用。

229

萨摩里·杜尔与曼丁卡帝国的兴起

图库洛尔帝国南部的萨摩里·杜尔(Samori Touré)的曼丁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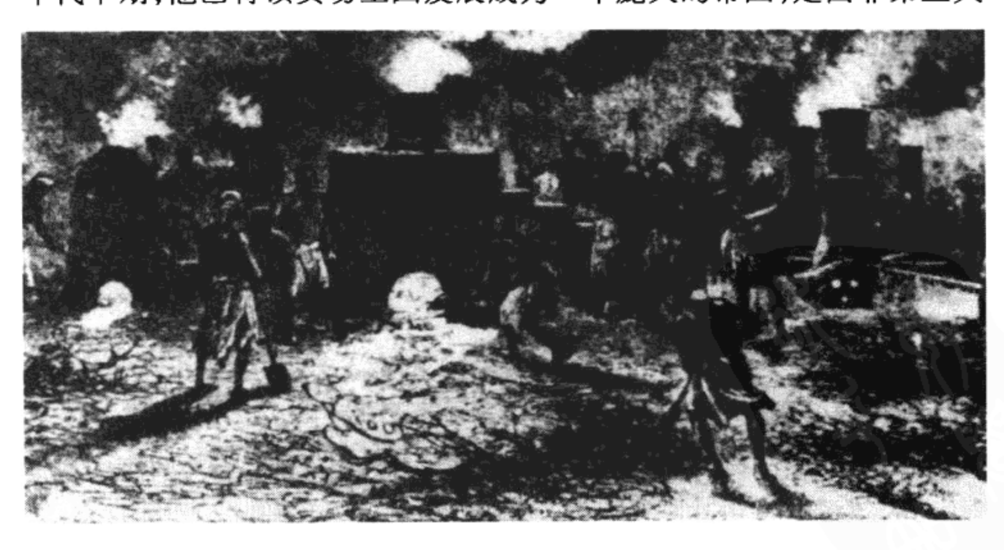


萨摩里·杜尔的画像。

(Mandinka)帝国与图库洛尔帝国是同时期兴起的。萨摩里·杜尔出身于一个居住在富塔贾隆东部尼日尔河上游盆地地区非穆斯林的迪尤拉(Dyula)商人家庭。在19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为了保护家族贸易利益，组建并训练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这支力量也是众多基于迪尤拉贸易城镇上的曼丁卡语(Mandinka-speaking)国家的力量之一。(曼丁卡人，和马林凯人一样，是曼德语民族的一个分支，曼德语民族曾居住在古马里帝国的心脏地带；参见本书第七章。)萨摩里的家庭主要从事沙金贸易和贩牛，沙金和牛分别是从布雷、富塔贾隆那里买过来的。在萨摩里的领导下，其家族利用广泛的迪尤拉联系，从沿海地区买来了火器，增强了其军队的战斗力。

在1865—1875年间，萨摩里征服了周围的迪尤拉国家，并建立一个强大的曼丁卡王国。萨摩里在该地区的统一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并给商人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年轻时，萨摩里成为一名穆斯林，但并不效仿其同辈发动圣战。他利用伊斯兰教所带来的团结强化了帝国。他推动了穆斯林的教育和清真寺的修建，并将伊斯兰法作为统治基础。在19世纪70年代末，萨摩里扩展了征服地，包括北部地区的布雷黄金产地、沿着尼日尔河上游流域直到今天巴马科(Bamako)。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他已将该贸易王国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是西非第三大

230



曼丁卡铁器铸造场，19世纪80、90年代用来锻造和修理枪支以对抗法国人。

国(在索科托和图库洛尔之后)。在很多萨摩里曼丁卡属国看来,他用古马里帝国的方式重新统一了曼德语民族。

除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萨摩里军队的强大力量也是曼丁卡帝国构建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萨摩里将男俘虏并入军队而不是将他们作为奴隶卖掉。这也强化了他们对萨摩里和国家的效忠。萨摩里也从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引进了最新的快速加载型来复枪,并让当地的铁匠制造和维修膛炮。

萨摩里的曼丁卡帝国极为短命。由于受到外部侵略的威胁,萨摩里一直忙于保卫其征服地,几乎没有机会将其非凡才能用于国内的进一步发展上。虽然如此,但其帝国内部的和平与安全还是给那些看到过它的访问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1881 年,曼丁卡与法国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此时的法国人正在从塞内加尔河上游向西扩展其殖民势力范围。虽然决战因为与法国的条约而被拖延了,但是曼丁卡军队是 19 世纪最后十年内抵抗法国征服西非的一支主力。

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结束

19 世纪早期伊斯兰教改革运动正在改变西苏丹政治模式的时候,推动并从事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欧洲国家内部也发生了一场不同类型的改革运动。

18 世纪,英国超过其他所有欧洲国家,成为最大的非洲奴隶贩子。到 18 世纪末,从西非运来的俘虏中,一半以上是用英国船只进行运输的。然而,几年后,即 1807 年,英国已经成为第一个废除奴隶贸易的欧洲大国。(法国革命政府曾在 18 世纪 90 年代早期颁发了临时禁令,但是很快就被取消了,法国的奴隶贸易依然存在。丹麦政府事实上在 1805 年就禁止其公民从事奴隶贸易。)这虽然没有废除奴隶制本身,但毕竟是在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它让英国人跨大西洋运输非洲战俘并转卖为奴隶的行为变得不再合法。新独立的美国于 1808 年正式禁止其国民从事奴隶贸易,荷兰和法国分别于 1814 年和 1817 年正式颁布了类似的禁令。

231

废奴运动的历史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然而，它对理解废奴主义者主张背后的某种经济动机来说，是很重要的。废奴运动改变了 19 世纪欧洲人与西非人之间的关系。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里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时期，这种变化达到了高潮。

美国的独立战争（1776—1783 年）和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革命（1789 年）有力地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自由、平等是所有人的权利这一观念越来越多地被接受。虽然一小部分欧洲精英在反对奴隶制上争辩很久、很激烈，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只是人道主义或仅仅是欧洲人的最初的良心发现导致了奴隶贸易最终被废除。非洲的奴隶以及奴隶贸易的受害者从一开始就为他们失去的自由进行过斗争，我们应认识到他们的作用。导致奴隶贸易废除的最重要因素是，到了 19 世纪早期，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从很多方面上说都变得不划算了。

废奴运动的经济背景

加勒比海地区甘蔗种植园在 18 世纪晚期的快速扩展，导致了生产过剩和糖料价格的下降。尤其是拥有大量新种植园和近代机械设备的法国，它将更便宜的糖料如洪水般投放到市场上，削弱了效率更低的英国竞争者的地位。同时，西非统治者和商人对俘虏的要价更高，这进一步地降低了欧洲人的利润。种植园主无法再偿还债务给欧洲银行家。欧洲银行家先前曾在糖料和奴隶贸易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他们发现投资国内的新兴制造工业更能赚到钱。这种情况特别体现在英国，此时的英国是新兴“工业革命”的引领者。

英国政府热衷于看到新工业家们让曾经强势的种植园主丧失影响力。英国制造商发现，欧洲工厂里的廉价劳动力比种植园里的奴隶效率更高，且花费更少。并且他们认为，“自由”的雇佣工人会将一部分的工资花在工业家所制造的衣服、陶器和金属加工品上。这就为资本主义工厂主开创了自己的国内市场。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新机器和蒸汽机生产出更多也更便宜的商品。制造商及银行家很快

232

就要寻找新的海外市场,且他们又一次看上了非洲。他们看到,如果让非洲人留在非洲,而不是通过奴隶贸易将其转移出去,这些非洲人可以做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可以让欧洲人得益。一是非洲人可以为欧洲提供重要的原材料;二是作为交换,非洲人可以购买欧洲新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因此,从 19 世纪早期开始,欧洲人及其政府开始将非洲视为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出售商品的市场,而不再只是奴隶劳动力的来源地了。

非洲人的抵抗与奴隶制的废除

这一时期推动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废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非洲人为获得自身自由而展开的斗争,这一点在非洲历史和奴隶贸易史中很少得到重视。在反对奴役和奴隶贸易上,非洲人既有文斗也有武攻。

在英国,欧劳达·埃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和奥托巴·古瓜诺(Ottobah Cugoano)的斗争和出版物也加入并推动了 18 世纪一小群废奴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人都曾是西非的奴隶,他们在英国获得了自由,并积极参与到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来。由于广泛地接受了教育并在文化上已经英国化了,两人在 18 世纪 80 年代末出版的著作揭示了奴隶贸易的罪恶并猛烈地谴责了奴隶制。埃奎亚诺在英国做巡回演讲并销售自传,他的个人自传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图书。古瓜诺在 1787 年建议英国海军舰队在西非水

233



反奴斗士欧劳达·埃奎亚诺的画像。

域巡逻以禁止奴隶贸易。然而，该建议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施。埃奎亚诺和古瓜诺在法国和美国也有响应者。这些非洲人的雄辩，以及基于他们自己个人经历的演讲和写作，在废奴运动中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奴隶贸易一开始，非洲俘虏就竭尽所能地反抗奴役。他们的抵抗行为通常是孤注一掷的，几乎是自杀性的。一踏上跨大西洋运输的船只，反抗就没有间断，海员不得不全副武装并进行持续的防卫。在美洲和加勒比海岛屿上，被奴役的非洲人几乎会抓住摆脱束缚的任何一次机会。

早期反抗成功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7世纪的巴西。在那里，“逃亡的”奴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帕尔马里斯”(Palmares)。在葡萄牙人最终将它占领之前，该共和国持续了约100年。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经常性的奴隶起义使得奴隶制越来越受到威胁，且维持它的代价变得高昂起来。例如在牙买加(Jamaica)，被称为马卢人(Maroons)的逃奴聚集在中央高原上，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自治种植区。他们在政府多次驱逐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们的生存甚至由于逃奴的加入而得到不断的巩固。

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奴隶起义发生在法国殖民岛屿圣多明戈(St Domingue，即今天的海地)，这是法国重要的糖料生产岛屿。种植园生产在18世纪晚期增长得如此快速，以至于到了18世纪90年代早期，圣多明戈已经有了约40万个奴隶。在一个法语名字叫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奴隶的领导下，圣多明戈的奴隶于1791年爆发起义，并杀死了法国白人主子。他们击退了法国和英国海军的进攻，并在1803年建立了独立的“海地共和国”。海地起义给欧洲政府与银行家们继续支持奴隶贸易的立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英国政府决定废除奴隶贸易后，就决定要将这项决定施加给欧洲其他国家。只有奴隶贸易在整体上停止或锐减，英国制造商和商人才有希望在与非洲的其他贸易上获得可观的利润。因此，此时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的英国，建立了一支“反奴舰队”(Anti-Slav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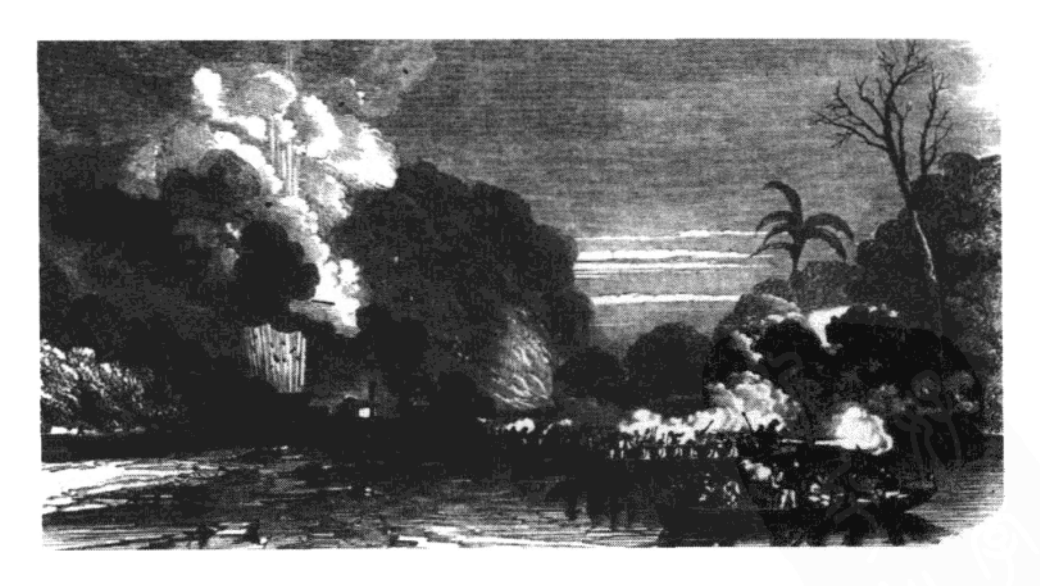
Squadron),并在西非海域上巡逻,用武力制止奴隶贸易。尽管有这些努力,还是有大量的船只躲过了英国的巡逻。只要种植园奴隶制本身还存在,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就不会停止。事实上,在 19 世纪早期的一个短暂时期里,输入到古巴和巴西的奴隶反而增加了。奴隶制本身直到 1834 年才在英国殖民地废除,法国殖民地于 1848 年、古巴于 1860 年、美国南部于 1865 年、巴西于 1888 最终废除了奴隶制。据估计,在 1807—1888 年间,又有 130 万非洲人被跨大西洋运输过来,并被卖为奴隶。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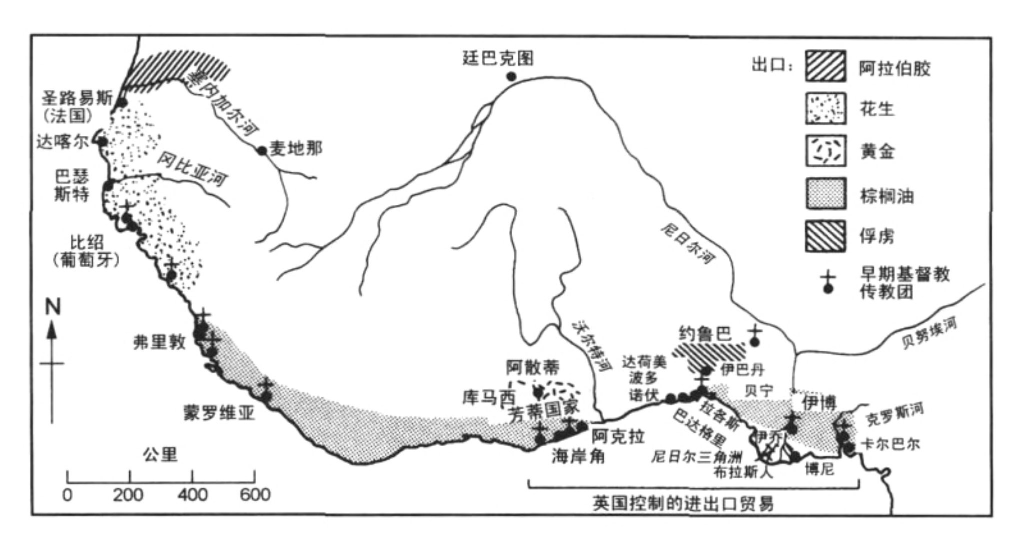
“合法贸易”的扩展

两三个世纪以来,奴隶贸易一直是西非沿海地区的主导性贸易。奴隶贸易打乱并扭曲了内陆的发展。使用奴隶劳动变得更为广泛,且当地农业生产经常受到严重的暴力与战争破坏。社会内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一边是富有的商人和统治者,另一边是贫困的农民及被奴役的人。

然而,在这些表象下也有着重要的、积极的发展。非洲农民试验并



行动中的英国海军反奴舰队,1849 年焚烧了尼日尔三角洲上的一处奴隶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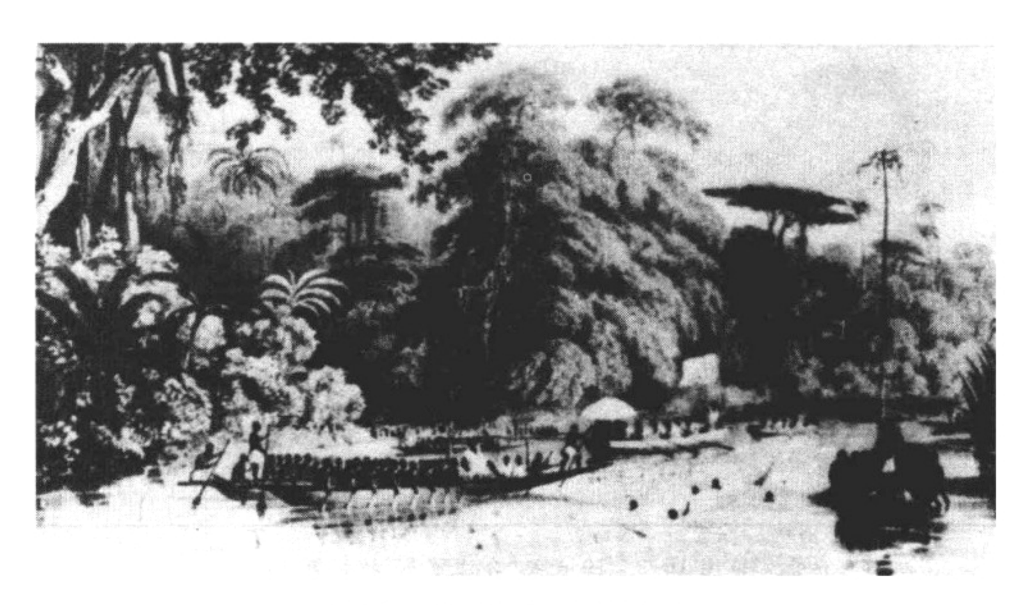


地图 16.3　19 世纪"合法贸易"的拓展。

发展了来自美洲新作物的种植技术，尤其是玉米和木薯。同时，非洲群落间、非洲群落与沿海地区的欧洲人之间或跨撒哈拉到北非的西非传统商品贸易依然在不断发展。因此，随着奴隶贸易逐渐被取缔，欧洲人发现西非成为他们称之为"合法贸易"的沃土。 235

在 19 世纪前半段内，各类西非商品取代了出口的战俘。西非统治者和商人，过去经常在经济作物种植园与运输上使用内陆奴隶劳动，现在组织起各类商品的生产。出口货物中包括来自塞内加尔的阿拉伯胶。阿拉伯胶是一种从塞内加尔河北部林地草原中的金合欢树上汲取的硬化树脂物质，在 19 世纪，欧洲纺织工厂在印布时用它来固定着色。其他出口货物是来自几内亚的花生和来自大多数沿海森林区的棕榈油。由于阿散蒂已经完成了其主要的扩张，出售的俘虏越来越少，黄金再一次成为该地区主要的出口商品。

一些国家，如达荷美，由于缺乏可替代商品，奴隶贸易在 19 世纪依然持续了很长时间。19 世纪 30、40 年代，古奥约帝国由于内战而分裂并最终瓦解，因此在拉各斯和巴达格里(Badagry)出口的战俘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来源地。同时，很多尼日尔三角洲国家，如博尼(Bonny)和布拉斯(Brass)，尽管遭到英国舰队的极力制止，也有非洲棕榈油出口商，但还是不断输出伊博俘虏。古巴和美国奴隶市场关闭之后，大规



尼日尔三角洲的独木舟贸易船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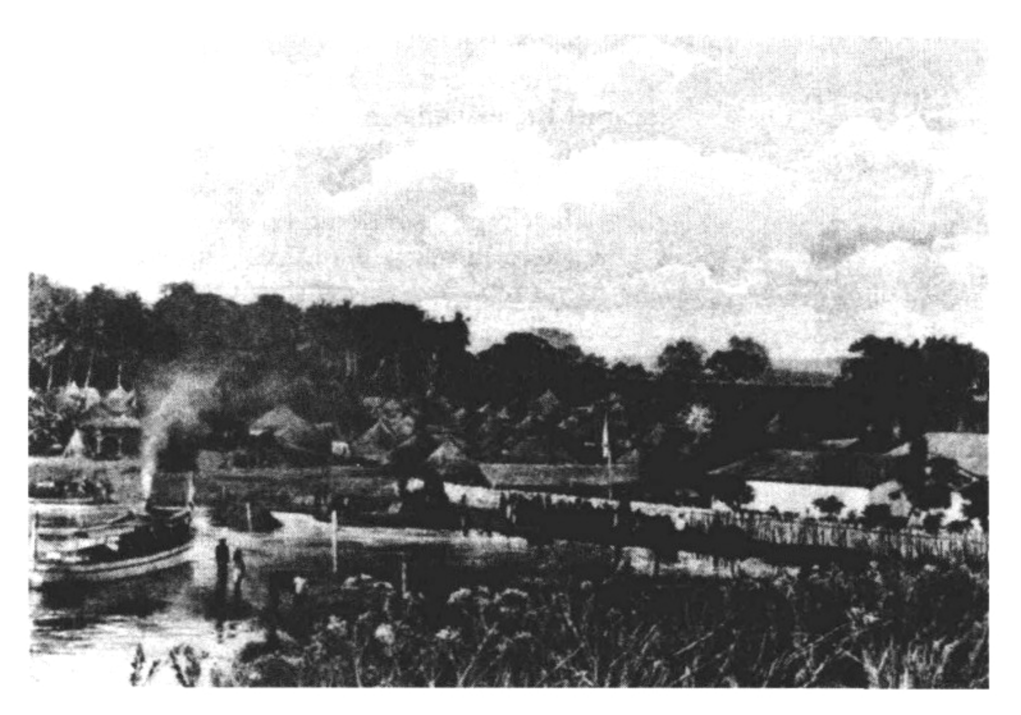
模的西非战俘出口才最终于 19 世纪 60 年代终结。

到 19 世纪中叶,棕榈油成为西非主要的海外出口商品。在 19 世纪后半叶石油出现前,西非也是欧洲工业机械润滑油的主要来源地。虽然整个森林地区都种植有油棕榈,但大规模生产、出口的最重要的地区是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克罗斯河(Cross river)流域。古卡尔巴尔(Old Calabar)的埃非克人(Efik)也是第一批开辟棕榈油种植园的人,甚至在 1807 年英国废奴前还使用过奴隶劳动。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伊乔人(Ijo)长期使用巨大的战船将伊博俘虏运到尼日尔河上游,以便在沿海地区出售。在此时,他们开始转运棕榈油了。就这样,他们成为伊博生产者与沿海欧洲商人之间贸易中的重要的中间人。

236

随着 19 世纪 40、50 年代棕榈油贸易出现的大幅增长,为了撇开伊乔中间人并直接控制伊博地区,英国商人开始推进到尼日尔河流域。由于欧洲棕榈油需求的增长,贸易竞争达到白热化,并导致了三角洲国家间的一系列战争。英国商人利用这些矛盾,再加上劝服与武力,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已经逐渐扩大了对三角洲贸易的控制。但是,这也只是 19 世纪前就已经在西非沿海地区出现的总体趋势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合法贸易”的形成并不是期望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和发展自己的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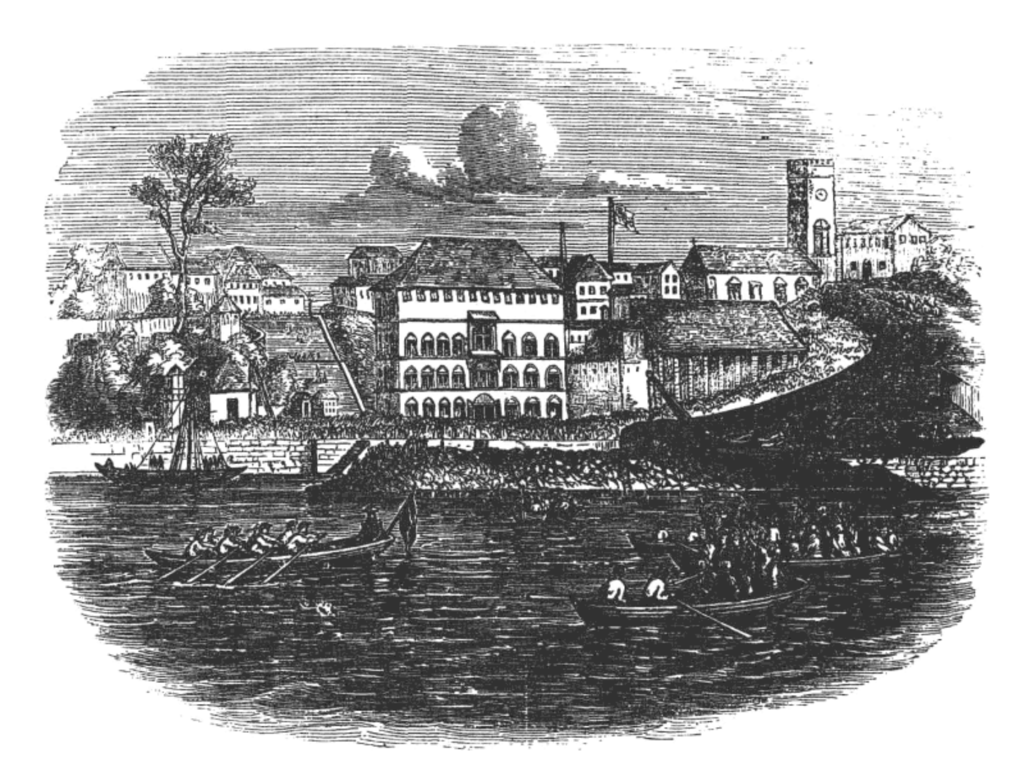


19 世纪 90 年代尼日尔河下游的一个贸易站。

济力量。首先，从这种贸易中获利的是少数富有的统治者和商人，大众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什么改进。事实上，很多人认为随着他们从事增加生产或从事出口贸易物品的货运，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个人自由程度反而在不断地下降。其次，从欧洲进口的主要是布匹、酒和火器，并没有增强非洲本土经济的发展。第一件物品仅仅只是削弱了非洲本土的手工业，第二件物品只是让健康人的意识成为纯粹的幻觉，第三件物品火器，可能使得统治者加强其对臣民和近邻的控制。但是这些火器从来就不会是最新式的，也不能用来和 19 世纪末被派来镇压非洲人的欧洲军队"好好地打一仗"，这些旧式的火器无法对抗机关枪和大炮。最后，那些出口贸易确实有所发展的国家很快就发现，它们的独立受到欧洲贸易伙伴直接干涉的威胁。

237

随着时间的推进，受到各自政府支持的欧洲商人越来越加强对西非内部贸易的控制。由于非洲中间人和欧洲竞争者造成的利益损害，他们希望能降低成本并最大化地追求利润。正是这种白热化的欧洲贸易竞争部分地导致了 19 世纪 70、80 年代"瓜分非洲"的"启航"。第二十和二十一章将进一步讨论欧洲贸易对西非的不断渗透。



新来到塞拉利昂的定居者：19 世纪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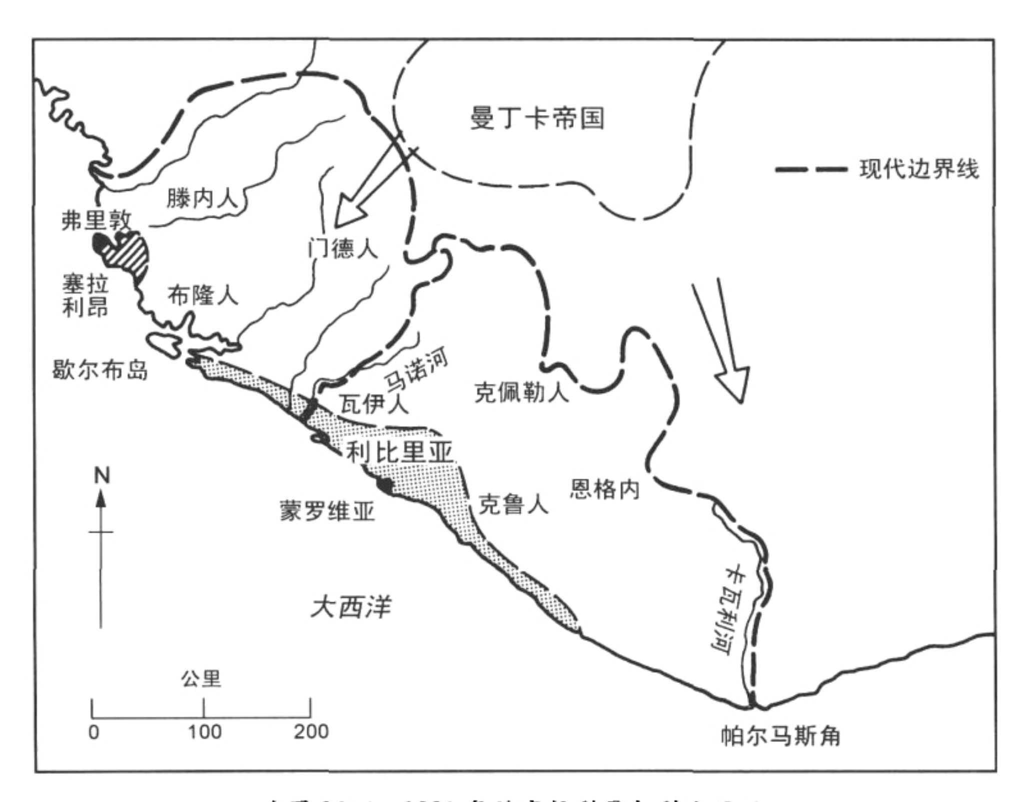
本章还将讨论一下 19 世纪早期在非洲西海岸出现的两个重要的“非洲人”定居地。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的建立与发展是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直接结果。塞拉利昂作为 400 名从英国获得自由的黑人的定居地建立于 1787 年。

塞拉利昂是由英国废奴运动成员建立的，其中包括欧劳达·埃奎亚诺，不过他没有和其他成员一同回到非洲。他们在现今的弗里敦半岛上定居了下来，18 世纪 90 年代从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获得自由的黑人也参与了进来。这些早期定居者被统称为“克里奥尔人”(Creoles)，他们备受疾病折磨，且不时受到当地滕内人(Temne)的暴力攻击。

238



地图 16.4 1880 年的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

1808 年,英国政府将该定居地作为殖民地接手过来。因此,反奴舰队就将此地作为一个安置那些从运奴船上获释的黑人的基地。这些"释放奴隶"(recaptives)来自今天尼日利亚的约鲁巴和伊博人(19 世纪早期西非奴隶出口的主要来源地)。最初的定居者是热心的且在文化上严重英国化了的基督徒,这些来自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新来者和不断增长的克里奥尔人中间传播基督教和欧式教育。

塞拉利昂最初是农民定居地,但是很多克里奥尔人很快就将更容易的贸易作为谋生的手段。一些人在诸如木材、花生和棕榈油的出口贸易中发了大财,另一些人则成了手工艺者、文书、教师和传教士。很多人游历广泛,且在西非民族中是基督教和"西式"教育的先锋。约鲁巴学者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是塞拉利昂弗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的第一批学生。他后来成为非洲第一位非洲人主教,并且是尼日尔基督教会的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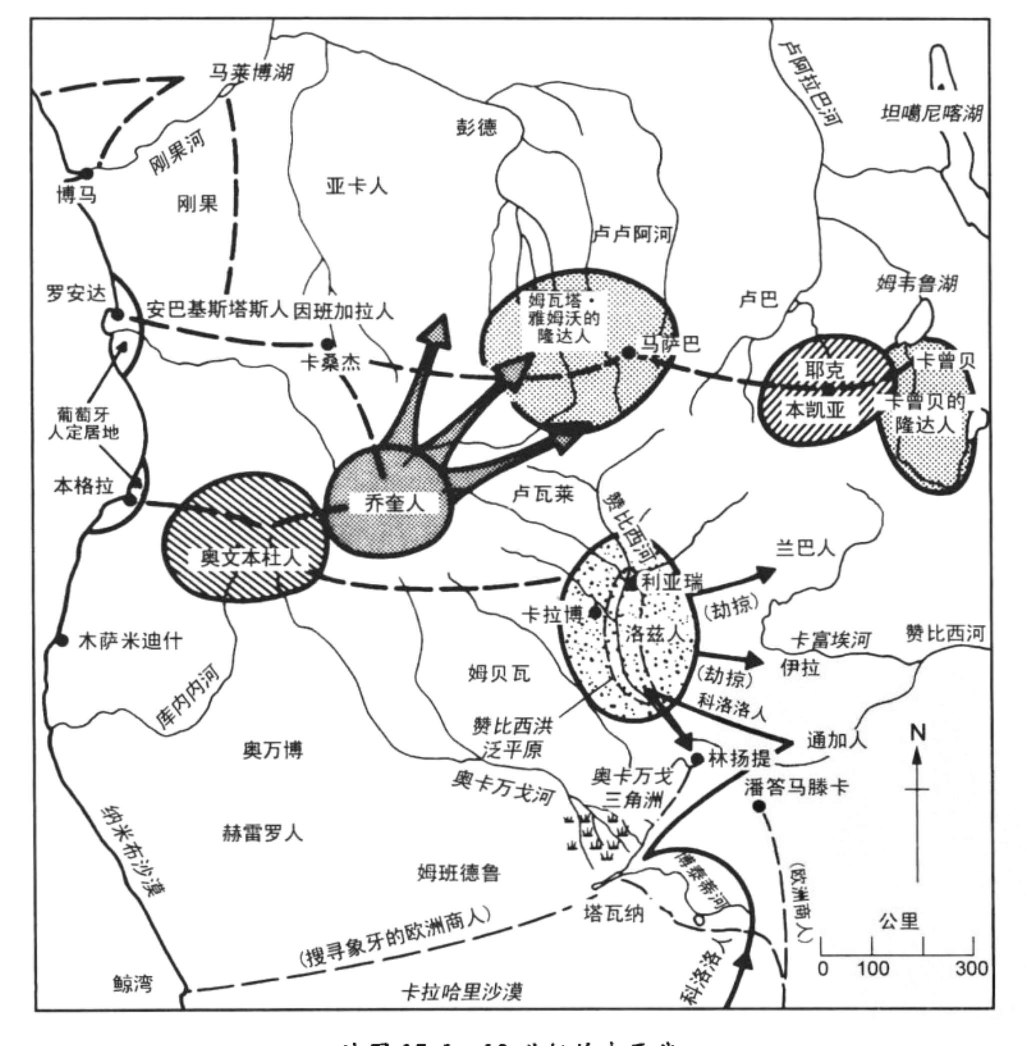
首次为约鲁巴语确定了书写语法。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在19世纪为西非的知识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临近的利比里亚定居地是由美国来的被释放的黑人于1822年建立的。它是由一个白人团体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sation Society)组织起来的。该团体的人认为,美国南部越来越多的被释放的黑人对还处在奴隶状态中的黑人来说是一种威胁。在枪炮的威胁下,殖民协会的代表强迫梅苏拉多角(Cape Mesurado)地区非洲酋长卖给他们土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更多地从美国来的被释放黑人的定居点,沿着帕尔马斯角(Cape Palmas)到歇尔布岛(Sherbo island)的海岸线修建了起来。

239

虽然最初是由白人组织起来的,但是受过教育的黑人很快就接手了定居地的管理。1847年,他们宣布殖民地为独立的“利比里亚”共和国(其名字来自拉丁单词liber,意思是“自由”,此拉丁单词派生出很多英文单词,如“liberty”和“liberal”。)。以美国为模型,利比里亚也有一部宪法,其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就是以美国总统门罗(Monroe)来命名的。虽然最初的定居者及其后代主导了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但是与当地人的融合在逐渐进行。与塞拉利昂一样,19世纪利比里亚及其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杰出的非洲知识分子。棕榈油、咖啡、象牙和非洲紫檀(一种西非木材,在欧洲纺织业中被用来着染红色)成为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但是利润在19世纪后期不断下降。利比里亚商人并没有与在西非海岸建立永久性基地、殖民地的强有力的欧洲竞争者进行合作。然而,尽管在国内事务上存在政治问题和腐败,但是利比里亚还是维持着脆弱的独立,它甚至在19世纪末欧洲人的“瓜分”浪潮中存活了下来。

第十七章　19世纪的中非和东非



地图 17.1　19世纪的中西非。

19世纪的中西非

自16世纪末期以来,中西非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欧洲人对跨大西洋贸易中俘虏的需求。最初,欧洲人声明废除奴隶贸易仅仅适用于北大西洋。所以,在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安哥拉出口俘虏到巴西依然在不受干扰地进行着。但是中非内陆的奴隶制与西非一样,甚至在跨大西洋贸易终止后也并未完全停止。事实上,由于俘虏被转向了当地的生产,内部的奴役在某些方面反而增加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人口在不断增长,且需要有更多的粮食。

241

好几个世纪以来,臭名昭著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已经掠夺走了大量的健壮青年。尽管也有一部分妇女被出口,但是从总体上说,贸易让许多非洲社会中的妇女远远多于男人。由于女性数量过多和一夫多妻制的普遍实行,当地人口勉强能够自我繁衍。但是,一旦奴隶出口停止,中非人口就出现了第一次增长潮。这给中非地区的自然资源造成很大压力,且该地区总是易受周期性干旱和粮食短缺的影响。男女奴隶转而从事粮食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

与此同时,与西非一样,被强制的或被奴役的劳动力开始从事其他出口产品的生产。这也是为了满足非洲人对进口布匹、火器和其他工业品的持续需求。中西非也生产少量棕榈油和非洲紫檀,而用于满足欧洲人"合法"商业需求的主要出口商品则是象牙和蜂蜡。

乔奎

在内陆地区,由于贸易转向新型出口贸易产品,古老的国家瓦解了,新的国家群开始出现,这当中最大、最成功的是乔奎(Chokwe)。

乔奎人起源于安哥拉边远的高原地区,他们是专职的狩猎者。他们进口的货物主要为火器枪炮而非其他奢侈品,为此,乔奎人成为专业的象牙猎手和蜂蜡收集者。他们建立了由专业猎人组成的军队,并吸收被俘妇女以巩固其群落。他们强迫这些妇女栽培作物,收集和压榨蜂蜡。乔奎人以一系列单独的村落形式组织起来,规模最大的村落大

约有 1 000 名武装起来的猎人及其妻儿老小。如果有村落超过这个规模，就会分出新的村落。就这样，乔奎人为了寻找象牙和蜂蜡的新来源地而处在一种无休止的扩张状态中。他们沿着森林的边缘向北部和东部扩张，如此一来，就吞并了正在瓦解的隆达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19 世纪 70 、80 年代，由于大象被射杀殆尽，获得的象牙也越来越少了，乔奎人转而从事橡胶生产。19 世纪 80 年代，随着自行车充气轮胎的发明(19 世纪 90 年代以及 20 世纪初期，又有新出现的汽车轮胎)，欧洲的橡胶市场迅速扩大。乔奎的妇女从含有乳胶的灌木和匍匐植物中挤压树液，再将树液转变成易于运输的固体橡胶球。由于男人不断砍伐攀爬植物、灌木和森林边缘的林地，虽是收获了橡胶，却也导致了环境的破坏。

奥文本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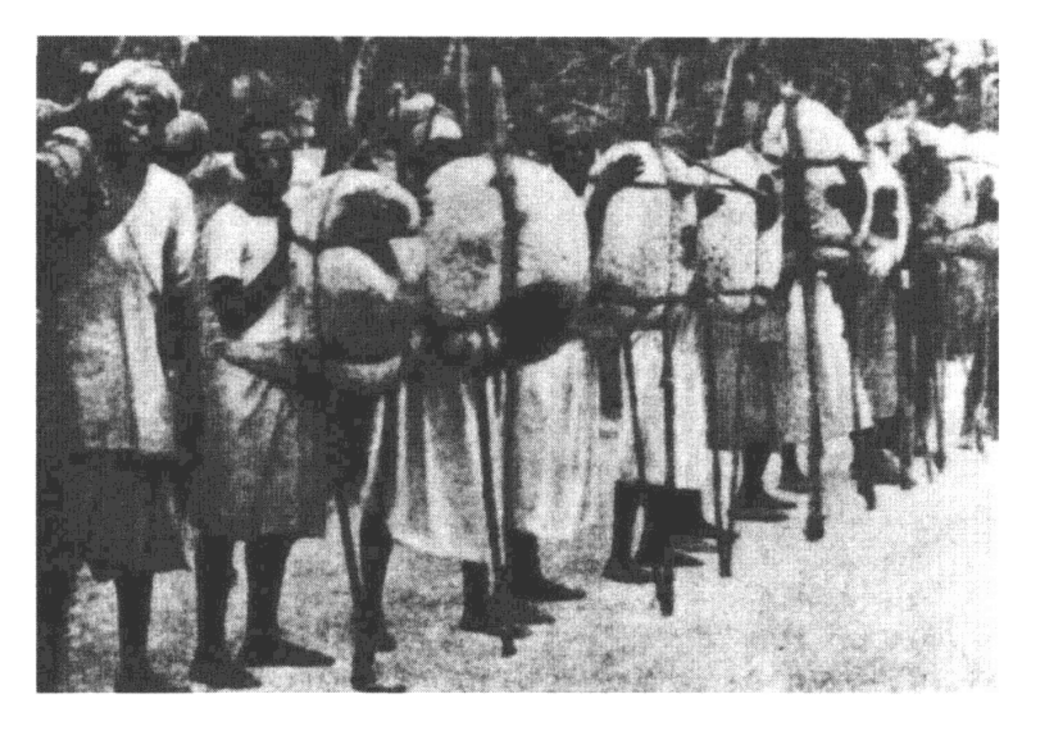
开始是奴隶，然后是象牙，为了搜索这两种出口商品，人们不断深入中非内陆地区，许多非洲人都变成了长途贸易的行家。在 18 世纪的奴隶贸易高峰期间，卡桑杰的因班加拉人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19 世纪，他们在长途贸易中的地位被隆达腹地的安巴基斯塔斯人(Ambaquista)和本格拉腹地的奥文本杜人(Ovimbundu)所取代。尤其是奥文本杜人，他们组织了庞大的贸易商队，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最远曾深入赞比西河上游地区。奥文本杜人是乔奎象牙和橡胶出口商进口火器枪炮的主要中转者。那些早期运输战俘的奥文本杜商人，此时将战俘变为转口贸易中的搬运工。

242

漫滩王国

洛兹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在赞比西河的上游河段，河流从北向南穿过一片开阔的草原。在夏天雨季的第二半段(11 月到 3 月)，河水上涨，淹没平原。原来叫卢亚纳(Luyana)的洛兹人为了能最大化地利用泛滥平原的自然资源，便在平原上星罗棋布的人造土堤上建立了定居点。在平原淹没前，洛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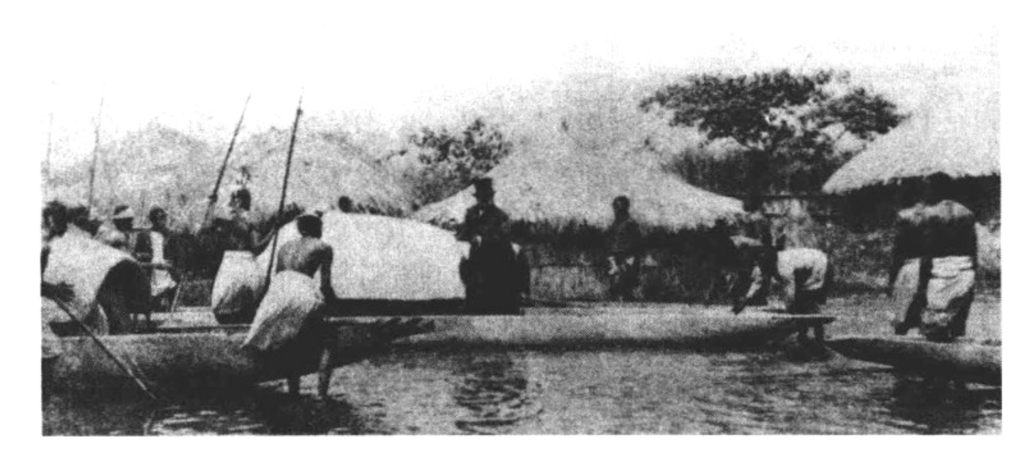
橡胶商队，摄于1900年代早期的德属东非(坦噶尼喀)。人们在肩膀上用木杆担着这样的固化原胶球，这一时期整个热带非洲都是这样来运输橡胶的。

人带着所有的财物去往西部平坦的、地势更高的干地上作为冬季定居点。当洪水退去之后，他们返回平原，在焕然一新的牧场上放牧家畜，在肥沃的漫滩淤泥上种植庄稼。

17世纪，在这一流域北端，即在说卢亚纳语的人群中已经发展出王权制度了。我们并不清楚王权制是否起源于洛兹的传统，它可能是受到隆达移民或其观念的影响，但也有可能是以卢安京加(Luanginga)属地卡拉博(Kalabo)附近的宗教神殿为基础在当地自然演变出来的。国王使用里通加(Litunga)的称号。18世纪，洛兹人扩张了王国，并覆盖了漫滩地区的大部分。统治这个新兴国家的里通加和贵族阶级强迫臣民或使用奴隶去修建可供居住的土堤，挖掘运河以便可以通航和控制洪水。随着洛兹王国在18、19世纪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俘虏被用于漫滩上的耕作和建设，洛兹老百姓也被迫要服各种劳役与兵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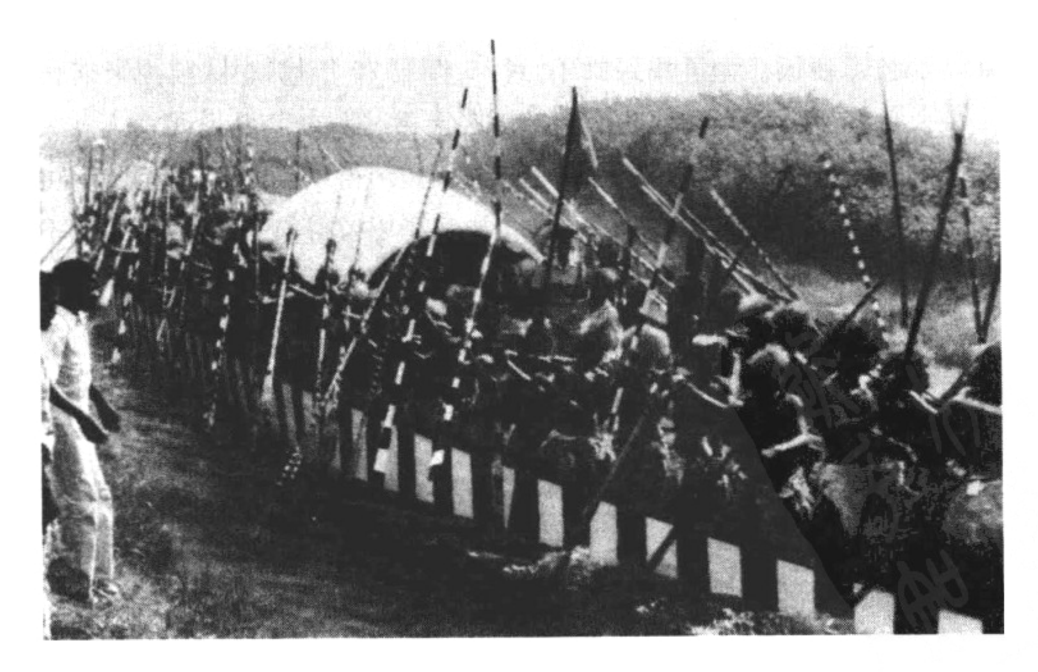
243

里通加直接领导臣民从夏季的漫滩住处迁往干地的冬季居所。他乘着一艘庞大的皇家驳船，带领着整个队伍。整个过程逐步发展成一



1900 年代早期的里通加莱瓦尼卡一世(Lewanika Ⅰ)登上一艘小平底船，准备在赞比西河每年水位上涨前离开其夏季居所。一旦他转乘大型的、有黑白条纹的皇家驳船(the Nalikwanda)时，就意味着他正式沿着赞比西河去往其干地上的冬季住处。

种皇家仪式，在今天赞比亚共和国西部省份，人们每年还会看到这种仪式的表演。由此，也就产生了一整套复杂的管理机构。在机构里，晋升基于美德而非王室裙带。



今天赞比西漫滩上皇家驳船(Litunga's Nalikwanda)的照片。

244

科洛洛人的征服

19世纪中期,洛兹王国经历了一场大的政治危机。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漫滩于19世纪30年代遭到了科洛洛人[①]的入侵。科洛洛人是说索托语的、从南部非洲动乱中逃脱出来的冒险家,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科洛洛人在塞贝通(Sebetwane)的强有力领导下,控制了洛兹王国的南部,并将残存下来的洛兹王室驱赶到北部。科洛洛人取代洛兹人成为统治贵族,但政治体系基本未变。然而,在塞贝通的继承者塞克勒图(Sekeletu)的统治下,科洛洛人只是将洛兹人看作在漫滩上耕作的奴隶。科洛洛人向他们课以重税,并将大量的洛兹人卖给奥文本杜奴隶贩子以换取枪支。

19世纪末期的洛兹王国

1864年,洛兹王室家族的幸存者领导的反抗推翻了科洛洛人的统治。科洛洛人统治的重要影响,除了将索托语带到该地区外,还在南部和东部扩张了洛兹王国。养牛变得更为重要,且洛兹人的生活更带有军事化特征。对在卡富埃河流域牧牛的伊拉人(Ila)的侵袭成为洛兹军队的家常便饭。为了找到象牙,到19世纪70年代,军队被用来捕获大象。象牙主要用来和那些从南部地区渗透过来的非洲、欧洲商人做买卖以换取枪支。19世纪末期,洛兹贵族统治重新得以确立,且统治阶层生活奢靡。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洛兹贵族将指甲留得很长,以表明他们不从事劳动。据估计,在19世纪最后十年内,洛兹王国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人是农奴或奴隶,他们为贵族劳作或由里通加组织起来在漫滩上挖凿沟渠。

中东非长途贸易的发展

卡曾贝王国的隆达

19世纪早期中东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长途贸易的发展。我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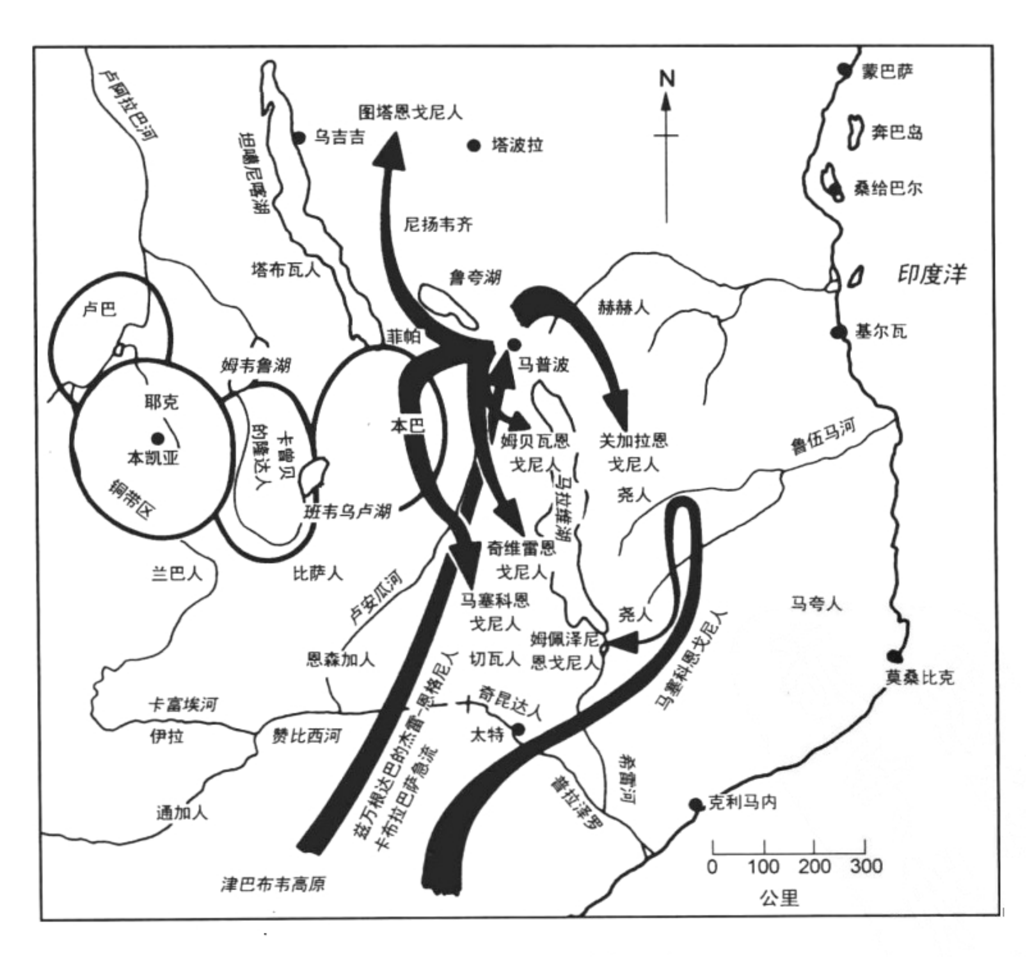
① Kololo,也有译为科卢洛人。——译者注

曾在本书第十四章论述过，到18世纪末期，卡曾贝王国的隆达已经成为横跨非洲的长途贸易网络中的主要枢纽。卡曾贝王国从其王国内的地方酋邦征收贡奉进而累积起贸易物品。人们在今天刚果和赞比亚沙巴铜矿带地区广泛地开采铜矿，铜条作为一种通币在王国内流通。卡曾贝的主要出口物品除了铜，还有象牙、盐和不断增加的转卖为奴的俘虏。从东方或西方进口的物品有火器、欧洲的毛织品、印度棉布、贝壳、念珠和欧洲的各种金属制成品。

比萨人和本巴人

245

去往西部的贸易线路大部分都要通过姆瓦塔雅姆弗的都城穆散



地图17.2 19世纪的中东非。

巴(Musumba)[1]。在东部,比萨人成为卡曾贝王国与葡萄牙商人、赞比西河流域定居者之间的主要贸易联系人,并由此成为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不过卡曾贝以关税和贡奉之名从他们那里抽取了大部分的利润。比萨人也经常受到本巴人的袭击。发源于卡曾贝王国正东部的本巴人,很快就统治了今天赞比亚的北部地区。本巴人以村寨为基础建立了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居住的地方通常远离侵袭对象,尤其是比萨人的贸易商队。

尧人

与此同时,马拉维湖南部和东部的尧人从象牙狩猎者变成全职的长途贸易商。他们成为希雷河流域和葡萄牙人的莫桑比克港口之间的贸易联系人。在 18 世纪,尧人又开辟了去往斯瓦希里的基尔瓦港口的贸易线路。这个古老的斯瓦希里港口的象牙和奴隶贸易,带来了 19 世纪初基尔瓦的复兴。19 世纪,尧人直接与马拉维湖西部的比萨人做生意。

普拉泽罗人和奇昆达人

在赞比西河流域,贸易主要是由普拉泽罗人(Prazeros)及其奇昆达(Chikunda)军队把持着。普拉泽罗人是葡萄牙人和非裔葡萄牙猎人、商人的后代,他们于 17、18 世纪在这一流域定居。普拉泽罗人摆脱了葡萄牙人控制,娶了当地的非洲妇女,成为非洲人的真正首领。普拉泽罗人权力的主要来源是由被抓获的奴隶组成的庞大的常备军。这些被称为奇昆达人的军队,主要用来征收当地的赋税以及从事狩猎、侵袭和贸易。普拉泽罗人控制着普拉佐(prazos)的大块地产,并将当地"土地的主人",即非洲农民,变为他们的属民。普拉泽罗人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并要求农民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以便养活普拉泽罗人及家庭、侍从与奇昆达军队。

24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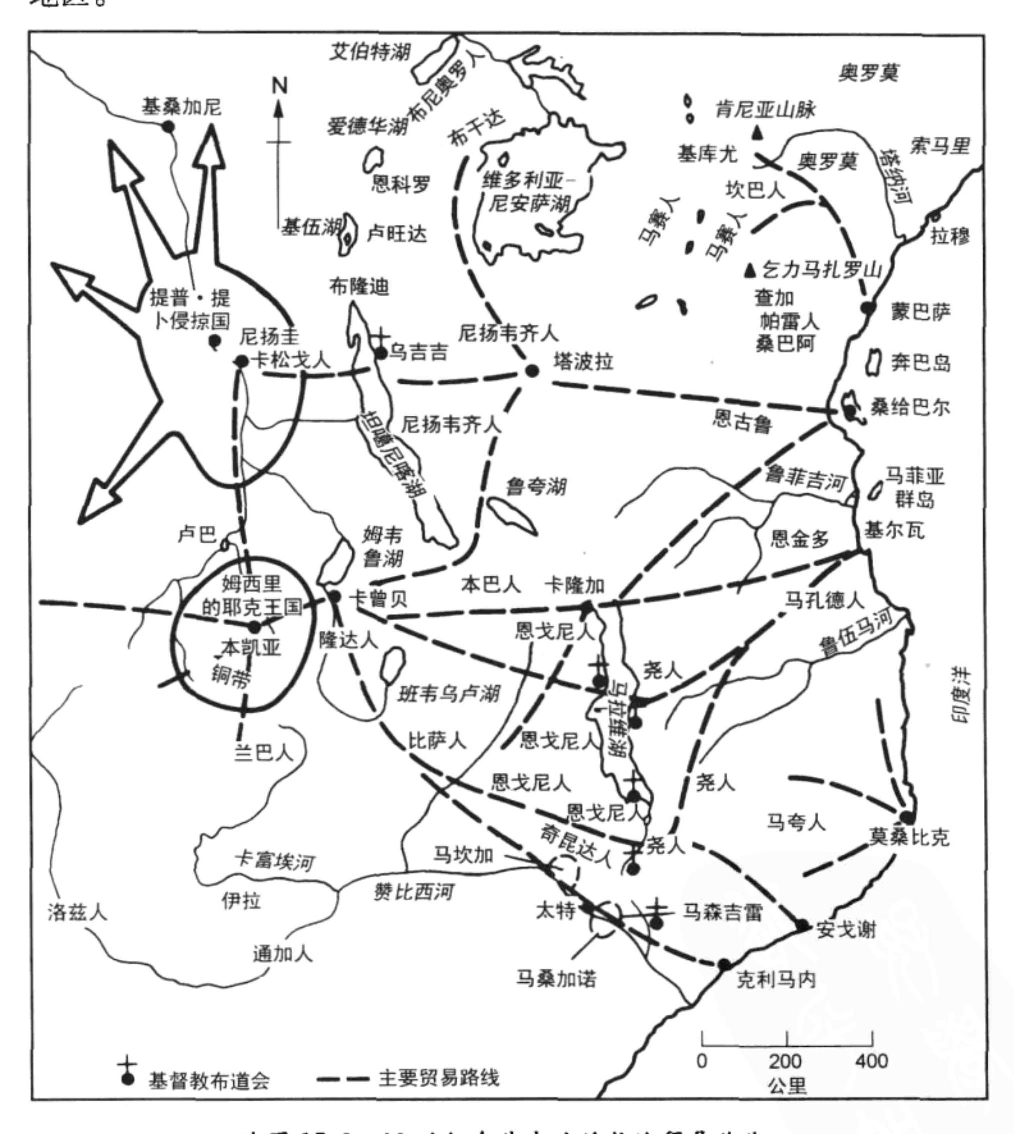
① Musumba,有译为马萨巴。——译者注



19 世纪 60 年代马拉维南部地区的尧人奴隶贩子。

18 世纪,随着马拉维帝国的衰败,普拉泽罗人及奇昆达人开始控制赞比西河流域的象牙贸易。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展,奴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奴隶既是向沿海地区运输象牙的搬运工人,又是壮大奇昆达军队的士兵。而且在 19 世纪,奴隶自身也渐渐成为一种出口商品。19 世纪 60 年代,独立出来的奇昆达军队将狩猎和侵袭范围扩大至卡布拉巴萨河(Caborabassa)湍流段的西部、赞比西河中游的河谷地区。

247



地图 17.3 19 世纪东非内陆的长途贸易路线。

尼扬韦齐人和坎巴人

尼扬韦齐人(Nyamwezi)在今天坦桑尼亚地区开辟并控制了坦噶尼喀湖与沿海之间的长途贸易线路。他们开辟了沿海地区的桑给巴尔与其都城塔波拉(Tabora)之间的贸易路线。就是从那里,尼扬韦齐人向北最远渗透到内湖地区的布干达,向南则经由本巴人地区到达卡曾贝王国的隆达、卢阿普拉河西部的产铜区。19 世纪,尼扬韦齐人在赞比亚北部至桑给巴尔的定期贸易往来中抢占了隆达的大部分象牙、铜贸易,这些货物以前都是由比萨人运往东南方的。

248

在今天的肯尼亚,主要从事贸易的民族是坎巴人。坎巴人建立了基库尤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但是,马赛人对东非大裂谷中部地区的控制往往阻碍了坎巴人进入布干达和湖区王国。

从南方来的侵犯者:恩戈尼人

19 世纪 30 年代,南方的恩戈尼人(Ngoni)的侵犯打断了中东非相对和平的贸易发展。与科洛洛人一样,恩戈尼人是从南部非洲政治动乱中挣脱出来的民族,且南部非洲的政治动乱其时还在进行。恩戈尼人在中东非地区的影响如此之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将全新的中央集权化的军事组织观念引了进来。这种军事组织建立在年龄团体制的基础之上,直接消解了对地方的效忠,并让所有年轻人为国家的军事力量效力,且被征服的民族也被吸纳进来。恩戈尼人的军团通过这一方式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他们虽然携带着枪支,却主要依靠短矛和突袭战术。大部分侵袭都发生在黎明或者黄昏时分村庄毫无防备的时候。比起农耕,恩戈尼人更加重视养牛。一旦他们在某一地区定居下来,军团就会被派遣出去劫掠牛只,征收谷物以及其他粮食。

大约从 1832 年起,恩戈尼人就开始侵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及其马佐埃属国,从而给津巴布韦平原的绍纳人和莫塔帕国家的残余力量造成了重大损失。1835 年,兹万根达巴(Zwangendaba)带领大部分恩戈尼人,即数千名强壮的支持者,包括聪加和绍纳拥护者,横渡了赞比西河。另

一支恩戈尼人则滞留在后面,并由一个名叫恩亚玛扎娜(Nyamazana)的妇女领导。她向西侵袭了罗兹韦的都城马尼扬加(Manyanga)。1836年,恩亚玛扎娜杀死了末代国王昌加米尔二世(Chirisamhuru Ⅱ)。恩亚玛扎娜在该地区安顿了下来,并在1840年嫁给了正在四处征伐的恩德贝勒国王姆济利卡齐(Mzilikazi)。恩亚玛扎娜及其一小支恩戈尼人就这样成为新恩德贝勒王国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兹万根达巴率领大部分的恩戈尼人向北远至坦桑尼亚西南部的费帕王国(Fipa)。恩戈尼人的胜利主要依赖于强有力的统治。1848年兹万根达巴去世后,恩戈尼人分裂为数个单独的团体。一个团体经由坦桑尼亚向北侵袭并导致了当地人的分裂与重组。其他团体则向南进发,并最终定居在马拉维湖的东部和西部地区。同时,恩戈尼人的一个独立分支在返回希雷河南部定居前,曾到达马拉维湖的东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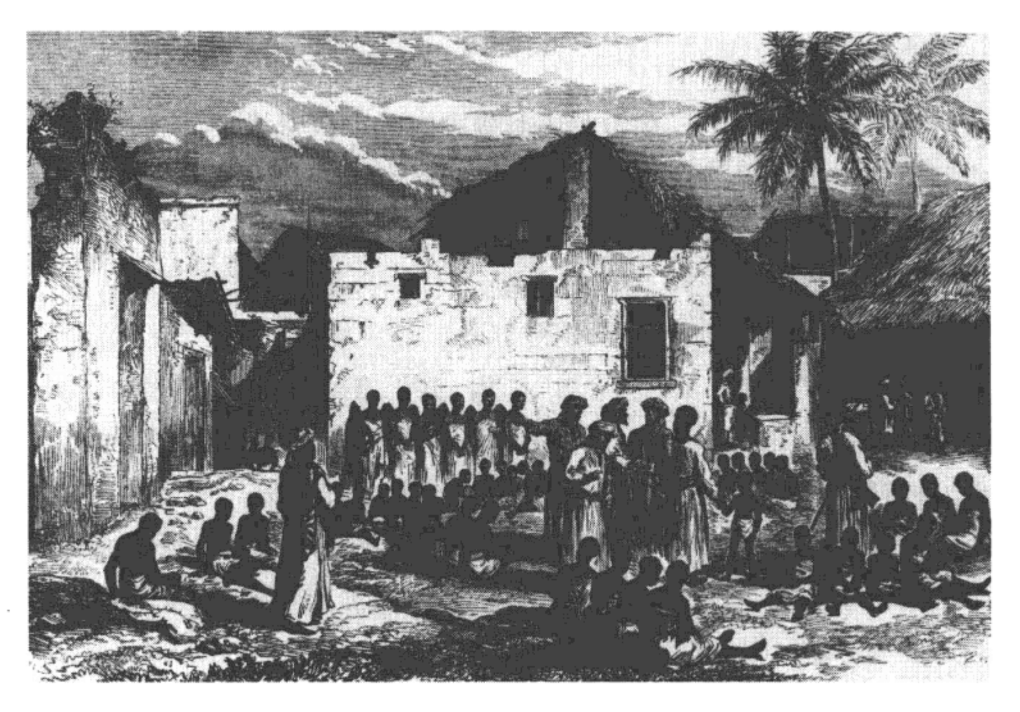
恩戈尼人吸纳了当地人,建立了一个人数虽少但势力较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们保持了军团体制的基本结构,继续侵袭邻国,并用武力征收贡奉。在19世纪最后十年到来之前,恩戈尼人的军事组织水平、纪律和经验使得他们在中东非能够最顽强地抵抗殖民征服。

249

许多中非、东非民族向其近邻恩戈尼人学习。其中,比较成功的是坦桑尼亚南部的赫赫人(Hehe),他们在年龄团的基础上采纳了一种恩戈尼式的军事结构。在门伊贡巴(Munyigumba)的领导下,分散的赫赫酋邦被统一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因此,赫赫人可以在19世纪90年代抵制恩戈尼人的进一步侵袭,并在后来强有力地抵制德国人的征服。

东非人的奴隶贸易

我们在本书前面章节中已经论述过,数个世纪以来,东非沿海地区输出了一定数量卖作奴隶的非洲人。其中,绝大部分奴隶被卖作家仆、小妾或者种植园奴隶并被带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然而直到18世纪下半叶,东非的人口贸易主要还是局限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



桑给巴尔的一个奴隶市场。

内,在整个贸易体系中不占有主导地位。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诸多因素导致了奴隶贸易规模的变化。首先,法国人在其印度洋殖民地毛里求斯、留尼汪(Reunion)和塞舌尔群岛开办了糖料、香料种植园。起初,他们在克利马内(Quelimane)和莫桑比克从赞比西河流域的葡萄牙人和印度人那里购买奴隶劳工。随着 18 世纪 70 年代糖料种植园的快速发展,暴虐行为、过度劳作和严酷环境共同导致了岛上的高死亡率,法国人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奴隶劳工,他们将目光转到了在基尔瓦和桑给巴尔的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对基尔瓦和莫桑比克内陆的侵犯,让尧人成为奴隶劳工的主要供应者,甚至有些尧人本身也会被卖为奴隶。

250

19 世纪初期,第二个因素开始起作用了。此时,巴西人发现他们不能从大西洋海岸获得足够的奴隶劳工。这部分是由于反奴舰队的行动,部分因为巴西糖料种植园的扩张。由于美洲奴隶的缺乏,奴隶价格开始飙升。更高的利润促使巴西的奴隶贩子开始长途跋涉,来往于印

度洋沿海地区。奴隶大部分是从赞比西河流域和莫桑比克地区买过来的。

最后,19 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对奴隶的需求快速增长,他们需要奴隶到桑给巴尔和周围岛屿上的种植园里劳作。自阿拉伯人于 1696—1698 年将葡萄牙人驱逐出耶稣堡和蒙巴萨起,他们就逐渐控制了北部沿海地区的贸易。在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葡萄牙商人被限制在更南边的沿海城镇。19 世纪初,阿曼苏丹已经直接控制了北部沿海地区诸多斯瓦希里城镇。19 世纪 20 年代,苏丹赛义德·萨义德(Seyyid Said)鼓励阿拉伯人在桑给巴尔群岛和奔巴岛上建立丁香种植园。当然,种植园也是由内陆来的奴隶来进行劳作的。阿曼苏丹国的丁香种植园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苏丹赛义德·萨义德在 1840 年将其都城迁到了桑给巴尔。随后,内陆到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快速增长,桑给巴尔成为东非沿海地区最大的奴隶市场。

据估计,东非奴隶贸易在 19 世纪 60 年代达到顶峰,每年输出的奴隶达 7 万之众。虽然有反奴舰队的限制,但沿海一带的奴隶贸易依然存在。

1873 年,英国人说服了桑给巴尔的苏丹关闭了岛上的奴隶市场。然而,此时的欧洲人对象牙的需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之前,东非出口的大部分象牙都被运往印度和中国。可此时,欧洲的需求最大。在工业化的欧洲,日益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使用象牙做的台球、钢琴键和餐具把手。19 世纪 70 年代,伦敦的拍卖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洲象牙销售市场。此时,很少有俘虏从东非输出。但是,沿着内陆贸易线一带,无辜的男女依然受到侵袭、抓捕,并被迫将象牙运输到海岸。

中非内陆的象牙和奴隶贸易

19 世纪 60—80 年代,东非象牙、奴隶市场将其魔爪伸到了中非内陆。代理商改变了该地区长途贸易网络的性质,且不知不觉地为紧随其后的殖民征服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赞比西河下游地区的普拉泽罗人对不断增长的奴隶需求迅速作出反应。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奇昆达人的独立分支在赞比西河中游地区的狩猎和侵袭是何种情况。在赞比西河下游的普拉佐，普拉泽罗人开始出售其属民，甚至有时出售奇昆达士兵。这加快了人口并不多的普拉佐人的分裂。到 19 世纪中叶，少数存活下来的普拉佐人并入大普拉佐人(Supraprazos)中，大普拉佐人还包括有马坎加人(Makanga)、马桑加诺人(Massangano)和马森吉雷人(Massingire)。大普拉佐人变成了本质上更具有本土化色彩的非洲人，因此，他们在 19 世纪 80 年代强有力地反抗葡萄牙人的殖民征服。

赞比西河下游北部的奇昆达人、尧人和恩戈尼人对今天马拉维、赞比亚东部曾一度繁荣的农耕地区的侵袭造成了该地区血流成河、混乱不堪。19 世纪 70、80 年代，东非的小规模农耕群落为了安全不得不住在有栅栏的村庄里。

戴维·利文斯顿(David Livigstone)的反奴呼吁将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吸引到中非内陆。但是传教士用“基督教和商业”取代奴隶和象牙贸易的企图失败后，他们便开始寻求英国政府的介入。这些传教士及其他传教士的作用，我们将在第二十章中进行论述。

东非内陆的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

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很少参与到东非贸易。19 世纪，桑给巴尔和沿海城镇中阿拉伯移民在数量上肯定有着显著的增长。此时，很多渗透到内陆贸易网的人都是纯正的阿拉伯人，但也有一些人具有非洲-阿拉伯人或者斯瓦希里人的血统。这个问题在同时代欧洲旅行者的著作中也是较为模糊的，他们的“探险日记”(参见本书第二十章)是此时内陆商人情况的主要历史证据。他们往往将来自东非沿海的、长期从事抢劫的穆斯林商人称为“摩尔人”或者“阿拉伯人”，除非他们在长相上很明显是“非洲黑人”。例如提普·提卜(Tippu Tip)，利文斯顿与斯坦利都认为他是个阿拉伯人，但事实上他具有阿拉伯人、斯瓦希里人和尼扬韦齐人的混合血统，某种合成的术语将显得更恰当些。所以，这里我

们用“斯瓦希里／阿拉伯人”这一术语指称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商人，无论他们具有何种血统。斯瓦希里／阿拉伯人通常都是贸易商队的领导人，但占商队绝大多数的人——猎人、侵袭者与搬运工——都是从当地新招募、俘获或者自愿加入的，且通常都是尼扬韦齐人。

当沿海对奴隶和象牙的需求上升时，斯瓦希里／阿拉伯人和尼扬韦齐的猎人/商人便深入内陆寻找这些商品。他们得到了桑给巴尔或者印度商人的资助，率领着一支有数百甚至数千男女组成的装备精良的商队。由于诸多古王国的衰落，他们在中非内陆地区建立了一些永久性据点。与南部的尧人一样，尼扬韦齐人是在马拉维湖北部建立据点的先行者。斯瓦希里／阿拉伯人沿着尼扬韦齐人的线路于 19 世纪 30 年代末在坦噶尼喀湖两岸的乌吉吉(Ujiji)地区扎下根来。19 世纪 40 年代，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的商队跨过大湖，在刚果森林边缘的东部地区收集象牙和俘虏。此时，尼扬韦齐人最远已经渗透到坦噶尼喀-马拉维走廊的西部地区。

252

姆西里和耶克

19 世纪 50 年代，一个叫姆西里(Msiri)的尼扬韦齐商人在卢阿普拉河西部建立了一个永久性内陆据点。此时的卡曾贝王国正饱受内战之苦，姆西里得以乘人之危。姆西里最初从都城本凯亚(Bunkeya)将其据点扩张成了一个由很多戒备森严的村庄组成的劫掠／贸易国家。随着尼扬韦齐人的不断扩展，他们吸纳了很多其他民族，并取了个当地的名字巴-耶克(ba-Yeke)。姆西里的耶克正是处于产铜区的中心，因而得以将卡曾贝王国西部地区的大部分贡奉转移到耶克来。巴-耶克人向西则与乔奎人、奥文本杜人之间建立了联系。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同时从东西方的联系中获利，就像卡曾贝王国的隆达人在此之前的情形一样。姆西里利用这一地区的象牙、铜资源建立了大量的兵工厂，而火器枪炮则是他从奥文本杜人和斯瓦希里／阿拉伯人那里买来的。正是姆西里对该地区的铜资源的控制，让英国和比利时殖民者于 1890—1891 年来到了本凯亚。

提普·提卜和刚果盆地东部地区

与此同时，中非内陆一位最著名的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也已经在坦噶尼喀湖西部扎下根来。他的名字叫哈米德·本·穆罕默德(Hamed bin Muhammed)，俗称提普·提卜。他是在姆西里的尼扬韦齐人中间开始狩猎和掠夺生涯的。19世纪60年代，他控制了卢阿拉巴河(刚果河上游)流域的尼扬圭(Nyangwe)和卡松戈(Kasongo)的斯瓦希里/阿拉伯人据点。他能够在这里维持着途经乌吉吉和塔波拉到桑给巴尔的直接贸易联系。这种联系使他可以长期获得火器，以便在森林里狩猎并侵袭周围的村落。如此一来，他事实上摧毁了卢阿拉巴河上游地区古老的桑海城镇，且严重地削弱了业已衰落的卢巴帝国。

253



提普·提卜(哈米德·本·穆罕默德，1837—1905年)画像，他是奴隶、象牙的掠夺者/商人，有时也是桑给巴尔苏丹的代理人。

考虑到他的“王国”是桑给巴尔苏丹的西部前哨，提普·提卜将王国打造成一个贸易帝国，从南面的卢巴一直延伸到刚果河上游的西部大弯曲处。19世纪80年代初，提普·提卜的“军队”多达几千人。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个狩猎-侵袭团体的非正规“联盟”的“领主”。与提普·提卜关系紧密的同伙就是斯瓦希里/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尼扬韦齐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武装队伍。提普·提卜及其同伙深入刚果森林追捕大象，袭击村落，掠夺粮食和俘虏。他们将俘获的妇女作为侍妾，男人则作为搬运工押送到桑给

巴尔。男人和女人都被当作农业劳动力去照管卡松戈和尼扬圭附近的甘蔗、稻米或玉米种植园。“剩余”的俘虏通常都在本地被赎出，用来换取象牙。据英裔美国旅行家斯坦利的日记所载，对提普·提卜及其同伙而言，人的生命非常不值钱：

> 为了给一艘帆船让道，我们在姆珀提拉(Mpotira)[从尼扬圭顺游而下]停了下来。这艘船运载着成百上千只要到塔塔(Tata)去交易的绵羊和山羊。据说，一只绵羊能购买一根象牙(长牙)，12个奴隶能买一根象牙。在乌吉吉，6个奴隶就能买到一根象牙。
>
> “奴隶不值钱，”哈米德·本·穆罕默德说，“他们只需要被赶在一处。”那正是穆伊尼·杜伊尼·杜古姆毕(Muini Duini Dugumbi)和姆塔加莫约(Mtagamoyo，提普·提卜的同伙)所干的事。
>
> 这些尼扬圭的混种人没有衣服、念珠和商品。他们抢劫象牙……他们攻击尼扬圭附近的普通百姓，抓获到12或15个奴隶可以换来35英磅(16公斤)的象牙。穆伊尼·杜伊尼有100到120个女人，姆塔加莫约有60个女人……
>
> ——R. Stanley and A. Neame (ed.), *The Exploration Diaries of H. M. Stanley*, William Kimber, london, 1961, p. 134; entry for 7 November 1876

应该指出的是，斯坦利本人只要一有轻微的不悦，就会毫不迟疑地击毙非洲人。

斯瓦希里/阿拉伯人对东非湖区的渗透

19世纪70、80年代，从沿海地区来的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正主导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此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接管了尼扬韦齐人的贸易都城塔波拉。装备精良的斯瓦希里／阿拉伯贸易商队甚至越过基库尤人的国家、马赛人领地的北部边缘而与图尔卡纳

湖西部养牛牧民和象牙猎人做买卖。

254

自19世纪60年代起，少数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被允许定居在维多利亚-尼安萨湖西北面的布干达首府。但是，他们在那里不能再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四处侵袭和自由贸易了。巴干达人统治者，即卡巴卡穆特萨一世(Kabaka Mutesa Ⅰ，1859—1884年在位)牢牢地控制了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巴干达贵族热衷于从穆斯林商人那里获得棉布和枪支。所以贵族们也派遣猎人和侵袭者去收集斯瓦希里／阿拉伯人寻找的象牙和俘虏。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在布干达和沿海地区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与此同时，巴干达划独木舟的人(canoeists)正在开通与维多利亚-尼安萨湖南岸的贸易联系。

在坦桑尼亚西部，尼扬韦齐人对日益主导其贸易路线的沿海斯瓦希里／阿拉伯人表示出不满。米兰博(Mirambo)建立了一个尼扬韦齐人的贸易帝国，涵盖了坦桑尼亚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而另一个尼扬韦齐人的首领尼温古(Nyungu)在更南边联系松散的金布(Kimbu)实现了政治控制。这两个国家都是成功的贸易国家，它们都将斯瓦希里／



马拉维湖卡隆加的姆洛兹(Mlozi)及其奴隶掠夺者，1890年。

阿拉伯人限制在坦桑尼亚西部日益凋敝的贸易路线和诸如塔波拉、乌吉吉这样的城镇。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非的经济生活已被火器、象牙和俘虏的贸易所带来的暴行所干扰与主导。除了个别商人和统治者获得大量财富外,绝大多数的中非人民并没有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好处。而且,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持续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给欧洲殖民者插手该地区事务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后来,中东非的人民发现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只是从一种奴役形式摆脱出来却陷入了另一种奴役形式。

255

马达加斯加:梅里纳王国的兴起

自16世纪以来,欧洲人到达印度洋并改变了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权力关系。南部的马尔加什(Malagasy)王国在印度洋贸易网络中一直没有发挥直接性作用。经南非至印度的欧洲船运的发展给南部马尔加什统治者带来了机会。欧洲人主要是派遣一些携带有食品(特别是大米)和奴隶的访问船到那里去。18世纪,法国人在其殖民地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岛上的种植园使用了奴隶,又一次推动了马尔加什经济的发展。

从18世纪末开始,给这些法国殖民地提供给养和奴隶贸易,推动了中部高原梅里纳(Merina)王国的发展。梅里纳国王实行一套关于劳役的常规体制,为其王国的发展提供服务,强迫劳动力服兵役以及从事王国控制的农业、工业生产。在工业生产中,非洲前殖民地时期的工业革命最为系统的努力就是利用水力来驱动机器。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军事上:制造滑膛枪、大炮和军火弹药。一个较大的、集中的工业中心就是动用2万个劳力建造起来的,并由5 000个固定职工来维持生产。

到19世纪中期,梅里纳王国扩展到了整个中部高地和马达加斯加东半部。但是在其权力的鼎盛时期,梅里纳王国本身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19世纪20年代,基督教已经成为国教,教会和学校都在为国家招募强迫性的劳工。

19世纪中期,奴隶贸易的取缔、北部沿海地区法国贸易定居点竞争的不断增强让梅里纳经济开始衰弱。19世纪70年代,反对法国人从北部持续侵犯的军事斗争让梅里纳王国彻底崩溃了。马尔加什属民趁机发起了反对国家强迫劳役的起义。1895年,残暴的梅里纳统治者声名狼藉,以至于法国人最后进入梅里纳都城时都未遭到任何反抗。

1895—1897年的梅纳拉姆巴人(Menalamba)起义通常被认为是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然而,近来历史学界认为,这场起义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攻击到法国人。更确切地说,他们攻击的是梅里纳管理机构及其职员,而这一系统是法国人打算重建的。因此,他们攻击的是教会、学校和强迫劳动系统的管理者。

第十八章　19世纪前工业时代的南部非洲

256

国家的建立和毁灭：姆菲卡尼／迪法盖及其影响

19世纪头几十年，横扫次大陆的一系列战争将南部非洲内陆社会搞得支离破碎。东南部地区的恩古尼人(Nguni)很是恰当地将这些战争称为"姆菲卡尼"(Mfecane)，意思是"支离破碎的"；而高地草原的索托-茨瓦纳人则称之为"迪法盖"(Difaqane)或者"里法盖"(Lifaqane)，意思是"散乱的"。1816—1840年期，姆菲卡尼／迪法盖改变了南部非洲内陆的政治版图。

姆菲卡尼的"神话"

20世纪80年代，南非的部分历史学家开始质疑姆菲卡尼是否真正发生过。他们提出，姆菲卡尼不过是一个宣传神话，是有着殖民意识的白人及其现代种族主义支持者共同捏造出来的。这些历史学家主张，神话的目的就是为19世纪的殖民统治，进而也意味着为现代种族隔离制度提供辩护。毫无疑问，过去的白人殖民主义者及其现代对应者蓄意歪曲了姆菲卡尼时期的某些内容。他们试图证明非洲人天生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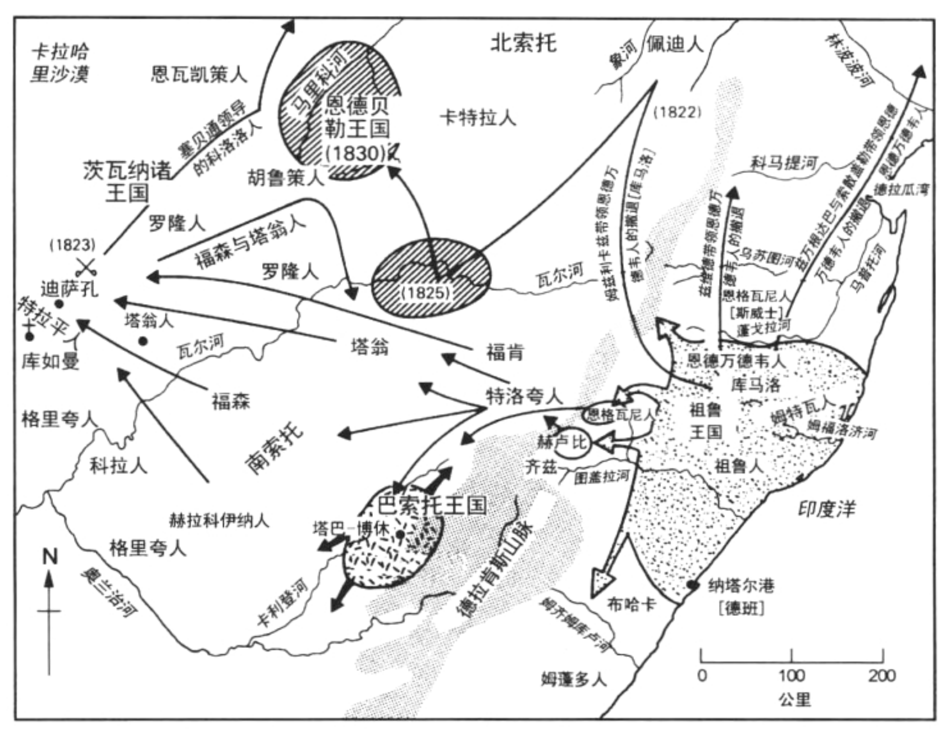
有非理性的“部族冲突”倾向，因此19世纪30年代南部非洲内陆的很多闲置地正等着白人定居者到来。许多关于姆菲卡尼的现代评论似乎已经对这种歪曲做出了回击，而这种歪曲在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官方历史教学中依然存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非以外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出现关于姆菲卡尼的完全不同的解释。然而，南非历史学界的评论很少关注这种解释。但是，南非历史学界的评论已经导致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检验证据，重新思考南部非洲历史中这一非常重要时期的某些内容。

德拉肯斯东部的姆菲卡尼运动

所谓的姆菲卡尼运动起始于北部恩古尼诸王国，如姆特瓦(Mthethwa)、恩德万德韦(Ndwandwe)和恩格瓦尼(Ngwane)之间的东南低地草原地区。最可能导致这场冲突的根源在本书第十五章已经概述过。从根本上说，它是由于该地区自然资源的竞争不断加剧造成的。18世纪末，马德拉图勒人(Madlatule)的饥荒迅速地将这种竞争推向了极致。成人军团多年来不断地被用于军事目的：扩展酋邦放牧、耕种和狩猎地的范围，以及保护其财产不被竞争对手掠夺。此时正值饥荒危机时期，军团几乎无时不刻不在战场上保卫领土和袭击近邻。衰弱的酋邦寻求更强大邻居的保护，自愿或者被迫地并入那些大的王国，也不再搞什么并入仪式了，且军团日益纳入强势国王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

257

该地区的竞争导致了1816—1819年间战争密集地出现。索布胡扎(Sobhuza)的恩格瓦尼人被驱逐出蓬戈拉河流域，恩德万德韦人在与姆特瓦人之间的决战中首次取得了胜利。姆特瓦人的领导人丁吉斯瓦约(Dingiswayo)被杀死，其力量分散开来。但是一个新领导人恰卡(Shaka)很快就崛起了，并开始挑战恩德万德韦人的统治。恰卡是前丁吉斯瓦约军队的指挥官，也是前姆泰特瓦联盟中一个小酋邦即祖鲁的领导人。在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之后，恰卡军团打败了敌人，将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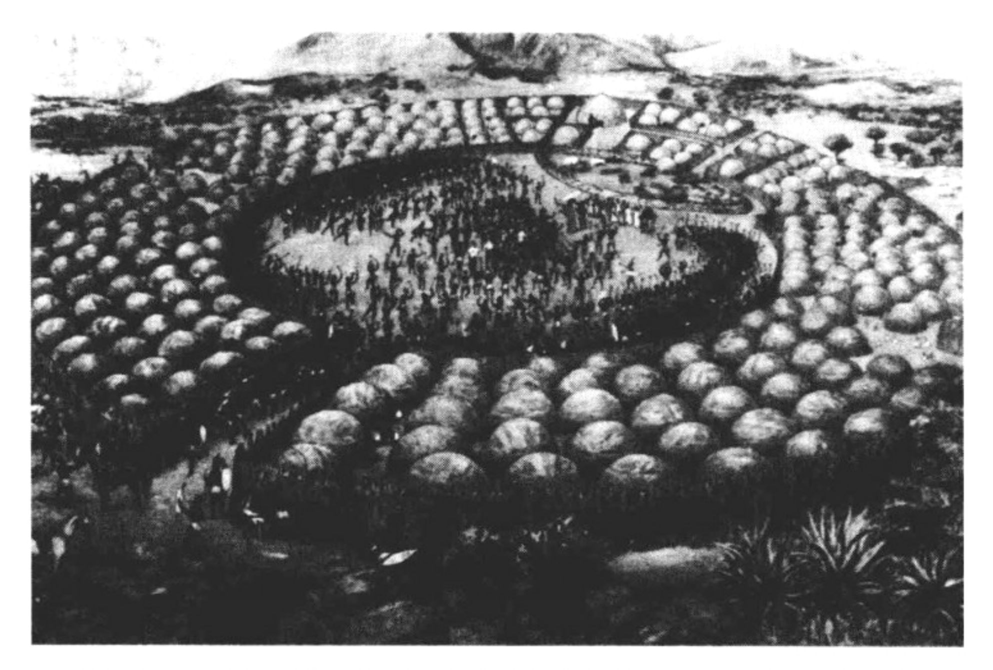
地图 18.1 祖鲁王国的兴起与高地草原上的姆菲卡尼运动,1818—1835 年。

258 德万德韦军队的残余势力赶到了蓬戈拉河的北部。恩德万德韦人和北部的恩古尼人从这些战争中,后来又从与祖鲁人的战争中逃脱了出来,将姆菲卡尼运动向北推进。他们被称为“恩戈尼人”,在 19 世纪中叶不断侵袭整个中东非地区。

恰卡和祖鲁王国的兴起

到 1819 年中,恰卡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拥有无上权力的统治者,这个王国支配着图盖拉河(Tugela)和蓬戈拉河之间的所有地区。在之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竭尽全力地扩张着其王国。他越过德拉肯斯山脉的丘陵地带,派遣军团向图盖拉河和乌姆济姆库卢(Umzimkulu)河之间的南部地区的民族勒索钱财。

这时,祖鲁王国迅速扩张,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军事上所出现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是恰卡带来的。当然,这些军事上的变化并不完全是恰卡本人的创新,恩德万德韦和姆特瓦军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



丁冈(Dingane)统治时期的祖鲁都城姆甘甘德鲁弗(Mgungundlovu),1838年。

现了这些革新。恰卡改进了这些革新,让它们发挥更大的效率。祖鲁军团训练严密,纪律严明。他们的主要武器是一种短刺矛,它取代了先前效率低下的长飞矛。军事上的成功最终取决于速度和出其不意,再加上一种要消灭敌人的斗志。19世纪30、40年代,正是恩戈尼人和恩德贝勒人将以这种方式作战的军团带到了中非地区。

恰卡将军团与政治控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确立了中央集权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在新近征服的地区,王室官员(induna)取代了世袭的酋长,直接对国王负责。任何不屈服的人会被清除,有时整个村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会被斩尽杀绝。有时,如果世袭首领迅速地表示出一种很心甘情愿的服从姿态,他们就不会被王室官员所取代。但是,即使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首领也丧失了其大部分独立权力,他们也不再有召集军团的权利。新近征服酋邦的年轻男女会被合并到国王的军团中来。库马洛(Khumalo)的酋长姆济利卡齐(Mzilikazi)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既是世袭首领又是自己军团的军事指挥官。当他公然反抗祖鲁国王权威并将其战斗军团撤退到内陆高原时,他证实了恰卡总体政策的睿智。

259



身披战服的祖鲁战士恰卡的侄子乌迪米尼(Utimini)。

除了履行军事职责,男女军团也会参与生产。男人放牧国王的牛群、搜寻象牙,而女人则耕作国王的田地。军镇(regimental town)以一个中央牛围为基础,设在王国范围内的各个战略要地上。军团只有在为国王提供多年的服务后,才会被解散,才允许其成员结婚,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即使到了那时,他们仍旧有义务听从军事召集。军团制度以这种方式粉碎了区域认同,塑造了民众对祖鲁国王的忠诚。在恰卡的短暂统治结束之前,王国中的所有人已经开始将他们自己当作"祖鲁人"了。

260

在祖鲁王国的北部,姆菲卡尼已经产生了许多新的强国。在蓬戈拉河北部的山区,索布胡扎·恩格瓦尼(Sobhuza Ngwane)建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斯威士(Swazi)王国的国家,斯威士的名称是以索布胡扎的继承者姆斯瓦蒂一世(Mswati Ⅰ,1839—1865 年在位)来命名的。在今天莫桑比克的南部地区,恩德万德韦一位名叫索散盖勒(Soshangane)的前军

事指挥官创建了一个强大的掠夺型国家加扎(Gaza)。该王国深入恩德万德韦人的近海地区,也深入中非的恩戈尼人那里。与此同时,图盖拉河南部的恰卡军队为了寻找牛和其他战利品,袭击的地方更远。甚至乌姆济姆库卢南端的姆蓬多人(Mpondo)也遭到了祖鲁人的进攻。在过去,人们常常认为今天纳塔尔大片地域里的人口在这些袭击中完全灭绝了,每个地方的贫困难民都要避开恰卡军团。现代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一人口灭绝的程度,并提出姆齐姆库卢(Mzimkulu)北面依然存在许多分散的村庄。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姆庞加兹萨(Mpangazitha)的赫卢比人(Hlubi)和马提瓦勒(Matiwane)的恩格瓦尼人在德拉肯斯山麓遭受到多次侵袭。1821—1822年间,开始是赫卢比人,然后是恩格瓦尼人逃离了这个地区。他们穿过德拉肯斯山脉的高山通道,将姆菲卡尼的冲突冲击到了索托高原一带。

恰卡统治的结束

1828年,恰卡的同父异母兄弟丁冈暗杀了他,并宣布自己是国王。恰卡花了仅仅十年创建了祖鲁王国。然而,在他死亡前的十年间,王国已经濒临毁灭。丁冈缺乏恰卡的军事天赋和领导才能,但恰卡是否能够更好地应对他的继任者所遭遇的问题,也是难以预测的。丁冈所遭遇的一些主要问题遗留了下来。恰卡王国的权力和团结,绝大部分是建立在战争总是胜利和源源不断的战利品的基础上。到恰卡统治的最后几年,战争取得胜利变得越来越难。潜在的敌人可能在比以往更远的地方,而他们正在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事实上,当他们获悉恰卡死亡时,祖鲁军队仍然未被索散盖德的加扎所打败。然而,丁冈面临的最大麻烦并不是维持恰卡的成功之道,而是低地草原遭到侵犯。1837—1838年,全副武装的布尔骑兵入侵低地草原地区,他们是为白人居留地寻找新土地而从开普殖民地移民过来的。

高原地区的迪法盖

19世纪早期,南部高原地区的索托人居住在众多小型、独立的酋

邦中。这些酋邦是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的卡利登河流域上的密集居住区。每个酋邦都有自身的年龄组制度。这些制度主要用于公共事务和军事,但人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被召集起来。酋邦间抢夺牲畜很是司空见惯,但是这种类型的冲突没有特别严重的破坏性。酋邦很少会出现因侵掠而彻底陷入赤贫状态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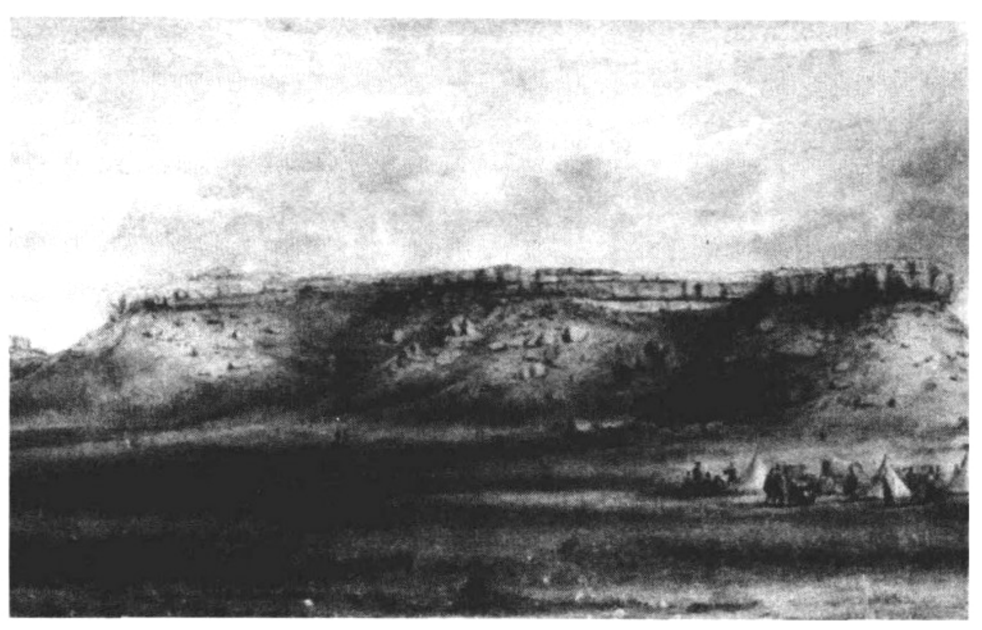
261 1821—1822年,当赫卢比人和恩格瓦尼人突然出现在高原地区时,他们发现索托小酋邦是很容易掠夺的。最初,赫卢比人开始进攻特洛夸(Tlokwa),特洛夸反过来攻击卡利登河上游的索托酋邦。尽管,这些袭击无疑会导致许多破坏和不稳定,但在过去,人们往往夸大这些破坏的严重性。冲突和掠夺牲畜,对这个地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时,新的最大危险是南方格里夸人骑兵以及从开普殖民地来的带着枪的科拉人的侵袭。他们袭击奥兰治河和卡利登河流域,抢劫村落,抓捕牲畜并将俘虏带到开普殖民地卖作奴隶。

这一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迪法盖,或"分散"时期,事实上也确实有过广泛的冲突。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抓住这样的机会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强大的新国家。从长远来看,从开普殖民地来的布尔殖民者的侵略更具毁灭性。自19世纪30年代起,他们在高原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事实上,他们还将迪法盖延长了数十年。

莫舒舒和索托王国的兴起

1821—1823年实是多事之秋,就是在此期间,莫科泰利(Mokoteli)部落的莫舒舒(Moshoeshoe)在卡利登河上游东部地区的一座山坡上建立了总部。作为一个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他迅速在这里获得了声誉,难民都逃往他这里以求得保护。1824年,在遭到特洛夸人和恩格瓦尼人几次攻击后,莫舒舒带领几千个追随者迁移到了更大点的塔巴-博休(Thaba-Bosiu)平顶山上。塔巴-博休是一个牢固的防御阵地,经得起长期围困。这里可以获得良好的牧草和淡水,并可以控制周围的村落。

以这个安全的中央首府为基础,莫舒舒建立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索托王国。恰卡的祖鲁王国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更像是个半



莫舒舒的山区根据地塔巴-博休，查尔斯·戴维森·贝尔(Charles Davidson Bell)的水彩画，1834 年。

独立的酋邦联盟。随着酋邦纷纷寻求莫舒舒的保护，它们被合并到这个正在扩张的王国。世袭首领仍留在原先的职位上，负责召集自己的年龄团。他们只需要承认莫舒舒总体上的权威，并在需要时派军团支持王国以及向都城送去贡奉。莫舒舒通过一种复杂的联姻同盟体系来巩固王国内部的关系，他自己有许多妻子和孩子，而大部分索托酋长家庭内都会以这样或者那样方式与国王联系在一起。 262

莫舒舒并不反对袭击更弱的邻居以建立自己的牧群，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地承认某些强邻的实力。因此，他将牛作为贡奉上交给马提瓦勒的恩格瓦尼人，将羽毛和毛皮制品当作礼物送给恰卡。他甚至在击退了恩德贝勒人的一次进攻后，还将牛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直到 1827 年祖鲁削弱恩格瓦尼后，莫舒舒才打散了其余敌国，并将它们向南赶入滕布兰(Thembuland)。

19 世纪 30 年代初，莫舒舒从开普殖民地邀请传教士来其王国定居。他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动机，而非宗教的动机。他认识到索托安全的主要威胁是开普殖民地北部边境地区的格里夸骑兵和科拉人



19 世纪 60 年代的莫舒舒(帽子最高的那位)及其顾问。

263 侵扰。莫舒舒希望与开普殖民地白人基督徒的友好关系将延缓这些进攻,也能让索托人从事火器枪炮和马匹的贸易。就后一个方面来说,莫舒舒的政策是成功的。19 世纪 30、40 年代,进口来的马匹和枪支使索托王国成为南部非洲最难对付的一股力量。

西部高原的迪法盖

当索托王国的发展给东部高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时,迪法盖运动也正向西部地区的茨瓦纳蔓延。由于被南部茨瓦纳庞大的牛群所吸引,1823 年,奔袭而来的福肯人、赫拉科伊纳人(Hlakoena)和塔翁人族群聚集在泰尔哈平(Tlhaping)的都城迪萨孔(Dithakong)。泰尔哈平呼吁传教士罗伯特 · 莫法特(Robert Moffat)将格里夸人及其火器枪炮带来帮助他们。在这次事件中,一百名全副武装的格里夸人骑着马成功地驱散了围攻迪萨孔的索托人。传教士以及这支携带枪支的盟

军的名声，由于这次事件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在迪萨孔被击退之后，赫拉科伊纳人和塔翁人在返回瓦尔河南部重新定居前，还侵扰了茨瓦纳人。然而，在塞贝通强有力的领导下，一小队福肯人在卡拉哈里沙漠和林波波河之间通过北部茨瓦纳继续向北侵袭。塞贝通的这小支袭击者队伍被称为“科洛洛人”，他们克服了诸多困难，在征服和定居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洛兹王国之前，曾差点在沙漠中全军覆没(参见第十七章)。

姆兹利卡兹和恩德贝勒王国的建立

高原上唯一的恩古尼大国是恩德贝勒王国。该国的恩古尼人起源于库马洛部落，该部落曾是恩德万德韦人的同盟者。随着恩德万德韦人被战败，库马洛只是名义上处在恰卡的统治下。库马洛酋长姆兹利卡兹(Mzilikazi)并不屈服于祖鲁国王，率领其核心战团于1822年到达内陆高原地区。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定居于马里科河(Marico)盆地附近之前，曾不断侵掠索托北部和中部地区。索托人称他们是“马塔贝莱人”(Matabele)，而库马洛人自己则用阿曼德贝勒(Amandebele)或者恩德贝勒的名字。

姆兹利卡兹采用祖鲁的军团体系、战斗方法，并吸纳进大量的索托-茨瓦纳的男女，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国。许多军团村落被建立起来，主要用来维持该地区秩序，从村落征收贡奉以及照管国王的牧群。附近的独立国家也要向王国提供贡品，如果没有支付，它们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恩德贝勒王国中心地区相对平静和安宁；但是为了寻找更多贡奉，王国的侵袭范围远至茨瓦纳并到达了瓦尔河南岸的索托南部地区。

1837年，恩德贝勒人被逐出高原地区，这是南方对他们发动一系列侵略的最高潮。其中，有一些是丁冈的祖鲁军团长途奔袭。但是，最后将他们从高原上驱逐出去的是骑在马背上的、携带着枪支的格里夸人、罗隆人和布尔人。在1838—1840年间，恩德贝勒人撤到林波波河北部，在那里，他们战胜了早已因恩戈尼人的侵袭而衰弱不堪的绍纳人

的罗兹韦王国。在那里，姆兹利卡兹吸收绍纳属民，用索托-茨瓦纳高原上的那种方式重新建立了王国。

264

开普殖民地的英国人

1795 年，英国政府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开普殖民地的控制权。尽管英国人在 1803 年将它交给了荷兰政府，但在 1806 年又重新夺回这块殖民地，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控制权。像在他们之前的荷兰人一样，英国人要为他们去往印度的船只提供一个供应站和一个海军基地，以便保护船只免受欧洲竞争对手的攻击。英国人试图使开普殖民地变成一个可靠的、有利可图的地方，为此，他们在该地进行了许多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些变革的最终结果就是促使大量说荷兰语的殖民者，即布尔人，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向北迁徙，离开这块殖民地。

经济扩张

英国人统治的头几年，似乎给布尔人带来了很多好处。这时，开普殖民地西部的酒葡萄农(Wine farmers)进入英国市场更自由。驻扎在开普敦的大量英国守备部队以及港口中越来越多的英国船只，既为当



恩德贝勒城镇，19 世纪 90 年代的牛圈。

地生产小麦的农民，也为内陆的迁徙布尔人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市场。美利奴(Merino)绵羊的养殖规模有了扩大，人们主要是为了获得羊毛而不是羊肉；内陆的迁徙布尔人中的猎人也从英国市场对非洲象牙不断上升的需求中获利不少。

劳动力

尽管1807年奴隶贸易的废止在一开始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但英国人很快就声明会加强对殖民地“自由”劳动力的管辖。根据1809年的所谓《霍屯督法案》(*Hottentot Code*)，殖民地所有科伊桑人和“自由黑人”必须携带“通行证”，通行证上标明有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的雇主是谁。任何一个没有通行证的人都可能会签约给需要劳动力的、距离最近的白人殖民者。与此同时，雇主得给工人核发书面的合同。工人也有权使用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可以因为其雇主破坏合同或者使用暴力而向其“主人”发起挑战。1812年，许多法官游历了殖民地的农村地区，去旁听大量服务人员反对其雇主的案子。虽然此类案件中能定罪的很少，但巡回法庭还是在边境布尔人中间引起了愤怒，因为之前布尔人一直可以在他们觉得需要的时候，自由地使用和虐待工人。

265

当这些变革发生时，许多基督教传教士离开欧洲来到殖民地“异教徒土著人”中间工作。传教士很快就变成开普殖民地穷人和被压迫的科伊桑人权利的捍卫者。这些传教士在法庭上为他们谋取利益，鼓励他们在宣教站发展独立的耕作——许多时候都会激怒当地的布尔人雇主。

传教士的活动和写作，对英国开普殖民地当局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影响。1828年，政府颁布第50法令，取消了1809年《霍屯督法案》的限制。它承认科伊桑人和“有色”工人享有基本权利，并享有在殖民地范围内移动、选择雇主和成为独立农民的自由。第50法令和1834年废除奴隶制度的法令就是建立在这一信念基础上的：从长远来看，一个需要支付工资的自由劳动力比一个受限制的或者受奴役的劳动力

更有效率、更容易使得劳动力得到满足。东部边境地区的布尔人很痛恨这两个法令。贫困的布尔人负担不起高工资以吸引工人到他们的农场中来。富有的、拥有奴隶的布尔人则抱怨政府为他们的“奴隶”支付的赔偿金太少。因此,对边境的布尔人来说,英国人在开普殖民地的劳动力政策是他们考虑离开开普殖民地向北移民的一个强烈的诱因。

东开普边境及与科萨人的冲突

英国人在东部开普殖民地边境上最重要的革新是在开普敦设立一支常备军,一旦有需要,它就能迅速地被召集起来。一方面,这使得边境的迁徙布尔人处在政府更严格的控制之下;但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让白人殖民者在与科萨人由来已久的为占有祖尔草原的斗争中增加了自身的优势。

头三场开普-科萨或“边境”战争均是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之间的侵袭和反侵袭斗争。布尔人虽有枪支和马匹,但也有其弱点,即志愿“突击队”的临时性质。在战争期间,追踪敌人和保护农场、家庭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英国职业部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英国也广泛运用当地的志愿军,但是他们这时在开普有守备部队的支持,而且如果有必要,还有海外增援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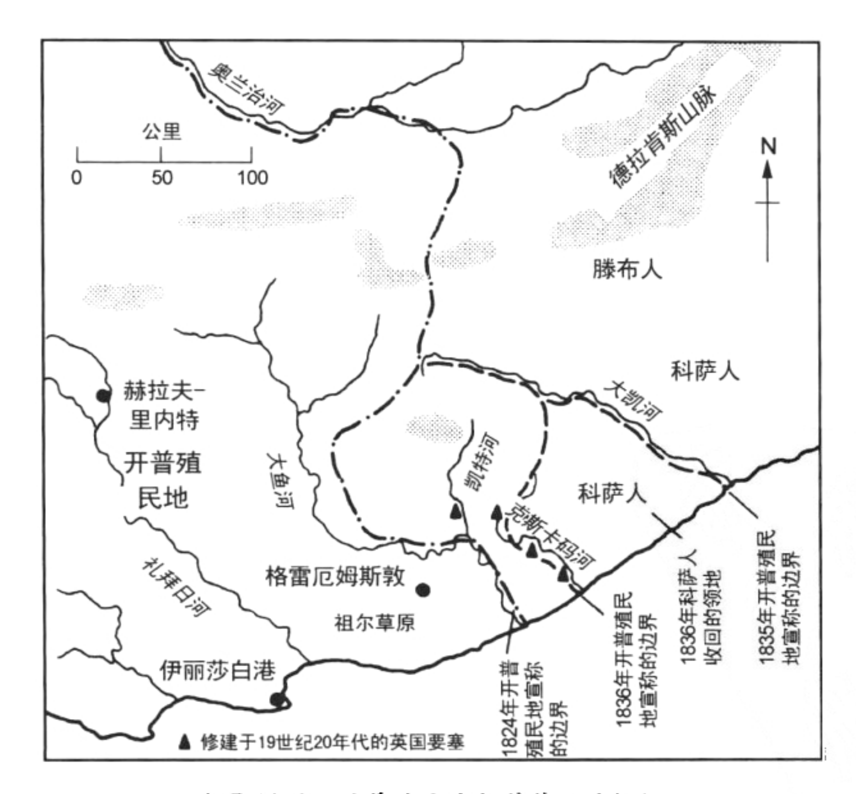
在与科萨人的第一次冲突中,英国人采用了总体战的思想,这种思想更加类似于恰卡的祖鲁王国的想法,完全不同于科萨人的想法。在1811—1812 年的“第四次战争”中,英国人残酷地将科萨人清除出祖尔草原,并将他们驱赶到大鱼河以东地区。在过去人口稠密的环境中,大鱼河以东的科萨人很快爆发了内战。英国人趁机介入,而后就演变为“第五次战争”(1818—1819 年)。尽管科萨人大胆地进入祖尔草原,但英国人最终将他们击退至更远的地方,甚至越过了凯斯卡马(Keiskama)。

266

英国人决心保护殖民地远离任何未来的“侵略”,他们试图在大鱼河和凯斯卡马之间的“空旷地带”树立一个屏障,修建大量军事要塞来监视这个地区。当时,为了给该地区北部增加一个“人工屏障”,英国人允许一群科伊桑人和“有色人种”(混种人)农民在卡特河(Kat)流域定



开普-科萨战争中的一幕：一个科萨村庄的毁灭，1851年。



地图 18.2　开普殖民地与科萨人的抵抗。

267 居。但是英国人因此断送了获得经济成功的机会，因为该地区是一个殖民地失业“有色人种”汇集的地方。而且，这个地区总体上缺乏土地，“旷地”的政策注定不能持续太久。科萨人很快又返回这个地区，科萨人与擅自占有土地的迁徙布尔人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冲突，这些迁徙布尔人根本就不顾英国人的限制。在后来的“第六次战争”(1834—1835 年)中，英国人向东推进得更远、并吞并了科萨人在大凯河西部的其他地区。

这次吞并结果就是，东开普的布尔人期望有一整块愿意接受白人殖民者的新地区。但是，英国政府令他们失望了。英国政府认为新地区的安全成本过大，难以为继。令边境的布尔人和英国土地投机商痛恨的是，凯斯卡马和大凯河之间的领土又重新交还给了科萨人。这一新地区的“丧失”使许多布尔人决心加入日益增多的迁徙者行列。此时，很多布尔人收拾起财产，从殖民地向北进行长途迁徙。

布尔人的长途迁徙和非洲人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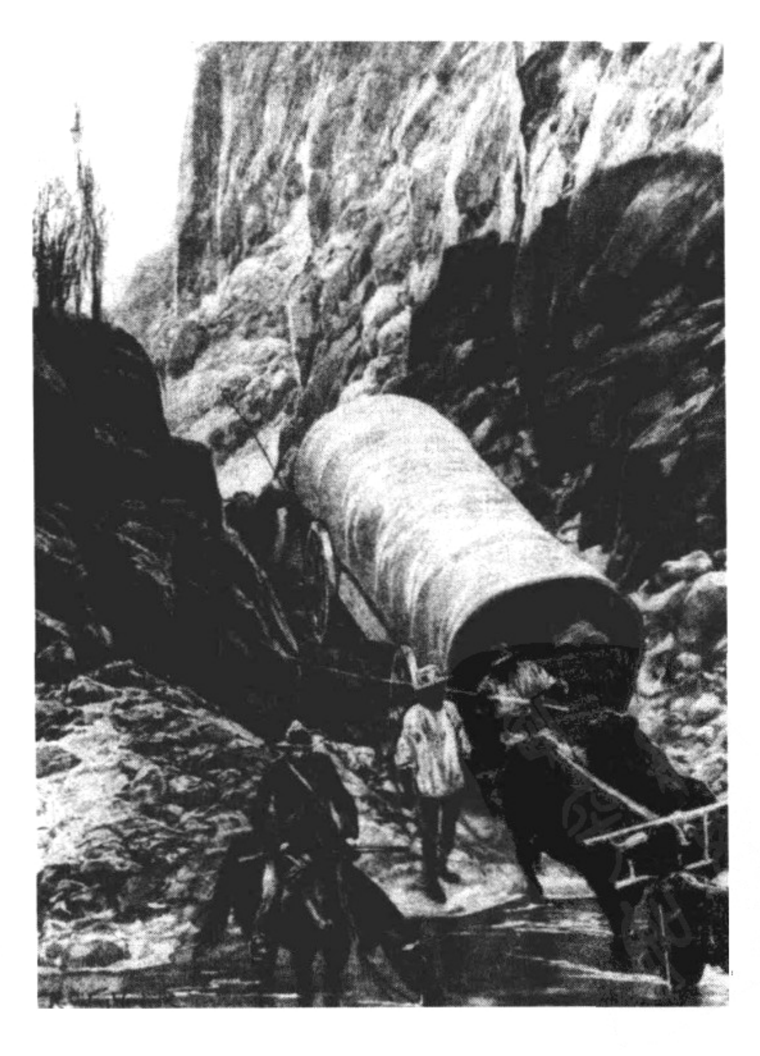
布尔人的长途迁徙

19 世纪 30 年代末，数千个布尔家庭及其侍从从东开普向北出发，踏上南部高原地区并远离了开普殖民地。现代阿非利堪(Afrikaner)历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将这一运动美其名曰“大迁徙”：这是阿非利堪人文化的起点，也是布尔人民族主义最早的表达形式。事实上，它只是一系列相对较小的、各自独立的长途迁徙，贫穷家庭聚集在富有族长的保护和领导之下而已。几乎没有总的、统一的目的与方向。而且各个迁徙小组领导人之间有相当多的对抗。这可以在第一代迁徙者在高原上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之间缺乏团结和合作上体现出来。可以将这些共和国联合在一起的地方，是他们要摆脱英国政府控制、获得自由的愿望以及可以获得更大片的土地。

19 世纪 30、40 年代，大部分“移民先驱”(Voortrekkers，字面上的含义是“打头阵的迁徙者”)来自东开普地区。他们在那里曾严重缺乏土地。科萨人有效地阻止了布尔人向东迁移，且英国人已经不情愿或

无能力进一步扩展凯斯卡马之外的殖民地。另外，科萨人1819年和1834年进入祖尔草原已经增加了边境地区白人定居区的持续不稳定。英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限制政策更是将这种不安全推到了顶点，且他们还严苛地征收各种租金。旧有农田贷款制度被土地私有制所替代，这种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变为私人财产，而贫穷的布尔人负担不起。当地选出的布尔官员被来自开普殖民地的英国委派的地方行政官所替代。教育机构和法院要使用英语，而且布尔雇主发现，他们过去暴力对待侍从也正在受到干涉。第50法令的"自由劳动力"政策和奴隶制的废除，极大地增加了布尔人，特别是东部边境地区布尔人的不满。英国人不

268



迁徙中的布尔人：R. 卡顿·伍德维尔(R. Caton Woodville)的一副绘画。

能给他们提供凯斯卡马东部更远的科萨人土地,让许多布尔人丧失了最后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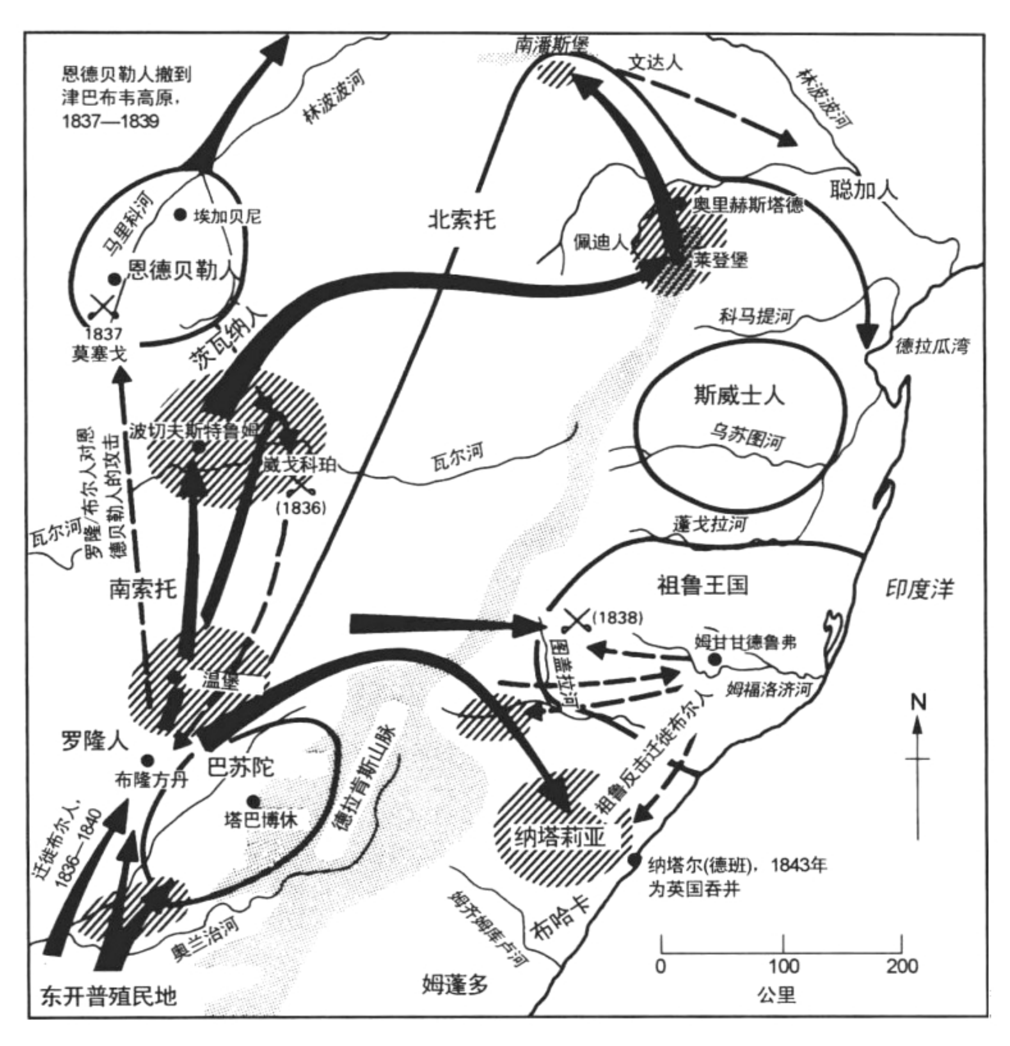
布尔人长途迁徙的影响和非洲人的抵制

19 世纪 30、40 年代,布尔人的长途迁徙将白人永久性殖民地有条不紊地扩展到南部非洲的内陆。许多历史地图和一些南非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认为,这意味着移民先驱的“共和国”在许多年里一直控制着奥兰治自由邦和今天德兰士瓦的所有省份。

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长途迁徙的方向和“共和国”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人定居方式和抵抗程度所决定。最初,布尔人的定居地集中在由于近代姆菲卡尼/迪法盖的巨变造成暂时性人口减少的地区,定居地的进一步扩张很是缓慢,且主要取决于非洲人的合作或抵抗的程度和性质。

269 移民先驱最初以瓦尔河中游地区人口相对稀少的南部高原为定居目标。在塔巴恩楚(Taba 'Nchu),他们受到了罗隆人的友好对待,罗隆人将他们看作有用的同盟者。罗隆人希望利用布尔人有枪、有马的军事优势来反抗恩德贝勒人,恩德贝勒人在那时经常将罗隆人从莫洛波河(Molopo)上游盆地其传统的“家园”地区驱逐出去。因此在 1837 年,罗隆人得以和布尔人、格里夸人一起攻击恩德贝勒人。就像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样,恩德贝勒人为了能在更北部的津巴布韦平原上进行重组,最后被迫放弃了这个地区。之后,布尔人声称他们对前恩德贝勒王国具有统治权,并在瓦尔河中游的北部和南部地区建立起主要的定居区。返回之前领土的罗隆人和茨瓦纳人发现他们现在要承受布尔人频繁的劳役和赋税要求。

在更北部和东部地区,一些小支移民先驱队伍在遥远的北部南潘斯堡(Soutpansberg)、奥里赫斯塔德(Ohrigstad)和莱登堡(Lydenburg)建立了小“共和国”。但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狩猎和贸易基地,布尔人实际的定居地范围还是受到斯威士人、佩迪人和文达人抵制力量的严重制约。这些抵抗力量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最终将布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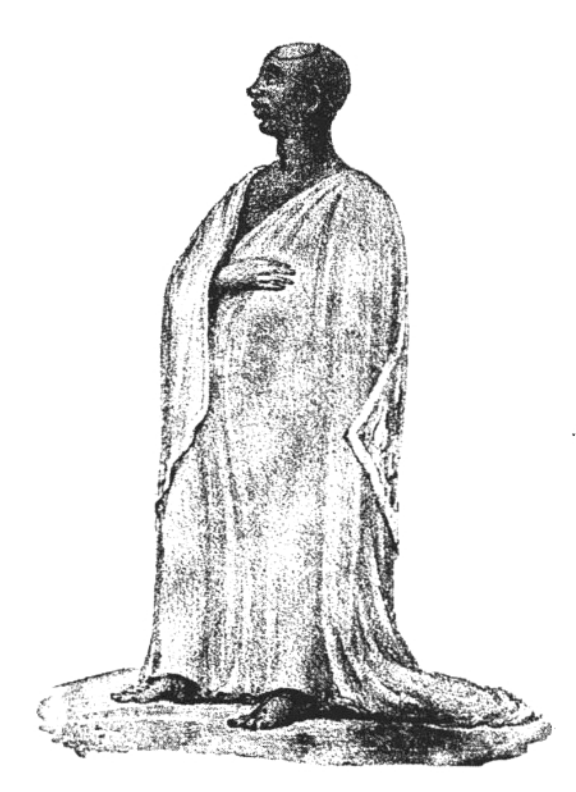


地图 18.3　布尔人的迁徙与非洲人的抵抗，1836—1840年。

完全驱逐出了南潘斯堡。此时，佩迪人正在向开普殖民地派遣移民工人，为未来与布尔人的冲突储备火器。 270

与此同时，最引人注目的冲突发生在低地草原地区的东南部。进入这一水量充沛、富饶的草地是许多早期移民先驱的首要目标。他们希望定居于图盖拉河南部这个人口稀少的区域。但是，他们首先要与祖鲁王国达成某种协议。

祖鲁国王丁冈借助于速度和残忍的策略试图除去这一新的潜在威胁。一开始，丁冈表面上赞同达成协议，这减轻了布尔人的怀疑，然后他



丁冈的画像，恰卡的兄弟，也是谋杀恰卡的凶手，同时也是祖鲁人的国王(1828—1840 年在位)。

突然发动了祖鲁军团。这些早期的西南部的移民先驱在 1838 年的头几个月里被掠杀殆尽。然而，在这一年年末，布尔人重新组建，并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证明了其武器的优越性。由于有防卫武器的保护(被称为车阵[laager])，500 个拿着枪支的布尔人成功地击退了祖鲁军队潮水般的大规模进攻。据说，3 000 个被杀的祖鲁人的鲜血染红了恩卡姆河(Ncome)河水。然而，即使是在这次引人注目的胜利之后，布尔人仍不敢占据祖鲁王国人口密集的地区，他们的"纳塔莉亚(Natalia)共和国"建在图盖拉河的南部地区。

1840 年，祖鲁王国经历了一场内战，丁冈在内战期间被杀。在其兄弟姆帕迪(Mpande，1840—1872 年在位)统治下，祖鲁王国恢复了元气，并且以牺牲斯威士人和其他独立的恩古尼人为代价，加强了其北部边界的防卫。他们有意避开与其南部白人近邻发生进一步的冲突。

1843 年，英国人兼并了迁徙者的纳塔尔"共和国"，主要是为了避免它落入欧洲竞争者手里。因为兼并，许多最初的移民先驱后退到高原地区，其中纳塔尔的很多土地都落入了英国土地投机商的手里。1848 年，英国人曾一度控制了南部高原地区，但是英国人觉得这一做法有点得不偿失。在桑德河(Sand River)协定和布隆方丹(Bloemfontein)协定中(分别签订于 1852 年和 1854 年)，英国人承认了瓦尔河和奥兰治河北岸的布尔人共和国的政治独立。

271

布尔人在高原地区的定居区还在以其邻居为代价继续扩张，这种

扩张的难度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在卡利登河的东南部高原地区，布尔人遭到强大的索托王国的猛烈抵制。19 世纪 40 年代，索托通过从开普殖民地买进枪支和马匹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索托人也成为熟练的骑手，“巴苏陀马”(Basuto pony)也成为一种带有南部非洲特征的马种。由于充分利用山脉地形，一些索托防御阵地是绝对攻不破的。然而，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一系列战争中，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人逐渐占据了低地地区，缩小了索托王国的领地规模。1868 年，莫舒舒被迫寻求英国人的合并以求自保。但是，索托王国中最具有生产力和价值的土地已经被布尔人夺取了。

1870 年的南部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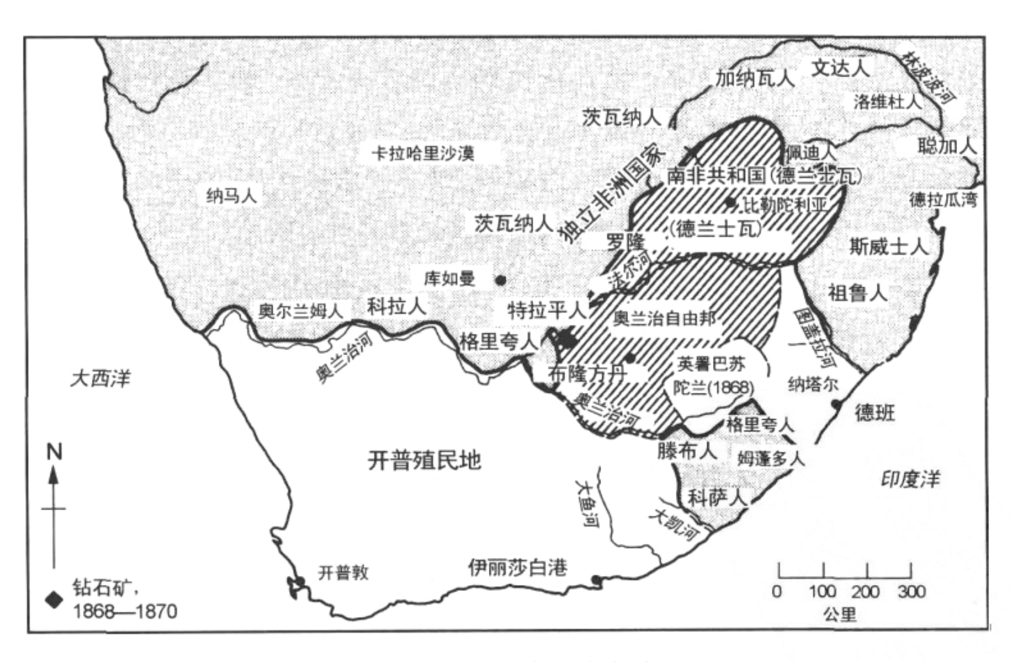
19 世纪 40、50 年代东开普爆发进一步战争之后，殖民者的权力范围扩张远至凯尔河(Kel)。科萨人的抵制已经显示，只是将非洲人驱赶出土地是徒劳无功的，还得在东开普给非洲人留出“保留地”。然而，大部分最好的土地还是卖给了白人殖民者，他们用这些土地来放牧美利奴绵羊。“保留地”对于维持西部科萨人的生存是不够的，许多家庭开始依赖从白人农场赚来的微薄工资。在纳塔尔，非洲人口数为 25 万，几乎是白人人口数量的 15 倍，但非洲人仅仅“被留给”15%的土地。同时，纳塔尔大部分的白人土地所有者都不居住在纳塔尔。实际上，非洲人以农民的身份占据着大部分土地，他们支付租金或将一部分收成上缴给官方的白人“地主”。在高原地区的布尔人共和国内，在白人农场讨生活的非洲人被允许养一些牲畜，种植一些属于自己的庄稼，但是作为回报，他们要向布尔地主提供无偿劳动。

无论是在共和国、殖民地或王国内，一直到 1870 年，南非内陆的大部分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仍然主要依赖于一种由畜牧业和小规模的农作物种植构成的自给自足的混合型经济。狩猎产品——毛皮、象牙和鸵鸟毛——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商品。这些出口商品主要用来交换枪支、弹药和奢侈品。开普沿海港口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和德班的英国商人从这种所谓的“内陆贸易”中发了大财。

1870 年,南部非洲的白人和黑人之间实现了某种政治平衡。早些年迁徙布尔人的迅速扩张已经结束。白人的定居地已经牢固地在大部分被姆菲卡尼/迪法盖削弱的地区上建立了起来,其他的非洲王国也已经恢复了实力,组建了比之前更为强大的军队。他们开始从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进口枪支,以便在未来抗击白人挑战的时候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内陆白人定居地的任何扩张,都将需要只有像英国这样的欧洲大国才能提供的军事资源。但是只要这种主要由非洲猎人自愿提供的狩猎贸易还主导着内陆的出口贸易,英国人就没有干涉的特别动机。

272

所有这一切都将随着南部非洲内陆储量巨大的宝矿的发现而发生改变:19 世纪 70 年代,奥兰治河的北岸被发现有钻石;19 世纪 80 年代,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的中心地区被发现有黄金。这些矿藏的发现所带来的影响改变了南部非洲历史的进程,正如我们将在第二十二章所讨论的那样。



地图 18.4 1870 年的南部非洲。

第十九章　19 世纪的北非与东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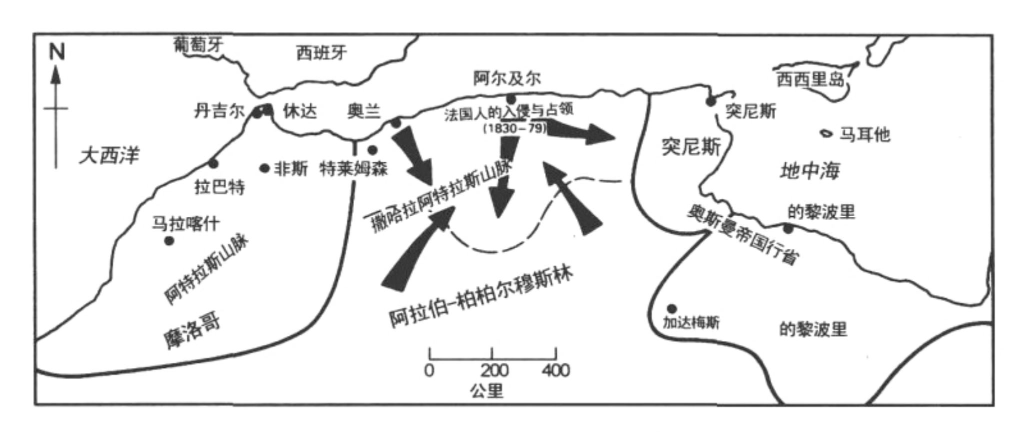
法国在北非的侵略与阿尔及利亚的抵抗

273

在 19 世纪早期，除了西部的摩洛哥王国，整个北非沿海地区在名义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北非省份的土耳其摄政者并没有直接按照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的意旨来统治领地。甚至对领地本身来说，其统治权也没有扩展出狭长的沿海地带。阿尔及利亚在这一方面是个典型。在阿尔及利亚，统治者，即总督(dey)，是从沿海和驻防城镇中的土耳其官员阶层中抽选出来的。在城镇之外，柏柏尔人依然维持着事实上的独立，特别是在山区。总督不时介入充满敌意的柏柏尔人团体间的争端中，但是统治者在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1830 年法国人占领了沿海城镇阿尔及尔、奥兰(Oran)，并将总督流放，从而也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名义上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统治者间的关系曾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紧张。阿尔及利亚自 18 世纪就已经开始向法国出口谷物和橄榄油。1789 年，阿尔及利亚总督给侵略埃及的法国拿破仑军队供应过粮食。法国对埃及的入侵也体现出埃及的独立性，且这种独立性为奥斯曼帝国其他省



地图 19.1　1800—1880 年的阿尔及利亚与马格里布地区。

274 份所承认。然而，后来的法国政府拒绝支付粮债。粮债纠纷和其他事务导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在 1827 年中断了外交联系。

1830 年法国出兵的理由是结束阿尔及尔海盗船的海盗行为。事实上，海盗船的海盗行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比较猖獗，但此时对地中海上受到军事保护的欧洲船只已不再是个严重威胁。实际上，法国对阿尔及尔的侵略与占领，是为了掀起民族热情以支持腐败的、不受欢迎的法国君主制。后来的法国政府将这块领土作为供白人居住的富饶殖民地，以及法国工厂产品的一个市场。然而从一开始，法国就遭遇到内陆阿拉伯-柏柏尔穆斯林的强烈抵抗。

阿卜杜勒·卡迪尔和阿尔及利亚的抵抗

法国侵略阿尔及利亚所引起的这场战争在 19 世纪非洲抵抗欧洲殖民主义征服者的战争中最为激烈、最为持久。游牧、半游牧部族和阿尔及利亚内陆的穆斯林兄弟情谊由于内部的竞争和经常性的侵袭与战争而荡然无存。但是，他们至少在经济生活、阿拉伯语言、伊斯兰宗教和文化价值上有着共同之处。因此，当他们的整个生活面临外部威胁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团结，这种潜在团结的种子总是存在的。1830 年法国的入侵正是这种威胁。虽然外国统治者在沿海城镇统治了数个世纪，但土耳其人至少还是由穆斯林统治的，且他们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还遵从伊斯兰法和伊斯兰传统。另一方面，法国所造成的威胁不但

是征服和外国统治，还意味着完全外来的宗教、文化和法律体系的输入。因此，对法国的抵抗采用了反对异教徒（“不信仰宗教者”）的圣战形式。反抗斗争几乎持续了 5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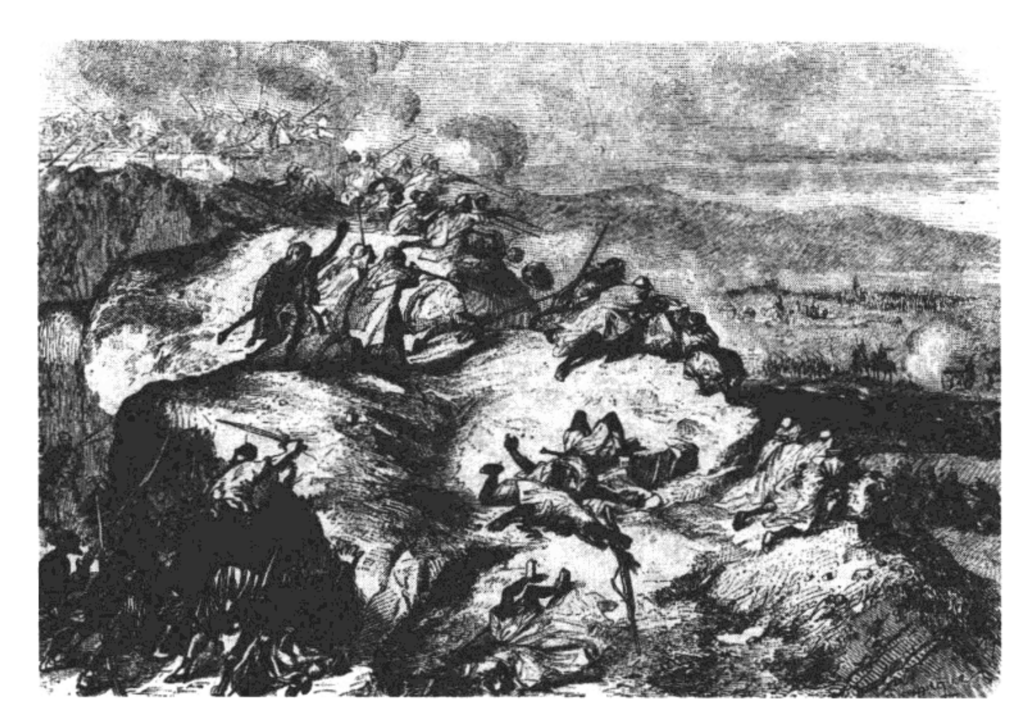
阿尔及利亚人的早期抵抗是由阿卜杜勒·卡迪尔（Abd al-Qadir，“al-Qadir”在阿拉伯语中是“伟大”的意思）组织和领导的。阿卜杜勒·卡迪尔是来自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的一个天才式的、富有活力的隐士（即“holy man”，圣人）。与撒哈拉南部的圣战士同道一样，阿卜杜勒·卡迪尔利用圣战之名将阿拉伯-柏柏尔部族和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兄弟统一为一个单一的、强有力的伊斯兰国家。他将国家划分为很多行政区，每个区的首领对自己所在区的防卫负责，从而克服了地方竞争问题。行政总部建有大量的防御工事，并被用来作为对抗法国军团和城市的基地。虽然枪炮是从欧洲进口的，但是也有很多是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制作和维修的。国家中部地区由阿卜杜勒·卡迪尔自己直接统治。作为“精神领袖”（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他定期视察各行政区，协调军事行动，并严格根据《古兰经》教规来匡扶正义。

最后，以数万法国人生命为代价，法国人取得了胜利，而阿尔及利亚人可能死亡了数十万。至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占领军数量达到 10 万多人。他们采取焦土政策，杀死牲畜，毁坏庄稼并屠杀村民。他们利用当地的矛盾，对那些反对阿卜杜勒·卡迪尔的人给予支持。卡迪尔本人最终也在 1847 年被抓获并遭到流放。但是，卡迪尔在其所领导的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勇气，激励着在他之后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持久抵抗。卡比利亚（Kabylie）山区直到 1857 年才被法国人所占领，而在 19 世纪 70 年代，该地区的反抗始终不断。法国人直到 1879 年才最终认为他们已经通过战争将阿尔及利亚人征服了，但是，法国人从没有征服阿尔及利亚人由于被占领而产生的愤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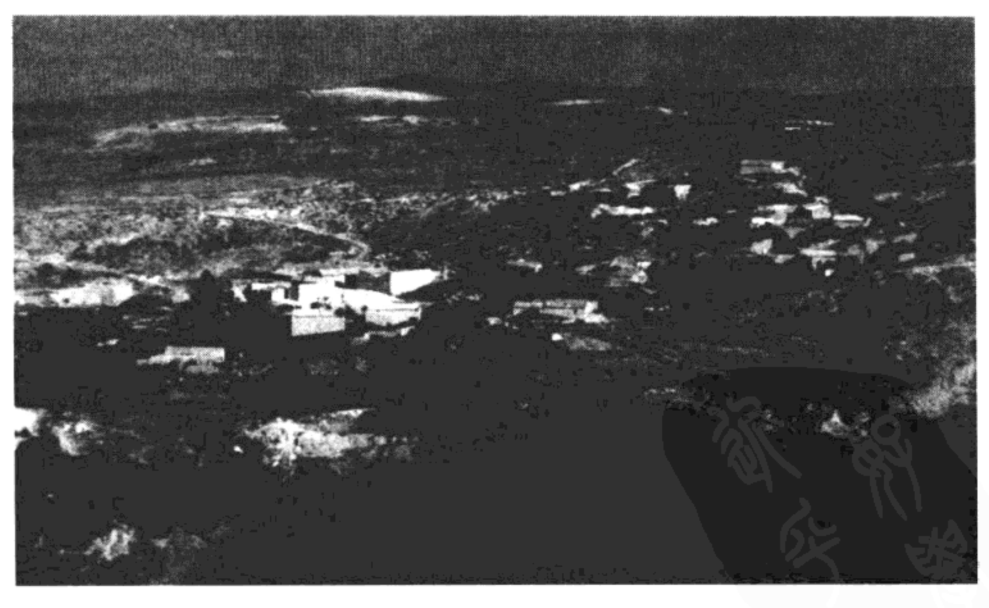
275

法国人的占领

随着法国人的征服浪潮，白人定居者也来到这里，他们不仅来自法国，有的也来自西班牙和地中海岛屿上贫穷的农村地区的白人。随着



阿尔及利亚反抗战争(1830—1839年)中的一幕。



现代阿尔及利亚：农庄、蔬菜园与葡萄园

276 阿拉伯-柏柏尔农民和牧民的土地被剥夺，白人定居者开始接手橄榄种

植园、沿海山区的葡萄园和城镇周围平原上的小麦地。当军事当局没有地可分配的时候，欧洲移民就用很少的钱从贫农那里买来土地。1871年，在阿尔及利亚被称为colons的欧洲殖民者人数达到13万，到19世纪末，达到百万之众，占到总人口数的13%。在19世纪最后的十年内，阿尔及利亚绝大部分可耕土地落入了欧洲土人的手中。这些欧洲地主中的绝大部分住在城镇里。土地由无地的阿拉伯-柏柏尔农民来耕作，这些农民的报酬很低且税赋很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其活动自由受到了限制，很大程度上与19世纪早期开普殖民地对科伊桑人的管理模式相似。法国法律凌驾在伊斯兰教规之上，这也增加了殖民地民众的羞辱感。在法国，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也被法国殖民当局认为是外来人和低等人。法国当局的傲慢给原本的伤害又平添了侮辱。

埃及与苏丹人对马赫迪圣战的反应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1805—1849年

1801年，法国从埃及撤离。在其后的混乱中，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人脱颖而出，掌握了埃及大权。他将埃及带出了虚弱和腐败的深渊，而正是这种虚弱和腐败导致了埃及在18世纪的衰落。仅在20年的时间内，穆罕默德·阿里就将埃及变为奥斯曼帝国最强大的省份，甚至能挑战奥斯曼帝国苏丹本人的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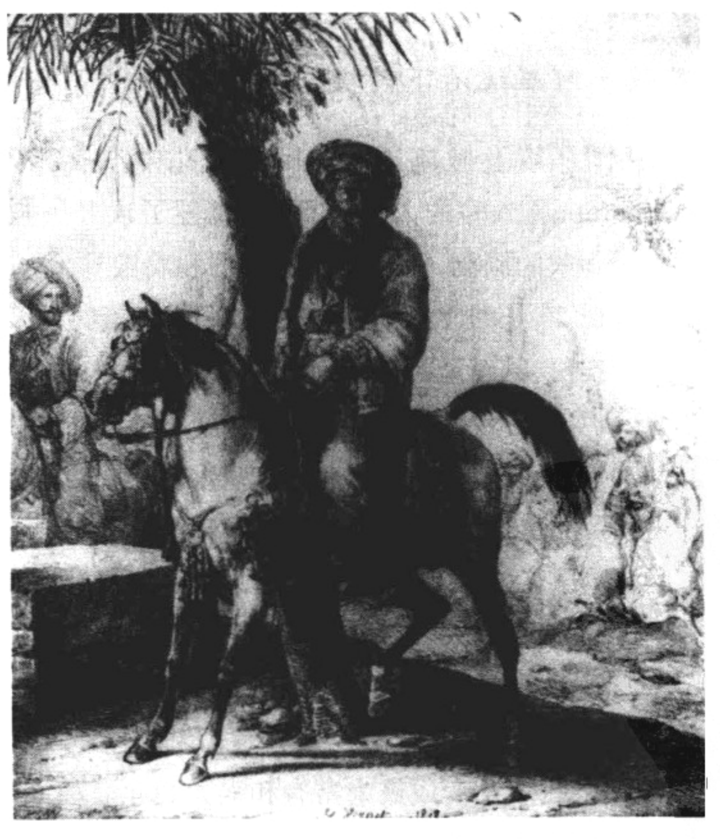
穆罕默德·阿里是今天希腊东北部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人。他随阿尔巴尼亚人分队来到埃及，这支分队也是在1801年将法国赶出埃及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组成部分。穆罕默德·阿里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支持，很快就成为开罗的主人。1805年，奥斯曼帝国苏丹承认他为埃及帕夏(pasha，即总督[viceroy])。

穆罕默德·阿里开始的目标，与他之前的众多外来统治者一样，就是建立自己的王朝。他只是想让自己及其后的家族世袭埃及的帕夏领地(pashalic)。他要将埃及变成最为富有和强大的北非独立国家，只是还沿用奥斯曼帝国的名义，也要是没有内忧外患的安全国家。穆罕默

德·阿里承认,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实行彻底的改革,特别是废除腐败的马穆路克的农税制度。

在实行改革时,穆罕默德·阿里热衷于欧洲人的建议与技术。他建立了薪金制的行政机构和一支近代化的职业军队,这两者都是按照欧洲而非亚洲或非洲的模式组建起来的。因为这些改革,欧洲历史学家常常称他为"维新派"(moderniser),而事实上,埃及人将他视为"近代埃及之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穆罕默德·阿里(所有的)改革与近代化措施,都不是为了改善整个埃及民众的生活。19 世纪 20 年代埃及的人口为 250 万,其中 90%都是农民,他们被穆罕默德·阿里称为"野蛮人"。埃及农民一直遭到严重的剥削,尤其是在埃及的"辉煌"时期。但是,就是按照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农民所遭受的剥削也是苛刻的。农民的税赋和劳役最重,且被征入伍。19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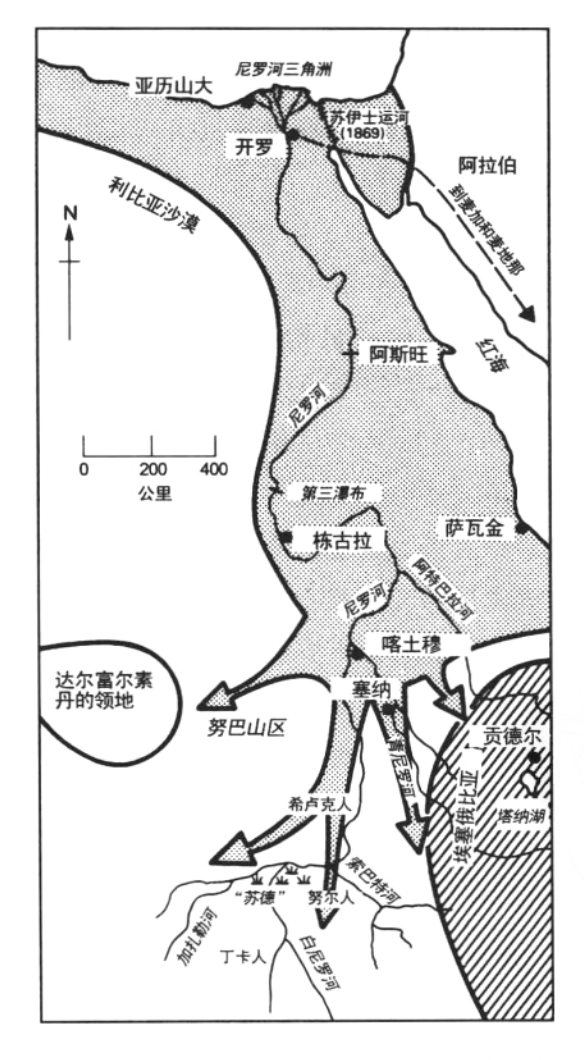


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9 年的埃及帕夏。

世纪 20 年代农民爆发了一系列起义，但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穆罕默德·阿里的权力基础为军队：首先是将他推向权力巅峰的阿尔巴尼亚兵，其次是苏丹奴隶兵，最后是埃及农民兵。数个世纪以来，埃及军队一直存在分封的税额，并由马穆路克的大公（beys，即军队指挥者）征集和控制。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从大量的土地（“包税地”或是伊克塔）中抽取税收。伊克塔成为世袭，且埃及中央政府对军队和地区的税收失去控制后，这个制度很容易出现腐败和滥用。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了一支发有薪金的职业军队，兵种有骑兵、炮兵和步兵，军队

278



地图 19.2　1805—1880 年的埃及帝国的扩张。

纪律严明,并由土耳其和欧洲军官来指挥。穆罕默德·阿里也很残酷地清除了其主要对手马穆路克人。1811 年,穆罕默德·阿里组织了一次对几百名马穆路克大公的屠杀,剩下的大公跑到苏丹人边界外的栋古拉寻求避难。

穆罕默德·阿里接手了马穆路克人的地产。他废除了包税地制度,税收直接交给国家。他做了一次新的土地调查,这是埃及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税收也因此得以重估,并也提高了征收的效率。他也组建了一个经过改革、发有薪金的行政机构,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同时,他还进行了农业改革。与其前任者一样,埃及的农业改革都是为了增加国家税收。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土地灌溉面积扩大了,灌溉工作都是强迫农民去做的。可耕地变得更多,且从苏丹引进的长绒棉很快成为埃及的主要经济作物。上交的税收主要是小麦和棉花,这些货物出口到欧洲,给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279

这里,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 19 世纪 20 年代后埃及对苏丹的侵略与占领。这种侵略与占领的最初动机主要是增加埃及军队中苏丹奴隶的供应。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经历了从红海到印度洋贸易的复兴,而红海到印度洋贸易自从南大西洋路线开通以来就备受影响。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重新在红海地区确立了奥斯曼的权力,并击败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瓦希达(Wahhida)阿拉伯部族,这个部族在此之前占领了圣城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圣城再次向所有穆斯林朝圣者打开了大门,这也有利于开罗的商人,像早些时候一样,他们可以做很多朝圣者的生意。穆罕默德·阿里于 1841 年实现了个人的最大抱负,即奥斯曼苏丹承认埃及帕夏领地由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来世袭。

1882 年前欧洲在埃及的势力与影响的增长

在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欧洲人在埃及的利益不断增加。欧洲顾问、军官和官僚都被雇佣过来以帮助埃及实现“近代化”。欧洲商人在其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埃及活动,对穆罕默德·阿里



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在修建运河前，埃及政府疏通了一条自法老时代开始，有着 3 000 年历史的运河，并重新蓄水。这条运河连接着尼罗河和红海，这样就可以为劳工提供新鲜水源。

施加压力，并于 1838 年促成穆罕默德·阿里降低埃及对外国商人的限制。法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对苏丹不断扩大的象牙贸易尤其感兴趣。英国人开始将埃及和红海作为其到印度殖民地的一条较短的“跨陆”替代路线。其后，在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在连接地中海亚历山大港到开罗和红海的苏伊士港的铁路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法国工程师开始在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地区的一条运河上工作。 280

穆罕默德·阿里之后有两个短暂的统治阶段，在此期间，法国和英国的影响进一步增加。1863 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伊斯玛依(Isma'il)继承了帕夏领地，并很快就将其称号提升到赫迪夫(khedive，古波斯王的称号，意思是“国王”)。这一时期埃及国家财政较为充足，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内战(1861—1865 年)所造成的美洲棉花短缺而带来的埃及棉花出口的激增。正是在此基础上，伊斯玛依将财力投入到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

尼罗河上游的铁路扩建,并提升了军队的战斗能力,将埃及帝国拓展到苏丹。但是,随着 19 世纪 60 年代棉花贸易的减少,埃及对欧洲的债务开始成为一个新的问题。随着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越来越多的埃及贸易由欧洲的船运主导。苏伊士运河是由法国和埃及共同投资的,其中埃及政府支付了 1 900 万英镑投资总额中的四分之三。由于埃及财政在 19 世纪 70 年代透支过度,英国乘机于 1875 年只用了 400 万英镑就买走了埃及在运河上的股份,而这 400 万英镑只是其真实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一行为确保了英国到印度的航线。与此同时,英国也开始致力于其在埃及投资的安全保护。

1876 年,伊斯玛依无力偿还外债,被迫宣布国家破产。英法为了保护它们在埃及的重大经济利益,于 1879 年用武力废除了伊斯玛依,扶植其子陶非克(Tawfiq)作为赫迪夫傀儡。为了保证埃及偿欧洲银行债务,英法正式建立了对埃及财政的"双重管治"(Dual Control),这一行动也让人想起 20 世纪后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的政策。

英法的这一做法激起了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热情,他们既反对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统治集团,也反对这种新式的欧洲干预。在一位本

地农民之子艾哈迈德·乌拉比(Ahmad Urabi，有时也被称为奥拉比帕夏)上校的领导下，这些民族主义者及其在军队里的支持者迫使陶菲克任命他们担任政府的主要职位。1881 年，乌拉比成为了战争部长，281 穆罕默德·巴鲁迪(Mahmud al-Barudi)成为总理。乌拉比的"民族党"(National Party)在"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下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英法于 1881 年 5 月，在先于这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建立前，派遣一支海军封锁了亚历山大港。法国在占领突尼斯之前也干了类似的勾当。乌拉比加强了亚历山大港的防卫，并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打死了 50 名欧洲人。1882 年 7 月，正当法国忙于平息突尼斯的抵抗时，英国侵入了埃及。四周后，英军在泰勒凯比尔[①]战役中击败了乌拉比军队，并占领了埃及，乌拉比被俘，并被流放到斯里兰卡(即英国统治的锡兰)。虽然英国现在只是在理论上以其所任命的帕夏统治着埃及，但是埃及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埃及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现代的民族国家的企图遭到了蓄意阻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首要的阻挠因素就是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内部的斗争推动了"瓜分"。法国非常愤恨英国 1882 年的单边行动及其在埃及的长期力量存在，而埃及成为英法两国在后来几十年内新的帝国主义竞争的烫手山芋。

苏丹马赫迪起义中的埃及

穆罕默德·阿里进军苏丹的主要目标是摧毁马穆路克的栋古拉根据地，并获得苏丹奴隶来加强埃及军队。1820—1821 年的入侵部队只有 4 000 人，但装备有进口的欧洲枪炮。他们占领了栋古拉并打散了马穆路克的残余力量。丰吉苏丹国多年来一直处在分裂状态，因此几乎没有组织什么有效的抵抗。埃及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占领了丰吉苏丹国的都城森纳尔(Sennar)，并在尼罗河两条支流的汇集处建立了喀土穆作为行政首都。在 19 世纪 20 年代，埃及的控制范围包括了从科

① 有时也翻译为特尔-埃尔-克伯。——译者注

尔多凡到喀土穆的西南部地区。

埃及军队在东部、西部地区抓捕奴隶，尤其是在科尔多凡南部地区的努巴山区。重新发现古埃及金矿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但象牙很快成为财富的另一个来源。在19世纪40年代，埃及人镇压了尼罗河上游地区希鲁克人的最后猛烈抵抗，得以进入苏丹南部大象较多的狩猎区。欧洲、埃及和苏丹的商人都以喀土穆为基地，但他们很快发现，比起贸易来说，抢劫更加有利可图，而且埃及政府对他们在尼罗河上游的活动并没有施加什么限制。因此，这些商人(主要是外国商人)的私人武装搜寻象牙和少量奴隶的历史，简直就是对南部苏丹人进行大屠杀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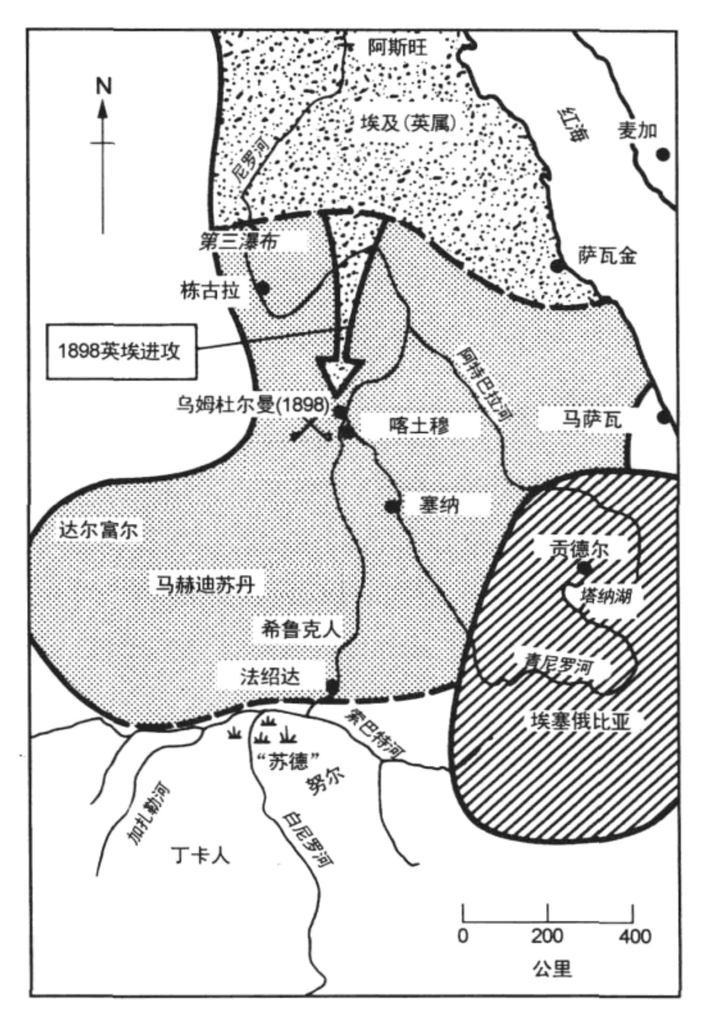
19世纪60、70年代，伊斯梅尔将埃及帝国进一步向南部扩张，在尼罗河上游的希鲁克与丁卡人之间建立了卫戍区。19世纪70年代，欧洲管理者塞缪尔·贝克尔(Samuel Baker)和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被雇佣过来，试图将湖区王国布尼奥罗、布干达纳入埃及的控制范围，但是没有成功。1874年，达尔富尔被占领。所有的这些军队活动激起了苏丹人对埃及的极大敌意，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本来就让埃及疲惫不堪的外债。

1881年，栋古拉的穆斯林圣徒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开路使者”(the Guided One)，是重塑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信仰纯洁性的救世主。他号召发起圣战以推动苏丹的反抗运动。19世纪70年代，戈登(Gordon)对奴隶贸易的打击引起了多个世代从此贸易中获利的穆斯林商人的愤恨，科尔多凡养牛游牧民希望摆脱腐朽的埃及管理机构压在他们身上的重税赋担，具有苏丹穆斯林兄弟情谊的圣徒们也被土耳其、埃及管理当局的腐败与不遵守伊斯兰教规所激怒。在管理机构中雇佣越来越多欧洲基督徒，凸显了埃及在苏丹的存在只是一种外部势力。

282

苏丹的马赫迪王国

马赫迪武装力量的勇敢与狂热，让他们在早期与装备更好的“近代



地图 19.3　1885—1898 年的马赫迪苏丹国。

化”的埃及镇压军队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些胜利。1885 年，他们占领了喀土穆，杀了戈登和城市中的埃及残余士兵和官员。五个月后，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去世了，这让其忠诚的支持者们错愕不已，在他们看来，马赫迪是永生的。不多久，马赫迪运动的团结就出现了裂痕，但这种局面为马赫迪的继承者哈里发·阿卜杜拉(khalifa' Abdallahi)强有力的统治所挽救。阿卜杜拉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制度，直接任命总督，且由他们严格按照《古兰经》教规来征收税赋。税赋要比前埃及收税官要求的轻得多，所以民众相当自愿地上缴税赋。马赫迪王国的统治范

283

围至少是今天苏丹共和国三分之二的面积，这片广阔的区域主要是靠骑着骆驼的信使来维持定期联系的。不幸的是，国家的绝大部分精力与财富都花在与近邻的战争上：在东南部与埃塞俄比亚，在北部与英国控制下的埃及。马赫迪王国最后被1898年庞大的英埃联军所摧毁。在乌姆杜尔曼(Omdurman)战役中，1.1万名苏丹人死于英国和埃及的机关枪和大炮下，而英埃联军仅仅只死亡了48人。苏丹的马赫迪王国成为英埃共管地，事实上也就是英国的殖民地。

埃塞俄比亚的统一

从18世纪开始，居住在贡德尔的皇帝不过是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游牧首领。“众王之王”(King of kings)意味着皇帝是众多独立“国王”的统治者。在“诸侯时代”(era of the preinces)，“联邦”的地区统治者会宣布其独立性。北部、西部的边界地区留给了当地贵族，以抵抗埃及的长期侵袭并保卫领地。

1854年，埃塞俄比亚的一名英国顾问揭示了当地贵族的权力与农民的地位：

> 一个村庄繁荣与否几乎完全取决于当地首领的贪婪或节制……税目品类繁多，但每个村庄过去征收的税目都有所不同。他们交出一部分给王公或其他大首领，并且有时定期用现金缴付税款；除了这些，他们必须给国王的土地耕作提供牛：他们的直接首领抽取每种谷物的五分之一，以户为基础供养一定量的士兵；首领为了生存有权处置牛只、绵羊、山羊、黄油、蜂蜜和其他必需品；首领在视察农户时，其臣民必须要好酒好肉好相待，且首领可以用多种借口向其臣民索要贡品：他正在发动一场战斗，或已经完成了什么战斗；他丢了一匹马，或娶了一位妻子；他的财产被火给烧了，或者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或者没有农户的援助，葬礼宴会就无法得以完成。
>
>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Correspond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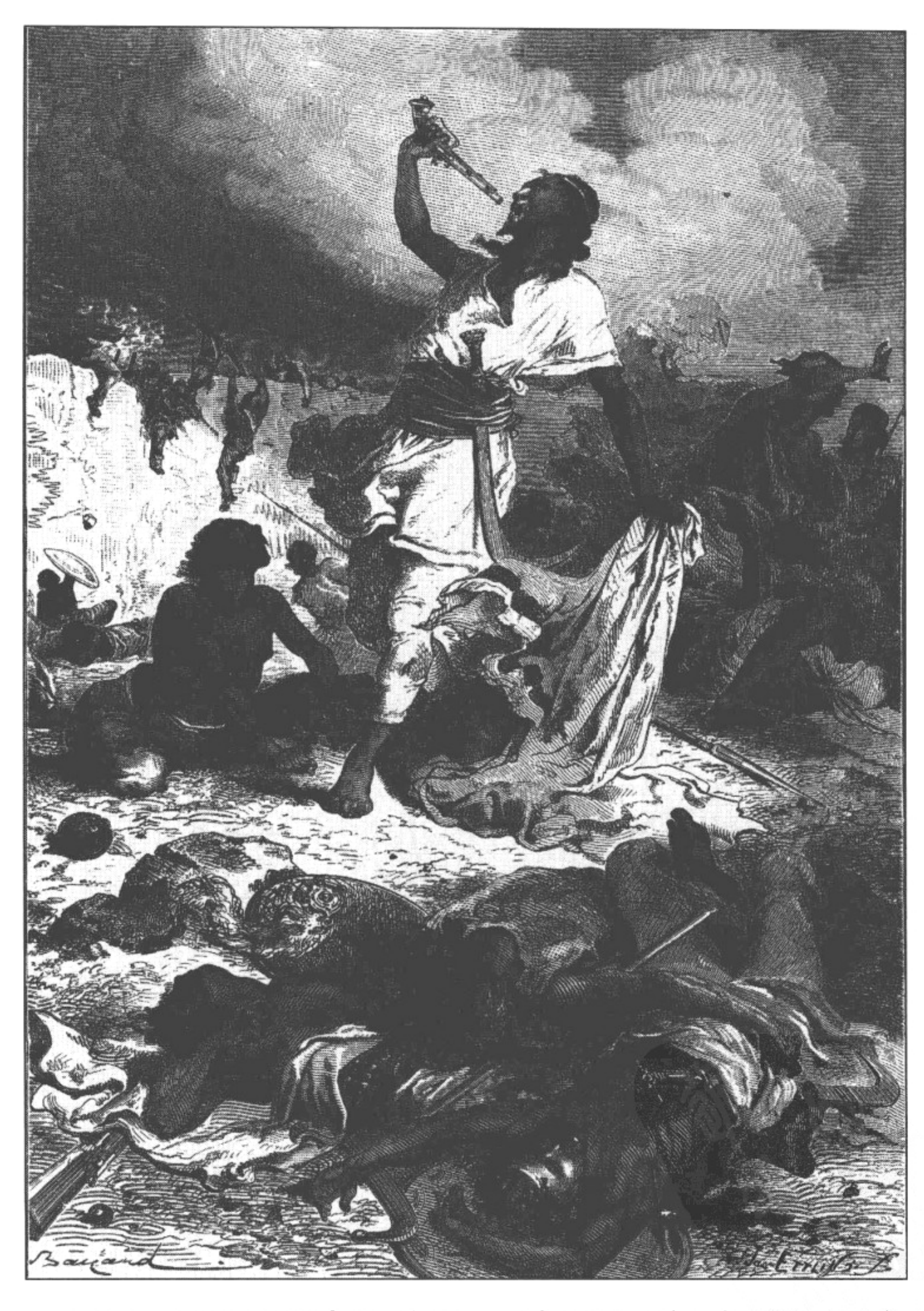
respecting Abyssinia, 1846 – 1968(London 1868),107. Plowden to Clarendon, 9 July 1854. 转引自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5, p. 70

提沃德罗斯二世的统治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西部省份夸拉(Qwara)的统治者,里基·卡萨·海卢(Lij Kassa Haylu)从其与埃及人的斗争经验中获得教训。他将其军队进行了分封捐税制改革,并将军队建设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固定的武装力量,且配有枪炮。1855 年,卡萨侵入中央省份并夺取了帝国王位。他采用了提沃德罗斯二世(Tewodros Ⅱ)的称 284

地图 19.4　1855—1896 年的埃塞俄比亚。

285



1868 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提沃德罗斯二世在马格达拉战役中被英国击败并自杀。

号。虽然提沃德罗斯的13年统治最后终结于疾病与自杀，然而，对埃塞俄比亚作为独立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正是提沃德罗斯复兴了有效中央集权政府的观念。他的改革使得教会及贵族对他充满敌意，但是，在试图对付这些改革时，提沃德罗斯为其继承者奠定了基础，并揭示了其继承者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 284

提沃德罗斯试图通过直接任命地区总督和法官来削弱地方贵族的独立权力，这些地区总督与法官也从中央政府拿取薪金。在过去，这些职位一直处在当地世袭贵族手中，这些人在农民那里获得了支持。同时，提沃德罗斯不再依赖于过去的军事制度，即地方贵族不定期地提供兵源。他将自己的常规军事武装扩展成一支国家军，操练有度，训练有素，发有薪金，并使用现代火器与大炮。1855—1861年，地方贵族试图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宣布独立，因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地方叛乱。当提沃德罗斯镇压这些反叛并允许其士兵去抢劫、屠杀并残害其俘虏时，人们对皇帝的敌意更甚。

提沃德罗斯从这些问题中摆脱了出来，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但是在试图废除整个神职人员特权时，他没收了很多教会的财产，使每个教区只有支持他的少数神职人员拥有土地。提沃德罗斯失去了教会支持，意味着他失去了其帝王称号所具有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正是教会劝服埃塞俄比亚人在皇帝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抛弃了他。 285

1868年爆发了一场危机。在与英国领事官员发生了很小的外交争端时，提沃德罗斯逮捕了当地的英国领事。英国作为世界大国，正急于显示其国际地位，派遣了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庞大军队来营救这位领事“人质”。随着英军深入高原地区，他们发现没有人支持皇帝。在马格达拉(Magdala)战役中，提沃德罗斯只能组织起4 000人的队伍，且很快就被击败了。提沃德罗斯本人也自杀了。英国不惜牺牲自身的声誉做了撤退，给欧洲人留下了埃塞俄比亚易于征服的错误认识。 286

1896年前埃塞俄比亚的统一与扩张

提沃德罗斯的继承者约翰尼斯四世(Johannes Ⅳ)放弃了直接任



1896 年在阿杜瓦(Adwa)战役中，埃塞俄比亚取得了对意大利人的胜利。

命拿取俸禄的官员为总督和法官的做法，恢复了地方贵族之前的很多权力。虽然这让埃塞俄比亚社会变成了分封制，但是让约翰尼斯四世获得了绝大多数诸侯的支持。约翰尼斯在这种广泛的支持下，召集起一支庞大的基督教军队来驱除其北部埃及穆斯林的威胁。另一个主要威胁则是来自东部。在那里，意大利分别于 1882 年和 1885 年宣布阿萨布港(Assab)和马萨瓦港为其殖民地。约翰尼斯在 1887 年的多加利(Dogali)战役中击败了一支 500 人的意大利武装。然而，约翰尼斯从来就没有完全控制过整个埃塞俄比亚。他一直面临着王位竞争者，即南部基督教绍阿王国的孟尼利克(Menelik)的威胁。

孟尼利克多年来一直在帝国南部地区强化其统治。他建立了一支庞大且强大的军队，配有从沿海的法国商人和意大利商人那里买来的来复枪和火炮。孟尼利克在 1889 年约翰尼斯死后成功地夺得了帝国王位。他将其都城建在绍阿心脏地带的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继续通过军事征服将其帝国向南部扩张。非基督教的奥罗莫、西达玛(Sidama)和索马里被并入帝国，该地区的庞大财产被分封

287

给绍阿军事总督和贵族。

在北部地区，孟尼利克遭遇了意大利的征服。他被迫承认意大利的沿海殖民地厄立特里亚(Eritrea)。在 1887—1890 年间，意大利人在厄立特里亚扩展了其统治。但是意大利试图将其征服拓展到埃塞俄比亚心脏地带的企图遭到孟尼利克优势军力的挫败。1896 年阿杜瓦战役的胜利有效地挽救了埃塞俄比亚，让埃塞俄比亚避免了"瓜分非洲"时代欧洲人的殖民征服。

第二十章　热带非洲的帝国前奏

前殖民时代的基督教传教士

288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

随着葡萄牙人从沿海进入热带非洲，葡萄牙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也就接踵而来了。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被派往非洲去改宗大批非洲统治者。葡萄牙希望这些统治者能成为其盟友。但是，一旦非洲统治者认识到了这些传教士背后强烈的政治动机，传教士最初的活动就注定没有结果。葡萄牙传教士被一个又一个非洲国家驱逐或杀死，主要是因为这些传教士及其少量皈依者对现存的政治和宗教秩序产生了直接的挑战。非洲统治者对发展与欧洲的联系是感兴趣的，但他们需要的是新的贸易机会、技术援助和火器，而非削弱其传统宗教基础的新思想。

在整个 16 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在贝宁几乎没有取得进展，改宗奥巴的企图也放弃了。除了贝宁艺术品中采用了十字架的象征符号外，基督教在贝宁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深远的影响。但基督教在刚果取得了较大成功：一位基督教皈依者在 1506 年成为了国王。但是，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葡萄牙人很快就不再将刚果国王视为同道的基督教君主。

外国传教士与其服务的机构也越来越疏远了，因为这里的基督教吸纳了“传统”的刚果文化。

16 世纪 40 年代，在埃塞俄比亚，新近成立的耶稣教会的传教士趁着葡萄牙对加拉德沃斯(Galadewos)进行军事援助之机，也赶了过来。但是，他们在让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从信仰上改宗罗马天主教的活动并没有取得成功。17 世纪中期，他们因干涉政治而被驱逐出境。

在更南边的今天津巴布韦的莫塔帕王国里，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在 16 世纪 60 年代试图改宗姆思胡姆塔帕王庭。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控制该王国及该地区的黄金贸易。在其他地方，他们的活动激起了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反击，传教士与一些皈依者引来了杀身之祸。

反观 18 世纪，作为宗教和文化变革工具的欧洲基督教在事实上没有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民族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相较之下，19 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复兴则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其早期活动虽然进展缓慢，但影响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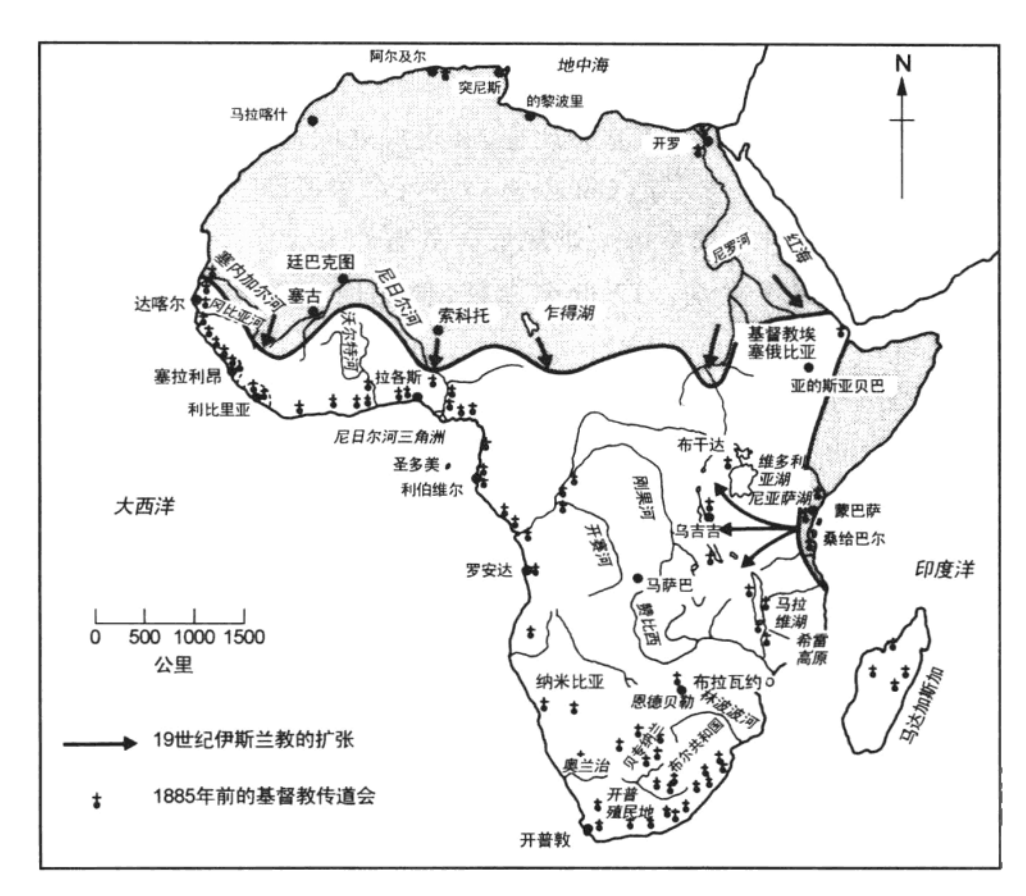
福音基督教的复兴

289

福音基督教(evangelical Christian)复兴于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它与废除奴隶贸易的人权运动紧密相关。它源于这样一种愿望，即实现欧洲及北美新工业城市中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在道义与精神上的解放。

福音运动含有强烈的传教目的，认为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都有责任将信仰传播到外部的“地狱般”的世界。由于对非洲的无知，欧洲基督徒认为非穆斯林的非洲人都是没有宗教的。他们观察到了非洲人的宗教仪式，但将这种仪式视为迷信。非洲因此被基督徒传教会视为可以取得丰富成果的地方。在非洲，基督教传教士在揭露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罪恶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欧洲人很快就开始检讨他们自己在奴隶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福音传教士将基督教义看作欧洲文化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



地图 20.1　1885 年前的非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290　程度上坚持让非洲皈依者穿欧式样服装。他们宣传一种严格的清教徒道德准则，反对跳舞、饮酒、非宗教类歌曲和一夫一妻制婚姻外的任何形式的纵欲行为。应用到非洲，这就意味着会谴责很多非洲社会的基础结构，特别是一夫多妻制，他们将此视为性放纵。此外还谴责诸如成人、求雨等仪式中所含有的非基督教仪式。从正面上说，基督教给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对非洲传统宗教的安全与舒适失去信心的人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既然相信《圣经》是他们信仰的源泉，那么基督教的传播也就意味着基本读写能力的出现与普及。

19 世纪传教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

在整个 19 世纪，大量欧洲基督教社团向非洲派出了传教士。其中



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Samuel Ajayi Crowthet, 1806—1891年),曾是一名来自尼日利亚西南部地区的奴隶。1821年,英国反奴舰队将他从葡萄牙人的一艘离开拉格斯的运奴船上解救了出来,并把他送到塞拉利昂。他是弗拉湾学院第一批学生之一,改信基督教,并根据一位英国基督教会传教会捐助人的名字取名为塞缪尔·克劳瑟,且成为一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他是1845年尼日利亚南部地区英国圣公会的奠基者。1864年,阿贾伊·克劳瑟被正式任命为尼日利亚传教会的主教。他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英文著作,并将《圣经》翻译成约鲁巴语。

较为重要的是以英国为根基的英国圣公(CMS),大英循道会(WMMS)和伦敦传教会(LMS),还有来自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的清教徒,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也在本世纪紧随而来。

在热带非洲,早期传教事业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是塞拉利昂。这个新建的英国殖民地有两个明显优势。首先,塞拉利昂之所以能很快接受基督教,最主要是因为非洲传统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安慰被无情地破坏了。在这种情势下,他们特别容易接受欧洲传教士的传教。欧洲文化价值和基督教带给他们一种新的精神安慰与社会目标。第二,由于语言、文化和热带病的障碍,欧洲传教士发现他们被挡在热带非洲

291

内陆之外。塞拉利昂是一个理想的培训基地,可以先把非洲人变为传教士,再由他们将基督教传到热带非洲的心脏地带。我们在第十六章已经论述过,基督教传教的成功让塞拉利昂声名大震。热带西非内陆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工作都是由非洲人自己来进行的。在这些非洲传教士中,最为重要的一位是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他是西非第一位黑人圣公会主教,也是在尼日尔三角洲成功地完成传教使命的英国圣公会的首领。

19 世纪早期传教事业颇有成果的另一个地方是南部非洲地区。科伊桑与塞拉利昂的情况一样,有着大量混杂的人群。因此,伦敦传教会、摩拉维亚传教会(Moravian missionaries)在科伊桑贫穷、受压迫的人群(主要为被释放的奴隶和混种民族)中顺利完成早期传教使命。越过开普殖民地的边界,传教士凭借其技术与读写专长以及懂得火器而广受欢迎。传教士自己也很看重充当主要建言者的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独立的南部非洲的统治者改宗过来。绝大多数非洲统治者,如巴索托(Basotho)的莫舒舒,重用欧洲传教士为技术顾问和文书,但是抵制他们的宗教,这些非洲统治者将基督教视为其政治权威宗教基础的威胁。一个著名的例外是茨瓦纳国王卡马三世,他成功地利用基督教增强了其权威。

到 19 世纪后半段前,除了南部非洲的一些特殊地方,如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基督教传教进展是很缓慢的。传教点主要被限定在沿海地区,皈依者也主要是那些已经通过贸易活动与欧洲人有了文化联系的非洲人。可以肯定的是,到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不到 1%的非穆斯林(除了埃塞俄比亚)信仰了基督教。由于早期的失败,欧洲传教士越来越依赖于欧洲政府的援助。为此,他们呼吁欧洲政府进行干预,以便促使非洲社会的改变,并使非洲变得更加能接受传教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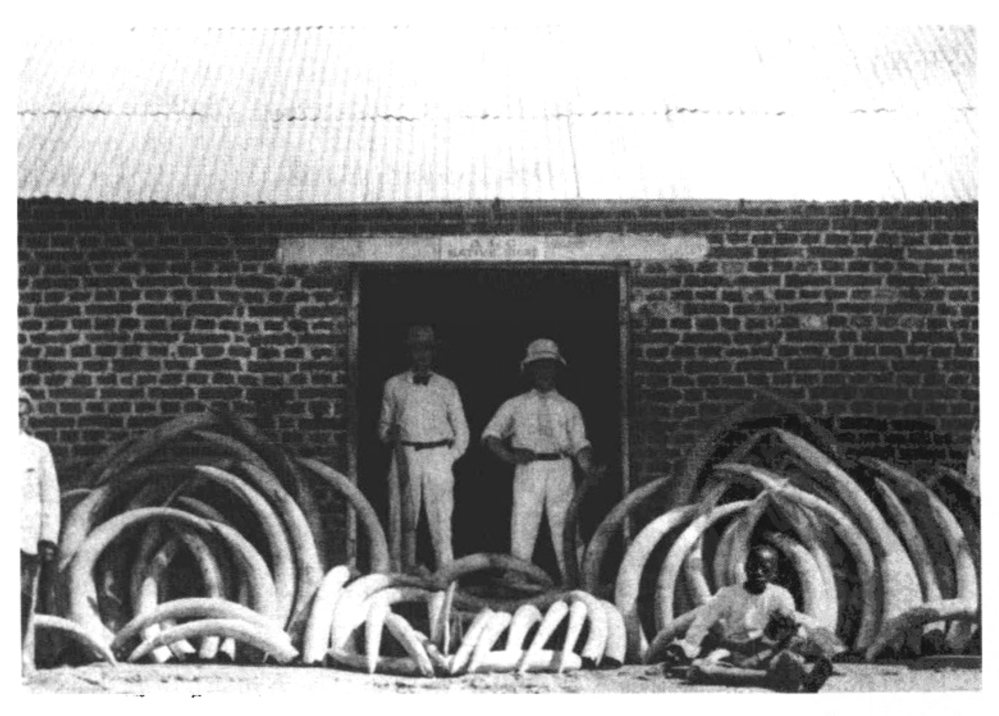
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传教士

很少有基督教传教士是欧洲帝国主义直接的、活跃的代理人,但他们越来越体现出欧洲力量在非洲的存在,且他们也是帝国统治的先驱

292

者。在很多例子中,基督教传教士在推动欧洲殖民主义的出现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世纪最后25年里,欧洲传教士呼吁其国内政府在当地提供政治或军事“保护”。这通常会招致当地的政治冲突,这些政治冲突威胁着传教的安全。然而,欧洲政府对他们的呼吁做出积极回应,更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做更符合国家本身的战略或商业利益。

在今天马拉维地区,苏格兰传教士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来到大湖西部地区和希雷河流域的高原地区。他们得到来自南非勒夫戴尔学院(Lovedale College)热心的巴索托基督徒的帮忙。试图用“基督教与商业”来取代该地区持续存在的奴隶贸易也得到非洲湖区公司(African Lakes Company)的支持。非洲湖区公司是一家英国贸易公司,该公司与苏格兰福音运动有着很深的关系。他们提供棉布和其他英国制造物品,试图打压在该地区依然很活跃的阿拉伯人、斯瓦西里人和尧人奴隶贩子。公司希望从当地大量出口的象牙贸易中获得可观的利润。



非洲湖区公司在卡隆加的象牙仓库,1904年。非洲湖区公司得到提倡贸易的传教士的出资,且这些传教士还提出了“基督教与商业”的口号。该象牙仓库实际上建于贩奴、贩卖象牙的商人姆洛兹的总部所在地。

然而,中东非的奴隶贩子武器装备较好,根基较为稳固。传教士在推动基督教传播上没有什么进展,非洲湖区公司也无法打破奴隶贩子对象牙贸易的控制。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传教士及其英国赞助者不断呼吁采取某种模糊的"英国保护"形式来抑制奴隶贸易。但是,英国政府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才决定采取行动。虽然后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打破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葡萄牙人对英国进入希雷高原地区的贸易限制。然而,英国传教士和贸易利益共同促使英国于 1889 年宣布希雷高原为其"保护领地"。

293 同样地,在纳米比亚的德国传教士曾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呼吁德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在 1880 年纳马人和赫雷罗人之间的领土战争期间,他们的传教和贸易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一个传教点被摧毁,那里的一个传教士则很幸运地逃了出来。为了保护商业而非传教利益,德国政府于 1884 年宣布"西南非洲"为其"保护领地",但德国传教士在内陆的长期存在为德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公开理由。

在对南部非洲的进一步瓜分中,英国传教士在推动英帝国的势力范围上起着积极作用。他们认为英帝国的控制将更有利于南部非洲殖民地白人定居者的支配地位。在贝专纳兰(Bechuanaland),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督促茨瓦纳统治者寻求英国保护,并将英国保护视为他们避免德兰士瓦布尔人控制、保卫自己领地的唯一途径。茨瓦纳的基督教国王没有被劝服。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曾在 1884 年短期担任过英国政府在贝专纳兰的副税务长,试图让茨瓦纳领地转让给开普殖民地和布尔共和国的白人土地投机者,但也没有成功。

南部非洲传教士最卑鄙的帝国主义行经是伦敦传教会骗取了恩德贝勒。1888 年,赫尔姆牧师(Rev. Helm)为了骗得恩德贝勒国王罗本古拉(Lobengula)将其领地签让给南部非洲的商业投机者,故意为他错译一份文件。但是总的来说,赫尔姆只是反映了基督教传教士的普遍做法。伦敦传教会在津巴布韦传教数年无果后公开提出,要获得基督

教传教突破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津巴布韦的“异教徒”国王。只是在认识到这位暴君的本质之后，他们才改变了这一想法，成立了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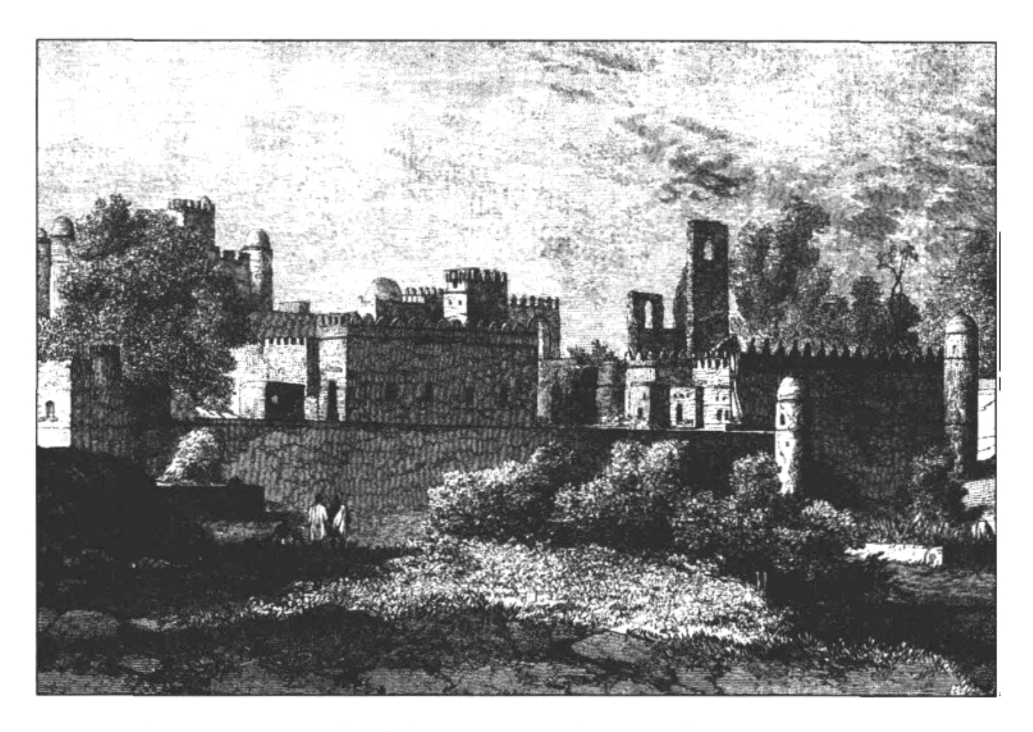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布干达的基督教传教士面临着可怕的国内战争所带来的危险。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近的基督教皈依者寻求政治控制所推动的。英国基督教传教会担心他们在布干达传教能否进行下去，于是开始在英国筹募资金。这些资金有一半用来在 1890—1891 年间维持一支在该国的英国军队。经过其他欧洲列强的同意，该地区被宣布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缺乏军事支持，该领地的前景依然不确定。英国基督教传教会的行为无疑挽救了他们的传教活动，提升了基督教新教的地位，并为 1894 年英国正式宣布乌干达为其“保护领地”扫清了道路。

欧洲探险家：作为帝国前奏的非洲勘测

1768 年，一位古怪的苏格兰贵族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为了寻找青尼罗河的资源，开始了一次去往埃塞俄比亚的漫长之旅。在他 1783 年返回欧洲的时候，布鲁斯发现很少有人相信他对埃塞俄比亚，特别是辉煌的埃塞俄比亚贡德尔王廷的描述。布鲁斯的发现与欧洲人的偏见不相吻合。在欧洲人来看来，非洲是原始、无序社会的大杂烩，只不过是奴隶的来源地。尽管有着数个世纪的沿海贸易联系，欧洲人对非洲的民族和历史依然无知。然而，欧洲人对非洲的兴趣即将被激发出来。 294

正是奴隶贸易的废除重燃了欧洲人对非洲的兴趣。如果欧洲人要从与非洲的“合法”贸易中获得好处，他们就需要对非洲大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需要知道非洲人所卖的原材料，也需要知道主要人口中心的位置，进而为欧洲商品找到新市场。

1788 年，一群富有且有影响力的英国人组建了非洲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他们的直接目标是派遣一支探险队去访问梦幻之城廷巴克图，并考察尼日尔河情况。在中世纪，非洲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是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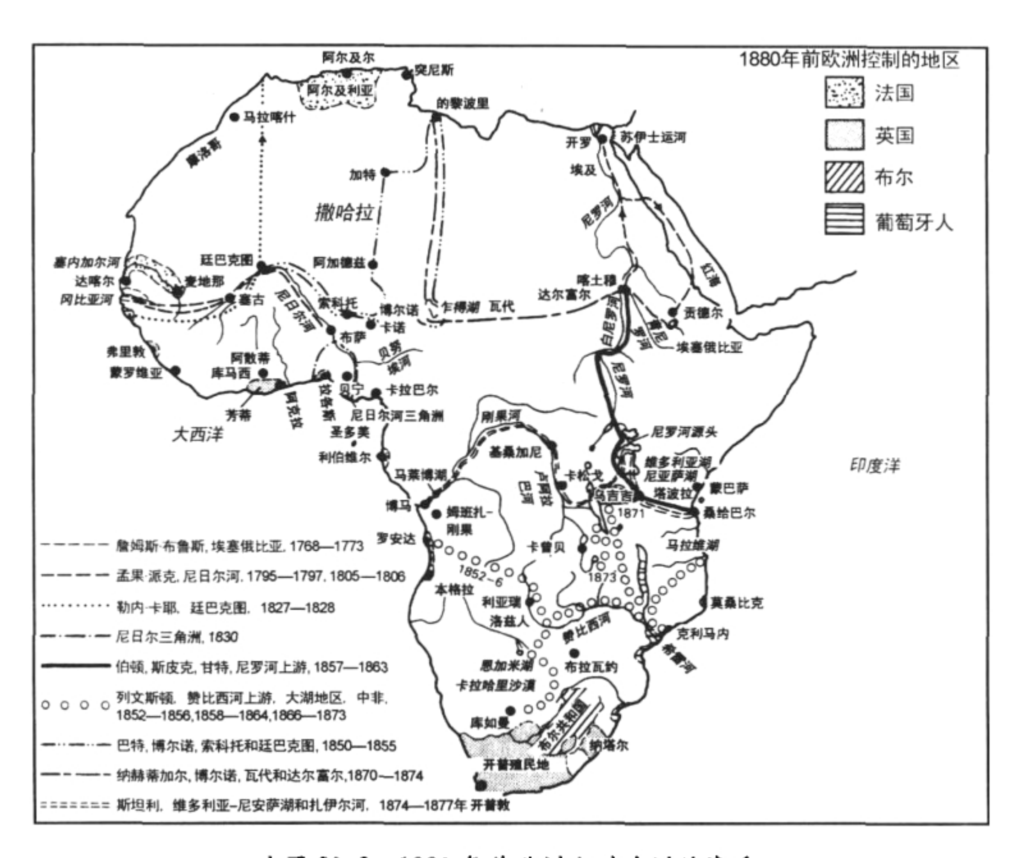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首都贡德尔，由詹姆斯·布鲁斯于18世纪70年代发现。在他回到欧洲时，欧洲人不相信如此雄伟复杂的建筑是由非洲人建造的。

金的主要来源地。马里国王曼萨·穆萨在14世纪那次著名的麦加朝圣之旅中曾访问过廷巴克图。穆萨在开罗赠送的奢侈的黄金礼品进一步地将廷巴克图在欧洲人的“迷思”中塑造为一个财富无法估量的城市，甚至那里的奴隶都是披金戴银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论述的那样，廷巴克图本身并不是一个黄金来源地，且其重要的贸易据点的地位在近来的几个世纪里已经有所下降。然而，这里依然是欧洲早期探险旅行的目的地。

1788—1877年间，大量欧洲探险家开始进入非洲心脏地带，以纠正欧洲人对非洲大陆的无知。这样的探险活动开展后，且近一年过去后，几乎没有一支欧洲探险队勘察过非洲大陆的内陆地区。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欧洲投机家们毕竟不是探险家。“探险”一词意味着对之前不知道的事物进行调查，但非洲没有什么地方是当地非洲居民所不知道的。而且，非洲的很多地方，特别是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

295



地图 20.2　1880 年前欧洲人对非洲的渗透。

在欧洲探险家们“发现”它们之前的数百年来一直为阿拉伯世界所熟知。绝大多数欧洲探险家都是沿着固定的长途贸易路线行进的，有些欧洲探险家为了与贸易商队搭伴，甚至用穆斯林服饰将自己假扮成穆斯林。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欧洲探险家都得到了非洲人的善意款待，以及非洲向导和侍从的帮助。有些欧洲探险家在旅行的时候，携带着大量的行李搬运工和全副武装的侍从。这些不可或缺的非洲侍从都具有读写能力，并记录了他们的探险活动，他们今天在非洲的声名几乎可与其雇主在 19 世纪在欧洲所取得声名相媲美。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进入非洲的欧洲探险家通常被描述为历史学家，且为一种纯粹、毫无功利的科学探求精神所驱使，其中很多人也是这样来认识自己的。其他人则或为探险精神所吸引，或为了名声，或者两者兼有。但资助这些旅行的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称赞他们

296



穿着阿拉伯服饰的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1821—1890 年)爵士,语言学家、探险家、伪装和伊斯兰教规的大师。他曾秘密访问了麦加的"禁城"(1853 年)。1857—1858 年间,他率领一支官方的探险队来到了坦噶尼喀湖以寻找尼罗河的源头。他的同伴,汉宁顿·斯皮克(Hannington Speke)夺走了他的功绩。汉宁顿·斯皮克带领一个分队到了大尼亚萨湖(Nyanza)的两岸,并将此湖改名为维多利亚湖,且(正确地)宣称这里是尼罗河的源头。

的"发现",废寝忘食地阅读他们的著作。这些著作论及欧洲的重大利益就是在未来可以获得更多利润的机会。如果有些信息有益于英国的商业利益,非洲协会甚至会将它们汇总起来并加以保密。非洲协会第一位成功的探险家孟果·派克(Mungo Park)很清楚其旅行的主要意

图，他将其描述为“使国民更加熟悉非洲的地理，且……让非洲成为他们的鸿志，成为工业财富的新来源地、新的商业渠道”（《通向非洲内陆的旅行》[*Travels into Interior of Africa*]，首次出版于伦敦，1799 年；此版本由伊兰书店出版于 1983 年，第 2 页）。 297

孟果·派克访问了尼日尔河两次（1795—1797 年以及 1805—1806 年），但死于旅途中。其他人则沿着他的步伐，直到 1827 年，法国人勒内·卡耶（René Caillé）才成为第一个带回廷巴克图第一手材料的欧洲人。讽刺的是，卡耶描绘的廷巴克图既灰暗又脏乱，颠覆了欧洲的黄金梦，欧洲人并不因此而相信卡耶的话。这和詹姆斯·布鲁斯在 1783 年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照，詹姆斯·布鲁斯对埃塞俄比亚的描述充满着赞许，因而不被欧洲人相信。1830 年，兰德尔兄弟（Lander Brothers）从内陆城镇布萨（Bussa）出发，沿尼日尔河顺流而下直到河口。藉此，他们向对非洲充满期待的欧洲揭示了一片被称为“油河”（Oil Rivers）的沼泽地。而事实上，这片沼泽地就是肥沃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后来，欧洲商人和制造商就是通过这条航道进入西非内陆心脏地带。但是，疟疾造成的高死亡率在后来的 20 年内将欧洲探险家与商人阻挡在海湾地区。转折点发生在 19 世纪 50 年代，此时人们发现服一定剂量的奎宁可以有效地应付疟疾。这一医学发现很快就加快了欧洲人在非洲探险的步伐。

19 世纪 50—70 年代，欧洲探险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非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情况：上尼罗河、赞比西河与刚果河。对非洲河流的强烈兴趣并不仅仅是超然的科学好奇心使然，在欧洲人看来，河流是出入非洲心脏地区的主动脉。这些河流是“高速公路”，通过它们，欧洲人可以让这片大陆向欧洲贸易和开发敞开怀抱。

伯顿、斯皮克和格兰特（Grant）将白尼罗河的源头追溯到维多利亚-尼安萨湖，并发现这条河流自喀土穆往上具有通航的可能性。在更南边的地区，利文斯顿从赞比西河横跨整个大陆直到罗安达的西部海岸，然后再回过头来到达克利马内（Quelimane）的东部海岸。后来，他率领一支探险队沿着希雷河直达马拉维湖，并将其余生投入到中南非洲的湖河探

险中。利文斯顿先前曾是一名传教士,受到传教激情的推动,他宣称基督教与欧洲商业是解决依然残存于该地区的奴隶贸易的唯一药方。与此同时,德国人巴尔斯(Barth)和纳赫蒂加尔(Nachtigal)曾勘探过撒哈拉与萨赫勒地区的主要贸易路线。巴尔斯五卷本的详细旅行记录一直是研究索科托和博尔诺的历史学家的主要参考资料。

巴尔斯的旅行记录由于有着丰富的信息,让巴尔斯被认为是最后一位进行无功利探险的科学家。但是,其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旅行(1850—1855 年)的主要目的是为欧洲商人评估博尔诺、索科托和尼日尔河河曲地区的贸易潜力。巴尔斯虽然是位德国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一群英国商人的资助。作为这些英国商人的代理人,巴尔斯想从索科托苏丹那里得到“一份特许状,即所有英国商人在其辖区内从事贸易活动时,确保他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苏丹爽快地就答应了这一请求,但是巴尔斯对其保护能力很是怀疑。更早的时候,即在乍得湖东南部的巴吉尔米(Bagirmi)的时候,巴尔斯被当作间谍关在了监狱,并加上脚镣度过数日。这一经历让他开始反思:

298

> 我得出结论,为了让期望变成现实,对这片由夸拉河(Kwára)、贝努埃河(Bénuwé)和卡杜拉河(Kadúna,主要流段在今天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包围的土地进行殖民是绝对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将商业和文明从各个方向拓展到非洲大陆的心脏地区。
>
> ——摘自 H. Barth,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初版于 1857 年,此处所引的版本为:Minerva Library, Ward Lock, London, 1890, p. 5

尽管巴尔斯担心当地非洲统治者在确保欧洲商人在非洲内陆安全方面的能力,但他还是欣慰于他对索科托都城当地贸易的了解程度:

> (1853 年)4 月 22 日,星期五。今天是重要的集市日,对我来说



楚玛(Chuma),戴维·利文斯顿的探险同伴。利文斯顿于1873年死于今天赞比亚班韦乌卢湖地区后,楚玛负责保护其尸体。后来他与苏西(Susi)带领一个由60个人组成的商队到达了海岸地区,并将利文斯顿的尸体运送回英国并安葬在英国。到巴加莫约(Bagamoyo)的旅程花了他们10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小气的英国政府的任何感谢与回报。

挺重要的,因为我要买很多东西,为此,我要花费7万贝(shell)……市场里人头攒动,但还在可以忍受的程度内,供应也较充分。这里有约30匹马,300头待屠宰的骆驼,50头驮兽或驮牛,还有大量的皮革制品(这是索科托最著名的制作业),尤其是皮包,很是柔软,也很漂亮。这里也有100多件待售的马勒;尤其是,这里有大量待售的铁制品,索科托的铁器质量极好且随处可见,但是卡诺的铁器实在不怎么的。这里也有很多奴隶出售,其价钱比想象的要高—— 一个很一般的年轻奴隶要卖3.3万贝;我自己花了3万贝买了匹矮马。这一天也是盐商访问这些地方的日子,沙漠商人的

299

个人用品通常可以从中获得一小部分补充。我花了约 2 000 贝买了多种食品，装满了一皮包，以备漫漫长途之旅所需。

——摘自 H. Barth,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p. 163, 184.

正是斯坦利揭开了非洲其他河流之谜，完成了利文斯顿的心愿。1874—1877 年，斯坦利从桑给巴尔出发横跨大陆，为此，他从刚果河上游地区的支流卢阿巴拉河一路航行到卢阿巴拉河河口的博马(Boma)。(从 19 世纪开始，在整个殖民时期，欧洲人都将这条赤道地区的河流视为刚果河，主要的依据是其下游的南部就是刚果人和刚果王国。之前葡萄牙人将它称为扎伊尔河，可能是源于非洲当地人对其河口的称呼。这条河流在不同河段有着不同的名字。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这条河及其所属共和国都被改称为扎伊尔，但 20 年后，即 1997 年，又都改名为刚果。)作为武装探险队的队长，斯坦利顺流而下，无情地用枪炮开路，以对付沿岸诸多民族的强烈反抗。这些民族亲眼目睹了他们所控制的古贸易路线受到了威胁。

多年来，欧洲商人一直将其控制的贸易路线与联系从沿海基地向内陆推进。如塞内加尔河的法国人，受到其政府的军事支持，到 19 世纪 60 年代已经建立了一个狭长的沿河殖民地，最东边到麦地那。同样地，阿散蒂王国挑战英国在"黄金海岸"的贸易主导地位之后，英国政府宣布芳蒂诸国为英国直属殖民地(Crown Colony)。英国在这一沿海殖民地的地位由于在 1874 年击败阿散蒂军队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英国商人利用尼日尔河三角洲国家的不团结，控制了尼日尔河下游的大部分贸易。如今，斯坦利突然发现刚果河流域可大量通航，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乘机将斯坦利派回刚果河河口，要他修建一条道路将博马和马莱博("斯坦利")湖连接起来。这事实上是一次殖民远征。

比利时国王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推动欧洲竞相控制非洲的丰富资源和业已加速了的贸易步伐。非洲大部分地区依然需要"勘测"，但自此后，欧洲"探险家"已经成为殖民扩张的直接代理人了。



1877 年 2 月 1 日，斯坦利在刚果河下游，即刚果河与伊图里河交汇处的暴力行径。在那里，他们遇到 40 多艘独木舟："我们抛锚停下并在河面上一字排列开来……我们及时地给了他们想要的一点好处……随着这些独木舟退开，一只来支援它们的雄伟的独木战船开了过来。这只战船可能是国王的独木舟，约有 100 个人。一个带有羽毛王冠的人在来回走动的时候，约有 6 个人站在船首的平台上，这些人身上画有丑陋的彩绘，戴着羽毛头饰。船上约有 60 名桨手，每个船桨都有象牙球柄装饰，且桨柄上缠有铜线与铁线。"[*The Exploration Diaries of H. M. Stanley*, ed. R. Stanley and A. Neame, William Kimber, London, 1961, p. 159]

第二十一章 欧洲人的瓜分、殖民征服和东非、中北非与西非地区非洲人的抵抗

301

"瓜分非洲"

自从"合法贸易"取代了大西洋奴隶贸易后,欧洲商人就对控制非洲内陆贸易体系越来越有兴趣。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欧洲人推进到西部沿海地区的主要江河流域。但是他们总体上还是承认非洲人的权威,其活动也是通过与当地非洲统治者合作展开的。除了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部非洲、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以及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维持名义上的统治外,外国势力在热带非洲的侵略大体上还是限制在小范围的沿海飞地(enclave)。桑给巴尔阿拉伯统治者的权威并没有延展到邻近的大部分沿海城镇和东非岛屿。葡萄牙人长期声称其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所属权,但是他们的统治很少从沿海或河谷地区扩展开来。在西非,法国人为了扩大其贸易利益沿着塞内加尔河流域向上推进,但是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依然只是限制在狭窄的河边地带。英国人同时控制了塞拉利昂和拉各斯的一小块沿海殖民地;他们正想着把今天加纳沿海地区的芳蒂国家并吞掉。尽管有着这些外来入侵,在 19 世纪 70 年代,非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是处在非洲人自身的统治

之下。

然而，在 1880—1900 年间，非洲-欧洲关系的整个基调和态势发生了变化。到 19 世纪末，大量的殖民掠夺，即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将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并入到欧洲殖民帝国的范围内。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剧烈的转变？非洲如此快地丧失独立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历史学家争论了很久，并强调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这种争论无疑还将持续下去。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提及一些重要的背景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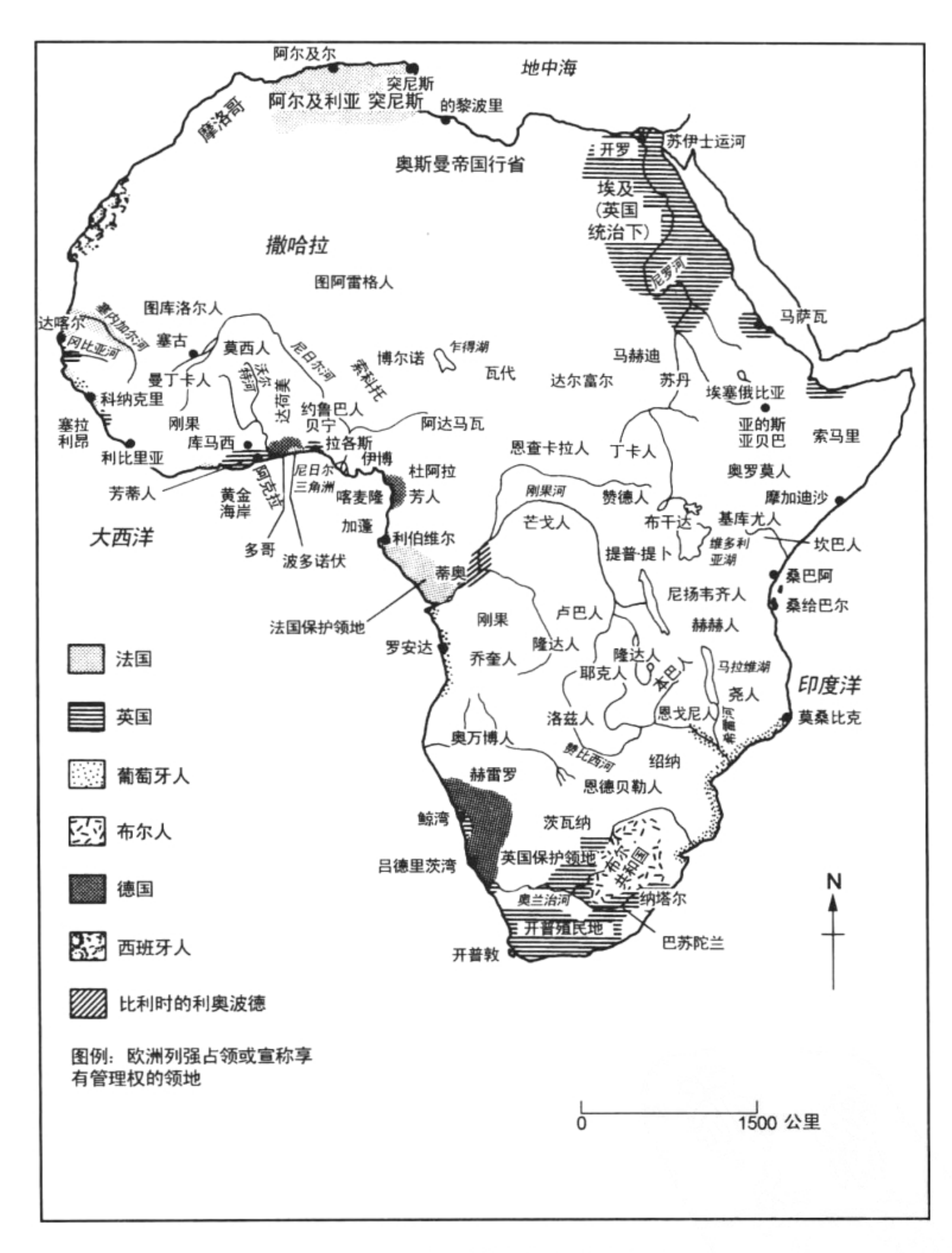
欧洲背景

英国作为世界上领先的工业国家，到 19 世纪的后半叶一直是无可匹敌的。在这一时期，提出欧洲国家在非洲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是符合英国利益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去干涉另一个欧洲国家在非洲的自由贸易。事实上，这也就意味着英国在非洲对外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因为，在欧洲生产的商品中，英国货最便宜，数量也最大，并且英国拥有将这些货物航运到非洲的最大商船。然而，到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法国、德国和美国在工业技术和制造上已经很明显地赶上了英国。到 19 世纪 70 年代，西欧工厂生产的廉价产品如此之多，以致于超出了其本国民众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出现饱和，欧洲制造商和商人越来越多地瞄向了非洲。布匹、服装、酒、枪炮和金属制造产品开始倾销到非洲大陆以开辟新市场。随着欧洲工业和贸易竞争变得更加均衡，“自由贸易”让位于“保护主义”。英国主要的贸易对手法国和后来的德国意识到，要在竞争中打败英国，就要在非洲建立殖民地或“保护”区。在这些地区，它们可以将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排除出去或征收重税。

303

瓜分非洲的另一个更深层的动机是欧洲人的认识，即非洲广袤的内陆地区蕴藏着大量未开发的财富。西非热带森林已经成为植物油的重要来源地，象牙是供不应求的稀罕物，来自热带森林的橡胶也即将要兴盛起来。最后，19 世纪 70、80 年代南部非洲大量钻石和黄金的发现更是激起了欧洲对整个非洲大陆的野心。

302



地图 21.1 “瓜分”时代的南部非洲。

303 甚至是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欧洲国家也迫切地想要加入对非洲部分地区的瓜分中来，它们寻求的是快速的回报或是保护未来的市场。在非洲占有殖民地成为欧洲国家声誉的一部分。

然而，对非洲进行快速的殖民征服成为一种可能，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第一，殖民主义者可以利用非洲国家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一些非洲统治者接受一个欧洲盟国或“保护”条约，并相信该盟国会保护他们以防止其他非洲宿敌国的攻击。只有当这些宿敌国被残酷地征服，欧洲“保护”的全部意义才变得清晰起来。没有一个非洲统治者主动自愿地签字放弃其与生俱来的权力，不过，欧洲“保护”国通常都是这样来解释条约含义的。

第二，欧洲在军事技术上占据着巨大优势。在前几个世纪，非洲统治者一般还能够倾其所有来抵抗入侵的欧洲军队。他们建有自己的前膛枪兵工厂，并可以熟练使用更加传统的武器和游击战术。然而，在19世纪70、80年代，由于欧洲武器的发展，非洲军队已经大为落后了。首先是后膛多发来复枪的出现，紧随其后的是1889年出现的马克沁机枪(Maxim-gun)，这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高度自动化的近代机械枪支。马克沁机枪的出现改变了欧洲人在非洲的军事要塞。在镇压抵抗的最后关头，使用马克沁机枪对欧洲人来说至关重要。老式、落伍的欧洲枪支已经自由出售给非洲达数年之久，但最新式枪支则被加以限制。虽然绝大部分非洲抵抗军获得了大量的后膛来复枪，但他们没有获得过一支马克沁机枪。英国反帝国主义的诗人希拉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著名的两行讽刺诗概括了英国人的地位：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瓜分”的开始

304

1879年，法国人开始挑战欧洲其他国家在非洲的“自由贸易”。他们开始从达喀尔(Dakar)修建一条铁路以连接塞内加尔殖民地与尼日尔河上游地区。法国政府希望通过这条铁路来获得对整个西非萨赫勒和草原地区这一巨大市场的控制权。1882年，他们宣称波多诺伏(Porto Novo)和刚果河下游北岸地区为法国的保护领地。波多诺伏位于英国沿海殖民地黄金海岸和拉各斯之间，因此打破了英国在西非南部沿海地区近

乎垄断的地位。刚果河下游的北岸地区则出现了在可通航河段上的“自由贸易”的问题。斯坦利以“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的名义要求刚果河南岸一带的所属权,而该地区曾是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的前线地带。英国人以支持葡萄牙人对安哥拉、刚果河口地区的归属权加以回应。此时,英国对埃及的“临时”占领可能正转变为永久性占领,且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这主要归因于在埃及的法国投资者的骚扰。德国领导人俾斯麦(Bismarck)看到了英法敌对状态所带来的机会,决定在非洲一些没有被殖民的地方展开行动。1884 年,俾斯麦声称德国的保护领地包括多哥、喀麦隆及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接着,他邀请欧洲主要列强到柏林来讨论尼日尔河和刚果河的自由航行问题。

柏林西非会议(1884—1885 年)是欧洲领导人试图就事实上已经开始的瓜分非洲达成某种国际协议。它没有确定殖民地边界,但是它设定了两项重要原则。第一,它承认利奥波德提出的所谓“国际协会”在刚果盆地享有合法权威。作为回报,比利时国王允许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自由出入该地区。在获得柏林承认的基础上,利奥波德在 1885 年声明对其私人王国,即“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具有所属权。第二,柏林会议同意,如果非洲任何一个地区被某一欧洲国家“有效占领”,那么该国对非洲地区的所属权只有得到其他欧洲国家政府的承认才有效。这是俾斯麦的精巧策略,旨在暗中破坏英国对那些模糊的、非正式的“势力范围”所属权的要求。1885 年 2 月,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几天内,俾斯麦将这一原则用于解决具体现实问题上。他声称德国保护领地位于英国东非“势力范围”的中央地带,而其“有效占领”的基础则是德国事务官彼得斯(Peters)在近期已经游历了该地区,并从当地统治者那里拿回了一大把“条约”。俾斯麦所要求的就是“德国的东非”殖民地,后来改名为坦噶尼喀(Tanganyika 即今天坦桑尼亚的内陆)。

1890—1891 年间,一系列的欧洲条约确定了非洲大陆很多内陆殖民地的边界。撒哈拉和萨赫勒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界定,绝大部分“已获得”的领地还远远没有被欧洲人“有效占领”。非洲人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独立,19 世纪 90 年代是非洲对欧洲征服进行普遍反抗的时期。



扑向非洲的德国鹰：英国漫画家视角下的德国对东非的野心。《笨拙》(punch)，1890。1885—1886年期间，英德已分割了维多利亚-尼安萨湖东部领土，但北部、西部的领土仍没有确定下来。1890年，德国宣布其代理人卡尔·彼得斯已与布干达国王姆旺加签订了一个条约。英国对此深感恐惧，因为布干达王国是进入尼罗河源头的要地，且埃及是英国付出血的代价才占领下来的。因此有了这幅漫画。后来，就在1890年，英德签订条约，确定了布干达王国南部的乌干达-坦噶尼喀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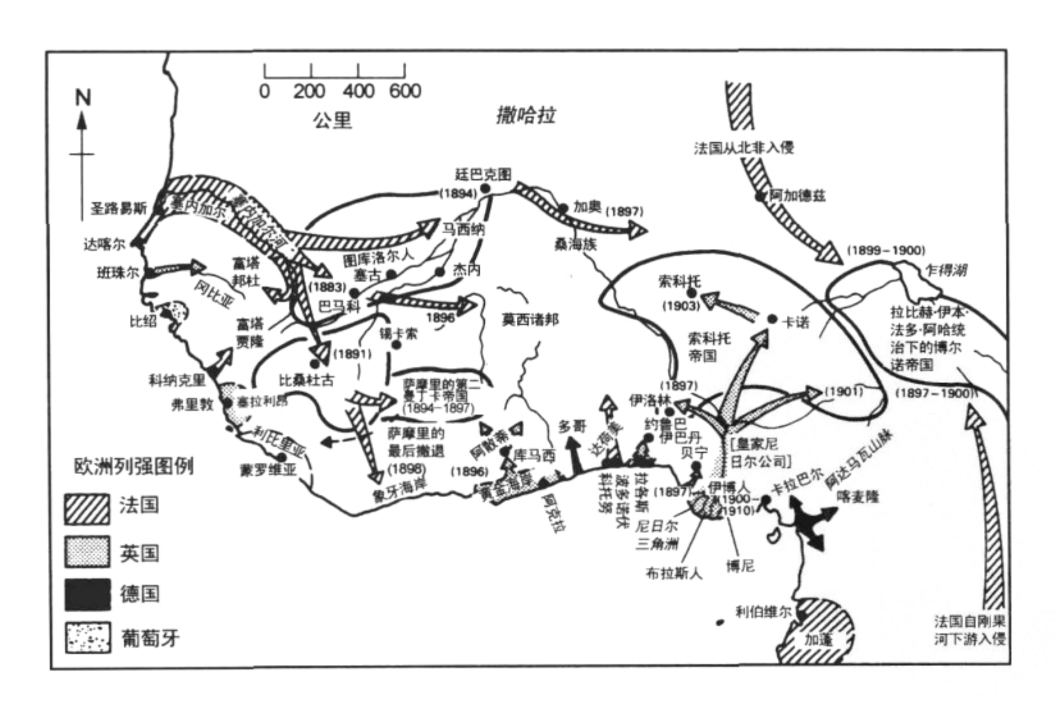
征服与反抗

法国人在西非和中北非

法国在塞内加尔的殖民地,最初是在达喀尔和圣路易斯的贸易港口附近建立起来的。19 世纪 50、60 年代,总督路易斯·费德尔布(Louis Faidherbe)为了保障法国贸易利益和阻止图库洛尔帝国向西扩张,并将法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塞内加尔河流域,组建了一支由塞内加尔人组成的纪律严明的军队以完成征服。这支军队是在当地招募和训练起来的,并配有最先进的欧洲武器。正是这支由当地非裔法国军官指挥的塞内加尔人军队,成为 19 世纪 80、90 年代法国征服西非的先锋部队。

306

1879—1881 年间,法国开始在西非推行大范围殖民的进攻性政策。他们在塞内加尔和巴马科之间建立起一系列要塞,从而推进到尼日尔河上游地区,并沿着这一路线开始修建铁路,希望以此经塞内加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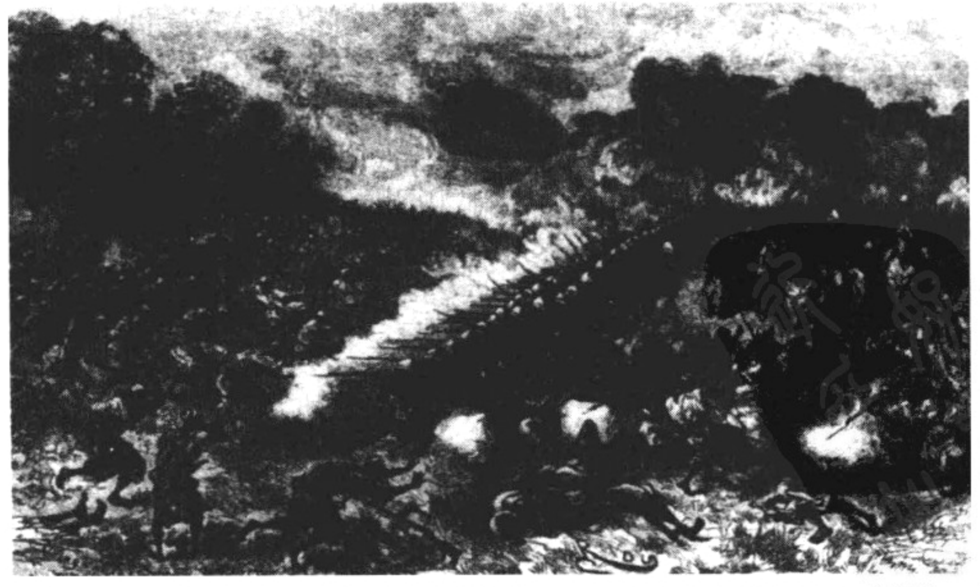


地图 21.2 “瓜分”时代的西非。

调运西苏丹的大宗贸易物品。

法国在西苏丹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艾哈迈杜·塞库(Ahmadu Seku)及其子兼继承者哈吉吉·乌马尔统治下的图库洛尔帝国,还有萨摩里统治下的正在扩张的曼丁卡帝国。艾哈迈杜和萨摩里最初都试图以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冲突来应对法国的塞内加尔人军队。艾哈迈杜和萨摩里最大的弱点是他们不能统一立场共同对付来自西边的外来侵略者,因为他们是争夺西苏丹权力的宿敌。

艾哈迈杜在确信图库洛尔帝国会获得法国人的承认后便与法国结成同盟。但是在1883年,法国人背弃了条约,沿着图库洛尔帝国南部到巴马科一线修建了要塞,而艾哈迈杜仍然表现出对条约的信任。在 307 1885—1887年,他支持法国人对冈比亚河上游与塞内加尔之间马哈茂德·拉明(Mahmadu Lamine)的伊斯兰国家富塔邦杜(Futa Bondu)的战争。但法国人的野心很快就昭然若揭了,法国从不在意是否尊重与独立的西非国家签订的条约。1887年签定的法国-图库洛尔条约没有给图库洛尔带来多大的安全,法国人两年后就发动了对图库洛尔边界要塞的攻击。在后来的十年内,法国对抵抗的西非军队经常动用大炮以确保胜利。但是,即使是在1890年法国占领了塞古之后,艾哈迈杜



非洲人抵抗法国征服的一幕。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动用的是由非洲人组成的军队。

的军队也拒绝投降。他们边战斗边撤退到马西纳(Masina),并在那里坚持抵抗,直到1893年。法国人利用帝国内的政治分裂才最终击败了艾哈迈杜。艾哈迈杜在马西纳一被推翻,其兄弟就成为马西纳的傀儡统治者,法国人与他结成了同盟。虽然艾哈迈杜死于索科托的流放中,但其残余部队向南行进,加入萨摩里那边,并持续地展开对入侵异教徒的实力悬殊的斗争。

萨摩里是法国在西非最顽强的一个军事对手。他指挥一支3万人的军队,绝大部分都是步兵,但也有一小支精锐骑兵。他们装备精良,配有滑膛枪和来复枪,这些枪是从塞拉利昂进口过来,或是由曼丁卡铁匠自己制造和修理的。此外,国家在曼丁卡民族主义的统一意识下得到强化,这种民族主义要恢复古马里帝国的荣耀。

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边界冲突之后,双方在1887年达成曼丁卡-法国条约。该条约使法国获得了沿尼日尔河一线的萨摩里东北边界地带。但与法国-图库洛尔条约一样,法国只是将这种联盟关系作为暂时性的策略。在曼丁卡-法国关系恶化的紧要关头,萨摩里对其统治地区的控制却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他的军队在东北边界锡卡索(Sikasso)都城的消耗战中遭到了重创。1888年他还面临着一场国内起义,这次起义是为了反对他没能成功地迫使曼丁卡人改宗伊斯兰教。

1891年,法国从北部进犯。萨摩里不想在阵地战中遭遇法国的塞内加尔人军队,因为他对法国的重炮和机枪没有招架之力。他在从都城拜桑杜古(Bissandugu)作策略性的撤退时下达了"焦土"政策,让帝国心脏地带变成一片废墟,留下的只是处在灰烬中的庄稼和整个村庄。但是,这也意味着法国军队供给不足,并不得不在1892年放弃了入侵。萨摩里认识到其军事方面存在的危险,便做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在1892—1894年间,他将整个帝国向东迁移至今天科特迪瓦和加纳北部边境。但是,即使是在那里,对曼丁卡来说也没有和平可言,因为现在他们自己就是外来征服者,要面对属民的内部反抗。而进一步东撤又会遭到阿散蒂人的阻截,这些阿散蒂人已在1896年归属了英国。萨摩里无法从英国人那里获得一个保护领地,不得不又和法国开战。尽

308

管塞拉利昂的武器供应被切断，但曼丁卡军队还是取得了几次重要的胜利。最终，1898 年的饥荒击败了在利比亚北部山区的萨摩里军队。萨摩里向法国投降，被流放到加蓬，于 1900 年死在那里，享年 70 岁。

在苏丹中部地区，法国征服所遇到的主要抵抗是由博尔诺的征服者，即拉比赫·伊本·法多·阿哈来(Rabih ibn Fadl Allah)领导的。拉比赫起先是一个专做象牙和奴隶生意的苏丹掠夺者-商人(raider-trader)的军事指挥官，后崛起于苏丹东部的尼罗河流域。紧接着拉比赫于 1885 年在加扎勒河(Bahr el-Ghazal)流域建立马赫迪国。其权力基础就是军队，军队的核心部分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骑兵，并配有进口来的来复枪。拉比赫利用这支骑兵不断抢劫和征服临近农村地区。

拉比赫将自己视为救世主的子孙，逐渐地向西征服，1893 年到达乍得湖，并征服了博尔诺国。在那里，拉比赫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在很多方面都要比之前的博尔诺贵族政治统治更为公正和清廉。征收的税赋较少，且每年只征收一次。绝大部分国家收入被用于军队和防卫，而不是统治者个人的奢靡生活。但是，拉比赫仍然是一个外来征服者，在其短期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面临着对其统治不满的内部反叛。军队为了粮食供给不断洗劫村庄，造成了农业的严重衰落。然而，拉比赫统治的主要威胁是法国军队的入侵。到 19 世纪末，法国军队已经威胁到拉比赫的独立统治。法国对拉比赫知之甚少，且震惊于其抵抗力量，但在 1900 年 4 月，两支法国主力军队包围了博尔诺。虽然拉比赫本人被击败并被杀死，但是斗争由其子法多·阿哈·伊本·拉比赫(Fadl Allah ibn Rabih)延续下来。他将残余部队撤到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希望英国人承认其为博尔诺的统治者。但是，英国人没有给他提供保护。他被法国人追击，死于 1900 年的战斗中。

达荷美在 1892—1894 年间为法国塞内加尔人军队所征服，起先法国的到来受到很多从达荷美专制暴政中解放出来的约鲁巴人的欢迎。科特迪瓦在 1893 年被宣布为法国的殖民地，但其军事征服则没有那么轻易就获得成功。那里没有法国人要推翻的中央权威，法国人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才迫使大量的森林酋邦国屈服。

309

英国人在西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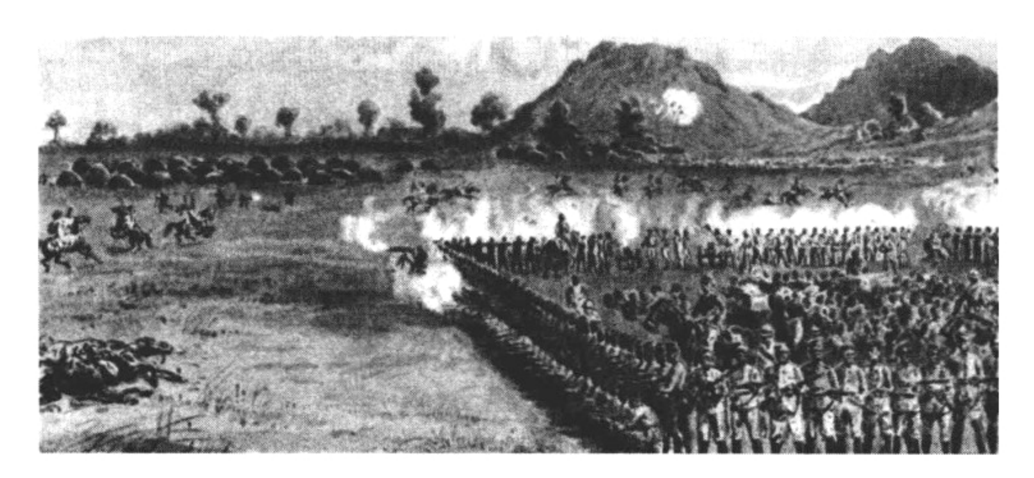
虽然英国人征服的领土没有法国人多，但是征服了非洲大陆中两个最为富有的国家——黄金海岸(加纳)和尼日利亚。这两个国家都是在沿海贸易飞地上建立起来的，英国人早已在那里扎下根来。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英国人买了长期存在的荷兰和丹麦贸易要塞，获得了黄金海岸的贸易垄断地位。现在，他们的状况就是对进出口征收关税，且无须担心因荷兰或丹麦的竞争而丧失贸易优势。这为殖民当局提供了财政支持，1874 年英国人宣称沿海芳蒂国家为其殖民地。

19 世纪早期，英国人与阿散蒂人爆发了战争，这些阿散蒂人希望阻止外国人在沿海贸易上取得主导地位。为了宣示其在沿海地区的新权威，英国人于 1874 年入侵阿散蒂，并击败了阿散蒂军队，烧毁了其都城库马西。英国人在这时希望节省殖民管理的花费，就从阿散蒂撤离了军队。到 1895 年，在赫勒·普伦佩(Asantehene Prempe)的统治下，阿散蒂的实力得到复苏。与此同时，面对法国人对萨摩里的战争，英国人发现有必要宣示其在黄金海岸腹地的权益。于是在 1895—1896 年，英国人再一次入侵了阿散蒂王国。

阿散蒂军事首领看到英国军事上的优势，机智地避开了战斗。王国遭到占领，英国人宣布今天加纳的绝大部分地区为其保护领地，但是阿散蒂军队毫发未损。1900 年，阿散蒂军队抓住机会开始反击英国人。在后来的战争中，阿散蒂取得了大量的胜利，几乎将英国人赶出了加纳。然而，由于英国从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调来增援部队，阿散蒂军队最终被击败，黄金海岸宣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普伦佩及其家族和大臣都被流放到塞舌尔群岛。

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政府在后来成为尼日利亚的地区中只在拉各斯拥有一小块海岸殖民地。然而，到 1884—1885 年的柏林会议前，英国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来自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尼日尔河下游地区棕榈油贸易垄断。乔治·戈迪(George Goldie)将几家英国贸易公司



西非人抵抗英国征服的一幕，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使用的是机枪。

合并为非洲国家公司(National African Company)。单单这一家公司就控制了尼日尔河/贝努埃河交汇地区与三角洲之间所有棕榈油的出口。戈迪因此可以将价格压下来，为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

310

柏林会议之后，英国政府立即宣布三角洲地区为其保护领地以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地位。同时，英国还给戈迪的公司颁发了王室特许状(即准许文件)，让该公司以英国之名统治尼日尔河下游地区。该公司现为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作为竟争者的非洲商人，如布拉斯人，则被武力排除出油料贸易。拒绝在英国人名下从事贸易的三角洲地区的富商，如奥波博(Opobo)的加加(Jaja)，则受到了战船和死亡的威胁。

在1892—1902年间，今天尼日利亚绝大部分内陆地区逐渐被纳入到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很多地区是用武力夺取的，尼日利亚众多民族都对征服者展开了反抗。和法国一样，英国也在前线使用了大量的非洲士兵。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这些非洲人变为纪律严明的职业士兵，并配有最新式的来复枪、重炮和机关枪。该地区的非洲人长期以来不够团结，这让英国军队一次性地就占领了一个非洲国家。虽然皇家尼日尔公司直到1897年才成功地征服了伊洛林，即索科托的约鲁巴省，但绝大多数约鲁巴兰地区都是在1892—1893年被占领的。与此同时，英国人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赶走了纳纳(Nana)，即贝宁河流域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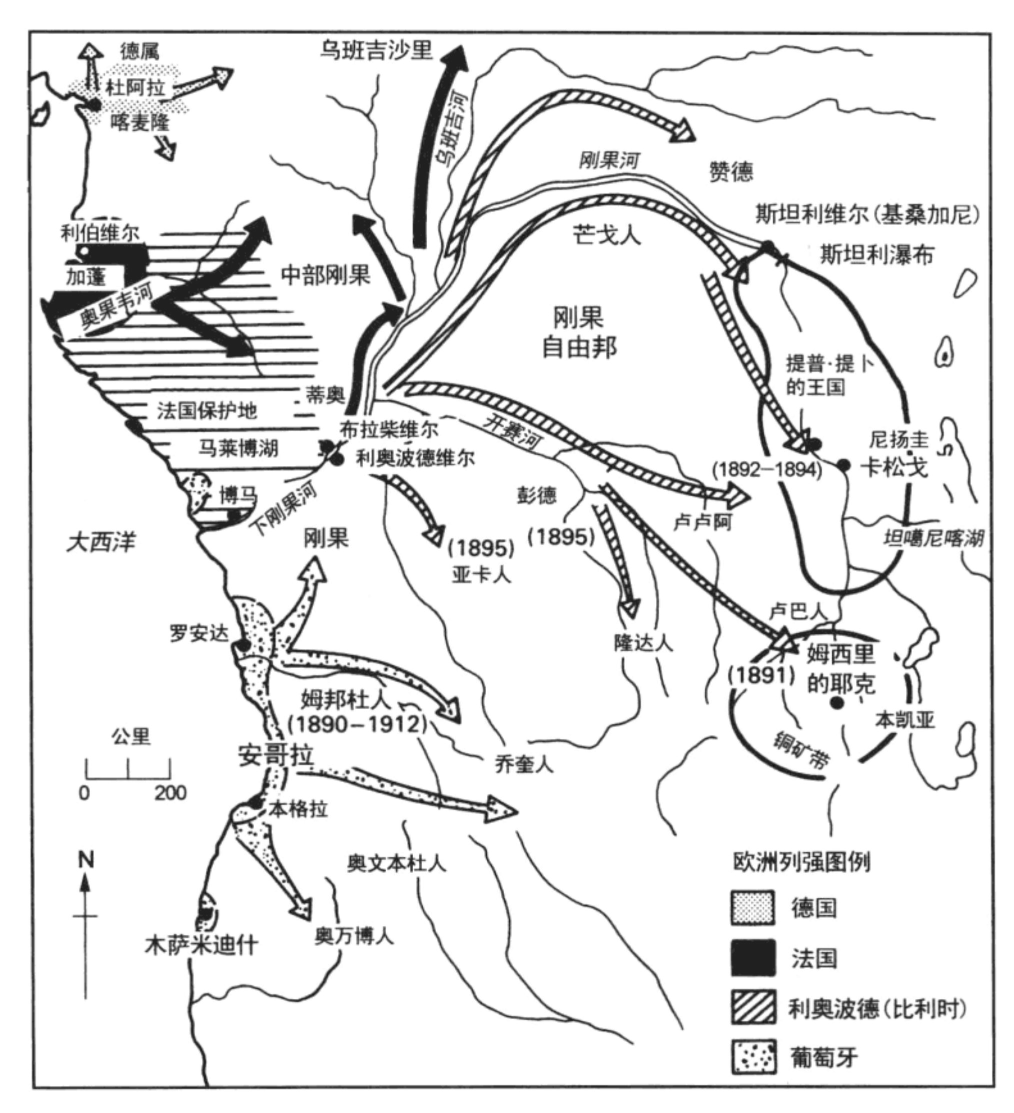


在贝宁的掠夺,1897 年。自中世纪以来就装饰在奥巴宫殿墙壁上的数百件青铜饰品被抢掠一空,这里的青铜饰被卖给欧洲私人收藏者或博物馆,其中,绝大部分青铜饰品最终被存放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者,他在森林沼泽地区组织起防御。贝宁城在 1897 年被攻陷。英国人无情地洗劫了城市,并抢掠了最值钱的珍宝。

索科托哈里发帝国是在 1900—1903 年间遭到袭击的。其帝国组织是一个半独立的埃米尔联邦,这使得英国将军卢格德(Lugard)可以将它们各个攻破。豪萨骑兵的散兵游勇根本就不是卢格德来复枪和机关枪阵的对手,其城墙很容易地就被英国的重炮轰塌。1903 年,只剩下索科托本身还没有被征服,哈里发阿塔希茹(Attahiru)决定有组织地逃亡,向东往今天苏丹共和国方向撤退。

311 最后,英国人在尼日利亚,就像法国人在科特迪瓦一样,其面临的最强有力的抵抗是来自那些小团伙的"非国家状态"的民族,他们没有可被推翻的大型中央权威。因此,英国在尼日利亚东南部森林地区花了数年来清剿抵抗运动。直到 1910 年,所有的伊博兰(Igboland)村庄才最终被迫接受了英国统治的现实。



地图 21.3　“瓜分”时代的刚果盆地与安哥拉。

刚果盆地和安哥拉

法国人对刚果盆地的要求源于一项条约,该条约是法国探险家布拉柴(de Brazza)与位于马莱博湖正北方的迪奥(Tio)酋长马科科(Makoko)于1880年所达成的。布拉柴声称马科科将主权割让给了法国。我们没有马科科对该条约理解的准确记录。如果他确实同意接受某种形式的法国“保护”,可能只是为了在面对利奥波德的代理人斯坦

利的蚕食时能找到一个欧洲盟友。斯坦利,绰号叫“碎石机”(bula matari)。而此时的斯坦利正忙着动用强迫而来的劳力修建一条从博马(Boma)到马莱博湖的道路。斯坦利于1876—1877年间在刚果河流域滥用暴力的恶名为刚果河下游人所熟知。因此,有可能马科科将斯坦利于1879年返回该地区视为对其民族安全的威胁。

312

在1884—1885年柏林会议期间,法国利用布拉柴的条约提出了对刚果河下游的北部领土的要求。19世纪80年代后期,布拉柴又被派到该地以获得更多条约。他利用一小支塞内加尔人军队来推进法国的领土要求,并沿着刚果河下游及其北部支流乌班吉河建立管理点和贸易点。在此期间非洲人并没有组织大规模抵抗,法国也没有征服一个大王国。最初,法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并没有太严重的侵略性。签订条约主要是为了换取金属物品、布匹和酒等小“礼物”,这些条约也没有得到详细的解释,相关的非洲酋长也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的后果。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已经建立了加蓬、中部刚果(Moyen Congo,Moyen的意思是“Middle”,即中部的意思)和乌班吉沙里(Ubangui-Chari)(即今天的中非共和国)等赤道殖民地。当法国的私营公司获准开发该地区之后,非洲人爆发了大范围的抵抗。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他的雇员在刚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区残酷地剥削当地民众并疯狂地掠夺资源。1885—1908年间,利奥波德二世将这块领地作为其私人帝国加以统治。即使是从当时的殖民统治标准来看,利奥波德二世的统治也是过于残暴。1908年,迫于国际压力,利奥波德二世将自由邦交给比利时政府来管理。

法国势力范围的南部，刚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落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之手，且被并入到他的“刚果自由邦”。在这个名称中，“自由”的意思是说它不受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控制。它是利奥波德本人的私人帝国。事实上，它不过是非洲人“自由”地受难于利奥波德这一非洲最残酷的殖民政权而已。该政权的性质及其激发的反抗将在第二十三章加以讨论，这里只是叙述该地区殖民当局的早期建立情况。根据柏林会议和后来的欧洲协议，利奥波德的刚果自由邦包括乌班吉河南部的刚果盆地大部分地区，直至赞比西河流域。利奥波德在这片广袤的赤道帝国统治的潜在对手是东部提普·提卜的斯瓦希里/阿拉伯人和加丹加(即今天的沙巴)东南部地区的姆西里的耶克王国。

提普·提卜的斯瓦希里/阿拉伯联邦统治着卢瓦拉巴/洛马尼(Lualaba/Lomani)地区，该地区占了利奥波德刚果自由邦的三分之一。提普·提卜声称其效忠于桑给巴尔的苏丹，试图从西部阻挡自由邦的挑战。19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英国和德国在东非的行动，桑给巴尔苏丹的统治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很显然，提普·提卜不会获得那些国家的外交保护。1887年，被劝服的提普·提卜推翻了他之前效忠的桑给巴尔苏丹，并接受了自由邦东部省份的总督职位。这种结果避免了代价惨重的战争，对自由邦来说也是极为有利的。该地区利润可观的象牙贸易不再输向桑给巴尔沿海地区。自此，象牙被运向西部，经过自由邦商人之手，并向自由邦上交关税。

这种安排保证了提普·提卜的权力，却不利于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他们不满于施加在抢掠行为上的限制，尤其不满于欧洲商人竞争者的闯入和自由邦混合雇佣军的不断壮大。混合雇佣军，即国家部队，由不同国籍的欧洲人指挥，士兵是从渴望对斯瓦希里/阿拉伯抢掠者进行复仇的当地非洲人招募来的。在提普·提卜1891年撤退到桑给巴尔之前，两者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1892年，当地的比利时官员对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的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进攻。经过18个月极其惨烈的战争，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的抵抗最终被镇压了下去。

313

与此同时，在南部，当双方开始遭遇时，姆西里的耶克王国(也叫加

任干泽[Garenganze]王国)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由于英国南非公司于1890年在本凯亚设置了管理机构,利奥波德开始意识到该地区可能有着丰富的矿产财富。姆西里在意识到这些条约的后果后,便立即篡改了这些条约。当利奥波德的代理人于1891年到来的时候,姆西里不允许树立自由邦旗,并宣布:“我是这里的主人,只要我活着,加任干泽王国就不会有其他主人。”在后来的一次纷争中,一位比利时官员将他击毙。或许有点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将射杀姆西里的比利时人杀掉,该王国没有为姆西里的死而展开报复。王国也出现了饥荒,该地区由于数年的干旱而变得凋敝不堪。姆西里近些年来日益残暴的统治也使其丧失了之前的民众支持。

自由邦官员访问加丹加的一处铜矿并将铜样本带回欧洲后的第二年,加丹加地区在后来刚果殖民地中的高度重要性才得以揭示出来。

从工业发展上说,相较于在非洲其他欧洲殖民者来说,葡萄牙是个弱国。但是,正是这种落后,葡萄牙无法承担丧失非洲殖民地的代价。制造商需要属于自己的保护市场,因为他们无法与其更为强势的欧洲竞争者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葡萄牙的工业家们推动其政府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对安哥拉广袤的内陆地区提出归属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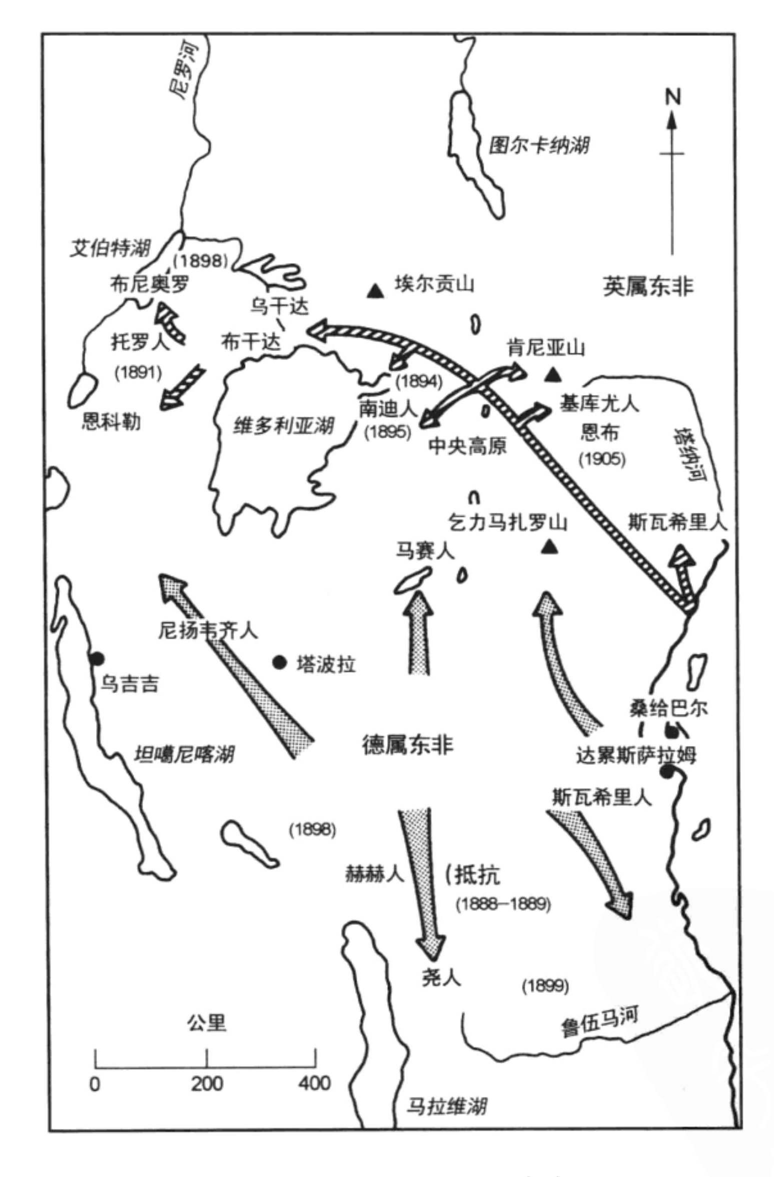
葡萄牙没有财力去派遣大量的、富有战斗力的占领军。为了征服安哥拉,葡萄牙采取了利用当地矛盾的老套路。征伐军常常不过是非洲抢劫团伙,而且是从当地政治竞争者中招募来的,但配有葡萄牙人的枪炮,并由曾被判过刑的葡萄牙人来指挥。巴刚果人、姆邦杜人、奥万博人、乔奎人对葡萄牙的收税官一直熟视无睹,直到进入20世纪。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1890—1895年的橡胶出口贸易的繁荣,它使得内陆非洲人可以从当地葡萄牙商人那里买来枪炮。1910年橡胶贸易的萎缩和1912年颁布的武器出售禁令使得葡萄牙政府得以在整个安哥拉殖民地确立起统治权威。

东非的英国人与德国人

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在东非的政策一直是支持桑给巴尔苏

丹对今天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部分沿海领地的统治。这让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得以自由出入该地区，并可以阻止欧洲竞争者在内陆获得据点：英国政府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然而，到柏林会议前，这一政策不再能确保英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在面临欧洲人的挑战时，苏丹的权力也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德国在1885年宣布坦噶尼喀内陆为其保护领地。虽然狭长的沿海带是从桑给巴尔苏丹那里正式租

314



地图21.4　“瓜分”时代的东非。

借来的，但英国和德国政府还是于 1886 年和 1890 年在“德国东非”的北部和西南部边界上达成了妥协。

俾斯麦将该领地的管理权交付给了一家私营商业公司。该公司的横征暴敛和对劳力的滥用很快就激起了殖民地的激烈抵抗。1888 年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的起义从赫赫人和尧人那里得到了增援，德国殖民主义者几乎被从该领地上驱除出去。在德国政府直接控制该殖民地并带来帝国增援部队后，起义才于 1889 年底被镇压了下去。

在坦噶尼喀内陆，德国依然要应付大规模的抵抗，多年来他们的商队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军事巡逻队的保卫。在坦噶尼喀的中南部地区，

315

458 *BLACK AND WHITE* OCTOBER 10, 1896

IN THE SMOKING-ROOM

BY BARRY PAIN.

"I saw the other day," said the Eminent Person, "in the *Daily Mail* an ccount of a meeting of waiters who are anxious to abolish e tipping system. The public's equally anxious, I ppose—but it will never be done."

"Why not?" asked the Ordinary Man.

"It's too old—too inveterate; the roots have struck so deep. It will never be abolished."

"For my part I can't see why a stupid absurdity canot be abolished merely because it is old as well as stupid. fter all, the public is the master of the business. If the ublic can only be got to understand that it never tips a aiter at all—that it only tips the proprietor—the eleeosynary twopence will go."

"The public can never be got to understand anything," aid the Poet pessimistically.

"It's simple enough. The waiter pays the restaurant roprietor for the holy privilege of waiting in his restaurant. his money which goes to the proprietor is taken from the ps given by the public. The system is an indignity to he waiter and an imposition on the public. The only erson who profits is the restaurant proprietor, and he ets quite well enough without it."

"Don't imagine the way out of it is so easy," said the ournalist. "I have watched that London restaurant roprietor for years, and had faint glimpses of the naughtias the public puts up with it, and always has put up with it, the public presumably can do nothing."

"Excellent!" said the Poet; "a fine, generous, impassioned enthusiasm. It shows where your heart is."

"I do not complain of the food alone. I complain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restaurant proprietor. Any twopenny-halfpenny Italian confectioner's refreshment-room thinks it has a right to stick up a notice that 'Pipes are not allowed in this saloon,' in order to force the customer to take the proprietor's penny packet of pestilence, call it a cigar, and pay sixpence for it. That sort of thing would be impossible if the proprietor did not *know* that he was master of the situation."

"This is very gloomy," said the Eminent Person, "and you tell us that there is no hope—that, even if we abolished tips, we should get higher prices and no advantage."

"I don't say that you would get no advantage—you would get the steady civility of a club servant, which is what you want."

"And what would the waiters get?" asked the Ordinary Man.

"They should get thirty shillings a week."

"Thirty shillings!" said the Mere Boy. "The memory of Loisette and Stokes, the agility of the *pulex irritans*, the temper of Job, the smile of a Venus, the steady civility of a club servant—and all at thirty shillings a week! It's an awful world."

SAID KALID



当时的英国杂志所展现的轰炸后的桑给巴尔王宫，1896 年。

赫赫人对德国的巡逻队和商队展开了成功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一直持续到1898年。赫赫人的首领姆克瓦瓦(Mkwawa)在最后面对失败的时候，选择自杀而非投降。在更远的东南部，尧人一直抵抗到1899年。北部的马赛人被认为是德国人的潜在对手，但他们的权力因为牛瘟的扩散而猝然地遭到分散，牛瘟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经济生活。对东非的早期征服只给德国人带来短暂的喘息机会。在20世纪早期，德国人再次遭到大范围的武装抵抗，这次抵抗被称为"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ising)。 314 315

在1890年的英德条约里，今天乌干达地区被划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将该范围内的管理和开发授权给一家私营贸易公司，即英帝国东非洲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该公司派出卢格德(Lugard)上校在该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王国——布干达内建立起英国人的统治。卢格德成功地说服了卡巴卡·姆旺加(Kabaka Mwanga)接受英国人的统治。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过，姆旺加(Mwanga)是巴干达王廷中基督教势力的首领。穆斯林巴干达及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的同盟者被驱除出去并撤到布尼奥罗王国。卢格德能控制的政府资源有限，因此他与布干达，尤其是基督教贵族结成了牢固同盟。他利用巴干达的征税人发动了一场对布尼奥罗及其穆斯林同盟的斗争，并在托罗(Toro)和恩科勒建立了要塞。 316

英国政府于1894年正式从英帝国东非洲公司收回了该领地的管理权。布尼奥罗的卡巴莱加(Kabalega)在此后的4年内持续展开对英国占领军的游击战争。在1898年最终镇压了反抗前，英国军队内部曾发生了叛变，因此不得不从印度调来军队。被英国击败的卡巴莱加和姆旺加被流放到塞舌尔群岛。巴干达对英国统治的重要支持表现为他们将整个保护领地称为"乌干达"。

1895年，英国从英帝国东非洲公司那里接管了肯尼亚领地，但在早期遭到了沿海斯瓦希里及其邻邦的反抗。"马兹鲁伊起义"(Mazrui rebellion)起源于马兹鲁伊部族内继承权的纠纷，一名当地的英帝国东非洲公司官员干预了这场纠纷，并反对穆斯林主导力量。这次干预很

快就发展成为沿海地区的一场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起义，英国殖民当局花了 9 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场起义之后，英国放弃了利用当地贵族统治沿海城镇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将桑给巴尔和阿曼的阿拉伯人推到了肯尼亚沿海城镇的权力中心。

英国最初在肯尼亚内陆建立统治的时候并没有遭到有效抵抗。英帝国东非洲公司只是将它作为通往乌干达的一条通道。1894 年，南迪人对英帝国东非洲公司的贸易商队发起了短暂的挑战，但被镇压了下去。值得注意的是，英帝国东非洲公司很早就开始从基库尤人那里抢掠劳力和食物。直到修建乌干达铁路和 20 世纪早期欧洲在中央高原上开始定居下来的时候，英国才在整个肯尼亚确立了全面的统治。



第二十二章　工业化、殖民征服与中南部、南部非洲人的抵抗

南部非洲的矿业革命

317

1870 年是南部非洲历史上的转折点。它宣告了一个剧烈变革时代的来临，这种巨变是由于在南部非洲内陆先后发现钻石和黄金而引起的。为开采这些高价值的矿物而出现的工矿业城市改变了南部非洲大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这种变革被历史学家称为南部非洲的“矿业革命”。它开始于 1869—1871 年在今天金伯利(Kimberley)地区有大量钻石的发现。

钻石产地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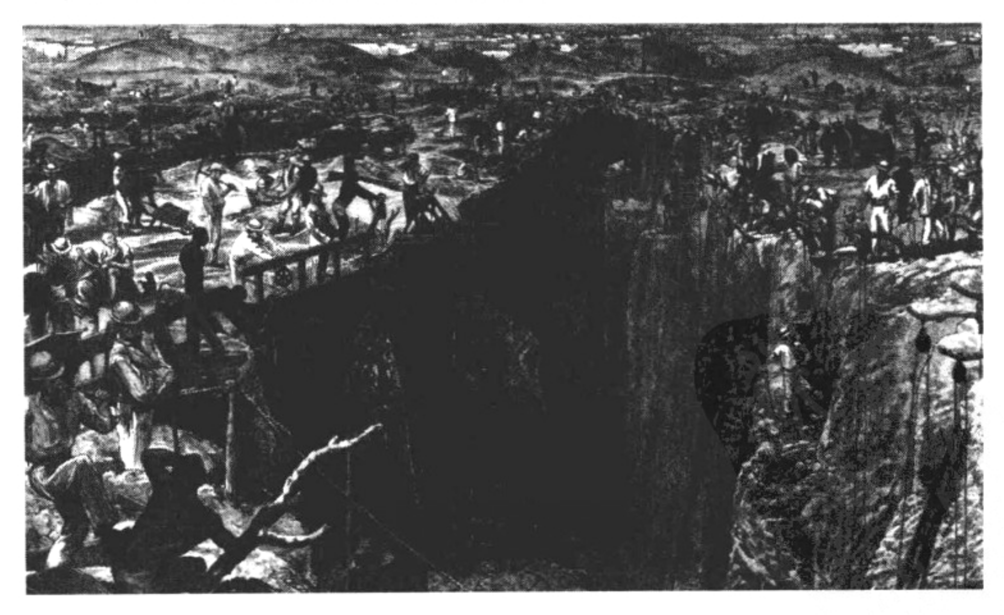
钻石产地位于后来成为英国开普殖民地的北部地区，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共和国、德兰士瓦、当地格里夸人的统治者及其代理人、茨瓦纳人和科拉人都对该地区提出归属要求。整个南部非洲的数千名白人和黑人，还有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矿工和勘察人员都汇集到该地区。英国决定将这块宝地纳入其南部非洲的属地。英国人建立了一个调查法庭以支持格里夸酋长瓦特博尔(Waterboer)。同时，瓦特博尔也在布尔共和国的劝说下向英国寻求保护。这让英国有了口实并立即合

并了这块领地。1871 年末,这块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富产钻石的宝地就成了英国殖民地西格里夸兰(Griqualand West)。

采矿业的发展

白人从一开始就主导了钻石产地的开采。他们有技术和资本的优势,也有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最初,有数千私人“挖掘者”在挖矿井,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白人,但也有一些是黑人。每个挖掘者都在其小“领地”上立桩为界,并与其雇佣的黑人劳工一起挖矿。到 19 世纪 70 年代晚期,主要的钻石矿井都已经成为露天大凹坑,需要由价格不菲的蒸汽机将土运送到地面上,并要抽干凹坑中的水。个体矿主开始让位给公司,因为公司可以筹措必需的资金。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一家名叫德比尔斯(De Beers)的公司开始崛起。这家公司是英国来的移民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开的,他于 19 世纪 70 年代在钻石产地发了大财。到 1889 年,德比尔斯公司已经买断了所有其他竞争者的矿井,因此获得了在金伯利开采钻石的专属权。

318



金伯利钻石矿井,1873 年。图片底部揭示了南非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劳资关系。

由于德比尔斯的垄断，钻石产地上的非洲人被限定为低级劳工。德比尔斯凭借其垄断权来压低工资，寻找工作的人不得不接受工资比之前要低得多的 6 个月合同，住的地方被限制在建有围墙的场地上，与家庭分开，同时被剥夺了另寻其他收入的机会。

矿业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

南部非洲内陆突然崛起了一座有着 3 万人的城市，这对该地区的人们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金伯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市场。该地区的黑人或白人农民对这一机遇做出了积极回应。从短期来看，虽然有很多人富裕了起来，但是最终将会出现对农业用地更激烈的竞争。在布尔共和国，白人地主对其佃户提出了新要求。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整个地区在土地问题上又一次出现了紧张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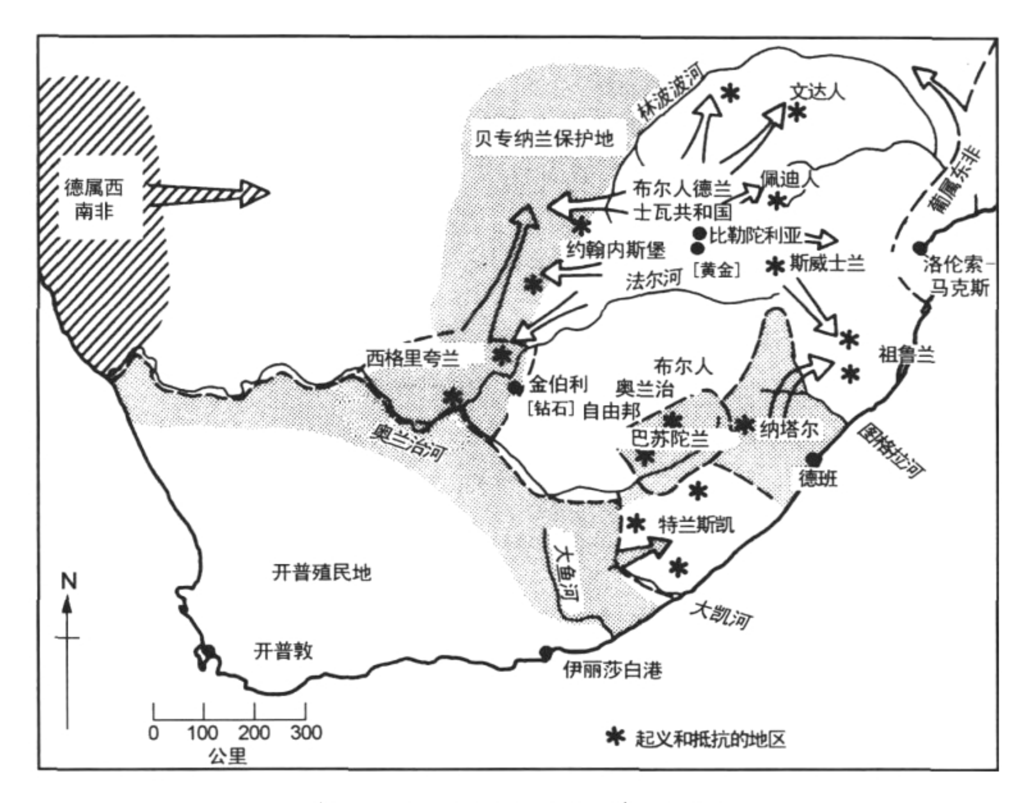
钻石产地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移民劳工的出现。金伯利矿井在 19 世纪 70 年代每年雇佣的黑人劳工达 5 万人。这些劳工来自殖民地、布尔共和国和其他王国。他们所获得报酬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虽然很低，但要比当时南部非洲的任何地区所能获得的收入要高得多。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一把枪。正是这样的高收入吸引了很多人不远万里，徒步来到金伯利。这些人在返回家乡的时候带有枪支，以便抵抗白人对领土的蚕食。

金伯利让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现金经济，无论他们作为农民卖出农作物，还是作为伐木工卖出燃料，或是作为个人出卖劳力。他们带着现金、马车、枪支或从欧洲进口来的布匹、廉价的金属制成品荣归故里。欧洲来的货物宣告南部非洲内陆独立铁器时代终结了。

319

矿业革命的政治影响

矿业革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加剧了 19 世纪 70、80 年代主导该地区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即白人加快推行殖民主义的新时代，白人开始加快其对该地区很多依然保持独立的、非洲人统治领地的控制，并拓展了白人的定居区。与此同时，非洲



地图 22.1 “瓜分”时代的南部非洲。

人的武器装备改善了许多,与之前和白人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相比,现在非洲人在抵抗上也更有组织性。第一个表现是 1876 年东德兰士瓦佩迪人与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佩迪人在一次冲突中将入侵的布尔人赶出了山区要塞,这次冲突几乎让布尔共和国覆灭。

19 世纪 70 年代,殖民野心复活的主要推动力是英国。他们希望将南部非洲白人统治的国家合并为一个新的、英国主导的联邦,联邦的繁荣由于钻石产地的出现而得以保证。该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征服该地区残存下来的独立的非洲王国,尤其是祖鲁、科萨和佩迪王国。这样就可以让白人定居区变得更安全,同时也能让非洲士兵成为白人农场和矿井中的劳力。虽然当地白人对这个计划中的联邦没有多大的热情,但归根结底还是非洲人挫败了英国人的计划。

在与科萨人的第 9 次,也是最后一次战争,即在开普东部边界展开的战争(1877—1878 年)中,英国遭遇到未曾预料到的顽强反抗。到战

320

争结束，科萨人的抵抗力量让当地的殖民当局放弃了为白人定居区夺取更多的科萨人土地的计划。科萨人因此得到大凯河东部事实上的“保留地”。

1879 年 1 月，英国遭遇到其在非洲的主要反对者——祖鲁人。庞大的英国军队分成三个纵队开进祖鲁王国的心脏地带。自 1872 年开始一直统治祖鲁王国的塞奇瓦约(Cetswayo)汇集其全部兵力攻击英军中部纵队，并在伊山德瓦那(Isandhlwana)战役中击败了该纵队。祖鲁人的这次胜利不仅只是一场胜利，它还严重打击了英国人的联邦计划。英国人在击败祖鲁军队并抓获塞奇瓦约前进行了八个月的战斗，且增兵数千人。后来，英国将塞奇瓦约的王国划分为很多人为制造的酋邦，试图削弱祖鲁人的团结。最终，英国人的企图得逞了。英国策划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派系斗争导致了 19 世纪 80 年代祖鲁内战的爆发和王国的分裂。1887 年，祖鲁王国遭受到一场严重的饥荒，并在同年成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

与此同时，英国在 1877 年吞并了破产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并在斯威士人的帮助下于 1879 年击败了佩迪人。1877 年，德兰士瓦的布尔人由于佩迪人抵抗英国的战争而遭到严重的削弱，但他们对丧失独立极为愤恨。1880 年，他们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以防备佩迪人和祖鲁人的进攻，他们开始抵制英国人的税收重负。1880—1881 年，布尔人在德兰士瓦掀起了对英国人的反抗。英国已经放弃了联邦计划，因此在布尔人取得一些早期军事胜利后，英国同意从德兰士瓦撤军，并将德兰士瓦还给布尔当局。

采金业的革命及其影响

1886 年，由于德兰士瓦中部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被发现有大量的黄金，因而南部非洲的矿业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1886 年约翰内斯堡建成后出现的大规模工业发展甚至让金伯利钻石革命都相形见绌。数年内，采金城市约翰内斯堡就从草地上几个帐篷发展成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城市。几乎一夜之间，南部非洲的经济

中心就从金伯利和英国殖民地转移到布尔共和国的心脏地区。

虽然威特沃特斯兰德(有时简称为“兰德”)的工业化规模要比金伯利大得多,但其社会和经济影响是类似的。来自金伯利的矿业资本家和来自欧洲的银行家很快就买断了采掘黄金的专有权,并组建了公司。人们发现大量的金矿石深埋在地面下,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要深层采矿,这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因此到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威特沃特斯兰德的采金业控制在少数几个大公司手中,其中就有塞西尔·罗得斯所有的联合金矿(Consolidated Goldfields)。

劳工招募机构将移民劳力从整个次大陆带到了约翰内斯堡。定期到兰德的劳工移民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白人进一步夺取土地的情况下出现的。同时,对德兰士瓦农村地区的布尔人来说,作为快速发展的农产品市场,约翰内斯堡成为一个新的收入来源。白人农场上的非洲佃户被迫签订更严格的租佃协议。这意味着他们要给布尔地主提供更多劳动力,以换来留在本来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的权利。

321

虽然没有多少布尔人直接从事采金业,但是德兰士瓦从这种新的采金工业中收入颇丰。他们对采矿工业课以重税,并在主要的采矿设备上征收很重的进口关税。德兰士瓦政府之前由于 1876 年的佩迪人



南非德兰士瓦采金工人在地下 6 000 英尺的地方休息,1920 年。

战争都破产了，现在竟能养活一支强大的正规军，布尔人也需要这支军队继续征服北方高地地区。带有惩罚性质的军事远征队在19世纪80、90年代被派到东部、西部和北部，反对那些依然不承认布尔人权威的非洲酋邦。到1898年，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已经从文达人手中重新夺取了南潘斯堡，并对北至林波波河地区享有占有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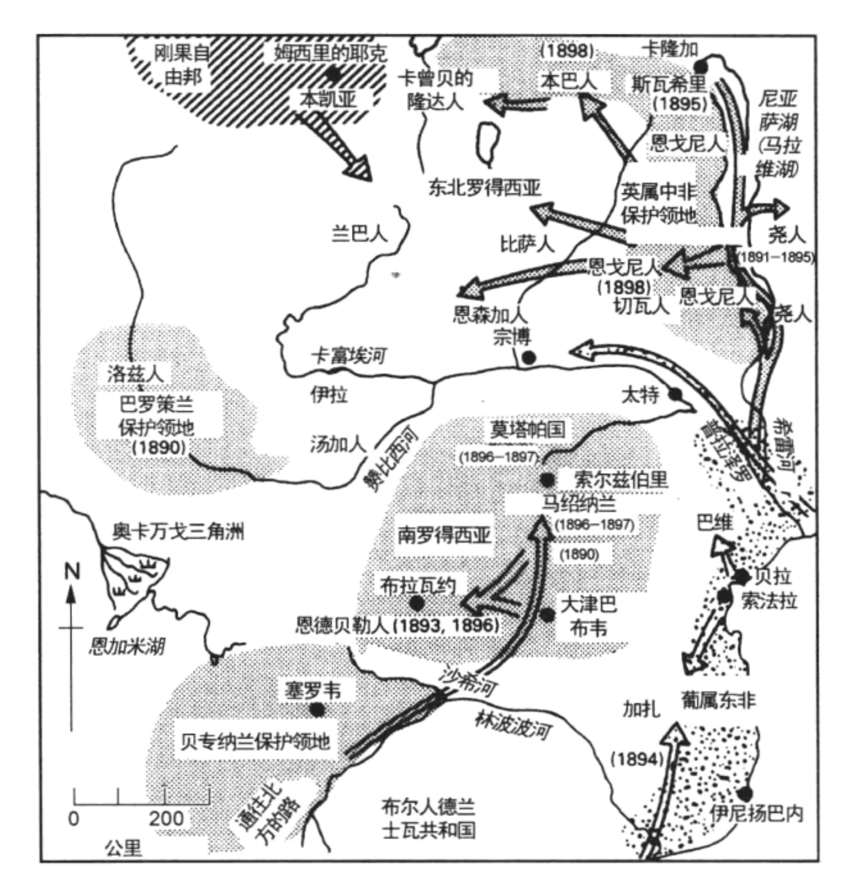
英国“瓜分”中南非洲

吞并贝专纳兰

1884年，德国宣布“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为其保护领地，这也是德国在更宽泛意义上“瓜分非洲”目标的一部分。英国也做出了反应，吞并了贝专纳兰，即开普殖民地北部的卡拉哈里和茨瓦纳地区。茨瓦纳领导人多年来希望获得英国某种形式的保护，以抵抗布尔人对其在德兰士瓦和卡拉哈里沙漠间狭长的沃土地带的不断蚕食。但是，英国在1885年宣布贝专纳兰为其保护领地主要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而非满足茨瓦纳人的期待。英国人的这一行动主要是为了切断德国人通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进之路”而与德兰士瓦布尔人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这条北进之路是出入北方内陆的贸易、劳动力要道，对维持金伯利和开普殖民地的繁荣至关重要。吞并贝专纳兰也能确保英国殖民主义者可以获得中南非洲内陆其他可能的矿产资源。矿业巨头塞西尔·罗得斯应势而上，数年内就制定了夺取资源的规划。 322

津巴布韦的殖民化

罗得斯及其规划的其他投资者曾听说罗兹韦和莫塔帕帝国有过古金矿。他们认为英国私营公司可以利用现代采矿技术将津巴布韦高原变为“第二个兰德”，让它不再是一个屈服于布尔共和国苛刻税收政策的地区。这一计划的主要反对者是主导津巴布韦高原西半部地区的恩德贝勒王国。1888年，恩德贝勒国王罗本古拉（1870年从姆济利卡齐那里继承了王位）陷入圈套，将其王国让渡给罗得斯的一个机构。罗本



地图 22.2 “瓜分”时代的中南非洲。

古拉认为他只是允许少量的探矿者进入王国，但是他所签署的特许状被英国常驻传教士赫尔姆牧师有意错译了。实际上，该特许状让罗得斯的机构可以大展手脚，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开采恩德贝勒王国的矿产。尽管罗本古拉进行了强烈抗议，但英国政府还是承认了这份充满欺诈的特许状，并支持罗得斯新组建的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对津巴布韦的殖民化。

1890 年，罗得斯派出防护恩德贝勒王国南部边界的、全副武装的“先锋队”占领了东部高原上的马绍纳兰(Mashonaland)。随后，先锋队分散开来监管农场，并开始开采前莫塔帕帝国已经废弃的金矿。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古代绍纳矿工要比他们之前想像的厉害得多，剩下的可开采矿井屈指可数。这些早期白人殖民者在分散开来搜寻黄金物

323



横跨大陆的罗得斯，1892 年《笨拙》(*Punch*)的漫画。罗得斯手上拿着电报线。罗得斯最大的抱负是修建一条从开普到开罗贯穿"英属非洲"的铁路。

品的时候破坏和掠夺了很多古代历史遗址，毁坏了有数百年历史的考古证据，且这些证据无法加以复原。

同时，在都城布拉瓦约，罗本古拉试图用任何可以使用的外交策

略来对付在他看来必然会到来的挑战。1893 年,挑战终于来了,罗得斯公司的优势骑兵和马克沁机枪清晰可见。数天内,布拉瓦约就落入侵略军之手。随后,罗本古拉被杀,恩德贝勒陷入混乱。取得胜利的公司抢走了恩德贝勒的所有家畜,并将王国划分为多个白人农场。然而在 1896—1897 年期间,恩德贝勒和绍纳人爆发起义,反抗征服者的压制。在灵媒(spirit-mediums)的鼓励和领导下,恩德贝勒和绍纳人几乎将白人殖民者赶出了王国。但是,罗得斯从开普殖民地召集来支援部队,恩德贝勒和绍纳人的抵抗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然而,19 世纪 90 年代争取自由的斗争激励了 20 世纪 70 年代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324

莱瓦尼卡、巴罗策兰和英国南非公司

自 1864 年洛兹贵族夺取科洛洛之后,洛兹王廷就陷入了长期的王朝纠纷和宫廷政变之中。这种局面直到 1885 年才因鲁伯斯(Lubosi)上台而得以扭转,鲁伯斯最终控制了该王国。他采用了莱瓦尼卡(Lewanika)这一称号,意即“征服者”。

1889 年,莱瓦尼卡寻求英国的保护(英国人称其王国为“巴罗策兰”[Barotseland]),其后,该王国被宣布为贝专纳兰保护领地。英国为茨瓦纳人提供保护,以防受到布尔人的进攻,然而并不干涉茨瓦纳人的内部事务。莱瓦尼卡则是为了应对恩德贝勒人持续的侵略威胁而寻求保护的。他也认为王廷中有英国人的存在会在王位竞争中树立威信并增强其个人地位,也希望英国能在建立学校、教授其臣民识字和技能方面提供帮助。1890 年,罗得斯的代理人洛赫纳(Lochner)答应所有这些要求,每年支援 2 000 英镑;作为回报,罗得斯获得了在该王国采矿的特许。莱瓦尼卡认为他所面对的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而非一个英国私人公司,因此签署了这项特许状。但是,他很快就醒悟了过来。虽然恩德贝勒人的权势最终被英国南非公司压制了下来,但是这发生在 1893 年恩德贝勒人再一次侵略巴罗策兰之前。1897 年前,英国南非公司没有给莱瓦尼卡一分钱,没有派过一个哪怕是临时性的定居者,也没



里通加莱瓦尼卡二世(1878—1884 年,1885—1916 年在位)在洛兹首府利亚瑞会见英国官员,1897 年 10 月。英国南非公司的科因顿少校([Robert Coryndon]后来就任西北罗得西亚的第一位常驻代表)坐在正中。莱瓦尼卡坐在少校右手边,头上戴着帽子,手中拿有蝇拂。他的大儿子,也是他的继承人,利提亚(Litia),即后来的国王耶塔三世(King Yeta Ⅲ)在图片的最左边。

有资助过技工学校。然而,巴罗策兰是南部非洲极少数以和平方式被殖民化的地区之一,白人的定居也没有导致洛兹人丧失土地。

中非保护领地和东北罗得西亚

325

1889 年,英国政府正式宣布该地区为中非保护领地(Central Atrican Protectorate),英国人在 80 年后将该地区更名为尼亚萨兰。(Nyasa 是当地非洲语"湖"的意思。因此,该英国殖民地被称为尼亚萨湖[Lake Nyasa]和尼亚萨兰,该殖民地独立后更名为"马拉维"。)英国政府的行动是对葡萄牙人试图阻止英国商人进入尼亚萨湖和希雷河流域而做出的反应。塞西尔·罗得斯的朋友兼同事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被任命为该保护领地的总督。

约翰斯顿的治理要应对非洲人的坚强抵抗。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

大部分时间里，约翰斯顿忙于军事镇压，先是尧人(1891—1895年)，后是斯瓦希里人(1895年)、切瓦人(1895年)和恩戈尼人的抵抗(1895—1899年)。约翰斯顿所发动的大部分战争都是以“压制奴隶贸易”之名而展开的。因此，约翰斯顿确实也得到了希雷河流域尼扬加人的热心支持，尼扬加人多年来一直遭受尧人奴隶贩子的侵袭。但是，约翰斯顿在中非保护领地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对该地区非洲人政权所发动的粗暴的军事征服。他依次让每个统治者签署臣服条约，并要求他们缴纳税赋。那些对这种“保护”方式进行拒绝的统治者将面临打击，要么死亡要么缴纳税赋。当时的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将约翰斯顿的要求恰当地比喻为公路抢劫者的盘剥：“条约或是镇压；要钱还是要命！”根本上说，是马克沁机枪、大炮、湖上的战船和印度来的300名锡克教徒组成的一支精锐职业军队，很好地确保了英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很多被击败的马拉维抵抗力量的领导人选择自杀而不愿成为英国人的俘虏。

约翰斯顿在邻近的“东北罗得西亚”地区充当罗得斯英国南非公司的代理人。罗得斯给约翰斯顿提供1万英镑的“平叛金”，以支持他在尼亚萨兰的活动。作为回报，约翰斯顿为了支持罗得斯的利益，派遣制定条约的机构进入今天赞比亚的东部、中部地区。英国南非公司在这些地区的统治主要受到班巴人(Bemba)和恩戈尼人的抵抗。在与这些抵抗力量作战的时候，罗得斯的公司得到了在尼亚萨兰的英军的支持。

在与英军作战的初期阶段，装备精良的班巴人还能坚持得住。但是，班巴人的主要首领的财富和权威日益消耗殆尽。这种情况是由英国和德国在尼亚萨兰和坦噶尼喀的征服所造成的，英国、德国的征服造成了长途商队贸易的中断，而班巴人过去一直是以侵掠这些商队为生的。班巴人内部的领导权危机更是进一步地削弱了其力量。最后，在1898年一位权力竞争者死亡之后所造成的混乱中，一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自封为王，并欢迎英国南非公司的军队进入班巴首府。

与此同时，在东南部地区，恩戈尼人维持了两个世代军事优势的武器无法与英国人使用的马克沁机枪相匹敌。在1898年的战争中，英国的机枪扫杀了数千恩戈尼士兵。从邻近的尼亚萨兰发起攻击的时候，

英国宣布要让该地区不再是个残暴的侵掠国家。然而，他们为白人夺得了大片土地，却强迫残活下来的恩戈尼人成为苦力，没收了他们的牲畜并要求他们缴纳税赋。

莫桑比克的征服与抵抗战争

326

莫桑比克对葡萄牙殖民者有着广泛的、长期的反抗斗争历程。葡萄牙人面临着南部加扎帝国、赞比西陡峭的山麓地区的巴维帝国和赞比西流域数量庞大的普拉佐人以及他们与当地通加人、曼甘加人和切瓦人结成的同盟的反抗。在北部，抵抗由尧人、马孔德人(Makonde)和马库阿人(Makua)领导，多年来与沿海商人的象牙和奴隶贸易使得他们装备精良。在19世纪80、90年代，那些与欧洲、果阿(Goan)商人有着最早联系的人在抵制葡萄征税上最为坚决。他们手中有枪，也一直反抗当地的葡萄牙官员的统治。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赞比西流域的普拉佐人身上，很多普拉佐人的城镇就是用大炮进行防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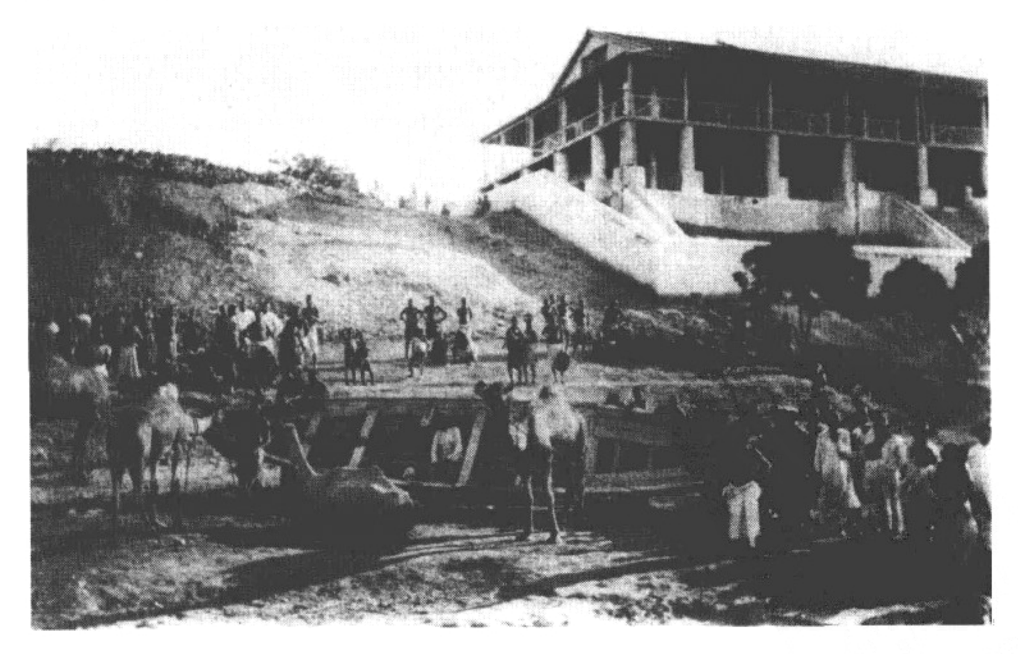
最大的加扎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走向衰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戈维亚(Gouveia)的戈隆戈萨(Gorongoza)的普拉佐人的扩张部分地导致了加扎统治者恩甘甘亚勒(Ngungunyane，也作Gungunhane)在1889年将其都城向南迁移。然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加扎族长(indunas)的权威由于金伯利、约翰内斯堡和纳塔尔的劳力迁移而遭到削弱。这不但让国家丧失了大量潜在的兵源，还失去了大量的牧民和狩猎者。山加涅(Shangane)年轻人在加扎境外挣取收入，因此他们回来的时候就不再依靠长辈给他们提供嫁娶的彩礼。

恩甘甘亚勒预见到了葡萄牙人的威胁，便寻求与英国结盟，但他的要求为英国人所忽视。1891年，英葡条约将加扎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纳入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该条约是欧洲"瓜分"协议的一部分，欧洲政府在非洲大陆划分殖民地边界而根本不考虑非洲人的利益与要求。1894年，加扎采取攻势，袭击了葡萄牙人的洛伦索-马克斯(Lourenço Marques)港。但是，虚弱的加扎无力应对葡萄牙人的报复。在两场决定性的战役之后，山加涅军队被击败，恩甘甘亚勒被俘。

在此过程中，葡萄牙征服军由于使用马克沁机枪而占尽优势。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其他地区的统治主要依靠当地非洲军队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反抗战争与其说是“葡萄牙人”的征服战，还不如说是一系列非洲国家间的战争，或是非洲“内战”，只不过是葡萄牙人加以利用和指挥而已。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普拉佐人卡尼扬巴河(Kanyemba)和玛塔肯亚(Matakenya)将葡萄牙人的统治扩展到恩森加(Nsenga)流域，并在赞比亚中部的宗博重建了葡萄牙人的贸易点。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葡萄牙人利用普拉佐人的宿怨挑起了他们的内部争斗。例如，1888 年葡萄牙人曾利用戈维亚的 1.2 万人的军队来征服其普拉佐人竞争者马西吉雷(Massigire)。1901 年，有 6 000 名恩戈尼人雇佣军被用来反对太特北部马坎加的普拉佐人。莫桑比克北部地区的抵抗时间最久，尧人只是在 1912 年禁止将武器出售给非洲的禁令执行之后才最终被镇压了下来。

327



20 世纪初赞比西地区的太特的交易中心。在莫塔帕帝国时期是个斯瓦希里贸易村庄，16 世纪被葡萄牙人夺去。在今天，它依然是赞比西河流域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葡萄牙人的非洲雇佣军、招募来的新军和同盟者都利用长期存在的国家间宿怨而展开行动或趁机抢掠。葡萄牙人在这些当地势力间的存在长达数个世纪。葡萄牙人只是当地众多势力之一而已。他们的统治最终都遭到了挑战。没有什么特殊的缘由认为，葡萄牙人最终会主导整个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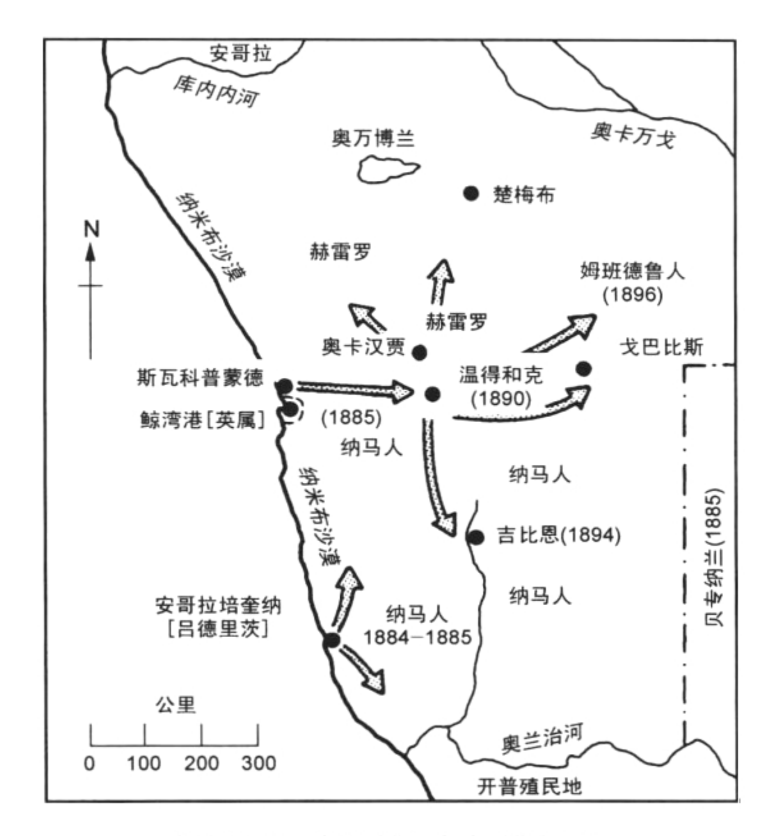
纳米比亚的征服与抵抗

纳米比亚中部，即从西部的纳米布沙漠到东部的卡拉哈里沙漠之间，是中部高原地区的干燥草原区。对纳米比亚人来说，这片区域虽然由于过于干燥而难以从事常规耕作，但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畜牧和狩猎资源。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该地区一直充斥着纳马和赫雷罗畜牧民、狩猎者/商人之间的激烈冲突。19 世纪中期，英国商人和德国传教士渗透到该地区，纳马人和赫雷罗人在西方人的贸易上展开竞争，出口牲畜、象牙和鸵鸟毛以换取枪支和弹药。

1884 年，德国宣布从奥兰治河到库内内(Kunene)河之间的沿海地区为德国的保护领地。这是德国人在非洲建立殖民地而处心积虑采取的新政策的一部分。德国人宣称这是为了保护德国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说法而已，尤其是一个名叫吕德里茨(Lüderitz)的商人在 1883 年已经在安哥拉培奎纳(Angra Pequena)建立了贸易站。吕德里茨宣称他用枪支、酒和少量的现金从当地的纳马酋长那里"买"了大片沿海土地。

1890 年，德国人进入中部高原地区，并利用纳马人与赫雷罗人之间存在的宿怨而展开活动。赫雷罗人与德国人签署了一份保护条约，以换取德国人在赫雷罗人与纳马人之间长期的领土冲突中支持赫雷罗人。纳马领导人亨德里克·维特布伊(Hendrik Witbooi)太了解德国人威胁的本质了。他写信给赫雷罗酋长马赫雷罗(Maherero)，警告他与德国人的新联盟：　328

> 您认为您在我被灭了之后会维持您独立的酋长地位……但



地图 22.3 德国对“西南非洲”的征服。

是,我亲爱的酋长,您将永远悔恨您将治理国家的权力交付给白人这一行为。毕竟,我们的战争并没有您认为的那样严重……但是,您所做的这件事,即向白人政府臣服,将是您自己给自己带来的负担。您自称为大酋长,但一旦您处在他人的控制之下,您不过是个附属酋长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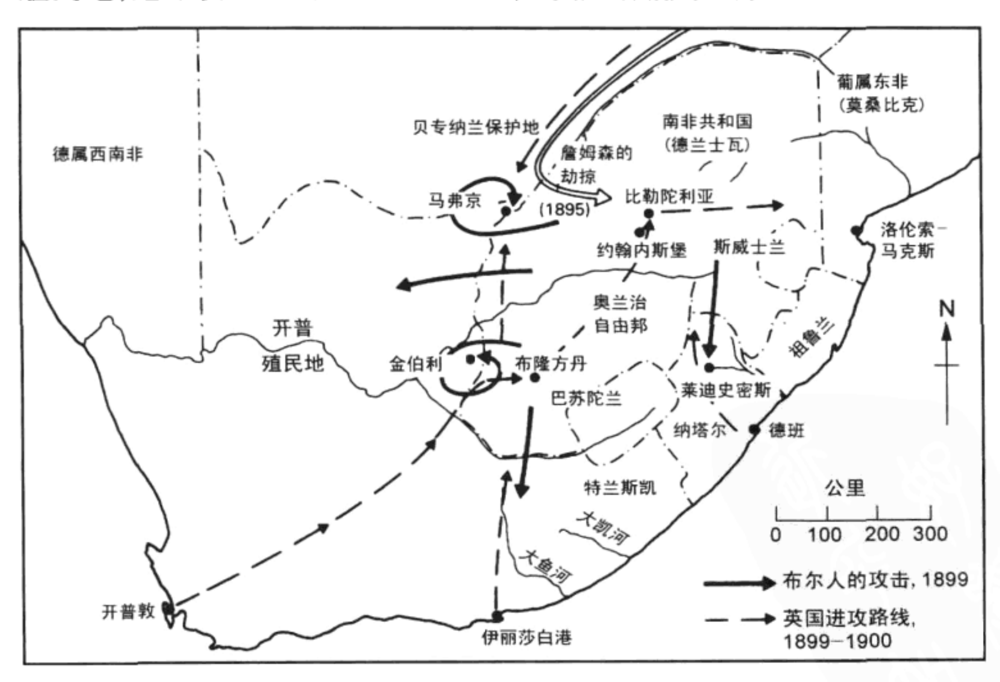
——*The Diary of Hendrik Witbooi*, Van Reibeeck Society, Vol. 9, p. 77

德国指挥官在温得和克(Windhoek)建立了军事基地,并发动了对维特布伊家乡吉比恩(Gibeon)的攻击。但是,维特布伊将其军队从吉比恩撤离,并对德国供给线发动成功的游击战。德国人被维特布伊达围困了数月之久,直到 1894 年强大的海外支援部队到来。虽然纳马人

随后在军事上被击败，但德国还是被迫允许他们持有武器。

与此同时，赫雷罗的权势由于马赫雷罗的死亡及随之而来的继承纠纷而受到削弱。德国人也验证了维特布伊的警告。他们开始利用赫雷罗的局势，在赫雷罗都城奥卡汉贾(Okahandja)建立军事要塞，并宣布承认塞缪尔·马赫雷罗(Samuel Maherero)为赫雷罗酋长。随后，德国人漠视新酋长的权威，开始在温得和克地区为白人定居者划置大片土地，包括中部高原地区的大部分好牧场。东部赫雷罗人和姆班德鲁人(Mbanderu)1896年抵抗德国人税赋和劳役的起义遭到德国的镇压，领导人也遭到惩治，德国人也为白人定居者夺取了更多的土地。 329

在19、20世纪之交，德国人将其势力拓展到“西南非洲”的大部分领地，除了最北部的奥万博兰(Ovamboland)。1896—1897年牛瘟的传播摧毁了纳马人和赫雷罗人的畜牧经济，这也让德国人在1896年之后的快速扩展更为便利。然而，德国试图将整个地区变为白人定居的殖民地，这激发了一场1904—1907年的非洲抵抗大战。



地图22.4 南部非洲战争，1899—1902年。

南部非洲战争(1899—1902 年)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论述过,兰德采金业的出现给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带来了大量财富。大部分采矿业依然控制在欧洲"外人"之手,其中绝大部分是英国人,他们有技术和资金来开发深层采矿。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Kruger)对采矿业执行一项有计划的税收政策,以便给其政治支持者,即农村布尔人(他们此时开始自称"阿非利堪人"[Afrikaners])带来实惠。克鲁格也要确保重点支援工业如给约翰内斯堡炸药制造业和铁路修建提供水源,这些工作都是由布尔人垄断的。这些工作要那些欧洲"外来人"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缴纳高额经费。因此,克鲁格政府的政策给英国人主导的采矿工业增加了很大的成本。同时,那些欧洲"外来人"也没有政治权利。这是因为,如果让这么多的欧洲"外来人"参加投票,他们可能在数量上超过了布尔人本身,因此会控制这个国家。

330

1895 年,此时已是开普殖民地总理(1890—1896 年在任)的罗得斯,炮制了一个用武力推翻德兰士瓦政府的阴谋。他希望约翰内斯堡的欧洲"外来人"掀起叛乱,然后将英国南非公司的警察从"罗得西亚"经邻近的贝专纳兰派到德兰士瓦。但是起义失败了,詹姆森(Jameson)领导的侵略部队也全军覆没,很多军官都被投入监狱。詹姆森的侵略在布尔共和国内和开普殖民地的阿非利堪人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英情绪。罗得斯被迫辞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建立了军事联盟,反对英国人对其独立的进一步威胁。

罗得斯和私人资本家的失败让英国政府开始进行直接干预。德兰士瓦将与德国建立一个反英联盟是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英国势必不会让兰德的金矿落入其他欧洲竞争者之手。1896—1899 年,英国与德兰士瓦关系紧张,英国要求克鲁格进行有利于英国主导的采矿工业的改革。尤其是英国要求欧洲人要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为了实现英国人的要求,英国大军压境。克鲁格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决定先发制人。他在 1899 年 10 月宣布开战,布尔突击队迅疾越过共和国的边境进入



狩猎羚羊后的一群布尔人；1899—1902 年南部非洲战争期间战斗中的间歇。

英国开普和纳塔尔殖民地。

英国在早期遭到难堪的失利，但他们运来的军力达 50 万。到 1905 年左右，英国已经夺取了布尔人的主要城镇。克鲁格流亡到欧洲，但他的突击队领导人在后来的两年继续开展游击战。他们只是在英国推行"焦土"政策之后才被迫投降了。布尔人农场遭到焚烧，其家人也被投入到骇人的"集中营"，数千妇女和儿童死于疾病。这是一段布尔人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南部非洲(或英布)战争期间，布尔妇女和儿童遭到的虐待强力地激发了 20 世纪前期阿非利堪人民族主义的出现。

331

在战争期间，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白人战争"，不涉及非洲人。战争在本质上决定着谁将统治南部非洲，是英国人还是布尔人。由于担心非洲人有了枪炮会射杀白人，非洲人会在战后不再屈服，双方都试图采取相关的行动。然而，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卷入了战争，或成为牺牲品或成为参与者。焦土战术让非洲人大受其害，也有数千非洲人死于集中营。他们被英国军队和布尔突击队雇佣为支援人员，为英国

人和布尔人充当劳工、货车司机、侦查员和通信兵。他们种植的大部分粮食也被供应给双方军队。一些非洲人也拿起武器支持英国人。很多非洲人认为这种支持会得到英国人的回报。他们占领了布尔人废弃的农场，并期望英国人将会确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其中很多农场都是早期布尔人从非洲人那里夺走的。他们认为英国人的胜利将会确保黑人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获得更平等的地位。

然而，非洲人的信任与期待沮丧地落空了。战后，英国人主要关注于安抚布尔人，建立起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统一立场与相互理解。1910 年，前布尔共和国和英国殖民地都加入单一的"南非联邦"。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白人在南非的安全和持续存在。



第二十三章　帝国的巩固：早期殖民统治

原材料与市场

332

我们在第二十一章曾论述过，对在非洲的欧洲帝国来说，有两个主要的经济动因：一是需要给制成品找到新市场；二是为欧洲工业寻找原材料。从理论上来说，这两者是有机统一的。非洲人生产原材料，并出售它们以换取现金，而其中大部分现金都被用来进口制成品。然而，欧洲政府、商人和殖民主义者滥用权力去从事暂时的征服，追求短期收益。他们在非洲大陆抢夺土地和原材料，而几乎什么都不给非洲。

特许公司

欧洲政府在非洲很多地区都利用特许公司来开拓其新建立的帝国。借助这一体制，欧洲私营公司得到授权，以欧洲相关各国之名进入非洲大片领土去开发和殖民，风险自负。这是欧洲的“廉价”殖民措施。我们已经论述过英国曾在尼日利亚（皇家尼日尔公司）、“罗得西亚”（英国南非公司）、东非（大英帝国东非公司）都采用过这一做法。特许公司在德国、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地开发的早期也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从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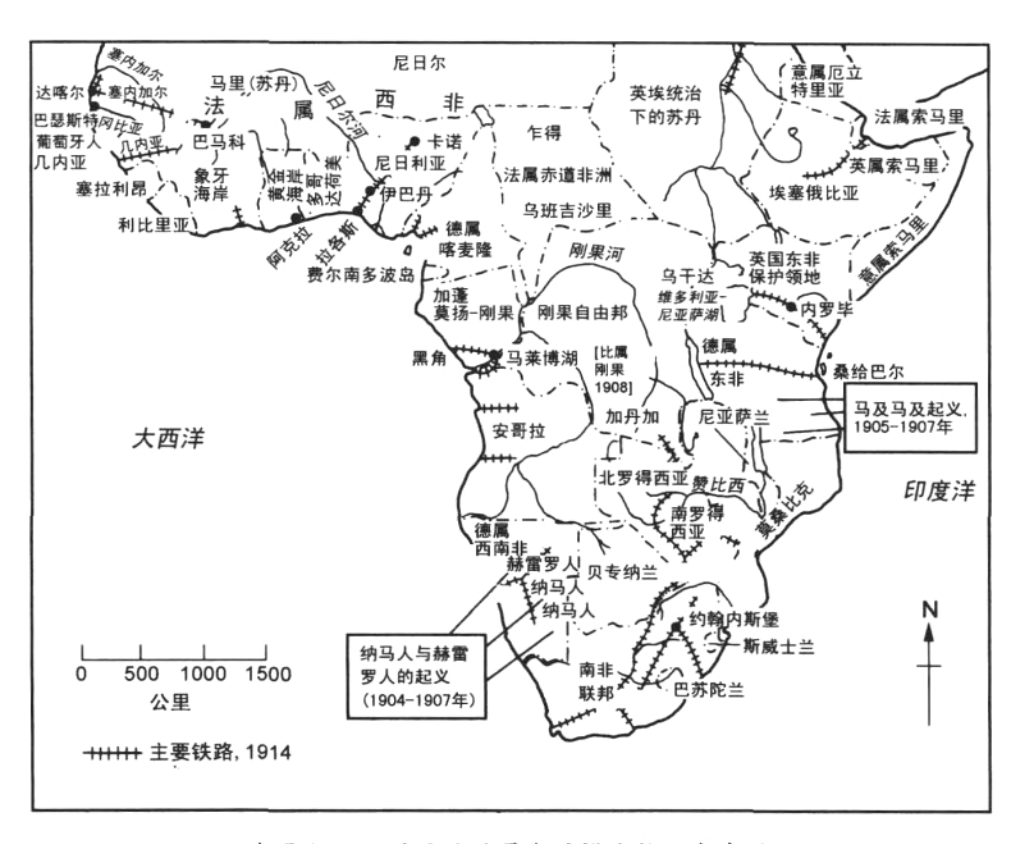
早期殖民地管理者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一位由抬轿(Machila)抬着的尼亚萨兰的邮政局长,同时也是收税官,身旁是其狩猎战利品,1891 年。

论上来说,公司将会“开放”领地,建立一个基础性的管理机构,投资于铁路,并将非洲人带入到商品经济中来。这样就会逐渐地为欧洲制成品建立起市场。但是在实践中,这一体制很容易被滥用,主要因为这是被纯粹的短期私人利益所推动的。在行政管理、公路和铁路上,很少有长期的投资。取而代之的是,公司热衷于暴力性地剥削民众,开采自然资源。然而,非洲持续不断的抵抗使得早期高利润率难以为继,很多公司都破产了。在非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除了莫桑比克,特许公司的行政管理已经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让渡给欧洲帝国来直接管辖。这种体制在刚果河流域,也就是在刚果自由邦和法属赤道非洲地区,滥用最为严重。

333

刚果自由邦

利奥波德宣布所有未被当地居民占有或耕种的土地都是“闲置地”,这样的闲置地都属于他及其自由邦政府。在人口稀少的森林地区,狩猎、采集和轮垦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该领地里土地众多。利奥波德将一部分这样的“闲置地”留为己用,其余的土地则租给



地图 23.1　殖民统治早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特许公司。例如，一家比利时公司就被获准租借 8 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回报，该公司要修建一条从沿海到马莱博湖的铁路。另一家加丹加公司租借了三分之一的“闲置地”，并获得了占国土四分之一的东南部矿产专属开采权。作为回报，自由邦政府将抽取该公司利润的三分之一。 334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早期，在热带森林地区特许开发的主要对象是野生橡胶树。自行车与汽车在欧洲和北美的普及促进了世界橡胶市场的繁荣，这种繁荣在 1905—1910 年间东南亚种植园出现后才开始出现转折。公司代理人将其私人武装——由之前为奴隶的非洲人所组成——带到刚果盆地，并强迫当地人到森林里收集橡胶。1895 年，一份英国报纸中曾有一篇报道，一名在刚果工作的美国牧师 J. B. 墨菲(Rev. J. B. Murphy)做了如下描述：

它让人们陷入一种绝对的绝望之中。该地区的每个城镇每周日都要给专员总部送来一定量(的橡胶)。橡胶的收集是强迫性的。士兵们将民众驱赶到灌木丛中去,如果有人反抗就会遭到枪击,砍下左手并作为战利品带回给专员。士兵们根本不关心枪击的是谁,他们通常枪击的是贫穷无助的妇女与无辜的儿童。这些手,即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手排列在专员的面前,专员再进行计数,看看士兵们是否浪费了弹药。收集到的橡胶按照每磅1美元的佣金支付给专员,因此,专员为了其利益,竭尽其所能……

我曾去过内陆地区并看到自由邦为此不平等贸易而犯下的暴行……让我说一件事情以说明这种不公正贸易给当地民众造成的影响。有一天,一个负责洛利法(Lolifa)邮政的自由邦下士绕着城镇收集橡胶。他遇到一名贫穷的妇女,她丈夫外出捕鱼去了。下士问道:“你丈夫在哪儿?”妇女回答道:“不是已经给你准备好橡胶了吗?”下士说:“你撒谎!”于是抬起枪,对着妇女头部就是一枪。不久后,她的丈夫回来了。得知其妻子被杀,他就带着橡胶径直走到下士跟前,问下士为什么杀他妻子。后来,这个不幸的人举起枪毙了那个下士。士兵们跑到自由邦总部,并对事情的经过做了歪曲的陈述。结果,专员派出大队人马以支持士兵们的权威。城镇遭到洗劫、焚烧,造成巨大伤亡。去年(1894年)11月,博希拉(Bosira)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因为那里的人们拒绝上交橡胶,我从一名自由邦官员那里获得权威数据,至少有1 890个人被杀。

——《泰晤士报》,伦敦,11月18日,1895

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都暴露于欧洲公众的面前,但在后来的十年内并没有对此作出什么反应。与此同时,非洲人对这种粗暴、残忍的剥削竭力进行反抗。背井离乡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反抗形式,虽然这会造成非常艰难的状况,正如里弗·墨菲所解释的那样:

335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被描述为一个阴险的人，其橡胶圈正在缠压着刚果人（《笨拙》漫画，1906 年 11 月）。

斯坦利时代两个最为繁荣的城镇位于斯坦利湖[①]的金塔墨（Kintamo）和金沙萨，现在已经繁荣不再，当地人都已跑到法属刚果去了……很多人为了躲避自由邦的苛政，都已经离开了大河区

① 即马莱博湖。——译者注

> 并逃进了内陆地区……曼土姆巴湖(Mantumba)、伊雷布(Irebu)、洛克拉拉(Lokolala)地区的人们以及所有的莫班吉(Mobangi)城镇都已站在法国一边……如果没有压迫,人们是不会逃跑的,因为这将意味着饥饿,意味着家园将留在自由邦那里。跑到法属境地意味他们将成为无家可归者,成为饥饿的流浪者。甚至是这样,自由邦也不让他们消停;自由邦听说他们晚上会过来回到老房子里去拿吃的,就在河上的独木舟打埋伏等着他们,一声令下,士兵们就会将所有抓获到的人枪杀掉。就我所知,他们一晚曾枪杀过7个人。

336 渐渐地,人们开始转向武装抵抗。刚果河下游地区的人们从沿海商人那里搞到了来复枪,并在与自由邦部队的多次交战中学会熟练地使用这些武器。

到20世纪早期,公开的反抗越来越多,殖民当局的权威处在崩塌的边缘。非洲人的不断抵抗,再加上国际社会对该体制的谴责以及橡胶价格的下跌,共同促使利奥波德二世在1908年放弃了其私人投资。1908年,利奥波德将自由邦交给并不情愿接手的比利时政府。比利时政府结束了这种体制的极端滥用,但是诸多欧洲私营公司依然控制着该领地的绝大部分资源。例如,联合矿业公司(Union Munière)继续把持着加丹加铜矿的垄断权。1911年,英国利弗兄弟(Lever Brothers)公司(即后来的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获得了一块75万公顷土地棕榈产品的专卖权。

法属赤道非洲

加蓬、中部刚果和德属喀麦隆境内的江河流域也存在相同的特许体制。法属赤道非洲多达70%的领地被分划给41个私营特许公司。公司代理机构袭击森林居民,抓获人质,并强迫居民上缴固定配额的象牙和橡胶。成千上万的人被迫作为廉价运输劳力,给在乍得的法国远征军运输供给品。在从沿海黑角(Pointe Noire)到马莱博湖北滨布拉

柴维尔的铁路修建中也曾使用过劳役。强迫劳动营的生活与工作条件骇人听闻；单铁路工程一项，估计就有1.6万个非洲工人死于暴行、疾病或营养不良。非洲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在早期殖民统治的数十年内骤然下降。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该地区的人们遭受的苦难可能要比整个奴隶贸易时代所遭受的苦难还要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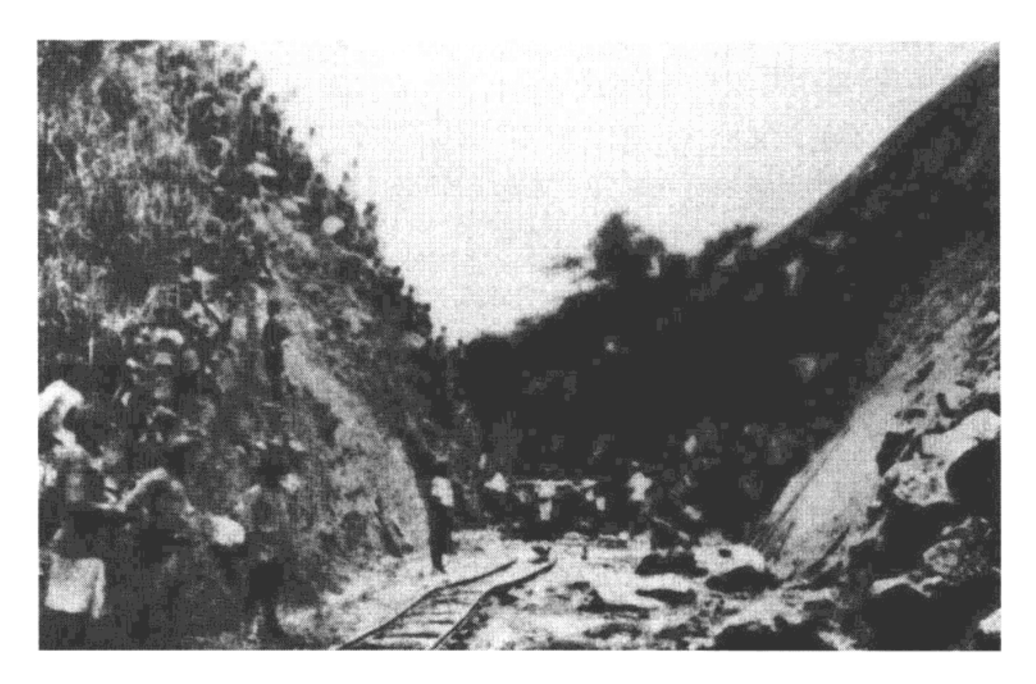
西非的农民生产与铁路

在早期殖民统治时期，西非撒哈拉以南的草原与森林地区是非洲最能对新市场做出反应的地区。欧洲代理机构强征劳力、掠夺森林资源的暴行在该地区的某些地方极为普遍。例如，它们从科特迪瓦森林里掠夺橡胶与硬木，一直到1915年都遭到非洲人的武装抵抗。然而，从总体上说，该地区的原材料生产主要是非洲农民来做的。他们比起欧洲种植园主来说，是效率更高的生产者，欧洲种植园主主要依赖于使用缺乏效率的强迫劳动。在法属、英属地区，非洲农民被"鼓励"抛开粮食作物，转而为欧洲市场种植经济作物。出口产品得到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殖民当局的现金税款、内陆到沿海地区的铁路建设以及非洲人的倡议。

花生与棕榈油是19世纪前，同时也是殖民时期的主要出口作物。随着1905年尼日尔河上游地区从达喀尔到巴马科铁路的修建，塞内加尔的花生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塞内加尔农民季节性地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冈比亚河流域去种植作物，并将其卖给下游沿海地区的巴瑟斯特(Bathurst，即今天的班珠尔)。虽然法属殖民地达荷美的棕榈油出口从来没有恢复到其前殖民时期的规模，但棕榈油依然是尼日利亚东部地区伊博兰的主要出口产品。

337

黄金海岸(加纳)将可可作为出口产品，是非洲本地一个极好的例子。可可最初是1879年由一位名叫特提·克瓦西(Tetten Quarshie)的金属制造者从费尔南多波(Fernando Poo)带来黄金海岸的。他在阿克拉(Accra)北部的阿夸平(Akwapim)山脊上建立了一个可可苗圃。到19世纪90年代，千棵可可幼苗被卖给了当地的农民。黄金海岸的



20 世纪早期多哥阿塔克帕梅的铁路建设。主要依靠大量的劳动力而非建筑机器，工人（图片中的背景）是用肩膀来搬运铁轨的。

英国总督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苗圃，但是内陆的可可种植主要还是依靠当地农民。勤劳的农民从阿夸平山脊向北迁移到相对来说开发滞后的森林地区。在那里，农民们从当地阿肯酋长那里买来土地，并发展出一种有效的、由农民运作的可可种植园体系。出售可可所得的现金，除了缴付税款外，都花在进口制成品、当地房舍修建、公路桥梁以及教会学校里的儿童教育上。1914 年，黄金海岸已经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可可生产地区。

与此同时，英国也在推进尼日利亚铁路系统建设，1896 年修建了从内陆的拉各斯到伊巴丹（Ibadan，1900），再到卡诺（1911）的铁路。可可成为伊巴丹南部约鲁巴地区农民的重要经济作物。英国期望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主要从事棉花种植，但令英国人惊讶的是，豪萨地区的农民却开始种植花生。他们具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并认识到棉花是种风险更高的作物，更不耐旱，且所需要的劳动力更多。铁路末端卡诺的欧洲商人开出的花生价格要比棉花更加吸引人。当地精明的豪萨商人

很快就将这一讯息传播开来，并搭建当地的市场网络。两年内，豪萨地区的农民生产的花生如此之多，以至于铁路都无法应付运输问题了。因此，卡诺的欧洲商人不得不在街道上囤积一包又一包的花生。

热带非洲很多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无疑得益于迅速提升的运输设施——公路、铁路和港口，这些设施自殖民统治早期就已经开始修建了。但是，对这些农业生产者来说，如果要他们投入过多资本也不现实。欧洲政府期待其殖民地在财政上是独立的。因此，铁路和港口的修建所需花费要当地来出。除了提供大量并不情愿的自由劳动力外，非洲人最终还是通过税收和进口关税来支付其铁路及港口的修建花费。在很多地方，铁路建筑公司都无偿获得了大片非洲土地。欧洲贸易商和制造商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利最大，但对殖民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却分文未出。

英属东非的农业生产者、铁路和白人定居区

西非的农民并没有按照英国或法国制造商的期望那样去大规模种植棉花。英法在非洲的代理机构，如英国棉花种植协会（British Cotton Growing Association，即 BCGA）就没能诱使西非农民去生产足够出口的棉花。比起其他经济作物，如可可、棕榈油或花生，棉花的开价也太低了点。然而，在埃及和乌干达，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则取得了较大成功。1902 年阿斯旺水坝的完工，意味着尼罗河下游地区终年灌溉已经成为可能。受到英国棉花种植协会和开罗的英国当局的鼓励，埃及农民以粮食作物为代价，变得过分依赖于棉花种植。

乌干达

撒哈拉以南非洲棉花生产出现巨大发展的地区是乌干达。我们曾在第十四章论述过，巴干达已经适应了密集型的农业生产。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英国曾利用与布干达基督教贵族结成的同盟关系将整个巴干达作为其保护领地。1900 年，英国与巴干达贵族达成进一步的协议，该协议为英国统治整个乌干达奠定了基础。英国人同意不为白人

定居区拿走任何一块土地,并实行一种私人土地所有制。这意味着布干达很多农业用地将变为巴干达酋长的私有财产,这些酋长都拥有自己的佃农。布干达国王"卡巴卡"失去了之前的土地分配权,随之也失去了绝大部分实权。国王成为一个由殖民当局任命的、有名无实的首领,且殖民当局现在享有任免酋长的权力。这一体制也拓展到该领地其他诸多王国内。

339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乌干达维多利亚-尼安萨湖两岸从蒙巴萨到基苏木(Kisumu)的铁路于 1901 年完工。跨湖的捷径让巴干达与沿海地区贸易联系变得更加便捷。英国棉花种植协会 1903 年引入了种子后,乌干达供出口的棉花生产规模就得到了快速的扩大。乌干达棉花种植的扩展得益于新近形成的土地所有制。种子最初是由酋长来发放的,并由酋长组织其佃农来种植棉花。通过这种方式,棉花种植在布尼奥罗、布索加(Busoga)以及整个布干达迅速地扩展开来。酋长们被吸纳到乌干达公司的管理理事会中来,该公司是为了管理乌干达境内棉花市场而筹建的。尤其是在布干达,农民既为酋长也为自己生产棉花。这里的土壤与气候除了适合生产赖以为食的香蕉外,还非常适合农民生产棉花以换取现金。这会让他们觉得有点安全感,不像非洲大陆其他地方,单一出口经济作物的生产压过了粮食生产。

肯尼亚

从很早开始,英国就将其东非保护领地(1920 年改名为"肯尼亚")作为一个白人定居区和潜在殖民地。维多利亚-尼安萨湖东部的高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该地区还有新修建的乌干达铁路。由于 1900 年的协议,白人定居区是排除在乌干达保护领地内很多好地之外的,但是这一问题很容易就得到了解决。1902 年,乌干达领地中的很大一块土地,从大裂谷到维多利亚-尼安萨湖都转让给了东非保护领地。在英国人看来,这一大块土地上的大量非洲人只是为其殖民地带来更多的纳税人以及为白人农场带来更多的潜在劳动力而已。

该地区的非洲民族没有不经过抗争就割让其土地与自由的,他们

在 1901—1908 年间掀起了反对英国的一系列抵抗战争。最终，英国的军事优势和大范围地使用暴力还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计划提前建立白人定居区。只有高原地区不在白人占有范围之内。乘铁路来内陆的印度商人被禁止购买该地区的土地。已占有土地的非洲人被归为"擅自占有土地者"(squatters)，只有白人"土地所有者"需要他们劳动时才被允许继续占有土地。从这方面上来说，基库尤人的农业种植者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们业已开始的在肥沃的大裂谷地区的扩张被迫停止了，并且由于白人定居区的涌现而被迫后撤。从 1905 年左右开始，白人定居者不断从英国和南非来到这里，并且带着明确的目的，即把高原变为"白人国家"。行政首都从内陆迁移到内罗毕，并且从早期开始，白人定居者在殖民地享有较高地位。

德属殖民地的反抗

马及马及起义(1905—1907 年)

德属东非边界地区的殖民征服在 19 世纪 90 年代晚期之前似乎就已经完成。殖民征服是个持久战的过程，且内陆行政中心在事实上不过是一系列的小型军事要塞。从 1898 年开始，殖民地就对所有成年非洲人课以重税，并且在征税过程中使用较高烈度的暴力和恐吓。北部地区乞力马扎罗附近的人们也尝试着与欧洲人的种植园打交道，但在德国人看来，德属东非的其他地区不过是象牙和税赋的来源地而已。 340

1905 年 7 月，殖民地南部内陆基尔瓦地区爆发了起义。起义开始于马图木比(Matumbi)山区，当地人反对殖民地政府为了出口而强迫他们种植棉花。起义很快就扩展到整个地区，开始攻击所有的外国人：传教士、管理者及其斯瓦希里/阿拉伯雇员。

这场起义是自发形成的，之前并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领导团体。然而，坦桑尼亚南部地区的人们团结起来了，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出现在非洲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中。他们本能地相信精神上的力量。非洲人缺乏团结也没有机关枪，这是早期阶段非洲人在抵抗欧洲征服过程中的

缺陷，而相信精神上的力量是克服这些问题的替代方法。他们把圣水洒在自己的身体上，便成为“马及马及”，他们相信这会让敌人的子弹变成水。圣水是一种简单的器物，可以将民众团结起来。德国人震惊于迅速扩展开来的起义，最初的起义成功更是增强了人们对马及马及的信仰。但是，四周后就出现了转折。只有长矛装备和马及马及保护的“反叛分子”成为德国机关枪的标靶，成千上万的坦桑尼亚人成为德国人的炮灰。虽然起义在不断地扩大，但是已经丧失了其最初的势头。马及马及的力量也遭到质疑，政治团结也逐渐分崩离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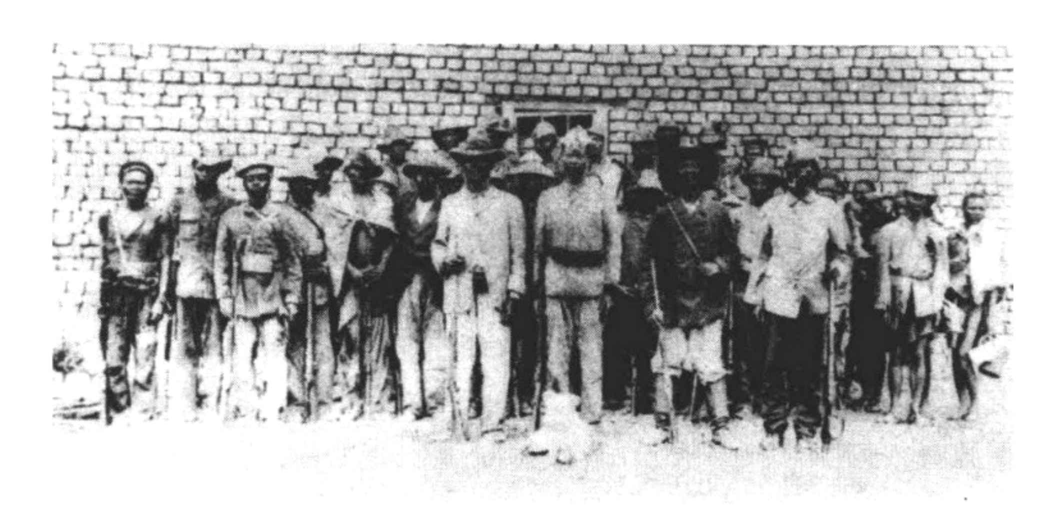
1905 年末，德国人引入了从索马里和新几内亚召集来的增援部队。1906 年，德国人又逐渐控制了中央高原地区。他们推行了“焦土”政策，毁坏村庄，并让整个坦桑尼亚南部、中部地区成为一片废墟。德国官方数据宣称在军事行动中杀了 2.6 万名“反叛分子”，且估计有 5 万多坦桑尼亚人死于由军事行动所带来的饥荒。

马及马及起义一结束，德国人就因为担心激发另一场起义而开始减少使用暴力，以增强其威信。他们鼓励教会学校发挥作用，并让欧洲雇主为其工人的健康承担责任。但从长远上来说，更重要的是，马及马及起义已经显示出非洲在殖民地的转折时期形成更广泛的反殖民民族主义的可能性。死于马及马及起义的成千上万坦桑尼亚牺牲者极大地鼓励着下一代民族主义者，正是下一代民族主义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使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

赫雷罗和纳马起义（1904—1907 年）

与此同时，德国在西南非洲殖民地的中央高原地区也在大力推行白人定居点政策。纳马和赫雷罗牧民在 1896—1897 年发生牛瘟期间深受牛群死亡之苦，白人定居者利用这个机会推进到当时很少使用的非洲人的肥沃牧场。同时，为了保住新获得的白人牧场，白人商人有组织地剥夺非洲牧民所剩不多的牛只。商人增加了对贫困的非洲畜牧民的粮食和衣服贷款，然后坚持让畜牧民以所剩无几的牲畜来偿还贷款。20 世纪早期从约翰内斯堡招募劳力，在赫雷罗人首领看来是白人精心

341



1904—1906 年起义期间被俘的赫雷罗人。

策划的阴谋，白人通过招募其年轻的精壮男青年以摧毁赫雷罗民族。

1904 年，赫雷罗人爆发起义，杀了 100 多名德国商人和定居者，重新收回了大部分领地。但是他们没能劝服纳马人参与进来，而之后纳马人再改变立场已经为时太晚了。此时，德国人已经从海外增调了支援力量，并将赫雷罗人围堵在瓦特伯格(Waterberg)。当赫雷罗人从包围中冲脱出来后，德国将军冯·特罗塔(von Trotha)发表了其臭名昭著的“灭绝令”：

> 赫雷罗人不再是德国的属民。他们已经开始谋杀和屠杀……赫雷罗人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他们说个不字，我将用武力来驱赶他们……在德国领地内，每个赫雷罗居民，不论有无武器，不论有无牛只，都将遭到枪杀。领地内也不许有赫雷罗妇女与儿童的存在：她们要不回到赫雷罗人那里去，要不死亡。这就是赫雷罗人从我——伟大的德皇的伟大的将军——这里获得的最后通牒。
>
> ——摘自 H. Bley, *South-West 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Heinemann, London, 1971, pp. 163 - 164

赫雷罗人向西撤退到卡拉哈里沙漠地区，在那里，数万人死于缺水和饥饿。到1905年末，冯·特罗塔的灭绝令被撤销前，仅仅只有1.6万名赫雷罗人在德国领地内存活了下来，而在灭绝令发布之前，赫雷罗人口有8万之众；而且只有2 000名赫雷罗难民到达临近的贝专纳兰。

在此期间，纳马人也爆发了起义。在亨德里克·维特布伊的有力领导下，他们发动了游击战。他们成功地牵制了德国军队，至少到1905年末老迈的维特布伊被杀前一直如此。之后，纳马人的团结逐渐瓦解。其他纳马人首领继续抵抗到1907年，但是德国人逐渐重新恢复了控制。

342 战争末期，德国人镇压了纳马人的残余力量，且赫雷罗人以牛群和撤除酋长职位为代价换来了独立。纳马人和赫雷罗人的幸存者成为德国农场和矿井的工人，待遇低下，地位卑微。但是，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杀的纳马人和赫雷罗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德国机构不得不从北方的奥万博兰地区招募人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些南部纳马人对德国统治的愤恨如此强烈，以至于欢迎1915年入境的南非军队。

传教士，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早期浪潮

在非洲，政治与宗教权威通常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些小型社会里，酋长通常也是宗教神灵的监护人和祖先灵魂的保护人。因此，欧洲人对非洲政治权威的破坏也削弱了传统非洲宗教的权威，且为基督教的传播开辟了道路。20世纪前十年是基督教传教士活动大发展的时期。推动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传教活动带来了初步的基础教育和卫生所，而这些是新殖民当局很少关注或未予关注的。正是这些急需的服务，在20世纪前20年内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来到了传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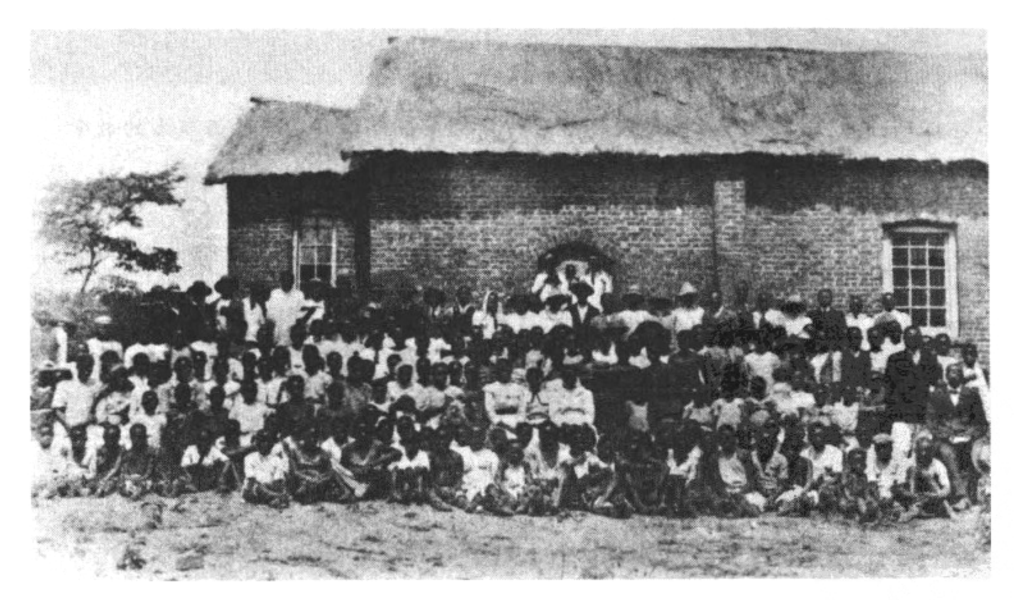
然而，一些基督教早期皈依者已经认识到基督教与欧洲文化和政治权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对其产生制约。19世纪80、90年代，南非的非洲基督教神职人员已经开始反抗欧洲人在其教会中的主导地位。很多南非基督教神职人员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的基督教教会，很多教会

的建立都得到美国福音传道者的鼓励。这一运动被称为“埃塞俄比亚教会”(Ethiopian Church)运动，因为在基督教《圣经》中，“埃塞俄比亚”指的是整个非洲。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浪潮，排斥欧洲人控制教会和建立独立非洲教会的倾向传播到中非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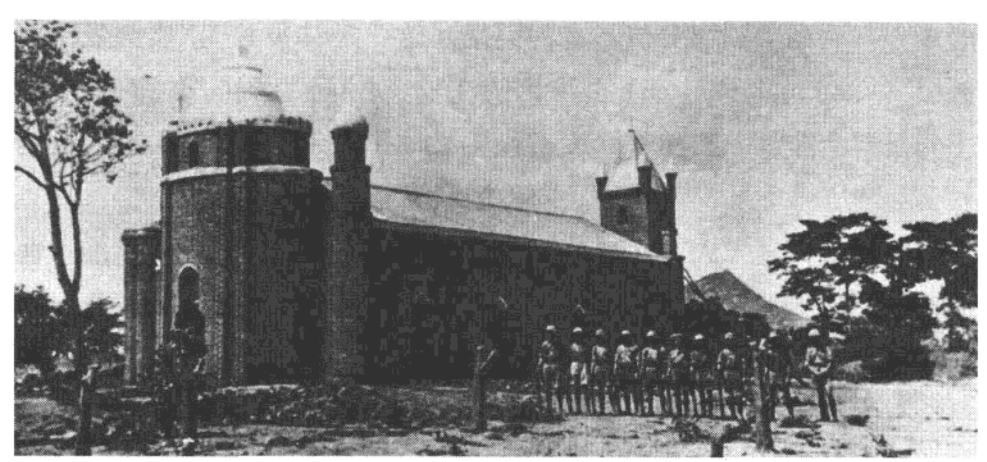
非洲教会领导人在教授《圣经》时，比起欧洲同道更具体、详细。他们在《圣经》中发现了正义与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很多人看来，“基督再临”之际就是殖民制度压迫终结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教会运动可以视为非洲反抗欧洲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最初表达。非洲基督徒最大的反抗声音来自 1908 年在尼亚萨兰成立的埃利奥特·卡姆瓦纳(Elliot Kamwana)的瞭望塔教派(Watchtower sect)。卡姆瓦纳宣传“基督再临”将会解放全非洲，殖民地的税赋将会废除，非洲人将会形成政治独立的政府。甚至是在卡姆瓦纳被捕、驱除出境后，瞭望塔运动还在临近的罗得西亚不断壮大，而罗得西亚所受的殖民压迫尤其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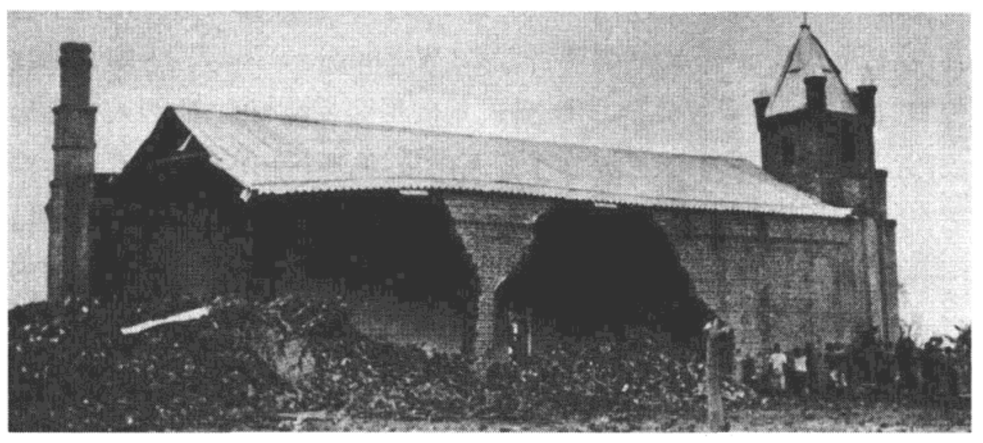
343

或许，这期间最著名的非洲基督徒“反叛者”是约翰·奇伦布韦(John Chilembwe)。他来自尼亚萨兰，在希雷高原的一个白人种植园



约翰·奇伦布韦的传教站，尼亚萨兰(马拉维)，姆博姆布韦(Mbombwe)1912 年。奇伦布韦(坐在右边的戴眼镜者)及部分会众在新建造的教堂前。到 1915 年，传教团包含 1 160 名“受洗信徒”。





1915 年 1 月 26 日，殖民军毁坏前后的奇伦布韦传教团在姆博姆布韦的教堂。

区建立了自己的传教点。1915 年，他领导其追随者发动了一场反对当地不正义及殖民体制的短暂性反抗运动。他尤其反对让无辜的非洲人在尼亚萨兰北部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冲突中担当炮灰。奇伦布韦决定“出击与面对死亡”，他确实死亡了，被枪杀于逃往莫桑比克的路途中。但是他的出击具有象征意义，激励着下一代的非洲人，他也因此在马拉维民族主义运动史上获得了备受尊崇的地位。

34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1914—1918 年)

1914 年 8 月欧洲爆发的战争起初只是一场欧洲冲突。但是，欧洲列强在非洲占有殖民地的事实意味着这场战争也会对非洲产生影响。

英国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进攻德属殖民地多哥和喀麦隆。多哥很容易就被英法联军击破，但进攻喀麦隆的战斗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同时，新团结起来的南非白人政府军队已经占领了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德属东非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在那里，南非军队与英国东非、西非军队结成同盟，战斗贯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一旦领土被来自北部的英国与来自西部的比利时占领，德国将军就会带领其军队在莫桑比克、尼亚萨兰和罗得西亚东北部发动攻势，并且往往会取得成功。

喀麦隆和东非的战役所造成的破坏给该地区农村人口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村庄经常遭到焚烧，互相敌对的双方军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征用粮食和劳力。估计有 100 万肯尼亚人和坦桑尼亚人在东非战役中充当运输工，高达 10 万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或过多劳作。同样在埃及，英国军队在与德国的奥斯曼帝国同盟军作战时曾征用埃及谷物、棉花、骆驼和劳力。

我们必须知道，在热带非洲发生战争的双方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事实上是非洲人，是欧洲统治者招募或强迫过来的。德国人在东非新近征服地，如从恩戈尼那里的非洲人中招募非洲土著兵(askaris，“士兵”的斯瓦希里语)。英国为其东非战役，从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尔招募了 5 万人。而与此同时，从南非招募黑人，但是不允许他们携带可能会用来反抗白人的来复枪。

此外，法国招募了超过 15 万西非人在欧洲为其作战，其中多达3 万人在西欧战线的战斗中死去。当法国试图加强在西非的征兵时，他们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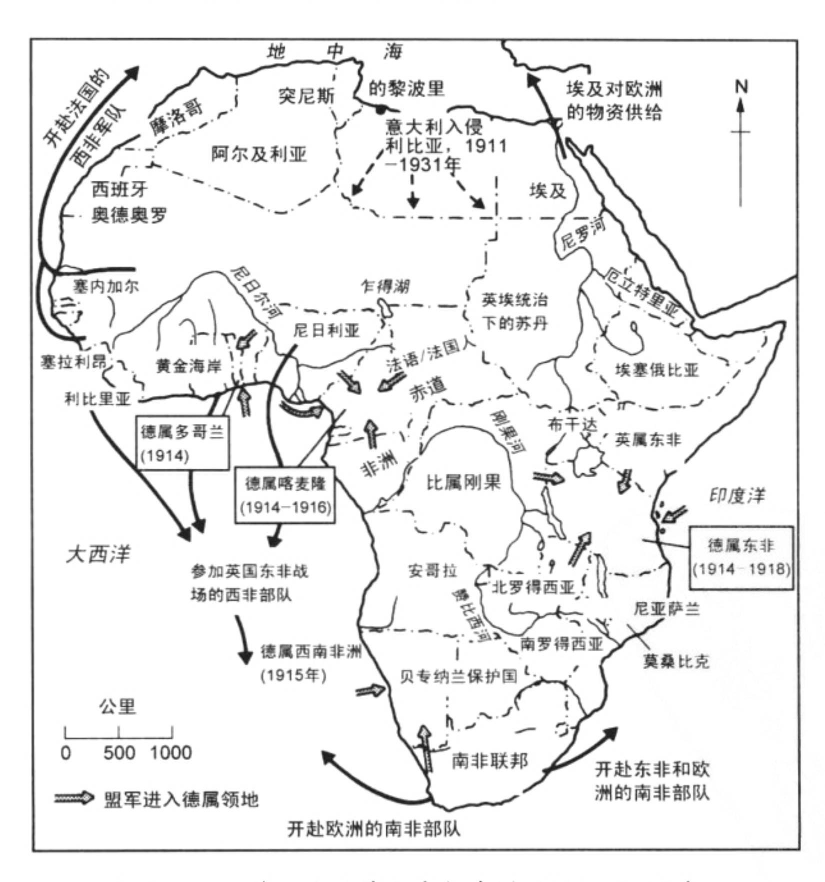


北罗得西亚白人警官骑在非洲侍从的肩上过河，1916 年东非战役。

345



冯·莱托(Von Lettow),百战不败的德军指挥官及其东非土著兵,北罗得西亚,卡萨马,1918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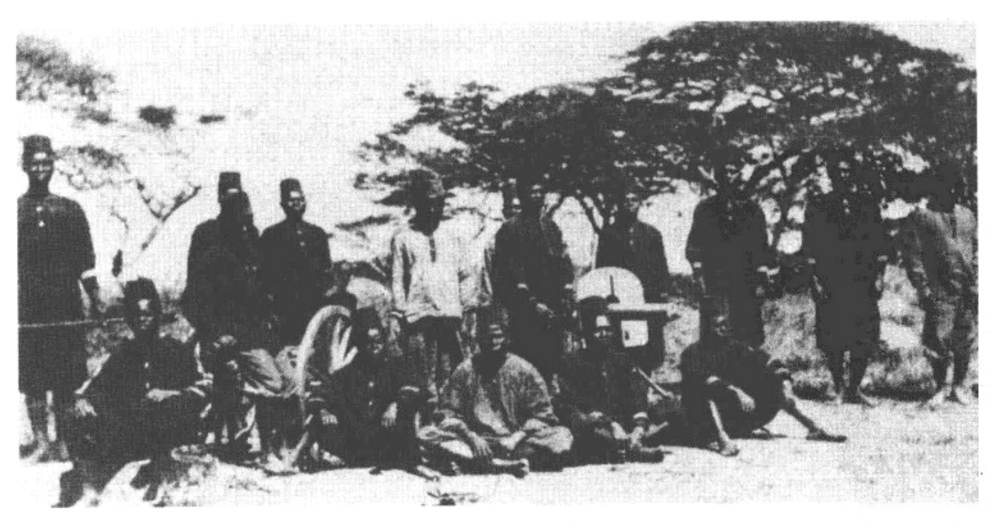
地图23.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非洲,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非军队：在喀麦隆的塞内加尔军队。

到普遍的反抗，尤其是在庞大的非洲帝国萨赫勒和沙漠地区。对法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他们完成对其庞大的西非帝国内其他独立民族征服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1919年的饥荒与流感给非洲造成了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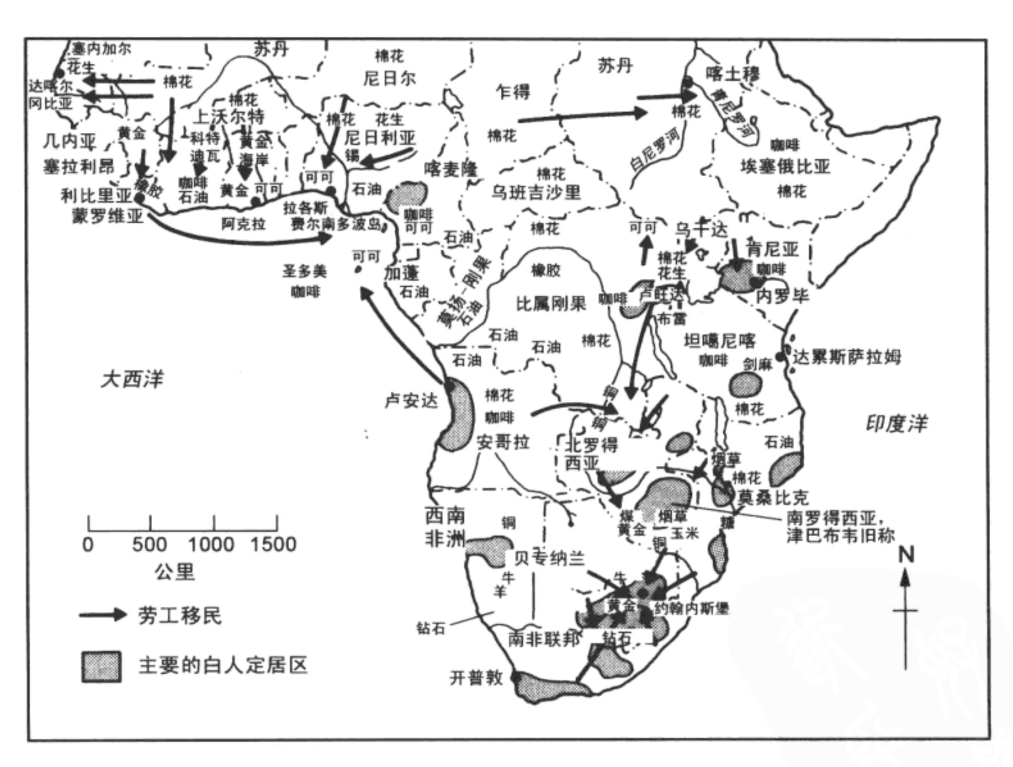
非洲机枪分队，比属刚果东部，1916年。

多破坏。流感在沿海一带以及新建的铁路线传播，严重地打击了本已深受战争、饥饿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之苦的非洲人。东非、西非和中非的广袤地区失去了总人口的3%，南罗得西亚估计有7%的黑人矿工死于疾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德属殖民地正式被业已占领这些殖民地的欧洲列强接手。因此，法国和英国共同占有多哥与喀麦隆（英语称为 347 Cameroon，法语称为Cameroun），比利时人得到了卢旺达和布隆迪，英国继续占有坦噶尼喀，南非人得到西南非洲。从理论上说，每个占领国都是以新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即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的前身）的名义来占有新领地的。这些新领地以托管地的名义来划界，并为其最终形成自治政府作准备。在实践上，欧洲战胜国在对待这些新获得领地上与其他殖民地并无二致。



第二十四章　两次大战期间的非洲：殖民统治的高潮



地图 24.1　两次大战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掠夺。

殖民统治的经济影响

白人定居区的扩张

白人在热带非洲最主要的定居区是肯尼亚与南罗得西亚殖民地。人们过去常常认为,这些地方由于其宜人的高原气候,是白人定居区的不二之选。选择的含义指的是,白人定居者有意避开炎热、潮湿以及热带病流行的中、西非地区。事实上,欧洲人确实曾试图在热带非洲殖民地上建立白人居住区。在那里,欧洲人的定居区并没能成为主导的经济力量,更多的是与非洲人有关系,而与欧洲人的关系不大。

349





帝国市场董事会促销英属东、西非产品的两则广告(出版于1926—1927年冬季的《泰晤士报》)。

例如，在热带西非的许多地方，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非洲农民已经广泛地占有土地。法国人曾坚持不懈地试图在几内亚和科特迪瓦推进白人定居者的农业发展。但按欧洲方式来运营的种植园在西非并不成功，它们过多地依赖于被强迫的、不情愿的且报酬很少的劳力。它们一般并不能与数量更多、效率更高、生产规模较小的非洲农民相竞争。在一些殖民地，非洲人在政治上的直接反对阻止了白人定居区的发展。例如，在黄金海岸，受过教育的非洲基督徒已经与传统统治者联合成立了原住民权益保护协会(Aborigines' Rights Protection Society)。1898年，他们向英国政府请愿并获得成功，反对将非洲人的土地转让给欧洲人。在尼日利亚南部地区，类似的反抗也阻止了非洲土地的转让。与此同时，在大陆的另一端，贝专纳兰的巴茨瓦纳酋长成功地向英国政府请愿，反对将其领土转让给罗得西亚的白人殖民者。

350

甚至是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白人定居者的农业也只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的资助下才获得成功。首先，19世纪的白人定居区都是由大量的、代价沉重的军事征服才获得的。到19世纪20年代，白人定居者“拥有了”撒哈拉北部阿尔及利亚的绝大部分耕地。阿尔及利亚“土著”穆斯林不得不在边缘地区，即以前的牧场上耕作。结果土地迅速退化，并在干旱时候出现了饥荒。在政府赋税的压力下，穆斯林不得不到白人农场那里从事低报酬的季节性劳动。同时，赋税收入主要用于给白人农场提供政府贷款、补助金、研究建议和市场设施。

肯尼亚与罗得西亚的白人农业也有这种类似的补贴制度，即从“土著人”的赋税中抽取补助金来补助白人农业。这两个殖民地都特别歧视非洲农民的生产劳动。非洲人被迫离开那些土质最好的土地，只有作为佃农才被允许回来。在肯尼亚，被称为基盘迪(kipande)的令人畏惧的通行证制度严格限制了非洲人在“保留地”之外的自由流动。在肯尼亚，非洲人被禁止种植阿拉比卡咖啡，而阿拉比卡咖啡是这个国家最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19世纪20年代，为白人定居者服务的肯尼亚、罗得西亚农民的生产力总体上出现了下降，但白人定居者获得了销售



殖民地棉花种植园中的工人，尼亚萨兰（马拉维）的马格麦罗，1908 年。该庄园中很多棉花采摘者都参加了 1915 年的奇伦布韦起义。

上和现金上的补贴。尽管如此，每一个殖民地的白人土地中被真正耕作过的不超过 10%，这一事实让那些被限制在土质差、人口密集的"保留地"上的非洲人非常怨恨。比起肯尼亚高原上白人农民所生产出来的出口作物——棉花和花生，乌干达农民生产的更多。

欧洲人经营的种植园是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比属刚果局部地区经济的重要部分。但是，这些种植园并不是肯尼亚与罗得西亚定居者的个人资产。大的商业公司雇佣欧洲经理来运营其大种植园，如比属刚果的联合利华的棕榈油庄园、莫桑比克北部地区的莫桑比克公司的糖料种植园。但是，这些公司很少投资在研究、科技和交通领域，生产效率也不高，只是动用高强度的暴力来使用劳力。

351

经济作物与农民生产

少量的农民仍然主导着大部分热带非洲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花生仍然是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和塞内加尔的主要经济作物。在科特迪瓦、安哥拉、坦噶尼喀、乌干达和比属刚果东部地区，咖啡作为一种赚钱的农作物被广泛栽种。可可则更加赚钱，仍然是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

西南部地区的主要出口作物。价格低、劳动密集型的棉花通常是在欧洲人的压力下被迫种植的。为了满足法国纺织工业的需求，在乌班吉沙里（中非共和国）、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苏丹（马里）和尼日尔的某些地方，农民必须生产棉花。在青尼罗河、白尼罗河之间，即苏丹的扎伊尔平原上，英国政府资助了一项巨大的灌溉规划以提高该地区农民的棉花生产量。然而，在这一规划中，非洲的佃农并不能获得其他土地来种植粮食，仅仅可以获得棉花利润的 40%。

成功的经济作物生产并不一定会带来农村的普遍繁荣。非洲农民仍然在种植基本的粮食作物。但是，欧洲人大批生产和制造的布料和金属制品正在逐渐削弱非洲工业的自给自足。非洲农民仍然用当地材料来建造房屋，一些人仍然自己编织棉布。妇女的锄头、篮子和水壶可能也是当地制造的，但是男人的砍刀和斧头可能是进口的。以前的奢侈食品，比如进口来的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法属印度支那的廉价大米被运到法属西非殖民地，且出售的价格和数量会影响当地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非洲的农民，经常在殖民地赋税的压力下开始种植那些供出口的经济作物。他们很快就依赖于用经济作物所换来的进口物品。这就让他们落入到贫困的陷阱之中，因为出口物品的价格和所需进口物品的价格，都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沿海市场掌握在少数欧洲大商业公司的手里。它们只给非洲生产者以最低的价格。如果在欧洲可以卖个高价，那么商人就可以赚得这种差价所带来的额外利润。同样还是这些商人控制着欧洲出口产品的价格；当欧洲产品的价格上升了，其上升的部分就会立即传递到非洲购买者那里。总体而言，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非洲农民生产所获得的收入很少，却不得不为进口产品支付高价；在 1929—1930 年的“经济大萧条”打击了欧洲和美国之后，情况尤为如此。由于实际收入的下降和殖民地赋税的持续压力，非洲农民不得不在越来越多的土地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人们忽视了粮食作物，土地也变得日益枯竭。一旦遇到干旱，饥荒就会爆发。1931 年，在尼日尔一些地区，饥荒几乎造成了当地一半人口的死亡。

采矿业

在殖民地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投资行业是采矿业。殖民当局拥有领土范围内矿产的所有权。这些矿产接着再出租给欧洲公司开发。英国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接管了阿散蒂的金矿区。邻近几内亚的布雷金矿区由于金矿质量太差,无法吸引法国公司前来,因此,个别的非洲人才被允许在几内亚继续小规模地开采黄金。将欧洲矿业资本吸引到西非的其他露天矿脉还有尼日利亚北部地区乔斯高原上的古锡矿。这些矿产的开采技术落后,开采者面向各个社会等级的人,且使用了大量缺乏技术的非洲劳工。20 世纪 30 年代初,尼日尔饥荒将成千上万的穷人带到了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因而矿业公司得以调低工资。在那时,尼日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锡生产地。

352

对欧洲在此期间的矿业开采来说,热带非洲最能赚钱的地区是中非地区的加丹加(即后来的 Shaba,沙巴)和北罗得西亚"铜带区"。联合矿业公司已经取得在加丹加铜矿开采的垄断权。一开始,公司从邻近的北罗得西亚地区召集了大量劳力。在北罗得西亚,英属南非公司的代理机构正在竭力榨取赋税。加丹加铜矿主要由罗得西亚和南非提



尼日利亚锡矿中的工人们。

供资金支持。为了加丹加铜矿，联合矿业公司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北罗得西亚的铁路。定居在北罗得西亚铁路线一带的白人农民种植玉米、豢养牲畜，以便给加丹加矿工提供食物来源。

20 世纪 20 年代，北罗得西亚这一边的铜矿带正式开始采矿了，那时刚果边界禁止从加丹加招募来的劳动力通过。北罗得西亚的采矿公司实行了一项政策，该政策在移民劳工基础上保证了工人的供给。劳动合同是短期的，收入也只能养活一个男人。雇主认为这个劳工的家庭是其妻子养活的，其妻子在偏僻的农村地区长期从事农业种植。情况通常并非如此。移民劳工从事那些无需技术的劳动，而那些薪水更高的、需要技能的工作则留给大部分来自南非的白人。

当失去了北罗得西亚的劳动力来源时，联合矿业公司开始从刚果境内和卢旺达/布隆迪招收新劳工。但与近邻北罗得西亚不同，联合矿业公司给劳工提供了一份三年的劳动合同，并鼓励劳工妻子来矿井附近定居，以此稳定劳工生活。公司聘请天主教传教士，让他们提供基本教育。公司允许非洲工人学习某些采矿技术，学习技术后的工人也可以做报酬稍微好些的工作。即使如此，工资仍然非常低，妻子还要自己种点粮食来补贴家用。

对欧洲采矿公司来说，南罗得西亚是另一个重要区域。除了有万盖(Hwange)的煤炭生产，南罗得西亚还是一个生产黄金、铜和石棉的地区。其中煤炭主要是供给铜矿带和加丹加矿井作为工业燃料。本章的最后部分将进一步讨论在南非占主导地位的工矿中心威特沃特斯兰德。

劳动力和赋税

这个时期，殖民地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移民劳工的出现。殖民当局几乎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通常每年大约 1 英镑，或等值于 1 英镑的其他货币。1 英镑需要他们在白人矿井上至少干活一个月，或要在白人农场干活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赋税有两个功效：支付给殖民地管理部门；迫使所有的成年男子进入现金经济，尤其是要迫

使他们廉价地为欧洲殖民者工作。这是蓄意破坏非洲农村自给自足经济的策略。村落本身没有足够的粮食、衣服和住房。无论家庭收入如何,当地非洲人都要用现金来纳税。这对那些不适宜种植经济作物或经济作物不能卖个好价钱的地方来说,意味着人们要迁移到可以获得工资收入的地方。但是城镇和矿上的欧洲雇主给的工资很低,还不足以支付一个家庭的吃喝穿用。如果雇主提供住的地方,也仅够一个人使用而已。因此,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工人的家人必须留在家里种粮来养活自己。工人在纳完税返回家里时,给家人留下的钱也只有一点点而已。

参看地图 24.1 会使我们对这一时期大陆上劳工迁移的范围有所了解。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西非和乌干达的移民劳工跑到非洲农业项目那里找工作。这些非洲农业项目包括黄金海岸、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的可可、咖啡农场,冈比亚和塞内加尔的花生种植地区,或是乌干达湖边地区的棉花和花生农场。这种工作是季节性的,报酬通常是用收成中的一部分来支付的。在西非,很多找这种类型工作的人都是为了躲避法国人,因为法国人在苏丹、尼日尔和上沃尔特强制他们种植棉花。

欧洲人需要雇工的主要场所——矿井、农场和种植园——派出招募劳工机构,用尽可能低的工资来雇佣大量缺乏技能的劳工。招募劳工机构动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包括劝说、哄骗或者强迫人们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为三个月到一年。招募劳工机构在特定地区被赋予垄断权,这样,这些机构就能将工资固定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因为那个地区要找工作的男人无法到其他机构找工作。比如,在莫桑比克的葡萄牙当局赋予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动代理公司(Witwatersrand Native Labour Agency)劳工招募垄断权。作为回报,矿业公司同意使用葡萄牙铁路去往莫桑比克港口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在葡萄牙压力下,莫桑比克南部地区差不多变成了约翰内斯堡金矿的一个劳工供应地。同样地,尼亚萨兰也被当作南罗得西亚农场和矿井的一个劳工供应地。铜矿带和加丹加的劳工招募情况在上文已经论述

354

过了。葡萄牙机构从安哥拉南部地区为圣多美的新咖啡种植园招募了很多劳工。在这里，招募几乎就与奴役没有区别，因为工人只得到一点点，而且很少有人被允许返回家庭。

非洲大陆的酋长被迫充当非正式的代理人以满足欧洲人农场和采矿公司的劳动力需求。在欧洲人高原地区的定居地上，非洲人被迫从事拿工资的劳动，这也是他们被迫离开土地的结果。那些被允许返回土地的人要为白人地主提供各种无报酬的劳役。此外，在大部分殖民地，非洲人都要无偿地为当地公共项目劳动，比如修路和筑桥。在法国人统治的殖民地，这被称为强迫性劳役，并且规定一年至少有 7—14 天这样的劳动。强迫性劳役是殖民统治最令人痛恨的一个方面。

在名义上独立的西非国家利比里亚，情况也没什么不同。1925 年，美国的费尔斯通橡胶公司(Firestone Rubber Company)从利比里亚政府手里租得了差不多 50 万公顷土地，这些土地以后可以建立种植园。费尔斯通宣称这是在帮助利比里亚的发展。他们确实改善了蒙罗维亚的港口设施，并筹备了一笔美国贷款帮利比里亚偿还了外债。但是，费尔斯通为橡胶种植园只付给利比里亚一笔名义上的租金，并没有上缴利润所得税。事实上，他们在利比里亚经营的主要诱惑是可以利用这个国家"实际上取之不尽"的本土劳动力。利比里亚也是唯一的一个未处于欧洲殖民控制的低地热带非洲国家。按照协定，利比里亚政府同意每年给费尔斯通种植园提供多达 5 万名工人。这些工人主要是来自内地的克鲁人(Kru)。与其他地方一样，酋长负责招募劳工，并强迫他们与费尔斯通签订报酬非常少的合同。酋长得到了利比里亚军队的支持，军队会侵袭那些迟迟不肯提供招募劳工的村落。同一时期，在费尔南多波岛的西班牙可可种植园里，那些从利比里亚"招募"来的合同工人就是军队侵袭后才被送过来的。

殖民管理的性质和影响

许多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殖民管理"制

度”的优缺点、异同点：法国是“同化”政策，而英国是“间接统治”政策。最近，历史学家很少关注理论，而更多地关注于这些制度对非洲殖民地大部分属民的影响。从非洲殖民地属民的立场来看，所有殖民管理“制度”在实践中都极其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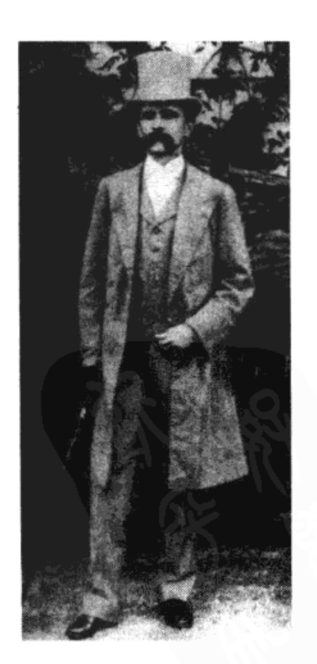
法国人最初要将他们的殖民地属民不论肤色都“同化”成接受法国文化的法国人。这些人将会拥有法国公民所有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包括派遣代表参加法国议会。这在19世纪中期也许行得通。当时，法国人在热带非洲殖民地仅仅只有塞内加尔海岸少量的贸易站。但到了19世纪后半叶，非洲大陆开始出现大规模殖民化之后，法国人便放弃了“同化”所有地区的政策，只是决定“同化”原来的四个塞内加尔的城镇（达喀尔、圣路易斯、戈雷和吕菲斯克[Rufisque]），以及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说法语的非洲人。法国人继续坚持“同化”政策，而且这是所有的非洲人的努力方向。但是，法国当局为“同化”的非洲人所设定的教育标准是高的。很少有非洲人会追求这一身份，因为它意味着对非洲人人格和文化的全盘否定。到20世纪30年代，被同化的塞内加尔“四大社区”的非洲人共计有5万名，然而，那些“有选择地被同化”的非洲人从未超过500名。热带非洲帝国剩下来的1 500万人依然被视为法国的臣民，但他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法律或政治上的权利。

法国人将前殖民时期像达荷美、图库洛尔和富塔贾隆这样的大国分成多个地区，并且让非洲酋长在当地政府中较低级别的岗位上任职。法国管理者可以随意任免行政区和村落的酋长。这些法国人任命的“酋长”的责任是征收赋税、招募劳工，特别是强迫性劳役的劳工，还有镇压非洲农村人的反抗。如果不能让法国人满意，任何一个酋长都会被撤免。因此，这些所谓的“酋长”只是具有“传统”的酋长封号而已。他们得到任职，与其说是因为这些酋长对其“属民”的语言和习俗的熟悉，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会说法语。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法国政府的官员，蔑视任何宗教或法律权威。法国人以这一方式破坏了非洲人的习惯法。非洲人最常触及的法律是土著管理制度（indigénat）。这个臭名昭著的殖民地法律可以让法国政府的地方管理者不经指控或审

判，就能无限期地关押任何一个非洲臣民。

在北非，法国人统治着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就好像它是法国大陆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显著区别，即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属民没有公民权。法国人以他们任命的苏丹的名义统治着邻近的摩洛哥"保护领地"。实际上，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内陆山区的民族一直通过军事征服占据着这些地方。

英国人也在当地政府使用"传统"的非洲统治者，但是英国人将其实践提升到殖民管理"理论"的高度。他们称之为"间接统治"。尼日利亚的前总督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在其1922年出版的《英属赤道非洲的双重委任》(*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一书中，最为清晰地阐述过这个理论。卢加德阐述了他为管理北尼日利亚索科托酋长国而制定出来的这种统治制度。卢加德向所有英属赤道非洲殖民地推荐使用这种统治制度。英国人相信"间接统治"是用最少的欧洲人员管理更大范围、更多人口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但是，"间接统治"远不是一刀切的制度，不同殖民地之间有着不同的应用。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1858—1945年)，殖民地官员，实现了英国人对乌干达的军事控制(1890—1892年)。作为英国驻北尼日利亚的英国高级专员(1900—1906年)，他采取实用主义立场，并成功地与索科托埃米尔谈判实行"间接统治"制度。他实现了南北尼日利亚的统一，并担任总督(1912—1919年在任)，但做得并不成功，让尼日利亚产生了很深的文化和政治分裂。

356 像法国人一样,在可能的情况下,英国人就会利用"传统"的非洲统治者来行使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特别是征收赋税、招募劳工和控制非洲人可能的不满。不配合的酋长会被解职,英国人会为空缺的酋长职位找个合适的替代者。在这一点上,英国人比法国人更加注意酋长候选人的"合法"要求。然而,英国人在之前处于"非国家状态"下的社会中创设新型酋长职位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犹豫,比如在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和肯尼亚的基库尤人中间。之前,这些地方的酋长并不被当地村落之外的人所知晓。

与法国人不同,英国人更多地利用了非洲"习惯法"。酋长允许审判当地的民事纠纷,审理小的刑事案件,但不许审理严重的刑事案件或者任何一个牵涉到欧洲人的纠纷。然而,英国人对"习惯法"的关注,并非出于对非洲事务的尊重,而是出于管理上的便利。酋长履行各种各样的法律职责,否则的话,殖民管理的成本就会很高,同时也不方便。可以保留酋长,让他们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中介人,有利于减轻非洲民众对殖民统治的敌意。当不受欢迎的殖民法规被送交给酋长执行时,正是这些酋长充当了当地非洲人泄愤的替罪羊。与此同时,只



索科托苏丹,他与卢加德一道发展出"间接统治"制度。

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英国殖民管理者就会毫不迟疑地调整、改变，甚至在必要时发明非洲"习惯法"。

殖民统治对酋长作用的强调，过分夸大了所谓的"部落"差异。欧洲殖民者看不起非洲社会，将它们视为"原始的"和"低等的"，他们是故意使用"部落"这个贬义词的。英国人将他们的地方管理建立在一系列前殖民时期酋邦的基础上，这些酋邦在英国人看来是不重要的，而且彼此完全分离。为此，他们强调方言的差异，并将方言重新划分为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依据严格的"部落"差异，描述了非洲人在穿着、居所和宗教实践中所存在的不同习俗。在许多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社会中，一个地区的人口、语言和习俗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有些群体间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这主要是为了获得政治实力或经济优势而产生的，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部落"。事实上，"部落主义"被认为是殖民当局发明出来的。通过加大"部落"差异与激化"部落"矛盾，殖民者使得非洲人在反抗中更难团结起来。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殖民地的农村

357



带有政府任命袖章的南罗得西亚酋长，1920 年。酋长是由英国南非公司指定的；他们通常并不是"传统上"的统治者，因此在其所属的民众看来缺乏合法性。

人口中。比如南罗得西亚,那里的每一个“部落”都住在属于这个部落的“保留地”上,部落都被孤立开来。英国人很是善于从古老的帝国格言中汲取智慧:“分而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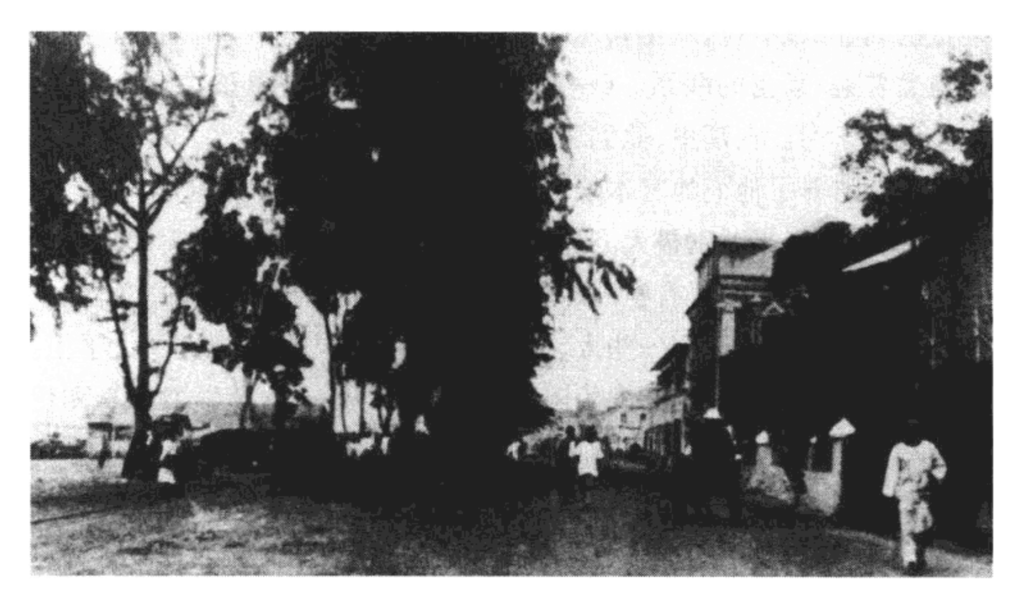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的管理政策大体与法国人类似。少数接受葡萄牙语言和文化的精英分子被认为是文明人(civilisado,后来改名为同化民[assimilado]),而且被免除了其他非洲属民要上缴的赋税和要提供的劳役,但是他们从没有被给予在地方或中央政府中的选举权。可是,被法国人同化的塞内加尔则可以享有这种选举权。文明人只是一个数量非常少的少数派,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文明人都具有混血血统。他们是居住在城里的店员、教师或小商人,在文化和世界观上与大多数土著人完全分化开来。

比利时人的殖民管理是一种掺杂着法国和英国殖民制度元素的混合制度。他们认可那些少数在文化上被“同化”、接受过布道团教育的非洲人,并称他们为当地非洲人中的上等人。但是与葡萄牙殖民者一样,这些人从未被允许参与地方政治。初级以上的教育不被鼓励,地方政府中酋长的任命和选用相当武断,主要取决于地方情势和管理的便利。另一方面,比利时人的殖民地通常还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前殖民权力结构,就像在卢旺达和布隆迪,这种权力结构往往是以一种“间接统治”形式而被控制和被利用着。

358

伊斯兰教在热带西非的传播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曾论述过,欧洲人的征服如何打开了扩大基督教布道团影响的大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殖民统治的巩固时期,热带西非却同时出现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传播的范围要比殖民统治巩固的范围还要大。殖民者在“间接统治”的伪装下利用穆斯林埃米尔,加强了伊斯兰教在北部草原地区上的影响。欧洲人的殖民统治,通过征服可能已经结束了 19 世纪改变信仰的使命。但是通过确认信仰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为“传统”的非洲统治者,欧洲殖民者可以让其属民的改宗变得容易些。在一些地区,比如伊洛林的索科托省,穆斯林只是



1920年左右的拉格斯港口。

新近的征服者。欧洲人确认了他们的地位，并让伊洛林的约鲁巴人的改宗变得容易了很多。

此外，重新调整后的贸易路线远离沙漠地区，这也推动了穆斯林在西非南部草原、森林和沿海地区的渗透。在殖民时期，伊斯兰教成为所有主要港口如拉格斯、达喀尔、科纳克里（Conakry）和阿克拉地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有一个优点，即与欧洲的殖民势力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伊斯兰教并不坚持要求非洲人放弃一些重要的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因此，在欧洲殖民统治下，就新皈依者的数量而言，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有着更多的皈依者。在塞内加尔，伊斯兰教传统由来已久，穆斯林兄弟情谊很深，且并未为殖民当局所干扰。在苏丹，英国人积极劝阻基督教传教士在该国北半部的工作，因为这很可能会扰乱伊斯兰教统治的相对平静。结果正如英国人所预料的那样，英国人在镇压1921—1922年达尔富尔那场严重的“马赫迪”起义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教育：从前殖民时期的传统到殖民时期的现实

359

在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教育有两种主要类型。在伊斯兰教占主导

地位的北非、撒哈拉、萨赫勒和东非斯瓦希里沿海地区,基础教育与宗教有着普遍、紧密的联系。6—12 岁的儿童(主要是男孩)到《古兰经》学校进行学习。在那里,他们通过死记硬背,学习《古兰经》的阿拉伯文诗句。这培养了他们的基本读写能力和一些初级的计算能力。在这些学校中,学识水平差别极大。那些学得好的、并且父母能供得起学费的孩子,就会继续在一位有学问的修道士(marabout 或 mallan)的指导下学习。精通阿拉伯语的一些人,可能会在西非杰内或廷巴克图大学里,或在突尼斯的凯尔旺或开罗的阿兹哈尔(al-Azhar)继续学习神学和伊斯兰教教规。

在文字出现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前殖民时代并没有正式的教育,但这些社会中的男孩、女孩都会接受不正规的义务教育。尽管这种教育在非洲大陆各个地区,在内容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方法和原则还是相似的。男孩和女孩从父母和其他的年长亲戚那里学习宗教和社会生活技巧。孩子们从大家庭中的长辈那里了解其祖先的历史、群落或国家的口述传说和习俗。孩子在抚养的过程中重视长辈的智慧,这是没有文字的口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从长辈那里汲取的许多知识,都是依靠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被逐渐灌输的。在这些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分别进入成人学校之后,他们被分在不同的房间中住上很长一段时间,且与其所属群落的其他人隔离开来。在这里,正式教育强化了他们的非正式教育内容,包括宗教信仰和活动、与性别有关的社会习惯和性习俗、道德行为、诸如勇气和忍耐力的个人性格测试等。这种学习结束时会举行成人仪式,经常涉及割礼,而有时包括面部或身体的刺青。从成人学校毕业后,依据“毕业生”的年龄和婚姻状况,他们就会被要求承担成人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是在一个很低的社会地位上。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伊斯兰教渗透不深,或仅是最近才开始渗透的。教育的这两种类型,即《古兰经》学习和本土学习并行不悖,许多孩子同时接受了这两种类型的教育。

法国和英国殖民者都决定不去干涉现存的穆斯林教育模式,尤其

是在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非。同样地，《古兰经》学校在西非殖民地也兴旺发达。这些学校随着上面讨论过的伊斯兰教的传播而普及开来，这种普及也得益于殖民地或本土社会的削弱。与此同时，基督教传教士攻击本土社会习俗以及成人学校，部分是因为它们的性教育，但主要是因为宗教内容。这使得许多非洲人转向了《古兰经》学校。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与欧洲人入侵没有关联。

殖民政府在最初几十年除了容忍《古兰经》学校之外，一般都是将教育交付给基督教传教士团体，这些传教士中的一些人在这个地区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像《古兰经》学校一样，基督教教会学校也提供基本的宗教和读写能力的教育。新教传教士依据《圣经》来进行教学，他们将《圣经》中的部分内容翻译成当地语言。天主教传教士依据翻译成当地语言的教义进行填鸭式教学，教学生死记硬背。

360

20 世纪 20 年代，殖民政府开始越来越关注于教育。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开始给教会学校发津贴，但随着津贴而来的就是对学校课程的控制，那时的学校课程集中于读写、数学、法语与法国文化。任何与非洲历史或文化有关的内容都一定要从学校课程里去除。在法属西非，殖民当局也建立了少量的小学，大部分学校都在塞内加尔。那里的威廉庞迪学校(William Ponty School)建于 1903 年，它为教师提供小学后的三年制的培训。法属赤道非洲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都没有政府建立的中学教育。20 世纪 30 年代，布拉柴维尔建立了一个中等学校。从本质上说，殖民政府只对少数精英分子的培养感兴趣，并让他们任职于较低的行政职位。他们将大众教育视作一项危险的事业，是需要规避的。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地区除了《古兰经》学校外，只有 3%的学龄儿童可以到教会或政府学校里上学。

在英国势力范围内，“西式”教育有着稍微长一点的历史。侧重于宗教教义、读写能力培养的教会教育至少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依然占主导地位。然而在塞拉利昂，隶属于英国基督教会传教会的弗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是一个神学院，也是一所培养教师的大学。这

所学院自 1876 年后并入到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在殖民初期,弗拉湾学院的许多学生都来自黄金海岸,那里的总督格吉斯伯格(Guggisberg)致力于让教育成为殖民政策的基石。他建立了西非第一个政府所辖的中等学校,即阿基莫塔学校(Achimota)。然而,英国人像法国人一样,将他们的教育财政经费主要提供给之前就业已存在的教会学校。其结果是,甚至到 20 世纪 20 年代,黄金海岸只有不到10%的学龄儿童进入到政府资助的学校。尼日利亚人口更多,但殖民当局资助教会学校的拨款少得可怜。1920 年,总督吉福德(Gifford)抱怨说,在《古兰经》学校占主导地位的整个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没有一个人能胜任最低等的殖民行政职务,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能胜任此职位的英语水平和教育资格。在尼日利亚南部和肯尼亚,所谓的"篱笆学校"(hedge schools)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些学校里,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在室外非正式的环境中,将他们的读写、识数和英语语言能力传授给当地人。然而,这些非正式学校的独立性引起了殖民当局相当多的关注,殖民当局担心它们会成为反殖民"阴谋"的温床。

1921 年,美国的菲尔普斯-斯托克斯委员会(Phelps-Stokes Commission)报道了英属赤道非洲的教育情况。尽管他们的报道工作获得了独立的资助,且致力于研究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教育问题,但报道的内容还是反映了当时英国殖民者的一些思考。美国人提议增加教育机会,但有个过时的观念,即认为非洲人主要是生活在乡村、以求生为第一要务的群落。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非洲人仅仅需要基本的读写、识数、农业、建筑和木工方面的一些职业培训。菲尔普斯-斯托克斯报道未曾考虑到迅速的城市化和劳动力迁移,城市化和劳动力迁移甚至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经成为非洲人日常生活一部分了。非洲人所需要的以及越来越需要的是可以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类似欧洲学院教育中的一些课程。20 世纪 30 年代末,殖民当局开始要将这些愿望变成了现实。然而,直到殖民时期的最后十年,非洲教育中所使用的课程仍蓄意排斥及诋毁非洲文化、语言和历史。通过教育,非洲人所知的就是欧洲科技、文化和文明的优越。非洲人了解了法

361

国、英国的历史以及欧洲“英雄”在非洲的历史，但是他们并未受到任何关于其本身历史的教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数十年，那些决心获得进一步教育的非洲人不得不出国深造。会说法语的就去了法国，而那些会说英语的主要去了在北美的非裔美国人的机构。20 世纪 30、40 年代，100 多个西非人去了美国大学，其中就有尼日利亚的阿齐克韦(Azikiwe)和黄金海岸的恩克鲁玛(Nkrumah)，他们都是林肯大学的毕业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中所出现的大部分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都来自这些海外的毕业生。

战争年代的非洲民族主义和反抗运动

在这一时期，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05 年刺杀法国总督而引发的毛里塔尼亚起义直至 1934 年才被最后镇压了下去。然而那时，大规模起义并不常见。一个重要的、但少为人知的例外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法属赤道非洲 35 万巴亚人(Baya)的起义。1928—1931 年间，在对起义进行暴力镇压的时候所发生的大屠杀，是殖民统治在热带非洲的又一次残酷暴行。

独立的基督教教会在不断地增加。在比属刚果，西蒙·基班古(Simon Kimbangu)在 1921 年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并自称为先知。他布道说，上帝不久就要将刚果人从殖民压迫中拯救出来。尽管比利时人很快就关押了他，但“基班古主义”(Kimbanguism)在整个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直延续着，其追随者拒绝上缴赋税或为政府种植出口作物。基班古主义在干旱和农村生活特别困难时期，会出现周期性的复苏。基班古主义者(Kimbanguists)相信先知基班古即将奇迹般地回来，尽管基班古事实上一直被关在监狱中，直到他于 1951 年去世。

总的来说，在战争年代，非洲人学会了如何与新秩序相处，如何在今后适当时候推翻和改变它。工人联盟还处于初创阶段，所有形式的工会活动都被取缔。然而，工人为获得更好的报酬和工作条件举行了



身着正装的"非洲合众国临时总统"马库斯·加维。

多次自发性的罢工,这当中比较重要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几内亚、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矿井、铁路工人罢工与1935年、1940年的北罗得西亚铜矿带地区所爆发的罢工。黄金海岸的可可农场主展示了非洲有力地团结在一起时所具有的那种潜在能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农场主们囤积了收获后的可可,直到沿海商人给出的价格上涨了才卖出。后来,他们形成了一个可可农场主联盟,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运用了同样的策略。

在20世纪20、30年代,整个热带非洲的非洲人正在组建自助福利协会,并且逐渐利用这些协会来反对地方上那些具体的不公正事务。同时,在东非、西非和中非的各个港口和行政城镇中,一个新的、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阶层在稳步发展:职员、译员、商人、教师以及

牧师。这些人意识到殖民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公正以及他们被从他们的国家政治中排除了出去。然而，除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英属西非的沿海城镇外，很少有非洲人会从政治独立的角度来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363

泛非运动对受过教育的精英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泛非运动重新唤醒了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人的自信心。在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泛非主义声音来自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加维出生于牙买加，是全球黑人促进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和广泛发行的报纸《黑人世界》(*Negro World*)的创始人，但他本人从未访问过非洲。然而，他的浮夸风格以及“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驱逐出所有的欧洲人等自信满满的鼓吹，对许多年轻的、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这些非洲人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民族主义斗争中崭露头角。加勒比海地区和西非的法语作家通过一场名为黑人性(Négritude)的运动，培养起了一种全新的黑人尊严意识。塞内加尔的诗人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的作品充满着对非洲人的“黑人性(Blackness)”的赞美，充满着对非洲古代文化的深深自豪。对非洲人来说，黑人性是欧洲文化占统治地位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定心丸，它明确拒绝法国的“同化”政策。

这一时期，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只在埃及取得了实质性的政治胜利。战争期间，英国人对埃及人索要食品、牲畜和劳动力，这种压迫激起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在 1918—1919 年间的迅速发展。农民、律师、文职公务员、地主、基督徒和穆斯林罕见地展现了一种为争取一个独立埃及而斗争的团结精神。一群知识分子组建了一个叫华夫脱(Wafd)的政党，该党领导人为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该党的知识分子领导了这场运动。如果英国人没有对华夫脱党提出的要求作出回应，该党就发动示威、罢工和暴乱以促使英国人做出反应。1922 年，英国人同意埃及独立宣言，成功地平息了反抗运动。福阿德(Fu'ad)成为埃及国王，并组建了议会制政府。实际上，英国军队仍占领着埃及，权力的真正源泉在国王宝座背后。20 世纪 30 年代，“穆斯

林兄弟会”唤起了埃及新一代年轻人掀起更广泛的伊斯兰教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表达的是对议会、君主制所受到的欧洲人的影响以及议会和君主制政治腐败的不满。

南非的种族隔离、民族主义和反抗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推翻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欧洲殖民统治或少数白人的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 世纪前一二十年引领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南非,却是最后获得政治解放(1994 年)的国家。也正是南非,在 19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初,创办了非洲大陆最早的独立的基督教会与非洲人控制和编辑的报纸。紧接着在 1912 年,南非成立了非洲大陆第一个现代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但是这些开拓型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实现目标。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是白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逐渐巩固的过程,尤其是阿非利堪人(Afrikaner,指的是 17、18 世纪的荷兰殖民者的后裔,即布尔人)的统治。

在 1910—1940 年间,南非联邦的历届白人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强制推行种族隔离制度。这一隔离主义立法是建立在阿非利堪民族主义政府基础上的,该政府于 1948 年开始掌权,是他们建立并逐渐加强了这种种族隔离制度。隔离主要是为了保持白人在两个经济领域内的统治地位:采矿和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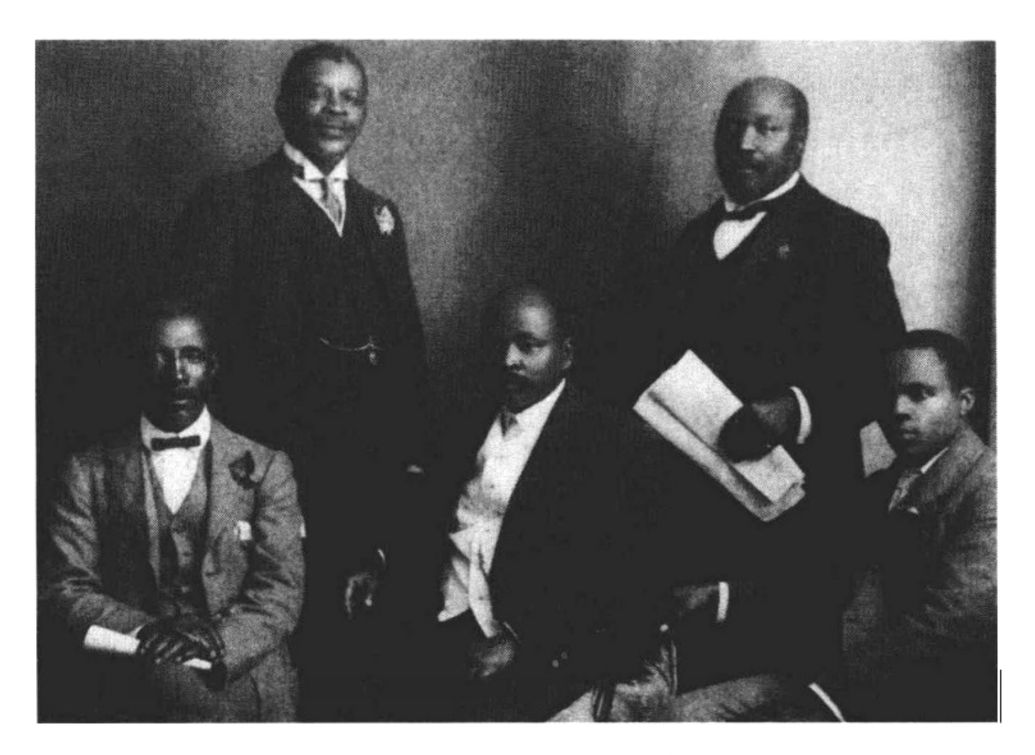
1913—1922 年间,在白人矿工的压力下,政府将采矿业中的“肤色隔阂”合法化了。所有技术性的和高薪职位都留给了白人,而黑人则被局限在非技术性的、低薪的职位上。1913 年的《原住民土地法》(*Natives Land Act*)不顾黑人数量已经超过白人五倍的事实,只给黑人划定了占联邦土地面积 7%的土地(1936 年提高到 13%)。这导致黑人被广泛地从白人土地上驱逐了出去,被赶进了原本人口就很稠密的“保留地”,或被迫迁移到城镇里去寻找工作。政府通过通行证做法(*pass laws*)控制劳动力的迁移,并阻止大量无业黑人在城镇里安家。黑人被迫在任何时候都要携带一个“通行证”以表明他们的“部

落"来源及其雇主的姓名。一个黑人如果被发现没有合法的通行证就会遭到逮捕、罚款或关押,并迫使他与一个白人雇主签订一份低报酬的劳动合同,或被驱逐到某个遥远的乡村"保留地"。1936 年,白人政府还剥夺了 1.1 万个黑人在开普省(之前的开普殖民地)议会中的选举权。在此之前,那些占有财产的或者拥有高薪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在联邦中的这一个省曾被允许进行投票。而现在,他们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黑人对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上所受到这些打击采取了许多种形式的抵抗。在农村,农民抵制政府对其牲畜的饮水和迁移的限制,并逃离家园以规避上缴赋税。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市地区,市政工人为了更好的报酬和工作条件不断展开罢工。1919 年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反通行证示威游行,1920 年有 4 万个矿工参加了罢工。然而在每次运动中,警察都动用了武力来驱散罢工和示威队伍,有成千上万名工人遭到开除。1919 年,一个来自尼亚萨兰的名为克莱门茨·卡达里(Clements Kadalie)的职员在开普敦码头工人中建立了工商业工人联盟(ICU)。当为争取更高工资的罢工取得胜利后,工商业工人联盟的声望如日中天,成员遍及整个南非,尤其在那些面临被驱逐命运的农村工人中。到 1926 年,工商业工人联盟宣布其成员达到 10 万之众。但是联盟的领导人不知道如何利用其潜在的力量,也不愿意号召进行大规模的罢工。因此,除了展示出全国工人意识的存在和未来联盟运动的可能性之外,联盟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就分崩离析了。

在 1912 年,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教师、职员、牧师、律师和新闻记者,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the 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1923 年改名为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但是,他们在策略上过于谨慎。他们严格在法律范围内展开工作,且将行动局限在会议、抗议和向政府请愿上。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南非政府并不把他们的抗议当作一回事,继续强制推进其种族主义立法。然而,这一时期

365



1914 年访问伦敦的非国大代表(从左至右):财务秘书托马斯·马皮科拉(Thomas Mapikela,东开普商人);牧师副主席瓦尔特·卢布萨纳(Walter Rubusana,组织部长,也是开普省唯一黑人议员);牧师主席约翰·迪尤布(John Dube,纳塔尔学校校长、报刊编辑);副主席索尔·姆塞恩(Saul Msane);秘书长索尔·T. 帕拉杰(Sol T. plaatje,北开普报刊老板兼编辑)

非洲国民大会的各种会议和会谈以及与印度裔的、"有色"人的(混种)政党代表的合作,为后来更广泛的大规模政治行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

1939 年 9 月，当英国和法国向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宣战时，它们的非洲殖民地又一次被卷进一场与非洲人无涉的欧洲冲突。20 世纪 20、30 年代，意大利、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法西斯政党用武力夺取政权，否定民主自由，认为附属民族是低劣种族(这些内容听起来都有点像是欧洲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法西斯主义者尤其致力于清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各个层面上的影响。1940 年 6 月 10 日，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让其国家站到了德国这一边。这个时候，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也已经加入所谓“轴心国”协议中来。1940 年 6 月底，德国军队已经侵占了法国北部，而且在法国南部的维希(Vichy)扶持了一个傀儡政府。法国上校夏尔·戴高乐成立了“自由法国”流亡政府。法国被分裂成法国“维希”政府和流亡的“自由法国”政府，这势必会对法属非洲殖民地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这种影响。 366

1941 年 6 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因此苏联也卷入战争中来。其间，日本军队忙于占领中国西部地区和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在 1942 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占领了英国人统治的马来西亚和缅甸，以及荷兰人统治的印度尼西亚。日本袭击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1941 年 12 月)，进而将美国也托入战争中来。反对轴心国的力量，那时已经站在美国、

苏联、英国及英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盟军这一方。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战争。但是非洲在这场冲突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欧洲、亚洲和北美在 1939—1941 年间被卷进全面战争,但非洲事实上早在 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就已经开始了反对纳粹的侵略战争。(欧洲人称埃塞俄比亚为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改后的名字是从阿克苏姆王国的古阿拉伯名中演变而来的。)

法西斯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及东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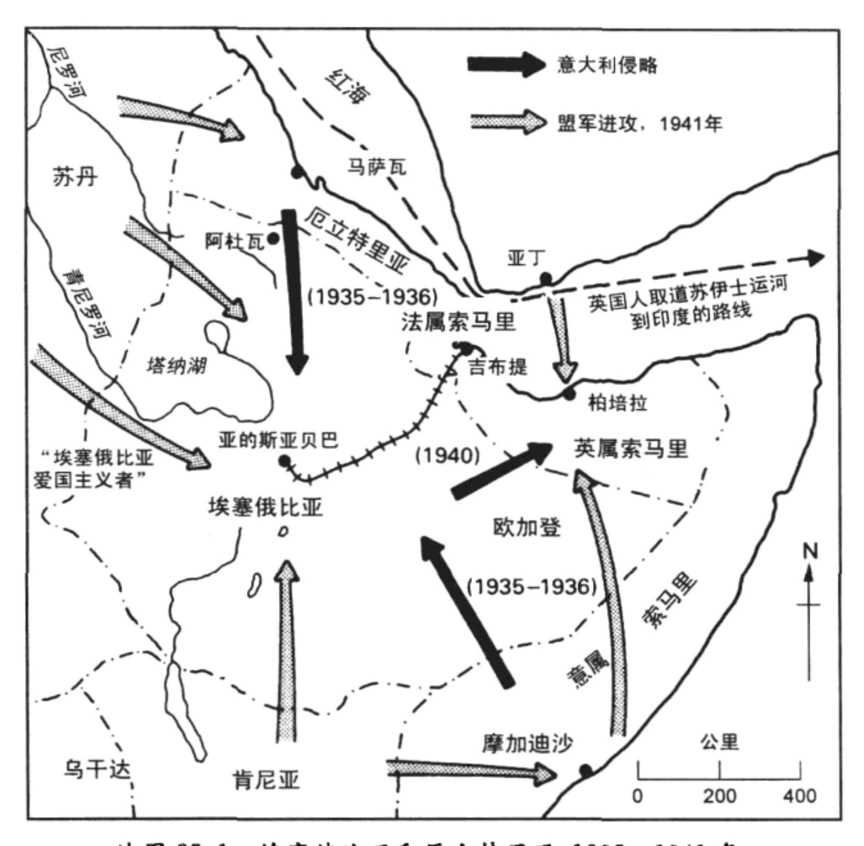
背景:意大利征服利比亚

意大利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欧洲强国,与其他欧洲竞争者相比,在瓜分非洲中所取得的成功很是有限。19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占领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南部海岸地区,但它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则在 1896 年的阿杜瓦战役中被挫败了。直到 1911—1913 年间,意大利才夺取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残留下来的最后一块独立领土利比亚。然而,利比亚东部沙漠的赛努西教派(Sanusiyya)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起成功的游击战争,使得意大利入侵者直到 1931 年还陷于困境。最后,意大利招募了数万意大利士兵,加上空中轰炸平民目标,在集中营里囚禁几十万平民,并在跨利比亚沙漠建造大规模铁棘网围墙,才镇压了赛努西教派的反抗。据估计有 10 万平民在集中营恶劣的环境中丧生。赛努西教派的领导人奥马尔·厄尔-穆科塔尔('Umar al-Mukhtar)于 1931 年 9 月被俘并被处死。由于他的死亡,利比亚的抵抗最终失败了。意大利军队这时才得以推进墨索里尼期待已久的计划,决定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亚,以雪阿杜瓦之耻。

367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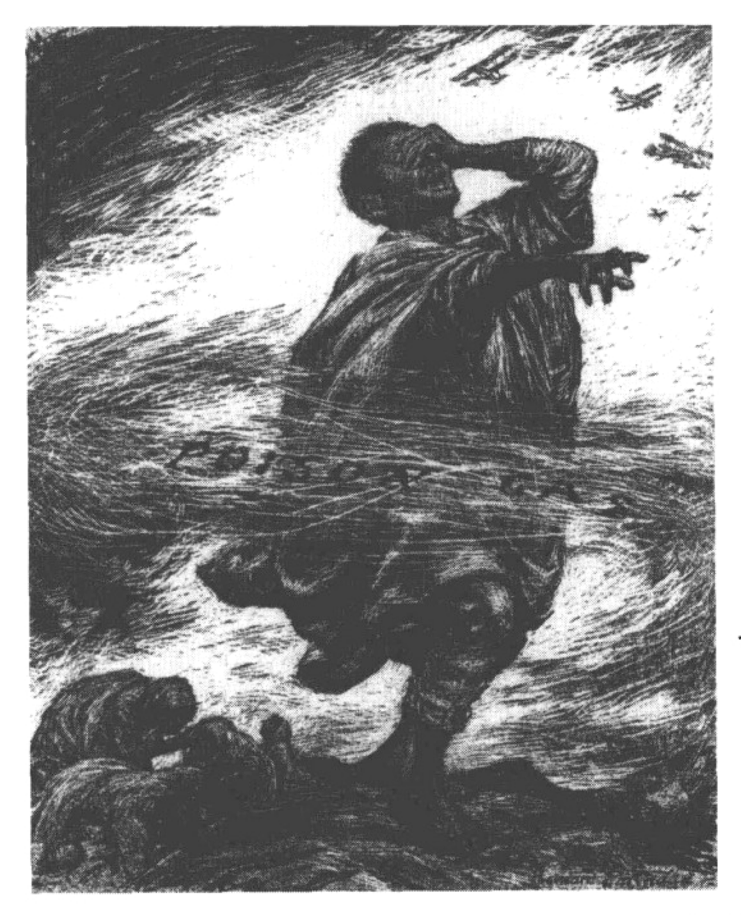
除了在 19 世纪 20、30 年代被非裔美国人殖民的利比里亚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唯一保留下来的独立国家,它尚未处在欧洲人任何形式的控制之下。绍纳贵族、孟尼利克(死于 1913



地图 25.1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1935—1941 年。

年)的远亲塔法里公爵(Ras Tafari)在 1916 年成为女皇的摄政王。1930 年，他成功地坐上了皇帝宝座，封号为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那时，埃塞俄比亚是国际联盟(联合国组织的前身)的成员国，海尔·塞拉西期望其他成员国家保护其国家免受意大利侵略。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注定要大失所望。1935 年 10 月，一支 12 万人的意大利部队越过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边境开进埃塞俄比亚。这一次，意大利人占据军事优势：拥有飞机、装甲车和现代炮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花了好几个月才完全征服了埃塞俄比亚。其间，他们对埃塞俄比亚乡村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轰炸村落以及从空中投放毒气。 368

尽管意大利军队在 1936 年 5 月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但他们从未控制整个国家。在意大利人占领的五年期间，埃塞俄比亚的游击队一直在进行零星的抵抗。在这一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意大利人虽然进行



1936 年,意大利以“进步”之名发起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并在空中投放毒气,报复 1896 年阿杜瓦战役中耻辱性的失败。正如《笨拙》的漫画所揭示的那样,英国虽然抨击意大利,但英国并没有在支持埃塞俄比亚上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直到 1940 年 6 月意大利对英国宣战。

了相当数量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他们的统治充斥着大量的暴力。例如在 1937 年 2 月,当埃塞俄比亚游击队暗杀总督格拉齐亚尼(Graziani)失败后,意大利人展开了报复行动,仅在亚的斯亚贝巴,三天内就杀了 6 000 多个埃塞俄比亚人。这种报复进一步地增强了埃塞俄比亚人的抵抗运动,大量被意大利军队强奸的妇女也加入了抵抗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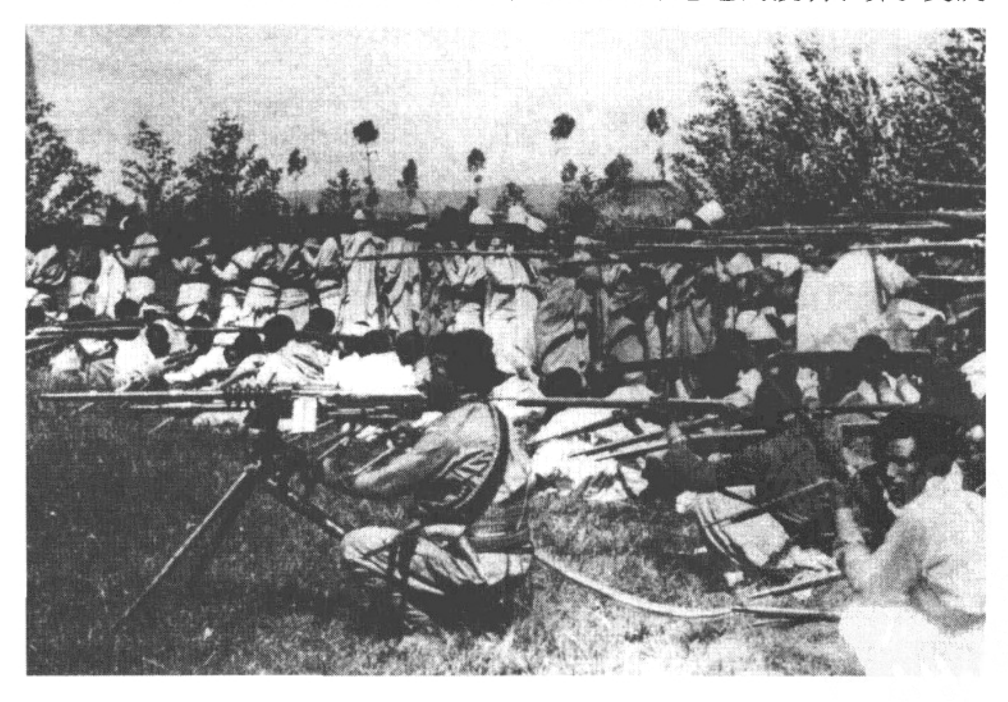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和国际联盟

1936 年 5 月,流亡欧洲的海尔·塞拉西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上

发表演说。他提醒道，国际联盟成员国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 8 个月中没有任何行动。他认为联盟的真正目的是要实现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平等，尤其是要保护小国免遭强国的侵略。他警告说，“国际道义”正在受到威胁：“上帝和历史将会记住你们的决断……难道所有（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要开创屈服于暴力的可怕先例？”但是联盟的主要大国，即英国和法国，并没有做出什么实际行动。埃塞俄比亚的“爱国主义者”不得不继续依靠他们自己的游击队进行抵抗。他们成功地使得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地区不受意大利的控制。同时，希特勒的德国军队依照墨索里尼的先例，正在准备进行国际侵略，最终导致了 1939 年欧洲战争的爆发。1940 年，在法国沦陷、意大利对英国宣战后，英国才改变了政策。 369

埃塞俄比亚的解放

1940 年 8 月，意大利军队从其在利比亚的基地出发，占领了英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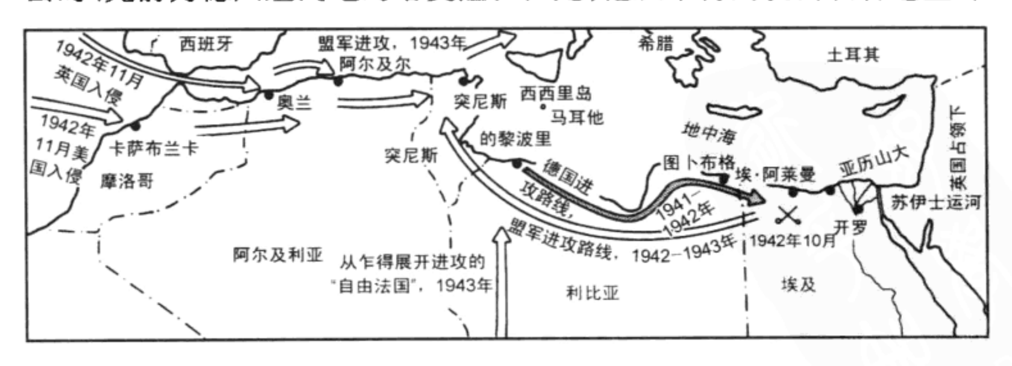
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爱国主义者”军队在演习。虽然他们没有装备最先进的武器，但是他们在 1941 年战争中的参与是迫使英国在击败意大利占领军后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索马里，并侵入英国控制下的埃及。不久，英国人被从欧洲大陆驱逐了出来，其苏伊士运河去往印度的航线面临着直接威胁，直到这时英国才在北非对意大利的侵略作出了回应。12 月，英国将意大利赶回了利比亚。1941 年 1 月，英国开始进入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返回苏丹南部领导一支埃塞俄比亚的爱国力量。英国从尼日利亚、加纳和塞拉利昂召集了数千兵力。比利时从刚果派遣了一小队非洲士兵，而自由法国的布拉柴维尔总督也从赤道非洲派送了一支小分队。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建立起志愿军。这些军队都在肯尼亚汇合。南非也派来了一支 20 万人的志愿军，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英属东非、西非和中非的黑人部队成为作战主力，而那些南非黑人，就像 1914—1918 年一样，并未被允许携带武器。1941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被夺回，海尔·塞拉西也恢复了皇位。英国尽管占领着欧加登(Ogaden)和厄立特里亚，但在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的问题上还是有些不情愿。

370

北非的战争

1941 年，希特勒派出了一支德国军队，即非洲军团，以支援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德国人迫使英国人撤回埃及，并开进到亚历山大港 100 公里以内的地区。德国人的目标是夺取苏伊士运河，此外还想夺取波斯湾的油田。与此同时，希特勒还有着长远计划，即跨越沙漠袭击南方，获得乍得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以及重新占领 1916 年失去的、先前为德国殖民地的喀麦隆。但是，他从未得到机会以将这些计



地图 25.2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1941—1943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海外服役的非洲士兵：缅甸战役。

划付诸实行。盟军最终在1942年10月的埃·阿莱曼(El Alamein)战役中突破了德国在埃及西部的战线。几乎同时，美国和英国部队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国和意大利部队在两面夹击下被赶回突尼斯。在突尼斯，德国的非洲军团的残余力量被迫于1943年5月投降。

371

非洲大陆的战争最终结束了。战争造成了北非尤其是突尼斯市区的巨大破坏。除了庞大的兵力损失，无数利比亚和突尼斯平民失去了生命和家园。1943年8—9月，非洲人从突尼斯出发，加入英国和美国的盟军军队，并一同攻入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而且，从法国和英国殖民地来的非洲军队继续在缅甸森林和东南亚展开反日战争，并立下战功。

法语非洲地区的战争

欧洲战争一爆发，法属西非就派出一支8万人的非洲人正规部队去保卫法国领地以免遭到德国人的侵略。这支部队在法国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还有许多士兵被德国人俘虏、监禁。1940年法国陷落后，法属北非和法属西非的殖民地官员宣称效忠于维希政府。这让他们在接下

来的两年时间内置身于战争之外。另一方面,乍得的黑人总督,南美法属圭亚那人费利克斯·埃布埃(Félix Eboué)则宣布效忠于流亡的"自由法国"政府。其他的法属赤道地区的总督纷纷效仿他的这一做法。一时间,布拉柴维尔成为流亡的"自由法国"政府的首都。许多法属赤道非洲人都在1941年的埃塞俄比亚战役中效力。1942年底,随着盟军攻入北非,法属西非的殖民当局宣布不再效忠于维希政权,转而宣布效忠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法属西非又一次为盟军战事提供了兵源和物资。1943年,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非洲人曾一度占"自由法国"军队总数的一半以上。

战争对非洲和非洲人的影响

人力和物力

我们已经提过非洲士兵对埃塞俄比亚、北非和东南亚战役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非洲在整个战争进程中都是盟军不可或缺的人员和物力来源地。然而,埃塞俄比亚一旦获得解放(1941年),要劝说非洲人协助盟军作战就变得比较困难了。英国人在自愿原则基础上正式招募非洲士兵,并且让酋长作为招募新兵的代理人。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他们有时也会施加相当大的压力来"劝说"非洲人自愿参军。法国人更加公开地依赖于强征非洲人入伍,以便为战争提供兵力。比如在1943—1945年间,法国从法属西非招募的士兵就超过10万人。

非洲作为盟军原料物资的一个来源地,其重要性在1941—1942年东南亚陷落于日本人之手后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殖民地官员软硬兼施,或强迫或劝说非洲人为盟军战事准备更多的物资。法属西非被迫生产更多的花生和棉花。东非森林地带变成了盟军棕榈油的唯一来源地。尼日利亚的锡矿曾使用了多达1.8万强迫而来的劳力。由于马来半岛种植园的丧失,许多人被迫到刚果盆地森林中收集野生橡胶,这使人想起了这个世纪前几十年所发生的情形。所有英属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的村落酋长都要在一些特殊田地上组织粮食种植,为战争生产

372

出额外的粮食。

战前欧洲主要的商业公司已经控制了非洲产品的销售，并对非洲农民的支付价格进行限定。在战争中，殖民国家被推进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整个东非、西非和中非，尤其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殖民当局建立了销售局来组织非洲人进行出口产品的生产。他们利用政府的政治权力进行官方限价。因此，尽管非洲棕榈油、橡胶、剑麻、花生、棉花、咖啡、茶叶和可可由于战时短缺在欧洲本可以卖个高价钱，但非洲生产者却在这样的贸易中一无所获。支付给非洲生产者的价格很低，而且是固定的。殖民政府能够将差价装入口袋，甚至还给盟军战事提供补助。同时，由于欧洲出现通货膨胀，非洲人为了买进同等数量的进口货物不得不生产越来越多的出口作物。

然而，战争并不只是对非洲的农民有消极影响。这也是一个富裕的和贫穷的农民、有田地的和无田地的人之间差距急剧扩大的时期。一些价格较高的作物，比如可可和咖啡其栽种者要比棉花和花生的栽种者赚得更多。另外，还有些避开销售局限价的途径。比如在肯尼亚，高价市场只对欧洲定居农民开放，但一些非洲农民却能将商品走私到自由市场，因而让他们的产品获得更高的回报。从中获利的人就是所谓“白人”高原地区的基库尤农民。基库尤人与白人殖民者之间在土地和市场问题上的矛盾加剧，并带来了潜在的灾难性后果，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贸易和军事需求，促使殖民政府大规模地投资于海港和机场，这种规模在早期殖民时期铁路投资之后就难得一见了。在西非的许多口岸，比如弗里敦和拉各斯，码头的吃水加深了，港口设施也得到了改善。弗里敦成为盟军调控南大西洋的一个主要口岸。阿克拉机场成为运送盟军部队去北非前线的一个重要的终点站。在这段时期，有更多的非洲人迁入发展中的城市中心以谋求营生。其中有些人是为了规避农村地区的强迫性种植，另一些人则是被海军港口建设提供的报酬吸引过来的。

在南非联盟内部，战争刺激性地推动了制造工业的巨大发展。由

于欧洲出口产品的短缺,南非开始自己生产食品、服装、化学制品、机械和工具。盟军船舶维修极大地推动了南非的钢铁制造业。1943 年,钢铁制造业已经超过采矿业成为产值最大的行业,从事该行业的劳动力最多。由于不断加重的土地限制和乡村贫困,黑人蜂拥到威特沃特斯兰德、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这些不断发展中的制造业中心。这是南非黑人城镇化的一个主要时期,也是为许多人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的一个时期。但是,它也是城市黑人越来越贫穷和失业率不断上升的一个时期,因为谋求工作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可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战后,当在海外盟军部队服役的 20 万白人和 10 万黑人返回南非时,形势接近爆发危机的临界点。

373

战争的政治和心理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殖民国家曾动用相当数量的军力迫使非洲人在战时支持其殖民宗主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期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武力胁迫,但殖民国家更倾向于鼓励和邀请非洲人支持欧洲战事。那时所用的许多种劝说方式现在被定义成赤裸裸的误导和宣传。然而,它标志着对过去统治方式的一种重大突破。尤其是英国人,他们运用电影、无线电和官方赞助的报纸来推广战时宣传。他们试图说服非洲人与殖民当局合作,自愿地参与战时服务或者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原料。殖民当局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试图说服非洲人,而不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方式。殖民当局也承认有必要解释他们的政策以及公开与非洲属民进行讨论。对此,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很快就作出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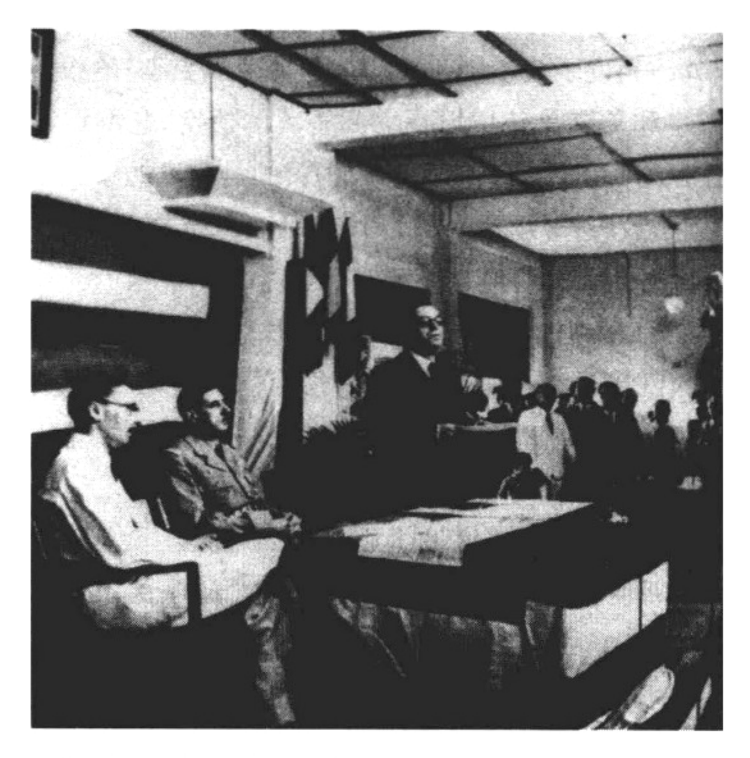
少数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职员、教师、律师、牧师和记者——的声音在战时的法国和英国殖民地已不再被忽略了。他们将当地报纸和战前福利会作为表达他们观点、尤其是抨击殖民统治诸多方面的一种工具。20 世纪 30 年代,非洲人创办了大量报纸。这些报纸的影响在战时快速增长。当一份报纸在市场和远离主要城市中心的村民会议场所被大声朗读的时候,它将很可能有广泛的听众。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非洲人广泛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

程和议题。比如创办于1938年的尼日利亚的《西非导报》(*West African Pilot*)刊发了关于1941年8月《大西洋宪章》的报道。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之间签署的协定,它制定了英美政府获得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则。与非洲人相关的是宪章的第三条:"……它们(英国和美国政府)尊重所有民族按自己意愿选择政体的权利;它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能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西非导报》批判性地提到,丘吉尔很快声明第三条原则不适用于非洲。整个大陆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纷纷写信给当地报纸进行抗议,并认为《大西洋宪章》的所有条款应适用于非洲。政治独立第一次开始成为新兴非洲政治组织最为重要的主题。

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震惊了非洲人和大西洋两岸的非洲后裔。截至那时,埃塞俄比亚一直是非洲人自尊及独立于欧洲文化和政治统治的一种象征:它自豪地将非洲人与非洲历史根基和古代文化连接在一起。1941年,埃塞俄比亚的解放虽是由英国人领导,但主要还是依靠非洲人的力量取得的,这对许多非洲人来说都是一个鼓舞:埃塞俄比亚的今天,为什么不能成为其他非洲国家的明天?这就是战争结束不久,1945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五次泛非大会的整体氛围。这次大会的主旋律就是结束殖民统治和推进非洲的政治独立。实现这一目标的时机和方式依然并不清晰,但像黄金海岸的恩克鲁玛和肯尼亚的肯雅塔这样的非洲代表却在心中有了清晰的目标,并带着这种目标回到各自的国家中去了。 374

甚至是在非洲最偏僻的乡村地区,强迫种植、征兵和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都让人们对殖民政权的不满日益加深。返乡的退伍军人感受到这种不满,他们已经拓宽了视野并认识到当地殖民行政官的残暴。之前,大部分非洲人见过的只是有钱、受过良好教育并握有权力的欧洲人。战争期间,非洲人与各个劳动阶层的欧洲人并肩工作和战斗,并发现他们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区别。非洲人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也攻打并杀死过欧洲人。非洲人在欧洲也看到了欧洲人的贫困和战争的野蛮。有一定阅历的非洲人,不会再作为一个温顺的和服从的殖民地劳力而



1944 年 1 月，戴高乐的布拉柴维尔会议。他坐在自左起的第二个座位上。此时，所有法国的非洲殖民地都宣布效忠于“自由法国”。此次会议没有邀请非洲人，却宣布赞成对殖民体系进行至少是在社会和经济层次上的改革，而通向自治政府的政治改革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没有可能。然而，自 1945 年后，政治改革很快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375 回到自己的国家。很少有退役军人能在后来独立运动的领导层中真正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削弱欧洲人在非洲的光环和威望方面，他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助于改变欧洲人自己对其非洲殖民地的态度。欧洲盟国，尤其是法国，在战争期间清楚地意识到了它对非洲所犯下的罪行。为了确保非洲能持续地提供物资供应，欧洲殖民者被迫答应在盟军取得胜利之后对非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改革。1944 年，自由法国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戴高乐还特别承诺将给法属非洲领土的属民带来一项“新政”。意味深长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一个非洲代表，更没有任何关于非洲政治独立的提议。但是在 1946 年，紧随布拉柴维尔承诺而来的是废除备受憎恶的土著管

理制度和强迫劳役制度。英属西非在战争期间不断地将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提拔到更高层的管理职位以及民选地方议会中来。当非洲人被准许实现一定程度自治时，英国殖民者开始盘算这种自治实现的时间表。然而，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葡萄牙人却感觉没有这样的义务在其非洲殖民地上进行改革。

第二十六章　赢得独立(一)

376　　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论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对非洲的依赖促使主要殖民国家英国、法国改变了对其非洲殖民地的态度。葡萄牙和比利时在此期间并没有什么关于变革的规划。而另一方面,法国和英国殖民地的经济潜力也已经得到清晰的展现,这也反映在殖民地的战后发展战略中。

殖民地的发展战略

1940 年、1945 年的英国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s)以及法国类似组织——投资、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Fonds d'lnvestment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Social,FIDES,1946)为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投资筹集了基金。然而,很多经济投资都直接由欧洲殖民主义者控制的部门来把持。这些投资项目有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的采矿业、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的定居者农业以及几内亚和加蓬的商业木材砍伐等。而在人口最多的农村地区却没有多少有效的投资。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英国试图通过使用现代机械和听取科学专家的建议来促进非洲"农场主"的发展。但是,所涉及的人数相对较少。只要是政府试图大规模地组织和促进农民生产,那么规划常常因构思不成熟而失败。

英国在扩建苏丹灌溉工程上的投资提高了塞纳和喀土穆之间贾扎伊尔项目的棉花产量。但是,法国试图在尼日尔河上游发展同样的棉花和水稻项目却遭到了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与那些要到这些项目上劳作的农民提前进行商议。同样地,由于没有充分的调研和缺乏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磋商以及进一步的计划,英国在坦噶尼喀的花生项目也遭到了失败。在乌班吉沙里(今天的中非共和国)地区,尽管有着严重的交通问题,但是法国还是试图将该地区变为棉花出口地区。在此过程中,法国重新回到强迫劳动力的老路上来了。

一般来说,殖民政府太急于命令和指导而非咨询和支持当地非洲人的建议。出于欧洲的需要,殖民地在战后经济规划上依然试图将非洲发展为一个原材料的进口地和制成品的出口地。在 20 世纪 40 年代,殖民政府并没有想到要培育非洲的独立自主,以便为从欧洲独立出来作准备。然而,欧洲对非洲产品需求逐年提高,20 世纪 50 年代成为非洲矿产、农业原材料出口的高峰期。这一阶段非洲农民取得的发展只是由于政府在市场和土地使用上限制的放松,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投资。

377

尽管这一时期殖民地的经济投资存在缺陷,但政府在非洲社会福利上的投入还在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对非洲民族主义者要求的回应。殖民地政府第一次开始正式地在非洲教育、卫生设施扩建上进行投资。主要的行政中心都建有新的医院,但是在卫生领域,政府主要关切的是疾病预防。针对采采蝇、传播疟疾的蚊子的灭虫和控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教育的重心仍然放在小学上。到 1960 年,几乎只有 3%—4%的非洲青少年进入中学。然而,非洲还是缺乏更多的教师和高级公职人员。英属东非和英属西非开办了很多大学:伊巴丹(Ibadan,尼日利亚)、莱贡(Legon,黄金海岸/加纳)、喀土穆(苏丹)和马凯雷雷(Makerere,乌干达)等大学。法国推行同化政策,认为想获得高等教育的非洲人要到法国去上大学。

从政治上说,英国和法国的战后目标是要推行改革,从而渐进地发

展非洲内部的自我治理能力,但要在殖民国家所确定的步骤的引导下进行。两国都认为前殖民地将会继续留在英法帝国范围内。从这方面上来说,欧洲将会继续主导非洲的经济。但是,主要的殖民大国很快就明白,他们不再能掌控非洲政治变革的步骤了。非洲民族主义运动高潮决定了变革的步骤,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带来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第二十八章将讨论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没能取得实际上的经济独立。)

在下面的地区纵览中,我们将会看到法国、英国殖民地有着不同的独立路线。一般来说,白人定居者的数量越大,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在大多数西非国家中,欧洲定居者很少。除了葡属几内亚外,殖民当局对非洲人要在自己的自治政府中拥有更大权力分享要求的反应还是积极的,或许有时也有些不情愿。相对照的是,在白人的密集居住地,如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白人定居者本身就参与阻止独立的进程。因此,在这些殖民地,非洲人只有经过长期的、血腥的解放战争才会获得自由和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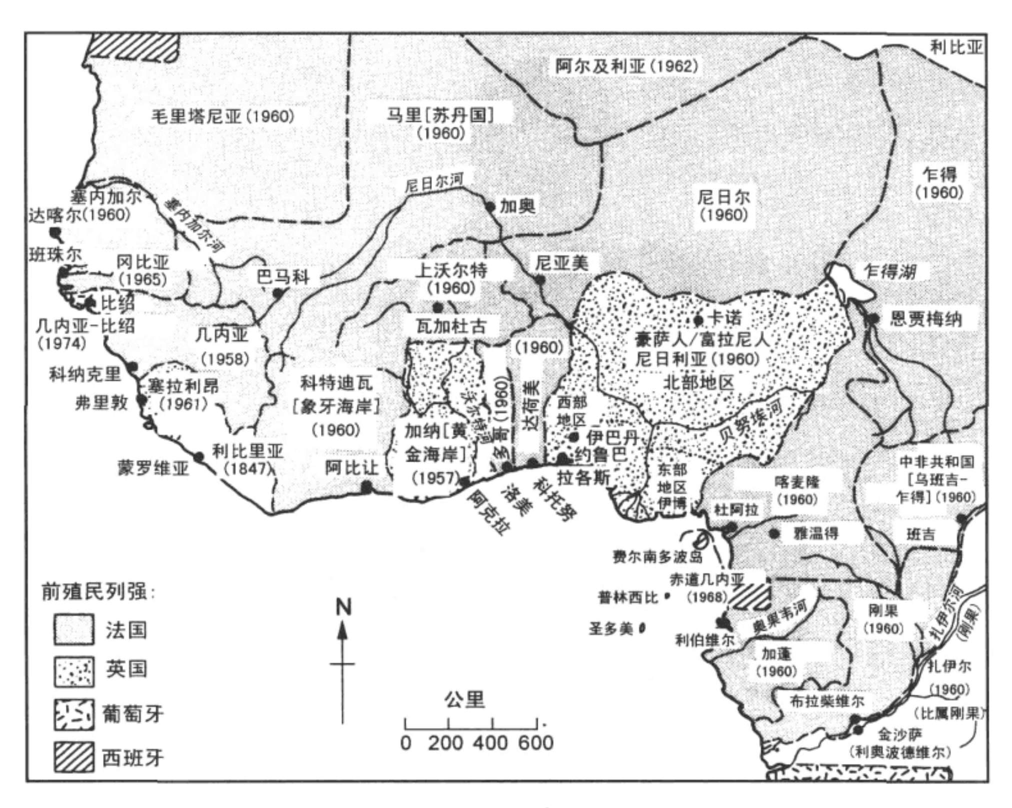
英属西非赢得独立

加纳

1947 年的印度独立运动预示着英帝国的瓦解。非洲自治政府也不会落在后面。在英属西非,独立运动是由黄金海岸殖民地,即很快成为独立国家的加纳来领导的。1946 年,英国修正了黄金海岸的宪法,成立了非洲人占多数的立法会。然而,大多数非洲代表都是由国家酋长任命的。英国虽然要推动非洲自治政府的出现,但还是相信要通过对现有的“间接统治”制度的渐进式改革才能实现。这个立法会将人数虽少但影响颇大的受过教育的群体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人肯定会在政府中占据更多的席位。

378

1947 年,阿克拉以及其他沿海城镇里的众多富有商人和律师成立了黄金海岸统一大会(United Gold Coast Convention,UGCC)。他们



地图 26.1　西非的独立。

希望修改 1946 年宪法,在政府成员中增加由选举产生而非指定的代表。来自黄金海岸南部的一名教师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受邀成为这个新党的书记。恩克鲁玛是新近从美国接受数年高等教育回国的,在美国他受到激进的泛非主义者马库斯·加维思想的影响。恩克鲁玛认为马库斯·加维的思想可能会实现 1945 年曼彻斯特泛非大会的目标,那次大会恩克鲁玛也参加了。

379

1948 年 2 月,阿克拉发生的一个事件加快了整个运动的进程。在非洲前公职人员抗议生活成本加大的和平游行示威中,警察开枪了。枪击事件很快就引发了阿克拉、库马西及其他城镇的动乱。政府怀疑黄金海岸统一大会是动乱的策划者。恩克鲁玛和该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数月。动乱让英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 1946 年的宪法。恩克鲁玛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恩克鲁玛从监狱中出来后就建立了自己的、也更为激进的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克瓦米·恩克鲁玛(1909--1972 年),加纳第一任总理,也是后来的第一任总统(1954—1966 年在任)。

Party)。恩克鲁玛提出要立即实现独立,强烈地吸引了大量群众加入其政党。他呼吁要进行"积极行动"以支持这些要求,示威游行、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由于其颠覆与破坏,恩克鲁玛立即再次遭到逮捕。然而,其策略还是成功的。

英国修改了 1946 年宪法,立法会成员更多地由非洲人主导。人民大会党在 1951 年的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恩克鲁玛从监狱中出来后成为政府事务的领导人。然而,1951 年宪法依然保留了一半议会席位给酋长指定人。为了制定一部新宪法,并在该领土内实现一个全部由选举产生、内部自治的政府,恩克鲁玛花了三年时间与总督阿登·克拉克(Arden Clarke)进行谈判。人民大会党赢取了新一轮选举,恩克鲁玛也成为总理。

380 黄金海岸在 1957 年成为独立国家加纳。但是,人民大会党虽然得到广泛支持,但并没有得到所有民众的支持。加纳人口中重要的一部

分是种植可可的阿散蒂农民,他们不满于恩克鲁玛保留市场委员会这一做法,因为市场委员会为政府带来巨额利润,却给农民限价。阿散蒂人成立了一个名为民族解放运动(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的地方性政党。他们并不信任控制着沿海城镇和政府的恩克鲁玛和南芳蒂人。很显然,未来还是有着严重的挑战,但是此刻,恩克鲁玛的加纳激励了非洲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

尼日利亚

加纳成为英属西非地区走向独立的过渡方式的样板。然而,加纳是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人口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也只有约 500 万。相比而言,尼日利亚是个大国,领土分裂,人口达到 3 500 万(1953 年)。尼日利亚南北是两块独立的领地,各自自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48 年。尼日利亚南部,在约鲁巴人的西部和以伊博人为主的东部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地区分裂。

1944 年成立的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全民大会(National Council of Nigeria and Cameroons)标志着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就是领导人之一,他是《西非向导报》一名直言不讳的编辑。虽然该党的主要支持地区仅为东南部的伊博农村,阿齐克韦还是想让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全民大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1949 年,其他地方性政党,即约鲁巴行动集团(Yoruba Action Group)、豪萨/富拉尼人的北方民族大会(Northern Peoples Congress)相继成立。由于各党派在一部适合的宪法上没有取得共识,独立被拖延了下来。国家应有单一的统一政府?国家应是一个由地方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国家吗?或者国家应分裂为三个或更多完全独立的国家?保守的北方穆斯林很担心由在文化上已经“欧洲化”的南方人来统治国家。就是北方内部,也由于长期存在的贵族政治统治而产生了矛盾。最终,联邦方案形成,尼日利亚于 1960 年 10 月宣布独立,北方的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Sir Abubakar Tafawa Balewa)成为总理。但是,原来的紧张关系肯定会导致未来的地区冲突,内战即将爆发也已

一目了然。

塞拉利昂与冈比亚

1961 年塞拉利昂的独立,对内陆受过教育的门德人(Mende)来说,是对之前统治弗里敦的克里奥尔人的胜利。冈比亚小国的独立遭到了拖延,主要是因为当时它正在讨论并入更为强大的邻国塞内加尔的可能性。冈比亚民族主义者反对合并,因此在 1965 年,冈比亚宣布为独立国家。

法属西非与法属赤道非洲赢得独立

法属西非与赤道非洲地区的政治独立有点不同于英属西非地区。

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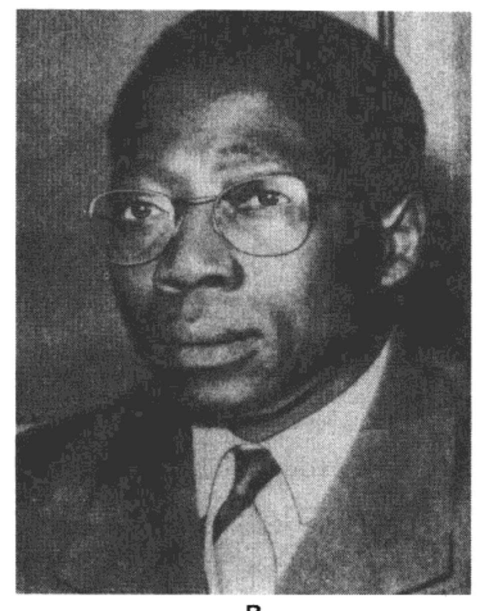
米尔顿·马尔盖爵士(1895—1964 年),首个获得医生执照的塞拉利昂人(1926),1954 年当选为首席部长,并在后来成为塞拉利昂首任总理(1956—1964 年)。

法国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操控改革步伐,并要将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纳入到“大法兰西”。在文化上已经遭到同化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安排,但是期望能和法国公民一样受到平等对待。但是,非洲人很快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1946年改革中,法国废除了受人唾弃的差额劳工制度。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总共可以在巴黎的法国国家议会中有10名代表。但这只是给了非洲人2.5%的席位。如果非洲人受到法国本土那样的平等对待的话,非洲属地要占有50%的席位。

非洲代表组建了一个政党,即非洲民主联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 RDA),由科特迪瓦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领导。然而,法属非洲有着不同的地区利益,代表不同地区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政治家们肯定不会将团结维持太长时间。1948年,塞内加尔民族主义者及重视黑人性传统的诗人利奥波尔德·桑戈尔从非洲民族联盟中独立出去,成立了塞内加尔民主党(Bloc Démocratique Sénegalais,BDS)。1951年,塞内加尔民主党在法国国民议会中为塞内加尔赢得了两个席位。

非洲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是与法国谈判中所要提出的方案。塞内加尔赞同像尼日尔、乍得和苏丹(马里)这样的穷国应实行联盟解决方案。法属西非应组建为一个联邦,法属赤道非洲则组建另一个。这样,每个联邦就有足够的实力在未来与法国的谈判过程中坚守立场。此外,桑戈尔希望塞内加尔可以领导在经济上弱一点的其他法属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可以充当这样一个联邦的首都,法属西非总督的官邸也可以留在这里。乌弗埃-博瓦尼则反对联邦,因为他担心这将会让科特迪瓦(咖啡、棕榈油和可可出口)来补贴萨赫勒地区的穷国。 382

在1954年爆发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的压力下,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进一步推进了改革。这些改革将会在1956年前带来这些地区各领地上完全由选举产生、内部自治政府的出现。法国国民议会中非洲代表席位依然保留,乌弗埃-博瓦尼加入了1956年的法国内阁。但是,法国依然控制着非洲军事、外交事务和经济发展规划,非洲远远没

A   B

A. 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1905—1993 年),法国国民议会议员(1946—1959 年在任),科特迪瓦总统(1960—1963 年在任)　B. 利奥波尔德·桑戈尔(1906—2001 年),诗人、作家,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黑人性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作战,并被俘获,后成功脱逃出来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并继续作战(1942—1944 年)。法国国民议会塞内加尔代表(1946—1958 年),马里联邦(马里/塞内加尔)联邦议会主席(1959—1960 年在任),也是独立后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960—1980 年在任)。

有“独立”。而且,在乌弗埃-博瓦尼的影响下,1956 年的基本法(Loi Cadre,即 Outline Law)废止了可能的非洲联邦计划。

随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压力越来越大,1958 年上台的戴高乐决定要避免西非、赤道非洲可能的冲突。他给各个殖民地下最后通牒,要么说“是”,维持与法国的联系;要么说“不”,断了与法国的所有联系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大部分法语非洲国家突然面临这样尖锐的选择都决定要维持与法国的联系。只有在工团主义者塞库·托雷(Sekou Touré)领导下的几内亚,投票说“不”,并立即成为独立国家。法国也做出回应,试图压制这个“反叛”的国家,以便向其他国家彰显非洲国家对法国的“依赖”。所有法国国内的公职人员、经济援助和装备都从几内亚撤出,甚至包括政府文件和文件柜,还拆了办公室的电话。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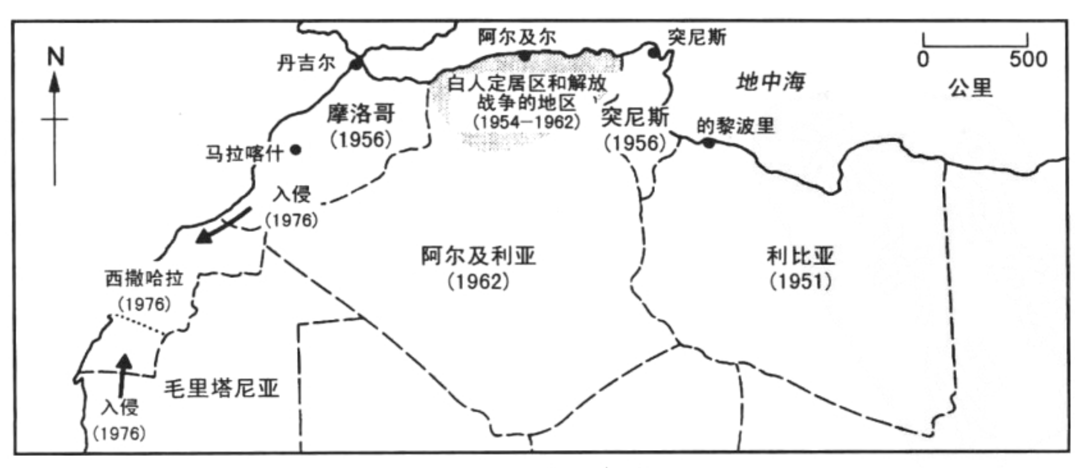
在法国军队中任职的几内亚人被立即遣散,并且没有发放津贴。这些军人返回到科纳克里的街道,成为不满与动乱的一个潜在势力。然而,几内亚还是在新近独立的加纳和苏联的紧急援助下挺了过来。原先在法国军队中任职的士兵被塞库·托雷政府所雇用,从事经济发展项目上的工作。

随着英属西非独立运动高潮的到来,其他法属西非领地的领导人很快就向戴高乐施压,要求独立。为了确保法国与非洲持续的经济联系,戴高乐同意了他们的要求。1960 年成为"非洲年",13 个法属非洲领地都成为了独立国家。

马格里布为争取独立而斗争

摩洛哥与突尼斯

法国一直用"间接统治"的方式来统治摩洛哥,主要是以苏丹的名义来统治,且将摩洛哥作为法国的一个"保护领地"。在战后,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站在了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一边,要求独立。法国试图通过废黜苏丹,并在 1953 年将他流放到马达加斯加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策略反而引起了反弹。穆罕默德五世成了民族英雄,旨在争取独立的摩洛哥"解放军"也成立了。到 1955 年末,法国正在承受阿尔及利亚解



地图 26.2 马格里布的独立。

放战争所带来的不断加大的压力,为了集中力量来应对这个定居者最多的殖民地,法国屈服于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意让摩洛哥和突尼斯独立。穆罕默德五世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回到了摩洛哥,突尼斯民族主义领导人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也从监狱中放了出来,这两块领地都在 1956 年 3 月成为独立国家。

384

西撒哈拉

在此期间,西班牙依然占有矿产丰富的沙漠殖民地里奥德奥罗(Rio d'Oro,即 Western Sahara)。1976 年,西班牙同意撤出,该领地北部并入摩洛哥,南部则并入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都派遣军队占领了沿海地区。20 世纪 70 年代,沙漠本土的阿拉伯-柏柏尔人成立了西撒哈拉独立阵线(Polisario Front),他们决定抵抗外国占领。由于得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援助,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发动了游击战,反对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占领。1979 年,毛里塔尼亚撤出,但与摩洛哥的斗争依然继续。这造成了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间关系的恶化,



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的一幕:一名被抓获的阿尔及利亚人被为法国作战的阿尔及利亚人包围着,1961 年。

也造成了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在是否承认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为独立的西撒哈拉合法政府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阿尔及利亚

法国不同意让阿尔及利亚独立。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白人定居人数最多的殖民地，到 1945 年，阿尔及利亚有 200 万法国定居者。1945 年，穆斯林的新民族主义意识被激发起来。1945 年 5 月，殖民地警察对在内陆城镇塞提夫(Sétif)进行和平示威游行的民族主义者进行开枪镇压，由此引发了民族主义运动。在动乱以及随后的殖民地报复中，有 100 名欧洲人和多达 8 000 名穆斯林死亡。这一天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觉醒的日子。1946—1947 年法国政府进行的改革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阿尔及利亚人。越来越多的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投身于全面的解放战争。

1954 年 10 月，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战争。民族解放阵线最初在奥雷斯(Aurès)山区建立根据地。1955 年 8 月，起义蔓延到君士坦丁，一天内就有多达 70 名欧洲定居者被杀。此次事件后，法国认识到他们正面临着全面的反抗，便开始从法国本土调遣 1 万多人的部队进入了阿尔及利亚。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升级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在其他非洲领地独立问题上的让步。

385

到 1958 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多达 50 万人。但是，法国人对起义的镇压让更多的阿尔及利亚人加入解放阵线的部队。这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死了数千士兵的法国军队造成了数十万阿尔及利亚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非武装平民，法国军队指责他们协助游击队员。民族解放阵线内部并不团结，每个地区事实上都是各自为政。到 1962 年，他们联合起来迫使法国政府压制白人定居者的吁求，并开始与他们谈判独立问题。

独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是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他是民族解放阵线内部一个派别的政治领导人。在战争期

间，他曾被法军抓获并关入监狱。独立后，艾哈迈德·本·贝拉极为依赖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上校指挥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部队来强化民族统一。本·贝拉是如此依赖于布迈丁的支持，以致于这名上校在1965年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中取代了本·贝拉。

利比亚

利比亚自1943年以来为英国所占领，独立于1953年，塞努西教团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伊德里斯(Idris)做了国王。20世纪60年代，利比亚沙漠中发现有丰富的石油储备之后，伊德里斯就于1969年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hdhafi)上校推翻。卡扎菲要发动一场激进的穆斯林革命，要在穆斯林人口中进行更平均的财富分配，也要依照《古兰经》和卡扎菲自己关于革命方针的“绿宝书”来进行统治，重新回归非世俗的信仰生活。卡扎菲的革命是以圣战的形式来反对反穆斯林力量。他决定在国内清除“西方”(欧洲和美国)的影响，不让西方开采利比亚矿产资源，同时要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将利比亚变为一个重要的团结的力量。北非和跨撒哈拉地区的一些政治领导人担心卡扎菲要建立一个由利比亚人主导的、像前几个世纪那样大规模的伊斯兰大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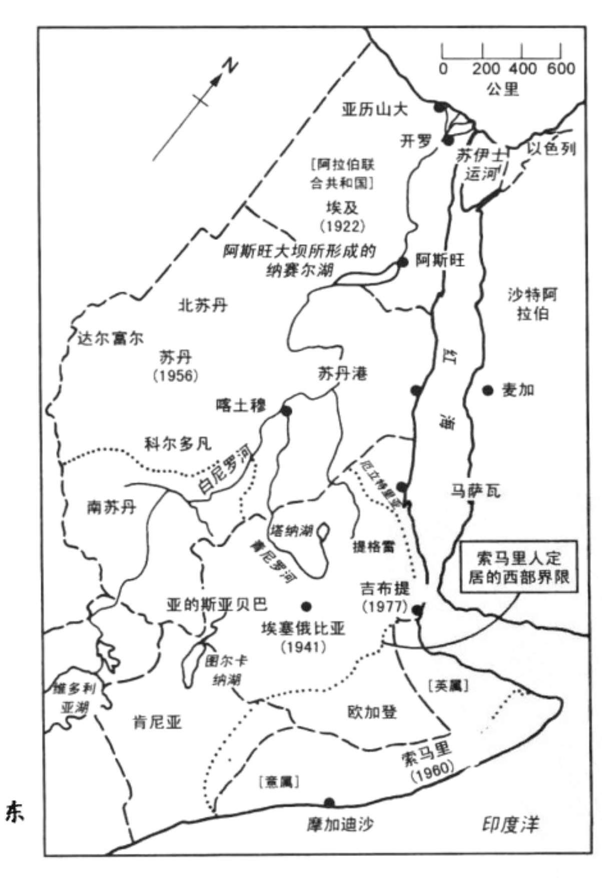
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

埃及

1944年，英国结束了对埃及的占领，埃及再次重获独立。法鲁克国王和旧有的奥斯曼地主贵族的腐败、专制政权在1952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1948—1949年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的埃及耻辱性的失败让军官们行动起来，将罪责都归咎到法鲁克国王头上。1954年，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Abd al-Nasir，英文常拼为Abdul Nasser)上校接管了军事委员会并成为埃及总统。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1918—1969 年),埃及军队的陆军上校,1952 年 7 月推翻法鲁克国王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1954 年成为埃及总统,先后三次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总统,1956—1969 年。



地图 26.3　东北非的独立。

387 纳赛尔出身低微，但决心改变法鲁克政权的不正义，主要就是土地分配问题。埃及很多可耕地掌握在少量富有地主的手里。埃及2 000万人口中绝大部分人依然无地，处于赤贫状态。纳赛尔没收了大片土地并在农民中进行土地再分配。

1956 年，纳赛尔政府从占有并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法国公司那里夺取了运河。这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精心筹划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旨在推翻法国、英国在该地区依然持续存在的控制权。但是，纳赛尔也想从运河中获得收益以增加埃及人的福祉。他尤其需要为其雄心勃勃的、旨在扩大尼罗河下游流域的土地灌溉范围的阿斯旺水坝项目筹集资金。英法通过进军埃及并试图占领运河区来作为对运河国有化的回击。但在埃及人的反抗和美苏的反对下，英法被迫撤军。1956 年英法军队灰头土脸地撤军后，埃及政府将所有剩下的法国、英国在埃及的公司国有化。纳赛尔在“苏伊士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西欧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对埃及经济的控制。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无可争议的领导国。

苏丹

1954 年，埃及放弃了对苏丹统治权的要求，这种统治权的要求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时期穆罕穆德·阿里的征服活动。接着，英国为苏丹议定了一部将在 1956 年生效的独立宪法。这只是一种草率的安排，内部的统一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英国在苏丹的殖民统治时期内，穆斯林主导的北方和非穆斯林主导的南方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个独立的领地。独立后，北方人开始在南方发动一场穆斯林化运动，并把这场运动作为加强国家统一的手段。但是，在非穆斯林的南方人看来，北方的苏丹人与英国人的统治一样不能接受。结果就导致了内战的大爆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大部分时间内，内战几乎让国家四分五裂，而 20 世纪 80、90 年代，这种情形再次重演。

厄立特里亚

1941 年后，之前为意大利殖民地的厄立特里亚被英国占领。沿海平原

的厄立特里亚穆斯林赞同完全独立,但他们的抱负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干预而遭到破灭。这个内陆帝国的政府将非殖民化时期看作一个重新获得出海口的良机(16 世纪突尼斯人的占领造成了马萨瓦的丧失)。英国对此积极回应,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岛上阿拉伯穆斯林实力崛起的时期,英国很是热心地与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建立牢固的同盟关系。因此,英国反对厄立特里亚完全独立出去,并在 1952 年将厄立特里亚交给了埃塞俄比亚,让厄立特里亚作为一个自治邦留在埃塞俄比亚联邦内。后来,海尔·塞拉西皇帝不再承认厄立特里亚人这种有限的政治独立,在 1962 年将厄立特里亚作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份并了进来。厄立特里亚的穆斯林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解放运动很快就发展成一场武装斗争,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帝国主义行径。 388
厄立特里亚人花了 30 年的时间才最后取得了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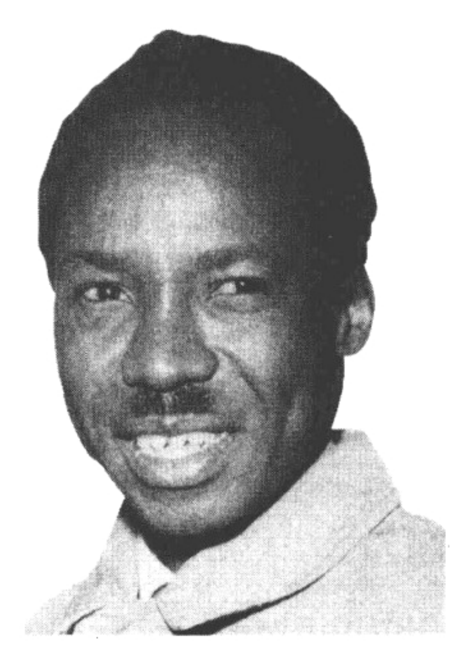
索马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属索马里成为意大利托管的联合国托管领地。1960 年,英属与意属索马里取得了独立,它们合并起来成立了索马里共和国,首都定在摩加迪沙。试图与埃塞俄比亚欧加登的索马里人建立一个更大的索马里联盟的努力,让索马里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埃塞俄比亚展开了漫长而又残酷的战争。在与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初期,索马里政府还可以依赖苏联的支持。但在海尔·塞拉西于 1974 年被推翻后,苏联改变了立场,转而给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准将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提供军事援助。1978 年,索马里部队最终被从欧加登驱赶出来,大索马里联盟的梦想也随之终结。与此同时,战争和 1974—1975 年间的大旱实际上摧毁了很多欧加登索马里人之前的游牧经济。

英属东非赢得独立

坦桑尼亚(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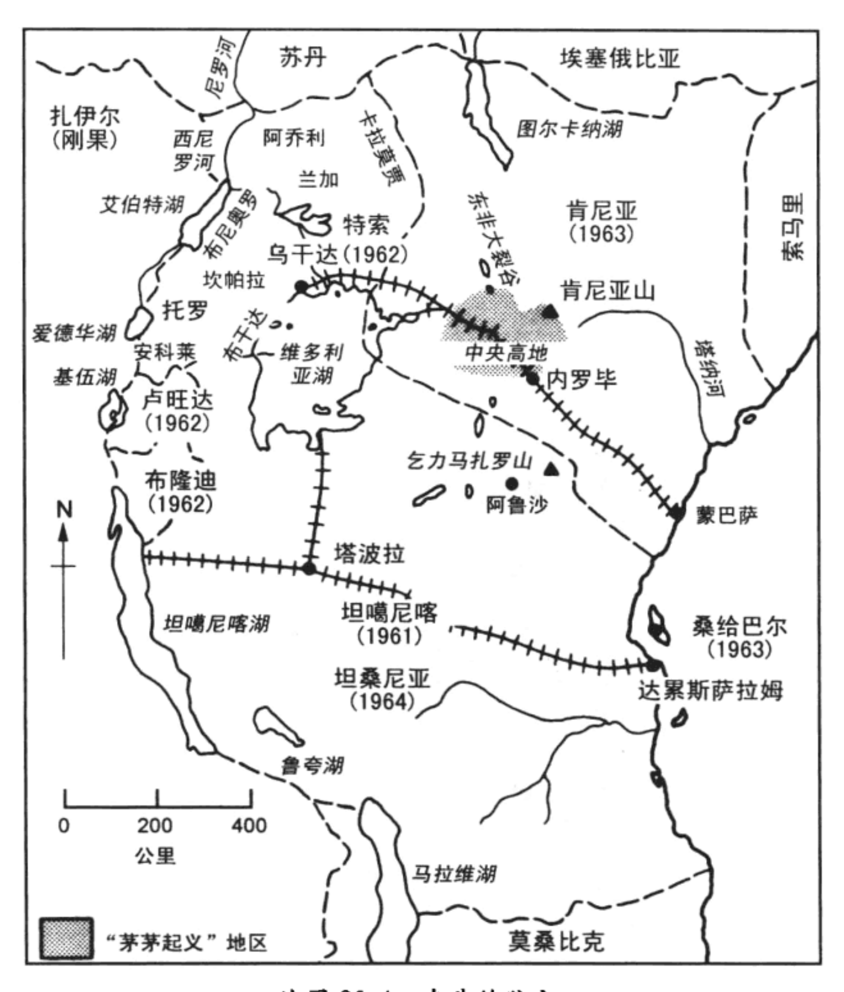
英属东非的独立方式与所论及的其他地区的独立方式完全不同,



朱利叶斯·尼雷尔(1922—1999年),教师、政治思想家。1960年当选为坦噶尼喀首席部长,并于1961年12月成为独立后的坦噶尼喀的总理,1962年受托制定新宪法,1962年当选为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1964年,与桑给巴尔进行联合谈判,因此也就成为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统(1964—1985年在任)。

起始于坦噶尼喀,是由1951年数千名梅鲁(Meru)地区的农民被一小部分白人定居者驱赶出去而引发的。这一事件让坦噶尼喀民族主义者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Tanganyikan African Association)对此次事件进行抗议。之后,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领导坦噶尼喀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TANU)。

389 尼雷尔在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和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接受过教育。他很快就凭借其组织才能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变为一个以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为榜样的全国性政党。他也得益于农民对政府在改变和"改善"农业生产上的无能而产生的不满。例如,1955年,政府在执行山坡梯田改造计划时就曾激起暴乱。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员的迅速增加也得益于坦噶尼喀广泛使用斯瓦希里语。早在殖民统治之前,斯瓦希里语就是长途贸易中所使用的语言。在殖民统治时期,传教士、官员在学校和行政机构中也使用斯瓦希里语,因为他们发现学习斯瓦希里语会更为实用,说起来就像是"母语"。因此,尼雷尔不得不借助于这一非洲语言,它有助于在这块领地上的很多非洲民族间形成一



地图 26.4　东非的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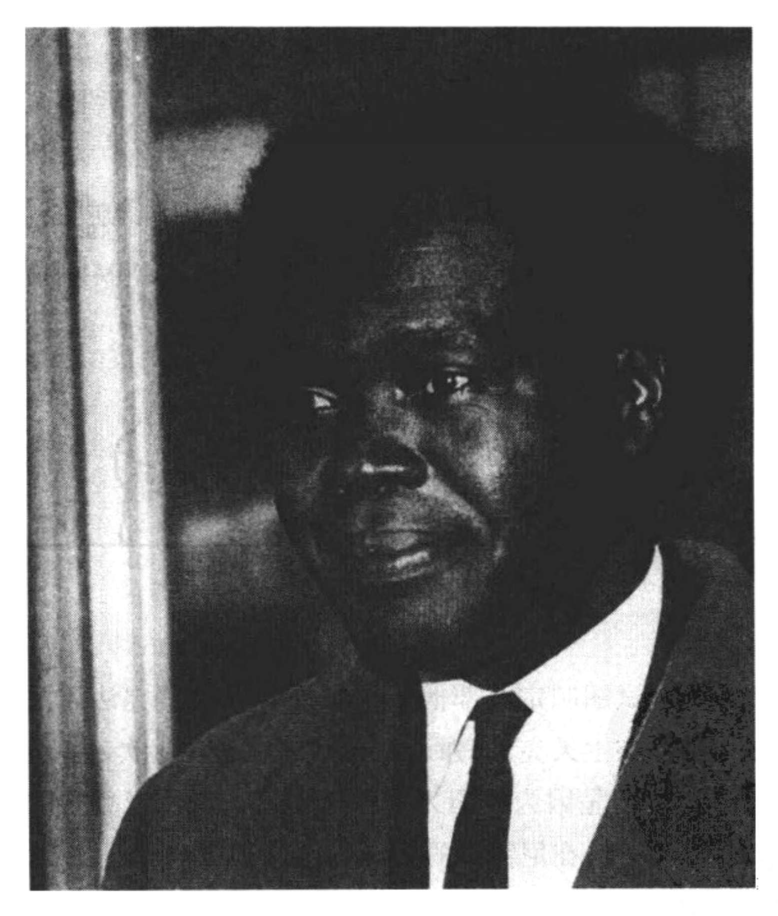
种民族团结意识。

不久，英国就试图制定一部他们称之为"多种族"宪法的法律。事实上，这是一部种族主义宪法，强调政府保护极少数亚欧人。英国人之所以有此立场，主要是因为英国人试图对邻近的肯尼亚更多的白人定居地给予支持。但是，在尼雷尔的领导下，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赢得了很多白人定居者中的政治家的支持。因此，即使是在"多种族"宪政的名义下，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在1958年的议会选举中还是赢得了明显多数。1961年末，坦噶尼喀获得了独立，实行的是完全不分种族的宪政。 390

英国在1963年12月准许桑给巴尔独立,但这个岛国依然是阿拉伯人占据主导地位,苏丹也还是国家首领。在独立后的数周内,苏丹政权就被暴力革命推翻,这场革命代表着长期受到压迫的非洲大众的利益。1964年4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为坦桑尼亚共和国。

乌干达

尼雷尔的坦噶尼喀(坦桑尼亚)率先起了个头,激发了英属东非、中非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在乌干达,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统



米尔顿·奥博特(出生于1924年),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的创始人,1962年乌干达独立后任总理;1966年废除宪法,宣布自己当选为乌干达共和国的总统;1971年由于阿明的政变而被流放;1980年再次当选为总统;1985年由于政变再次遭到流放。

一立场却没有像坦噶尼喀那样容易就实现了。在殖民时期,英国将布干达"王国"视为乌干达保护领地内的独立单元。与此同时,英国的"间接统治"也凸显了卡巴卡(国王)在巴干达政治生活中的持续作用。卡巴卡穆特萨二世(Mutesa Ⅱ)决定在未来独立的乌干达保留布干达的特殊地位。在1961年的独立宪法中,布干达允许有其独立于中央政府的自治政府,直接由卡巴卡控制。

1962年10月,乌干达独立政府是一种政治联盟,即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的以北方为基础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和布干达君主主义政党卡巴卡耶卡党(Kabaka Yekka)的联盟。奥博特成为总理,翌年,卡巴卡穆特萨成为不掌实权的总统。独立后,奥博特的政党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奥博特很快就无需其政治同盟布干达保皇党人的支持。1966年4月,奥博特颁发新宪法,自立为总统。同年5月,政府军攻击卡巴卡王宫,通过暴力结束了布干达的特殊地位。虽然穆特萨逃脱出来流亡在外,但是王宫遭到了摧毁,王宫中有很多人遭到杀害。领导这次攻击的军队指挥官为伊迪·阿明(Idi Amin)上校,阿明后来又在1971年1月的军事政变中驱逐了奥博特。

391

肯尼亚

肯尼亚的独立之路走得较为艰难。中央高原上的白人定居者主导着内罗毕的殖民政府。正因为如此,肯尼亚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游击战争之后才开始谈判由非洲多数人统治的问题,独立才成为一种可能。虽然没有像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的规模,但肯尼亚武装起义,通常被称为"茅茅(Mau Mau)起义",依然是一场激烈、惨烈的斗争。

茅茅起义的主要支持力量是非洲"占地者"的佃户,绝大部分是基库尤人,但也包括恩巴(Emba)人和梅鲁人,后两者是从内罗毕北部肥沃高原农场中被驱赶出来的。白人定居者不希望其非洲佃户变为独立的农业种植者,那样会和这些白人"农民"之间出现竞争。白人定居者只想让非洲人继续保留在肥沃的"白人高原"上,让这些非洲人完全依赖于白人"农民",且维持较低报酬。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基库尤



茅茅起义的嫌疑犯，内罗毕。

392 “占地者”被驱除出高原地区。很多人被赶到干燥的、贫瘠的安置区或人口过于密集的“保留地”。其他人则放弃了斗争，留在原来的土地上并进入内罗毕城区，找工作或是干些小偷小摸。

茅茅起义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时是在农村的暴力活动，包括劳力罢工、纵火焚烧农场建筑庄稼和残害牲畜。20世纪40年代末，茅茅起义变得更具有组织性，实行秘密的宣誓仪式以强化团结和对事业的效忠。斗争的目的不是将殖民政府拖入全面战争，而是为了恐吓定居者，好让他们放弃农场并最终离开肯尼亚。起义者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政治自由。对基库尤人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土地不公平分配的结束，意味着劳工法的制定和对白人土地的激进式的再分配。

1952年，冲突开始加剧，人们对白人定居者本身以及被视为殖民

政权合作者的非洲酋长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10 月,殖民总督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00 名著名的非洲政治领导人被逮捕,英国军队开始从海外聚集到肯尼亚。但是,茅茅起义是一种草根运动,起源于所谓"白人高原"上的严重压迫。它并不像殖民当局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场人为制造出来的、由内罗毕非洲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虽然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和茅茅起义的目标是一样的,而且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宣读的是茅茅起义的誓言。抓捕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并没有终结斗争。然而,茅茅自由战士被迫回到阿布戴尔(Aberdare)森林,并在那里开始了后来三年的抵御作战。殖民政府对基库尤人的严酷打击让他们更是无法获得广泛的支持,农村地区数千潜在的同情者遭到逮捕并被赶进集中营。茅茅起义中总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 1 万。与殖民时期非洲其他地区的冲突一样,非洲人在前线伤亡人数上大大超过政府方面。约有 1 700 名非洲"爱国者"死亡,而欧洲人只不过死亡了 100 人。

严格地说,茅茅自由斗争在 1955 年末遭到挫败,但战争让肯尼亚人获得了重大政治变革的可能性。首先,它让英国政府放弃了当地白人定居者的过分要求,正是后者的严酷法律导致了危机的产生。1960 年,英国已经接受了肯尼亚自治政府的非洲人多数统治原则。

茅茅起义之前,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就已经在领导肯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他是基库尤中央协会(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的前书记,在英国呆了数年,最近才回国的。1947 年,肯雅塔成为新建立的、追求政治改革和独立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Union)的主席。作为政府的一名直言不讳的反对者,肯雅塔在 1952 年国家紧急状态时期也曾被投入到大狱。随着 1959 年国家紧急状态的取消以及 1960 年英国接受了多数统治的原则,民族主义政党再次得以组建,两个主要的政党出现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和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前者是由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和工团主义者汤姆·姆博亚(Tom



乔莫·肯雅塔(1894—1978)，"Mzee"(即老人)，20 世纪 20 年代基库尤中央协会的总书记，基库尤中央协会于 1929—1946 年在欧洲的活动是为了重新获得基库尤人的土地；1938 年出版了《面对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1952—1961 年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入狱，独立后任肯尼亚总理(1963—1964 年在任)，肯尼亚共和国总统(1964—1978 年在任)。



汤姆·姆博亚(1930—1969)，肯尼亚劳工联盟的总书记(1953—1962 年在任)，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紧急状态时期肯尼亚民族政治家中的领袖人物，肯雅塔政府的主要政治同盟者和部长(1963—1969 年在任)。

Mboya)组建的。后来的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是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的创建人之一。肯雅塔在 1961 年出狱后成为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的主席和立法会中非洲领导人。在关于宪政问题的更深入谈判之后，肯尼亚于 1963 年 12 月最终赢得了独立。

第二十七章　赢得独立(二)

比属中非的独立

背景

394

比属刚果的独立之路与非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二战结束后，比利时政府决定保留它的这块非洲殖民地。比利时政府甚至直到1956年才开始讨论比属刚果向非洲自治政府转变的可能性，比利时政府此前曾认为，比属刚果的自治政府要到很久以后才能实现。由于有着这样的认识，比利时当局很是谨慎地将刚果人与席卷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激进政治思想隔离开来。

虽然从读写能力上说，殖民统治晚期的比属刚果要比非洲其他大部分地区好得多，但国家对教育的援助主要还是限制在小学层次上。除了那些受训要成为天主教神父的人外，非洲人并没有接受到更高的教育。比利时当局实行党禁，直到1957年才出现独立的非洲报纸。任何一级立法会中都没有非洲人代表，哪怕身份是顾问，行政部门中的非洲人也被限制在最低等级的职位。

到1956年，主要城市中少数接受过教育的职员、教师和店主日益要求废除种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存在于殖民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

方面。比利时人认为允许他们参与利奥波德维尔(Leopoldville,即金沙萨)、斯坦利维尔(Stanleyville,即基桑加尼[Kisangani])、伊丽莎白维尔(Elizabethville,即卢本巴希[Lubumbashi])和卢卢阿布尔(Luluabourg,即卡南加[Kananga])等主要城镇的地方政府选举,就可以安抚他们。1957年末—1958年初举行的选举为非洲人的政治运动浪潮开了闸。大多数政党随即成立,但它们都是基于地方的区域组织,往往都是从单一的族群那里获得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领导下的巴刚果人的文化组织巴刚果联盟(Alliance des Ba-Kongo, ABAKO)。加丹加产铜区的主要政党是加丹加部落联盟①(Con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 s Tribales du Katanga),该党由莫伊兹·冲伯(Moise Tshombe)组建而成,主要获得了隆达人的支持。只有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建立的刚果民族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Congolais, MNC)付出了坚实的努力而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刚果民族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还是来自卢蒙巴家乡,东方省府基桑加尼(即过去的斯坦利维尔)周边的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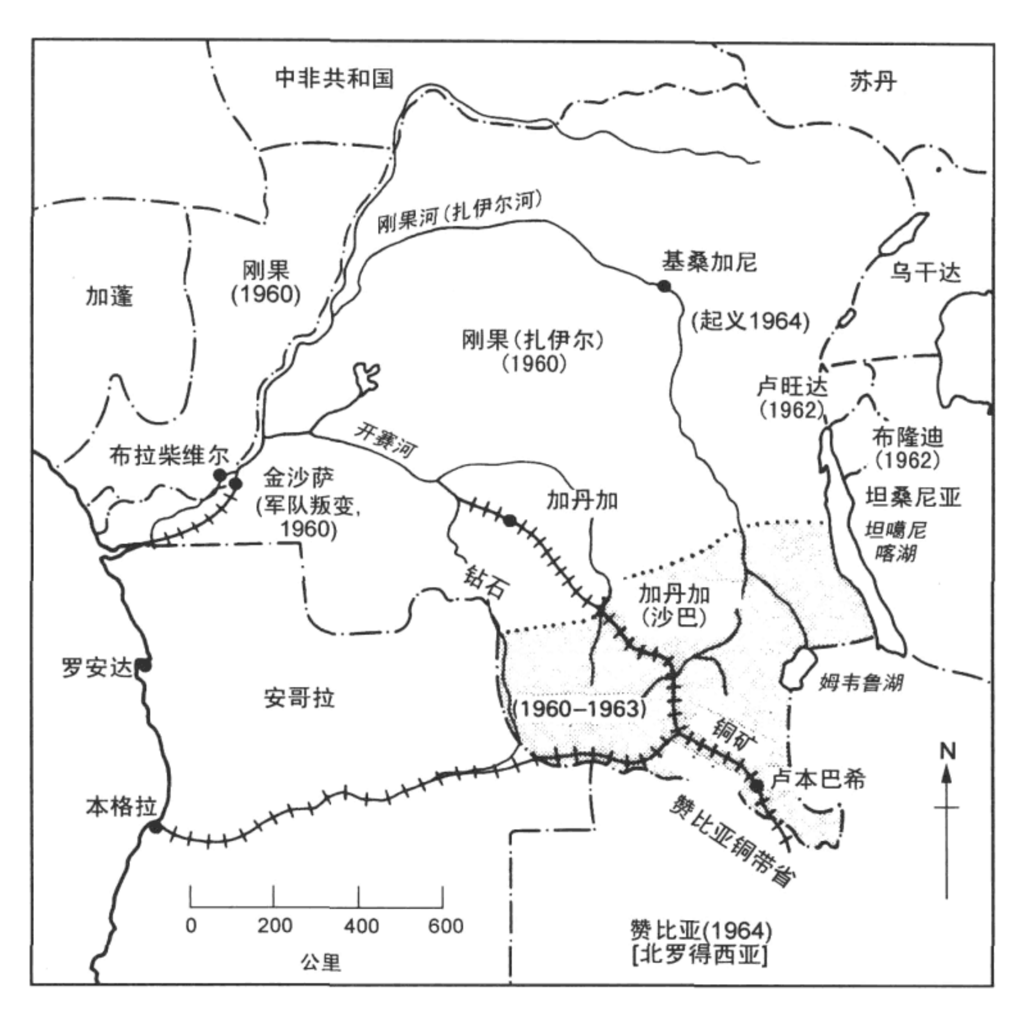
1958年,这些热情高涨的非洲政治家们很快就将其地方利益转变为对政治独立的要求。大部分政治家为独立划定了一个相当宽泛的时间表,即从1961—1965年。这些政治家受到非洲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的重大影响,尤其是法属刚果布拉柴维尔人获准脱离比利时殖民地成立自治政府。1958年12月,卢蒙巴返回刚果,受到其曾在新近获得独立的加纳参加过的全体非洲民族会议(All-African People's Congress)的鼓励。金沙萨的政治集会很快就在1959年1月变为大规模且难以控制的骚乱,尤其是主要城镇里一些失业青年所引发的骚乱。骚乱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建筑物、天主教会和欧洲人所占有的财产。

395

历史解释问题

根据尚未公之于众的新的证据,过去对关于刚果独立前后所发生

① 也被简称为科纳卡特党。——译者注



地图 27.1 刚果(扎伊尔)独立。

的种种事件的解释,包括本书前几版的相关解释,都需要彻底地加以重新修订。过去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可以概括如下:

比利时政府面对 1959 年刚果全境没有法律和秩序的情形,担心会出现像阿尔及利亚那样的解放战争。1959 年 8 月,比利时正式承认非洲政党的合法性,随即在 1960 年 1 月就召集刚果殖民地主要政治领导人到比利时参加“圆桌会议”。卢蒙巴被控挑起暴力,自 1959 年 11 月起就被关押在狱,为了能让他参加此次会议特地将他释放。非洲政治家认为比利时人准备就实现内部自治政府的五年过渡期来谈判。令他们震惊的是,比利时同意在不到六个月内实现完全的政治独立。由于

396

完全没有准备，刚果全国涌现出120个不同政党，在1960年5月为议会中的137个席位展开竞争。由于长期贫困、强制劳役、重赋和种族歧视的存在，刚果选民被即将到来的独立所带来的极其草率的期待搞得措手不及，当然很多期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6月30日组建独立联合政府的谈判中，基于地区利益的政党所具有的问题很快就呈现出来了。只有卢蒙巴的刚果民族运动赞成成立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其他地区性政党希望有一部联邦宪法来保证它们领导地区自治政府。宪法形式还没有达成一致，卢蒙巴就发动了一场引发震动的党派联合，卢蒙巴担任总理，卡萨武布担任形式上的总统。数天内，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就开始走向分裂。军队爆发反对保留比利时军官的兵变，加丹加宣布为一个独立国家。

卢蒙巴政府瘫痪了。它既失去了收入的主要来源，即加丹加铜矿的税收，又不能控制军队来执行法律。由于产生了混乱，联合国派遣了一支维和部队。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联合国部队拒绝干预加丹加的独立问题。1960年11月与1961年1月之间的某个时候，卢蒙巴在加丹加遭到谋杀。与此同时，军队司令蒙博托将军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成为金沙萨一连串脆弱政府后的主要权力掌控者。

真正独立与新殖民主义

过去对这些事件的解释都认为，刚果人并没有对独立做好准备。比利时人的过错是没有给刚果人获得政权提供一个更长的时期，或者说比利时本应将独立进程延迟一些。然而，近来的历史研究将这种观点彻底推翻。这种新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荷兰人鲁多·德·威特(Ludo De Witte)，他的研究基础是纽约的联合国档案、比利时政府档案以及当时比利时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这一研究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点。

比利时政府突然决定让刚果独立完全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精心谋划的策略，想要阻止刚果民族主义者提出独立的激进方案。比利时人认为，如果他们快速行动，他们将还能在幕后控制刚果政府，这主

要是因为刚果政治家们非常缺乏经验。比利时人甚至认为卢蒙巴这样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包容进来。刚果历史中唯一一次大选前,比利时政府修改了刚果宪法,允许六个地方政府实现完全自治。这种做法是一种精心策划的预防保护措施,以防中央政府落入“对己不利”的人的手里,就像卢蒙巴这样的人物,并防止最为富有的省即加丹加独立行事,甚至是分裂出去。在加丹加,比利时定居者和官员加入了冲伯的加丹加部落联盟,甚至草拟了该党宣言。冲伯的加丹加部落联盟注定将成为维护比利时利益的工具。

在 1960 年 6 月 30 日的独立仪式上,比利时国王博杜安(Baudouin)就比利时崇高的“文明使命”以主人的姿态发表了演说,并盛赞其祖父利奥波德二世为天才!博杜安要求即将成立的政府不要进行“匆忙的改革”,而要留心比利时行政人员和技术专家的建议。这预示着刚果将面临着一个“新殖民主义”的未来:经济剥削的殖民体系依然保留下来,除了将一小部分非洲政治精英提升为上层人物外,殖民体系变化并不大。然而,卢蒙巴不顾礼节,发表了激进的演讲以作回应。在演讲中,卢蒙巴痛斥比利时统治的残暴与不正义。他宣布刚果人民最终告别了“通过武力强加给我们的可耻的奴隶制”。有人认为这次演讲决定了卢蒙巴的命运。然而,德·威特认为,在比利时人看来,这次演讲不至于让卢蒙巴遭受劫难——政治家为了获得民心可以说很多,而是卢蒙巴随后在数天内就用行动来履行他的承诺才让他性命不保。

军队发生兵变的时候(7 月 5 日),德·威特称这一事件为“罢工”,卢蒙巴站到士兵这一边来进行干预,遣散了比利时高级军官,并要非洲士兵提出取代这些军官的建议人选。蒙博托成为上校和军队领导人。在加丹加,比利时官员拒绝接受遣散,当刚果士兵抗议目中无人的比利时官员时,比利时政府派出伞兵部队缴了士兵们的枪(7 月 10 日)。在比利时军队的保护下,冲伯得以宣布加丹加从中央政府独立出来(1960 年 7 月 11 日)。联合矿业公司立即给冲伯政府提前支付一年的税赋以克服冲伯政府的财政短缺。随后,更多的比利时部队来到刚果,在冲伯政府独立数天内就来确保刚果其他主要城市的安全(包括 7 月 13 日来

到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比利时军队表面上是来保护比利时财产和平民的,实际上是对 7 月 5 日爆发的兵变进行报复。

卢蒙巴呼吁联合国反对这一侵略行径。在卢蒙巴看来,这种侵略行径事实上是又一次的殖民侵略。但是,卢蒙巴没有得到同情或是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美国和英国支持比利时而不信任卢蒙巴,因为卢蒙巴可能推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也同意英美的立场,因此 1960 年 8 月到达刚果的联合国部队仅限于恢复“法律和秩序”。虽然联合国要求比利时人撤军,把其控制地区交给“蓝盔军”,但联合国并没有要比利时人撤出加丹加,也没有阻止加丹加的分裂。事实上,当刚果军队中效忠于卢蒙巴的派系试图阻止分裂的时候,联合国部队还设置了阻止他们进入加丹加的障碍。

在美国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下,比利时的计划是要削弱和推翻卢蒙巴民族主义政府,还要将加丹加分裂作为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比利时的目标不是让加丹加重新纳入刚果,而是要从加丹加的比利时

398



1961 年联合国驻刚果部队中的尼日利亚警察分遣队。

基地来重建刚果。比利时和美国计划的主要障碍就是卢蒙巴。此时，美国、英国和比利时都同意要让卢蒙巴这位民选总理永久消失。美国中央情报局劝说卡萨武布总统将总理解职。于是,效力于中央情报局的蒙博托解散了民选议会,并在 1960 年 9 月 5 日将卢蒙巴关了起来。联合国就在一旁关注,但并没有采取措施来保护卢蒙巴,甚至当卢蒙巴在 1960 年 12 月被押往加丹加的时候,联合国也没有进行保护。1961 年 1 月 17 日,卢蒙巴及两位贴身随从在冲伯默许下被行刑队枪杀了,当时还有三位比利时官员在场。

加丹加的分裂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加丹加获得了联合矿业铜矿公司和其他比利时利益集团管理者的支持和资助。冲伯的加丹加军队也得到了白人杂牌雇佣军的支持,这些人是由罗得西亚和南非前比利时士兵和冒险者组成。1962 年末,联合国才最终对加丹加问题进行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干预,并在 1963 年 1 月终止了冲伯的分裂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1964—1965 年间,冲伯担任新统一起来的刚果政府的总理。但是,冲伯的统治很快就不被信任,部分是由于腐败问题,最重要的是在镇压卢蒙巴支持者活动中心基桑加尼的一次大叛乱中使用了白人雇佣军、美国与比利时伞兵。

蒙博托政变与扎伊尔共和国

1965 年 11 月,蒙博托将军最终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夺取了权力。只是令人好奇他为什么不早些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来巩固其对这支进行过重整的军队的控制权。得益于国际铜价短暂却快速的提高,蒙博托重建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随着蒙博托建立起具有个人特色的总统制政府,过去那些不被信任的政治人物逐渐被清除出去。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作为一种新时代的象征,加丹加省改名为沙巴,国家的名字也改为扎伊尔。 399

卢旺达和布隆迪

与刚果不同,比利时统治过的“卢旺达-乌隆迪”(Ruanda-Urundi)

是由国联/联合国托管的，托管理事会有责任让这两个国家独立组建自治政府。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活动在这两个联合地区里是被允许的，人们在这里也组建了众多政党。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在前殖民时期，"胡图人"和"图西人"反映的只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名称而不是种族上的差异。胡图人指的是农民或是仆人，而图西人，即最初的"畜牧业者"，在殖民化前夕则在更一般意义上等同于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拥有牛通常是一个重要因素)。德国和比利时殖民者将这两个名称改造为严格的种族身份，并在法律上进行区分，在每个人的身份文件中加以记录。他们记录了图西人起源的远古神话，并将这些神话塑造为历史事实，且确立了图西人在种族身份上的优越地位。历经两个世代殖民统治之后，图西人和胡图人的身份差异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在人们思想中留下了烙印。由此，那些被认定为图西人的人成为少数占据特权地位的精英，并被委任为殖民统治中职位较低的合作者。那些被认定为胡图人的占人口多数的民众则处于下等阶层，要从事强迫性的劳役，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也很难进入上层社会。随着政治独立的获得这种以种族来界定整个社会的殖民遗产造成严重的种族敌意和冲突。

在卢旺达，政党从一开始就带有族群含义。图西精英为了维持其特权地位要求直接独立。以格雷戈瓦·卡伊班达(Grégoire Kayibanda)为代表的新出现的胡图知识分子要求在独立前实行多数统治。在不断升级的族群内暴力冲突中，比利时支持胡图知识分子的立场，用被提名的胡图人来取代很多图西酋长。被提名的胡图人组织起对图西人的大范围迫害，无论是富有还是贫困的图西人，也不管他们是精英还是老百姓。1959 年 11 月—1960 年 10 月间演变为一系列屠杀的迫害运动被描述为受到比利时人资助的革命。数百图西人遭到杀害，成千上万的图西人被迫流亡于布隆迪、坦噶尼喀和乌干达。1961 年，少数图西人——胡图人称他们为蟑螂(inyenzi)——开始从邻近的乌干达发起攻击。

在这一背景下，卡伊班达领导的"解放胡图"党(Parti de l'émancipation

du people Hutu, PARMEHUTU)在1961年获得选举胜利,并于1962年成为卢旺达独立后的总统。然而,卡伊班达让族群矛盾又增加了地区性因素。卡伊班达政府容纳了卢旺达中部地区的胡图人,却排除了北方的胡图人。1973年,他在一场由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发动的政变中被推翻,哈比亚利马纳就是一个来自卢旺达北部地区的胡图人。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与大屠杀将在最后一章中进行论述。

相较而言,在布隆迪,姆瓦姆布斯塔四世(Mwambusta Ⅳ,1915—1966)的领导则受到广泛的尊重。布隆迪在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实现了一种无党派区别的合作,胡图人与图西人都被纳入最重要的政党,即乌普罗纳党(Union pour le progress national,UPRONA,即争取民族进步统一党)。该党是由国王的儿子路易斯·鲁瓦加索雷(Louis Rwagasore)于1958年成立的,但是路易斯·鲁瓦加索雷在1961年10月遭到暗杀。暗杀让长期积压下来的族群紧张关系爆发了。由于担心发生像1959—1960年在卢旺达所发生的对图西人的屠杀,图西领导人让很多胡图人离开了乌普罗纳党,确保布隆迪是一个图西人主导下的政府,正是这个政府在1962年将布隆迪带向独立。1966年的军事政变进一步地强化了图西人的控制,胡图人则排挤在政府权力之外,军事政变也导致军事统治的出现。自独立后,布隆迪就一直在屠杀与反抗中备受煎熬。

400

英属中非的联邦与独立

英属中非在独立时遇到的是白人定居者的问题。其中,大部分白人住在南罗得西亚(1950年有15万人,到了1960年则上升到20万人)。在那里,他们用南非那种种族隔离的立法体系来统治非洲大众。南罗得西亚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以及最好的土地都归白人所有,而四五百万的非洲人只占有剩下来的最为贫瘠的三分之一土地。严苛的通行证法限制了城镇中工人的活动,其他带有种族主义的法律则为白人保留下来了报酬更为丰厚的工作。自20世纪20年代,南罗得西亚的

白人定居者就已经用其自己选举的议会制政府来统治殖民地了。非洲人的代表权极其有限。非洲人的政党一组建,很快就会被取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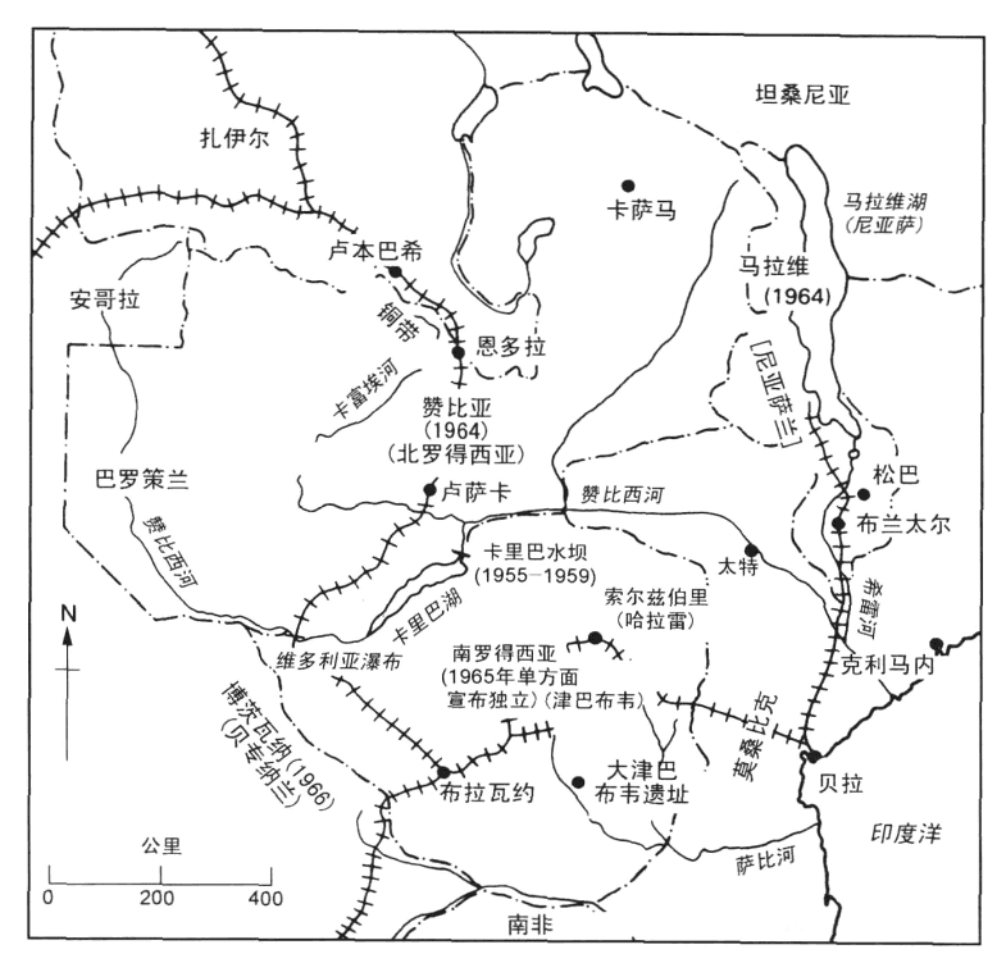
联邦

20世纪40年代后期,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白人定居者提议,将这三块领地合并为一个中非联邦。这是在非洲独立运动出现前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作出的决定,它将让南罗得西亚的白人也能从北罗得西亚铜带所带来的巨额税收中分得一杯羹。同时,尼亚萨兰将继续为白人的农场、新建的制造工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扩容了的国家到时将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像南非的白人一样,足以抵制所有要求实现非洲人多数统治的反抗活动。这将会吸引英国在该地区的新投资,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地强化了白人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

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没有像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那样受到联邦提议如此直接的影响。他们已经在白人种族优势中备尝屈辱与不幸。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非洲人意识到,强化白人主导地位就意味着进一步地延迟其最终获得解放的时间。另一方面,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非洲人会由于联邦提议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从名称上说,他们是作为英国"保护领地"被统治的,而不是定居者的殖民地。白人定居者的数量要比南方殖民地上的白人少得多。种族歧视虽然在保护领地普遍存在,但是还没有写在法律上。

401 非洲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北方保护领地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地反对联邦提议。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Hastings Kamusu Banda)医生和哈里·恩孔布拉(Harry Nkumbula)在其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出生于尼亚萨兰的班达曾在美国和英国取得了医生资格。班达虽然在英国行医,但与其故土的政治发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恩孔布拉曾是北罗得西亚的一名教师,一度(1949年)在伦敦大学学习。他们写道:

> 中非所有的欧洲人,以及南罗得西亚的欧洲人,对非洲人毫



地图 27.2 英属中非的独立。

无怜悯之心……他们视非洲人为低等人，没有权利过上有尊严和高雅的生活，只配给欧洲人伐木提水……在与非洲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总是带有一种征服者的姿态……就是这些欧洲人……将统治和治理这个联邦……在南罗得西亚的治理下，我们与当局的关系将是一种主奴关系，基本的原则……(是欧洲人享有)领导权。

——1949 年 5 月 1 日的备忘录，摘自 R. I. Rotberg,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Central Afric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64, p. 224

402 尽管非洲人激烈反抗，联邦在英国政府和白人定居者的推动下还是于 1953 年成立了。非洲民族主义者之前所担心的不断加重的种族歧视在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就随之而来了。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白人经济的繁荣，而非洲人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原本的低工资却没有丝毫提高。1956 年铜带地区矿工的罢工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一个新的重大投资项目是赞比西河上的卡里巴水坝(Kariba Dam)的修建(1955—1959 年)，主要是为南罗得西亚和铜矿地区提供水力发电。在水坝后方，由于出现洪涝，3 万多非洲人被强迁出赞比西河北岸地区。意味深长的是，发电站修建在南岸地区，并且完全掌握在南罗得西亚当局的手中。

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独立要求

阻止联邦的民族主义运动遭到失败之后，非洲民族主义者不被非洲人所看重，非洲人的政治活动出现了短暂的低潮期。但是，1956 年旨在进一步加强白人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的新种族立法再次激发非洲人的政治反抗。这次政治反抗是由恩孔布拉、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



1958 年加纳阿克拉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上方的旗帜上写道："别碰非洲！非洲一定要实现自由！"

大会(成立于 1948 年)和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成立于 1944 年)领导的。他们在北方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抵制、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非洲政治活动在南罗得西亚遭到残酷的镇压。由于受到新独立的加纳的



The Nyasaland Times

BLANTYRE EDITION

SIR ROY PULLS NO PUNCHES

Targets: Labour and Ghana

Zambia is banned

PERTH HERE TODAY

'WAR RISKS'

Now 408 detained in Nyasaland

BLANTYRE, THURSDAY.

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lonial Affairs, Lord Perth, arrives in Nyasaland from East Africa today. He will make a personal survey of the situation and will also ascertain when it will be possible to continue constitutional talks. But he will not hold formal talks.

WITHDRAWN

Now Labour has a chance to farm and learn

Comforts for the troops

ANOTHER £196

Attack at Limbuli

WILL JOIN IN TALKS

Civil flights back

Sabotage at Chileka

FIRM STAND

HAD CHAIN WHIPS

紧急状态时期的《尼亚萨兰时报》(*Nyasaland Times*),1959 年。

402 鼓励，非洲政治领导人纷纷为其未来的独立国家另起新名。北罗得西亚采用赞比亚(改自赞比西亚)这一名称，尼亚萨兰选择的名称为马拉维，主要是为了纪念17世纪的帝国。南部殖民地的非洲领导人用津巴布韦这一更醒目的名称来取代“罗得西亚”这一令人憎恶的名称，“罗得西亚”是为了纪念白人定居者先驱塞西尔·罗得斯而命名的。

1957—1959年期间，尤其是在众多政治领导人参加1958年12月在加纳阿克拉召开的全非人民大会之后，非洲人提出了更多且需要尽快实现独立的政治要求。联邦政府试图镇压这种抗议，实行党禁并要403 抓捕非洲政党领导人。但是，党禁的速度有多快，成立新党以取代它们的速度就有多快。此时政治抗议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无论抓了多少领导人也阻止不了这种抗议运动。1959年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被禁之后就立即被联合民族独立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 UNIP)所取代。肯尼斯·卡翁达(Kenneth Kaunda)，一个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就开始对联邦、殖民统治中的种族主义进行直接抨击的批评者，1960年被释放出狱后成为赞比亚的总统。1958年，班达医生重返尼亚萨兰。抗议者的游行示威、罢工和暴乱使得尼亚萨兰在1959年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被禁的尼亚萨兰非洲人大会很快就改组为马拉维大会党，班达成为该党的领导人。1957年，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404 国民大会在工会联盟的领导人乔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领导下重新活跃起来。在一次次禁令和监禁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62年最终以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ZAPU)的名义重新出现于南罗得西亚。

赞比亚、马拉维的独立与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

到1960年，英国政府最终被迫开始关注非洲反抗力量了。英国人看到“变革潮流”(winds of change)横扫整个非洲大陆，继续支持中非联邦的少数白人统治终将徒劳无果。(“变革潮流”这一著名短语是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在1960年1月访问加纳时杜撰的新词。访问加纳一个月后，该词在麦克米兰对开普敦的南

非白人议会的演讲中被反复提到,让该词流行开来。不用说,这次演讲对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白人听众来说,不单单只是有点不高兴而已,可谓意味深长。)1963 年末,也就是联邦瓦解前,联邦政府与两个北方保护领地的非洲政治家进行了三年的宪政谈判。之后,赞比亚和马拉维很快就于 1964 年走向政治独立。

而在南罗得西亚,白人定居者依然牢牢掌握着权力,坚决抵制非洲多数人统治。恩科莫未能让政党坚定开展必要的武装游击战争,这一点让非洲政治家们备感受挫。恩达巴宁吉·西托莱(Ndabaningi Sithole)、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和其他人于 1963 年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中脱离了出来,组建了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rd Union, ZANU)。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以及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之间存在地区性竞争,两个组织在联邦瓦解的关键时期都没有多大作为。1965 年 11 月,新成立的罗得西亚白人阵线党(Rhodesia Front party)领导人伊恩·史密斯单(Ian Smith)方面宣布独立。他将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脱离了英国的殖民控制。英国政府对此进行过抗议,但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阻止独立。很显然,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未来要做的确实就只有一件事,即武装斗争。

国际社会对非法的史密斯政权进行了经济制裁。但是南非和葡属莫桑比克不顾联合国的禁令,继续与罗得西亚保持贸易往来,甚至英国跨国石油公司也秘密地继续供油给史密斯政权。讽刺的是,制裁的主要牺牲国是赞比亚,其很多贸易都要途径罗得西亚。

葡属非洲地区赢得独立

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葡萄牙在欧洲其实是个贫穷的国家。其在非洲的殖民地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葡萄牙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葡萄牙政府决不会对独立要求让步。葡萄牙殖民地上的非洲人却决意要争取独立。葡萄牙在其所有的三个殖民地上对非洲人的反抗进行的暴力镇压很快就表明,非洲解放只能通过长期的游击

405

斗争才能获得。两个最小的殖民地,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率先走上了游击斗争的道路。

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

1956 年,一个名叫阿米尔卡 · 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的佛得角人建立了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非洲党(PAIGC),开始发展党员和谋划获得独立的战略。1959 年,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非洲党领导比绍港码头工人发动了一次大罢工。殖民地的警察残酷地镇压了罢工,并枪杀了 50 个工人。这次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卡布拉尔领导下的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非洲党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为此展开了全面解放战争。1963 年,战争终于爆发。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几内亚比绍的农村人逐渐开始支持解放事业。随着农村地区被解放,学校、卫生所、公路与农业项目贸易得以修建或展开,所有这些都基于民众的需要,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奠定了民意基础。1973 年 9 月,几内亚比绍大部分内陆地区都获得了解放,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非洲党宣布几内亚比绍为一个独立国家。1974 年 1 月,卡布拉尔遭到暗杀,几内亚比绍这个时候才开始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令人叹息的是,卡布拉尔没有活着看到 1974 年葡萄牙军队的最终撤离。

在几内亚比绍担任葡萄牙司令期间(1968—1973 年),斯皮诺拉(Spinola)将军确信葡萄牙人不可能赢得战争。他认识到,在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持续战争会耗尽葡萄牙国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非洲解放战争促使斯皮诺拉及一群军官在 1974 年 4 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葡萄牙独裁政权。这直接导致葡萄牙从非洲撤军和 1975 年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

安哥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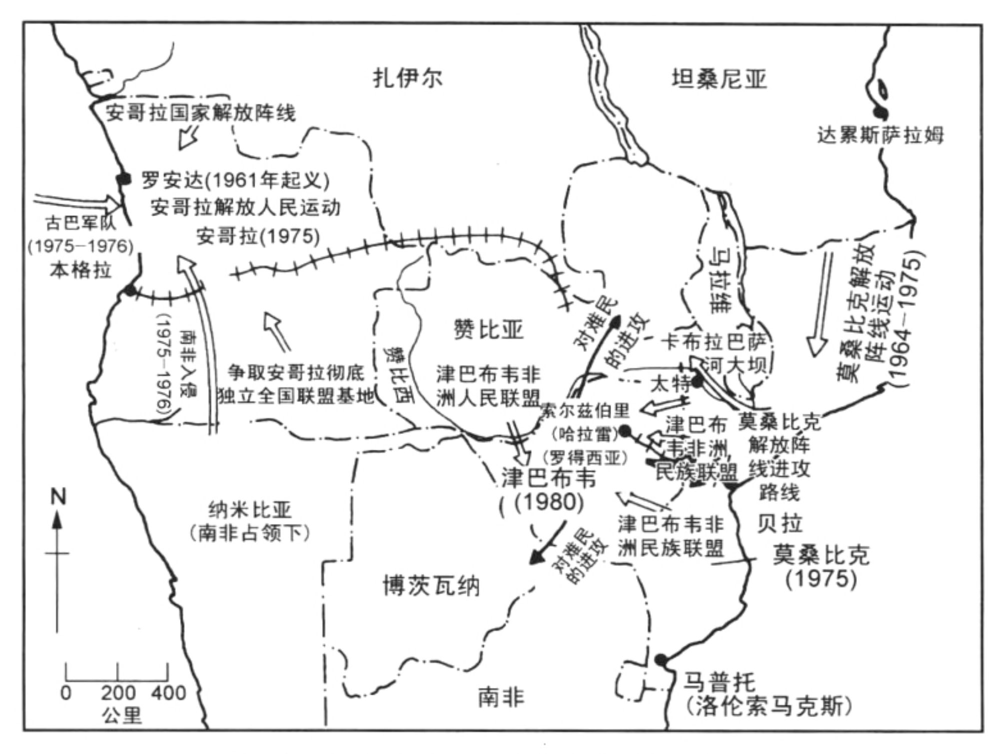
安哥拉主要的政治力量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 MPLA),该党是由阿戈斯蒂诺 · 内托(Agostino Neto)于 1965 年 12 月在卢安达的工人阶级中间成立起

来的。1961 年早期,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大多数领导人都希望在反对强制性种植棉花和强制劳役的农民中发动小规模的起义。起义很快就扩展到卢安达城市贫民那里,他们涌向监狱,要求释放被关押的领导人。葡萄牙警察和武装部队进行了残酷镇压,不分青红皂白地在卢安达杀了数百名非洲人。起义扩展到霍尔敦・罗伯托(Holder Roberto)的以巴刚果人为基础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Nacional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 FNLA)领导下的安哥拉北部地区。

这次起义揭开了漫长、惨烈的独立战争的序幕,战争直到 1975 年安哥拉独立后才结束。战争由于外国势力的干预而变得复杂。大部分游击斗争是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发起的,他们有着实现安哥拉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成功地从苏联那里获得军事培训和武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以扎伊尔为基地,直到战争快取得胜利的时候才参与到战争中来。之后,在扎伊尔和美国的支持下,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开始以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斗争目标。另一个在后期参与战争的是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该党扎根于安哥拉东南部的奥文本杜人之中。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一样,比起与葡萄牙人的战争,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更关注的是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斗争。1974 年,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甚至与葡萄牙人结成反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同盟。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得到了南非的大力支持和武器供应,南非主要是想让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来取代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成立政府。南非担心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安哥拉政府将会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而该组织正是南非在纳米比亚与之展开斗争的组织。

406

1975 年,葡萄牙从安哥拉撤军后,安哥拉却深陷内战之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夺取了首都卢安达,并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975 年前几个月,这段时间极为关键,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从新独立的几内亚比绍获得了少量的武器。与其说这是对斗争的支持不如说是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为巩固社会主义力量而发出的信号。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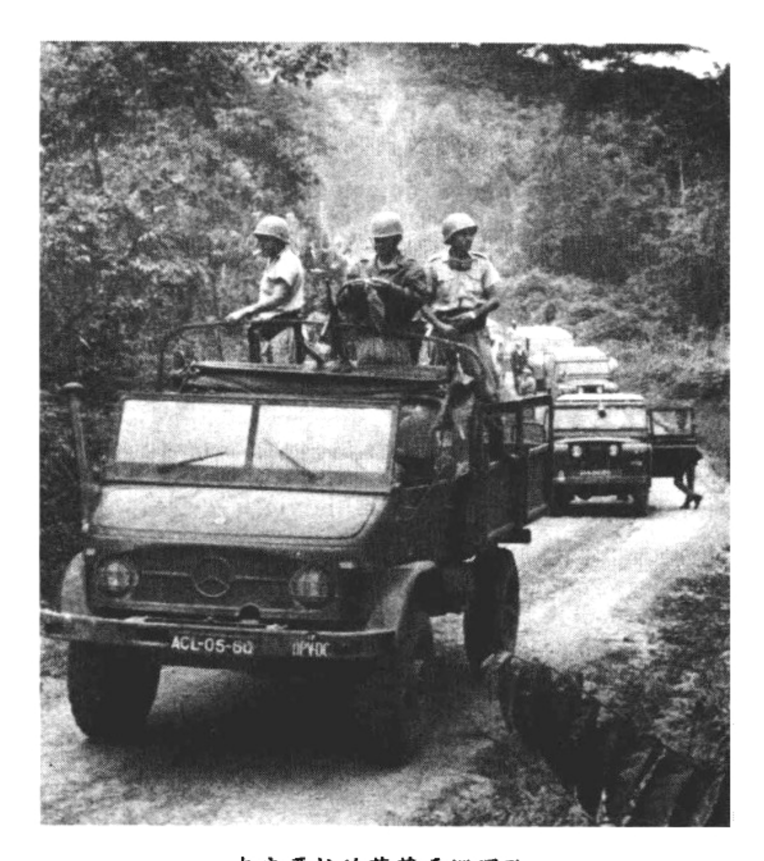


地图 27.3 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独立。

月，安哥拉独立被提上议程，内托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有望掌握权力。为了阻止这种事发生，南非军队从纳米比亚侵入安哥拉，并向北推进到卢安达。与此同时，美国武装起来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则从北部展开进攻。这种进攻也得到了扎伊尔军队、葡萄牙非正规军以及杂牌的白人雇佣兵的支持。内托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名义宣布安哥拉独立，并仓促地召集了一支得到苏联武装支持的由 1.3 万名古巴人组成的军队。这些古巴军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部队(现为安哥拉国家军)在 1976 年前几周内成功地击退了南非、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同盟者。同时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也被击退，撤回其在莫西科省(Moxico)东南部山区的基地。

安哥拉正式获得统一，并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组成的政府的领导下获得了独立。但是，由于南非和美国不断提供经费、武器以及在南非军队偶尔直接入侵的支持下，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

407



在安哥拉的葡萄牙巡逻队。

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不断地制造麻烦。

莫桑比克

1962 年，莫桑比克人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成立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统一了全国解放力量。1960 年 6 月，莫桑比克人也遭到葡萄牙人的残酷打击，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北部地区枪杀了数百名反抗的农民。爱德华多·蒙德兰(Eduardo Mondlane)及其副手萨莫拉·马歇尔(Samora Machel)领导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国内的斗争，并在 1964 年 9 月正式对葡萄牙人宣战。

随着战争的推进，蒙德兰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日益确信要在莫桑比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让一个莫桑比克统治阶级来取代一个外国统治阶级，" 蒙德兰写道，"我们的斗争是一场革命。"农民大

众将成为革命的基础。与几内亚比绍的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非洲党一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莫桑比克的解放区建立了另一种类型的地方政府。但是不幸的是，与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非洲党一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1969年2月的一次暗杀中也失去了其精神领袖蒙德兰。萨莫拉·马歇尔成为解放力量的领导人，领导着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走向胜利并在1975年让莫桑比克获得了独立。

408

津巴布韦赢得独立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与罗得西亚安全部队于1966年4月在罗得西亚北部地区的奇诺伊(Chinhoyi)首次交锋。游击队被轻易地挫败，七名游击队员阵亡。但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后不久，游击队就向史密斯政权发出将要展开斗争的警告。20世纪60年代后



20世纪70年代，在赞比亚训练的津巴布韦人民解放军(Zimbabwe Independence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ZIPRA)的政治"教育"。

期,游击队发起多次战斗,但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由于在赞比亚的流亡期间出现了领导人之间和意识形态上的很多分歧,因而内讧不止。

1971—1972 年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占领了莫桑比克太特的大部分地区,此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得以大量渗透到罗得西亚的东北部地区。这让战争进入一个新的且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游击队在发动对白人定居者的农场、警局和安全部队攻击前得到了当地农村的支持,而安全部队越来越难以从当地人中获得有关游击队的信息。1974—1975 年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莫桑比克取得了胜利,这让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得以沿着莫桑比克东部边界地区进入到罗得西亚。1975 年,罗伯特·穆加贝取得领导权,开始强化政党领导,并在获得解放的津巴布韦地区发动运动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1977 年,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此时,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政治骨干已为决战打下了根基,他们已经赢得农村民众长达五六年的支持。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虽然在赞比亚的训练营中得到大量苏制武器,但在决战前,他们在津巴布韦西半部地区并没有发动多少有效的进攻。

409

史密斯政权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发动了密集性猛攻,袭击这两个组织在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基地与难民营。此外,罗得西亚还资助并武装了一支由莫桑比克不满者组成的军队,他们被称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Mozambique National Resistance)。罗得西亚安全部队让这支军队纵深到莫桑比克,炸毁桥梁、切断电线及攻击村庄。罗得西亚的意图是摧毁莫桑比克经济后,“劝服”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放弃他们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支持。罗得西亚利用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的策略最终失败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对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支持立场从未动摇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最终在津巴布韦夺取了政权。津巴布韦独立后,南非开始资助莫桑比克全国抵抗组织,以确保南非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在最后垂死挣扎的几个月里(1978—1979 年),史密斯政权在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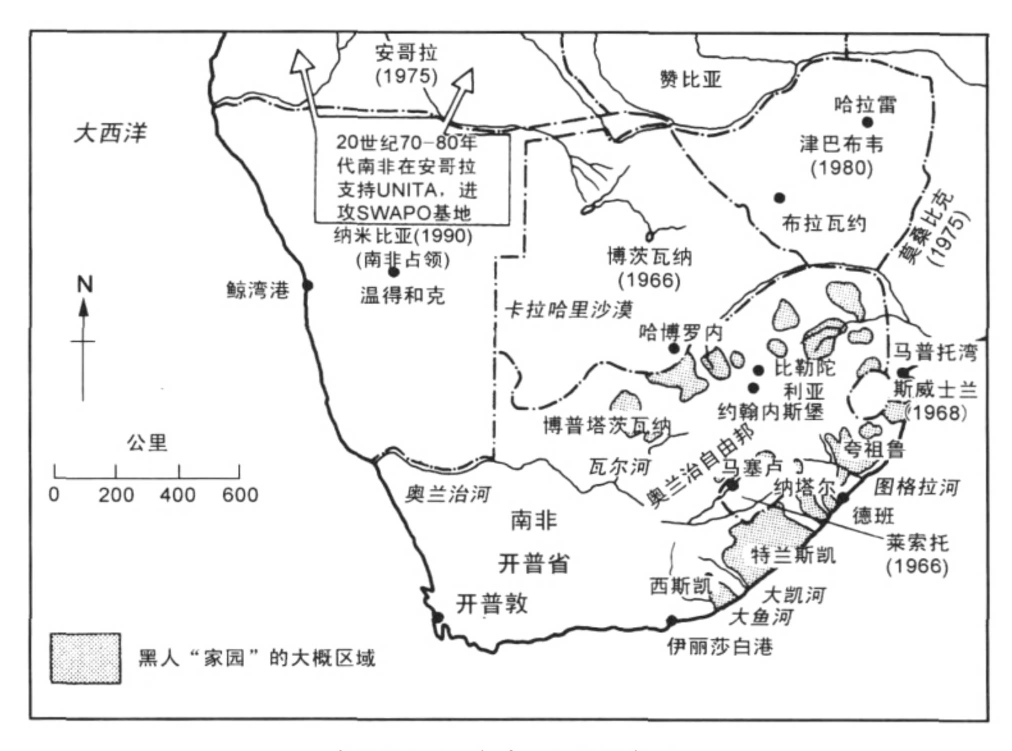
的压力下试图绕开游击队而达成一个内部协议。津巴布韦众多有影响的非洲人,如教会人员和酋长,都希望能结束战争,但是又都担心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取得彻底的胜利。因此,他们准备协商津巴布韦的独立问题。在 1978 年签署的协议中,艾贝尔·穆佐列瓦(Abel Muzorewa)成为所谓"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的总理。"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名称本身就体现了某种妥协。白人依然保有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并继续控制着经济。游击队战士并不接受这种妥协,战争依然继续进行。穆佐列瓦无法结束战争,而且其政府还在攻打津巴布韦同胞,因此很快就失去了民心。

1979 年末,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游击队控制了除津巴布韦主要城市外的大部分地区。史密斯/穆佐列瓦政权被迫承认失败。在 1979 年 12 月于伦敦签署的协议中,政府和游击队都同意结束战争,并在 1980 年 2 月举行全民大选。这让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罗伯特·穆加贝在 1980 年 4 月成为津巴布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

南部非洲的自由斗争

战后的南非

我们已经在本章及之前的章节中论述过,只要是有大量白人定居者,那些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者就会竭尽所能地抵制非洲人的多数统治。410 因此,南非的情况也不令人奇怪。南非白人最多,其对非洲人多数统治的抵制也最为坚决。20 世纪 70 年代,南非 400 万白人统治或控制着 2 000 万黑人。(南非还有 200 万混种和亚裔。)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南非并不像其他非洲殖民地那样。虽然南非名义上的元首(到 1961 年)依然是英国君主,但南非联邦自 1910 年开始就已经有了自治政府。但是这个自治政府是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的自治政府,也是为他们服务的自治政府。1936 年,少量有投票权的黑人被剥夺了投票权。欧洲的非殖民化绝不会给南非带来非洲人的独立。南非要实现非洲人的多数



地图 27.4 南非：独立与抵抗。

统治就必须要靠南非人自身通过内部努力才能实现，而这正是南非白人坚决要抵制的。

南非是非洲大陆上经济最强的国家，南非的白人也受惠于此。这种经济实力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矿业革命。二战期间，南非工业基础由于制造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得以加强。由于在战时不能从欧洲进口工业品，南非开始自己生产消费品。南非工业发展也受惠于英国，因为英国在战争期间需要在南非港口进行战舰整修，并要从南非港口运送物资。1940—1945 年间，南非工业发展也为黑人提供了重要的、新的工作机会。这些黑人离开农村的土地，涌到城镇来寻找工作。

战后，阿非利堪国民党(Afrikaner Nationalist Party)利用白人对失去控制的黑人的担心，很快控制了城市地区和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接着，就是南非也无法阻挡席卷非洲大陆的黑人自由运动。阿非利堪国民党利用白人的担心和露骨的种族主义宣传，在 1948 年的白人大选中赢得了多数席位。

411

种族隔离制国家的出现

国民党政府强化了隔离制度，这种隔离制度是从过去的 50 年中演变出来的。国民党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确立了更加清晰的种族主义制度，该制度旨在确保白人在南非主导地位的永固。该制度被称为"种族隔离"，字面上的意思是"分开"。种族隔离的最终目标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就是让黑人成为正式划定给白人的南非 86%土地上的"外人"。除非直接受雇于白人，黑人被限定居住在贫困的、拥挤的"保留地"。

《人口登记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1950)依据种族划分人口，将人口大体分为白人和"非白人"。在旧有的"分而治之"的帝国原则下，"非白人"又细分为"有色人种"(混种)、印度人(19 世纪带到纳塔尔糖料种植园的合同劳工的后裔)和"班图人"(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班图人"又被进一步地细分为各种种族：祖鲁人、科萨人、茨瓦纳人、文达人、索托人，等等。该法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策略，旨在削弱非洲人的团结并破坏非洲人民族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种族区域法》(*Group Areas Act*,1950)规定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居住的地区范围。这两个法案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石。此后，还有很多种族隔离法律影响了南非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禁止不同种族间的性行为以及划分公共场所、巴士和学校等。然而，种族隔离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制度，旨在将黑人限制在永久性的附属地位，限制在低收入的劳动者阶层。

所有的工会活动都被禁止，因此，白人雇主得以将工资维持在很低的层次。与此相对照的是，无论是熟练的工人还是新手，白人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是黑人的十多倍。在种族隔离制度中，最受憎恨的是《班图教育法》(*Bantu Education Act*,1953)。该法案将黑人教育从传教士那里收了回来，并强迫黑人进政府学校去学习那些强调种族差异的课程，并只教给他们为白人工作所需的技术。

非洲人对种族隔离的抗议和抵制

新的、严苛的种族主义立法成为南非非洲人抗议和抵制的新的导

火索。非洲人发起了抵制新通过的法律的浪潮,并抵制农业限制和农村地区的“班图地方政权”。城镇也爆发大量自发性的罢工、抗议和示威游行。非国大在新一代年轻的、接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了起来,其中就有约翰内斯堡律师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和工团主义者沃尔特·西苏卢(Walter Sisulu)。

1952年,非国大发动了一次“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Defiance Campaign),公开反对种族隔离法律,拒绝遵守法令。1953年1月,数千名党员遭到逮捕,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1955年,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中,非国大与印度人、“有色人种”和激进的白人政治团体联合组建了“大会联盟”(Congress Alliance),并制定了“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这是创建一个新的、不分种族的且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特征的南非的蓝图。与此同时,政府动用严苛的新法律来镇压所有的反对者,宣布他们为受到苏联指使的“共产主义分子”。

412



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是南部非洲政治史中的转折点;因为虽然它暂时中断了南非走向政治自由的和平进程,却加速了南非邻国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非殖民化进程。

1956 年,156 名大会联盟成员因叛国罪遭到审判,但自由宪章并未被证实是一个叛国文件,所有受到起诉的人最终都被释放了。此时,非国大从上到下出现了分裂。有些人认为非洲人的自由只有通过非洲人的斗争才能实现。他们不满于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也不满在非国大领导层中任职的南非共产党的白人或黑人党员的影响,尤其是这些人对自由宪章的影响。1958—1959 年,"泛非主义者"脱离出非国大,组建了一个由罗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领导下的泛非主义者大会(Pan-Africanist Congress, PAC)。

1960 年是"非洲年",自由即将降临到非洲大陆其他大部分地区,而这种即将到来的自由并没有降临到南非的迹象。南非的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执委决定在这一年继续推进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但是,他们没有考虑过警察的反应。1960 年 3 月 21 日,在约翰内斯堡南部的沙佩维尔(Sharpeville),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造成 69 人死亡、180 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逃跑时背部中枪。

沙佩维尔屠杀标志着南非自由斗争新阶段的到来。南非政府由于担心爆发革命,立即禁止了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活动,数千名党员被逮捕。南非政府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谴责。联合国中新独立的非洲、亚洲国家呼吁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但是被南非主要贸易伙伴英国和美国否决了。诺贝尔和平奖(1961)授予当时遭禁的非国大主席艾伯特·卢图利(Albert Luthuli)。但是,南非政府公然蔑视国际社会的谴责,脱离了英联邦,并宣布为独立的共和国。

413 在私底下,非国大执委不情愿地承认需要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bonto we Sizwe,MK),流放了奥利弗·坦博以便获得对武装斗争的支持。1963 年,在进行了几次成功的破坏活动后,"民族之矛"的高级军官在约翰内斯堡北部郊区的农场中被抓获。在后来的审判中,曼德拉向法庭宣读了一份声明,回顾了非国大长期无果的非暴力抗争历史。他用现已成为名篇的话语总结道: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直投身于非洲人民的斗争。我为反对

> 白人的主导地位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的主导地位而斗争。我怀抱着一个愿望,即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所有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有着平等的机会。这个理想就是我活下去的追求,也是我希望实现的目标。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愿意为此理想献出生命。

曼德拉、西苏卢、戈文·姆贝基(Govan Mbeki)以及其他六人被判终身监禁。

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与纳米比亚

1910 年南非联邦成立的时候,英国和南非政府认为英国保护领地贝专纳兰、巴苏陀兰和斯威士兰在适时的情况下将会加入联邦。贝专纳兰和巴苏陀兰被认为只是为南非工业不断发展提供劳动力的来源地而已,同时,斯威士兰一半多的土地为南非白人所占有。在这三个国家中,殖民官员主要依靠传统酋长权威来管理地方行政,包括征税。

20 世纪 50 年代南非出现的政治危机,无疑会促使地方要"高级专员公属"(High Commission Territories)承担更多的推进民主责任。这可以解释为对酋长权力滥用的批评,也就是对殖民统治的批评。尽管种族隔离制度在不断强化,英国殖民当局依然认为贝专纳兰、巴苏陀兰和斯威士兰会以某种形式与南非结成联邦。直到 1960 年 3 月沙佩维尔屠杀后,所有关于未来南非合并的想法才最终被放弃了。之后,英国允许非洲政党活动,也允许进行宪政谈判。就这样,博茨瓦纳于 1966 年宣布独立,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分别于 1966 年和 1968 年宣布独立。

虽然南非自 1915 年打败德国殖民主义者之后就一直占领和统治着纳米比亚,但在官方意义上说,纳米比亚依然是联合国的托管地。但是南非政府拒绝遵守托管条款,也不允许纳米比亚独立。南非政府将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的大部分沙漠领地看作南非的第五个省份,并在纳米比亚民族中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并对他们进行压制。1960 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始展开反抗南非占领军的游击斗争。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述过,在安哥拉共和国独立过程中,南非如何准备切断

414 外部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援助。同时，由于南非不顾联合国的决议依然占领着纳米比亚，南非矿业公司有组织地分割了纳米比亚庞大的天然矿物资源，包括钻石、铜、铀和很多其他宝贵资源。很显然，未来独立的纳米比亚继承下来的矿物储量在很大程度上都已被耗尽。南非最终撤军以及纳米比亚在 1990 年的独立将在第三十章中加以讨论。

岛屿国家的独立

留尼汪

留尼汪在 1946 年成为法国的一部分，且留尼汪有权派出代表参加法国国民议会。这也确保了糖料种植园经济牢牢地控制在法国公司的手中。法国的财政补助减轻了留尼汪高失业率所造成的不满，这些财政补助包括社会安全投入和失业金。留尼汪在经济上依赖于法国，因此也没有出现对政治独立的广泛要求。

毛里求斯

1810 年，英国从法国手中夺走了毛里求斯。1934—1935 年奴隶制废除后，之前的非洲裔奴隶都离开了糖料种植园，这让英国不得不从印度输入合同工。50 年后，数万印度人到达了毛里求斯，到 20 世纪早期，印裔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改变了人口的种族构成。1936 年成立的毛里求斯工党(Labour Party)就是从这些农村劳动阶级中获得主要支持的。工党在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Seewoosagur Ramgoolam)医生的领导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推进独立进程中，他们遭到了主要是克里奥人支持的毛里求斯社会民主党(Parti Mauritien Social Démocrate, PMSD)的反对。社会民主党担心独立会让他们被迫接受“印度人的统治”，他们更倾向于保留一种留尼汪式的与英国联系。然而，拉姆古兰很是机巧地引领毛里求斯度过了困难的十年，期间不乏族群间的暴力行为。他赢得了一系列的选举，并在 1968 年脱离英国获得了独立。

马达加斯加

马尔加什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屈服于法国的外来占领。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公开的抵抗遭到了镇压,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立了很多秘密团体,它们保持着马尔加什人的民族主义激情。法国的同化政策只是将少数屈服的马尔加什人吸纳进殖民体系中来而已。1940 年,殖民当局支持法国维希政权的决定,导致英国与"自由法国"于 1942 年占领了马达加斯加。这次对法国殖民威望的彻底屈服激励了马尔加什民族主义者,战时的粮食短缺还导致了 1943—1944 年出现了饥荒,这更是进一步地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1946 年,与法国其他非洲殖民地一样,本土的马尔加什人获得了法国国民议会的两个代表席位。这两个代表是约瑟夫·若斯塔(Joseph Raseta)和约瑟夫·拉沃阿含奇(Joseph Ravoahangy),他们建立了马达加斯加民主革新运动(Mouvement démocratique pour la rénovation malgache, MDRM),但是在巴黎,他们要求立即实现独立的呼吁遭到了拒绝。与此同时,法国定居者试图镇压岛上民族主义者的起义浪潮。马达加斯加民主革新运动领导人遭到逮捕,那些被认为是该党同情者的工人也遭到虐待或解雇。1947 年 3 月 29 日爆发"大起义"时,没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在起义的最初几个月里,数百名欧洲人及其马尔加什"合作者"遭到杀害,起义者控制了东部地区。然而在 1948 年,法国无情地镇压了起义,至少造成了 9 万人的死亡。

415

尽管武装起义失败了,但是马尔加什人的民族主义精神长存。1953 年,天主教堂为阻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而正式支持独立。随着 1956 年法国开始允许其非洲殖民地成立内部的自治政府后,马达加斯加又开始出现了新一轮政治运动。在马达加斯加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一支新的"现代"民族主义力量以社会民主党(Parti social démocrate)的形式在菲利贝尔·齐拉纳纳(Philibert Tsiranana)的领导下脱颖而出。社会民主党在 1958 年的公投中成功地将马达加斯加保留在"法兰西联邦"。1960 年,齐拉纳纳领导马达加斯加走向独立。

科摩罗

科摩罗群岛的主要人口为说斯瓦希里语的穆斯林,只是马约特岛(Mayote)上还有一定数量的马尔加什基督徒。直到 1968 年法国采取暴力镇压学校罢课前,科摩罗都没有从法国独立出去的特殊要求。1974 年,经过一系列全民公投后,科摩罗群岛投票支持独立,不过法国宣称马约特岛投票决定留在法兰西联邦里。1975 年,科摩罗民主联盟(Union démocratique des Comoros,UDC)领导人艾哈迈德·阿卜杜拉(Ahmed Abdallah)宣布科摩罗独立,其本人也成为首任总统。同年 12 月,法国承认格兰德科摩岛(Grand Comore)、昂德昂岛(Anjouan) 和莫埃利岛(Moheli)的独立,但是继续坚持马约特岛留在法兰西"领土共同体"内。此时,阿卜杜拉已经被阿里·萨利赫(Ali Soilih)推翻,阿里·萨利赫驱逐了所有的法国人。他后来又在 1978 年被鲍勃·德纳尔(Bob Denard)推翻。鲍勃·德纳尔是一名法国传教士,他后来邀请阿卜杜拉回国担任总统。

塞舌尔群岛

塞舌尔群岛的独立运动开始于 1964 年。其时,群岛上成立了两个主要政党。詹姆斯·曼卡姆(James Mancham)领导下的塞舌尔民主党(Seychelles Democratic Party, SDP)赞成继续保持与英国的关系。塞舌尔人民统一党(Seychelles people's United Party)的领导人是弗朗斯·阿尔贝·勒内(France Albert René),他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工团组织者。他站在穷人的立场,很快就认识到只有彻底独立于英国才有可能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然而,英国人并不准备以法国为榜样。他们告诉曼卡姆,如果他希望国家避免走上勒内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好为独立做好准备。20 世纪 70 年代的选举显示出两党势力非常接近,但曼卡姆获得了美国、当地地主和商业利益团体的经济支持。(美国与英国在冷战期间认识到,印度洋上群岛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且英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将查戈斯[Chagos]群岛租借给美国,让美国在迪戈加

西亚[Diego Garcia]修建一个空军基地,并将塞舌尔群岛中的一个主要岛屿,即马埃[Mahé]岛上一个地方租借给美国,让美国修建一处卫星侦测站。)相比而言,勒内的激进社会方案让他获得了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经济支持。 416

英国希望能严格控制勒内,并劝说两党在 1975 年组成同盟,为来年的独立做好准备。独立后,曼卡姆担任总统,勒内担任总理。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同盟:曼卡姆认为群岛未来取决于奢侈的旅游业,以便成为他的富人朋友的一个离岸免税天堂。勒内希望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独立后不到一年,勒内就发动政变,并建立了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如此,他还是采取实用主义立场,允许美国人留在岛内:美国侦测站的租金每年被用来购买国家所需进口的石油。

第二十八章　独立后的非洲(一)

417　独立后，非洲人及其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非洲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与一些非洲领导人的错误政策、腐败或无能，甚至是生态问题无关。但在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初，非洲很多反复出现的问题都根植于之前80多年，甚至是更多年前的殖民统治。

殖民统治的政治遗产

独立前夕，欧洲人将议会民主制及其他不适宜于非洲的制度形式强加给非洲。此时，欧洲人忽视了一点，即通过军事征服在非洲业已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殖民政府留给非洲的真正政治遗产是外来的独裁体制。这种体制虽然有些时候是有用的，但总是在压制反对声音。很多争取非洲独立的领导人因为直接反对殖民政府的非正义性及专制而遭受牢狱之灾。

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边界线完全是人为设定的。欧洲政治家在划分这些边界线时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前殖民时期的民族国家和小型村落。出于欧洲人自身利益的考虑，具有不同语言、政治与文化传统的非洲民族被划定在一起。殖民地上广泛存在的“间接统治”又进一步地加大了非洲内部的差异。历经数个世纪冲突后才在欧洲民族国家

中产生的多党议会民主制，现在突然被强加在非洲人的身上，且他们必须要适应。

非洲国家边界的人为划分让非洲国家独立后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团结问题。非洲政治家或许在反殖民主义情感上是一致的，但他们本身依然属于某个单一国家。赞比亚经常提出的政治口号是“一个赞比亚民族，一个国家”。与其说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表达，不如说是执政党在说不同语言的族群间“制造”民族意识的一种意愿。例如，尼日利亚国家的民众还是自认为是约鲁巴人、伊博人、豪萨人或是其他，而非“尼日利亚人”。在那些由一个杰出的民族领袖领导的、存在单一大党的国家，如桑戈尔领导下的塞内加尔或是尼雷尔领导下的坦桑尼亚，就没有如此严重地受到民族团结问题的困扰。但是对绝大多数在独立之际实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来说，政治党派都是建立在特定政治家个人所属族群或地区的基础上，而非基于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的经济发展主张。

418

集权政治与人造民族国家的双重遗产，严重影响了非洲独立后早期的政治稳定。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论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这种双重遗产给刚果带来的混乱。绝大多数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某种“地区主义”的祸害。在尼日利亚，1967 年东南部的伊博人想独立成“比夫拉共和国”(Republic of Biafra)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在经过了两年半的残酷内战后，尼日利亚才实现了民族和解。

但是，争取非洲独立的领导人为何如此坚决地维持这种人为划分的、从殖民统治时期脱胎而出的民族国家的边界呢？取得对“比夫拉反叛”胜利后的尼日利亚军队领导人戈翁(Gowon)将军在对尼日利亚人发表演说时，简短地概括出了基本原因：

> 我们的目标(镇压反叛)就是……要维持国家的领土完整，要证明黑人有能力去建立一个强大的、不断发展和繁荣的现代国家，为了实现繁荣要确保民族共同体内的尊重、尊严和平等。我们敞开怀抱欢迎……所有不破坏国家统一的人。统一的尼日利亚

万岁。

——摘自 R. Oliver and A. Atmore, *Africa since 1800*, third edition, CUP, Cambridge, 1981, p. 338

平衡尼日利亚不同地区利益的努力最终产生了由众多地方州所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在乍得和苏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互不信任更是激化了地区矛盾,并爆发了持续不断的内战。但是,绝大多数非洲政府有时还是成功地维持了脆弱的国家统一。

一党制国家

绝大多数非洲执政者很快就放弃了多党议会制,因为它无法运作起来。为了快速取得社会、经济发展,他们迫切地需要民族团结,这也是非洲各国的国情使然。在独立后的几年内,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都实行了"一党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的国家里,只有人口约 100 万的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这两国自独立后依然维持着多党议会民主制。支持一党制的观点认为,建立在地区族群利益基础上的议会制具有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作用,并且认为,在一党制内民主更容易实行。

419 在一些一党制国家里,如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选举确实可以将那些不受欢迎的政府部长们通过投票的方式排斥出政府。但是,这种选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党首的政治团结及其控制地方党员情绪的能力。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党制往往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在诸如恩克鲁玛的加纳、班达的马拉维或是绝大多数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一党制成为专制的执政党压制对政府的任何批评的工具。一党制政府的很多正直批评者未经审判就被投入牢狱或被流放,并有生命之虞。地区反叛或军事政变(coup d'état)成为推翻无能或不受欢迎的政府的唯一途径。非洲政治中的军队角色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进行论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在受到广泛尊重的领导人统治下的、广义上的一党制国家在没有军事干涉的情况下依然生存了下来。其中有桑戈尔领导下的塞

内加尔、乌弗埃-博瓦尼领导下的博茨瓦纳、肯雅塔领导下的肯尼亚、尼雷尔领导下的坦桑尼亚和卡翁达领导下的赞比亚。塞内加尔于 1975 年开始实行一种修正了的多党制,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肯雅塔于 1978 年去世、尼雷尔于 1986 年退休后实现了向民选总统的和平转变。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进一步论述 20 世纪 90 年代多党制在非洲的重生。

经济遗产:欠发达和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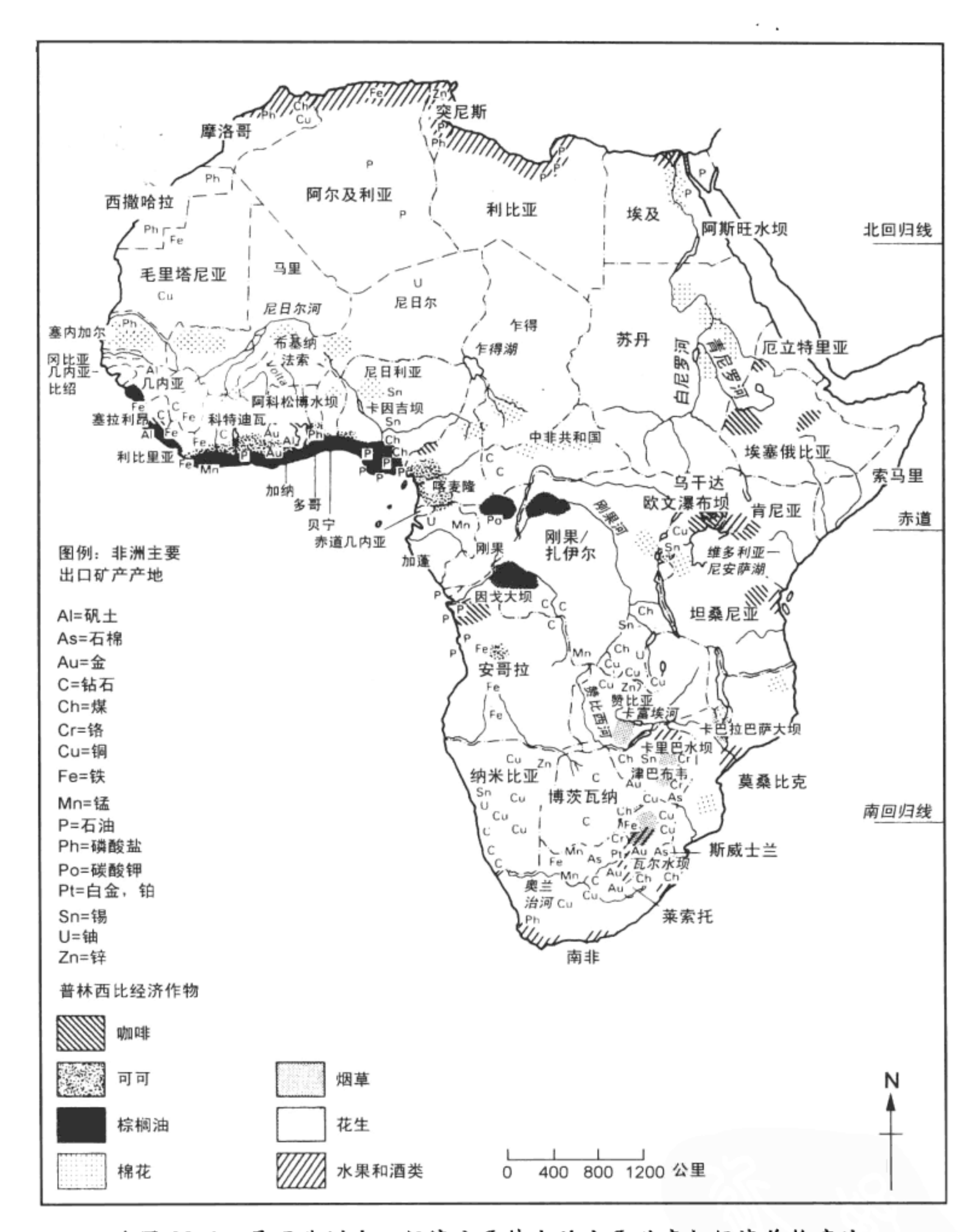
欧洲殖民政府给非洲带来了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也是 80 年殖民暴政的最终产物。非洲经济一直表现为直接向欧洲出口廉价的农业原材料和未加工的矿产,进口的则是相对昂贵的制成品,很难甚至无法实现非洲经济的自给自足,因为这并不符合欧洲占有殖民地的目的。非洲产品的类型和"贸易关系"都是欧洲以牺牲非洲利益来决定的。非洲产品的出口价格也是由欧洲和北美所谓的"发达经济"所控制的。因此,在欧洲萧条时期,非洲产品的出口价格会更低,而在欧洲繁荣时期,非洲却要为其进口产品支付更多。为了能进口和过去同等数量的制成品,非洲越来越转向为欧洲市场生产经济作物。这些"不利的贸易关系"的结果就是让非洲成为将财富输出给欧洲、北美的地区。

同时,随着对经济作物生产和矿产开采的投入越来越多,非洲基础性粮食作物生产的可持续性遭到了忽视。20 世纪 50 年代,非洲已经成为粮食的净进口者。换句话说,非洲人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非洲一半人口的需要。不断增加的城市失业更是进一步地强化了这种危机。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早期,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逃避农村的日益贫困、强迫种植与强迫性劳动制度,在绝望中迁移到了城镇。

421

殖民统治的另一个遗产是非洲交通体系完全不能满足大陆内部的发展需要,这也是造成非洲贫困的原因之一。19、20 世纪之交修建的绝大多数铁路都是为了便于非洲向欧洲出口产品。独立前夕,这些铁路急需维修,而且它们只是把矿区或经济作物产地与沿海地区连接起

420



地图 28.1　展现非洲出口经济主要特点的主要矿产与经济作物产地。

421　来。例如，塞内加尔和马里的花生与棉花、加纳的黄金、尼日利亚的锡和花生、乌干达的棉花以及刚果与赞比亚的铜。非洲国家的公路发展非常有限，而且绝大多数公路、铁路网络都很少考虑到国家的内部发展

需要。除了内陆国家到沿海的路线外,非洲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地区间的公路、铁路线以促进非洲国家间的贸易。电信情况也类似。内陆农村地区的电信网络几乎就没有,而且从非洲打电话到欧洲比某个非洲国家首都打电话到其邻国首都要容易得多。

非洲很多国家的政府从其前殖民当局继承了两个尤其残酷的经济政策:人头税和农业市场委员会。人头税征收范围是每个成年男性,而且无论其收入多少。农业市场委员会以低价从农民那儿买入产品,却以高价在海外将这些产品卖出,并将这种差价作为政府收入来源。这两项残酷的经济政策对政府收入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很多国家在独立初期将其保留了下来。

教育缺乏是殖民统治又一个使非洲贫弱的遗产。独立时期,热带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具有读写能力的人还不到人口总数的10%。

经济发展的早期动力

独立时期,非洲主要矿产和农业出口产品的世界价格出现过短暂的提高。这一情况最初掩饰了由于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经济危机的程度。非洲大陆缺乏经验的新领导人对政治独立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他们的迷梦很快就随着经济危机逐渐显现而破灭了。独立后的非洲领导人最初是以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经济为模板,制定了错误的发展规划,这使得情况变得更糟。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这些领导人得到欧洲经济"专家"的强烈建议。该理论很简单:欧洲是"发达的",而非洲是"欠发达的"。因此,要解决问题,非洲必须复制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非洲领导人看到快速工业化是取得经济自立的途径就接受了这一模式。如果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了,它们就能制造出自己的消费产品,而在那时,这些消费产品是从欧洲进口来的。在适当的时候,这就会将"不利的贸易关系"扭转过来,并有利于非洲的发展,因此也就可以终止将非洲财富输入业已"发达的"世界。但是情况却事与愿违。

一方面,早期的工业化计划过于雄心勃勃,而且经常脱离国家实际需要和资源情况。另一方面,非洲不得不从欧洲和北美引进所有的专

422

业技能、技术、机械和建筑材料。在促进卫生、教育和交通设施发展方面,情况也是类似的,而这些正是非洲新领导人对其民众所做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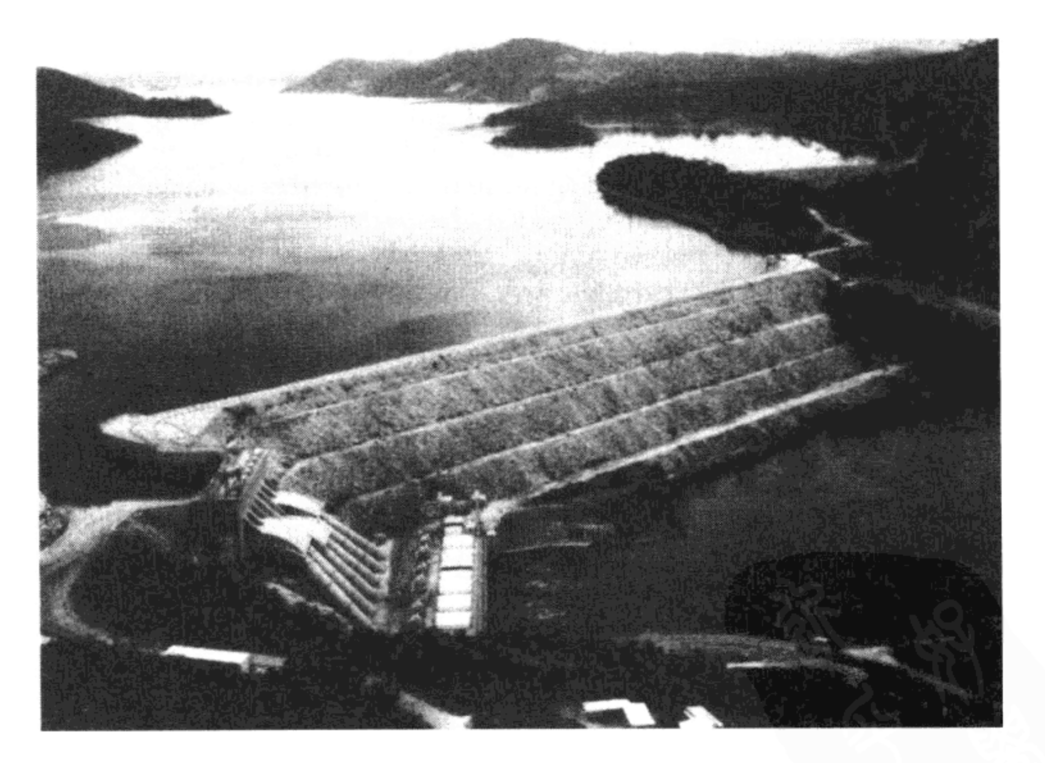
数年内,非洲国家的政府就已经欠下“发达”世界的高额外债。这一结果造成非洲国家需要更大的经济作物和矿产出口以支付这些债务。旧有的贸易模式延续了下来,不利的贸易关系变得更糟糕。欧洲与美国的资本、专业技术所建立的工业只适合欧洲和美国,而并不适合非洲。加纳瓦尔科铝业公司(the Ghanaian Valco Aluminium Company)的历史清晰地展现了这一问题。加纳政府为该公司提供极为低廉的电力,因为加纳政府相信加纳将会用自己的工厂加工铝土矿。但是控制瓦尔科的美国公司利用其在加纳的工厂加工从牙买加运到加纳的铝土矿。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当瓦尔科电价提升到更接近电力真正成本价的时候,工厂便倒闭了。

甚至非洲国家的政府部分或完全将矿业公司国有化,事实上很多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但其出口市场和价格依然控制在“发达”世界的经济中心之手。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创造了“新殖民主义”一词来描述欧洲在经济上继续控制政治独立的非洲的这一情形。

法国依然紧紧地控制着其前热带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加纳在 1958 年经过投票对戴高乐政府说“不”。其他法语国家依然留在法国法郎区。虽然这些国家更容易吸引外部投资,但也会将其贸易优先权给予其前“母国”。对法国来说,这也尤其重要,非洲是法国极其重要矿产的重要来源地,如来自加蓬和尼日尔的可以作为核燃料的铀、毛里塔尼亚的磷酸和刚果人民共和国的碳酸钾。来自萨赫勒地区的非洲棉花、加蓬与科特迪瓦热带雨林的木材、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热带水果和植物油,对法国来说也较为重要。法国是这些国家的主要援助国和贷款国,并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被调适为向法国持续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很多法语非洲国家政府为法国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地,法国政府在法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也会采取直接干涉。例如,法国军队在支持扎伊尔、加蓬和乍得亲法政府上发挥了直接的作用;法国军队将自立的“皇帝”让-巴都·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的臭名昭著的政权赶出了中非共和国。

用一位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独立非洲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开始”,这一观点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日益得到明证。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取得独立的国家,尤其是西非国家政府在高成本的工业和面子工程上花费巨大,但对其适用性缺乏关切。加纳的阿科松博水坝(Akosombo Dam)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让加纳背负了足以让国家破产的国际债务,而且在短期内对加纳民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效用。各种原因造成了该工程的失败,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过于长远的规划和欧洲“专家”不恰当的建议造成的。加纳所期望的工业革命没能开始就夭折了。尽管产生了债务,发电站也有一些技术难题,干旱时期阿科松博湖也出现了水位下降,恩克鲁玛的远见确实在一定程度取得了成功。该工程使得 20 世纪 90 年代加纳农村城镇电力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

423



加纳的阿科松博水坝。1966 年 2 月恩克鲁玛总统宣布投入运行的水坝与发电站(图片底部),按设想是为加纳工业革命提供电力,也是恩克鲁玛被政变推翻前最后的政府工程。水坝后方的湖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湖。

与此同时，加纳政府没能在可可种植上加大投资，而可可种植曾使加纳取得过巨大的经济成功。20 世纪 70 年代，加纳老化的可可树已经过了其最富产的生命时段了。事实上，加纳自从独立后就没有种植过新可可树，政府也没能让国家的年轻人看到可可工业的希望。因此，加纳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可可价格上升时期也没能取得经济复苏，而其邻国科特迪瓦则受惠颇多。

独立时期，非洲人口依然主要是在农村地区，且至少有一部分人口继续依赖于种植业。但是，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所主导的政府经常蔑称农民落后、没有生产能力。然而，这些精英们本身并没能将剩余的政府基金或是代价昂贵的外国贷款用对地方，过去曾使国家保持了一定程度经济自立的那些人却没有获得这些款项的支持。相反地，他们保留着从殖民政权中继承下来的、严格限制的农业市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继续让少量生产盈余粮食的农民只获得很少的回报。赞比亚的例子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种趋势。

1964 年，赞比亚取得国家独立，用卡翁达总统后来的话说是“含着铜汤匙”诞生了。铜价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到 1973 年持续上涨，独立的赞比亚获得了巨额外汇储备。但是，付出的代价则是对单一铜矿开采工业的过分依赖。1970 年，铜占了国家外汇收入的 92%，占了政府总收入的 53%。赞比亚在免费教育、卫生和大量的城市建筑项目上投入巨大，但是很少考虑到经济的多样化，对农民的粮食生产也没有有效投资。事实上，从殖民时期保留下来的政府控制的市场委员会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行政部门的大量出现以及非技术性教育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很多人脱离了农村生活。赞比亚几乎没有认识到，自己从一个人口不多且之前完全自足的农业大国，很快成为了粮食的净进口国。1970 年，赞比亚政府将铜矿国有化，为了获得采矿工业 51% 的股份，政府给多国矿业公司支付了一大笔国家外汇。卡翁达及其同僚认为这符合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在理论上讲，赞比亚人民将会控制国家的重要工业资源。然而，在实现国有化不久的 1973 年，智利突然脱离了国际铜业市场卡特尔，导致铜的国际价格崩塌，再加上同年石油价格的

飙升所造成的影响、赞比亚对其联系紧密的贸易伙伴南罗得西亚的经济制裁,共同造成了赞比亚经济的急剧下滑,并让赞比亚陷入难以自拔的负债境地。

同时,大部分热带非洲地区,政府腐败泛滥已经显而易见。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依然相对贫困,城市失业不断上升,但是政府部长、行政职员和其他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日益富有。事实上,在一些非洲国家内,独立后受过教育的精英实际上功绩有限,只不过是黑人"殖民"统治者取代了白人殖民统治者而已。

在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农业出口产品的世界价格下滑时期,很多非洲新政治巨头除了喂肥了自己外,所作所为明显无能。非洲是如此依赖于进口制成品,以致于这些制成品价格变得更为昂贵。很多国家不得不开始削减进口,无论国家是如何地需要这些进口产品。通货膨胀迅速加剧,商店出现货物短缺。除了政客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得越来越差。这就是那些政客在独立时所承诺的发展和繁荣吗?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随着议会反对派大体上遭到了压制,西非、中非地区出现大量的军政权,其境况极其令人震惊。

非洲政治中的军人作用

除了几内亚、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绝大多数法语国家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过渡到军人统治。多哥和达荷美(1974 年改名为贝宁)都常受军事政变和反政变之苦。自 1965 年 11 月开始到 1966 年早期,尼日利亚和加纳发生的政变一个接一个,政变成了家常便饭。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军人统治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选择。军事政变在整个 20 世纪 70、80 年代里成为政府变更的最常见方式。

425

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选择,非洲军人政权有着很多有趣特征。首先,在前殖民大国的政治统治中,军队经常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第二,独立时期的军队在最初通常是作为早期殖民征服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建立的。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殖民时期的非洲军队主要是用于反对可能的反叛属民,而不是用来反抗可能的敌对邻国和保护国家。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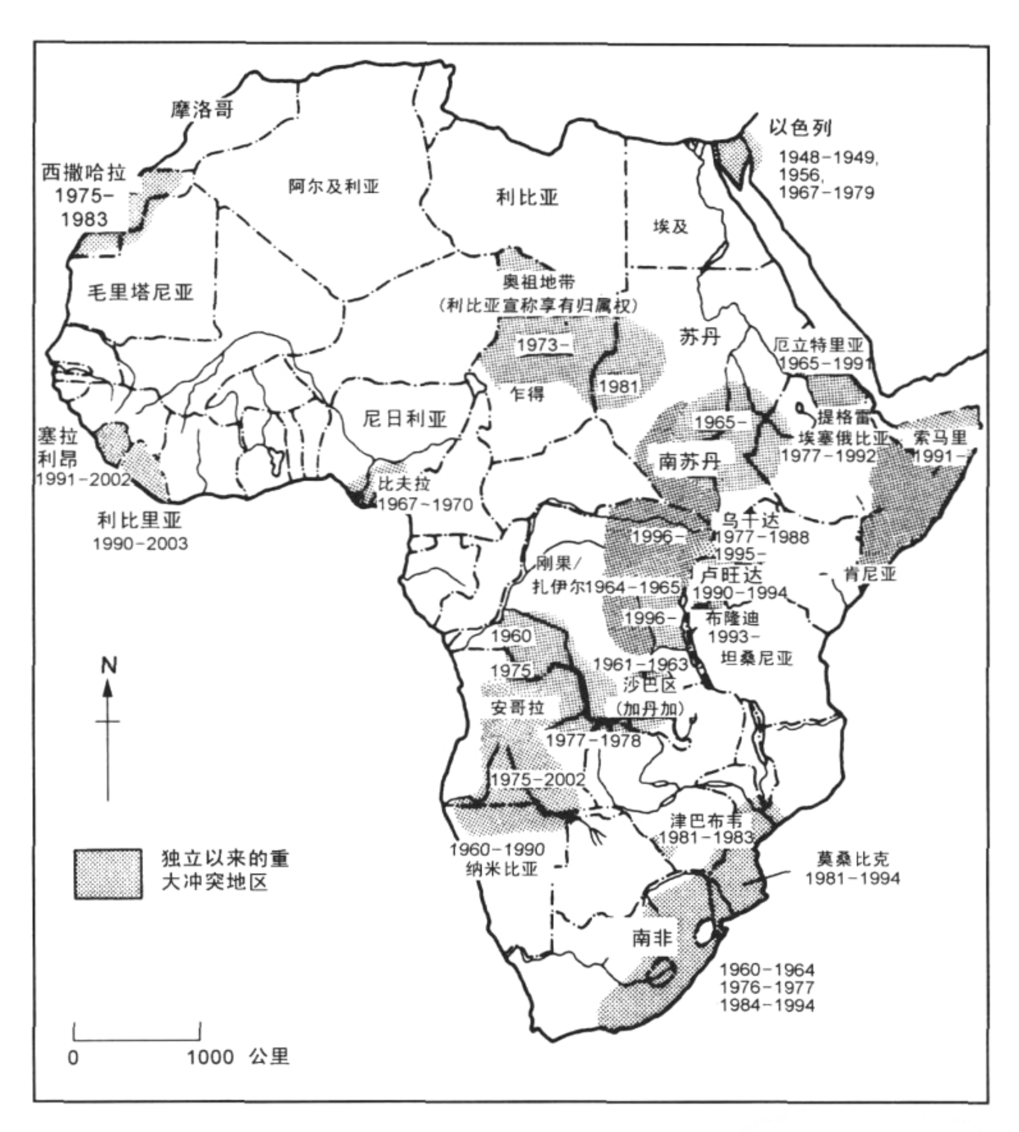
立时期，军队除了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装点外，其原本应有的作用很少得到发挥。一个有趣的例外是塞舌尔群岛，塞舌尔群岛独立时期压根就没有任何军队。1976 年，总理勒内和少量控制警局军械处的同僚发动政变。塞舌尔群岛只是在政变之后才需要一支军队，以用来保卫政权以防备潜在的反政变力量。

20 世纪 60 年代的军事政变一般来说是对低能且腐败的文职政权的抵制。绝大多数这样的反对文职政权的政变最初都得到了支持。至少在军人掌权前，军队还是纪律严明的，通常也没有腐败存在。几个例子足以证明这种情势。

在尼日利亚，1964—1965 年拼凑出来的选举最终瓦解了人们对文职政权的信任。但是，1966 年 1 月第一次军事政变后，又在 7 月发生了另一场军事政变，七月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担心东南部的伊博人或北方的豪萨人获得族群优势。居住在北部地区的 2 万名伊博人遭到屠杀，屠杀直接导致了“比夫拉人”的独立及后来 1967—1970 年的内战。争吵的多党文职政客并没有对政治继承做出什么改善，正是在 1966 年 7 月反政变中获得权力的戈翁将军，将尼日利亚从这种状况中引导了出来。

虽然戈翁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战后和解，但是其政府越来越低效且脱离国家需要。这导致穆尔塔拉·穆罕默德(Murtala Muhammed)将军于 1975 年 7 月推翻了戈翁的统治。穆罕默德重塑了政府的影响力，他实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并设置了 1979 年恢复文职统治的时间表。同时，他开始处理导致拉各斯港货船严重积压问题中的腐败与低效问题。然而，在这位广受欢迎、尊重的军事领导人于 1976 年 2 月被一伙满是嫉恨的中层军官谋杀后，非洲军人政府的脆弱性就很明显地揭露出来了。他们策划的政变事实上经过了掩饰，后来奥巴桑乔(Obasanjo)将军掌握了权力，继续推进穆尔塔拉·穆罕默德的改革政策，并在 1979 年恢复了文职统治。

从对反政府力量的压制与容忍来看，1979—1983 年尼日利亚文职政府是尼日利亚历史上最为自由的时期，但是也是国家系统性腐败、



地图 28.2　独立后主要军事冲突地区。

政客贪腐以及尼日利亚巨额石油新收入浪费最为严重的时期。几年内,文职政权所展现出来的个人贪婪使得尼日利亚经济出现问题,而尼日利亚经济本来是有望兴盛起来的。1983 年,军队又一次地回到政府中来了。作为重塑公众生活中的道义威望和纪律的力量,军队最初是受到拥护的。然而,军队变得日益腐败和不受欢迎。这次政变后虽然经历数位统治者,但一直到 1998 年,军队依然掌控着权力。

加纳的情况也如此。腐败、铺张浪费和对批评的不容忍让人们乐于看到 1966 年 2 月恩克鲁玛被推翻。一段时间以来,加纳人有种越来越强烈的情绪,即恩克鲁玛在成为一名世界政治家上花了太多的精力,而忽视自己国家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二月政变还是由于另外的、较为具体的军队抱怨造成的。这些怨言主要关系到可能的防卫开支削减、通货膨胀造成军队官员收入的缩水以及传闻中政府对军队日常管理的干涉。而且军官担心在刚果的在联合国机构中服务的加纳部队,可能会被派到"罗得西亚"去反对在 1965 年 11 月宣布罗得西亚独立的史密斯政权。

加纳军人政权将恩克鲁玛流放到几内亚,并将恩克鲁玛政治支持者清洗出行政部门后,在 1969 年,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第一次实现了"重新文职化"。然而,老练的"黄金海岸"政治家科菲 · A. 布西亚博士(Dr. Kofi A. Busia)在面临可可世界价格急剧下滑时,对解决加纳不断严重的经济问题束手无策。1972 年,在伊格内修斯 · 阿昌庞(Ignatius Acheampong)上校的领导下,军队重新掌握了政权。

军队的不满,其中包括军事预算的进一步削减,又一次地让军队发动了政变。虽然不能阻止加纳整体经济的衰落,但是阿昌庞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自足行动"(Operation Feed Yourself),该项行动旨在减少加纳对价格高昂的进口粮食的依赖。但是,这一点对加纳来说远远不够。加纳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受到 1973—1974 年间石油价格飙升的重大冲击。随着通货膨胀的快速加剧以及某些军官的炫富,空军上尉杰瑞 · 罗林斯(Jerry Rawlings)于 1979 年夺取了政权,这次政变只是一次短暂的"清算行动"。国家的三名前军队领导人因腐败行为而遭到处决,国家在三个月内又回到了文职统治。新的文职政府又一次地没能扭转国家经济衰落。加纳需要有一个值得信任的、有信心的领导层,以及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经济政策,该项政策不能只是让特权政党和城市精英获益。1981 年 12 月,罗林斯再次夺取了政权,但这次被宣称是一场"人民革命"和清洗老权贵的行动。在后来的十年内,罗林斯带来了加纳所需要的领导和得力的经济重建政策,

但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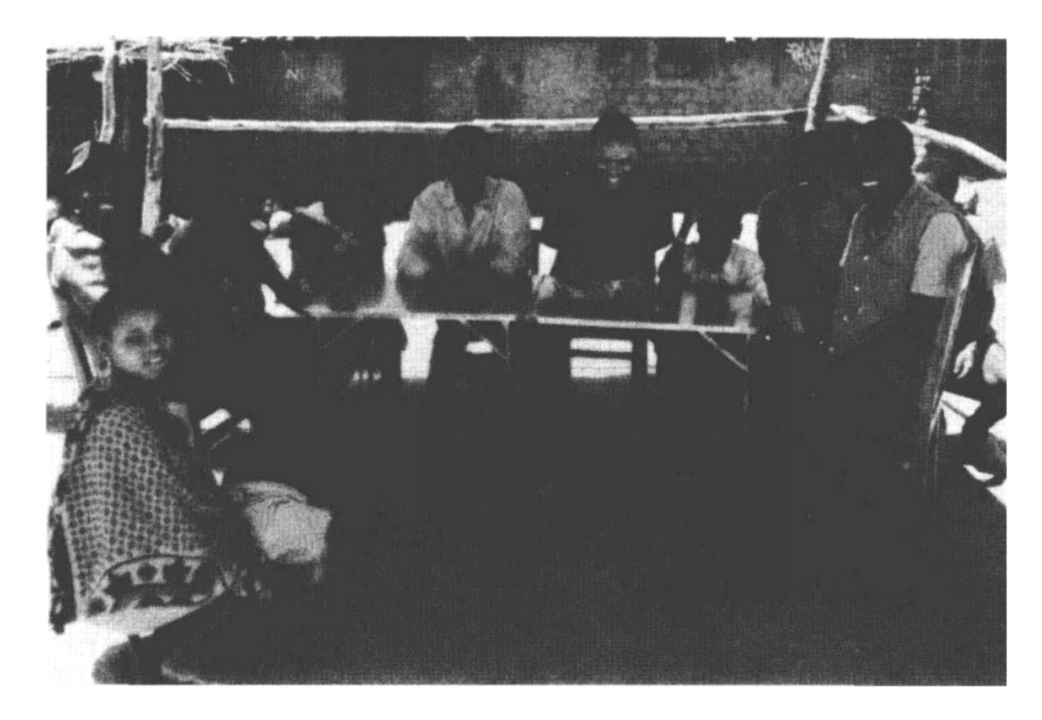
但是,我们并不能从上文的叙述中得出结论,即非洲政治中的军队是非洲发展的一个必备的、正面的积极因素。军事统治者与文职统治者一样,也可能会走向腐败与专制。1979 年,三个非洲最腐败和专制的政权都倒台了,它们是中非共和国的让-巴都·博卡萨"皇帝"(1966—1979)、乌干达的陆军元帅"终身总统"伊迪·阿明(1971—1979)和赤道(前西属)几内亚的文职独裁者弗朗西斯科·马西埃·恩圭马(Francisco Marcías Nguéma)。博卡萨从其贫困的国库中抽取了巨额资金,挥霍在自己及朋友身上,包括其臭名昭著的帝国加冕礼及送给法国总统的钻石礼品。在数以千计真实或想象的反对者遭受到虐待和死亡问题上,阿明和马西埃·恩圭马的残暴的独裁政权难辞其咎。阿明政权的暴政毁灭了曾一度被认为是非洲最繁荣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

社会主义与自力更生:坦桑尼亚路线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看到非洲独立政府不断地在努力,但总体上没能克服其从殖民政权那里继承而来的发展不平衡、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坦桑尼亚的尼雷尔确立了一个大胆的新路线,试图将非洲发展带入一个全新的方向。该项计划始于 1967 年 2 月的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在宣言中,尼雷尔确立了发展的基本方针,寻求扭转基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非洲发展方向。非洲独立后的早期发展已经显示出欧洲模式依赖于巨额外来投资。这增加了非洲的债务,事实上也意味着要将非洲财富输送到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去。同时,随着非洲越来越贫穷、越来越无法自立自主,私人的贪欲正在非洲社会内增加了阶级分化,尼雷尔决定结束这种"精英肥得冒油"的状况。

428

尼雷尔认为坦桑尼亚的未来是一个繁荣、自立自足和无阶级分化的社会。他称之为"非洲社会主义"。作为对殖民统治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应,该理念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中间演化出来



坦桑尼亚乌贾马村委会。

的。除了几内亚塞古·杜尔(Sekou Touré)这个特例外,最具独立意识的领导人在非洲社会主义原则上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尼雷尔为这些社会主义原则在实践上绘制了蓝图。尼雷尔宣称非洲人无需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及其他人发展出来的欧洲社会主义原则中获得教益。尼雷尔对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历史有着相当理想化的认识,认为"传统"的非洲村庄社会就是基于互相合作的社会主义原则。

坦桑尼亚社会主义基于当地资源而非舶来的、高科技的工业化。国家的主要银行和外国资本主义公司应该实现"国有化",也就是应由国家代表人民接管过来。"领导准则"则将禁止政治领导人积累私人财富。政府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农村发展上,这会带来自力更生。

429 尼雷尔提出要将大量偏远的小村庄聚集起来合并成更大的、也更有生产效率的村庄。这将会便于政府修建更好的公路和搭建农村市场,也能更好地提出农业建议和改良技术。大型的、集中的村落也能有效地提供更好的水源、卫生和教育设施。这项政策被称为"乌贾马"

(ujamaa),可以翻译为“家庭型”、“自助”或“互相合作”。乌贾马是建立在古代非洲家庭、部落在有互助需要时期诸如收获或清理新土地时期的自助传统基础上的。因此,乌贾马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互助劳动的“非洲社会主义”原则落实到共同体的利益上来。尼雷尔相信,乌贾马应用到大村落中将会增加农业产量,可以让互助劳动田地生产出用来出售到城镇或用来出口的剩余粮食。同时,乌贾马社会主义会确保人民共同分享农村的更大繁荣。这也会避免贫富的严重分化,而这种贫富分化一直是殖民统治、独立早期的典型特征。

无论理论是怎样的好,坦桑尼亚乌贾马却有着内在的缺陷。它是个自助体系,但在实践上,农民并不情愿离开其祖先的故土以及家族世代以来收成都还不错的地区。他们也不情愿为了公有地而放弃私有土地。当劝服工作不起作用后,政府转而推行强迫式的“集体化”。1973—1974 年间的严重旱灾有利于政府政策的推行,旱灾让很多村户认为迁移值得尝试。1973—1976 年间,约有 500 万人迁入乌贾马村落。到 1977 年,坦桑尼亚有 8 000 个这样的村落。

城市机构主导的强迫式集体化运动,也通常是缺乏效率的。农民有时是在新村落的公路、市场和公共福利设施建立前就已经迁入了,导致农村基本物品如煤油、肥皂和糖的严重短缺。政府和政党官员认为农民落后且无知,不能理解和接受集体化的好处。但是农民其实非常明白。乌贾马村落中公有地上的各种生产并不比之前的农业生产有着显著的提高。一些家庭被从肥沃地上迁走,去种更贫瘠的土地。新的农业“专家”不见得“拿手在行”。到 20 世纪 80 年代,农民的知识与经验获得了很大的尊重。政府被迫不再刻板地坚守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教条主义。非公有制的个体农户被允许继续存在,有些农户成为富有的农业资本家,生产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

20 世纪 80 年代,坦桑尼亚依然是非洲最贫穷国家之一。坦桑尼亚外债沉重,依然依赖于出口农业原材料——咖啡、棉花和剑麻——以进口越来越昂贵的制成品。但是,和非洲很多其他地区一样,坦桑尼亚的粮食作物生产严重恶化。与邻国肯尼亚相比,坦桑尼亚没有大量的

无地农村贫困人口,因而比肯尼亚更为繁荣。坦桑尼亚也成功地为大量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大为改进的福利设施:清洁的水源、免费的卫生和教育设施。

430 那些通过游击战争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政府——阿尔及利亚、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将其后来的发展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与当地情况相结合的基础上。阿尔及利亚幸运地有着丰富的石油财富,这可以将其经济多样化。20 世纪 70 年代,阿尔及利亚的大型钢厂的建造是非洲工业化的重要一步。几内亚比绍政权不幸地越来越独裁,最终丧失了民众的支持。安哥拉的农村经济基本上可以得到矿产财富尤其是石油的支持,因而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但与莫桑比克一样,安哥拉的发展不断遭到南非支持的军事反抗运动的干扰,也无法与南非边界地区建立起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紧密联系。

津巴布韦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困难重重。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政府虽然要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无意破坏早期白人政权时期建立起来的、富有经济生产能力的资本主义工业和



正在为庄稼除草的津巴布韦妇女。妇女是非洲主要的农业劳动者,这一点经常被农业"专家"和政府决策者所忽略。

商业化农业。教育被视为津巴布韦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与此同时,一定数量的已受到教育的精英迫切地像白人统治者一样聚敛私人财富,牺牲大众利益。穆加贝在言辞上的反殖民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21世纪早期津巴布韦经济的崩溃,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进行论述。

第二十九章　独立后的非洲(二)

旱灾、债务和发展：20世纪80、90年代的困境

431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非洲独立后的前几十年时，可能会突出其成就。与百年前的忽视、压迫和剥削相比，他们可能会极为赞许非洲卫生、教育、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非洲在21世纪初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阻碍非洲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国际债务和旱灾。非洲债务问题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的不平等贸易，一些人甚至认为它直接起源于奴隶贸易时代。非洲独立后，政府的浪费和不恰当花费更无助于这种状况的改变。虽然自独立后每个想改变这种状况的非洲政府，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都曾想控制这种奢侈的花费，增强自立自足能力和减少外债，但债务依然不断加大。

20世纪70年代，债务问题达到了危机的边缘。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平等贸易关系的持续。与非洲进口的制成品成本相比，非洲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下降。然而，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进一步地恶化了这种下降所导致的非洲长期负债状态，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外汇严重短缺。

为了回击1973年的阿以战争，西亚(即中东)和北非产油国有意地

减少对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工业国家的石油出口。当时,这些国家的石油产量占了世界石油产量的40%,它们的行动导致了世界石油的严重短缺,并让世界石油价格飙升,1973—1974年,石油价格翻了三番。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国家陷入了暂时的经济衰退时期,非洲原材料出口价格比20世纪60年代滑落得还要厉害。而且,20世纪70年代工业国家经济复苏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更是提高了非洲进口的制成品的价格,正是在这一时期,非洲的出口收入开始下降。同时,非洲本身也受到1973—1974年石油价格上升的影响(这时正是20世纪80年代西非发现石油之前,尼日利亚石油刚刚投入生产)。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要用外汇来支付自己所需的全部进口石油,且每个月的购买价格都在不断提高。相比较而言,国际银行受到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利率的影响而资金充足,到处寻求贷出。处于破产境地的非洲政府发现没有其他选择,只得积欠巨额外债。它们发现国际银行急于将钱贷给自己,也缺乏安全考虑,而这种缺乏安全考虑的贷款在正式的私人商业银行中是绝不会批准的。 432

到1980年,很多国家都用光了外汇,甚至像坦桑尼亚这样的"自足"国家也没有了外汇。它们开始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外汇贷款以偿还过去贷款所产生的利息,过去的那些贷款已经超过了非洲国家的偿还能力。麻烦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附属的世界银行都在华盛顿,是由"发达"的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的银行资助的。这些机构首要考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且西方依然认为非洲只不过是其发达工业的一个主要原材料来源地而已。

结构调整计划

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金是和特定前提条件挂钩的,这些前提条件就是结构调整计划。这些应用广泛的"条件"以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为标准,并没有考虑到有关非洲国家的具体需要和最佳收益。这些解决潜在问题的方案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更大的

麻烦。

首先,政府要平衡预算:即要实事求是。从理论上说,这意味着政府每年债务增长的下降。从实践上说,这意味着失业和贫困的增加,数以千计的公职人员将要被解雇,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项目的投入将会锐减。第二,从非洲自身的角度来说,最致命的前提条件就是货币贬值。一方面,这可以让出口作物、矿产的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上为其商品卖上更高的价钱;然而另一方面则是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消费品,如燃油,甚至是供养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粮食。因此,对绝大部分非洲国家来说,贬值意味着大街上货物的大涨价。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资助的第三个前提条件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非洲经济的第二大弱点,就是缺乏充足的本土资本以用于投资本地工业、农业和其他生产流域。在殖民统治时期,银行不给非洲人贷款。商业及其利润几乎全部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非洲独立(1960年)后的头20年内,政府曾限制资本流动,以确保外国资本及其利润留在国内和再投资。20世纪80、90年代去除这些限制,是为了让非洲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向可能的投资者保证他们在其需要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动其资本及其利润。因此,非洲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再控制自身的经济,资本的自由流动难以解决实际的结构性问题——本土资本的短缺。不出所料,外国资本确实进来了,且主要投入基础性的采掘行业,如加纳的黄金、尼日利亚的石油、刚果/扎伊尔的铜和加蓬的木材。

433

20世纪80年代,非洲商品在世界上的价格下滑以及后来外汇的巨大短缺,这让撒哈拉以南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被纳入结构调整计划中来了。正如我们在上文论述的那样,国际金融家们更关心的是结构调整计划会提高出口以偿还外债,而不是帮助整个大陆成为自给自足的地区。这意味着旧有殖民模式的一种延续:集中于用来出口的经济作物是以牺牲用于地方消费的粮食作物为代价。最好的农业用地和代价昂贵的新灌溉规划都划拨给了出口作物的种植。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农民不断被推向之前用作牧场的边缘土地上,



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调度场正在装载出口的硬木。

而畜牧者则被挤到更接近沙漠边缘的地区。1984 年,萨赫勒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虽然萨赫勒国家的棉花还是取得了丰收,但粮食作物却出现歉收,畜牧业者失去了 90%的牲畜。结构调整计划实施后,只有一小部分人取得了某些好处,但要付给外国银行利息,而大部分人口却常常面临着饥饿。由于有国际债务,非洲在 21 世纪早期依然是欧洲和北美的净出口者。非洲每年都要以偿还债务的形式将其宝贵的外汇支付给外国银行,这些外汇要远远大于外国的援助。

全球化

新世纪来临前,一个新词已经取代了工业世界给非洲开出的药方即结构调整计划,而这个新词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互联网这一新电子时代的延续,资本和商品需要在没有国家间贸易壁垒的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章节里所叙述的 19 世纪里英国是世界主导国家那样,"自由贸易"就是强国在世界上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自由。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工业国家,即 G8(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认为,全球化将会惠及非洲贫困国家,

434

因为非洲国家可以在工业世界市场中出售自己的商品,从而实现"贸易"脱贫。但是,事实却事与愿违。为了进入那些市场,非洲国家必须要为外来竞争者开放自身的经济和行业部门。非洲国家必须要去除那些旨在保护脆弱的、正在发展的工业和农业的贸易壁垒,并让这些行业向"世界市场"完全开放。例如,毛里塔尼亚将其宝贵的大西洋捕鱼基地租让给西班牙捕鱼船队,政府收取租金,但当地的毛里塔尼亚渔民则被驱除出渔业,无法再靠捕鱼来养活家庭。

这是披着新外衣的"新殖民主义",同时也是伪善的。虽然非洲农民要面对世界竞争,但是欧盟和北美的农民却受到很好的保护和补助。欧盟、北美农民的生产超出其实际需要,并将盈余投放世界市场,从而将非洲农民从贸易体系中排挤了出去。

非洲法郎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以来,非洲法语国家的经济历程只有些微的不同。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过分地依赖于原材料出口和外国投资,前法属西非、中非帝国的成员国也都使用相同的货币,即非洲金融共同体(Comunauté Financière Africaine, CFA)法郎[①]。从 1947—1994 年 1 月,非洲法郎与法国法郎有着紧密的关系,并可以实现互换,固定汇率为 50 非洲法郎兑换 1 法国法郎。从可靠的外国投资来说,这让 14 个相关的非洲国家维持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稳定。然而与此同时,这也将这些非洲法语国家和法国在金融和经济上联系起来,因此,法国利益占据主导地位。非洲法郎区卖给法国可可、咖啡、棉花、花生、木材、石油、铀和锰。这些国家获得了法国大量的投资,但几乎都集中于上述基础工业。同时,由于非洲金融共同体 65%外汇储备都是法国法郎,非洲金融共同体国家实际上都是从法国进口所有消费品。这真可谓

① 1945 年开始启用,是非洲法属殖民地发行的以法郎为面值单位的货币,1958 年改为法国-非洲共同体(Comunauté Franco-African)法郎,1962 年改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简称非洲法郎。——译者注

“新殖民主义”的极致。这也是西非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严重障碍。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金融共同体只有 7%的贸易是在西非地区内进行的。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法郎估值过高的情况日益严重，尤其是在临近的非洲英语国家。这意味着出口作物的生产者只被付给少量的非洲法郎，与此同时，从法国进口的货物也相对便宜。进口导致了这些国家对法国消费品的过分依赖，这是以牺牲当地工业为代价的，而且很大一部分外汇被用在了达喀尔、阿比让(Abidjan)和雅温得(Yaoundé)城市精英所消费的法国奢侈品上。与此同时，由于将经济考虑集中于欧洲一体化上，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在不断地减少。随着法国投资越来越少，非洲金融共同体中的非洲国家政府被迫又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和法国银行的支持下，非洲法语国家政府在 1994 年完全不情愿地接受将非洲法郎进行大幅度贬值。进口价格在一夜之间翻了两倍，随之而来的就是几乎不可避免的政治动乱。

435

旱灾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非洲大陆很多地区的年均降雨量一直都在减少，虽然不明显，但还是可以观察到。近来的研究揭示：世界整体气候的变化可能是由工业化的北半球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降雨量的减少给非洲带来的结果就是发生旱灾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尤其是在萨赫勒地区和季节性降雨的草原地区。除了 20 世纪 70、80 以及 90 年代早期严重的旱灾外，一些地区也深受内战之苦：乍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为了镇压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叛乱”，1974 年推翻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军事政权每年要耗费埃塞俄比亚一半的财政收入购买武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段时期，埃塞俄比亚战乱地区旱灾严重，饿殍遍野。同样地，在遭到旱灾的莫桑比克，得到南非支持的“叛乱”给这个富庶的、之前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造成了浩劫。



妇女依然是非洲农业的主要劳动力，既要带孩子也要从事农业劳动，这张照片展现的是萨赫勒发展项目中正在摘棉花的妇女。

博茨瓦纳则揭示出旱灾不见得就一定会导致饥荒。博茨瓦纳位于卡拉哈里沙漠边缘，和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历了1981—1986年、1991—1992年的旱灾。但是，博茨瓦纳的经济较为稳定，其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养牛和钻石出口上，同时博茨瓦纳还有着稳定的民主政治。因此，博茨瓦纳可以利用其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物资储备建立有效的抗旱工程，从而让国家团结起来，虽遭受旱灾之苦，却没有出现饥馑。

436 正像本书前面章节中所揭示的那样，非洲人在过去也要应对气候变化，并发展出新的畜牧和农业技术以适应新环境。由于有着明确的现代民族国家边界(这也是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另一个产物)，像迁徙这样的选择已经不再可行了。非洲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需要设计出解决本国问题的本土方案。国际发展援助不再直接用到那些巨大的面子工程

以及昂贵的水坝和灌溉工程上了,这些项目都是外资持有者希望增加非洲出口经济作物的生产而设计的。像布基纳法索这样的穷国更加关注的是小型劳动密集型工程,如人工建造的小型水坝,这些水坝有助于当地粮食作物的生产。人们在当地建立起合作粮库,为当地人提供粮食贷记,也可在必要时期提供储备用粮以救急。由于有新技术的援助以及对成功的无限期待,没有理由认为非洲人不会找到克服未来发展问题的独有方案。

国际合作和非洲统一组织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论述过,泛非运动有助于早期非洲民族主义者在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共同境遇意识的觉醒。非洲本土举行的第一次泛非大会是1958年在新独立的加纳由恩克鲁玛召集的全非人民大会(All 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恩克鲁玛和塞古·杜尔都是最为热衷推动泛非主义的人。恩克鲁玛在美国受教育的经历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认为非洲要从欧洲主导地位中取得完全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的"非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a),然后再经过全大陆的合作,真正取得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平等地位。恩克鲁玛看到统一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他的理想则只是一种虚幻的景象而已。就是在加纳国内,恩克鲁玛本人也要通过镇压阿散蒂反对力量才取得表面上的国内政治统一。从更广泛的非洲大陆来说,非洲国家及其新独立的政府有着太多的现实问题,它们并不将政治统一当作一回事。1961年加纳、几内亚和马里的联盟在数月内就分崩离析了。

1963年5月,32个非洲独立国家的元首汇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立非洲统一组织。虽离"联合国家"还相差甚远,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一个非洲"联合国"。它的目标是促进独立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加快非洲其他地区的非殖民化。非洲统一组织确立了两项重要的原则:第一,承认独立时期业已存在的国家边界线;第二,"不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内部事务。非洲统一组织成立时的理想是促进实



1982 年 8 月，非洲统一组织的的黎波里首脑会议。此次会议遭到非洲三分之一国家首脑的联合抵制，这些国家首脑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要求。绝大多数出席的黎波里会议的领导人都将自己视为“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或“革命的”，包括这张照片坐着的几位：左为 J. J. 罗林斯（加纳）；中为萨姆·努乔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右为穿着古琦[①]套装的穆阿迈尔·卡扎菲。的黎波里会议遭到联合抵制意味着，由于没有达到法定的人数，卡扎菲不能当选为非洲统一组织 1982—1983 年的主席，也成不了未来的东道主。

现非洲大陆的非殖民化。为此，非洲统一组织的解放委员会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解放委员会经济资助的主要是那些被流放的政治家和南部非洲——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自由斗士”，这些“自由斗士”都聚集在达累斯萨拉姆，成为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贵宾。但他们并没有获得足以购买武器的经济支持，但对办公、支持流亡者和促进海外政治事业来说则绰绰有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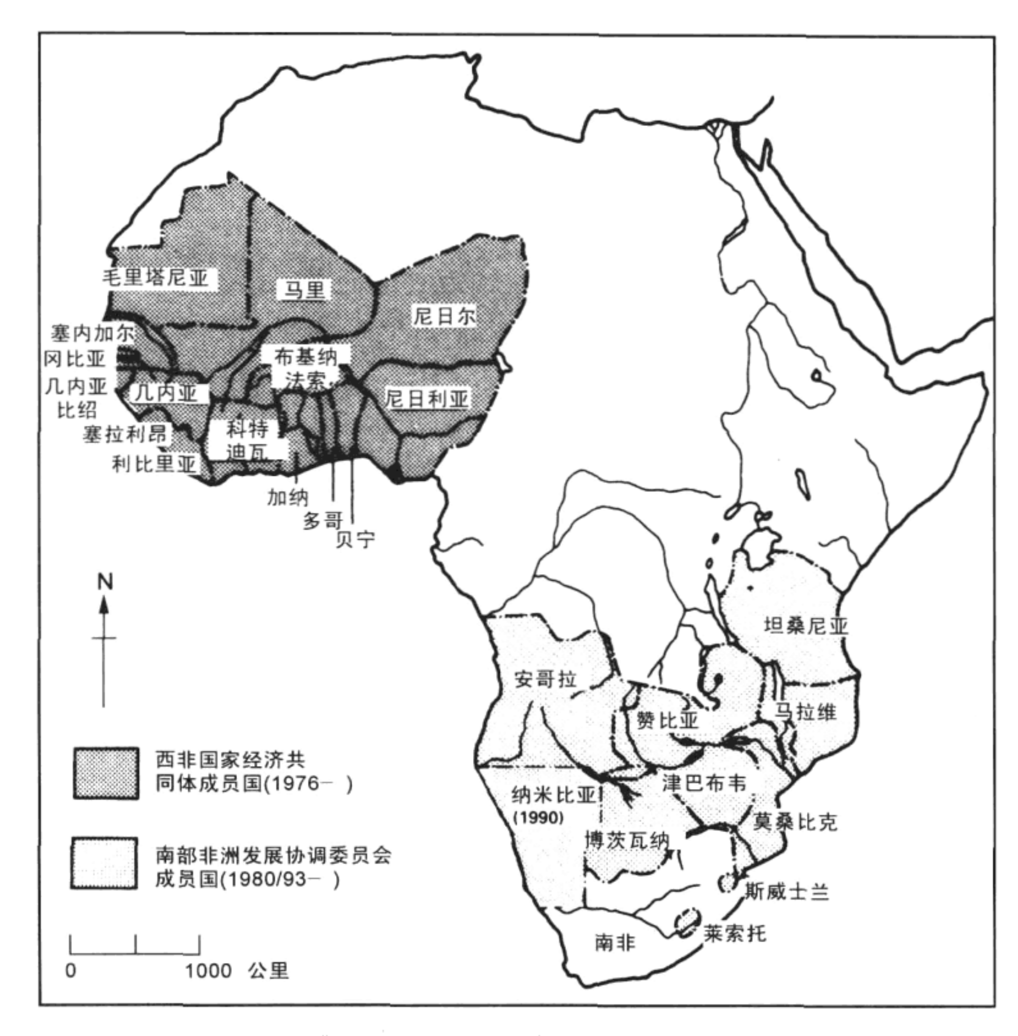
① Gucci，即古琦，意大利著名时尚品牌。——译者注

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个弱点是它没有法律授权以推动方案的执行。因此,它常常被批评为不过是个“清谈俱乐部”而已。然而,非洲统一组织毕竟是一个非洲国际合作的有用论坛。它的部长、国家首脑定期会议有助于人们对其他国家问题产生更深入的认识。当然,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其共同的目标都是合作。非洲统一组织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且没有产生长久性的分裂。

1967年,非洲统一组织派生出非洲发展银行,它成为为非洲发展规划筹集世界资金的一个无可估价的工具。从非洲的角度上来说,国际资本的协调与运转朝着有利于非洲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20世纪70、80年代极为宝贵。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1989—1990年)和苏联的解体(1991年),世界金融丧失了对非洲投资的兴趣。非洲领导人被迫要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非洲将不得不依赖其自身资源来寻求未来的发展。这意味着非洲内部贸易的更大发展,同时也会出现更进一步的经济整合。换句话说,在最初阶段,至少从经济层次上说,是朝着恩克鲁玛的“非洲联合国家”方向发展。1991年6月,在新尼日利亚联邦的首都阿布贾的年度会议也认识到了这一趋势,非洲统一组织的政府首脑签署了一项推出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协议。十年后的2002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在南非正式转变为非洲联盟,这是最终迈向非洲大陆经济政治联盟的第一步。虽然实现这一目标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但这种意向的宣示也是重要的。与此同时,各个地区都有着更大的经济整合愿望。 438

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于1975年成立于拉各斯。这个包含有西非16个国家的新地区集团尤其重要,因为它克服了西非英语、法语国家间的人为障碍与分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很明智地没有试图启动野心过大的政治联盟。本着非洲统一组织的精神,西非经济共同体将重点放在不断发展的地区经济合作上,一开始是在交通和电信领域,后来是在更高层次的金融和商业领域。同样地,在大陆的另一端,南部非洲



地图 29.1 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

439 发展协调会成立于 1980 年。它将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团结起来，并决定逐渐打破对南非的经济依赖。纳米比亚在 1990 年脱离南非获得政治独立后就加入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让各地区协调长期发展规划，并在外国援助与发展贷款谈判时确立了统一战线。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这两个组织都已显示出加强地区合作的意愿。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期望一个自由的南非在未来加入进来，并开始进一步地建立地区经济和贸易网络。1993 年，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改名为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

随着1994年南非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个南部非洲组织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秘书处设在该地区最为稳定的国家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总体上说,该组织在多个领域内的合作进行得非常不错。然而,南非与津巴布韦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津巴布韦在罗伯特·穆加贝的领导下,在1994年前一直是该集团内的一个主要的政治、经济成员。从1994年开始,穆加贝的津巴布韦在影响力上被世界闻名的、魅力超凡的政治家内尔逊·曼德拉领导下的南非所超越。1997年,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南非决定干预莱索托事务,并将其演化为兵变。南非劝服博茨瓦纳派遣部队以支持其干预政策,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名义将该行动合法化。然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防务机构的主席穆加贝却没有给该项行动授权。相反,他开始干预不断升级的刚果内战,加入安哥拉、纳米比亚的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为名义的行动中来,以支持新近在金沙萨成立的劳伦特·卡比拉(Laurent Kabila)政府。由于津巴布韦经济急剧恶化,政治暴力不断加剧,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内部的关系更加紧张。曼德拉的继承者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总统面临着一项艰难的使命,即施加压力促使穆加贝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并阻止津巴布韦的经济崩溃,以免整个地区变得不稳定。

与此同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间接地复活了西非的政治、经济合作理念。1990年8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备受内战之苦的利比里亚组建了一支维和部队,称为西非维和部队。西非维和部队的首创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打破了非洲统一组织长期固守的禁忌,即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西非维和部队最初的作用较为消极,只是一个利比里亚不断升级的暴力的观察者。然而,一段时间后,解决危机的财政压力开始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起作用了。在不断上升的国内压力下,这些国家都被要求结束在利比里亚的行动。西非维和部队主要是以西非大国尼日利亚部队为主,尼日利亚此时本身就处于军事统治之下,似乎唯有其武装部队在外国发挥有效作用才

能彰显其国家实力。1992 年,西非维和部队继续采取进攻性姿态,并强迫叛乱领导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 1993 年回到谈判桌上。

440 西非维和部队在利比里亚表面上的成功不仅仅是结束了利比里亚冲突,同时也激活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经济方面,成员国为了实现统一货币开始进行谈判,统一货币会让这些国家在整个西非地区建立一个实体的、有效的贸易集团。货币统一的主要阻碍是旧有的英语国家-法语国家的分化。法语国家已经有了单一货币——非洲法郎,并且它们不愿意放弃非洲法郎而让尼日利亚的奈拉[①](naira)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法语国家认为,如果完全实现经济同盟就会发生上述情形。然而在新世纪开始后,西非地区内的贸易壁垒开始减少,跨边界投资、政治经济合作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西非维和部队受命去干涉其他地区冲突,最有名的就是塞拉利昂。

① 尼日利亚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第三十章　迈向新千年的非洲

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进程

441

20世纪90年代早期，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实行了政治改革，军事独裁制和一党制几乎普遍地被多党民主制所取代。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这一结果的出现。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之间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的最具戏剧性的象征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非洲不再是全球战略性权力博弈的争夺区。腐败无能的政府或是长期存在的独裁者，像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Siad Barré）和扎伊尔的蒙博托都不能再通过宣布反对共产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而获得外来资金或武器的支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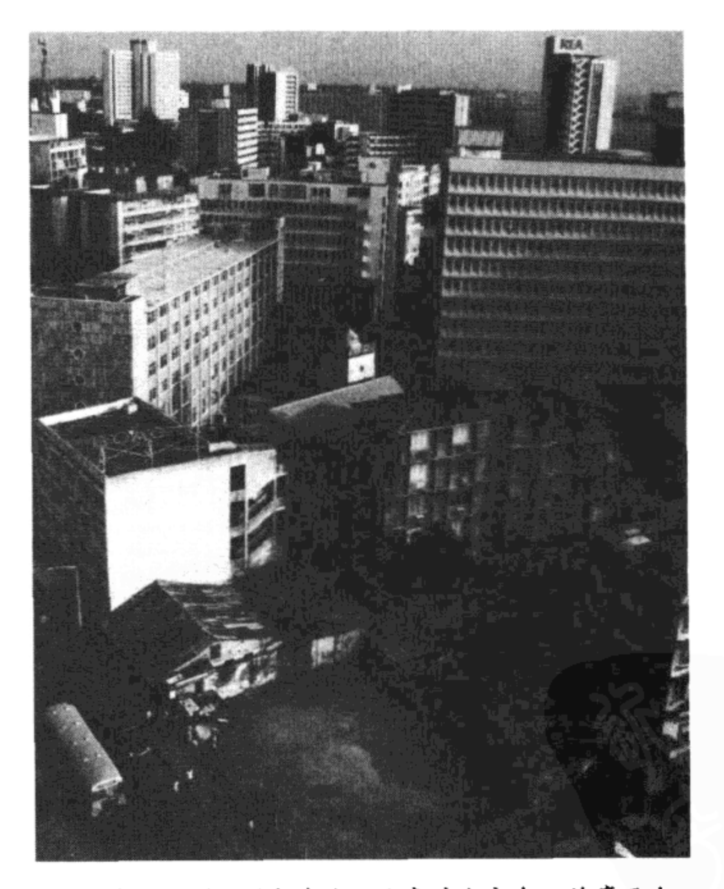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除了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这两个特例外，没有任何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一直维持着多党议会民主制。人们可能会认为博茨瓦纳是个特别的案例，因为其执政党从来没有受到支持票数的严重挑战，这一情况至少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另一方面，毛里求斯已经显示出相当程度上的政治成熟。在1982年的毛里求斯大选中，参与选举的多族群选民成功地更替了长期执政的现政府，20世纪90年代又一次重复了这一轮替。相比而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首脑在面对选举失败的问题上，都只是简单地废除宪法，确保能从冷

战双方中的一方那里得到外部的承认与支持。

非洲独立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到了 40 多岁或 50 岁出头,他们是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教育大发展的受惠者。他们作为一连串非洲政府——多党制、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失败的见证者,度过了其青年时代。他们不再回想殖民时期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思考非洲本身经历的政治、经济灾难。20 世纪 80 年代不断上升的经济危机更是增加了这种紧迫感。大量的非洲团体提出要为非洲问题找到解决之道,是要让政府负责的时候了。这正是非洲新民主动力之所在。

1990—1994 年间,非洲政府有时候像踢球似的,一个又一个地被拉到宪政谈判桌上。在少量的案例中,像赞比亚、马拉维或贝宁这些反

442



现代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注意对比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和近景中的穷人的人工住房。绝大多数非洲大城市都存在城市两极分化问题。

对力量较为团结的国家里，通过投票成功地实现了宪法和政府更替。在其他国家，如马里，宪政会议宣布自己为唯一合法政府，驱除出现任国家首脑并重新修改了宪法。在扎伊尔(刚果)，宪政代表作出同样的选择，并任命了一个临时总理，即国家元首蒙博托。蒙博托对其引起的日益严重的暴力毫不理会，并遭到其本人任命的新总理抵制。这让国家有了两个平行的政府，甚至有两种货币，看不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国家很快就陷入崩溃的境地。

加纳的杰瑞·罗林斯在分裂和削弱反对派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一次令人尊敬的、从独裁制到民主制的转型。在肯尼亚，莫伊总统算不上是个完全的民主主义者，但他成功地让其本人及其政党通过选举再次当选，而这次选举被广泛地谴责为远远不是“自由和公平”的。这一例子被很多其他一党制国家模仿。尼日利亚的民主进程的失败最为令人侧目。尼日利亚经过多年准备实现了 1993 年的总统大选，但选举结果刚刚出来，就被巴班吉达(Babangida)将军宣布无效。

443

20 世纪 90 年代重新出现的民主形式并不一定满足了普通选民的愿望，这些选民一直呼吁政府改革以便带来全新理念。然而，这些民主形式确实重建了民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过去曾遭到严重漠视，也就是说政府最终要对选民负责。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像塞拉利昂的斯特拉瑟(Strasser)上校(1992 年)、尼日利亚的阿巴查(Abacha)将军(1993 年)、冈比亚的叶海亚·贾梅(Yahya Jammeh)上尉(1994 年)或是尼日尔的易卜拉欣·迈纳萨拉(Ibrahim Maïnassara)(1996 年)这样的军事独裁者都很快承认这些原则，并承诺将重归文职宪政统治。

无论有何局限，整个非洲大陆的新民主运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非洲自身在决定非洲问题的解决之道。政府需要新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也和更大程度上的地区经济整合理念相结合在一起，从而开创了非洲大陆未来的新航向。然而，无论潜力有多大，迈向更美好的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下面所要描述的地区将展现出这一点。

北非

作为一个整体,北非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那样走上民主道路。部分地是由于结构调整计划造成的经济压力和高失业率,两个人口最多、也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推动了宗教的复兴。穆斯林兄弟会和神职人员号称要拒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多党民主制的"西方"文化。他们只想置身于"全球化"这一"无神文化"之外。他们宣称,随着伊斯兰教法的普及,必定会产生一个更少无序、腐败而更多公正、更多精神导向的社会。我们已经在整个非洲历史中见证过,非洲的历史曾在不同的时期里提出过各种理想化的伊斯兰社会的承诺。虽然经常带来了急需要进行的改革,但理想化的伊斯兰社会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穆斯林的敌人给他们打上的标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遭到有着强大外部支持的强力政府的威胁,这些政府决心要阻止他们。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自独立后,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一直统治着这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njedid)上校自布迈丁总统(Boumédienne)于1978年12月去世后继任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本杰迪德遵循结构调整计划削减政府开支,以应对石油(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出口产品)价格下滑和不断升高的失业率。政府暴力镇压了1988年阿尔及尔爆发的动乱,造成500人死亡,并让伊斯兰激进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于阿尔及利亚。本杰迪德同意实行多党选举,希望以此来分化反对派,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在1990年6月的地方政府选举中,激进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e Salut)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按计划,国家选举将在1991年12月进行,伊斯兰拯救阵线公开发起攻势,承诺如果当选,将会废除多党民主制,并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

444

教法的伊斯兰国家。尽管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领导人遭到拘禁，但它还是在 1991 年第一轮大选中赢得了近一半的席位。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本杰迪德政权，中止选举，禁止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活动，并将其成千上万的成员及支持者拘禁起来。军队的行动打着“民主与自由”旗号，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大力支持。

伊斯兰激进派在被剥夺了和平参与政治的权利后转向了暴力反抗，而政府也采取暴力进行镇压。在后来的内战中，伊斯兰激进派宣称他们获得了比实际上更广泛的支持，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有计划地使用暴力以控制农村地区。受到政府资助的民兵回以相同的暴力攻击，每一方都指责对方屠杀农村非战斗人员。1998 年，在造成 6—10 万人死亡之后，双方达成脆弱的停火协定。此后，暴力行为有所减少，但是伊斯兰教法与自由民主以及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埃及

埃及是北非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家过分依赖于石油出口，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受到石油价格下滑的影响。早前反对以色列的战争(1979 年结束)给国家留下一个庞大规模的军事基础设施；数十年来忽视有利于工业化的农业发展让埃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有 80%的粮食需要进口。

穆巴拉克总统曾是一位军事官员，维持着一个威权政体。虽然埃及在萨达特(Sadat)总统 1981 年遇刺前就实行了多党选举制，但是埃及的政治一直由执政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把持着。由于得到了美国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大力支持，穆巴拉克奉行结构调整政策，削减粮食补贴和政府开支。结果却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甚至波及高俸禄的公职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家及其政治支持者在这种环境下过得似乎还挺滋润。埃及有 7 000 万人口，其中一半住在城市，且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开罗，很多城市下层失业民众看到待在城市贫民窟中只

会更穷,便迁入到农村地区。

政府对伊斯兰教进行严格的监控,希望在政治上吸纳"温和"的伊斯兰势力。然而,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激进的伊斯兰势力不断攻击政府及其政策。埃及政府的政策一直侧重于旅游业,旅游业是埃及外汇的主要来源。激进团体通过杀死西方游客制造恐怖事件,彻底摧毁了埃及的旅游业。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逮捕了数千伊斯兰激进成员,到新世纪来临前,反对派似乎已被镇压下去。穆巴拉克政府依然从美国那里得到重要的外交和经济支持,但是面临着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压力,经济问题依然有待解决。

445

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

在突尼斯,本·阿里(Ben Ali)总统的威权政府成功地避免了困扰其邻国阿尔及利亚的那种暴力。尽管有着较高的失业率,但混合经济(农业、工业和旅游业)的总体成功以及政治反对派的虚弱和分化使得本·阿里成功地赢得了差额选举。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Hassan 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了谨慎的旨在推行直接普选的政治改革,并在 1998 年承认工会。哈桑的儿子及继承人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Ⅵ)最终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希望随着他未能就这片领土未来的地位诉之公投而前景黯淡。事实上,他延续了其父亲将摩洛哥人安置于占领的西撒哈拉的政策。同时,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成为新非盟(African Union)发展的推动力量。我们见证过非洲政策太多的分化和不可预测性,卡扎菲之前动用石油换来的美元支持非洲及其境外的每个激进的反西方组织。然而现在,卡扎菲以新的心情来迎接新千年,并给非盟提供了急需的财政支持。

西非

20 世纪 90 年代后,西非一直是充满极大反差的地区。它见证了贝宁(1991 年,1996 年)、马里(1992 年,2002 年)、加纳(2000 年)和塞内加尔(2000 年)向选举政府的和平与稳定的过渡;但与此同时,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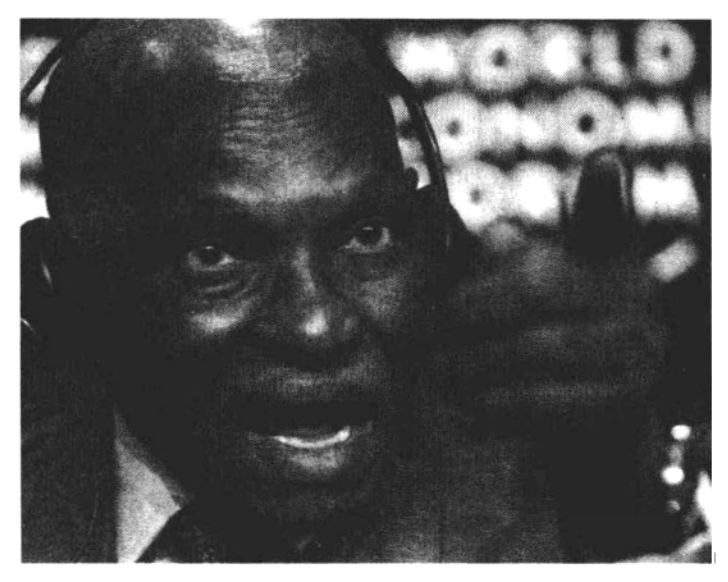
经历了近年来发生在非洲大陆的最严重的国内冲突。这些最严重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境内以及它们之间。

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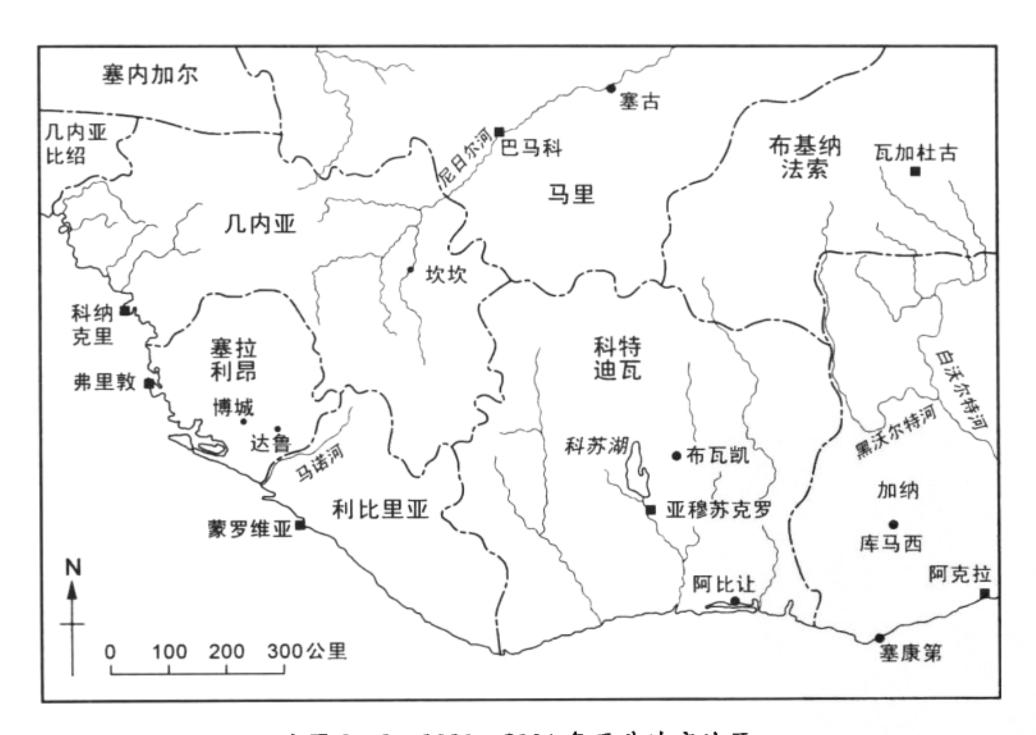
讽刺的是，在和平时期，这两个国家曾成立了马诺河联盟(Mano River Union, 1973 年)，旨在消除壁垒以及加强双方合作。1980 年几内亚也加入了进来。然而由于塞缪尔·多伊(Samuel Doe)将一次失败的政变归咎为以塞拉利昂为基地的持不同政见者，自 1985 年开始，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了。多伊关闭了边界，事实上也就是终结了马诺河联盟所开创的合作时代。1989 年 12 月，利比里亚持不同政见者查尔斯·泰勒从邻国几内亚进入利比里亚。他得到了塞拉利昂的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他们希望获得胜利的泰勒会帮助他们推翻塞拉利昂的全国人民大会党(APC)政府。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论述的那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干预了利比里亚内战，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不过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利比里亚内战出现过无数次“停火”。泰勒最终在 1997 年当选为总统，因为精疲力竭的选民们似乎相信将他选为当政者是结束战争的唯一出路。

与此同时，塞拉利昂也爆发了冲突。在塞拉利昂，泰勒给革命统一战线(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RUF)提供武器以换取钻石。塞拉利昂军队无法遏制革命统一战线的反叛，并因此让莫莫(Momoh)领导的腐败的全国人民大会党政府开始对军队产生蔑视和失望。1992 年，斯特拉瑟(Strasser)上校发动了一场政变，并承诺快速解决东部战争。斯特拉瑟承诺在 1996 年回到选举的宪政政府，但是，他并未能解决战争，其本人在预定选举前一个月就被推翻了。由马尔盖(Margai)兄弟，即米尔顿爵士(Sir Milton, 1956—1964 年任总理)和阿尔伯特爵士(Sir Albert, 1964—1967 年在任)组建的老道的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和塞拉利昂人民党(Sierra Leone People's Party)的艾哈迈德·泰詹·卡巴(Ahmed Tejan Kabbah)赢得了选举。1996 年末，政府与革命统一战线达成和平协定，塞拉利昂恢复和平的希望很大。在富产

447



2000 年当选为塞内加尔总统的阿卜杜拉耶·瓦德，在 2004 年 1 月的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说。他提醒主要工业国家，它们有责任对非洲“新民主浪潮”提供积极的经济支持。



地图 30.1 1990—2004 年西非冲突地区。

钻石的东部地区，战斗最为密集，当地村民成立了被称为“卡马约”(Kamajor)的治安民兵队来保护自己免受肆意的掠夺、破坏和屠杀，这些是革命统一战线反叛中所出现的典型特征。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人福迪·桑科(Foday Sankoh)认为卡巴的塞拉利昂军队与卡马约是同一阵线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明确表示绝不妥协于让渡权力的宪政路线。他和军队中由约翰尼·科罗马(Johnny Koroma)少校领导的一个派别结成同盟。1997 年 5 月，科罗马在一次政变中推翻了卡巴，并建立了军队革命委员会(Army Forces Revolutionary Council)。

由于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西非领导人派遣西非维和部队将军队革命委员会/革命统一战线驱除出弗里敦。1998 年 3 月，卡巴总统重返首都，联合国也组建了一支 6 000 人的维和部队，但是这支部队没能直接作战，战争在弗里敦之外的地区继续。“国际社会”即联合国安理会，很明显对塞拉利昂的军事责任没有兴趣，卡巴总统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与革命统一阵线取得妥协，并将桑科纳入政府。1999 年 7 月，双方在多哥签署了和平协议，然而，和平协议很快就被进入弗里敦的反叛分子所破坏。弗里敦由于西非维和部队和英国干预而得以挽救。这一行动扭转了战局，因为西非维和部队开始直接参战，英国军事顾问开始训练一支塞拉利昂新军。桑科被捕后死于监狱。2000 年 11 月签署的阿布贾停火协议标志着冲突的结束。2002 年 1 月，卡巴总统通过销毁过去两年来缴获的一大堆武器来庆祝战争的结束。

2002 年 5 月，卡巴政府进行了重新选举，并建立了一个审理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2003 年 6 月，特别法庭起诉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因为其煽动革命统一阵线反叛而犯下的罪行。这一行动加速了泰勒本人的垮台。

多年来，泰勒在地区冲突中一直是个挑事者，而其之前的行为及其盟友很快就让他吃到了苦头。1999 年，利比里亚和解与民主联盟(Liberians United for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cy)从几内亚发动进攻，并得到了孔戴(Conté)总统的支持。多年来，几内亚一直深受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国国内冲突的影响。利比里亚和解与民主联盟叛军

进入蒙罗维亚(Monrovia)时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亡。地区压力不断上升,被泰勒要求在新选举前让位,2003 年 6 月的《阿克拉协议》(*Accra Agreement*)实现了这一目标。两个月后,泰勒被流放到尼日利亚。

马诺河联盟内部盘根错节的内战并没有什么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冲突充斥着种族仇恨、残暴、个人野心、不信任和贪欲。由于滥采钻石引起的战争创伤更是增加了这种贪欲,正如博茨瓦纳所展现出来的那样,资源在实现国内稳定和发展上扮演着较为积极的作用。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多年来一直是该地区象征稳定的一面旗帜。在乌弗埃-博瓦尼长期执政期间(1960—1993 年),乌弗埃-博瓦尼积极地从科特迪瓦北部较为贫穷的邻国布基纳法索吸引了很多迁移过来的劳力和农民。谁劳动谁享有土地的原则吸引了很多布基纳法索人来到科特迪瓦从事繁荣的可可和咖啡的生产。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除了很多其他移民外,科特迪瓦大约有 250 万布基纳法索籍的科特迪瓦人,其中很多人都对国家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上,乌弗埃-博瓦尼的总理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就是布基纳法索移民之子,而且是个穆斯林,他有做总统的野心,希望能成为乌弗埃-博瓦尼的接任者。然而,1993 年 12 月乌弗埃-博瓦尼去世后,依照宪法,国民议会主席亨利・科南・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一位来自南方的基督徒成为了总统。

20 世纪 80 年代严重的经济问题已经迫使当时的总理瓦塔拉开始实行对结构调整计划的严格限制。20 世纪 90 年代,咖啡、可可价格的下滑以及非洲法郎的贬值共同促使独立后繁荣时代的彻底终结。尽管"移民社会"对繁荣时期的国家经济成功做出过贡献,但是当经济遭受严重衰退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替罪羊。贝迪埃将"纯种科特迪瓦人"[1]

[1] 贝迪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将科特迪瓦经济问题归咎于外来劳力,通过修宪引入了"纯种科特迪瓦人"的概念,即规定没有出生于科特迪瓦境内或者父母不都具有科特迪瓦国籍的人都不是科特迪瓦公民。——译者注

(ivoirité)这一粗鲁的种族概念带入科特迪瓦政治。北方人和穆斯林则被猜忌或被认为是"外人"。

1999年12月,随着种族紧张关系的加剧以及贝迪埃政府无力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罗伯特·盖伊(Robert Guei)在政变中夺取了权力。然而,街上示威游行群众要求他下台,并在2000年10月实行总统选举。瓦塔拉因为是一位"布基纳比绍外人"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而老练的反对派政治家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赢得了选举。排除了瓦塔拉,去除了后来的盖伊,还有来自军队的人也加剧了国家种族关系的紧张。虽然2001年9月一伙士兵试图发动政变遭到了失败,但是反叛的士兵还是控制了中部驻防城市布瓦凯(Bouaké),国家有走向全面内战的危险。这次反叛与利比里亚和解与民主联盟或是塞拉利昂革命统一战线一样,都没有固有的目标与要求,但这些叛乱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经济、政治稳定。科特迪瓦占有整个非洲法郎区GDP的40%,马里和布基纳比绍尤其依赖于科特迪瓦的经济稳定。法国对此也非常重视,因为法国出口到西非的产品中有60%都是运到或经过科特迪瓦。2003年1月,由法国做协调人,在阿克拉举行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紧急峰会,并在巴黎达成了和平协议。法国军队被派驻到科特迪瓦各地,但叛军并没有按照和平协议解除武装,依然控制着北方,也没有纳入到政府的倾向与实际行动。2004年11月初,巴博政府发动了对叛军根据地的进攻,在进攻过程中有九名士兵死亡。法国对此进行了报复,摧毁了科特迪瓦在阿比让(Abidjan)的整个空军基地。这激起了打砸法国人商铺的反法暴动。法国人加以回击,并射杀了约50名并无武装的示威游行者,这让法国人丧失了作为和平构建者的信誉。于是,非盟以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个人名义参与了进来。姆贝基的干预让科特迪瓦南北方在年内恢复了平静。

449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在前军事统治者(1976—1979年在任)奥卢塞贡·奥巴桑乔的统治下最终于1999年5月恢复了文职政府。既由于其腐败又

因为其威权主义和暴力，军事统治到此时已经遭到严重的不信任，但是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局势总体稳定，零星的插曲也只是波澜不惊。石油工业的倒闭使得尼日利亚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同时，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北部诸邦引发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种族暴力，这些暴力威胁着整个联邦的政治安全。尼日利亚一直维持着一个统一的政府体系，2003 年，在近 40 年来(自 1964 年)的第一次，也是独立历史中的第二次的选举中，奥巴桑乔再一次当选为总统。



肯尼亚全国彩虹联盟领导人，2002 年当选为肯尼亚总统的姆瓦伊·齐贝吉，在 2003 年 8 月比勒陀利亚的一次反腐败、免费基础教育和经济复兴会议中受到了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的热烈欢迎。

东非与中非

东非、中非20世纪90年代后的历史由于内战与屠杀的阴影而变得黯然无光。在这种负面背景下，坦桑尼亚依然贫困，但相对稳定；肯尼亚成功地度过了莫伊总统的独裁统治，并在2003年1月选举出一位反对党的政治家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为总统。齐贝吉的全国彩虹联盟(National Rainbow Coalition)发布了一个五年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很多承诺，但在揭露和反对腐败上很少能看到成功的迹象。

非洲之角

450

在索马里，1991年穆罕穆德·西亚德·巴雷的逃离所产生的权力真空让以部落为基础的民兵组织摧毁了这个民族国家。1991年5月，北部地区(前英属索马里)宣布独立为"索马里兰共和国"，但没有获得国际承认。索马里其余地区分裂为十余个由部落控制的领地，主要是在军阀和纪律性较差的民兵的统治之下。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人经过长期的内战，从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独裁统治下赢得了自由。厄立特里亚人脱离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战争早在1964年就已经开始了。1977年，门格斯图控制了埃塞俄比亚执政的军事武装力量德格[①](derg)，并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大量的武器供应让门格斯图几乎可以压倒性地击败厄立特里亚人。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供应开始减少，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重新控制了厄立特里亚除阿斯马拉(Asmara)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大量的埃塞俄比亚反叛组织都已加入反对门格斯图政权的战争中，尤其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 People's

① 德格(Derg或Dergue)，阿姆哈拉语，意思为委员会，其全称为武装力量、警察及边防部队协调委员会。德格自1974—1991年间长期控制埃塞俄比亚的中央政权。——译者注

Liberation Front)。1989 年,这些组织在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即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的领导下,与厄立特里亚结成同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即门格斯图政权)。到 1990 年,"埃革阵"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控制了埃塞俄比亚北部大部分地区,而奥罗莫解放阵线(Oromo Liberation Front)则活跃于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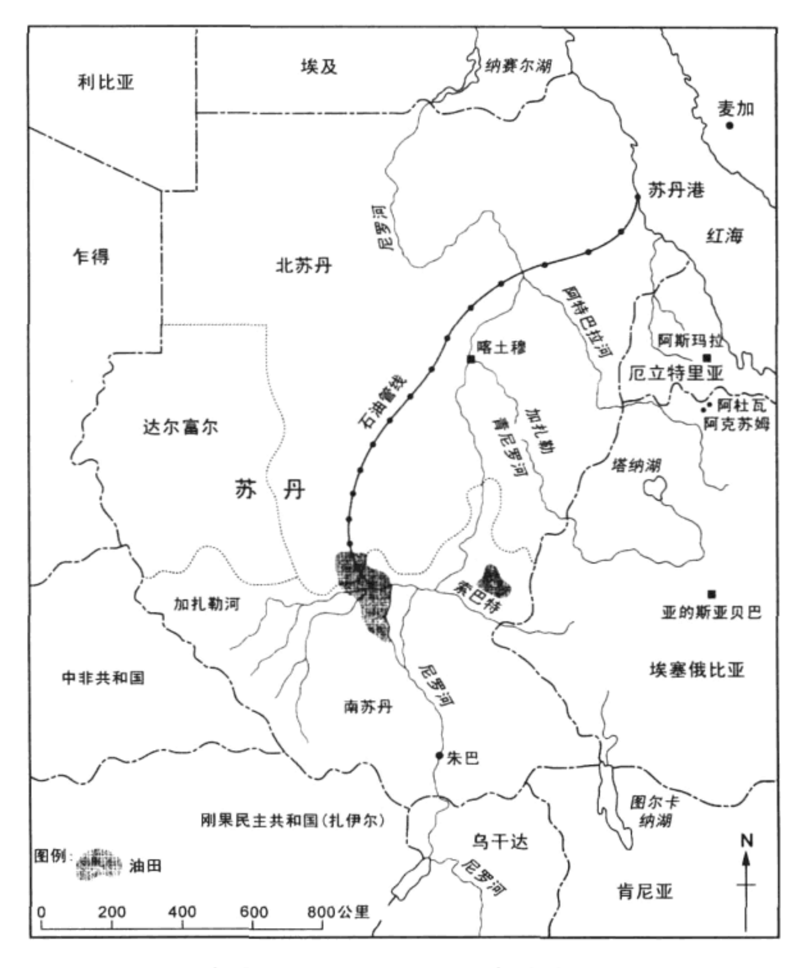
1991 年,门格斯图被流放到津巴布韦。"埃革阵"掌控了埃塞俄比亚政府,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则掌控了厄立特里亚政府。依据早年间达成的协议并经过公投,1993 年,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幸的是,这两个曾经的同盟国在历经数十年的冲突、艰难和旱灾后的复苏进程在 1998 年由于边界争端而中断,边界争端迅速地升级为全面的战争。直到 2000 年埃塞俄比亚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后,这次边界战争才最终结束。

苏丹

苏丹于 1956 年取得独立,自独立前一年开始,除了 11 年的和平期(1972—1983 年),内战一直充斥着苏丹的历史发展。人们通常将苏丹内战描述为阿拉伯/穆斯林的北方与非洲/基督徒或是信奉传统宗教的南方之间的战争,但是事实上,苏丹尤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爆发了好几场盘根错节的内战。约翰·加朗(John Garang)领导下的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在绝大部分时期内主导着南方脱离北方控制的独立斗争。但苏丹境内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穆斯林中,还有着诸多其他反抗中央政府的集团。喀土穆政府总体上还是由北方人主导着,这些北方人将自己视为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

北方人剥削和掠夺南方资源有着漫长的历史,主要表现为贯穿整个 19 世纪的奴隶、乌木和象牙掠夺。20 世纪末期,一种新资源即南北苏丹传统行政边界线以南地区有着大量的石油储备,更是增加了这种本已较为紧张的关系。1983 年再次爆发的内战打断了石油资源的开采,但是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即通过修建一条直接通向苏丹

451



地图 30.2 1990—2004 年的苏丹。

港的石油管线阻止南方的直接获益。苏丹其他主要的自然资源是水源和沃土,而这两种资源的绝大部分也是位于南方。这促使历届喀土穆政府决定维持并加强其对南方的控制。为此而实施的措施之一就是执行沙里亚法,但这反过来更是增强了苏丹人民解放军脱离北方的决心。 452

艾哈迈德·巴希尔(Ahmad al-Bashir)政府成立于 1989 年,是苏丹第一个通过政变而夺取权力的政权。在穆斯林兄弟会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的支持下,巴希尔政府决心将苏丹转变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南方在 1991 年正式废除了沙里亚法,但这种让步并没有减轻处于战争中的紧张关系,因为这一行为强化了苏丹人民解

放军要将南方脱离出依然实行沙里亚法的北方的决心。1993 年,苏丹正式回归文职政府,巴希尔当选总统。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石油收入让政府得以购买大量武器装备,但 1997 年政府寻求达成一项永久性和平协定。政府向主导石油产区争夺的努尔人的南苏丹国防军(South Sudan Defence force)提出倡议,试图以此孤立苏丹人民解放军。政府在南方的战争中广泛地使用了"阿拉伯"游牧民兵。苏丹解放军(Sudan Liberation Army)和正义与平等运动组织(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认为他们被排挤出加朗苏丹人民解放军与喀土穆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便于 2003 年初在达尔富尔发动了反叛运动。但这两个组织在 2004 年加大反叛运动的时候,政府开始放松了对被称为贾贾威德(Janjaweed)的民兵组织的约束。在政府空袭的支持下,这些"阿拉伯"民兵造成了达尔富尔西部地区的灾难,他们趁机对其传统牧场上的穆斯林"非洲"牧民竞争者进行"种族清洗"。国际社会本来都将焦点聚集于中央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和平前景,而现在都在关注从西部地区逃离出去的 100 万难民,其中有 10 万人逃到邻近的乍得。

2004 年的头几个月,在肯尼亚的协调下,喀土穆与苏丹人民解放军之间达成一项协议。肯尼亚提出了一个实现和平的政治框架。虽然还不是一个稳固的、彻底的停火协议,该项协议提出在南部是否独立的公投前,应有六年的有限"权力分享"过渡期。将约翰·加朗纳入政府的权力的协议于 2005 年 1 月正式达成。

乌干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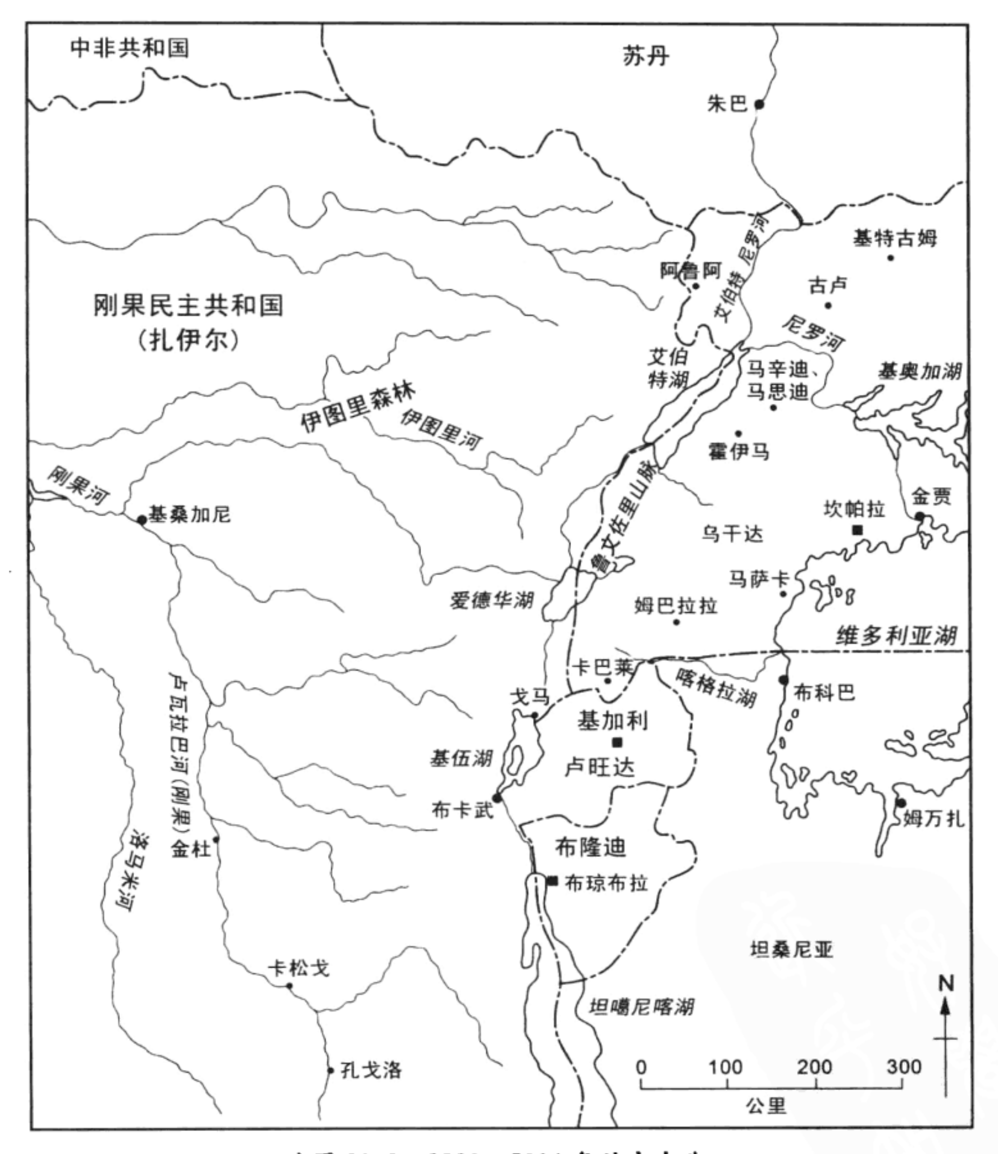
在坦桑尼亚侵略和 1979 年伊迪·阿明被推翻后,乌干达艰难地开始了政治经济重建。20 世纪 60 年代的旧有裂痕又重新浮出水面。在 1980 年有缺陷的选举中,奥博特重新掌握了权力。约韦里·穆塞韦尼曾是首批投入到反阿明的游击战争中的人,现在又一次地落草为寇,决定用武力来改变乌干达的政治局面。他的全国抵抗军(National Resistance Army)最终于 1986 年掌握了权力。之后,穆塞韦尼在西方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无党派"活动"的政府,并至少在南部地区恢复了

本来陷入停滞状态的经济。北方的繁荣则遭到"匪帮"叛乱团体的破坏，这些叛乱团体是从苏丹南部地区进行叛乱活动的。他们一直是穆塞韦尼政权的麻烦，并消解了穆塞韦尼政权"包容性"的信誉。

卢旺达

453

自 1973 年开始掌权的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地图 30.3　1990—2004 年的中东非。

Habyarina)政权,对其他被排除的胡图精英来说是一个带有地方利益色彩的政权。哈比亚利马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的文官一党制国家,一直延续到 1991 年多党体系出现。此时,由于乌干达图西流亡者的入境而爆发了内战。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 Patriotic Front)的士兵们在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的领导下,在乌干达与约韦里・穆塞韦尼的全国抵抗军的斗争中(1981—1986 年)掌握了游击战术。

454

哈比亚利马纳最初对侵入的反应是压制基加利的图西人。紧接着就召集并训练数千胡图民兵,这些民兵被称为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即"站在一起的人")。法国为哈比亚利马纳的军队和民兵提供训练和武装。法国决定在这个属于"法语国家共同体"的小国中保持影响力,并阻止卢旺达倒向曾执教于乌干达人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中的"英国人"。联攻派民兵接受了秘密的政治教化,让他们作"最后的清算",对卢旺达境内所有图西族人采取种族灭绝行动,并清洗反对胡图族政权的胡图族"叛徒"。

1992 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哈比亚利马纳与卢旺达爱国阵线达成协议,1993 年的阿鲁沙协议(Arusha Accord)同意让卢旺达爱国阵线有限地分享权力。但是,这被胡图族强硬派看作一种背叛。哈比亚利马纳多年统治所依托的北部家族派系疏远了他,并使其丧失了更多的胡图族人的支持,他们不再信任哈比亚利马纳会特别地保护胡图人的利益。当邻国布隆迪新任胡图族总统梅尔基奥尔・恩达达耶(Melchoir Ndadaye)在 1993 年 10 月遭到布隆迪的主要为图西人的军队暗杀后,死神便笼罩着布隆迪全境。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秘密地拟定了暗杀名单,联攻派民兵在臭名昭著的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 Collines)的怂恿与引导下,准备对图西"蟑螂"实行大清洗。

1994 年 4 月 6 日,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在飞往基加利机场时被击落,大屠杀开始了。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主要政治官员在数小时内就遭到杀害。卢旺达全国有数十万图西族平民在短时间内遭到屠杀,即约

100 天的时间内有约 80 万的图西族人遭到杀害，其屠杀人数之多、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在被屠杀的图西族人之中，很多人通常都是在避难的教堂被邻居用大砍刀杀害的，他们很少或没有得到神职人员的保护。

1994 年 7 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占领基加利之后，屠杀才得以终止。联攻派民兵带着 200 万胡图族平民向西逃到扎伊尔（刚果），以求得蒙博托的保护。整个逃离过程是在法国干涉军队的监控下进行的。这让联攻派民兵以及胡图族军队的残余部队得以重组，并对卢旺达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政府的安全构成了持续的威胁。

1995 年，卡加梅的卢旺达军队侵入扎伊尔东部的胡图族人难民营，他们搜寻联攻派民兵，并将大量的胡图族难民赶回卢旺达。

刚果民主共和国（扎伊尔）

卢旺达政府认为只有清除了扎伊尔东部所有可能叛乱的胡图族人之后自身才是安全的。1996 年，卢旺达政府看到了扎伊尔东部存在可能的反叛。卢旺达支持反叛在事实上变成了对邻国的侵入，并在 1997 年击败了蒙博托军队，并导致蒙博托本人的下台，这是这场侵略行动的最高潮。卢旺达将老练的刚果叛乱分子劳伦特·卡比拉扶上金沙萨的权力中心。这个新政府将扎伊尔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但这个新政府并没有带来卢旺达及其盟友乌干达所期望的边界安全。由于担心卡比拉政府会支持刚果东部的胡图族及其他敌对力量，卢旺达和乌干达在 1998 年改变了立场，派遣了占领军以支持刚果东部的反卡比拉武装。 455

由于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站在卡比拉政府一边并参与了进来，这使得刚果内战变得国际化了。虽然安哥拉、乌干达和卢旺达的干预都声称是出于战略安全利益考虑，且纳米比亚是出于对安哥拉的支持，但是津巴布韦的干预动机则较为模糊。在很大程度上，津巴布韦主要是为了保证其在刚果的钻石特许权以及为了转移其对国内问题的注意。战争延续了七年，争夺矿产财富、侵犯人权——也成为乌干达和

卢旺达军队的干预理由。2001 年 1 月,劳伦特·卡比拉遭到其保镖的刺杀之后,其子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成为刚果总统。在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地区和平协定最终在 2002 年 12 月达成了。协定规定,所有外国军队将在 2003 年全部撤离刚果。300 多万的刚果人死于长达五年的内战,刚果在未来要实现彻底的和平、稳定和恢复,依然相当困难。

南部非洲

南非

非洲其他地区在关注其本身独立后的发展或发展受限的时候,林波波河以南地区的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依然还在进行中。南非政府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残暴地镇压了所有的反对势力,并确保在没有黑人起义之后,依然继续推行其种族隔离制度。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再次出现了反抗,主要表现为黑人工人争取更多报酬而展开的大规模自发性的罢工,尤其是在纳塔尔。罢工行动取得初步成功后更是引发了更多的罢工,直到政府被迫通过立法来制约工会。同时,黑人学生中产生了被称为"黑人觉醒"的一种新"泛非主义"运动,与法属西非殖民地的黑人性运动一样。黑人性的目标是重塑黑人自尊,它重新唤醒了黑人靠自己来实现解放,而无需白人自由派力量以及其他力量。

黑人学生长期以来对黑人教育水平低下非常不满,黑人教育所得到的经费几乎只有白人教育经费的十分之一。1976 年 6 月 16 日,警察在约翰内斯堡市郊的索韦托发生的 1.5 万名学生的和平请愿中进行开枪镇压。这次事件成为导火索,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抗。1976—1977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都存在暴乱、罢课和警察镇压,至少有 600 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或被投入监狱。其中,黑人觉醒运动领导人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在警察局拘禁中被打死。

20 世纪 80 年代,东开普和德瓦士南乡镇的黑人反抗者组织了有

效的罢工、罢商、罢课，并拒交公用住宅租金。为此，政府建立了由黑人来管理的乡镇委员会，认为这些委员会更有效地控制乡镇和收集租金。可是，这些乡镇委员会委员很快就被人们视为政府的走狗，因此也就成为人们的泄愤目标。思想激进、失业和离校的青年自称为“同志”，在乡镇中另建了“公民协会”。他们成立了人民法庭以审判案犯、加强反抗行动和惩罚那些警察局的线人。 456

1985 年 7 月，乡镇已经脱离了政府管理，P. W. 博塔总统宣布全国某些特定的乡镇处于“紧急状态”。之后，数百人死亡，数千人以安全管制为由遭到拘禁。同时，安全部队鼓励保守派黑人——绝大部分是居住在馆舍的移民劳工，他们害怕那些革命青年——充当义务治安员，打击乡镇反抗及激进青年的权势。自 1985 年 9 月，治安团体开始攻击并焚烧住有反抗运动同情者的房屋和贫民窟，而安全部队就在一旁观看。

与此同时，国际新闻媒体电视转播了乡镇中的冲突，尤其是安全部队残暴地用实弹射击没有武器的游行群众。很显然，南非政府过分吹嘘的“改革”对黑人大众来说毫无意义，而且国家的暴力程度在世界看来也是不能接受的。西方政府在此之前很少留意种族隔离制度的不正义，此时也不得不改变立场了。外资开始撤离南非，1985 年 8—9 月之间，南非的兰特只相当于其在 1984 年价值的三分之一。

大约在同一时期，很多有名的白人商人往北前往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去会见流放中的非国大(ANC)。随后，南非政治家、学者，主要是荷裔南非人也来访问非国大。很显然，阿非利堪国民党政府很快就失去了信誉，甚至是在其自己的支持者中间。但是，南非政府并不承认这一事实，在 1986 年，全国延长了紧急状态的时限，在 1987 年还颁布了禁令，并实行了大范围的拘捕。

纳米比亚成为使南非政府倒台的最后一根稻草。多年来，南非一直在安哥拉南部草地上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其古巴同盟军作战。1987 年，南非侵入安哥拉南部，这主要是出于南非政府的需要，它要让其白人选民确信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反对真

正敌人的安全战争。所谓的真正敌人是南非政府宣传想象出来的国外黑人“共产主义者”。然而就在此时，接受古巴培训的安哥拉空军已经控制了安哥拉南部的领空。1988 年，南非侵略军陷入奎托夸纳瓦莱(Cuito Cuanavale)包围中。南非政府最终在美国的调停下不得不走向谈判桌，同意结束其对纳米比亚长期的不合法占领，以换取其军队可以从奎托夸纳瓦莱撤离出来以及古巴军队从安哥拉分阶段的撤离。协议一达成，纳米比亚很快就开始自由选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赢得了 1989 年的选举。1990 年 3 月，在萨姆·努乔马的领导下，纳米比亚宣布独立。

1989 年，P. W. 博塔总统遭到挫败并被迫退休。F. W. 德克勒克(F. W. de Klerk)接任总统和国民党党首。虽然德克勒克之前在内阁中是个强硬派，但迫于形势，不得不重新评估整个局势。他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举措，废除了《人口登记法》与《集团地区法》(*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nd Group Areas Acts*)，解禁了非国大、阿扎尼亚泛非主

457



20 世纪非洲重大事件之一，所有种族的南非人在为期四天，即 1994 年 4 月 26—29 日的首次不分种族的全国选举中行使其投票权。为此，他们要在投票站上排队很长时间。

义者大会和其他政党，释放了大量著名的政治犯。1990 年 2 月 11 日，在众多被释放的政治犯中，最著名的曼德拉结束了 27 年的牢狱生涯重新获得了自由。

之后，南非各政党间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密集的、引人注目的谈判。谈判主要是在曼德拉的非国大和德克勒克的国民党政府之间展开的。他们经过反复磋商，为未来的宪法确立了根本原则。谈判是在南非暴力行为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结束的。在竞争性政治力量寻求填补由于过渡政府的虚弱而留下的权力真空过程中，数千人丧失了生命。在德兰士瓦和开普，馆舍居住者与乡镇居民之间的宿怨被安全部队中的某些部分再次激发起来，这些人依然将非国大视为共产主义敌人。同样地，在纳塔尔，夸祖鲁首席部长曼戈苏托·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在安全部队中右翼势力的支持下，利用其英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作为自卫队，在纳塔尔削减非国大的影响，并削减祖鲁人对非国大的支持。同时，右翼的荷裔南非人吵嚷着要进行军事反抗，并含糊地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荷裔南非人家园。

1994 年 4 月，在南非第一次不分种族选举后，曼德拉宣誓成为南非总统，并领导非国大主导下的“全国统一政府”。曼德拉任期内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种族间的和解，当然，从这个方面上说，南非是非常成功的。关于经济领域里的判断依然还没有定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南非白人商业团体第一次向流亡的非国大示好之后，有一点就变得很清楚，即非国大政府不会推行其在《自由宪章》和后来的宣传中所勾画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德克勒克在明白这一点之后立即做出决定，要与非国大进行正式谈判。曼德拉和其继任者塔博·姆贝基以及非国大其他领导一般都认为要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会让黑人大众分享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解放。南非解放十年后，资本主义的种族隔离式的现实业已暴露出来了：与曾经的种族问题一样，阶层特权与控制依然存在。虽然新出现的富裕的黑人中产阶级加入了白人精英，但是这些阶层分化依然在相对隔绝开来的乡村里存在。在电气化、供水和住房方面，曼德拉

458

和姆贝基的非国大政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庞大的贫困人口的发展方面则进展缓慢。同时,阶层、贫富分化不断加大,且绝大多数土地、财富和商业依然控制在少数白人的手里。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南非的解放让其两个曾由葡萄牙统治的邻国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减轻了压力。对这两国来说,这意味着南非资助"叛乱"运动的结束,这些运动除了扰乱南非这两个"社会主义"邻国外并没有什么政治目标。和平的局势让莫桑比克很顺利地走向多党民主制。在莫桑比克,伴随着战后重建的快速经济增长只是在 2000 年和 2002 年的严重洪涝灾害的影响下才出现过暂时性中断。

1992 年,安哥拉试图将反叛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纳入宪政民主的努力失败了。当萨文比意识到选举失败后,又再次逃入丛林并重燃战火。他的这种决定受到了美国(萨文比以前的支持者)没有立即承认的、名义上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的鼓励。美国在美国石油公司与安哥拉政府之间的谈判结果出来前的 6 个月内都没有承认安哥拉政府。"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的反叛运动部分地得到了安哥拉与刚果的非法钻石贸易的资助,反叛运动一直延续到萨文比在 2002 年 2 月战死。

津巴布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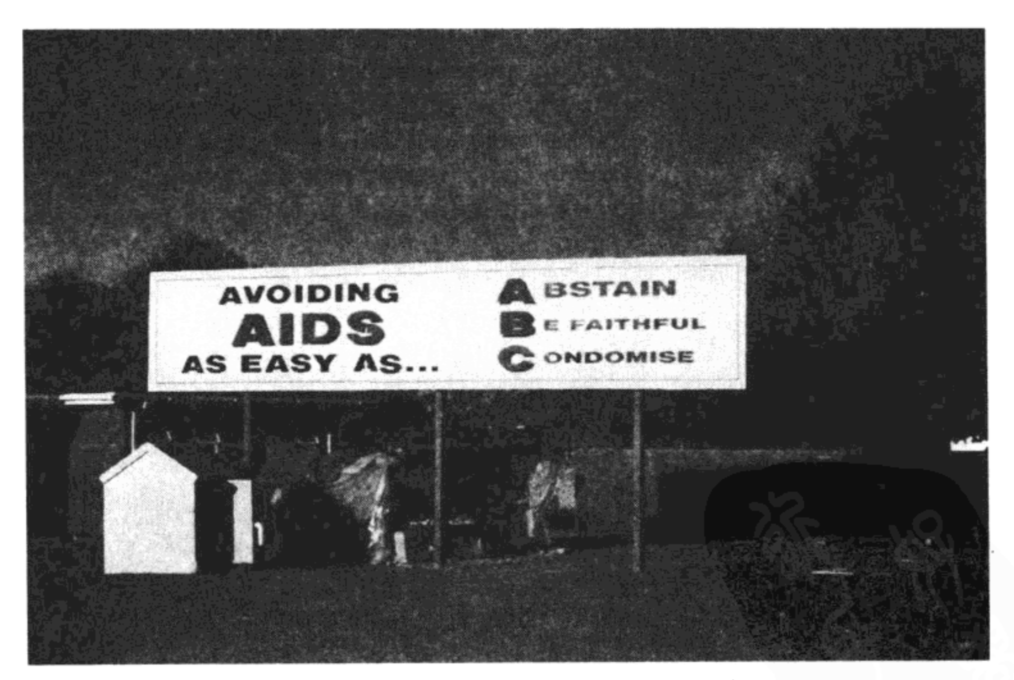
1980 年津巴布韦政治解放后,罗伯特·穆加贝政府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全国绝大多数可耕地控制在一小部分白人手中。这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解放战争中绝大部分老兵所要解决的问题。穆加贝曾相信英国政府的口头保证,即英国将会筹集资金向白人农民赎买,正是这些白人农民的先辈在 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殖民化过程中不花分文地夺取了土地。可是,这项资金并没有筹措成功。起先,穆加贝并没有着急处理此事,因为白人所有的经济农场中的烟草产品是津巴布韦主要的外汇来源。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失业率不断上升,受到

良好教育、善于表达的城市选民给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政府带来了政治压力。正是在这些背景下,穆加贝选择回到土地重新分配的“未竟事业”上。由于非洲民族联盟的鼓励,很多自称为“作战老兵”(其中有很多人过于年轻,压根就没有作过战)的人占领了白人土地,并强迫绝大多数白人土地所有者放弃农场。“土地重新分配”的无政府状态让非洲民族联盟青年在农村地区制造了恐慌,因此也确保了非洲民族联盟在后来选举中的胜利。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外国资本撤离出津巴布韦,货币汇率和通货膨胀率高涨,经济崩溃了。然而,穆加贝否认国家的经济混乱和执政中所使用的政治暴力,坚持反对殖民主义的宣传,并将津巴布韦的灾难归咎于英国政府。

459

新千年的非洲

在新千年里,一个将要影响非洲大陆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就是艾滋病的流行,它在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的传播得尤其迅



博茨瓦纳的一幅健康教育海报,1997 年。博茨瓦纳(具有非洲大陆最好的卫生诊所设施、学校、净水且政治稳定)学习乌干达相对成功的案例,发动了一场阻止艾滋病流行的公众信息和同侪教育。

速。新药品和公共健康教育计划可以减缓甚至阻断病毒的传播,但是与此同时,艾滋病正在毁灭一代人,这代人自独立后已经长大成人,未来的希望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他们。

尽管存在这个问题,非洲人在新千年的头十年内还是大有希望的。由于非洲人本身的贡献与努力,20 世纪 90 年代曾肆虐整个大陆的绝大部分内战已经结束,并实现了和平。在新非盟的泛非主义引领下,非洲或许正处在真正复兴的起步阶段。



进一步阅读建议

说明：在为第三版列出阅读清单时，我省略了 1985 年前出版的许多著作，以及 1985 年后出版的一些著作。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著作没有价值，而是为了给更近期，特别是 1995 年后出版的著作腾出篇幅。出版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的推荐阅读作品，请参见本书的第二版(1995 年出版)。综合性参考书目如下：

最全面的综合性参考著作有(按出版顺序)：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8 vols (CUP, Cambridge, 1975 -1986)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8 vols (Heinemann, London, 1981 - 1993; abridged paperback editions, James Currey, Oxford, 1990 - 1999)

J.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ical Atlas of Africa* (Longman, Harlow, 1985)

T. Falola (ed.), *Africa*, 5 vols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Durham NC, 2000 - 2003)

K. Shillington (ed.),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History* (Routledge Reference, New York, 2005)

单卷本通史包括(按出版顺序):

J. Iliffe, *Africans: 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 (CUP, Cambridge, 1995)

P. Curtin, S. Feierman, L. Thompson and J. Vansina, *African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Independence*, 2nd edition (Longman, Harlow, 1995)

E. Isichei, *A History of African Societies to* 1870 (CUP, Cambridge, 1997)

B. Freu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Society since 1800*, 2nd edition (Macmillan, Basingstoke, 1998)

J. D. Fage with W. Tordoff, *A History of Africa*, 4th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2002)

C. Ehret, *The Civilizations of Africa: A History to 1800* (James Currey, Oxford, 2002)

R. Oliver and A. Atmore, *Africa Since 1800*, 5th edition (CUP, Cambridge, 2004)

详尽的地区纵览包括(按地区从北到南排列):

J. M. Abu-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UP, Cambridge, 1987)

J.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3rd edition, 2 vols (Longman, Harlow, 1985 - 1986)

J. P. Chretien, *The Great Lakes of Africa: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Zone, NewYork, 2003)

D. Birmingham and P. M. Martin (eds),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2 vols (Longman, Harlow, 1983)

T. Davenport and C. Saunders, *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00)

面向中学/高中层次水平,对非专业普通读者也有所裨益的地区介绍性著作(按地区从北向南排列):

B. Davidson, *Discovering Africa's Past* (Longman, Harlow, 1978)

F. K. Buah,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from AD 1000* (Macmillan, Basingstoke, 1986)

E. Atieno Odhiambo, T. Ouso, J. Williams,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gman, Harlow, 1977)

D. E. Needham, E. K. Mashingaidze, N. Bhebe, *From Iron Age to Independence: A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2nd edition (Longman, Harlow, 1984)

K. Shillington,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Longman Botswana, Gaborone, 2002)

关于方法和理论的图书有(按出版顺序):

J. Vansina,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James Currey, Oxford, 1985)

D. P. Henige, *The Chronology of Oral Tradition: Quest for a Chimera*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1987)

S. Howe, *Afrocentrism: Mythical Pasts and Imagined Homes*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具有争议性的、有影响力的挑战世界历史中欧洲中心主义的著作:

C. A. Diop, *The Africa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Lawrence Hill Books Chicago, 1974)

相关主题的综合性、长时段的重要著作有(按出版顺序):

G. Connah, *African civiliz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CUP, Cambridge, 1987)

J. Iliffe, *The African Poor: A History* (CUP, Cambridge, 1987)

D. M. Anderson and R. Rathbone (eds), *Africa's Urban Past* (James Currey, Oxford, 2000)

D. L. Hodgson, *Rethinking Pastoralism in Africa* (James Currey, London, 2000)

洲际范围的学术期刊,刊登一些关于非洲历史的最近研究文章和大量书评(按出版顺序):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1960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1968 -)

History in Africa (Los Angeles, 1974 -)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Cambridge, 1983 -)

主要涉及近代或当代事件的其他期刊:

African Affairs (form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since 1901) (Oxford, 1944 -)

African Studies Review (Atlanta, 1956 -)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Cambridge, 1963 -)

关于特定主题和时期且论述更为详尽的参考著作如下:

早期史前史和人类起源(第一章)

C. Stringer and R. McKie, *African Exodus: 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ity* (Jonathan Cape, London, 1996)

H. J. Deacon and J. Deacon, *Human Beginnings in South Africa: Uncovering the Secrets of the Stone Age* (David Philip, Cape Town, 1999)

L. Berger with Brett Hilton-Berber, *In the Footsteps of Eve: The Mystery of Human Origins* (National Geographic Adventure

Press, Washington DC, 2000)

史前史和种植业、畜牧业的起源(第一、二章)

B. E. P. Barich, *Water and Grain: The Beginnings of Domestication in the Sahara and the Nile Valley* (*L'Erma* di Bretschneider, Rome, 1998)

D. Lewis-Williams and T. A. Dowson, *Images of Power: Understanding Southern African Rock Art* (Southern, Johannesburg, 1999)

M. van der Veen (ed.). *The Exploit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in Ancient Africa* (Kluwer Academic, New York, 1999)

R. M. Blench and K. C. MacDonald (ed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ivestock: Archaeology, Genetics, Linguistics and Ethnography* (UCL Press, London, 2000)

F. Marshall and E. Hildebrand, 'Cattle before crops: the beginnings of food produc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 16 no. 2 (2002), 99 - 143

F. A. Hassan (ed.), *Droughts, Food and Culture: Ecological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s Later Prehistory* (KJuwer Academic/Plenum, New York, 2002)

K. Neumann, A. Butler, S. Kahlheber (eds), *Food, Fuel and Fields: Progress in African Archaeobotany* (Heinrich-Barth Insitutue, Köln, 2003)

史前史和铁器时代(第一至四章)

P. Perigrine and M. Ember (eds), *Encyclopedia of Prehistory: Africa* (Kluwer Academic/Plenum, New York, 2001)

D. W. Phillipson, *African Archaeology*, 2nd edition (CUP, Cambridge, 1993)

T. Shaw, P. Sinclair, B. Andah, A. Okpoko (eds), *The Archaeology of Africa: Food, Metals and Towns* (Routledge, London, 1993)

E. W. Herbert, *Iron, Gender and Power: Rituals of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n Societies*(Indiana UP, Bloomington, 1993)

J. E. G. Sutton (ed.), *The Growth of Farming Communities in Africa from the Equator Southwards*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Nairobi, 1995)

G. Pwiti and R. Spear (eds), *Aspects of African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Harare, 1996)

P. Lane, A. Reid, A. Segobye, *Ditswa Mmung: The Archaeology of Botswana* (Pula Press and Botswana Society, Gaborone, 1998)

G. Connah (ed.), *Transformations in Africa: Essays on Africa's Later Past* (Leicester UP, London, 1998)

C. Ehret, *An African Classical Age: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in World History, 1000 BC to AD 400* (James Currey, Oxford, 1998)

S. Kent (ed.), *Gender in African Prehistory* (Altamira Press, Walnut Creek, 1998)

B. Keine and D. Nurse (eds), *Africa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CUP, Cambridge, 2000)

古埃及、库施与麦罗埃(第二、三章)

K. A. Bord, *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 (Routledge, London, 1999)

B. Manley, *The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Ancient Egypt* (Penguin Books, London, 1996)

B. Midant-Reynes, *The Pre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First Egyptians to the First Pharaohs* (Blackwell, Oxford, 1999)

J. G. H. James, *A Short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From Predynastic to Modern Times* (Johns Hopkins UP, Baltimore, 1998)

P. A. Clayton, *Chronicle of the Pharaoh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and Dynasties of Ancient Egypt* (Thames and Hudson, New York, 1994)

W. S. Smith,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 3rd edition (Yale UP, New Haven, 1998)

A. Dodson, *The Hieroglyphs of Ancient Egypt* (New Holland, London, 2001)

J. Tyldesley, *Ramesses the Great* (Viking, London, 1999)

W. V. Davies, *Egypt and Africa, Nubia from Prehistory to Islam* (British Museum Press, London, 1991)

D. O'Connor, *Ancient Nubia: Egypt's Rival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hiladelphia, 1993)

D. Wildung (ed.), *Sudan: Ancient Kingdoms of the Nile* (Flamarion, New York, 1997)

D. A. Welsby, *The Kingdom of Kush: the Napatan and Meroitic Empires* (British Museum Press, London, 1996)

L. Török, *The Kingdom of Kush: Handbook of the Napatan-Meroitic Civilization* (Brill, Leiden, 1997)

公元 1000 年前的北非和东北非(第五章)

S. Raven, *Rome in Africa*, 3rd edition (Routledge, New York, 1993)

B. D. Shaw,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Roman North Africa* (Variorum, Aldershot, 1995)

D. Cherry, *Frontier and Society in Roman North Africa*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

B. A. Pearson, *Earliest Christianity in Egypt* (Institute for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 Claremont, 1997)

D. W. Phillipson, *Ancient Ethiopia* (British Museum Press, London, 1998)

M. Brett and E. Fentress, *The Berbers* (Blackwell, Oxford, 1996)

16 世纪前的撒哈拉和西非地区(第六、七章)

N. Levtzion, *Ancient Ghana and Mali* (Methuen, London, 1973)

N. Levtzion and J. F. P. Hopkins (eds), *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CUP, Cambridge, 1981)

P. A. Lovejoy, *Salt of the Desert Sun* (CUP, Cambridge, 1986)

G. Connah. *African civiliz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CUP, Cambridge, 1987)

R. Austen (ed.), *In Search of Sundiata: The Mande Epic a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Performance* (Indiana UP, Bloomington, 1999)

P. A.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2nd edition (CUP, Cambridge, 2000)

E. Savage, *The Human Commodity: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Frank Cass, London, 1992)

T. Insoll, *The Archaeology of Islam in Sub-Saharan Africa* (CUP, Cambridge, 2003)

16 世纪前的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第八、九、十章)

P. Henze, *Layers of Time: A History of Ethiopia* (Hurst, London, 1999)

D. Schoenbrun, *A Green Place, A Good Place: Agrarian Change, Gender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to the 15th Century* (Heinemann, Portsmouth NH, 1998)

J. G. Galaty and P. Bonte (eds), *Herders, Warriors and Traders: Pastoralism in Africa*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91)

J. P. Chrétien, *Burundi: L'histoire retrouvée* (Karthala, Paris, 1993)

P. R. Schmidt, *Iron Technology in East Africa* (James Currey, Oxford, 1997)

M. Horton and J. Middleton, *The Swahili* (Blackwell, Oxford, 2001)

C. M. Kusimba, *The Rise and Fall of Swahili States* (Altamira, Walnut Creek, 1999)

P. Garlake, *Great Zimbabwe Describedand Explained'*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73)

T. H. Huffman, *Snakes & Crocodiles: Power and Symbolism in Ancient Zimbabwe* (Witwatersrand UP, Johannesburg, 1996)

M. Hall, *The Changing Past: Farmers, Kings and Traders in Southern Africa, 200 –1800* (David Philip, Cape Town, 1987)

E. N. Wilmsen, *Land Filled with Flie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alahar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9)

R. K. Kent, *Early Kingdoms in Madagascar, 1500 –1700*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ew York, 1970)

18 世纪前的北非(第十一章)

E. R Walker, *Exploring an Islamic Empire: Fatimid History and its Sources* (I. B. Taurus, London, 2002)

D. Nicolle, *The Mamluks, 1250 –1517* (Osprey, London, 1993)

J. M. Abu-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UP, Cambridge, 1987)

M. Le Gall and K. Perkins (eds), *The Maghrib in Ques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97)

V. J. Cornell, *Realm of the Saint: Power and Authority in Moroccan Sufism* (Univeris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98)

19 世纪前的奴隶贸易和西非(第十二、十三和十六章)

E.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C, 1944)

R. Anstey,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 - 1810* (Macmillan, London, 1975)

B. L. Solow and S. L. Engerman (eds), *British Capitalism and Caribbean Slavery: The Legacy of Eric Williams* (CUP, Cambridge, 1987)

J.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 -1800* (CUP, Cambridge, 1998)

R. Law, *The Slave Coast of West Africa, 1550 -1750: The Impact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n an African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

E. G. Bay, *Wives of the Leopard: Gend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Kingdom of Dahome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Charlottesville, 1998)

I. Wilkes, *Forest of Gold. Essays on the Akan and the Kingdom ofAsante* (Ohio UP, Athens GA, 1998)

T. McCaskey, *State and Society in Pre-colonial Asante* (CUP, Cambridge, 1995)

R. Roberts, *Warriors, Merchants and Slaves: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the Middle Niger Valley, 1700 -1914* (Stanford UP, Stanford, 1987)

A. Djata, *The Bamana Empire by the Niger: Kingdom, Jihad and Colonization, 1712 -1920* (Markus Wiener, Princeton, 1997)

J. L. A. Webb, *Desert Frontier: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along the Western Sahel, 1600 - 185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95)

B. Barry, *Senegambia an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Senegambia Before the Colonial Conquest* (CUP, Cambridge, 1998)

W. Hawthorne, *Planting Rice and Harvesting Slaves: Transformations along the Guinea-Bissau Coast, 1400 - 1900* (Heinemann, Portsmouth NH, 2003)

J. A. D. A. Alie, *A New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0)

T. Shick, *Behold the Promised Land: A History of the Afro-American Settle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beria* (Johns Hopkins UP, Baltimore, 1977)

19 世纪前的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第十四、十五、十七和十八章)

A. Hilton, *The Kingdom of Kongo* (Oxford UP, Oxford, 1985)

J. C. Miller, *Way of Death: 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Angolan Slave Trade, 1730 - 183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88)

J. Vansina, *Paths in the Rainforests: Towar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 (James Currey, Oxford, 1990)

R. Harms, *River of Wealth, River of Sorrow: The Central Zaire Basin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and Ivory Trade, 1500 - 1891* (Yale UP, New Haven, 1981)

R. Reid, *Political Power in Pre-Colonial Buganda* (James Currey, Oxford, 2002)

M. Hassen, *The Oromo of Ethiopia: A History 1570 - 1860* (Red Sea Press, Trenton NJ, 1994)

T. Spear, *Mountain Farmers: Moral Economies of Land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rusha and Meru (James Currey, Oxford, 1997)

M. Newitt, *A History of Mozambique* (Hurst, London, 1995)

A. Sheriff, *Slaves, Spies & Ivory in Zanzibar: 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 1770 –1873* (James Currey, Oxford, 1987)

D. Scarr, *Slaving and Slavery in the Indian Ocean*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8)

M. Carter, *Servants, Sirdars and Settlers: Indians in Mauritius, 1834 –1874* (OUP, Oxford, 1995)

M. Brown, *A History of Madagascar* (Damien Tunnacliffe, Ipswich, 1995)

P. M. Larson, *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Age of Enslavement: Becoming Merina in Highland Madagascar, 1770 –1822* (James Currey, London, 2000)

R. Elphick and H. Giliomee, *The Shaping of South African Society, 1652 – 1840*, 2nd edition (Maskew Miller Longman, Cape Town, 1989)

J. D. Omer-Cooper, *The Zulu Aftermath: A Nine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Bantu Africa* (Longman, Harlow, 1966)

J. Cobbing, The Mfecane as alibi: Thoughts on Dithakong and Mbolompo,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9 (1988), 487 – 519

C. Hamilton (ed.), *The Mfecane Aftermath: Reconstructive Debates in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Witwatersrand UP, Johannesburg, 1995)

N. Etherington, *The Great Tre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rn Africa, 1815 –1854* (Longman, Harlow, 2001)

J. Ramsay, B. Morton and P. T. Mgadla, *Building a Nation: A History of Botswana from 1800 – 1910* (Longman Botswana,

Gaboronc, 1996)

19 世纪和殖民征服(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

T.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1876 - 1912*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91)

A. Porter, *European Imperialism* (Macmillan, London, 1994)

A. Hastings, *The Church in Africa, 1450 -1950* (OUP, Oxford, 1995)

R. Gray, *Black Christians and White Missionaries* (Yale UP, New Haven, 1990)

K. R. Ross (ed.), *Christianity in Malawi: A Source Book* (Mambo Press, Gweru, 1996)

P. S. Landau, *The Realm of the Word: Language, Gender and Christianity in a Southern African Kingdom* (James Currey, London, 1995)

C. R. Ageron, *Modern Algeria. A History from 1830 to the Present* (Hurst, London, 1991)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New York UP, New York, 2000)

W. A. Hosington, *Lyautey and the French Conquest of Morocco*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5)

J. R. I. Cole, *Colon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Egypt's' Urabi Movement* (Princeton UP, Princeton, 1993)

K. Fahmy,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CUV, Cambridge, 1997)

B. Zewde, *A History of Modern Ethiopia, 1855 - 1974* (James Currey, Oxford, 1991)

A. Shik - Abdi, *Divine Madness: Mohammed Abdulle Hassan*

(*1856 –1920*) (*Zed*, London 1992)

J. Hargreaves, *West Africa Partitioned*, 2 vols (Longman, Harlow, 1974 – 1984)

A. F. Clark, *From Frontier to Backwater: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Upper Senegal Valley, 1850 – 1920*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nham, 1999)

B. Nasson, *The South African War, 1899 –1902* (*Arnold*, London, 1999)

N. Worden,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frica: Conquest, Segregation and Apartheid*, 2nd edition (Blackwell, Oxford, 2000)

N. Parsons, *King Khama, Emperor Joe and the Great White Que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98)

J-B. Gewald, *Herero Heroes: A Socio-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erero of Namibia, 1890 –1923* (James Currey, London, 1998)

殖民主义在非洲(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章)

B. Digre, *Imperialism's New Clothes: The Repartition of Tropical Africa, 1914 –1919* (Peter Lang, New York, 1990)

J. Jankowski, Egypt: A Short History(One World, Oxford, 2000)

J.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Croom Helm, London 1982)

B. A. Mojuetan, *Hist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Morocco: The Structural Roots of* Conjncture (Lit Verlag, Heinburg, 1995)

M. Gershovich, French Military Rule in Morocco: *Colonialism and its Consequences* (Frank Cass, Portland, 2000)

G. Warburg, Islam, *Secularism and Politics in Sudan since the Mahdiya* (Hurst, London, 2003)

P. Manning, *Francophone Sub-Saharan Africa, 1880 – 1995*, 2nd edition (CUP, Cambridge, 1998)

R.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 – 1960* (James Currey, Oxford, 2000)

C.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 –1960* (CUP, Cambridge, 2003)

M. Klein, *Slavery and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 (CUP, Cambridge, 1998)

M.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at War, 1940 –1945* (Manchester UP, Manchester, 1998)

J. H. Lunn, *Memoirs of the Maelstrom: A Senegalese Oral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einemann, Portsmouth NH, 1999)

M. van Beusekom, *Negotiating Development: African Farmers and Colonial Experts at the Office du Niger* (James Currey, Oxford, 2002)

T. Falola, *The History of Nigeria*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1999)

H. L. Moore and M. Vaughan, *Cutting Down Trees: Gender, Nutrition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Zambia, 1890 –1990* (Heinemann, Portsmouth, 1994)

M. Twaddle, *Kakungulu and the Creation of Uganda* (James Currey, Oxford, 1993)

D. M. Anderson and D. H. Johnson (eds), *Revealing Prophets: Prophecy in Eastern African History* (James Currey, Oxford, 1995)

W. R. Ochieng (ed.), *A Modern History of Kenya, 1895 – 1980* (Evans, London, 1989)

W. O. Maloba, *Mau Mau and Kenya* (Indiana UP, Blomington, 1993)

L. Buchert,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nzania, 1919 – 1990* (James Currey, Oxford, 1994)

J. Gahama, *Le Burundi sous administration belge* (Karthala, Paris, 1983)

S. Nelson, *Colonialism in the Congo Basin, 1880 - 1940* (Ohio University Athens GA, 1994)

A.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Houghton Mifflin, New York, 1998)

T. Ranger, *Are We Not Also Men? The Samkange Family and African Politics in Zimbabwe, 1920 - 1964* (James Currey, Oxford, 1995)

S. Miers and M. Klein (eds), *Slavery and Colonial Rule in Africa* (Frank Cass, London, 1999)

S. Friedrichsmeyer, et al. (eds), *The Imperialist Imagination: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ts Legac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98)

C. Coquery-Vidrovitch, *African Women: A Modern History*, translated by B. G. Rap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97)

D. Chichester, *Savage Systems: Colonialism and Comparative Religion in Southern Afric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1996)

A. Kirk-Green, *Britain's Imperial Administrators, 1858 - 1966*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0)

A. Sbacchi, *Legacy of Bitterness: Ethiopia and Fascist Italy, 1935 - 1941* (Red Sea Press, Lawrenceville NJ, 1997)

T. Tibebu, *The Making of Modem Ethiopia, 1896 - 1974* (Red Sea Press, Lawrenceville NJ, 1995)

B. Zewde *A History of Modern Ethiopia, 1885 - 1991* (James Currey, Oxford, 2001)

M. D. Abdullahi, *Culture and Customs of Somalia*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2001)

W. Beinart,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2nd edition (OUP, Oxford, 2001)

赢取独立(第二十六、二十七章)

J. D. Hargreaves, *Decolonisation in Africa*, 2nd edition (Longman, Harlow, 1996)

R. L. Tignor, *Capitalism and Natinalism at the End of Empire: State and Business in Decolonizing Egypt, Nigeria, and Kenya, 1945 - 1963* (Princeton UP, Princeton, 1998)

C. R. Pennell, *Morocco: From Empire to Independence* (One World, Oxford, 2003)

F. Cooper, *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 The Labo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 (CUP, Cambridge, 1996)

D. Birmingham, *Kwame Nkrumah: The Father of African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Ohio UP, Athens GA, 1998)

R. Rathbone, *Nkrumah and the Chiefs: The Politics of Chieftaincy in Ghana, 1951 - 1960* (James Currey, Oxford, 2000)

J. G. Vaillant, *Black, French and African: A Life of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Harvard UP, Cambridge MA, 1990)

B. A. Ogot and W. R. Ochieng (eds), *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Kenya, 1940 - 1993* (James Currey, Oxford, 1995)

K. Kyle, *The Politic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Kenya* (Macmillan, London, 1999)

S. Geiger, *TANU Women: Gender and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Tanganyikan Nationalism, 1955 - 1965* (Heinemann, Portsmouth NH, 1997)

C. Baker, *State of Emergency: Crisis in Central Africa, Nyasaland, 1959 –1960* (I. B. Tauris, London, 1997)

C. Legum, *Congo Disaster* (Penguin Books, Baltimore, 1961)

T. Kanza, *Conflict in the Congo. The Rise of Fall of Lumumba* (Penguin Books, London, 1972)

L. de Witte, *The Assassination of Lumumba*, translated by A. Wright and R. Fenby (Verso, London, 2001)

L. Heywood, *Contested Power in Angola, 1840s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Rochester NY, 2000)

A. Sampson, *Mandela: The Authorised Biography* (Harper Collins, London, 1999)

独立后的非洲(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章)

M.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James Currey, Oxford, 1996)

M. Cowen and L. Laakso (eds), *Multi-Party Elections in Africa* (James Currey, Oxford, 2002)

北非

J. Reudy (ed.), *Islamism and Secularism in North Africa*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S. E. Ibrahim, *Egypt, Islam and Democracy*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Cairo, 1996)

M. Badran, *Feminists, Islam and Nation: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Princeton UP, Princeton, 1995)

G. Arnold, *The Maverick State: Qaddafi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Cassell, London, 1996)

R. Lemarchand, *The Green and the Black: Qadhaffi's Policies in Africa* (Indiana UP, Bloomington, 1988)

R. Malley, *The Call of Algeria: Third Worldism, Revolution and the Turn to Islam* (UCLA Press, Berkeley, 1996)

L. Martinez, *The Algerian Civil War, 1990–1998* (Hurst London, 1999)

E. C. Murph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unisia: From Bourguiba to Ben AH* (Macmillan, London, 1999)

西非

E. E. Osaghae, *Crippled Giant: Nigeria since Independence* (Hurst, London, 1998)

J. Bingen et al. (ed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Mali* (Michigan State UP, Lansing, 2000)

E. Hutchful, *Ghana's Adjustment Experience: the Paradox of Reform* (James Currey, Oxford, 2002)

J. L. Hirsch, *Sierra Leone: Diamond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Lynne Rienner, Boulder, 2000)

P. Richards, *Fighting for the Rain Forest: War, Youth and Resources in Sierra Leone* (James Currey, Oxford, 1998)

东非

O. M. Eide, *Revolution and Religion in Ethiopia, 1974–1985* (James Currey, 2000)

C. Gordon, *The Horn of Africa*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I. M. Lewis,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omali*, 4th edition (Ohio UP, Athens GA, 2002)

D. H. Johnson, *The Root Causes of Sudan's Civil Wars* (James Currey, Oxford, 2003)

H. B. Hansen and M. Twaddle (eds), *Developing Uganda* (James Currey, Oxford, 1998)

H. Behrend, *Alice Ladwena and the Holy Spirits: War in Northern*

Uganda, 1986 –1997 (James Currey, Oxford, 1999)

J. Barkan (ed.), *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 (Lynne Rienner, Boulder, 1994)

C. Legum and G. Mmari (eds), *Mwalimu. The Influence of Nyerere* (James Currey, London, 1995)

E. Dommen and B. Dommen, *Mauritius: An Island of Success, 1960 –1993* (James Currey, Oxford, 1999)

中非

R. Lemarchand, *Burundi: Ethnic Conflict and Genocide* (CUP, Cambridge, 1995)

G. 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1959 –1994* (Fontana, Kampala, 1995)

G. Prunier, *Rwanda in Zaire: From Genocide to Continental War* (Hurst, London, 2000)

C. P. Scherrer, *Genocide and Crisis in Central Africa: Conflict Roots, Mass Violence and Regional War* (Praeger, Westport, 2002)

南部非洲

T. Hodges, *Angola: Anatomy of an Oil State*, 2nd edition (James Currey, Oxford, 2001)

I. Tvedten, *Angola: Struggle for Peace and Reconstructio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1997)

S. Moyo, *The Land Question in Zimbabwe* (SAPES, Harare, 1995)

T. Lodge,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From Mandela to Mbeki* (Indiana UP, Bloomington, 2003)

S. L. Robins (ed.), *Limits to Liberation in South Africa: Citizenship and Governance after Apartheid* (Ohio UP, Athens GA, 2004)

索　　引

（索引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C

D

E

H

L

M

N

Q

R

S

T

U

译后记

翻译后第一次校对完《非洲史》的这一天正好是2010年12月8日。12月8日在非洲历史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全非人民大会正是1958年12月8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的。算是一种纪念吧。

要一个人用30—40万字左右的篇幅叙述完非洲历史的整个进程，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都是极其有难度的。就历史著作来说，单卷本的非洲通史要想处处流彩似乎注定是不可能的。凯文·希林顿（Kevin Shillington）的这本《非洲史》也不例外，但还是有其特色的。

凯文·希林顿1968年毕业于著名的都伯林三一学院，学的是现代史。20世纪80年代，希林顿在博茨瓦纳大学培训历史教师，并在非洲多个大学和中学里教授非洲史。这种经历在西方非洲史学者中是不太多见的。希林顿也是一个著述颇丰的研究者，主要著作有《南茨瓦那的殖民化》（*The Colonisation of the Southern Tswana*, 1985）、《南部非洲史》（*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1987，2002年出了该书的第二版）、《贾格纳特：毛里求斯总理》（*Jugnauth: Prime Minister of Mauritius*，1991）、《非洲冒险：塞西尔·罗得斯的短暂一生》（*An African Adventure: a brief life of Cecil Rhodes*，1991）、《加纳与罗林斯的影响》（*Ghana and the Rawlins Factor*，1992）、《非洲独立的根由与影响》（*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dependence in Africa*,

1997)以及《非洲史》(*History of Africa*，1989 年出了第一版，1998 年出了第二版，2005 年对第二版作了修订)等。

应该说，这本《非洲史》是非洲研究入门级一个重要作品。作为译者，我想谈一下本书的几个特点。首先，作者用平白的语言，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论述了非洲整个历史进程，其中具体涉及到的民族、部族、语言、宗教、城镇、私人信件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等等内容，头绪繁多，但作者叙述流畅且不时夹杂着某些坚守的立场与评论；比如，作者在论述非洲奴隶贸易终结时指出，奴隶贸易终结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比如，商业贸易在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作者所强调的内容，尤其是在作者论述非洲殖民史、东非斯瓦希里城镇部分。其次，作者写作的立场。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希林顿在写作非洲历史著作与教材的时候，其非洲本位意识是非常强的，大体上做到了站在非洲人的立场来看待非洲历史发展与未来进程。无论是开篇还是结尾部分，都体现出作者对非洲所充满的热爱与乐观态度，虽然其观点在证据上显得有些单薄。作者在序中曾说，“将非洲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置于非洲本身的历史场景中，因此避开了很多论述当代非洲大陆作品中所具有的那种严重的负面论调”。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在很多主题论述上，作者会将非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迁放在非洲本身所处在的历史场景中来考虑与理解。但是，作者在论述奴隶输出时，或许是出于“立场”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为西方人的奴隶贸易做辩护，读者会在第十二章以及其他部分章节中看到这一点。最后，本书图文并茂，近 100 幅地图、200 幅左右图片，更是增加了读者对非洲历史的直观了解。

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做翻译，但对我而言要翻译一本非洲通史难度确实也不小。困难的地方倒不是英文的语法与希林顿用笔时所用的词汇，而是非洲历史中所出现的地名、人名与历史专有名词的翻译。中国的非洲史学界至今为止依然还没有编纂过一本通用的统一的非洲地名、人名和历史专有名词的英汉翻译手册，这一点极其令人遗憾。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在刘鸿武教授的主持下，目前正式启动了非洲地

名、人名和历史专有名词翻译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可谓中国非洲研究基础中的基础，对中国非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的规范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我要对刘鸿武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以及引荐。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李明英女士翻译了第十一章、十四章、二十章的初稿，然后由我逐字逐句进行了校对；肖玉华博士对地名、人名、专有名词的翻译给予很多帮助；非洲研究院的硕士生燕丽君、李桂洲对地图中的英文做了誊抄；之后，我进行了统稿，并进行了初校；最后，刘鸿武教授进行了审校。我也向北京大学的李安山教授请教了几处翻译问题。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当然，译稿中所出现的错误或不妥之处由本人负责。我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逸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谭秀英编审，两位老师在我翻译的过程中给予很多提醒与鼓励，希望能不负两位老师的期望。同时，我也要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他们做了细致的编辑工作。但是，由于我水平有限，呈现给读者的这个译本肯定会有一些疏漏，还希望读者能给予批评与指正。

赵俊于骆家塘

2010 年 12 月



书名=非洲史
作者=（美）希林顿著；赵俊译
页码=628
ISBN=
SS号=13083629
dxNumber=000008345501
出版时间=2012.08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定价：